《华北治安战》

【作　者】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 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

- 【形态项】 956 页 ； 19cm
- 【出版项】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2
- 【ISBN 号】 5072.3 / K265.606
- 【原书定价】 CNY1.42
- 【主题词】侵华事件(地点：日本 学科：史料)
- 【参考文献格式】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 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华北治安战．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

承蒙 bloodoooo 提供上述格式和资料，再次重发《华北治安战》WORD 版。

这是我根据网络上流传的版本用 CAJ 录入的，未经第二次校正，因此舛误在所难免，我自己这一段引用时，都发现了几个。因为看书很费时，闲暇又少，我差不多录入了半年，因此也不大可能精校一遍，就把这个半成品放在这边，供大家参考和进一步精校和做成电子书。

文字版其实很难看，不如原来那种 OCR 版的格式好看，但是方便检索和引用。

《华北治安战》的内容非常丰富，虽然我经常看到该书被引用，早就知道其材料丰富，但仍然有出乎意料之感。

是绝对值得一看的。

这本《华北治安战》虽然是鬼子写的，却是完全符合主旋律要求的。

———

从这本书里，可以看到华北共军是怎样和倭寇浴血奋战，华北军民付出了怎样巨大的牺牲的。

我们经常说抗日人民游击战争，可是什么叫游击战争？什么叫人民游击战争？我们的概念却很模糊。

事实上，一贯以来的宣传都是说得很模糊，我们不很清楚这场战争的性质。

可是在《华北治安战》里，倭寇详细地描述了人民游击战争的组织架构，指出了敌后游击战争的全民性质，仅民众自卫队即达人口的十分一（还不包括妇女队，儿童团，老年队）。指出了共产党以其政策发动人民。

所谓人民游击战争并不如我们以前所肤浅地认为的，只是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等战术，正如日军指出的，首先是组织人民武装人民。至于战术什么倒在其次。

事实上，这些战术离开了人民的基础是根本无法执行的，地道的挖掘，需要全民的动员；地雷，同样主要由民兵埋放观察的。麻雀战，打冷枪杀伤敌人，等敌人追击时，经过几个村庄，却发现共军越追越少，最后不见了，这同样需要人民的支持和掩护。

因此战术是次要的，只有深刻理解游击战争的人民性质，才能真正理解敌后战场。

这一点上，我经常想起古龙的名言，“最了解你的人，不是你自己，而是你的敌人。”

倭寇对抗日人民游击战争的切身之痛，比我们自己可能还更深刻些。

———

这本书里还可以看到国军的通敌投降的很多事实。

甚至可以看到倭寇和国军夹击共军的事实，比如在决定河北命运的 1939 年，当共军和国军石友三（高树勋）部决战时，（石友三是亲日军阀，当时已经和倭寇秘密勾结，后来更公开投降，结果被部下高树勋诱捕活埋），倭寇出兵协助石友三部作战，当冀中共军吕正操部南下追击石友三部时，倭寇将吕部击溃。比如山西军阀阎锡山和倭寇的大量勾结，共同剿共的事实。比如山东国军荣子恒等部大量投降日军（山东伪军高达 20 万）。

某种意义上，华北抗战的领导权，是部分国军将领的卖国投降的行径，拱手让给共军的。山东共军即使在最后也没有二十万人啊。

———

此外这本书还提到了倭寇和共军之间的经济作战，对帮会的利用等等很多问题，应该说都是很有启发性的，却很容易被我们忽视的题材。

日方的这本书关于百团大战的评论也是非常珍贵的。按照大陆官方的宣传，百团大战简直就是完美得不行。可是令人奇怪的是，百团大战同时又是彭德怀的一条罪状。

既然是这么一场完美的战役，彭德怀何罪之有呢？

看完日方对百团大战的评论，我们才能对百团大战有更完整的认识。

———

在《华北治安战》里我们可以看到，

从军事角度说，正如倭寇指出的，百团大战是共军高估自身实力，而过早发动的一场大战，战斗中，共军将三年缴获积累的物资器材消耗殆尽，以至于难以为继。在战斗中，也暴露了习惯于游击战争的共军，不适应正规战，军官士兵都缺乏必要的素质，以至于倭寇后来缴获的共军文件里百团大战的经验教训，居然大部分是基本的军事常识。

从军事角度来说，彭德怀发动百团大战，却是是错误的，不合时宜的。在当时的中国，就算是国军，其装备弹药都大量依赖于外援。更何况被倭寇和国民党双重封锁的共军？

共军如果不能从敌人手里缴获武器弹药来弥补战斗带来的损耗，那么这场战斗就是不应该打的，这样打，只会使得军队越打越弱，最终被消灭，而使得民族抗战的事业一起葬送掉。

以当时共军的实力，发动百团大战这样的战斗，虽然取得了一般意义上的军事胜利，可是所缴获的武器弹药不足以弥补共军的损耗，这在共军的实际情况来说，就是一场严重军事失败。

因为共军很难从别的方面得到补充，如果不能从敌人手里缴获补充，那就是失败。

这样的所谓胜利，是难以为继的，是皮洛士式的胜利。（古希腊国王，远征意大利，因为无法从当地补充兵员，所以尽管屡战屡胜，最终却失败）

难怪一方面对外宣称胜利，对内却对彭德怀意见很大。

从当时的军事角度来说，共军仍然应该进行自己擅长的游击战，不断消灭敌人，缴获武器，壮大自己。等到共军有足够的步枪（而不是大刀），有足够的重武器，从而有力量在大规模战斗中缴获多于损耗的时候，才是共军转入正规战的时候。而那是 **1943** 年以后才具备的条件。

———

但是，

从政治角度来说，也正如日方所承认的，百团大战是一场意义重大的战斗。

日方战史，《华北治安战》里还说得不详细，而只是粗略地提到，而在其他的《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等等，则指出，正是百团大战，使得倭寇在 **1940** 年诱降蒋介石的桐工作计划流产，在政治上评价很高。

———

因此我们回头看去，

即使历史重演，我们还有别的选择吗？

即使我们明知道百团大战将对共军带来严重的损失，可是为了打破蒋介石的公开投降的危局，是不是也只能不顾一切地发动来拯救抗战呢？

百团大战是一场不应该打，却不能不打的战斗。

这本书里多次说共军消极避战，如果从字面上理解，会有很多右右们如获至宝的，但是如果我们多看两行字，就会看到，倭寇评价共军的“消极避战”只是说共军不和倭寇硬碰，而并不是指共军不作战，只是因为共军拒绝以大刀长矛向倭寇正面挑战接受倭寇的优势炮火的屠杀，只是因为共军选择以游击战方式杀伤敌人，于是恼羞成怒的倭寇就说共军消极避战。

不过如此而已。

下面为一例，这是倭寇独立混成第三旅团在 1941 年扫荡晋察冀之后的感想。

“

一、有关共军的事项

(一)战术

1.共军回避交战，采取退避战术，专心致志保存其战斗力。加以支援共军的民众，具有高度的警惕性和巧妙地传递情报的能力，并有可怕的谍报组织，因而想要捕捉歼灭共军，至为困难。由于此种情况，在作战中使敌在人的方面损失不大，我方的死伤也极少。关于指导退避作战的具体事实，据俘虏称，与日军发动作战的同时，聂荣臻向全军重申了:“敌进我退，敌去我追，敌多我避，敌少我打”的指令。在党、军及行政机关的全面统制下，确定了退避的部署。命各机关分散混入部队之中，在严密的保卫下，先行退避，显示出党、军、政三位一体的作风。

2.为了在冀中地区实行退避战术，中共在修建地道及其它隐匿设备方面，付出的心血确实惊人。

3.对于劣势的日军，则出乎意料地勇敢进行挑战，并突然袭击企图围歼。其负责掩护主力退却的部队，即使兵力薄弱，也必进行顽强抵抗。

4.共军在进行袭击、伏击、防御战斗之际，特别注意选定有安全退路的地点做为战场。由于共军在险峻山地行动敏捷，尽量避开驮马可能通过的地区，多在山后小路进行夜间活动。

5.共军常潜伏于离开主要交通道路的山中村落。

6.当宿营时，通常不在大的村庄，而分散于小村或山中。

7.共军哨兵在退却之际，有故意向与主力相反方向退避的倾向。

8.为了便于退避，有时使用石头等做为秘密路标。

”

可是倭寇所谓的共军消极避战，并不能拿来作为污蔑共军的证据的。

如果有人非要拿着大刀长矛的共军去正面接受倭寇优势炮火的屠杀，我倒认为，那才是卖国贼的行径。

———

再有，

《华北治安战》千方百计地掩盖日军的伤亡，夸大对共军的杀伤，这也经常被右右们作为论据来证明共军游而不击。

但是，这是明显不足为据的。

当日军拿着“死一人，伤五人”的所谓激烈战斗来吹嘘自己的勇敢的时候，这我们就要问一句了，难道“死一人，伤五人”这样的战斗能算是“激烈”？这样的战斗也有“勇敢”可以吹嘘？

日方过分地缩小自己的伤亡数字，结果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反而令人发笑。

———

而且，

如果以日方数据来说的话，我个人认为不但不能贬低共军，反而抬升了共军。

按照日方的数据，即使是对国军的大会战，也只不过伤亡数百。

比如投入中国唯一的一个机械化师，从而取得昆仑关大捷的桂南会战，倭寇方面自供的伤亡也只有两百多人，尽管倭寇承认死了三个联队长一个旅团长。

而冀中五一反扫荡，倭寇同样承认死了 **160** 多人。

如果右右们企图以日方数据为据来贬低共军，那是非常危险的。

这不仅贬低了共军，连国军也贬低了。

事实是，日方的数据恰恰证明了，共军的游击战虽然不起眼，其战果却可以和国军的大会战相媲美。而大会战只有二十二次，共军反扫荡却是没完没了的。

———

另外在《华北治安战》上册的结尾，在发生了华北中条山会战的 1941 年，华北日军却在广播里承认，本年度最大的战斗不是中条山会战，而是对鲁南沂蒙山共军的扫荡。

而在这之前，当日军写对鲁南扫荡规模之大进行比较的时候，也不是拿中条山会战做比较，而是拿华北方面军对晋察冀边区的扫荡做比较。

这充分说明了，在 1941 年的华北，至少共军在晋察冀边区和鲁南沂蒙山的反扫荡作战，是比所谓的大会战规模更大的战斗。

因此这再一次证明了所谓大会战，除了投入的中国的资源更多，伤亡的中国人更多，损失的中国物资更多，不见得比敌后反扫荡大到哪去。

我录入过程中，我记得有一处两个数字因为原版过于模糊无法确认，因此学习《废都》以方框代替。那一处是倭寇宣布扫荡之后杀伤多少共军，是该数字的万位和千位。

另外，在输入近卫文“磨”（音为 MARO 好像）的“磨”的时候，无法输入，只好以“磨”来代替。在录入过程中，片假名平假名什么的很好录入，WORD 有提供，倒是这种日文伪汉字无法录入。如果网友们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还请不吝交流。

我的排版一般是这样的，

我看了下，原书有以下四种大小字体，每一章的标题，每一节的标题，正文，及正文里引用的文件回忆材料。因此我设为三号，小三，四号，小四四种。

原书正文里引用的材料较正文本身都有退格，我没有，同样顶格，只是以字体大小进行区别。（插一句，我在阅读原书 PDF 版时发现原书排版也是有问题的，有些时候，引用的材料已经结束，已经是正文，应该恢复正文字体的时候，没有恢复，导致把正文和正文引用的材料混淆一谈的情况）

如果兄台有心，建议还是依据原 PDF 排版，为什么呢？

因为这样方便页数的引用，说第几页，大家就很容易找到。

当然，这个工作量巨大，比我的录入还要大：）

第一次做，不太好。

比如图片的录入方法不对，在录入《华北治安战》的时候，我是把图片用 PDF 里面的菜单项（有个照相机的选项）直接拷贝粘帖，那实际上是 BMP 格式，而且大小可能改变很厉害。而现在，我现在正在录入黎东方《细说抗战》（不过不知道录完能否发布的说），我是先拷出到画图，然后存成 JPG，最后再从

WORD 里引用图片，这样文件的大小就大大减少了。不过也没有力气回头纠正了，就这样吧。

以前有手工录入过《希特勒和纳粹主义》，那完全是手工，连 PDF 原版和 CAJ 都没有。

需要用的材料，就自己录入，既方便自己，也方便他人。

华北治安战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

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

译者说明

《华北治安战》是战后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编写的一部“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者侵略华北的作战史。本书比较详细地记叙了当时日本侵略者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所采取的各种战略、战术，及其遭到强烈抵抗的情况。

按照日本帝国主义者制订的“国策”，在侵占我国东北之后，迫切需要使华北成为它的战略根据地，以便最后鲸吞中国。“华北治安战”即为达到此目的而进行的。早在“七七”事变以前，日本即不断以武力威胁国民党反动政府使之屈服，相继签订了“塘沽”、“何梅”、“秦土”等一系列丧权辱国的协定。同时，派遣特务机关收买亲日分子策动华北独立。敌人的猖狂侵略激起我国人民的极度义愤，终干爆发了空前规模的中日战争。当时日本帝国主义者仰仗其精锐强大的兵力，利用国民党反动政府“攘外必先安内”，假抗日、真反共的政策，妄想一举而定华北。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坚持团结抗战的方针，粉碎了敌人速战速决的企图，使侵略者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本书除系统地叙述了中日战争在华北各个阶段的作战经过外，并对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方面的斗争介绍颇详。诸如“百团大战”，冀东、冀中（包话“五一扫荡”）、冀南、晋南、晋中、鲁西等地的所谓“肃正作战”，先后五次的“治安强化运动”，对华北、华中、南京一系列伪政权的炮制和操纵，以及对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诱降活动等等，.都有比较具体的记载。另一方面，对共产党八路军的群众工作和游击战术，以及敌人采取的各种谋略、战术等也作了分析和研究。书中一再确认:“华北治安的症结所在，并非国民党政府，而是中共。”并且以大量事实说明“中共游击战和地下工作异常巧妙，”使敌人打了一场“不分昼夜、连续不断、永无休止的战争”，“没有明确战线的战争”，“陷在泥潭里的浴血成争”。据日本军方透露，至1940年，“日军在华北有九个师团和十二个旅团的强大兵力被钉死在那里”。这样，就大大地消耗了日本的国力，牵制了日本的兵力，从而导致日本侵略者的“整个战局陷入完全被动的局面”。

本书原文共两卷，上卷自“九‘一八”事变后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止，下卷自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至日本无条件投降止。本书编写的内容主要依据日本侵华时的档案资料，大本营和

陆军省的机密文件、日志和颁发的命令，以及当时日本的主要决策者、高级指挥官等的回忆和笔记。因此，本书编写的立场、观点，当然站在与我敌对的方面，其采用的资料不可避免地要带有侵略者的偏见，其真实程度，特别是书中列举的“战况”及“战果”，是根据当时日本当局发表的作战公报编写的，连日本人也认为“大本营发表的统计数字相当可观，但其中70%是为了夸耀战果而增加的水分”（见《土肥原贤二秘录》）。尽管如此，本书还是得出了“中共是致命的祸患”，中国人民“是不可征服的”结论。因而本书从另一个角度看来，仍有其一定程度的真实性和客观性。这一点，对于我们了解和研究中日战争中敌我双方采取的战略战术，敌人如何利用蒋介石、汪精卫等执行的投降卖国路线，以及战争成败的各种因素，将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书为全书的上卷，其中资料颇多烦琐重复之处，另外，有些地方引用早经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八路军的文件等，译时大部从略。至于敌人当时搜集的有关中国共产党、八路军以及国民党等的情报，其内容和人名、职称、番号、军政机关序列以及对国共关系的介绍等等，多有错误和主观猜测之处，为保持

原著的面貌，便于研究当时敌人的活动情况及心理状态，均按原文译出，未加订正。此点希望读者特别予以注意。另外，有些专用名词，如“治安战”、“肃正”、“剔抉战术”等等，因系当时日军特定用语，故均用原文，从行文中当可了解其含义。有些地方译者作了注解。至于书中的“笔者注”、“注”以及括号内的说明，均为原书编者及作者所加，也希读者注意。

全书由田琪之、申泽福、李直、方克、宣继哲、张.玉璞、王新崇、尹福泽等同志译出，孙立民同志负责校订。李作民、张士杰同志也做了部分校订工作。

最后，限于译者水平，难免翻译错误或不当之处，诚恳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天津市政协编译组

上册目录

译者说明

序章华北事变爆发前的形势——日、中在华北的对立
满洲事变后的形势
华北自治工作的进展
纠纷不断发生
绥远事件及西安事变
华北形势恶化

第一章从华北事变至1938年的治安战
一从华北事变向中国事变发展
华北事变的爆发
中国事变趋向扩大
华北方面地面作战概要
第八路军的出动
平型关战斗
二1937年华北占领地区的治安状况
华北政权建立工作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
蒙疆三自治政府的成立
1937年末占领地区的治安状况
华北方面军对占领地区维持治安的指导
三事变的扩大化及1938年的治安状况
徐州会战及华北占领地区的治安
攻取武汉战役及华北的治安肃正
四中共的政治工作
中共抗日根据地(解放区)的建设
边区政府组织机构—晋察冀边区政府
扩大党组织工作的实况—和顺县的一例
中共党组织的扩充及后方扰乱工作
共军的政治工作
中共的军事工作

第二章1939年度的治安战
一华北方面军的治安肃正计划
确保安定的基本设想
治安肃正的根本方针
二肃正作战与治安工作概要
要点
第一期肃正作战（1939年1月—5月）
第二期肃正作战（1939年6月—9月）
第三期肃正作战（1939年10月—1940年3月）

三各方面的肃正作战
五台作战（1939 年 5 月 8 日一 6 月 25 日）
鲁南作战（1939 年 6 月 7 日一 6 月 25 日）
鲁西作战（1939 年 7 月 3 日一 7 月 9 日）
驻蒙军及独立混成第二旅团的肃正讨伐
第一一 0 师团地区的治安肃正
四中共各项工作实施状况
文教(思想)工作
宣传工作
经济工作
对抗属的优待工作
除奸工作及民众连坐法
制造、修理枪械等工作
山西省西北部的叛乱工作（晋西事件）
对日军的思想工作情况
五方面军对中共情报的收集
方面军情报工作负责人会议
驻中国宪兵队的情报业务
华北灭共委员会
六华北、蒙疆的政情
树立临时政府中央政权的谁备
蒙古联合自治政府的成立
新民会的活动
天津租界问题
七中国方面的状况
国民政府(蒋政权)的抗战态势
中共的动向
国共矛盾的激化

第三章 1940 年度的治安战
一根据全面形势的剧变所采取的各项施策
针对国际形势发展制订应付时局的措施
促进汪蒋合流工作
国共走向妥协的努力及双方的交涉
二华北方面军关于肃正工作的施策
1940 年春中国军和地方治安状况
1940 年度肃正工作的根本方针
1940 年度第一期肃正建设计划
方面军对思想战的指导方案
关于确立秩序的军律布告
华北政务委员会的成立与新民会的改组
三各方面的治安肃正工作
山西省南部的肃正作战
第三十七师团地区的警备及治安情况

第三十六师团地区的警备及治安情况
山西西北部的肃正作战（1940 年 6 月 6 日—7 月 8 日）
冀中、冀南及山东的肃正作战
第三十二师团地区的警备与治安情况
第二十七师团地区的警备与治安清况
独立混成第十五旅团的治安肃正工作
四中共在华北的政治工作及军事方针
政治工作的重点
行政组织与民众组织
中共地下工作的一例
八路军的行动方针
五对“百团大战”的作战（冀中作战、晋察冀边区肃正作战）
共军攻势开始前的一般情况
共军第一次攻势与日军的防御战斗
第一期晋中作战(第一次反击作战)（1940 年 8 月 30 日—9 月 18 日）
共军的第二次攻势（1940 年 9 月 22 日—10 月 2 日）
第二期晋中作战（1940 年 10 月 11 日—12 月 3 日）
晋察冀边区方面的肃正作战
从中共方面的记录看“百团大战”
六从“百团大战”中取得的教训和对中共的观察
第一线兵团取得的教训
共军方面取得的战斗教训
华北方面军加强和调整情报机能
方面军对中共的观察
方面军时国共矛盾的观察（1941 年 1 月—3 月）
七华北方面军第二期后段的肃正建设
中共势力的盛衰及华北治安的好转
年初华北方面一般敌情

第四章 1941 年度的治安战
一指导对华长期战的各项措施
对华长期作战指导计划
二 1941 年初期华北方面军的肃正建设
方面军 1941 年度肃正建设计划
冀东作战与冀中北部作战
第一次治安强化运动的展开(3 月 30 日—4 月 3 日)
三对华北地区共党实力的观察
中国共产党组织系统概况
晋察冀边区政府的组织概况
第十八集团军管下各军区概况
对共军战斗力的观察
剿共工作的参考
四 1941 年夏季的各项主要施策
肃正建设三年计划

第二次治安强化运动的推进和扩大
晋察冀边区肃正作战
方面军的作战计划
作战经过概要
政治及宣传报道工作
教训及意见
五 1941 年秋季各项施策的推进
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
中共方面的“治安强化运动”对策
肃正作战及其成果
沁河作战(9 月 20 日—10 月 20 日)
博西作战(“は”号作战—9 月 19 至 10 月 1 日)
第二次鲁南作战(“ろ”号作战—11 月 6 日至 12 月 28 日)
第一一 0 师团地区内的肃正建设工作
讨伐肃正作战的成果

序章华北事变①爆发前的形势

日、中在华北的对立

满洲事变②后的形势

日本虽于1932年9月15日承认了满洲国③，但满洲国内治安状况仍很混乱，需要军方用极大努力进行肃正讨伐。关东军于年末扫荡了呼伦贝尔进人满洲里，1933年平定了热河省，断绝了张学良政权赖以扰乱满洲的根源。

此次热河作战，趁势越过长城线而到达华北地区，5月31日，关东军与当地中国军之间在塘沽缔结了停战协定(即塘沽协定)。关东军8月由长城线撤军，熄灭了日中之间在华北的战火。根据这一协定，划定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一线以东，北至长城地区，为非武装地带，由中国方面警察机关维持治安。

由此，关东军专心致力于恢复全满的治安，分散部署各兵团，积极展开讨伐作战。

中国方面于6月17日，成立了以黄郛为委员长的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以河北、察哈尔、山东、山西、绥远及北平、青岛两市为管辖区，处理华北政务。但该委员会软弱无能，对于处理与当地日军及外交官员之间的悬案毫无进展。

本章仅就1932年7月至华北事变爆发期间的形势，特别是对于日本进入华北的情况，国民党政府与中国共产党所持的态度以及相互关系加以概述。

日本基于1932年日满议定书，实际上全面担任了防苏重点的满洲国的国防，急于充实国防力量使之空前强大，并改革军制。但远东的苏联战备急剧扩展，在1933年间，已完全打破了日苏之间的均衡状态。

关东军痛感对苏国防的危险，但正处于讨匪几无宁日的情祝下，致使对苏战备迟延。然而，在这期间，以满洲对抗苏联为背景，笼络内蒙、华北使之与我方采取同一步调的谋略工作，却有迅速的进展。

对内蒙，则策动新兴势力的领导者德王。1935年5月，参谋副长板垣征四郎少将在东乌珠穆沁王府会见德王以后，迅速推进了内蒙的工作。

对华北，由于与南满的治安，经济关系密切，又因在对苏防卫上具有巩固满洲后方的意义，故对之抱有深切的关心。无奈兵力不足，对华北、内蒙只能依靠政治谋略。

塘沽协定后，日中之间逐渐平静。在1934年12月，蒋介石也采取了对日绥靖的新外交政策，恢复了满洲与华北之间的交通、通信、邮政等，形势顿见好转。但另一方面，围绕塘沽协定的实施，纠纷频出，不仅在停战地区内发生扰乱治安的情况，井波及该地区以外。

兹将当时中国的一般形势加以概述。

满洲事变爆发以来，在中国群众之间，民族意识、国民觉悟空前急剧高涨，出现了通过南京政府实现全国统一的强烈要求。1932年1月1日，南京、广东两政府合并成立了统一政府。林森任政府主席.出现了行政院长汪兆铭与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合作的新时代。蒋介石支持汪兆铭的所谓“一面抵抗，一面

交涉”的外交方针，对日持慎重态度。

1932 年 1 月末，因第十九路军爆发了上海事变④，5 月停战。于是，蒋介石为完成国内的统一，再次恢复剿共作战，即第四次围剿，由蒋自任剿共总司令，在汉口设立总司令部，动员 60 万人的兵力，在 6 至 10 月之间，进攻以湖北为中心的三省苏区。

此次剿共作战值得注意之点，是以县为单位组织义勇军，建设公路，对苏区实行经济封锁等。根据过去的经验，国民党政府虽痛感群众及其党的基层组织很不完善，但此时为期已晚，只能依靠县长指挥的义勇军。

剿共军队虽占领了广阔地区，但由于共军采取了回避战术，未能歼灭其主力，而陷于停滞状态。在此期间，江西省瑞金的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在政治方面、军事方面的工作顺利开展，这对蒋介石已成为国内最强大的敌人。

至 1933 年，日本与中国的紧张情况进一步加剧，中国国内的抗日运动更加激烈，但国共的对立却毫未减弱，相反在 1933 一 1934 年之间达到了顶峰。中共在 1933 年 1 月发表了抗日三原则，虽主张国内抗日势力有条件的合作，但抗日依然被当作反蒋的从属问题。蒋介石也于同年 4 月对国府要人演讲时强调主张“安内攘外”。提出只要彻底肃清中共这一“心腹之患”，则治愈日本“癣疥小病”不成问题，将抗日斗争的矛头极力转向剿共。

蒋介石第五次剿共作战，虽因日军对热河作战暂行延缓，但 5 月塘沽停战协定成立，对日问题告一段落，蒋立即正式进行围剿准备。此次采取了加强经济封锁、扩充汽车公路，建设包围堡垒等三大政策。值得注意的是还成立了所谓“别动队”的特务组织，负责督战，收集情报，组织群众、搞阴谋活动等工作。

为此，中共也加强了反围剿的态势。但在中共内部，最高领导权尚未确立，左翼宗派主义倾向的发生，从而削弱了中共的力量。例如，中共对 11 月建立的高举“反蒋抗日”旗帜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不但未与之合作，反而加以敌视。致使福建军陷于孤立，受到国府陆海空军的总攻击，于 1934 年 1 月末覆灭。

第五次剿共作战，在福建事件之后动员了近百万大军，以江西为中心，在福建、湖北、安徽等地迅速展开围剿。中共方面采取了以正规红军为主力的单纯消耗战，因此，被剿共军的物质力量所压倒，4 月末，败势已成定局。1934 年 7 月 15 日，中共号召“北上抗日”，开始逐步突出江西。11 月 10 日瑞金陷落。但在此之前，红军主力已于 10 月 15 日夜，开始大规模西迁(长征一译者)。

蒋介石鉴于共军的直接威胁业已减轻，为完成最后的剿共作战及重建濒于崩溃的经济，与日本之间有必要暂时保持休战状态。因此，1934 年末开始对日采取绥靖政策。

此时，华中政情十分不稳。以何应钦为首的主张使华北统一于中央的国民政府势力，和拥护河北省主席于学忠的张学良系的抗日势力，推动华北五省的反蒋军阀以谋求华北独立自治的日军势力，彼此之间相互对立，各项工作针锋相对，处于一触即发之势。此时，蒋介石对日绥靖政策所提出的制止排日行动等措施尚未充分实行，而纠纷却不断发生。

1935 年 1 月下旬，宋哲元军之一部侵入热河省丰宁县，于学忠军又于 4 月侵人停战区内。5 月 2 日两名亲日要人(中国报社社长)在天津被暗杀。同月下旬，孙永勤匪团在热河停战区内扰乱治安。抓住这一机会，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中将进行强硬交涉，要求何应钦改变华北局势。中国方面被迫全面接受了日本方面的要求，6 月 10 日缔结了“梅津一何应钦协定”(何梅协定)。据此

协定，中国方面应实行:(一)罢免河北省主席于学忠，(二)从华北撤走宪兵第三团及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政治训练处，(三)撤走河北省党部，(四)于学忠属下五十一军及中央军撤出河北省，(五)解散有害日中邦交的蓝衣社及其它秘密组织，(六)发布禁止全国排日、排外的命令。

在察哈尔方面，自 1934 年末以来，由于宋哲元军对热河西部的侵犯，在张北不断发生非法逮捕和侮辱口本官宪等事件。关东军派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少将，与察哈尔省代主席秦德纯交涉，于 6 月 27 日缔结了“土肥原—秦德纯协定”(秦土协定)，成功地迫使国民党势力从接壤热河省西境的察哈尔省撤走。

上述两协定是为处理塘沽停战协定的善后工作而缔结的，目的是要确保停战协定的施行，其内容则又前进了一步。

华北自治工作的进展

由于上述两协定，华北间题告一段落，但这又成为下次飞跃的基础。

1935 年 8 月，更换了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由多田骏少将到天津接任。当时奉天特务机关长是土肥原贤二少将，关东军参谋副长是板垣征四郎少将，此三人由奉天、新京、天津紧密合作，华北工作进一步飞跃发展。华北工作的意图是由中国方面有志之士成立自治政权，脱离南京束缚，将日满与华北引向亲善状态。因此，这一工作的对象，是察哈尔的宋哲元、济南的韩复渠、山西的阎锡山、河北的商震等华北将领。

首先开展了察哈尔的工作。8 月 5 日在张家口缔结了“松井(源之助—张家口特务机关长)—张允荣协定”，确定口北六县由蒙人保安队担任治安维持工作。同年 12 月驻扎在察东特别自洽区的李守信军，根据关东军的指示进驻这一地区(察东事件)，迫使宋哲元交出口北六县的行政权。

10 月又在察东的香河县揪起了农民自治运动。殷汝耕(根据塘沽协定设立的蓟密停战区督察专员)于 11 月 24 日将停战区 22 县归其管辖。在通州设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12 月 26 日改称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宣布脱离中央(南京)实行自治。随着冀东政府的出现，从大连方面向冀东沿岸地区的商品输入频繁起来，因而刺激了国民政府，加深了日中之间的隔阂。

宋哲元在 8 月末，被任命为平津卫戍司令，第二十九军主力也移防至平津地区。针对这种情况，土肥原少将去天津，策动宋哲元建立新政权。到 12 月 8 日.南京政府也承认了河北、察哈尔的自治，确定了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名称，并且赋予该委员会以军事、外交、财政、人事、交通等方面广泛的权力。其管辖区为冀察二省及平津二市，任命宋哲元为委员长。该委员会于同月 18 日宣告成立。尔后国民政府对上述政权，逐步使之中央化，极力对所有机构施加国民政府的影响。自 1933 年长城之战以来，拥有抗日运动经验及实力的第二十九军，以执行抗日政策的第一线部队而傲慢自负。因此，以日满华亲善、建立缓冲地带为目的的冀察政权，完全改变了性质。

在陆军中央，正为 1933-1934 年间以来日苏战备上的均势发生破绽而担心，并且也考虑到将会带来相反的不良影响，极力主张华北自治工作不要操之过急。为此，1936 年 1 月 13 日，以下列的“华北处理大纲”指示中国驻屯军司令官。这一指示的主要精神是命中国驻屯军担负援助华北自治的任务，而使关东军从

主导地位上撤出，华北工作应在幕后逐渐进行。

华北处理大纲 1936 年 1 月 13 日

对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的指示:

处理华北之主旨，在于援助其完成以华北民众为中心的自治，使之得以安居乐业，并调整与日满两国的关系，增进相互之间的福利。为此，应支持及诱导新政治机构，以期加强与扩大其机能。

要领

一、自治地区应以华北五省为目标，不能急于扩大地区，按照第二项以下为要领，首先稳步实现冀察二省及平津二市自治，进而使其它三省自行与之合并。对冀察政务委员会的领导，当前应通过宋哲元氏进行之。民众的自治运动凡是公正妥当者，应尽量采纳，逐步实现真正的白治，以确立华北五省自治的基础。

对冀东自治政府，在冀察政务委员会自治能力尚未健全期间，可暂行支持其独立，一俊冀察的自治大体稳定时，再尽快促使合并。

二、自治程度，虽尽可能使之获得广泛的自由，但当前则以不容南京政权有推行反对日满政策的余地为目标，其它则可循序渐进，应避免急剧要求独立权限等。(以下笔者略)

(三、四项笔者略)

五、对华北的处理，由中国驻屯军司令官负责。其实施原则上应直接以冀察、冀东当局为对象，并坚持以幕后指导为主旨。(以下笔者略)

关东军及华北各机关，应对上述工作给予协助。(以下笔者略)

对此，关东军方面仍很积极，但对于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委员，多委由南京嫡系人物担任的情况甚感失望。另一方面，内蒙工作与华北工作的进展互相结合，加强了德王的政治基础，2 月举行蒙古建国会议，5 月在德化成立了军政府。

陆军中央部要使关东军完全撤手，但中国驻屯军现在的战斗力极其薄弱，更担心有被四周中国军队轻侮的可能。原来华北驻屯军，是根据“北清事变”协议书⑤设立的。其兵力并无限制，而由缔约国举行会议决定(实际并未举行会议，各国任意施行已成惯例)。于是 1936 年 4 月 18 日中国驻屯军按下列部署，较过去增强兵力约二倍:

中国驻屯军司令部
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团司令部
中国驻屯军步兵第一联队
中国驻屯军步兵第二联队
中国驻屯军战车队
中国驻屯军骑兵队
中国驻屯军炮兵联队
中国驻屯军工兵队

改编后，军司令官定为钦命(天皇任命—译者>，5 月 1 日任田代皖一郎中将为中国驻屯军司令官。

1936 年 5 月 15 日，日本陆军当局发表的谈话中指出，这次兵力增强的目的:(一)华北防共，(二)保护侨民。正当此时东京发生了“二.二六”事件，当局对于治安正感头痛时、北京中共系统抗日团体及学生运动又开始激化，并发生共军力量侵入山西省的情形，引起了激烈的镇压与战斗。

上述日本方面的工作和一系列措施，均被中国方面看作是日军强行侵略的继续，终于加深了反日情绪。

对此，当时驻中国大使馆副武官矶谷廉介少将(后升中将)回忆如下:

“陆军中央部未能采取主动有效的正确领导，而是静观趋势演变，所能做的不过是控制和防止了武力行动而已。由于未能正确掌握全中国统一的现实趋势，依然固执所谓分治合作的老框框，未认识到华北自治工作是如何逆天而行，从而造成了对新中国形势的错误判断。在此情况下，只有暗中期待关东军工作的成功了。

对此，蒋介石认为如日本促进华北自治，势必从根本上造成中国统一的破产，因此，一方面恳请日方加以制止，同时竭尽一切手段努力加以防范。”

以下概述苏联的对华策略与中国共产党的状况。

1934 年秋，丧失了江西根据地的毛泽东、朱德等共军首脑，鉴于内外形势的不利，宣言北上抗日。经过贵州、云南、四川、新疆、甘肃，历时一年有余，到达陕西北部。完成了长征。途中频遭地方武装的堵截及国民党军的追击，粮食缺乏，疾病及掉队者不断出现，加以险峻的地形，恶劣的气候等，历尽难以想象的苦难，到达陕北时，只剩二万余兵员，不过是出发时的十分之一。

由于蒋介石的数次围剿，加以艰难的长征，共军的势力大为削弱。之所以能够避免彻底歼灭，固因共军坚韧情神所致，但也与蒋介石对外问题的处理有关，特别是由于日本对华北的威胁，以致放松了对共军的追击。

在此之前，1935 年 7 月 25 日至 8 月 20 日，在莫斯科召开第七次共产国际会议。会议认为当前之故在于德，日法西斯，其它一切势力均应积极纳入统一战线之中，社会主义革命问题应暂行搁置。会议明确了通过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专心致志地进行斗争。为此，中国共产党决定，首先，在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爪牙所进行的群众武装革命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必须成为统一全中国人民的核心。

在召开此次共产国际会议当时，中共中央虽处于长征途中，但在 8 月 1 日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所谓八一宣言)⑥，号召结成民族统一战线。

一、为防外敌，停止一切内战，集中所有国力、人力、物力、财力，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战。

二、国民党军队，立即停止对中共红军的攻击，准备对日作战。

三、红军抛弃旧怨，为了救国愿与国民党军队(除蒋介石外)携手合作。

四、不论任何政党、派别、团体、军人、一般人及具有民族意识的青年人，团结奋起粉碎日本及蒋介石的压迫。

五、组织全国性的国防政府，改编红军及抗日义勇军为统一的全国抗日义勇军。

六、中国苏维埃政府和国民党政府与各党派团体、军政机关，共同制定国防政策。

七、在统一的国防政府指导下，组织抗日联军，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夺取最后胜利。

“八一宣言”是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主的中共战术转变的第一步。日本华北工作急速进展，中国抗日运动也在全面展开之际，这一宣言正合时宜。此后，抗日运动发展成为决定中国政局的势力。这可以说是苏联的策路在背后巧妙指导的结果，其目的乃是驱使中国人民，对日本的人侵进行一场所谓民族解放或民族独立的战争。

但是在“八一宣言”时期，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依然存在打倒蒋介石国民党及帝国主义的观点，因而国民党上层分子、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仍被排斥于统一战线之外。

在宣言中，中共初次提倡全面停止内战，号召有民族意识的广泛阶层奋起

抗战，其意义实为重大。

中共中央的“抗日第一、国共全面停止内战”的思想，在全党内部普遍贯彻，需要相当时日。1935 年 12 月 9 日，在天津，北平掀起的学生运劫(要求打倒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波及全国(随后发展成为全国各界救国会)。由于国际形势的转变（日本和中、美、英的对立，德、意的兴起，苏、英、美、中的接近）、国民政府的地位及内部派系关系的变化，使中共的政策从“反蒋抗日”逐步向“联蒋抗日”发展。

1936 年 2 月 1 日，陕北红军主力大举东渡黄河，拥入山西省。中共在东进宣言中宣称，此举是为了抗日而逼近日军前线的河北省，也是为了打倒与日本妥协的蒋介石，号召立即对日宣战。随后迅速击溃阎锡山军，控制了山西广大地区。但在 3 月，由于中央军的进击，受到很大损失，5 月 5 日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即五五通电或称回师通电)，从山西撤退。由这一通电开始，才宣布的联蒋抗日。

注: 由于蒋介石无视此通电，国共合作未能迅速进展。撤回陕西的红军，努力建立抗日根据地，并继续渗入全国各个抗日组织内部。另一方面，蒋介石在积极准备第六次剿共的同时，5 月 5 日公布了加强蒋介石权限的宪法草案，在国民党政府内更加巩固了蒋介石的地位。

纠纷不断发生

日本为适应世界形势的转变，谋求推进划时代的国防国策，1936 年 8 月 7 日，决定了“国策基准”、“帝国外交方针”等一系列重要方针。外交方针，为了挫败苏联侵略东亚的企图，首先是针对苏联制订的；与英、美则要增进亲善关系；对华北仍执行下述推进华北分治政策:

当前的施策，鉴于日苏关系的状况，首先应使华北迅速成为反共亲日、亲满的特殊地区，在获得国防资源、扩充交通设施之同时，应使中国全面反对苏联，靠拢日本。这是对华施策的重点。

随后在 8 月 11 日，有关各省之间所决定的“对华施策”及“第二次华北处理大纲”中，在以华北自治为目标这一点上，也和“第一次华北处理大纲”相同。所不同者，强调华北分治是为了防苏，并且应在南京政权下实行，此外，对华北的经济开发已进入具体研究的阶段，这些是新政策的特点。

然而这是与国民政府的政策根本冲突的，特别在抗日排日气氛全面急剧高涨的中国现状下，要完成这一任务是极其困难的。

如上所述，日本的华北工作从 1935 年秋以来，虽有迅速的发展，但与此同时，在中国各地不断发生各种纠纷及对日暴力事件。如 1936 年 8 月 24 日，在四川省成都发生了 4 名日本新闻记者遭到群众的袭击，两名死亡，两名重伤的成都事件；9 月 3 日，在中国北海(位于广东省西南部、北部湾北岸—译注)发生了惨杀日侨的北海事件；9 月 9 日，在汉口枪杀日本领事馆警察；23 日，上海又有海军士兵被枪杀。这时，负责保护华中、华南的日本利益及侨民的海军，态度突然强硬起来，表示了如不及时解决事件，便不惜使用武力的决心。

在华北，7 月 26 日出现了中国士兵侵入丰台的日军兵营进行威吓的事件（第一次丰台事件）。9 月 18 日，中国士兵再次在丰台妨碍日军行进而引起了纠纷（第二次丰台事件）。

11 月，各地开始罢工示威游行。首先上海日人经营的纺织工厂的中国工人参加了示威，其中一部形成了暴动，由此激化而演变为抗日运动。通过日方的强烈要求，上海市当局逮捕了救国会及其它抗日团体的领导者和暴徒，对共产党进行了搜捕；由于上海示威怒潮波及青岛，且有逐步加剧的趋势，12 月 2 日各工厂陷人不得不一齐关闭的危机。3 日，日本海军陆战队在青岛登陆，进入各工厂布置警戒。

当时在中国方面，蒋介石调中央军陆续北上，大规模动员东北军、西北军，亲自飞往西安、洛阳、太原进行部署，并巩固山东、绥远的防务。同时，为了对共军陕北根据地发动第六次围剿，加强了包围圈。蒋介石这一措施，不单纯是剿灭共军，也是企图对持中立态度的华北各将领加强中央的统治。

绥远事件及西安事变

日中之间的纠纷在中国全境不断发生，远在北方绥远，内蒙军与傅作义军又生战端，这就是绥远事件或绥东事件。该事件发生的经过概况如下:

1935 年末，进入察东 6 县扩大领土的德王，迫切希望早日建立包括察哈尔、绥远、甘肃在内的蒙古国，从而首先开始了对绥远的工作，与傅作义形成对立之势。但是，陆军中央部已于 1936 年 1 月的第一次华北大纲中指示，“对内蒙工作，其范围限定于长城以北，且不得波及东部绥远四蒙旗地区”，禁止关东军与傅作义军发生冲突而进行绥远工作。

然而，关东军无视中央指示，根据其参谋田中隆吉中佐等的计划，企图以乌合之众的杂牌军侵入肥沃的绥远省东部的四蒙旗。该地区在 1929 年以前，曾是察哈尔省的一部分。1936 年 11 月 9 日，德王向傅作义要求归还该四蒙旗遭到拒绝后。遂于 14 日按上述预定计划开始了军事行动。

蒋介石调约 20 余万中央军及非嫡系军北上，采取支援绥远军的姿态。

内蒙军战况趋向不利，特别在 11 月 24 日，守备薄弱的百灵庙要冲被占领，遂即导致全面溃败。正当此时，12 月 12 日蒋介石被张学良监禁，发生了西安事变。苦于作战失利的德王，趁机通知绥远军停止军事行动，傅作义当即应允停战。因此，事态未进一步发展，暂时告一段落。

然而，傅作义军的胜利，特别是百灵庙的占领，中国方面进行了夸大宣传，好象关东军已被击破。因而，中国国民在军事上有了自信，激发了抗日气氛的更形高涨。

另一方面，西安事变由于中共的调解，蒋介石与张学良之间得到谅解，蒋介石在 12 月 26 日返回南京。

西安事变是中国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重要转折点。事变后，国民政府在表面上虽仍否认转向容共政策，但在 1937 年 1 月 6 日撤销了西安的剿共总司令部。2 月 27 日在西安召开国共停战会议。此后，两军从主要战线开始停战，并逐渐及于各地的游击战区。国民党从 2 月 15 日召开第五届三中全会，根据所通过的“根绝赤祸决议案”，虽属极为间接的表现，但是从此开始迈出了国共合作的第一步。在这次大会上，亲日派的失势已明显可见。

中共早在 2 月 10 日即向国民党提出包括将抗日统一战线的领导权让与国民政府，停止土地没收政策，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等要点的国共合作方案。在国民党三中全会以后，进入抗日时期的新阶段，提出了加强国内和平，推进抗

日战争，争取民主权力等口号。5 月 3 日在延安召开中共全国代表大会，讨论了加紧进行抗日战争与彻底改革准备工作总的政策。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作了总结，号召“为千百万人民大众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奋斗”。

从 1936 年至 1937 年，国民政府对全中国的统一有了显著的进展。1936 年 9 月已使西南派屈服，到 12 月的绥远事件以后，由于中央对华北军阀加强统治及国共合作的实行，国民政府的威令几乎及于全中国。

在日本方面，事前虽认真研究了对华政策，但由干绥远事件的发生，现在已不允许对改变政策有所犹豫。1937 年 4 月 16 日，决定了新的“对华政策”和“华北指导方案”。这一新政策明确规定了“不要进行华北分治，或打乱中国内政的政治工作”，放弃了过去的华北分治方针。政府开始积极调整日中邦交。这是外交政策的空前转变。

华北形势恶化

此时，在中国当地日中之间的形势，日趋恶化。在华北依然不断发生排日行为。如 2 月发生非法检查驻张家口副领事及日人事件，2 月一 4 月出现割断张庄、北仑、落岱附近日军军用电话线事件，4 月在德州火车站发生监禁日人警察官事件，5 月张家口发生对日侨暴行事件和北京的对日本小学校学生暴行事件，6 月命令禁止满洲与华北之间的飞机通航以及要求撤销天津日军无线电台等，从而与日本之间的气氛日益险恶。

下面是 5、6 月间有关华北形势的各种情报。

一、 6 月 8 日永津佐比重大佐(参谋本部中国课长)有关中国形势报告之一:

蒋介石政府领导的新生活运动，现已转变为国家军事的总动员运动。他们过分相信自己。因此，必然要出现对日轻侮的行动。当前正想依靠英国充实其军备的财源，并极其关心解散冀东政权。

二、6 月 9 日柴山兼四郎大佐（陆军省军务局军务课长）中国视察报告之一:

当地攻击日军的宣传十分强烈，第二十九军上层人员对日本虽有所理解，但中层以下人员对日抱有强烈反感，约三分之二是抗日派。冀察的一般情形也是如此。

三、6 月 18 日冈本清福中佐(陆军省军务局军事课高级课员)奉命向中国驻屯军重新传达旱已指示过的中央方针，以打通思想，再次告诫，严禁出现类似谋略活动的行为等。其归国报告中有如下一段:

中国驻屯军全然未见有何行动，但根据日中之间反感日深的事实，预料从中国方面可能出现某些挑衅行为。因此，到那时必须有采取断然措施的思想准备。

四、曾任参谋本部作战课课员的井本熊男大尉（后升大佐）的战后回忆:

1937 年 6 月，中国对日空气险恶，加紧准备对日作战的情报频频传来。为防止万一。视察了天津、张家口、包头、大同、大原、石家庄、济南、青岛附近的地形，于 6 月末返回东京。当时中国官宪严重妨碍视察，时有置身险境之感。特别是在芦沟桥上听取前宋哲元军事顾问樱井德太郎少佐的讲解和视察一般地形时，险些受到中国士兵的拘留。芦沟桥附近日中两军完全处于一触即发之势。

阅读此类报告，华北形势恰如充满可燃性的气体，处于星星之火即可爆发的危险状志，且有极大可能燃烧到中国全土。然而日中两国首脑皆不认为即将

发生全面战争，当然更不希望出现此种情况。在此期间，实际上是由于非理性的原因和第三者的煽动（日中双方的强硬分子、阴谋家、煽动者等），而使事态日趋严重。

①日本侵略者最初称“七七事变”为“华北事变”，后又改称“中国事变”，后同。—译者
②日本侵略者称“九一八事变”为“满洲事变”，后同。—译者
③“满洲国”即 1932 年 2 月 18 日，在日本侵略者一手操纵下成立的东北傀儡政权。—译者
④“上海事变”即“一二八”事变，1932 年 1 月 28 日，日本侵略者进攻上海。第十九路军奋起抵抗。同年 5 月国民党政府与日本妥协成立停战协定。后同。—译者
⑤“北清事变”指 1900 年八国联军入侵我国的战争。所谓“北清事变”协议书即 1901 年 9 月 7 日签订的辛丑条约。—译者
⑥八一宣言译文未按中文校正。—译者

第一章 从华北事变至1938年的治安战

以1937年7月7日深夜爆发芦沟桥事变为开端，眼看战火由华北向华中扩展，尽管双方首脑努力不使战火扩大，力图就地解决，但事变终于进入全面战争状态。

日本于1937年，即事变的第一年，在华北进攻黄河以北，在华中会战于上海，随后攻陷南京。一方面以武力施加压力，另一方面以各种外交手段谋求事变的解决，同时在占领地区则建立地方政权，努力维持和恢复治安。

在事变的第二年，继徐州会战之后，在进行攻占武汉及广东的作战同时，尽力施展政治谋略，图使重庆早日屈服。但是，由于中国事变始终未能解决，故不得不进入长期的持久战争。

本章主要叙述全面形势的变迁，在此期间的治安状况，以及维持和恢复治安所采取的各种措施，阐明事变第三年即1938年以后，正式进行治安战的经过。

一 从华北事变向中国事变发展

华北事变的爆发

首先叙述事变开端的芦沟桥事件。

当时，在冀察方面驻有宋哲元指挥的第二十九军。该军由四个普通师、一个骑兵师、一个旅，一个特务旅、二个独立混成旅组成，此外，在其指挥下的尚有华北地区保安队，总兵力约10万人。1937年6月间，第二十九军司令部与特务旅驻南苑，第三十七师主力驻北京西郊的西苑，以其一部部署于北京市内、芦沟桥地区及保定附近。第三十八师主力驻南苑，其它驻北宁及津浦路沿线要地。第一三二师驻河北南部，第一四三师驻察哈尔省内。

事件发生以前，芦沟桥附近中国方面的情况，显然日趋不稳，此种情形在“中国驻屯军步兵第一联队(联队长牟田口廉也大佐)战斗详报”中有如下的记述:

事件发生前，驻芦沟桥的中国军队增加兵力，态度突然傲慢起来。其变化情况如下:

一、 增加兵力的情况

平时芦沟桥附近的中国军队，在城内驻有营部及一个连，在长辛店驻扎约一个骑兵连。但至本年 5 月中、下旬，城内兵力虽无变化，城外却增驻一个连。在芦沟桥附近也增驻约二个步兵连。6月间在长辛店增调步兵第二一九团所属的约二个营。

二、增强防御工事的情况

在长辛店北方高地，原有两处永久性机枪阵地，在高地上筑有野炮阵地。进入6月，又新筑了散兵壕。在芦沟桥附近，修整加强从龙王庙至铁路沿线附近之间的土堤及东方高地上的散兵壕，而且在夜间掘开以前用土埋藏的“碉堡”(过去为掩护对北平方向的进攻或退却，在以芦沟桥为中心的永定河左岸地区，构筑了十余个桥头堡)。

三、抗日意识浓厚，态度傲慢，拒绝通过芦沟桥城内的情况

关于通过芦沟桥城内一事，去年驻扎丰台时，曾拒绝我部队通过，经我提出抗议，获得解决。丰台事件以后，中国军队的态度大为缓和，并配备懂日语的军官，努力防止发生误会。但是，最近又拒绝我军由城内通过，每次通过均需经过麻烦的交涉。

四、对我演习的抗议

芦沟桥附近一带，是北宁铁路取用砂砾的采掘地区，只能种植花生等植物，因此在夏季各地高粱茂盛时期，该地区却成为丰台驻扎部队的唯一可供演习的场地。

然而，最近当我演习之际，中国军队却指称侵害农田，对夜间演习则要求事前通知，并对夜间进行实弹射击提出抗议等等，同时还逐渐加强了警备。

五、限制行动地区:

过去龙王庙河堤及其南方铁路桥梁附近，我军可以自由活动，但从6月下旬开始，拒绝我军在该地自由活动，当我军兵力不多时，则荷枪实弹，态度蛮横。

六、改变警戒部署情况

从6月下旬起，龙王庙附近以南，在已有阵地上部署兵力，严加警戒，到夜间更增加兵力。

一字山附近从来未曾配备警戒兵力，但最近发现夜间我军不演习时，即在该地配置兵力，黎明时撤走。

中国军队自本年春夏之际，北平附近战备已相当加强。至本年6月，北平各城门又增加了警备兵力，且以警备行军为名，特别是夜间，屡屡见到在北平市内及郊区行军的部队。(以下笔者略)

芦沟桥附近日军情况，在前述战斗详报中有如下记载:

(以上笔者略)驻屯军应慎重行事，尽力不使酿成事端，为顺利完成既定任务，应坚持训练，特别要加强夜间演习。(以下笔者略)芦沟桥附近中国军队的增加，从各种征兆判明，乃是根据全面形势以及南京方面的指示进行的，但也应考虑到，由于我部队的行动刺激了他们的神经等原因，举例如下，

一、6月至10月是丰台驻屯部队的中期训练时期，在此期间对中队及大队积极进行训练，特别对中队进行了日以继夜的训练。

二、5月下旬，军方对驻丰台部队进行临时检阅，军的幕僚大部聚集在一字山。

三、联队长对驻丰台部队的中队训练检阅，计划在该地举行，因此辅佐官屡次去该地附近勘察。

四、旅团长、联队长到该地附近视察演习。

五、本年从6月末至7月上旬，为了普及新步兵操练，在芦构桥城北地方实行演习，北平及丰台部队的大部分干部参加了这次演习。

联队长感到中国方面对日情况逐渐恶化，抗日情绪日益高涨，全面形势十分严重。因而指示全体部下，高度注意，严防不测，同时命令事先作好战斗准备。(以下笔者略)

在此情况下，7月7日夜，丰台部队的一部在芦沟桥附近演习时，遭受龙王庙附近阵地中国军队的射击。以此为开端，8日晨在芦沟桥附近日中两军终于进入交战状态。当时情况，由前述战斗详报中摘记如下:(括号内为笔者注)

第八中队(驻扎丰台的第三大队所属，中队长清水节郎大尉)，7月7日午后7时30分进行夜间演习，由龙王庙附近向东方大瓦窑进行“利用薄暮接近敌主阵地”及“黎明突击行动”的演习。该中队长为避免误会，特别背向龙王庙朝东进行演习，盖因已知龙王庙

附近在夜间部署有中国士兵的缘故。该中队在上述演习中，于午后 10 时 40 分左右，突然遭受到龙王庙附近中国军的数发射击。因此，中队长当即停止演习，吹集合号。然而此时从芦沟桥城墙方向又射来十数发子弹。

在此期间，中队长命中队集合在大瓦窑西方碉堡附近，发现有一名士兵失踪，当即一面准备应战，一面紧急向大队长报告。

夜 12 时前，大队长在丰台官舍接到报告后，命令紧急集合，决定立即出动，同时向联队长报告。

当时北平警备司令官河边(正三)少将，正在南大寺(秦皇岛西方)的野外营地，对步兵第二联队的中队教练情况进行视察检阅，由联队长代行其职务。联队长于 7 月 7 日零时左右接到第三大队队长一木(清直)少佐的电话，报告该突然事件的大致情况，并报称拟令驻丰台部队立即出动，妥善处理。联队长当即同意。一木大队长急赴现场，在作好战斗准备后，命令驻芦沟桥城内的营长出面交涉。

7 月 8 日上午 2 时，联队长派联队附森田(彻)中佐驰赴现场。对事件进行调查，并要求中国方面负责人赔礼道歉。(以下笔者略)午前 4 时，派森田中佐带领特务机关人员寺平(忠辅)大尉，偕同宛平县长王冷斋，外交委员林耕宇等到达一字山。

第三大队于 8 日 1 时 50 分左右，由丰台出发到达一字山附近，监视中国军的行动，于 3 时 25 分左右，再次遭受中国军的射击。联队长判断“进行如此多次的射击，是中国对我军的敌对行为”，立即命令第三大队长，在受到中国士兵射击时即可应战。于是，第三大队长从 8 日 5 时 30 分，对龙王庙芦沟桥间之敌开始攻击，夺取了敌方阵地后，渡过永定河进占右岸。至 6 时以后战斗呈胶着状态。(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对第二十九军军事顾问樱井德大郎少佐声称:“在芦沟桥城外并未部署中国士兵，如有部队当是土匪。”)

中国驻屯军于 8 日晨召开会议，决定采取迅速解决芦沟桥事件的方针。适巧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中将病危，因此对驻守南苑、北苑的第二十九军主力未曾积极进攻，仅将天津东机器局(东局子)附近的军方直属各部队的主力，置于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团长河边正三少将指挥之下，使之迅速向丰台前进。其它各部作好随时出动的准备。当时，未向关东军等处要求增援。

中央统帅部 8 日晨，接到中国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少将)的电报报告.经过研究。考虑了全面形势，决定防止事态扩大。当天 18 时 42 分，对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发出“为了防止事件扩大，应避免进一步使用兵力”的指示。

当地的河野旅团长奉军方命令，从 9 日拂晓命所部准备攻击芦沟桥城(宛平)。中国方面第二十九军首脑部惟恐事态恶化，9 日晨该军副军长秦德纯向华北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大佐提出“为了使芦沟桥附近之中国军队向永定河右岸移动，希日军勿从现在战线前进”。我军当即允诺，并监视其行动。中国军队拖延撤退.直至 9 日中午才勉强由芦沟桥城撤退完了，但至 10 日再次占领龙王庙附近，八宝山附近的中国军南下，对我进行射击，因而引起小的纠纷。

9 日晚。参谋次长给中国驻屯军参谋长下达了“关于解决芦沟桥事件与中国谈判的方针”的通知。通知指出，解决芦沟桥事件应避免涉及政治问题，谈判时提出下列要求，限中国方面于最短期间内承认并实行。

谈判提出的要求为:

一、中国军队停止在芦沟桥附近永定河左岸驻扎。

二、对将来作出必要的保证。

三、处罚直接负责人。

四、道歉。

当天（7月9日）将此次事件命名为“华北事变”。

中国驻屯军为迅速解决事件，桥本军参谋长去北平，10日向中国代表提出了上述通知的四项要求。中国方面虽大部予以承认，但未允撤兵。11日午后，当参谋长谁备回津抵达北平飞机场时，中国方面表示愿意承认全部要求，当日18时两军代表签订了停战协定。

然而，就在当地签订停战协定那天（11日），中央统帅部为了保护侨民、军队自卫、保障合法权益的需要，作出了有关向华北派兵等的重大决定。当即命令关东军调独立混成第一、第十一旅团主力，并从朝鲜军抽调第十二师团，派往华北以加强中国驻屯军。此外，还钦命香月清司中将为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接替病危的田代皖一郎中将。(注:香月司令官12日乘飞机到任。)

7月12日以后，中国驻屯军监视中国方面履行协定的情况，但中国方面却构筑阵地，输送军队及军需品等，正在忙于战备。又接到情报称，南京政府7月10日出动了空军部队，并调四个师集中于河南省北部省境；12日动员山西、河南、安徽，江苏各省军队向陇海、平汉沿线集结；14日命令广东省空、海军出动等。

此时，双方在芦沟桥附近，不断发生小的纠纷。当时的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大佐(后为中将)回忆如下:

“停战协定成立后，仍在局部地区出现两军对峙状态。在13日夜，终于再次开火。日军方面声称中国军方面先行射击，中国军方面则声称日军方面先行射击，究由何方首先挑衅不得而知。经过调查，始知在两者之间竟有发射手枪并燃放鞭炮者。

日、中两军对此作了传达，要求各自警惕。但是14日以后此类情事仍时时发生。据当时的情报称，共产党员某某纠集北京文化界人士，组织北京文化界抗敌后援会;京津蓝衣社第四总队得到西安第六总队的增援，正进一步促使日中之间的冲突加剧等。冀察政权内强硬派的势力更加增大，协定的实行已很难有所进展。”

陆军中央部在13日夜，重新确定“华北事变处理方针”，经上奏批准后向当地驻屯军作了传达。新方针指示:“今后仍采取不使事态扩大、坚持现地解决的方针，极力避免可能陷人全面战争的行动”。传达这一指示，是由于陆军中央部方针已定，有必要再次确立对当地驻屯军的领导。但鉴于中央军的北上及平津地方各种纠纷等情况，陆军中央部判断今后形势将更加紧迫，为防止中国方面的拖延政策可能导致的危险，以及不误我方动员出兵的时机，16日训令中国驻屯军在当地进行“限期交涉”，即以7月19日为期，要求中国方面最低限度实行以下事项:

一、宋哲元正式道歉;
二、处罚负责人同时罢免第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
三、撤退八宝山附近的部队;
四、宋哲元在7月11日的解决条件上签字。

根据上述训令进行就地交涉，进展顺利。18日宋哲元到天津访问了驻屯军司令部，表示遗憾，承认了驻屯军提出的“关于取缔中共及排日运动等有关条

件”。在此期间，调来加强中国驻屯军的兵力，已按预定计划在 7 月 19 日集结完了。此后当地形势转趋缓和。

然而，25 日在廊房，26 日在北平广安门，相继发生了中国军突然向日军射击而引起的战斗事件。至此，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终于决定以武力惩罚宋哲元军，当即向陆军中央报告并请示。中央部予以同意，26 日指示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在必要情况下可以使用武力”。27 日对国内三个师团（第五、第六、第十师团）下达了动员令。这一动员是从 11 日以来，为了保护侨民、军队自卫而保留下来的。陆军的意见是，不扩大的方针依然不变。

27 日根据临参命第 64 号，赋与“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在原有任务以外负责惩罚平津地区中国军队及保证该地方的安定”的新任务。

中国驻屯军原定 27 日开始攻击，但由干北平侨民避难迟延、改于 28 日开始行动。我军一举即将第二十九军的主力击败。29 日扫荡北平西方地区，30 日推进到长辛店、大灰厂附近，确保了永定河右岸地区。在此期间，28 日夜天津的中国军进行反击，29 日黎明通县发生冀东政府保安队叛变事件，但不久即被镇压下去。

以上是从日方的立场出发，对事变爆发前后至 7 月末使用武力为止这一时期主要情况的概述。以下再就中国方面的状况加以叙述。关于芦沟桥事件，在中国国民党党史中有如下一段记载:

“7 月 7 日夜，日军在芦沟桥进行非法演习。偶然有一士兵行踪不明，日军以搜索该兵为借口，当夜要求进人附近的宛平县城。中国当局予以拒绝，日军步炮兵立即对宛平城进行攻击，我守备部队终于被迫进行抵抗。”（此段译文未与原书核对一译者）

芦沟桥事件发生时，中国民众的抗日气氛在全国十分高涨。当局虽然希望事件就地解决，但强硬派积极抗战的呼声甚嚣尘上，特别是中共指导舆论，施加压力，致使国民政府不能走上局部解决的途径。

事件爆发后的 7 月 8 日，中共迅速发表“抗日宣言”，主张立即发动全民抗战，要求宋哲元军应战、国民政府援助，实现国共合作共同抗战。9 日更对各级党组织发出抗战指示，命令积极进行宣传，组织各种抗战团体。

另一方面，在国民政府内部发动抗日战争的呼声和反对就地交涉的倾向也日趋高涨。11 日以后，蒋介石在庐山召集各界、各将领，举行国防会议，并邀请中共代表周恩来于 15 日参加正式会议。

17 日蒋介石作了所谓“最后关头”的演说，强烈表明了决心。

但是，蒋介石声明，国民政府仍希求和平解决问题，惟以能否解决芦沟桥事件作为最后界限。万一不得已临到“最后关头”.中国只有发动全民进行抗战，直到取得最后胜利。并以下列四项条件，作为对日最低要求。

(一)无论如何解决，不得侵犯中国领土和主权完整。

(二)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地位由中央政府决定，不允许任何非法变更。

(三)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是由中央政府任命的地方官吏，不得因外部压力罢免之。

(四)第二十九军驻防地区，不受任何限制。

这一声明的情势仍未面临“最后关头”,并不认为是开战。在此期间，仍在继续组织各种抗日团体，国民政府也已进人战时体制。20 日前后，国民政府中

央对当地协定开始采取否定态度，21 日决定党政军按战时体制进行改组。

中共于 15 日向国民党送交了“国共合作宣言”，要求予以公布。认为蒋介石 17 日的声明，比过去大有进步;一味非难宋哲元的和平外交.，并努力防止其实现。23 日中共又发表了“关于华北事件第二次宣言 ”及毛泽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的论文，提出全国军队及人民总动员，改革政治机构，实行抗日外交、国防教育等八项要求，呼吁进行全面抗战。因此，各地抗日后援组织蓬勃发展，反对当地协定的呼声更加高涨。

当 29 日日军开始进攻时，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表明不惜一切牺牲，抗战到底。31 日释放沈钧儒等抗日救国会七名领袖及其他政治犯，迅速调整了抗战体势。

笔者在本章最初，特别对芦沟桥事件加以简要叙述，乃是为了说明持续 8 年的中日战争是怎样开始，又是怎样扩大的，并且搞清在此期间中共所起的作用。但因缺乏确切资料，未能达到理想，深感遗憾。如果追究事变的根源，就要涉及谁先开枪的问题。对此有种种议论，兹将当时驻北京大使馆陆军武官辅佐官今井武夫中佐(后升少将)的回忆录介绍如下:

“最初的射击是偶然发生，还是别有阴谋?对后者，有的说是日军对中国的暗中挑衅，有的则说是中共系统或激进抗日分子挑起的。

“虽然对此作了各种调查，但在龙王庙向日军打第一枪的纵火犯究系何人，至今仍是不解之谜。

“当然，事件刚一爆发时，日本方面的部分人员认为这是可以解决多年悬案的好机会，企图与中国一战。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而在中国方面，以共产党为首，还有国民党左派及西北系军人等，在事件发生前已开始宣扬对日开战，并已见诸行动。事件发生后，又极尽策划鼓动之能事，阻碍早日实现和平解决。因此，不能排除有施阴谋的嫌疑。若以怀疑的眼光观察时，人民战线派的活动是符合事件前后出现的各种事实的。据我判断，只有中共和国民党的旧西北系及其它左派人民战线，才是扩大芦沟桥事件的主要势力，这可能是没有错误的。据我调查的结果，绝对不能认为是日军所为。至少我相信，平津地区的日军内部没有那种阴谋分子。不过，也不能相信冀察军首脑人物愿意制造此次事件。

“其次，是否纯系偶然发生的?这种情况似乎存在，而且是可能的。那就是从龙王庙射出的第一发子弹，或许是被恐怖心理驱使的中国士兵由于过失而打的。换言之，起火的原因并非纵火而是失火。但当场既无灭火的决心，也无灭火的设备，更有人宁愿使火扩大，从而造成了大火。这种看法，似无不可。

但是排除一切阴谋的说法，单纯认为是偶然的开枪，则无法解释事件前所发生的种种变故。不过再从另一角度考虑，抗日意识强烈的中国士兵对日军的反感极大，由于这种感情的偶然发作而开枪，并引起了其他同伙的开枪，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

“总之，间题并不在于是何人和如何打的枪，最重要的在于查明其后使事件连锁扩大的政治背景。”

中国事变趋向扩大

中国驻屯军在结束平津地区作战以后，以其主力确保北平、天津两市及北宁沿线地区，以一部确保长辛店和独流镇附近地区，并作好进攻中央军的准备。

当时参谋本部对华作战方针，是尽量将作战范围限定在局部地区，短期内

结束战争。7 月 29 日拟定的作战计划是:

击败平津地区的中国军确保该地的稳定，作战地区大体上限定在保定、独流镇以北。根据情况，以一部兵力在青岛、上海附近作战。

随后，8 月 2 日对华北方面的情况判断和部署如下:

一、我第二次动员部队，8 月 10 日前后紧急动员两个师团，由 15 日至 20 日止，该两师团及另一师团必须到达天津附近，8 月末，全部后方部队必须在天津附近集结完了。

二、万福麟、冯占海等军在涿州、保定之间约有 3 万人。中央军在保定、石家庄之间约有 6 万人，在石家庄、顺德之间约有 3 万人，在河北省北部及郑州附近陇海路沿线约有 20 万人，徐州附近陇海路沿线约有 5 万人，共约集中 34 万人，估计这些中国军将在平汉方面，以一部阻止我军前进，以主力于河北省中部及津浦路沿线沧县、德县附近进行顽强的抵抗。为此，其陇海路沿线部队也大有向前方增援之可能。这些中国军队以我兵力微少，或直接进攻，或阻止我军集中，或扰乱我后方，难保不同时向我发起攻击。

据判断在山东省及察哈尔省内的第二十九军之一部可能保持中立态度。山西及绥远军也以一部开至省境采取消极对策，不致出现积极行动。(以下笔者略)

三、中国驻屯军的作战地区，大体为保定、独流镇一线以北、但中国军也可能在保定方面进行认真的抵抗。为进入该线，必须有激烈战斗的思想准备。(以下笔者略)

然而，此时有的中央军逐渐进入察哈尔省东部，已威胁到中国驻屯军的侧背及满洲国的西境。因此，参谋本部决定在河北省中部作战之前，先歼灭这支军队。8 月 9 日天皇批准中国驻屯军司令官，以一部兵力歼灭张家口以东之敌，又令关东军司令官由热河省、内蒙方面支援中国驻屯军作战。

中国驻屯军从 8 月 11 日命独立混成第十一旅团攻击南口附近长城一线之敌，16 日又增调第五师团参加作战。关东军蒙疆兵团(混成第三旅团、堤支队、大泉支队、独立混成第一旅团，后又增加混成第十五旅团)由北方进军，20 日对张北之敌开始攻击。8 月下旬两方各兵团分别突破冀察省境及张家口附近，9 月.上旬进人察晋省境。

另一方面，华北事变爆发后，华中、华南的形势也日趋恶化。8 月 9 日上海发生海军中尉大山勇夫被中国保安队枪杀事件。以此为开端。13 日该地海军陆战队遭受中国军队围攻。以后终于发展到双方出动空军互相轰炸的局面。

因此，8 月 15 日决定以第三、第十一师团为基干，组成“上海派遣军”(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其任务是“与海军协力，扫灭上海附近之敌，占领上海及其北方地区的重要地带，保护日本侨民的安全”。

同日，政府发表出兵上海声明。在声明中指出此次出兵的目的是“严惩中国军队的暴行，以促使南京政府醒悟”，并表明日本之企图在于日华协作，根绝抗日，改善日满华关系。总之，处理事变的目的，是要从解决局部事件进而扩大到全面调整日中关系。

这样，虽然战局波及华中，使用兵力也大为增多，但只是在 9 月 2 日，才将事变的名称从过去的“华北事变”改为“中国事变”。我国政府对此次出兵仍然看作是“事变”，并未实行宣战。

此时，中国方面的状况如下:

8 月 6 日，军事委员会在委员长蒋介石的主持下召开第一次国防会议。中央政府及各地军政首脑出席了会议，会上先由军政部长何应钦报告华北战况，随后由国防会议副主席汪兆铭报告国际形势，然后讨论国民政府应采取的最后态度。7 日在对日作战不可避免的结论下，对有关战时体制的重要事项作出了决议。

8 日，蒋介石以“告全体将士”为题发表演说，在表明抗战决心的同时，要求不惜最大牺牲坚持到底，争取最后胜利。9 日在上海发生了上述大山事件后，国民政府认为必须及早整顿全国对日抗战阵容，命参加国防会议的将领立即返回任地。

13 日，上海战事爆发。国民政府 14 日发表《抗日自卫宣言》，表示抗战的决心。16 日下达国家总动员令，全国分为第一至第四战区，形成全国战时体制。18 日，蒋介石针对日军的速战速决方针，提出了以不屈不挠的抵抗，尽量消灭日军有生力量，依靠持久战挫败日军的侵略意图。而且，将中国军的主力集中上海方面，使上海决战的方针具体化。其后，国民政府军迅速进行了动员。

中国共产党 8 月 15 日发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阐明抗日战争的基本主张。

十大纲领是(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二)全国军事的总动员；(三)全国人民的总动员；(四)改革政冶机构；(五)抗日的外交政策；(六)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七)改善人民生活；(八)抗日的教育政策；(九)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十)抗日民族团结。进一步发展了前曾叙及的 7 月 23 日毛泽东报告的精神。(“十大纲领”译文未与中文核对—译者)

上海派遣军自 8 月 23 日在上海附近登陆以来，反复进行激烈战斗。至此，日本政府也放弃了当初的不扩大方针，逐步进入战时体制。8 月下旬内阁决定了“国民精神总动员实施大纲”。为整顿战时体制，9 月 4 日召开了为期五天的第二十七次(临时)议会。5 日，近卫首相在施政演说中声明放弃过去的不扩大方针，为对中国军进行彻底打击，积极地，全面地转向了军事行动。

当时，陆军中央部最为关心的是苏联的动态。虽然目前苏联参战的可能性不大，但日方根本思想则是尽快从中国撤出手来以便整顿对苏战备。

11 月 1 日，首相、陆相、海相、外相会议决定了“处理中国事变大纲”，这是军事成果与外交措施的有机结合，力争尽快结束事变为宗旨，同时对长期的准备也做了安排的大纲。

然而，在当地的作战未能达到预期的政治效果。如后所述，8 月 31 日编成的华北方面军，在 9 月下旬开进保定附近，10 月为追击中国军更行南下，但也未能达到速战速决结束战争的目的。

在上海方面，由于中国军集中了主力，日军虽然投入五个师团，但战况全无进展。参谋本部于 10 月初决定将主要作战从华北转移到上海方面。10 月上旬以新编第十军从杭州湾登陆，加强上海派遣军，编成了华中方面军。其作战目的也由当初的“保护侨民”改变为消灭上海附近之敌，以“挫敌战斗意志，创造结束战争的时机”。

尔后，随着事态的急剧变化，11 月 20 日设置了大本营。为了统一大本营与政府之间的联系，举行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废止了以前的“战时大本营条例”。17 日新制订了不仅适用于“战时”，也适用于“事变”的“大本营令”。

华北方面地面作战概要

参谋本部在 7 月末扫荡平津之后，为实现击败北上的中央军而进入保定、独流镇一线的计划，以五个师团增强中国驻屯军。然而因第五师团已用于察哈尔方面，认为以现有兵力与大量增加的中央军进行保定会战似有困难。同时，为竭尽全力创造早日结束战争的时机，对打好华北会战这一仗寄托了很大希望。因此，讨论了增兵问题，结果决定以两个军担任此次会战，并编成了如下的方面军。

华北方面军的编成: 8 月 31 日以临参命第 82 号，下达了华北方面军第一、第二军的战斗序列，与此同时，决定派遣第十六、第一 0 八、第一 0 九师团到华北。又将原拟使用于青岛方面正在航海途中的第十四师团也派往京津地方。(注: 华北方面军司令部于 31 日编成，同日以临命第 480 号派往华北。)

华北方面军(方面军司令官: 寺内寿一大将，参谋长: 冈部直三郎少将)包括; 第一军(军司令官: 香月清司中将，参谋长: 桥本群少将)，该军由第六师团(师团长: 谷寿夫中将)、第十四师团(师团长: 土肥原贤二中将)、第二十师团(师团长: 川岸文三郎中将)为基干组成; 第二军(军司令官: 西尾寿造中将、参谋长: 铃木率道少将)，该军由第十师团(师团长: 矶谷廉介中将)、第十六师团(师团长: 中岛今朝吾中将)，第一 0 八师团(师团长: 下元熊祢中将)为基千组成，以及直辖第五师团(师团长: 板垣征四郎中将)、第一 0 九师团(师团长; 山冈重厚中将)、中国驻屯混成旅团、临时航空兵团及其他部队。

注: 其后在保定及沧县附近的会战，将第一 0 九师团的主力配属于第二军，将第一 0 八师团划归方面军直辖，在此次会战末期又配属于第一军。

于是，31 日对华北方面军司令官下达了下列任务:

“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占据平津及附近要地，确保该地的稳定。

“以挫敌斗志，争取结束战局为目的，迅速歼灭河北省中部之敌。”

河北省中部及察哈尔省方面的作战: 9 月 4 日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到达天津，当日即以歼灭保定、沧县一线附近之中国军为日的，下达了方面军命令，命第五师团(已突破冀察省境的长城线，进人怀来平原地带)推进到蔚县(张家口西南约 150 公里)附近，准备对保定平原地带进行作战; 命第一军进入易县(保定北方约 50 公里)、霸县(易县东南偏东约 80 公里)一线，准备攻击保定附近的中国军，命第二军(当时只有第十师团)进入马厂(天津西南约 55 公里)附近，准备攻击沧县附近的中国军。

11 日，第二军占领马厂附近后，又迅速推进到沧县附近，随后又命主力做好向保定南侧地区前进的准备。关于以后的作战经过，在参谋本部编写的“中国事变陆战史”中有如下的记载:

“第五师团于 9 月 1 日占领蔚县，根据情报，该地西方晋察省境附近之敌有进攻企图，师闭长拟先行击败该敌，然后再向奉命进占的方面转进，于是与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的平绥沿线作战同时进行攻击，至 9 月中旬击败晋察省境之敌后，进入保定平原地带。

“第一军从 9 月 14 日起，开始攻击涿州及保定附近之敌，战斗进展渐趋顺利。

“第二军以第十师团在津浦沿线作故，该师团从 9 月中旬向沧县进击逐次攻占要地，该军主力(第十六师团及第一 0 九师团的主力)以其先头部队由天津出发，从独流镇(天津西南 25 公里)沿子牙河向西南前进。

“9月18日华北方面军司令官，鉴于各方面的战斗正在顺利进展，决定向正定、德县一线追击敌人。当即命第五师团长以有力之一部，根据需要与关东军派遣兵团协同作战，以主力向保定进击，命第一军司令官突破保定附近敌阵后，向正定附近追击敌人，命第二军司令官以一个师团向德县压迫敌人，以其余主力向正定急进切断敌人退路。(笔者注;华北方面军的作战地区大体限于石家庄----德州之线以北，此乃9月25日以临命第542号所规定。)

“第五师团突破敌阵以后，师团长以有力之一部于9月下旬击败灵邱内长城线一带之敌，旋于该地附近被优势之敌包围陷于苦战之中，师团长乃率领主力攻击该敌，配合关东军派遣兵团从北方对内长城线敌军的攻击，于9月末击败该敌，以后即转向‘太原攻略战’。在此期间，师团长以一部兵力于9月中旬末，由蔚县出发，经涞源(蔚县正南偏东约50公里)于10月上旬进人保定平原地带。

“第一、第二军于9月24日分别攻陷保定及沧县。第一军于10月初由保定出发，向正定追击敌人。第二军继续前进，其主力于10月5日到达小范镇(正定东约110公里)，沿津浦线南下的第十师团于10月初占领德县。

“华北方面军司令官为了消灭盘踞于河北平原地带敌之有生力量，命第一军适时开始攻击，在突破石家庄敌阵之后，向顺德（石家庄南方约115公里）急追敌人，另以一部兵力进击井陉(石家庄西方约50公里)以西之要地，切断敌通向山西方面的交通，同时与第五师团互相策应，命第二军由滏阳河左岸攻击敌主力之背后。(笔者注:方面军于10月5日下达命令。)

“第一军于10月上旬末攻陷石家庄，当即追击京汉沿线之敌，10月中旬占领顺德，随即进抵漳河一线。

“第二军主力于10月中旬到达宁晋(石家庄东南约63公里)，以后与第一军同时并进，经京汉路东方地区向广平追击敌人，10月中旬在津浦沿线占领平原(德县正南偏东约30公里)。

“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8月下旬占领张家口后，立即向西攻击平绥沿线之敌。9月中旬占领大同后攻占附近要地。但得知第五师团在内长城线附近陷于苦战，乃于9月下旬以主力攻破内长城线附近之敌，经滹沱河河谷向西追击敌人，进入代县(大同正南偏西约100公里)南方地区。(9月30日一笔者注。)

“10月5日以独立混成第十一旅团为基干，奉命编组第二十六师团(10月下旬编成)。关东军司令官命该师团长(后官淳中将，10月9日到任)指挥察哈尔派遣兵团，攻取绥远(今呼和浩特一译者)、包头。该师团长以派遣兵团之一部，于10月中旬攻陷绥远，包头。

太原攻略战

“中央统帅部于10月初决定攻取太原，命华北方面军司令官以一部兵力，由山西省北部进攻太原。命关东军司令官以一部兵力归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指挥，以加强对太原的攻略战。

“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根据上述命令，将最近由关东军转调到内长城线以南的各部队划归第五师团长指挥，同时命第五师团长负责攻取太原。

“第五师团从10月中旬攻击忻口镇(代县南方约70公里)附近敌人的坚固阵地，战斗未能顺利进展。方面军司令官于17日命第一军司令官以有力部队，突破正太路方面敌人阵地，进入榆次(太原东南约26公里)附近，以支援第五师团攻占太原。第一军司令官奉命派第二十师团的一部兵力开往正太路方面，但因井陉之敌顽强抵抗，战斗仍无进展。21日，方面军司令官命第一军司令官以第二十师团全部及第一0九师团之一部，继于27日又命一0九师团之主力(由第二军转属第一军)参加该方面的作战。

“第二十师团于24日突破河北、山西省境，沿正太路向西追击敌人。第五师团(根据

方面军命令于11月上旬归第一军司令官指挥)于11月突破忻口镇附近阵地，于同月上旬占领太原及其附近:

“攻陷太原后，第五师团于 11 月中旬转进保定附近归方面军直辖。参加攻占绥远省及山西省的关东军，其大部分也都回原驻地。

此后，察绥两省(包括晋北在内)由第二十六师团负责驻守。

“中央统帅部鉴于上海战线的胶着状态，10月中旬乃将第六、第十六师团及国崎支队(国崎少将指挥的步兵第九旅团、山炮兵一个大队为基干)由华北转用于上海战线。

“于是第一军以两个师团（第二十，第一0九师团）确保山西省北部，以其它两个师团(第十四、第一0八师团)确保京汉路沿线。第二军以一个师团及一个支队(步兵第一0八旅团内缺一个联队为基干)确保津浦路沿线。

扫荡宋哲元军及山东军

“10月下旬在京汉路方面的宋哲元军，企图扰乱我军后方，津浦路方面的山东省主席韩复渠也敌视我军(过去韩复渠对中央与日本之间采取观望态度)，令其部下山东军活动于黄河左岸。因此，方面军司令官于10月下旬，命第二军司令官摧毁德县附近以南山东军的活动，准备攻取济南。

“第二军司令官从 10 月上旬至中旬扫荡了山东军。第一军以警备京汉路的两个师团于11月上旬至12月中旬，对宋哲元军进行了彻底的打击。

济南攻略战

“攻陷南京后，大本营决定戡定胶济路沿线及济南黄河上流左岸地区，令华北方面军司令官逐步推进此一作战(但对青岛及山西南部的攻取，须待大本营指示)。

“于是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决定速取济南，当即命令第二军攻占该地。

“该军从 12 月下旬开始在敌前渡过黄河。随即占领济南，并追击敌人。从年末至年初进入泰安（济南南方约50公里）一线。”

注:在此期间，上海方面已如前述，11月7日华中方面军编成，又于12月1日下达该方面军的战斗序列，同时命其攻取南京。方面军于 12 月 13 日攻陷南京。又以一部占领扬州、滁县，切断江北大运河及津浦路。24日占领杭州。

第八路军的出动

8月25日发表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就任通电(22日接受命令)，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举行誓师大会后，即开赴前线。9月，八路军从韩城、潼关两处渡过黄河进入山西，乘同蒲路军用列车北上，在原平镇下车集结。当时，日军正在攻击雁门关、平型关方面。因此，第一一五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向晋东方面，第一二0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肖克)向晋西北方面分别进发，迎战日军;第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于原平镇北方待命。9月23日，八路军按照抗日战争的战斗序列，称为“第十八集团军”，隶属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兼任该战区副司令长官，命其与山西军各部队协同作战。

第一一五师于大营镇(平型关西方约20公里)待命，随后进入正在进攻平型关的日军的后方，9月25日在通往灵邱—平型关的山路上，伏击日军补给部队，使日军遭受极大损失。此次初战告捷。大大鼓舞了八路军的士气。(平型关战斗情况以后详述。)

以后晋东北方面在副师长聂荣臻的指挥下，进行游击战，并建立了根据地。

其一部杨成武支队从灵邱、广灵、涞源、阜平方面进至京汉路以西的曲阳、行唐方面，组织群众进行广泛的游击活动，占领了数十个县城。

第一二0师进入雁门(代县北方约30公里)以西的晋西北以后,活动于神池、宁武、朔县一带，同时以一个支队进逼大同附近，进行雁北(晋北)游击战。

随后，在日军的忻口镇(太原北方约60公里)附近，战斗一开始，八路军主力就协助山西军进行防御，于同蒲路北部地区展开了游击战。此时，一二九师的一部，夜袭阳明堡(忻口镇北方约60公里)的日本飞机场。彼时日军有力部队(第十二师团和第一 0 九师团之部队)正攻击正太路方面。其一部已开始攻击娘子关。因此总司令朱德令第一二0师及第一一五师的主力向该方面急进。

第一二九师主力从同蒲线地区北部经太原到达娘子关东南的七亘村。26日袭击日军辎重部队，使之遭受损失，缴获很多军用物资，同时使守备娘子关的中国军便于进行撤退。

以后第一一五师、第一二九师，以沿正太路进攻的日军后方部队为目标，在各处进行了伏击。共军在太原失陷后，即不与国民政府军直接协同作战，而采取自主立场实行所谓“敌后游击战”，扰乱日军的后方，并且在日军占领地区的间隙部分，努力建设抗日根据地，组织群众及武装群众。11月11日，第十八集团军确定了新的兵力部署，其情况如下:

第一一五师副师长聂荣臻，一直驻在五台山附近建设解放区，第一一五师主力转移到晋南汾河流域;第一二0师依然在太原及晋西北、第一二九师向晋东南移动，各师分别在敌后进行游击战。

平型关战斗

阎锡山指挥十几个师占据了沿内长城线的阵地。9 月下旬第五师团的一部开始向平型关进攻。阎锡山即将西方地区的兵力转用于平型关方面，因此该方面中国军颇占优势。

9月25日，中国军在平型关阵前进行反攻、同时共军的一部，伏击第五师团非战斗部队的补给部队，使该部队受到极大损失。

第五师团增强兵力继续攻击，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的主力予以策应，在茹越口正面突破长城线阵地，进入中国军之背后。因此，9月末其长城线阵地即已崩溃。

中共方面尽量进行夸大宣传，宣称这次平型关之战是八路军出动以后的首战大捷，由于八路军的奋战，为中国抗战开始以来赢得了最初胜利。中共伏击成功确是事实。但从内长城线的攻防战看来，此乃一时的局部战争。以下介绍日中两国的资料。

关于第五师团的行动，在“中国事变陆战概史”中有如下的记载:

第五师团平型关附近的战斗

（以上笔者略）第五师团长在蔚县正准备转进保定，但20日得到情报称:山西军以主力于内长城线一带，以另一部于大营镇、代县间地区集结，似在构筑阵地。于是，师团长决定攻击该敌，突破长城线，彻底打击山西军并进占大营镇附近，以利于向保定方面转移。21日命步兵第二十一旅团长率领在灵邱的部队，沿灵邱一大营镇的道路，向大营镇追击，

命步兵第二十一联队从浑源经小道沟，西河村向涧峪村(大营镇西北约 8 公里)附近追击。

步兵第二十一旅团长于 22 日以三个步兵大队为基干部队向大营镇前进，在平型关与敌人遭遇，立即予以攻击，但战况并不如意。经过激战后，于 25 日占领了该地附近的长城线正面约 2 公里的地方，然而当日即有优势之敌截断我后方联络线，并逐渐增加兵力，因此，旅团陷入被包围的困境。

步兵第二十二联队于 21 日从浑源出发。

笔者注: 以后联队转入棚子沟，翌日正在攻击该方面之敌，收到旅团陷于苦战的情报，于 26 日转进平型关，28 日参加旅团战斗。第五师团长在 25 日得知平型关附近的状况，命正集结于蔚县的部队(步兵第四十二联队主力)前往救援。该部队于 26 日后到达战场参加平型关附近的战斗，然而战斗进展不能如意。

笔者注: 关东军司令官决定以蒙疆兵团主力(混成第二、第十五旅团)从下社村、茹越口方面，以一部(步兵第一联队主力及大泉支队为基干的十川支队)从平型关北侧地区，攻击当面之敌，支援第五师团。27 日开始攻击，29 日突破敌阵转为追击。第五师团方面，29 日一齐开始攻击，但战斗难以进展。至 30 日拂晓，乘敌退却，各部队始进入大营镇平原。

中共方面的资料《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书，第二章以“平型关大战”为题，其中记载大致如下:

9 月中旬第一一五师(师长: 林彪将军)主力，于平型关西方大营镇集结待命。此时日军已迫近灵邱，国民党军方面再三要求我军向灵邱正面增援。林彪将军亲自侦察灵邱方面地形，根据当时国民党部队溃退及日军猛烈锐进的情况，决定取消增援灵邱的办法，而由友军(国民党军)利用平型关的险要阻止敌人的进攻，我军则出其不意从侧后猛烈袭击敌军。此作战方针一经确定，部队即昼夜兼程向平型关东南山地的下关及上寨移动。国民党的败兵只顾到处抢掠。

23 日午前林师长在上寨召开连以上干部动员大会，说明了情况和计划。此时，收到友军电报，内称: “敌之先头部队，正在进人平型关附近，现正炮战中。”林师长立即决定; 以骑兵部队全部及步兵部队一部向灵邱方面出动，负责牵制敌人增援部队，以师的主力策应平型关附近的决战。

23 日夜，师部率领主力向距平型关约 30 华里的冉庄急进。在途中已可听到隆隆炮声。附近一带居民已全部逃走。一部部队找到居民，井告诉说: “我们是八路军，不要害怕。”好不容易才使他们勉强回家，但时过不久就又逃走了。由于那时群众是没有组织与领导的，他们害怕日本及国民党军队，对八路军也不甚了解，因此一见军队就逃走。

24 日营长以上干部亲自到前线侦察。部队严加戒备，以营为单位进行战斗动员。党支部也举行了政治工作会议，讨论了如何保证战斗任务的完成。黄昏后，师部接到第六集团军总司令部送来的“25 日出击平型关计划”，估计敌人“于 25 日有大举进攻的可能性”。根据这一判断，国民党军除担任正面防御以外，计划以八个团由平型关西北攻击敌之侧背，要求一一五师从平型关东南出击。

林彪师长与聂荣臻副师长于灯下详细研究地图以后，下达命令: “当夜 24 时出发向白岩台前进。”黑夜，部队在大雨中沿崎岖的山沟前进。拂晓前部队到达白岩台(距汽车路约 1 公里)的埋伏阵地。我军主力布置在由平型关到东河南镇(灵邱与平型关中间)之间(约 6 公里)的汽车路以南的山地一线。同时以一部兵力占领东河南镇以北的高地，以便切断敌之退路。

25 日黎明，攻击平型关的敌军情况已可望见。此时，敌人从灵邱方面开来一个旅团(板垣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兵力约 4000 人，前面约有 100 余辆汽车，接着有 200 余辆辎

重大车，后面有少数骑兵，完全连成一线，进人了我伏击圈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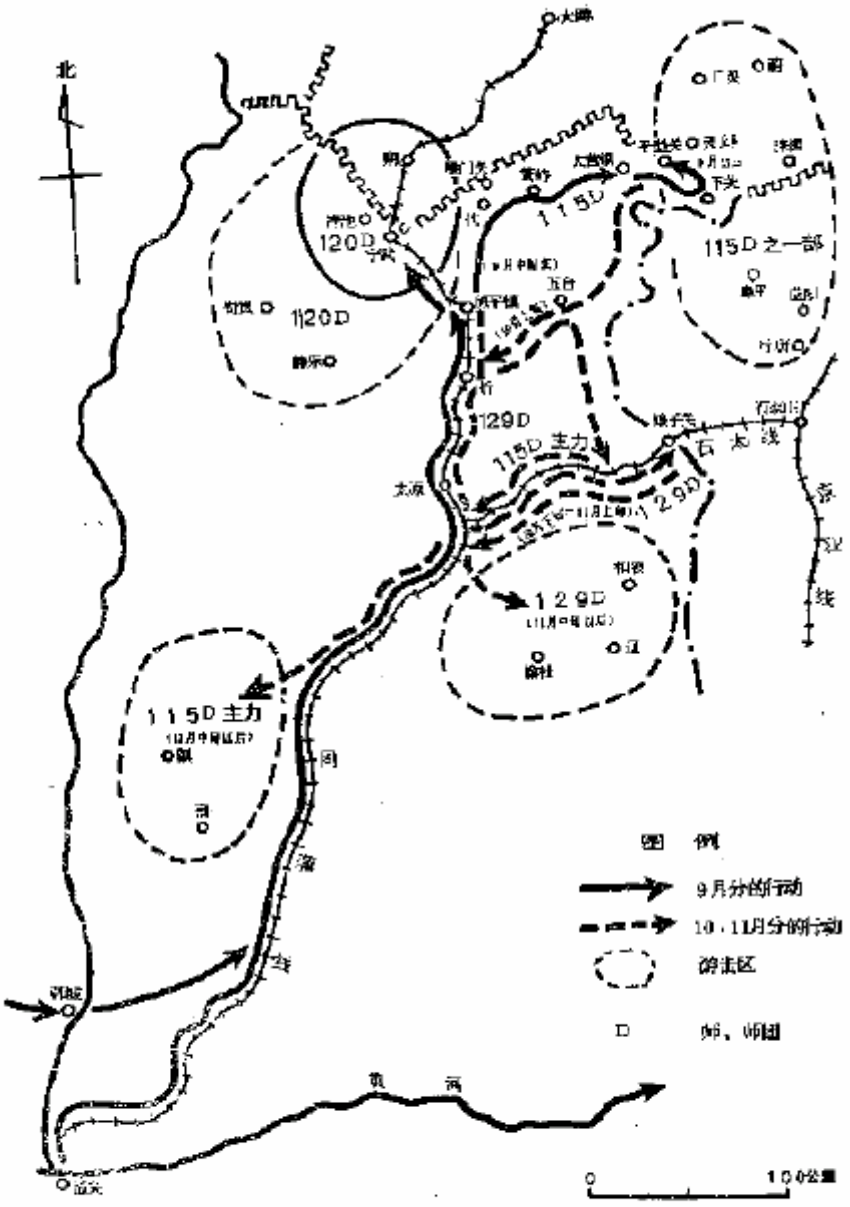


图 1 · 第八路军行动概要图
（1937年 9 月—11月）

5 时 30 分战斗开始。师部攻击令一下，我前线部队立即以居高临下之势袭击敌人。敌人万未料到距离他们如此近的地方会有伏兵，当即展开肉搏战。敌人最后尾的汽车被炸毁，不能逃走的汽车互相仲撞，情况极为混乱。有些敌人在汽车底下进行顽抗，有些敌人向西北山上爬，企图夺取阵地。此时我军全线展开突击，十数里长的山沟里，充满手榴弹爆炸声和刺杀声。敌人虽进行顽强抵抗，要夺取四周的高地，但是重要高地均在我军手中，我军控制了整个山沟，返复向敌人发起冲锋。

经过整日激烈战斗，终将平型关以东 10 里以内之敌全部歼灭。山沟的道路上被敌人死伤的人马和破坏的汽车以及遗弃的兵器所堵塞。

此部敌军乃素以精锐闻名的板垣师团，战斗极为顽强。当时虽想活捉敌人，但无一降者，至死也不放下武器。伤兵扭在一起相咬相打。敌一伤兵被我营长背负救出，他竟在途中将营长的耳朵咬掉。

我军歼灭山沟之敌以后，当即集结兵力，对进攻平型关阵地之敌军背后进行攻击。此处为友军(山西军)的攻击目标，但始终未见山西军的踪影。因未得友军适当配合，以致未能歼灭该敌。

26 日敌人得到浑源方面的增援，重整阵容，在东河南镇方面也发现了敌人增援部队。同时大量敌机袭击我阵地。我军决定以一部向敌增援方向进行游击，箝制敌人，以一部打扫战场;主力向山西移动。战利品极多，搬运两天仍未搬完。此次战斗，歼敌 3000 余人，毁汽车 100 余辆，大车 200 余辆，缴获野炮 1 门，轻重机枪 20 余挺、步枪 1,000 余支、掷弹筒 20 余个、战马 53 匹，以及其它军用物品无数。仅大衣一项，给我师将兵各发一件还有余。

(以上译文与人民出版社 1953 年版“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原文对照，日文著者有所删节。—译者)

以上为中共方面所传在平型关附近的共军战斗情况。另在国民政府军方面对此次战斗有如下记载:

敌人企图夺取察哈尔省以后分兵进攻晋北，并占领晋北战略要地。9 月下旬以来以主力从浑源、灵邱猛攻我平型关，以一部由茹越口突入。

我军为确保晋北要地，集中晋军十余师，占领平型关、神池一线的防御阵地而努力抗战，但因繁峙陷落，后方路线被截断，终于 9 月 30 日夜，分散转移五台山、代县一线。

二 1937 年华北占领地区的治安状况

华北政权建立工作

从平津地区将宋哲元第二十九军驱逐出去以后，派遣军内部主张在占领地区实行军管或建立新政权的意见抬头，但陆军中央部依然贯彻当初的方针，依靠民众自治，进行善后工作，我军只是予以保护。

7 月 30 日在北平，8 月 1 日在天津，分别成立了治安维持会。当时在平津地方，便衣队、残兵游勇到处横行，各种抗日团体也暗地活动，经日军不断讨伐，治安渐趋恢复。8 月 20 日解散了冀察政务委员会。从此以“建设华北人的华北”、“打倒国民党专制”为目标的运动应运而起。

陆军中央部也在 8 月 12 日制订“华北政务指导大纲”，将当初方针稍加具体化。

然而，正当陆军中央部考虑以较稳健方法进行局部地区解决之时，当地军方，尤其是关东军，提出了积极处理时局的设想。关东军司令部 8 月 14 日决定的“对时局处理大纲”中对华北政权的设想如下:

华北政权大致以五省自治为最终目标，先将河北及山东二省(将来包括山西)组成一个政权。另将察南、察北合并建立一个政权。前者设于北平，后者设于张家口。两政权内各配以有能力的日本顾问。日军则专门负责确保各地治安。有关政治、经济等的指导问题，由设在北平、张家口的大特务机关长，通过日本顾问，对其外交、经济、内政方面进行幕后指导。

此方针依然是将华北新政权置于中央政府的宗主权下实行自治的设想，是关东军对建立新政权的强力建议。在上述设想中，由大特务机关长通过顾问对当地政权进行幕后指导的方式，成为以后日军在占领地内体现其政权指导的一个重要样板。

在华北占领区内，由北平、天津、通州的特务机关担任军方的政务执行机关，归中国驻屯军参谋长统辖。但至华北方面军司令部成立后，则在参谋部以外另行设置了特务部。

9 月 4 日，喜多诚一少将被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大将任命为特务部长，接受了下列训令。

训令喜多少将

一、贵官为军特务部长，指挥所属部员对军方作战的后方地区(包括冀东)执行各有关政务事项，统辖指导中国方面的机关，为使该地区成为实现日满华合作共荣的基础而进行各项工作。

前项工作暂应依据 1937 年 8 月 12 日陆军省起草的华北政务指导大纲。

二、关于将来在华北建立政权问题，应体察华北人心的趋向，逐步进行准备。

三、为了削弱中国方面的斗志，以迅速结束战局为目的，对敌军后方采取相应的谋略。

四、当施行以上任务时，应与军方参谋部.各军、独立兵团及方面军兵站部紧密联系。

五、有关细节由参谋长指示。

9 月 6 日，华北方面军参谋长冈本直三郎少将根据上项训令指示如下。

指示喜多少将

一、政务指导首先应迅速确立治安，并安定民心，为使日军的后方安全，着重建立并扩充各项制度和设施，逐渐开展一般工作。

二、政务指导应经常考虑当地与第三国的关系，进行适当调整，避免发生纠纷。

三、关于交通、经济等的建设，应注意与作战用兵方面的关系及国防资源的获得，努力促使日满资本的流入。

四、关干建立华北政权的准备，暂建立政务执行机关，以统治现在及将来的军占领区的中国方面各机关，且尽量使之成为将来华北政权的基础。

五、关于谋略问题，应抑制华北现有军阀参与会战，努力制造并扩大反蒋气氛，同时根据需要对南京施以政治及经济的谋略。应与军参谋部所进行的作战谋略紧密配合互相协

力。

六、特务部与军方有关方面配合如下:

(一)向中央部请示、建议或作其它重要业务报告时，须经军参谋长同意。

(二)直接供作战用的中国方面交通、通信机关，统由军方直接使用，并指导中国方面机关使其协力为原则。

(三)作战地区后方的警备，虽然依靠军方部署的兵力，但应指导中国机关使之尽量减轻军队的负担。

(四)关于宣传及宣抚，与军宜传部密切联系，务求其圆满为要。

在此指示中，并未明确将来政权的性质。当时在察哈尔方面，如以后所述，关东军指导的蒙疆政权的建立工作有了显著进展。但是华北为中国内地，且与议和有关，问题重要而复杂，其行之不易是不难想象的。

当时特务部在此问题的配合上，研究和准备工作均未做好。该部的组织为:特务部长(喜多诚一少将)。其下设有总务课一政策(课长:根本博大佐);第一课一交通、通信、邮政、建设(课长:佐伯文郎大佐);第二课一经济(课长:井户垣骏主计中佐)，1938 年 1 月设第三课一产业(课长:石本五男中佐)。

注:据佐伯大佐的记录，该大佐于 9 月 15 日到天津任职时，部下只有一名工作人员，办公室也未准备。总务课也只有数人。第二课的工作还算活跃。当时特务部编制细则尚不明确，后来才有明文规定，1938 年 4 月以军令决定的特务部编制如下。

军令陆甲第 22 号(1938 年 4 月 14 日)

改正中国驻屯军编制修改部分

一、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有关政务事项受陆军大臣的监督。

二，华北方面军参谋长秉承华北方面军司令官的意图，统辖军特务部的业务，负责军事与政务之协调。

三、华北方面军特务部长隶属于方面军司令官，掌管有关政务事项。

方面军特务部长向方面军司令官申请事项，须向参谋长陈明情况取得同意。

四、各地的特务机关如下:(机关长是以 1938 年 3 月 2 日为期，括号内是前任)

天津特务机关，机关长为森冈皋少将(仪俄诚也少将)

青岛特务机关，机关长为河野悦次郎大佐(代理中本四郎中佐)

济南特务机关，机关长为渡边渡中佐(中野英光大佐)

太原特务机关，机关长为谷荻那华雄中佐

河南省特务机关，机关长为落河鼎五大佐

10 月 1 日中央在总理、陆、海、外相会议上决定了“中国事变处理大纲”。大纲以尽快结束此次事变为宗旨。其中作为“华北对策”，则以三、五项的规定为准则，其内容如下:

三、华北对策:

华北问题的解决，以日满华共存共荣为目标，在中国中央政府之下应以真正使华北明朗为宗旨。

注:行政虽由中央政府施行，但上述地区的行政首脑应为实现日华融洽可靠的有力者。另外，与中央政府之间，应在华北订立以日华平等立场合办及其它合作方式的经济协定。

此外，并在华北设立非武装地带。

五、对华北作战后方区域的措施:摆脱“占领敌国领土”的观念，大致规定如下:

(一)不行使占领地区的行政，但治安须由军方指导确立之。

(二)行政机关由当地居民自行组织，但应对其加以指导，使之成为明朗的施政。

(三)在军事上必需的交通设施及资源开发，应在必要的统治下进行。

以上的(二)及(三)两项必须在和平局面出现后，在不影响调整邦交情况厂进行。

上述大纲中必须注意:在作战区域后方的行政机关，应由当地居民自行组织，并须置于中央玫府统治之下。9 月 23 日在天津成立了“平津治安维持联合会”。北平治安维持会于 10 月 12 日召开了常务委员会，会上决定将“北平”改为“北京”，同时发出了“劝告国民政府和平停战”的通电，以打破南京迷梦，促其反省。

从 10 月至 11 月随战局的急速开展，在当地军方及陆军中央的部分人士中，主张建立华北新政权，这一政权的性质并非地方政权，而是取代南京政府的中央政府。

12 月 28 日，华北方面军特务部在“华北政权建设研究”中说，其所提倡的新政权不是华北地方政权，而应是取代南京政府的中央政府，其政令得在日军势力范围内所属全部地区普遍行施。理由是，如果以地方政权为牌匾，不足以号召第一流人物前来参加，且带有分割中国的地方政权形式的嫌疑，实非善策。再者，建立地方政权乃是消极退让，易被南京政府的统一政策所压倒。当时陆军中央部也提出了同样的意见，随着和平谈判问题的进展，引起了种种议论。关东军支持华北方面军的意见，于 11 月末提出了尽量树立政权的强力建议。于是新政权即在此种情势之下诞生了。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

12 月 7 日，以由香港来北京的王克敏为中心，协商决定了新政府的组织纲领。在南京陷落的第二天(14 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于北京居仁堂举行成立仪式。新政府是三权分立体制，主席暂时空位。成立了议政委员会(委员长:汤尔和)、行政委员会(委员长: 王克敏)、司法委员会(委员长:董康)。以五色旗为国旗，继承中华民国年号，定都于北京。北京、天津设特别市，北京特别市市长为江朝宗，天津特别市长兼河北省省长为高凌爵。京津治安维持联合会在 15 日解散。新政府的主体行政委员会，下设行政部(部长:王克敏)，治安部(部长:齐燮元)、文教部(部长:汤尔和)、司法部(部长:朱深)、赈济部(部长:王揖唐—救济灾区)等五部(部长后改总长)。临时政府要人均为军阀时代的政客。

新政府于 14 日发表如下的施政方针:

一、内政方针:

清除国民党一党专制的积弊，真正体现中国民众的共同心意，施行为中华民族谋幸福的政治。

二、经济方针:

确立以农为本的农村政策，同时开发资源，发展生产，努力改善民众生活。

三，东亚政策:

以体现东亚道义的民族协和精神为基准，与邻邦友好相处，谋求真正的亲善合作。

四、对外玫策:

前政府所负的对外义务，凡属已向国民发表的债务及其它义务，代其承担一切责任，不侵犯他国权益。

五、防共方针;

绝对排除容共政策，进一步与防共各国相协力，确保东亚的固有和平。

以后，各地治安维持会，逐次划归临时政府治下。冀东防共政府也于1938年2月1日与之合并，冀东22县编入河北省。河北省分为冀东、天津、保定、冀南四道，省公署暂设天津。

在山东省，济南于1938年1月1日、青岛于1月17日分别组织治安维持会，纳入了临时政府的治下。4月4日建立起行政组织(全省分鲁东、鲁西，鲁南、鲁北四道)，任命马良为省长。

在河南，1937年11月27日于彰德成立了河南自治政府，吴佩孚的部下肖瑞臣任主席，山西省在12月10日成立了山西省临时政府，提出与日满两国亲善合作、反共灭党的口号。其后随着治安的恢复，也纳入了临时政府。1938年4月20日河南省(省长:肖瑞臣)、山西省(省长:苏体仁)省公署分别成立。

然而，这样成立的临时政府，其自主能力及实际情况都存在种种问题。

在此以前，日本政府曾通过德国驻华大使进行和平谈判，拟从军事及外交两方面努力谋求事变的解决。

由12月初以来，根据“事变处理大纲”，研究了针对和平解决与不能和平解决两种情况的准备工作，并以此为基咄进行施策。结果，“不能和平解决情况下”的处理要点，已成了今后的基本政策。

政府于12月24日经内阁会议决定了“事变处理大纲”，在此大纲中的“华北处理方针”如下。

华北处理方针

在华北以增进中国民众的安宁福利为政策方针。在政治上以成立防共亲日政权、经济上以建立日满华不可分离的关系为目标，促进该政权逐渐扩大和加强，指导新中国逐步形成新的中心势力。

然而，与中央政府谈判成功时，上述新政权应根据和平条件进行调整。

甲、政治指导方针

(一)华北新政权不仅对华北而且对华中、华南方面也必须取得威信。为此，(1)该政权的首脑应网罗在全中国具有威望的人才;(2)该政权应有适应新时代的机构;(3)应有能号召全国的主张和纲领;(4)我方对该政权的指异，应停止大纲中有关日人顾问的幕后指导而改为配备日系官吏，但以不干涉行政细节为方针。

(二)华北新政权所包括的区域，虽依军事行动进展而定，但大致为河北、山东、山西三省及察哈尔省的一部分。撤消冀东自治政府使之与新政权合并。对察南及晋北两自治政府，相机使之与新政权合并。此外，应与蒙疆自治政权保持密切联系。

(三)目前为避免与第三国发生纠纷，暂不插手租界，但在租界以外，即使在新政权建立以前，也应使其邮电、税务等的行政组织正常运营。

对海关则另行考虑。

乙、经济建设方针

(一)华北经济建设的目标，在于加强与日满经济的综合关系，以确立日满华协作共荣

的基础。为此，要使当地中国资本与我方资本和技术紧密结合，使经济各部门发展完备，以维持秩序，安定生活，从而扩充日满两国广义的国防生产力。

然而发展经济建设，应尊重日满及华北的国际间收支的对等及物资供求的调节，并根据轻重缓急采取措施。同时，应把重点放在努力做到既不使中国有经济压迫之感。又不违反我国国民的期待，而妥善掌握国策进行运营。

(二)为了华北经济的开发和管理，应成立“国策会社”，以体现举国一致的精神和全国产业动员的宗旨。

由会社负责发展、经营和调整有关主要交通运输事业(包括港湾及道路)、主要通信事业，主要发电事业、主要矿产事业、盐业及其化学工业等。

关于该会社经营，则要适应日满两国主要产业计划，并经常考虑我国实情，根据轻重缓急进行经营。

以上各项重要产业以外的其它事业，除有特珠原因者外，不施行特别管理。

(三)在发展华北经济时，尽量利用中国资本，并谋求与中国企业方面的协议。

(四)允许第三国投资合作发展华北经济。在可能范围内，尊重在华北的各国的既有经济权益。

(五)在谋求日满华贸易关系紧密化的同时，适当地调整华北对第三国的贸易。

(六)促使当地政权对于改善农业、兴修水利、植树造林、合作社等，逐步进行必要的建设。

(七)在华原有企业中的主要产业，根据本方针进行整顿和调整。

(八)目前凡能立即着手的事业，在将来按本方针进行整顿、调整的前提下，迅速采取措施开始经营。

(九)有关华北经济发展的谈判对象，当前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治安维持会、或其联合会及地方政权。

与南京政府尚未达成和平解决之前，拟将华北新政府扶植成新中国中央政府，同时，由10月前后以来、急趋表面化了的我方对经济的期待，此时更为殷切。于是为管理华北的经济开发，决定成立“国策会社”。

蒙疆三自治政府的成立

关东军于8月9日接到在察哈尔进行作战的命令，13日迅速决定“察哈尔方面政治工作紧急处理大纲”，而向陆军中央部提出了建立政权的设想。在大纲中主张建立“统辖察北、察南的统一政权”，但是陆军中央部予以反对，并训令关东军对其内蒙工作应以长城以北的察、锡两盟为限。其后虽有若干交涉，但至27日关东军占领张家口后，立即积极展开工作，9月4日迅速成立了察南自治政府。政府以杜运宇、于品卿为最高委员，受新张家口特务机关长吉冈安直大佐及最高顾问金井章次的指导，管辖察南10县，开始了政务工作。

继于9月13日占领大同，10月15日成立晋北自治政府，管辖长城以北山西13县，最高委员为夏恭，最高顾问为前岛升。

关东军事先于10月1日决定了“蒙疆方面政治工作指导大纲”，该大纲决定了改组内蒙政府为自治政府和晋北自治政府的组织要领。并从察南、晋北、蒙古三自治政府派出委员，在张家口成立“蒙疆联合委员会”，指示该委员会协商、管理有关三政权的重大政务工作。这样，由以前察哈尔政权的设想，一跃

变成建立包括绥远、晋北的蒙疆政权的蓝图。

10 月 4 日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大将将该指导大纲呈送中央，并训令蒙疆各特务机关长遵照执行。该训令如下:

训令张家口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大佐

一、贵官对蒙疆方面政治工作，应遵照附件指导大纲统辖有关机关担任领导工作。

二、关于蒙疆方面的领导，应统辖有关特务机关长处理工作。(以下笔者略)

对松井大佐的指示(指示者为东条关东军参谋长一笔者注)

一、晋北自治政府。在当地居民自发趋势形成时，即应迅速成立政府。

二、蒙古自治政府，应尽力促其早日成立，对汉民族要密切注意，防止发生摩擦。

三、三政权联合委员会应与各有关特务机关长紧密联系，以期使之尽快设立。

四、平绥线虽属联合委员会管理，但目前应由满铁华北支局在张家口设立铁道局管理其业务。

五、币制及金融机构的统一，应首先扩大改组察南银行，将来俟时机成熟普遍改变名称，并应进行有关事项的研究。

六、在确定鸦片、盐务政策时，应特别注意筹划蒙疆方面的财源，并应注意防止财源及粮食流入我管辖区以外的中国地方。

七、其它矿山资源的开发，目前龙烟铁矿应以兴中公司为中心。下花园、大同煤矿应速作调查，促进开发准备工作。(以下笔者略)

八、关于各地治安的维持，应指导有关机关紧密与当地军队，特别是帝国军队取得联系，充分作好作战与警备，不得稍有疏忽。

九、附件指导大纲第一至第三，除联合委员会最高顾问外，不准阅读，对有关机关根据需要可作指示。(以下笔者略)

训令大同特务机关长羽山喜郎中佐、张北特务机关长桑原(荒一郎少佐)

贵官对于蒙疆方面的政治工作，应遵照附件指导大纲，担任各基地政权的幕后指导。

关于蒙疆方面的一切指导，应受张家口特务机关长的统辖和管理。

大同攻陷以后，关东军蒙疆兵团的作战更进一步发展，9 月下旬与第五师团协力攻占内长城线，10 月 14 日进攻绥远省主席傅作义的根据地绥远(今呼和浩特一译者)，17 日占领包头，内蒙作战至此告一段落。

10 月 27、28 两日，于绥远召开第二次蒙古大会，决议撤消蒙古军政府，成立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推选云王为主席，德王为副主席，将“绥远”改称“厚和”，定为首都，其国土包括察、锡、乌、巴、伊五盟(2 市 1 县 39 旗)及厚和、包头两特别市。12 月 1 日公布政府暂行组织法，自治政府正式成立。李守信为蒙古军总司令，军事最高顾问为高场损藏大佐，政务最高顾问为宇山兵士。

这样，张家口，大同、绥远(厚和)相继成立了自治政府。

11 月 22 日三政权的代表集干张家口，按预定计划组成蒙疆联合委员会。该委员会根据“联合委员会成立协定”，移交了各政权职能的一部分，即与各政权互相关联而且影响极大的产业、金融、交通及其它有关重大事项。该委员会设置日本人最高顾问一名，日本人参议及顾问若干名，委员会由总务委员会及产业、金融、交通等专门委员会组成，并规定“联合委员会的决议，必须通过有关委员、最高顾问及有关顾问的协议”。金井章次就任最高顾问，依据“缔结协定时谅解事项”的规定，由金井最高顾问代行总务委员长的职务。总务委员长为“总理联合委员会和代表联合委员会”最重要的职务。

注:各自治政府也设有日本人最高顾问，规定一切重要政务时必须经过最高顾问的同意。

同一天，在联合委员会成立时，三自治政府代表向关东军司令官呈送了下列内容的函件:

一、蒙疆地方的本委员会应处理的一切命令及执行的政务，须适应贵军占领地的军事要求，因此，请求贵军给以大力协助，特请贵司令官在幕后指导方面给予深切的关怀。

二、本委员会的最高顾问、参议、顾问及委员会职员中的主要成员，请由贵司令官推荐日满两国人员充任。

三、本委员会所管理及统辖的重要交通和重要产业，根据需要.可委托贵司令官指定日满各机关分别经营，或合并经营，对此请给以方便。

关东军司令官接到上述要求，于11月25日当即函复，其内容为:“拟在我方可能范围内，尽力给以协助”。这是关东军司令官与蒙疆联合委员会之间秘密交换的文件，这就是前述11月1日的“指导大纲附件第二”中所规定的内容。依此，在正式条约成立之前，规定了日蒙之间的基本关系，确立了关东军及驻蒙兵团的领导权。

关于蒙疆(察、绥、晋北)的区域及政务领导，陆军中央部与关东军之间，有重大的意见分歧，但关东军根据既成事实。推行了自己的方案。关东军认为根据经济和人口分布的状态，若将察南、晋北分离出去，仅在内蒙实现独立自主是有困难的。事实上，蒙疆的经济是以京包沿线为中心、晋北的大同煤矿、察南的龙烟铁矿的丰富资源最有吸引力。察南、晋北的人口占全蒙疆的一半以上，其中大部分是汉人。

注: 蒙疆的各种统计极不正确。根据1932年2月驻蒙军的调查，黄河以北蒙疆的总面积约为50万平方公里，总人口413万人，其中蒙人28万。汉人385万.其比率是1比13.6,察南、晋北的汉人占全体的56%，其余汉人的居住地区大概在外长城线以南。

对关东军的强硬要求，陆军中央部曾持拒绝态度，思想上虽然逐渐趋于缓和，但也并未全面认可。9月4日在“察蒙处理大纲”中有关察南、晋北的归属问题，规定“目前承认关东军在政务上的指导，但将来由华北方面军担任之”。在12月24日的“中国事变处理大纲”中规定“察南、晋北两自治政府相机使之与华北新政权合并。后在1938年初，编组了担任蒙疆地方防卫的驻蒙兵团(直属大本营)由中央直接领导。对此，关东军从未改变其设想，而努力使驻蒙兵团继承关东军的方针。

1937年末占领地区的治安状况

中国军的状况:中国军在事变当初(8月15日)，分全国为四个战区(冀察方面第一战区、察晋方面第二战区、上海方面第三战区、华南方面第四战区)，在战区内部署若干集团军与日军相对峙。10月上旬为了保卫津浦沿线及其以东地区，设立了第五战区(该方面的第三战区担任南京方面的防务)。12月.上旬又新设两个战区而成为七个战区，华北有四个战区、华中有二个战区、华南有一个战区。南京陷落后，其战区的划分如下表:

方面	战区	司令长官	配备地区	各战区兵力概况
华北	第一战区	程潜	京汉沿线	约 25 个师
	第二战区	阎锡山	山西省方面	约 35 个师
	第五战区	李宗仁	津浦沿线	约 20 个师
	第六战区	蒋介石，副司令长官朱绍良	陕西、甘肃方面	约 4 师半
华中	第三战区	顾祝同	江南地区	约 45 个师
	第七战区	刘湘	浙赣沿线	
华南	第四战区	余汉谋，司令长官何应钦，后为张发奎，余为副司令长官	华南方面	约 13 个师

中国军虽因华北战败受到打击，但政府机关移往内地。因此，更加强了战时体制，同时重新编组军队，整备武器。

日本军的状况：在蒙疆方面：新编成第二十六师团，在关东军司令官的统率下，自 10 月中旬以后指挥内蒙军及满洲国的热河支队警备该地，努力恢复治安。1 月 8 日设立了驻蒙兵团司令部，此后即归中央直辖，负责该地区的治安。

在华北方面：第一军以第二十、第一 0 九师团（本川旅团配属于第二军，但在 1 月 18 日调归师团主力）占领山西省的中北部，以第十、第一 0 八师团等占领河南省的一部及河北省西半部的各要地。第二军到 1 月中旬占领了山东的大半部，以第十师团确保济宁—邹县—蒙阴一线，以第五师团确保胶济沿线，以方面军直辖部队（由中国驻屯军混成旅团及若干后备步兵大队等所组成）警备河北省东部及北部。在年末华北方面军的总兵力为六个师团、一个混成旅团及航空兵团（十五个飞行中队）。

在华中方面：占有长江下游三角洲地带，以第十军确保青浦—吴江—江宁镇一线以南，以上海派遣军占领该线以北及长江北岸的扬州和滁县。到年末基干兵力为第十军的第六、第一一四、第一 0 一师团及两个后备兵团（国崎支队于 12 月 31 日调回华北方面军）。上海派遣军的基干兵力为第三、第九、第十三，第十六师团及天谷支队。华中派遣军总兵力为七个师团、一个混成旅团、两个后备步兵团及一个飞行团（十个飞行中队）。

为了进行华南作战，以第十一师团及重藤支队为基干的第五军，于 12 月下旬在台湾集结，但因停止华南作战，该兵团就在原地过了年。

占领地区的治安状况：中国军由于在各方面败退，全面进入了游击战，扰乱日军后方。尤其共军的游击战术巧妙，其势力与日俱增，广泛地扩大了地盘。其主要手段有下述各点：

（一）彻底破坏铁道、道路、水路、通信线路等，阻碍日军后方补给，使之因修理而消耗大量人力和物力。

（二）袭击补给部队或小部队。

（三）袭击军需品仓库，飞机场、经济要地等。

此种游击行动，在日军的警戒线的间隙出没无常。日军所占领的地区与兵力相比过于广阔，不能守备全部地区。因此，只能主要守备政治及战略上的要

点、后方主要交通线、铁路沿线，并且要在广大范围内讨伐游击队。

为恢复日军占领后的治安，在各地成立了治安维持会。如前所述，在蒙疆、华北根继成立了新政府，从国民政府分离出来，开始独立执行政务。

由于对华中的占领较迟，新政府在第二年 3 月 28 日才成立，但年初已在各个要地成立了治安维持会，为建立政权做了准备。

华北方面军对占领地区维持治安的指导

方面军在 12 月 22 日揭示了“军占领地区治安维持实施要领”，致力于治安的恢复。

当时，方面军考虑扰乱治安的根源，在于土匪的活动及经济不稳定，以致民心发生动摇。同时由当地中国人组织的行政机关，还只限于局部，尚不能寄与多大的期望。因此，实施要领规定由日军担任警备讨伐的同时，指导整顿当地各警备机关，并由特务机关、宣抚班等负责扶植地方行政机关和民众团体。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时期，如“第二要领的第三项”中指出的“共产系统匪团”一节，表明了对共军的注意。

军占领地区治安维持实施要领

1937 年 12 月 22 日
华北方面军司令部

第一 方针

一、维持治安的宗旨，是我军存在的需要，促进军占领地区的全面安定，并以帮助奠定新政权的基础为目的。

二、首先完成军队驻地及主要交通线附近的治安，逐渐向外扩展而及于全区。

三、目前在地区内各要冲分驻日本军队，凭其威力尽快恢复民众原有的自卫能力，指导中国机关自行维持治安。

第二 要领

一、有关维持治安担任区域的划分，如附件所示(附件未到手一笔者)。

二、投降的武装团体，解除武装后使之归农或当劳工等，给以生活出路。

归顺部队根据性质另作考虑。

三、对匪帮的讨伐，重点指向共军，特别对已建成的共产地区，努力尽早将其摧毁。对一般土匪兼用宣抚怀柔政策，尽量从归服者手中收缴武器，使其另谋生路。

四、迅速复活县及乡镇的行政组织，使之统辖于新政权之下，策划恢复发挥各地的自卫能力，促使民心之安定。

五、自卫机关由警察队(公安局)及保卫团(联庄会、民团、保甲)组成。前者常驻在县城及县内要地，担任警备与公安工作，后者在各乡镇以壮丁编组，与警察队协力担任清乡、剿匪工作。

六、警察队及保安团，由身分有保证的当地良民充当，原则上不收用归顺者、土匪及投降兵等。但在警察队编成以前，可暂以冀东保安队代替警察队使用。

七、铁道、通信线路及飞机场的保护，应组织利用爱护村。

八、为了警备通信，除军用通信以外，恢复县有电话线，并尽可能增设电话线。

九、为了便于警备兵力的移动，设法修整道路和增设飞机场。

十、在军事上许可的限度内，增开交通列车，同时确保主要道路及水路的安全，以促进物资交流，安定民众生活。

十一、加强统辖各种宣传机关，使之有重点地进行活动，号召民众主动协作，以期改善治安状况。

十二、军队指导县长、乡长、镇长等，收集有关肃正讨伐匪贼及守备兵站等方面的情报。使用警察队及保卫团修整警备用通信网及交通要路。其它一般行政事务，由特务机关长负责指导省政府以下单位，协助军队的治安工作。

十三、在边远地区的警备队，尤其小部队，应保持军纪和风纪，特别改善与当地居民的关系，同时监督日人进入内地后的行动，并取缔其非法行为。

十四、治安工作通过扫荡兵匪，实施应急救济、促进物资交流、恢复与加强行政机关，以求迅速安定民心，严格取缔与本工作有害的军人军属及一般日人的不良行为，以防止民心叛离。

第三 实施上的注意事项

其一自卫机关

一、警察队的编组，因各县的状况而异，初期担任治安的兵力大概在200名以下，主力在县城，其余在警备区域内各要冲，根据匪情随时出动讨伐。警察队的武器暂以步枪进行装备，尽量使用原有武器，其不足部分则发给一部分没收的武器。

二、自卫团(河北、山西为保卫团，山东为民团或联庄会，河南为保甲)在各乡镇以壮丁组成，分为常备团丁(有工资)和散住团丁(无工资)。前者驻守县城，经常进行训练，担任剿匪工作;后者在农闲时实行一些训练，平时搞家务，当匪徒袭来时，立即集合进行乡镇自卫或援助比邻乡镇。自卫团有长久的历史和传统，在未受战祸地区中可利用其现有团休，其因战祸而溃散的团体则可予以恢复(特别重视利用原来存在的自卫团一笔者)。各自卫团均使用其现有武器，其武器被军队或匪众没收者，暂时可使之徒手担任收集传送情报工作，一俟没收武器时，再发给武器以加强自卫能力。

三、警察队及自卫团所需军费，根据地方特性，委托中国方面筹措。

四、警察队及自卫团的训练，按照需要，由警备地区的负责兵团与有关特务机关协议后，适当进行。

五、铁路爱护村，由铁路两侧村民组成，在铁路(包括通信线路)保卫方面，主要进行收集情报等活动与铁路守备队协作。

爱护村所需军费，由该村负担，但应适时发给奖金等，施行奖励办法。

其二共军的处理

一、对共军应彻底进行扫荡。为此，在共军地区，应一面进行讨伐，一面采取宣传及其它方法，尽量灌输防共思想。

对于与共军合流或被共军操纵的匪众，应迅速设法使之与共军脱离。

二、对于受南方抗日势力唆使的政治匪众，应努力予以击溃，尤其要消灭其组织及领导者。

三、对匪化的地方自卫团及当地居民，结合讨伐进行宣抚，使其重新就业。

四、对盘踞外国租界的共产党及抗日团体，主要依靠宪兵及中国警察机关，查明其动静，以适当手段使之逐渐减少，如有可能则一网打尽。

五、在劝告归顺投降时，要利用新政权的名义，以保持他们的体面，这对归顺工作有利。

其三有关治安的行政领导

一、军占领地区有关治安肃正工作，军队(兵站)与军特务部(特务机关〕之间的业务关系如下:

1.县警察队及各乡镇自卫团的组织，根据特务机关长的指导，由中国机关施行。但在中国机关统辖力量达不到的战线地区，应与特务机关紧密联系，由军队指挥官进行指导。

2.对警察队及各保卫团发给武器时，特务机关长应与兵团协议，由兵团发给。武器的保管和监督，按照保甲条例，打上烙印进行登记。

3.警察队及保卫团的训练指导员，尽量由中国人担任，需要由日本军人充任时，则由该地区警备部队派出。

4.县警备队及乡镇自卫团，对于有关收集情报、讨伐兵匪、保护铁路、通信线路等警备业务，应受该地区担任警备的指挥官管理。

5.铁路警察队(护路警察)的有关警备工作，受铁道守备队长指挥;有关警察工作受日本宪兵的指挥。

6.警察队及保卫团所需军费，均由中国方面负担，军队不参与此事。

对人事如有意见，应由有关军队指挥官通报特务机关长，经其同意进行处理。

7.警备通信网及道路网的整备工作，警备军队指挥官应与特务机关长妥善协议，指导省及县政府、乡镇公所等负责进行。

8.有关配给石油、食品、燃料以及协助贩卖棉花和其它农产品等工作，特务机关长应使宣抚班担任之。在远离特务机关(宣抚班)的地方，当地军队应在中国方面与特务机关之间进行介绍工作。

二、特务机关长对中国地方行政进行幕后指导时，应考虑下列各条，指导省政府努力使之主动进行活动，指导县政府以下机关迅速恢复原状。

1.在任命新政权的县长时，尽量以治安维持会推荐的当地有声望者充当。如此既便于加强治安，并可减少与治安维持会的摩擦，同时还可防止中国官吏惯于榨取的积弊。

2.在治安尚未稳定时期，县政府机构不必拘泥一定形式，可适应县内实际情况，建立简易的机沟，随着治安的恢复，再使之完整。

3.使县管下的各乡镇治安维持会组成乡镇公所，迅速进行联系，将其置于县的统辖之下。

4.县长以下的薪俸及县行政费用，原则上以县的收入支付。建设警备道路及警备队的薪俸等与警备工作有直接关系的经费，必要时由省政府予以补助。

5.县长不得以私人班底组织县政府。

6.在大部分受水灾的县，县的行政方面应以全力进行救济，在冬季发给食品及燃料，在来春配给耕种用的种子。县政府的机构、县长的任命，均须考虑适应上述任务。由于战祸严重荒废的地方，例如山西省境内，更应照此办理。

7.铁路两侧500米以内，应注意不使种植高杆农作物。

其四警备交通网的建设

一、为维持治安，整修警备电话及兵力移动所使用的道路，极为重要。

警备电话最有利的方法是恢复原有的县用电话。因为县用电话是连结县城和县内各警备区的电话，在收集情报、指挥警察队及保卫团工作上最为理想。

调动兵力所使用的道路，因即将进入结冰期，修建道路有困难，应延至来春解冻以后再修，此时可修整河川渡口的设备等。冰冻期间，汽车于平原公路上皆可通行，必要时，部分在道路以外也能行驶，因此没有必要在此期间修建汽车公路。

其五宣抚

一、宣抚班隶属于军特务部长，派遣至各军及方面军直辖兵团的管区之内。

二、被派至各军及直辖兵团的宣抚班，其配置及担任地区，应根据军(兵团)警备要求及特务机关的行政指导，由两者协议后决定。但在作战期间.应将宣抚班隶属于军。

三、宣抚班的有关警备事项，应在警备军队指挥官管理下。一般行政事项应在特务机

关长管理下进行工作。但到中国方面能发挥行政机能时，宣抚班对一切行政则不要加以干涉。

四、报纸、广播、传单、讲演等有关治安工作的宣传，在方面军管辖之下，由各兵团各部队指派负责人，进行贯彻始终的坚强有效的宣传。

其六物资对策

一、内地的食品(食盐除外)不足，并非只是由于铁路运输力的减少，主要是由于都市周围农产品的供应被匪贼或战祸所杜绝。有鉴于此，必须在排除此种障碍的同时，扫荡天津各水路中途的匪贼，努力打开水路运输。

二、对食盐、火柴、石油、棉布等日用品，宣抚班及当地军队应与特务机关联系协助运输。

三，为控制食品、日用品价格的暴涨，应采取适当措施，按照需要规定公定价格。

四、棉花的收购是农村救济上第一件应办事项，为此，应力求棉花运输路线的安全。同时，监督收购人员不得乘农民的危困进行压价。驻在该地的军队、宣抚班、宪兵等应调查收购情况，与特务部联系后，命令不法收购人员离开收购地区。

其七其它

一、军队及军人的举动应严肃正当，恩威并施是宣抚工作的第一要义。与此相反，部分军人军属由于不小心而对中国人有不正当行为时，宣抚工作的成果即将毁于一旦。有鉴于此，各部队长应对部下严加教育，并使监督机关进行监视，在许可的范围内，采取军中娱乐措施，以防发生过失。

二、军队对讨伐兵匪、守备兵站线及与此有关的军队本职工作应力求精通，对中国方面的指导应由特务机关(宣抚班)担任，以免增加军队的烦琐事务。

三、为防止不良日人进人内地，实行居住许可制，除经特务机关长或宪兵官员许可者外，一概禁止居住。在领事馆警察出入的地区内，对日人的取缔，在原则上属于警官的任务。

四、宪兵在本职工作以外，担任治安警察工作，根据需要，指导中国警察的业务，但不得干预行政。

三 事变的扩大化及1938年的治安状况

徐州会战及华北占领地区的治安

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命第二军从1937年12月下旬，继攻取济南之后，占领胶济沿线及其南方地区(山东作战)。又命第一军从2月中旬，进攻济南西南方黄河左岸的中国军。至3月上旬平定了山西省南部及河南省的黄河左岸地区(河北平定战)。

但在第一军地区，有力的中国军退入山西省内的山地，会同原来盘踞该地的共军，扰乱我占领地区，其威势已不容轻视。第一军从3月中旬至4月下旬之间，在占领地区内进行肃正讨伐，虽予敌以一定的打击，但未能达到预期月的，特别是对五台山及潞安北方的共军，未能进行讨伐。因此，为确立治安，将来必须进行积极的扫荡讨伐。

在第二军地区，自2月中旬前后，中国方面全面展开了游击战，扰乱我军占领地。当时大本营根据不扩大战局的方针，给方面军的任务也只是:“确保胶济沿线及从济南附近到黄河上游右岸之间的占领地区的安定。”但是，“第二军

不能静待敌人来袭，必须进而摧毁占领地前方之敌”的强硬建议，得到了批准。于是第二军决定将中国军击退到大运河以南，在 3 月中旬开始行动，到月末前后大致进入预定目标附近。中国军利用台儿庄附近的坚固阵地，进行顽强抵抗，同时，以优势兵力转取攻势。

大本营决定以此次作战为转机，命华北方面军及华中派遣军夹击集中在徐州附近的中国第五战区的军队,4 月 7 日下达了有关进行徐州会战的大本营命令。由此，不扩大战局的方针遂告破产。

各部队在 5 月上旬开始行动，于中旬末，在徐州东方包围了中国军，但其大部从兵团的间隙向西撤出。尔后，华北方面军增加第二军兵力在黄河南岸向西追击，6 月上旬末切断京汉铁路。中国军 6 月 12 日在郑州以东决开黄河堤坝，河水泛滥到第二军前线部队的后方。因此，第二军停止追击，集结于泛滥地区以东。

大本营在徐州会战后，企图攻占武汉，命华中派遣军沿长江及淮河逐渐占领地盘。命华北方面军依然确保占领地区的安定。同时以一部牵制华中方面的中国军而进行作战准备。

然而淮河沿岸浸水严重，作战行动十分困难。因此，命华中派遣军做好从大别山北麓及长江两岸地区攻取武汉的作战准备。

在徐州会战期间，由于调用了华北方面的兵力，占领地区内的警备力量减弱，中国方面扰乱活动更加激烈。此时华北占领地区的治安及警备状况如下:

一、第一军担任地区

1.第一军占领地区警备部署的变更

在徐州会战时，第十六师团从第一军转属于第二军，第十四师团也参加了会战。因此，第一军司令官将过去警备地区作了变更。

第一 0 八师团撤出潞安平原的守备，由第十四师团接防，第一 0 八师团担任警备怀庆、获嘉、修武附近地区。

独立混成第四旅团{缺独立步兵两个大队}警备新乡，汤阴附近，并警备过去由独立混成第三旅团、第十六师团所担任的地区(高邑、彰德，濮阳、临清地区)。

2.第二十师团的状况(晋南肃清战)

山西省南部的中国军，5 月初逐渐增加兵力，共有 20 多个师，企图夺回山西省南部，在第二十师团(师团长:川岸文三郎中将，6 月 30 日以后为牛岛实常中将)的作战地区内，同蒲线频繁遭到破坏。5 月 12 日，即黄河决口之日，曲沃首先遭到中国军步、炮部队的攻击。山西省南部各守备队受到优势中国军队的攻击。第二十师团努力打击敌人，但补给不够理想，只得撤出蒲州、运城、平陆的守备，确保运城，河津，闻喜，以主力确保曲沃、侯马镇、新绛附近。

当时，各守备队，由于优势敌人的妨害，以及大雨阻断了交通，弹药、粮食均告缺乏，只能以猫狗及野草充饥。两个月后才打破了敌人的进攻，做好转向攻势的准备。在此期间，第一军司令官尽力增加兵力，补充弹药粮秣。方面军司令官也将配属于第二军的第十四师团调回第一军。

第二十师团逐渐做好一切准备，在 7 月 5 日转为攻势，迫使中国军向南方退却。

与第二十师团作战相呼应，在第一 0 九师团的警备地区内，离石方面的各守备队也遭受优势中国军的攻击，但均被击退。

第一军指挥扫荡山西省内的中国军，约在7月下旬扫荡完了。

3.第十四师团的后方警备

在陈留口(兰封西北的黄河渡口)以北的第十四师团补给线附近，中国军的游击活动从5月末开始活跃。担任该地区掩护任务的独立混成第四旅团，从6月1日在长垣(兰封以北约50公里)及其以南地区，击溃中国军，确保补给线。

二、华北方面军直辖地区

方面军直辖地区，以第一一四师团及中国驻屯兵团(兵团长:山下奉文中将，配属有独立混成第四旅团的两个大队)等担任警备。4月8日第一一四师团主力转调到第二军，全区即以中国驻屯兵团及其他部队担任警备。从4月下旬至5月上旬，再将步兵两个大队(配属于中国驻屯兵团的独立混成第四旅团独立步兵大队)、第一一四师团的残余部分(步兵两个大队)、平山支队(由中国驻屯兵团抽调步兵一个大队、山炮一个中队，与混成第四旅团的两个大队合并编组的支队)等转调到第二军。因此，警备兵力更显薄弱，特别是从涞源附近撤出警备以后，易县及保定以西地区的共军游击活动更加活跃顽强。对此，日本警备队不断进行讨伐，努力防止其蠢动。

7月，方面军司令官由于第二军(军司令部、第十、第十六师团)转调到中国派遣军，因此，划分该军担任的警备地区及原来方面军直辖地区为甲、乙、丙三个防卫地区，重新部署了兵团。

甲防卫地区(京津地方)，由中国驻屯兵团担任;乙防卫地区(山东省及南方津浦线)，由第一一四师团、第五师团及独立混成第五旅团(旅团长:秦雅尚中将)担任;丙防卫地区(新黄河以东地区)暂由第十六师团、随后由骑兵集团(集团长:内藤正一中将，由北满转来，7月11日隶属方面军)担任。

第十师团从6月中旬于夏邑(归德东南约50公里)、永城(徐州西南约80公里)附近集结，为了集中于庐州附近，从7月中旬开始行动。

第一一0师团(师团长:桑木崇明中将)于6月25日被派遣到华北方面，7月15日与中国驻屯兵团(由第二十七师团改编，为参加汉口作战南下)交代京津地方的警备。

三、蒙疆地区

驻蒙兵团改编为驻蒙军，于7月4日隶属华北方面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奉命“除继续执行原有任务以外，应确保蒙疆地方主要地区的安定”。

攻取武汉战役及华北的治安肃正

大本营于5月末，将预定1939年攻取武汉的作战腹案提早一年，计划于今秋尽快进行。6月18日命令准备汉口作战。

政府也于6月24日决定了“今后中国事变指导方针”，作出新的重要决定，指出:“为直接解决中国事变，集中国家力量，以在本年内达到战争目的为前提，内外各项施策均须适应此目的进行。”

继而在7月8日决定了“中国现中央政府屈服时的对策”及“中国现中央政府不屈服时的对策”。前者的方针在于“中国现政府屈服时，帝国就以它作为一个政权，使之合并于新兴中央政权之下”，后者的方针是，举国家一切力量，集中用于将来攻取武汉及广东作战，以求得事变的解决。

第一 方针

帝国综合一切力量致力于作战、内政、外交，经济、谋略、宣传等，促使中国现中央政府的溃灭或屈服，同时适应长期战以加强当前各种必要的政策，从精神到物质实现真正的战时体制。

(以下笔者略)

7 月上旬变更了担任进攻武汉的华中派遣军及第二军的战斗序列，并下达了第十一军的战斗序列。以后又增加兵力，步步准备好攻取武汉的作战。

在此期间，7 月 9 日发生了张鼓峰事件，8 月 11 日签订了停战协定，免除了后顾之忧，以利于对华作战。

8 月 22 日，大本营命令攻取汉口附近的作战开始。华中派遣军在 10 月下旬占领武汉及其周边和修水一线，继以一部追击，至 11 月中旬初，占领通城及岳州。

在此以前，9 月 7 日，决定进行广东作战，同月 19 日对担任作战的第二十一军下达了战.斗序列。此一作战与攻取武汉作战同时进行，以扩大作战效果，可能时，希望就此结束事变。第二十一军，10 月 12 日在白耶士湾(疑为大亚湾一译者)奇袭登陆，10 月下旬占领广东及其周围。

汉口作战刚一结束。从 11 月下旬，第十、第二十七师团等乘船向南京进发，随后大部归还华北。第二军于 12 月 15 日脱离华中派遣军的战斗序列，其所属兵团主力转入第十一军。改编的第十一军，以七个师团为基干部署于武汉地区，纯属作战部队，与负责确保占领地区治安的华北方面军的性质不同。该军以武汉三镇.及九江附近为根据地，负责随时打击周围的中国军，摧毁蒋介石军的战斗意志。

与上述作战同时进行的各种政治谋略。其情况如下:

武汉、广东陷落，蒋介石政权仍未屈服。以后的策略，即根据 7 月 8 日政府决定的“中国现政府不屈服时的对策”中的“占领要地后的对策”进行工作。该对策有如下一段内容:

占领要地后，中国现政府仍不屈服时，帝国即不急于直接依靠武力解决事变，而要促进新中央政权的扩大和加强。同时，主要从外交、经济，思想方面对中国现中央政府施加压力，以期采取政治及谋略手段使之崩溃。(以下笔者略)

华中派遣军攻取武汉作战时，华北方面军与之策应，牵制了中国军。除令各兵团在防卫地区积极清剿外，9、10 月间根据方面军的指示，对山西北部进行肃正作战，扫荡了共军的根据地。9 月 15 日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大将对派来视察军情的侍从武官作了如下的情况报告。

情况报告

一、作战经过概要

(以上笔者略)方面军以一部在北方牵制敌人，以策应汉口作战，同时，以主力在占领地区进行空前规模的肃正工作，已逐渐取得效果。

命第一军主力及骑兵集团，在其作战地区内扫荡黄河及新黄河左岸地区的敌人，占领黄河河畔的要点，牵制敌人。两兵团从 8 月下旬开始行动，第一军各兵团通过险峻地形击溃顽敌收获很大。至 9 月中旬到达河岸。目前，第十四、第二十、第一 0 八师团各以一部

有力部队正对垣曲附近进行攻击。骑兵集团在中旬左右，以一部渡过新黄河给敌人以极大的威胁。其它各兵团均在各防卫地区内担任肃正工作，特别是第一一 0 师团方面，由于最近冀东地区治安突然恶化，从 8 月中旬对该地区一齐出动讨伐，至 9 月上旬掌握了所有县城，肃正工作大致告一段落。

8 月下旬接到抽调第五师团的秘令，逐渐向青岛附近集结，该师团原来负责地区内的警备，由 9 月上旬在塘沽上陆的第二十一师团(师团长:鹫津铅平中将，7 月 15 日隶属于方面军)的主力接防。同时变更了山东地区一部分兵团的部署，此项工作于 9 月 15 日前后顺利完成。

二、山西北部作战

治安肃正工作，决定按照作战地区由各兵团自行承担。但对主要地区有必要由方面军统辖;尤其皇军威力未曾达到的山西北部及连结太行山脉的山岳地带，乃共军巢穴，其影响至今及于华北全区。因此，必须彻底扫除，以绝后患。统辖所属第一军、驻蒙军及一一 0 师团，自 8 月上旬进行准备，9 月 24 日开始攻击，约至 10 月下旬基本按预定计划结束。

注:据“第一 0 九师团状况报告”，1939 年 12 月 21 日师团将所在之敌击溃后，进至五台县附近，以后在五台县周围进行讨伐，随即驻兵五合县以西，进一步扫荡忻县、五台、代县之间的残敌。但因共军采取退避故术，未有较大战斗成果。

三、治安状况概要

占领地区内的治安，在徐州会战后一时呈现小康状态。随着占领区的扩大和兵力的减少，敌人游击活动逐渐活跃。及至青纱帐起，游击活动更加统一，加以爆发了张鼓峰事件，其行动极为猖獗。破坏铁路，袭击各地等事件不断发生。所谓治安恢复地区，实际上仅限于主要交通线两侧数公里地区之内。经过兵团多次讨伐，随着汉口作战的进展，治安始逐渐得到恢复。

四、情报、宣传、谋略

情报工作，由于科学谍报机关和航空兵力的减少，特将工作重点放在兵团搜索和一般谍报机关的活动上，利用中国方面和其它机关以及华中派遣军的通报，大体上可以达到目的。

宣传工作，特别加强对各机关的统制，重点放在使中国军民懂得其一切幸福的获得，必须反共叛蒋，依靠亲日防共的新政权。

谋略工作，应配合中央机关的施策，导致蒋政权及党军的分裂和内讧，同时要尽力操纵杂牌军及回教徒等。

如前所述，为了徐州、汉口作战，由华北调出很多兵力，兵力已显著减少，这对确保占领地区的安全，完成方面军的任务相当困难。从当时离察南共产党地区最近的独立混成第二旅团独立步兵第三大队的情况，可以看出其困难的程度。

兹将该第三大队附田副正信少佐回忆录摘记如下:

1938 年 3 月 24 日完成旅团的编组。4 月 3 日由北京北苑兵营出发，越过长城线到达宣化。6 日旅团下达有关警备、驻扎的指示，大队担任旅团管内最远的蔚县和广灵县地区的防务。

4 月 11 日与前任部队交接完毕。大队的配置:总部和第一中队在蔚县，第四中队在广灵，第二中队在暖泉镇(广灵、蔚县之间)，第三中队在西河营，以中队为单位分驻各地。大队长浅川悌二大佐决定，在装备尚未运到之前，努力搞好部队的团结和训练，准备进行积极行动。旅团长常冈宽治少将召集各大队附，在张家口进行了为期五天的有关游击战法

的教育，这是我们完全不懂的一种战法。

大队以这些材料为基础，进行了游击战法的普及教育。第一次讨伐战斗从4月7日开始。

警备的部署最初以小队为单位分驻各地，5月8日西河营第三中队派一个小队驻扎北水泉。此时，我军只能保持点和线。为了扩大治安圈，建筑了宿营地，从居住中心加强和扩大防御设施，减少守备兵力.增加机动兵力，扩大讨伐地区，与此同时，逐渐增多分驻地，这样可望收到成效。这种逐渐扩大治安圈的做法被称为“乘圈扩大”(马术名词、从小的半径逐渐向外扩大圆周的运动)。这种扩大的动力，主要靠积极果敢的讨伐，同时还必须进行确保治安的工作。

当时在察南政府派有日满系顾问及指导官，在各县也派有指导官。但是，这种治安工作与现实状况不相适应。例如，部队进驻之后，却立即搞起植树节活动。在这时的重要工作应该是收集情报，保护、修补道路和通信线路，训练自卫团。相形之下，共军的政治工作比我方巧妙得多。他们以怀柔、威压相结合，牢固地掌握了农民阶层。处于彼此势力中间地区的居民，朝迎日军，晚通共军，向双方纳税等，这是必须予以重视的事实。我相信扩大治安圈的第一要事，就是掌握民心。因此，指导部队对居民注意威武与慈爱相结合的工作方法，并教育士兵每个人都要做宣抚员，保持正确行动。当时日军士兵的教育程度相当高，相信这些对治安各方面都起到了扩大效果的作用。

我军进驻时，涞源，灵邱及涿鹿南方山地都有八路军盘踞，土匪也在各地横行。由于我军多次讨伐，士匪逐渐溃灭，而八路军的势力却逐渐扩大。他们采取遇强则退，逢弱便打的战法，对其剿灭极为困难。

我大队在察南担任警备期间所参加的讨伐战斗，不到一年就有50次以上(向其它方面出动除外)。其中，有按大队计划施行的，有紧急援救受敌人袭击的中队的，有遵照旅团命令进行的。此外，各中队还不时进行了单独讨伐。

在5月，讨伐土匪、训练部队、宣抚居民等方面的工作都取得了成果。6月，八路军开始活跃。侵入驻扎地附近进行政治工作。或袭击我讨伐部队的留守部队，并破坏道路及通信线路。对此，大队除临机应战之外，还进行了有计划的讨伐。7月，八路军以一个旅及一个团的大兵力袭击北水泉警备队，并伏击增援部队。由于我军的机敏处置，给了敌人很大的打击，但未能将其歼灭。尔后，逐渐扩大治安圈，或寻找八路军进行远距离的讨伐，或紧急救援运输部队。望风扑影、劳而无功的讨伐，也实在不少。

对八路军的战斗，痛感需要注意的事项为:(一)尽快搜集情报，(二)最忌麻痹大意(不论警备队、讨伐队、运输队、总部、步哨均应注意)，(三)行动迅速(不拘泥于包围、迂回等旧的概念，要以奇袭、急袭为第一)。

此项笔记与前述“情况报告”表明的方面军治安确保地区，都是仅限于点和线的状态。至于向面的方面扩展;乃是今后的课题。特别由于中共地下活动及游击战的活跃，使今后的治安战的性质逐渐有所改变。

四 中共的政治工作

中共的组织特色是具有党、政、军三位一体的密切关系。军和政是党的两臂。党挥动两臂以推动革命。即军是党以武力推动革命的组织，政是党掌握政权领导，以推动革命的组织。华北方面军为了观察中共的政治工作，必须首先了解中共的党、政、军的组织。为此，进行了调查研究。“1938年11月方面军

的情报记录”主要是依靠实地调查、审查缴获文件，检查邮件等手段取得的，但这仅是初步阶段，仍不能完全正确地掌握中共的实际情况。

中共抗日根据地(解放区)的建设

中共长征以后，在巩固陕北中心根据地的词时，逐渐向四周扩大势力。事变爆发后，中共进入日军及国民党军势力达不到的真空地带，树立自己的势力范围，称之为“抗日根据地”.并对此根据地的建设称之为“解放区工作”。

注:中共的行政组织大体完备，对其领导支配下的特区称为“边区”，对党、政、军组织健全的抗日根据地称为“解放区”，根据地周围彼此势力混杂的地区称为“游击区”。

根据中共战后发表的资料，抗日战争时期，中共解放区的建设和发展，共经过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1937 年 7 月—1940 年(摇篮、建设)

第二阶段 1941 年—1942 年(困难的斗争)

第三阶段 1943 年—1945 年(发展、反攻)

第一阶段:1937 年，国民党军受日军攻击败退时，八路军将第一一五师、第一二 0 师、第一二九师分别派往五台山、晋西北、太行山脉的日军未占领地区，建立了晋察冀、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在山东地区建立以泰山、沂蒙山(沂水、蒙阴之间)为中心的鲁中根据地。以上是华北解放区的摇篮。

1938 年，八路军分别东进，到达冀鲁豫平原、齐鲁平原，冀中平原。一部向北进入绥远大青山地区及河北省东部，逐次建立冀鲁、冀中、冀东、大青山等抗日根据地。

新四军在此期间，逐次建设苏南、苏北、苏中、淮南、淮北、鄂豫皖等根据地。在广东方面，从 1938 年至 1939 年，在东江、琼崖建立了根据地。

1940 年，八路军达 80 万人，其解放区人口达 4,000 万人; 新四军达 10 万人，其解放区人口达 1,300 万人，至此，支持中共的人口包括游击区在内已达一亿人。

第二阶段:1941 年至 1942 年，是解放区斗争困难阶段。从 1941 年开始，日军对华北解放区连续进行了彻底的扫荡。加之各地发生天灾，解放区的困苦实难形容。至 1942 年末，华北解放区人口减至 2,500 万人，八路军为 30 万人，财政经济陷入极端困境。

第三阶段:日军在此阶段，虽也企图积极扫荡，然而，中共领导军民妥善进行防御，并同时通过生产和整风运动。奠定了精神与物质两方面的基础，从而增强了军事力量。结合国际形势的转变，1944 年春共军兵力增加到 47 万人，民兵达 200 余万人，解放区人口(包括游击区)达 8,600 万人。共有 I4 个解放区:晋察冀边区、晋冀鲁豫边区、山东区、晋绥边区、华中的苏北区、苏中区、苏南区、淮北区、淮南区、皖中区、鄂豫皖区，浙东区及华南的东江区、琼崖区。这 14 个解放区，成为全中国人民解放的原动力。

一、晋察冀边区的建立

中共 1937 年 9 月在山西北部内长城线一战之后。对日军回避正面作战，而

潜入日军侧面或后方展开游击战。10 月末。中共首脑决定在山西五台山附近建立基地，开始积极的地下工作。

注:山西五台县是山西军阀阎锡山的故乡。阎在政治上有很大的影响。土地的大半为阎的亲朋或山西官僚所占有，佃农和小自耕农都从属于他们，牢固地维持着旧中国特有的支配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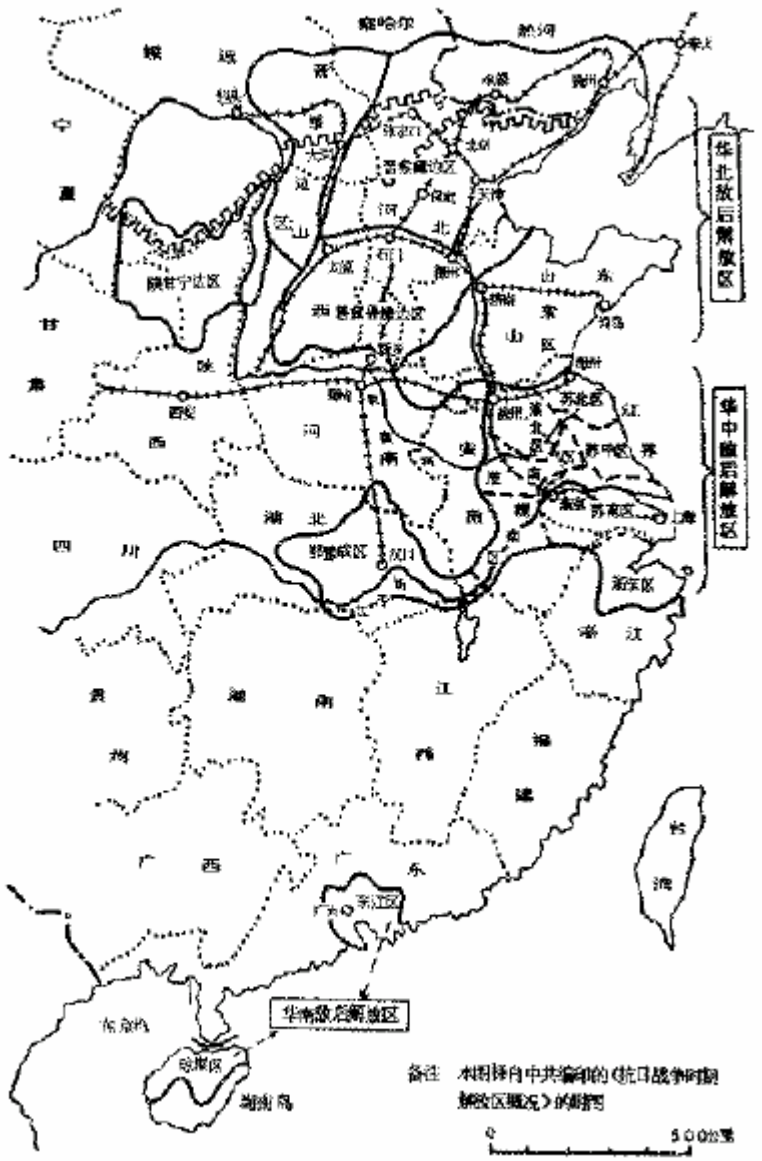


图 2、 解放区概况略图

负责建设根据地任务的，是第一一一五师副师长兼政治委员聂荣臻。聂先在 10 月 23 日于五台地区创建游击根据地，11 月 7 日设立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后在 1938 年 1 月 10 日于阜平召开晋察冀边区军民临时代表大会，在大会上发表宣言，决定建立边区政府。在 2 月 10 日的成立大会上，有 40 个县的县政府代表和 120 万民众的各种团体、少数民族、国共两党的代表等共 140 余人出席大会，推选宋邵文、胡仁圭、刘奠基、聂荣臻、张苏、孙志远、李杰庸、娄凝先、吕正操等九人为临时行政委员会委员。边区的行政组织及省政府的组织均待以后再行充实。至 1939 年 3 月前后，边区政府的规模已臻完备。

晋察冀边区的行政区划分为北岳、冀中、冀热辽三区，包括同蒲路以东、正太路以北、满洲国热河省的南半部共 108 个县。面积约为 80 万平方华里，人口为 2,500 万。北岳区为险要山地，不宜大部队作战。虽然矿产资源丰富，但

农作物缺乏。冀中区为平原，农产品虽然丰富，但在地形上不易展开游击战。因此，北岳、冀中两区需要紧密结合，互相支援。冀热辽区山地平原交错，适于游击战，而且是连接满洲国与华北的要地。这三个地区包括华北中心的平津地区，成为政略和战略上的重要地区。

关于边区政府的成立经过，华北方面军在1939年3月下旬，以五台县为中心调查中共工作情况时提出的“八路军进入五台以后”报告中，记述如下:

1937年秋，在忻口镇战斗时，进入五台县城的八路军一部，立即开到阜平方面，在县内驻扎一部兵力，即开始了政治工作。首先更换县长，推举共产党系统的宋邵文担任县长，同时安排了数十名政治工作人员，担任组织民众及抗日宣传工作，进而整备了抗战体制。同年10月根据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的指令，在县政府、八路军、民众团体参加之下召开大会，会上决议建立“五台县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总动员委员会由县长任主任，在各区村设立区村动员委员会，就组织人民武装自卫队、减租减息、合理负担、保卫五台等积极进行宣传。该委员会是负责动员人力、物力的机关，与农民救国会同在八路军政治部领导下进行活动。

1938年1月，在八路军的领导下，成立了晋察冀边区政府，五台县县长宋邵文任行政委员会主任，秘书蒋自力提升为县长。未过数月，蒋转调边区政府祛院，由左障之继任县长。

在此期间，五台县政有了很大变化。宋任五台县长时，山西省政府对该县的领导尚有相当力量，但随着边区政府的成立和加强，其实际领导权即落入八路军之手。

二，冀中区的建立

事变开始时，在平汉路方面作战的万福麟军(第五十三军)的第一一六师第六九一团团长吕正操，在该军向南方退却之际，指挥约两个营的兵力，潜伏于冀中的深泽、安国、任邱、河间附近。至1938年4月1日，成立了冀中区行政主任公署。

三、进入冀热辽(冀察热)区

1938年6月，邓华、宋时轮指挥的邓宋支队，拟在燕山山脉(热河省西南的国境地带)寻找根据地，建立冀察热区，企图威胁日军背后，并向满洲国伸张势力，并挺进到了平北的冀东地区。于是在该地领导民众起义，展开游击战，努力创立抗日根据地。但是由于日军警备严密无隙可乘，支队反受到日军攻击，于同年秋回到山西。

中共首脑派遣当时驻晋北地区的一二0师副师长肖克，组织北上挺进队，从1939年逐渐沿长城线扩大地盘，进行游击战。

四，晋冀鲁豫边区概况

晋冀鲁豫边区，特别是晋东南的晋冀豫区，以后中共称之为“延安是总后方，晋冀豫是前方总根据地”，对该地区非常重视，并设置了八路军司令部，以此作为统辖华北各边区的地区。但这一地区有日军、国民党军、共军的三种势力混在一起，展开深刻的心理战，边区的成长及活动状况十分复杂。

该边区在战略上分为晋冀豫(太行、太岳区)和冀鲁豫(冀南、冀鲁豫区)两战略区。晋冀豫区东至平汉路、西至同蒲路、南至黄河、北至正太路，总面积约为29万平方华里，人口700万，全区59县，大部为适于游击战的山岳地带，

居于威胁各地主要铁路的战略地位。冀鲁豫区是处于平汉路、石德路、津浦路、陇海路中间的地区，总面积 31 万平方华里，人口 1,800 万，全区 118 县，大部为平原，多有河川湖泊，农产品丰富。

1937 年 11 月太原陷落以后，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根据党中央“与华北人民同生共死、展开敌后游击战”的指示精神，在朱德、彭德怀直接指挥下，于晋东南地区展开了游击战。

这一地区，从前就潜伏有中共地方党组织，事变爆发后，以平津逃来的学生等为基干，编组了‘牺牲救国同盟会”等敢死队，以薄一波、戒伍胜、董天知等为领导，进行抗战工作。

第一二九师与地方党组织相结合，并与山西革新势力相互合作，创建了太行、太岳山地的抗日根据地。

随着冀鲁豫平原的第一二九师的积极活动，在 1938 年 5 月前后，第一二九师政治委员邓小平与冀西游击队司令杨秀峰(曾任北平朝阳大学教授)先后到达冀南，领导组织民众抗日，同年 8 月 4 日，50 余县的军政代表在南宫集会，设立了冀南行政主任公署，选出杨秀峰、宋任穷为正副主任。

1941 年 8 月成立了晋冀鲁豫边区政府。

注;在草野的资料中，有关杨秀峰的活动叙述如下:

冀南区的组织者为杨秀峰夫妇。杨为河北省迁安县人，留学美国，曾在北平朝阳大学任教。事变爆发即赶赴保定，在张荫梧组织的“保定行官民训处干部培养所”充当政治教官。后遭日军进攻，率领该民训处人员退却，途中吸收难民加入，随后编成游击队，杨自任司令。

1938 年 3 月，杨秀峰部在徐向前领导下，于邢台、临城，元氏方面打下了地方政权的基础，进一步加深了与中共的关系，并在赞皇县内设置了军区司令部。后来杨往访冀中的吕正操，得到吕的支持，在冀中区与冀南区的合作下，成立了抗战学院。学院以培养两区的军政干部为目的，由冀中区分担经费，冀南区负责教育训练。杨为院长，孙文淑为秘书主任，宋仁穷为政治主任。学院被日军扫荡破坏后，与阜平的抗日大学第二分校合并。1938 年 8 月，成立了冀南行政主任公署，杨秀峰部完全归于中共领导。

五、山东区概况

山东区包括津浦以东，山东省的大部，河北、江苏两省的各一部，计有 82 县，总面积约 60 万平方华里，人口约 2,900 万。区内平原和山地交错，铁路、港湾、矿山、工商业城市较多，并有富饶的农村，适宜建立游击战的大片根据地。该地区为华北、华中根据地的联络据点，且与五台，太行根据地相策应，处于支援冀鲁豫平原抗战组织的战略地位。

早在事变以前，中共山东省地方委员会即曾在该地区进行组织活动。事变爆发后，该委员会移往泰安，企图进行山地游击战，使抗日武装组织逐渐向各地发展。1938 年秋，八路军山东纵队的势力已达九个支队，三万人左右，扩大到十余县。此外，山东半岛的蓬莱、黄县、掖县也建立了抗日政权。

六、晋绥边区

该边区东以同蒲、西以黄河为界，南自离汾公路(离石一汾阳)与阎锡山势力范围相接，北至包头、百灵庙、武川、陶林。总面积约为 33 万平方华里，人口 322 万有余，包括 46 县。全区皆为高原地带，北部为蒙古草原，中部、南部

峻岭连绵。

1937 年 9 月，第一二 0 师侵入晋西北，于神池、宁武、朔县附近，对日军后方展开游击战。该师由师长贺龙、政治委员关向应领导，动员西北各地的牺牲救国同盟等抗日组织参加抗战，此即边区建设的开端。

七、华中、华南状况

在华中，1938 年 1 月新四军组成以后，由军长叶挺指挥，在日军占领地区展开游击战，同时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努力组织解放区，如前所述，在 1939 年以后逐渐建立了抗日据点(八个战略区)。

华南解放区为东江与琼崖两地区。东江地区是在 1938 年 10 月广东陷落后，组成“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时开始建立的，琼崖地区是于同年国民党海南岛守备兵团撤退后组成“广东琼崖抗日自卫队”时建立的。

边区政府组织机构

—晋察冀边区政府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原则下所产生的边区，实际上就是由中共领导的行政特别区。因此，边区在形式上是中华民国一个构成部分，实际上则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若干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施行独立自主的政权工作。1938 年 1 月 10 日，于阜平召开的晋察冀边区军民临时大会，宣读了决定创建边区政府的大会宣言。这是中共扩大势力的第一阶段工作，明确了边区政府组成的意义及目的。

注:本资料是新民会中央指导部调查科为该会指导员编写的，简称新民会调查资料，在 1938 年 12 月 7 日分发有关人员，其内容摘录如下。

扩大党组织工作的实况

—和顺县的一例

中共如何在乡村构成组织网，又如何扩充发展党的组织。虽因情况而异，但对处女地，一般则是由宣传开始进行地下工作。随后或者同时，派遣工作人员建立基层组织，逐渐扩大“点”的工作，然后向“面”发展。

然而，在不易建立基层组织的地区，则采取等待军队进入时，在一定地区内组织多数支部，逐次集结起来再行扩张的方法。

现举山西省和顺县为例:

和顺县是第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建设基地的成果，是一个典型例证。华北方面军为了调查该地中共工作的实情，由宣抚班派出三崎良一调查员。该调查员从 1939 年 5 月做了将近一个月的调查。他住在和顺，经过细致的实地调查，提出了调查报告。下面是报告的摘要。

山西省和顺县中共势力渗透及扶植状况

第一期(事变爆发前的抗日救国宣传时期)

1936 年 2 月，共产党大举渡过结冰的黄河，侵入山西省内。一方面，以一部从离石向

太原方面进发，转移阁锡山军的注意。另一方面，使前年潜入的党的工作人员，开始积极活动，采取所谓“声东击西”的战法。工作人员经过沁县、辽县进入和顺，选定该处为宣传据点，对民众积极进行抗日救国宣传。向阁锡山军展开了攻心战。

这一战法收到了良好效果，阎锡山不得不哀叹:“共产党已侵入山西全境。……搞不清哪些地方是由共产党支配的。”阎锡山认为，中共号召抗日，并非为爱国而抗日，乃是为中共而抗日，因而予以反对。阎为了防止共产党的地下活动，组织了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但该会变成了激发抗日感情的中心，中共利用该会的组织渗透其势力，深入地侵蚀了山西青年阶层。

第二期(从事变爆发后到1938年4月，日军占领和顺县以前，主要为地下工作时期)

事变爆发后，进入和顺县的共军是第一二九师的一个营，一面派遣政治工作人员秘密发展新党员进行地下工作，一面公开进行抗日宣传和开展民众运动，广泛深入地进行公开与秘密的活动，努力渗透赤色势力。

其公开的工作，首先是宣扬抗日救国十大纲领，高唱抗日统一战线，注意避免与阎锡山势力的对立和摩擦。另一方面，其政治工作，则是努力推动发展党员的地下工作与扶植抗日容共势力的半公开工作，

对村长的工作有如下的文件记载:

村长的自觉和基本任务

训练村长的意义

旧村长不能完成新的使命。新村长应具备的条件:

(一)有民族意识;(二)有强烈的责任感;(三)有现代知识，(四)富有牺牲救国精神。

村长应有的自觉性

(一) 村长是村民政治上的领导者，(二) 村长是民众总动员的核心。(三)村长是民众武装的执行者，(四)村长是民族革命的主要动力。

村长的基本任务是建设新山西

(一)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实行民族总动员，(二)实行民族革命，为救国而牺性，(三)发展抗敌救亡的统一战线，(四)主持公道，消除社会之不平，(五)指导人民监督政治;(六)执行合理负担，按贫富计算分担。

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共产党的政策对现有的政治势力，极力避免发生冲突，而是采取稳步渗透的方法，将中共意图巧妙地渗进阎锡山的气味之中，以内部改造为名，先行站住脚步，然后再逐渐进行赤化。

第二期是为了将牺盟会变成赤色尖兵而训练地方干部的准备阶段，是奠定扩大共产党地下工作基础的时期。

第三期(自1938年5月日军撤走至1938年11月改造和顺县政府的阶段，是准备建立财政经济政策、组织民众及武装群众的时期)

1938年5月，日军刚由和顺撤走，共军迅速回到和顺县，本想立即掌握和顺县的政权，但因仓促返回，未能作好政治准备，只得暂且放弃政权工作，集中力量争取民众及加强组织工作。首先分散安置牺盟会的中坚干部，同时利用麦、谷收割的大好时机，动员八路军驻扎部队、政治工作人员和牺盟会干部义务帮助农民割麦。这种作法，是学习中共早先进行秋收暴动时的成功经验。这种平凡手段在收揽民心上取得了极大效果。以此为第一步，以后按照工作指导大纲，进行了减租减息的宣传(收割、收获后暂时停止农民纳税、交租)。此外进一步引用国共合作公认的口号“为民族救亡抗战，有力出力有钱出钱”，在青年阶层中结合抗战政策的观念宣传减租减息，使贫农大众领会经济利益的观念及救国抗战的义务，

以获得他们的支持。对少数富农则不准他们乱说乱动，使之完全屈服于群众压力之下。

此外，并结合阎锡山时代公布的合理负担，宣传向富农征收高率累进悦，用以救济贫农，及提供抗战财源。随着宣传及民众团体内的赤色组织的扩大，进而从事掌握县政权的工作。其方法是，使民众团体提出县政府及各区、村行政机关与民众之间需要有一个协商机关的主张。同时，在阎锡山按照中央命令成立的公开机关“总动员委员会”的委员中，任命各种抗日救国团体的代表，使之在该委员会内部逐渐进行赤化，以确立政治的立足点。这样，对阎锡山系的县长张雨帆从内外施加压力，逐步使之执行赤色政策。例如，1938 年 7 月，以抗战时期合理负担办法，对富户摊派了等于掠夺的过重负担。对特别富户则以紧急费用借款的名义，实际进行没收。对不服从者，以汉奸行为论，由民众团体没收其财物，并予以社会制裁。终于迫使张雨帆县长辞职。后由阎聚宝继任，但在职不到一个月，于 11 月由邓肇祥(共产党员)接替。邓就任县长后，对县政府加以改革，亲自领导全部工作，积极推行各项施策。

第四期(1938 年 11 月以后，推行中共政策时期)

共军从 11 月前后即获悉日军对中共地方据点展开“粉碎作战”。为此，采取了分散部署，以和顺县做为提供人力、物力的兵站基地。县政府首先号召加强行政工作，实现自给自足。在 12 月下旬前后，判断日军即将进攻，于是全力以赴加强政治工作及武装民众工作。以各新编村长、秘书、副村长为中心，进行政治训练。对于民众，则由所属村常设文化联络员(直属县长领导)进行训练。为了加强各村自卫队的训练，由共军派出正规士兵担任指导。

在政治方面，根据过去半年的经验，确立了财政、税收、通货、一般经济政策的体系，开始整顿了游击队与兵站财政的统一体制。

此时的县政府，被称为打倒日本拯救中国，保卫家乡保护自己，代表全体人民的意志和利益的政府。其所负使命为动员全体人民，武装起来，肃清汉奸，加强抗日根据地，进行抗日斗争。

笔者注:1.此报告书对统一战线的调查并不完全。2.中共掌握农民大众的方法极为巧妙，已在华北各地施行。此点，日本望尘莫及。

中共党组织的扩充及后方扰乱工作

根据新民会调查资料，中共北方局关于扩充党内组织及扰乱后方工作下达的指示(1938 年 4 月至 9 月)，综合叙述如下，

华北共产党认为在城市活动是无效的，应依靠农村的组织工作以扩充实力。武汉陷落后，按照“从局部领导权向夺取全国党政军抗战领导权转移”的纲领，进行了总动员，最近(8、9 月)行动渐趋活跃。同时，北方局发出指示，以扩充党组织增强实力为目标，搞好游击队与各部队之间的联系，防止思想动摇分子及阶级异已分子的混入，设立特务训练班，教授特务工作，以及设立联络信箱等:

收买宣传工作，

对临时政府各机关的团体和工作人员，展开收买工作，最近尤为活跃，并已收到实际效果，特别注意收买日华官宪派出的中国方面的宣抚员，对他们晓以国家大义，加以利用。

对通信,交通机关的破坏工作:

要求各地区的游击队,将重点放在破坏交通及通信机关的工作上,切断我后方运输线，

策划破坏华北各铁路，除炸毁供水、贮煤、桥梁及铁路的弯曲点外，并设法破坏道路、水运、电话、电信等一切交通通信机关。

对报道机关的破坏工作:

最近日本方面报道机关，发表有关共产党战败，新政府组成等消息，对民众的影响很大。为了防止宣传刊物和报纸的进入，对报社或代理贩卖人加以制裁，对购读者予以警告。

经济扰乱工作;

命令各地党员，注意当地粮食问题，防止农、矿产品出境及联银券流入。

按不同地区，进行后方扰乱工作。

研究各种实际情况，按照下列三种地区，采用各种不同的手段。

(一)扰乱破坏工作的重点地区

此种地区为完全或大部处于日军势力之下的地区，并包括施行新民工作的地区。

在这种地区进行了顽强的扰乱工作，对中国居民实行极苛酷的征集、掠夺及强制动员等。命令村长筹措军费、粮食，倘有违反则实行放火烧庄或强行夺取等恐怖手段。此外并使村民轮流担任警戒，强迫村民破坏铁塔(架电线用)、割断电线。

据定县新民会指导部报告，共军命令每村一次供应粮食 100——200 斤，救国捐 100——200 元。

由于这种地区比其它地区受害更大，手段也极其残酷，因此，由地方成立保卫团、自卫团等联防组织，以防游击队来袭。这种地区是将来新民会工作的重点。

(二)政治工作重点地区

这种地区是敌我势力范围的中间地区，是组织民众的重点地区。出入村庄需有通行证，由动员会、少年先锋队等严密监视出入。

这种地区，游击队的活动较少。征集、掠夺也不太苛酷，但设有伪县公署的分区署，征收租税，进行合法掠夺，较共产地区为重。流通货币，仍用旧币和共产党的边区银行纸币，不用联银券。

(三)共产地区

这是在中间地区背后为中共占有的地区，是在社会、经济各个领域走向共产的地区。这里有共军司令部、伪政府分署、伪县公署、共产系统边区银行办事处、游击队特务队总部、部队直属青年政治军事训练学校、人民自卫军总部、人民自卫委员会总部等机关。军队大多数是共产党的正规军，比较遵守纪律，征集较轻，并想出许多办法实行合法的征收。

虽未实行分配土地的革命政策，但因地区不同，有的取消欠款，有的减轻民众税款，具有浓厚的社会主义色彩。对耕种 100 亩以上的地主征收富户捐，每亩征捐一元。以村为单位，强制购买救国公债，公债票面无金额，在交纳“约定金”时记入金额。

县政方面，由军代表、各团体代表举行的地方会议负责。地方委员虽采用选举或提名的民主方法选出，但因地方会议是由该地驻扎部队推荐的人物参加，故不过是形式的选举而已。

共产党地区最为重视的工作为组织民众。八路军精心加强居民组织，并大力抉植其自卫能力。在各村的人民自卫委员会之下，组织有农民、工人、商人、妇女、少年等团体。各团体选出各自的领导者，用自费执行各自的任务。

妇女救国会负责洗衣、慰劳军属及伤病员、耕种，以及进行政治教育，宣传等:少年先锋队负责敲锣打鼓，在村内巡逻，宣传抗日，检查通行证等。

八路军为取得民众的支持，大事宣传“八路军是民众的军队，是保护民众的军队”，努力清除中国人自古以来怀有的厌恶军人的观念。

共军的政治工作

华北方面军汇集的有关中共党、政、军的调查材料，于1938年11月18日编写成情报记录，其中对于“共军政治部”所作的结论如下:

总之，可以断定，今后华北治安的对象是共军，而共军的核心及动力则是政治部。政治部的妙处在于其强大的组织力量及顽强的行动，并有一贯的共产思想。针对这种悄况，我方的对策，第一要正确把握其真象，其次则要采取良好的组织行动和思想对策。

“华北治安的对象是共军”，这种认识，在方面军内部虽未达到广泛深入的程度，但情报工作人员能注意及比，应该重视。

再就冀北共军政治部的政治工作大纲介绍如下:

冀北国民抗日救国军政治工作大纲

一、各部队的政治工作，应通过各级政治部或政治指导员，按照中央全民坑战的原则，并遵守上级政治及军事首长的命令，处理各项政治工作，以完成军民合作及抗战建国的任务。

二、各部队政治部及政治指导员，在本军所到地区，应协同该地抗日救亡团体，遵照中央规定的人民团体组织大纲，以恢复各级行政机构。

三、各部队政治部及政治指导员，应协同地方行政机关及人民团体恢复地方秩序，以安定人民生活，巩固游击队后方的经济力量。

四、各级政治部或政治指导员，要对部队防区的人民，进行宣传工作，唤起民众意识，激发抗日情绪，以实现全民族抗战的目的。

五、各级政治部或政治指导员，应协同当地行政机关，调整生产，管理民食，实行公平合法的原则，“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以充实军队给养。

六、各级政治部或政治指导员，事前要向本军所到的地区派出工作人员，以利于军事进攻。

七、本军为了进行游击战，要经常移动。各级政治部或政治指导员，要在本军所到地区内深入社会各阶层进行联系，掩护军队的潜伏活动，以达到游击战的目的。

八、各级政治部或政治指导员，应对地方民众实行适当的军事及政治训练，以协助全军工作。

九、各级政治部或政治指导员，应对本军士兵实行政治训练，阐明抗日救国的意义，唤起士兵牺牲报国精神。

十、各级政治部或政治指导员，应切实督促本军将官，使全军士兵严守军纪，服从长官命令，以严肃军队的纪律。

十一，本大纲呈请中央批准后施行。

这些政治工作是八路军所最重视的，其基本原则是:第一、官兵一致。第三、军民一致。第三、对敌宣传及优待俘虏。

中共的军事工作

在上述“新民会调查资料”中，对共军的军事工作有如下叙述:

所谓组织与加强共军，就是在日军占领地区内，使之与政治工作表里一致，

军事工作就是政治工作。

所谓组织，就是扩大共军的数量，补充正规军，建立游击队，组织民众自卫军，并且吸收国民党系统的游击队及自发的自卫团，使之纳入共产党系统之中，依靠所获得的领导权，扩大抗战力量。

所谓加强，就是要使共军本身具有一定的纪律，以期协调军民关系，“通过教育”，晓以抗战的意义和目的，“提高士兵的素质”。收买或强制改编土匪等，使之共产化。协商划定各匪间之地盘，战斗时采取协同动作，以求得抗战力量的加强。

一，游击队的组织

在河北省，作为八路正规军卫星存在的游击队约有 30 一 40 万人。游击队以少数正规军为基干，由散兵游勇、土匪及征募的民众组成。多数游击队在远离正规军司令部的地区分散活动。游击队袭击某地时，当地的流氓地痞多与之合流，进行掠夺。

游击队的组成多种多样，有的在正规军之下组织游击总部，有在远离地区独立活动的，称为游击第几师;也有与正规军同样组织起来进行活动的。

二、人民自卫军

游击队不断进行攻击，成为扰乱后方的主力。人民自卫军则主要担任防御，其行动范围较小。各地的青年政治、军事训练，是组织训练民众的准备工作，然后逐渐发展成为人民自卫军的组织。这样，共军宣称要组成数百万人民大军，将是可能实现的。

河北省在日军占领时，尚无这种组织，最近才在各地逐渐出现。

人民自卫军，一般受该地驻扎部队和人民自卫委员会指挥，但在涿县、固安县一带打游击的华北抗日民众自卫军，则有自己的政治部，并掌管行政。各地情况并不一致。

三、改编与肃清土匪

共军派出政治指导员潜入土匪、败残匪、民团匪之中，进行赤化或收买工作，使之改编为共军。对于反对的匪众则进行肃清工作(使匪军互相冲突)。

东光县附近极为凶暴的土匪张国旗，由于其部下队长宋达民业已共产化，不久，张也投靠八路军，改称抗日救国第二路军。东子牙附近的赵壁臣、大城县的魏大光等也都成为共军，改称红军第二支队。此外，东光附近的土匪葛荣华、徐西平、穆金城等也都改编为八路军。以上数例，说明共产党对此等匪团正在积极进行改编工作。

特别引人注目的现象是，鹿钟麟组织河北省伪政府以来，在土匪中问，标榜“中央华北别动队”、“中央华北游击队”、“中央第十二旅”等中央名称的部队逐渐增多。但是，有不少共产党政治工作人员也潜人中央系统部队之中，暗中逐渐夺取领导权，削弱中央的统制能力。共军与土匪之间也时常发生冲突。

共军在此种情况下，则经常散发宣传文件，指责“某某匪掠夺民众财物，极为残暴，离间军民，反对收编，拒绝训练，破坏抗日阵营的团结，妨碍抗日工作，似此行为与汉奸何异”等等，这不过是表面上的理由而已，实际上，大多数是由于争夺地盘引起的纠纷。“晋察冀抗日义勇军第十团政治部”提出的口号如下:

1.铲除汉奸。

2.扫清抗日障碍，巩固抗日力量。

3.军民联合，驱逐日寇于国境之外。

4.服从上级指挥，尊重民众利益。

5.争取义勇军正规化。

四、共军的纪律

一般的匪军也都向民众宣传纪律条款，注意获得民心，但实际上尽做些坏事。特别是在充当袭击先锋的游击队里，混进很多当地的流氓无赖，这样的游击队所到之处，全村一片荒芜。

正规军及政治训练所所属的游击队，尚能着到纪律，但也仅是征集手段有所不同。即在征集物资时避免直接掠夺，而以巧妙、狡猾的方法，通过各种组织及政治手段达到其目的。

例如，发行不兑现的纸币购买物资，以村为单位要求“救国捐”，如不应允即做为汉奸强迫服从。

当地居民深知彼等言行不一，不仅有怨言，有的地方出现了组织自卫团的倾向。但是在有实力的游击队的地区，或其宣传普及的地方，抗日的号召依然深入人心。

在共产党系统的游击队的宣传文件中，有关纪律部分摘记如下:

三大纪律

(一)一切行动听指挥。(二)不许侵犯民众任何东西。(三)不准破坏我军的光荣传统。

八项注意

(一)积极进行宣传。(二)必须清廉。(三)对人要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借物损坏要赔。(七)优待俘虏。(八)不得随意大小便。(以上均按日文译出一译者)

共军的宿营办法

(一)军队在村庄宿营时，部队首长或其代表先与村长商洽，说明人马数目，做为准备工作的参考。部队在商洽之前，不得进入人家，村长不得借故拒绝部队宿营。

(二)村内若有公共设施，应先利用公共设施，军队不得撇开此等设施而在民宅宿营。但有时村民可以收拾公共设施安排少数民族战士宿营。军队在民宅宿营时，只能在指定的民房住宿，不准强制民众移居他室而独占好的房屋。

(三)军队不准强夺民众食物，不准强行交换。

(四)军队需要粮食和马料，政府可规定一定价格，军队应按规定价格付款，不得向民众提出不当要求。

五、与国民党系统游击队的对立

国民党系统的游击队，在鹿钟麟北上的同时，也稍作整备，以败残兵为基干，收容了曾在“CC 团民众动员会”工作的土匪团，编成 10 个团，由匪首或旧军官担任指挥官。该游击队同共产党员领导的受过政治训练的游击队相比，战斗力相差很大，而且其下级队员大多数倾向共产党。为此，在天津的国民党员深为焦虑，随着武汉陷落，这种倾向更为显著。

第二章 1939年度的治安战

一华北方面军的治安肃正计划①

确保安定的基本设想

1938年秋，大本营决定了华北作战指导基本原则，命令华北方面军确保所占领地区的安定。在建设东亚新秩序的理想下，日满华三国结成亲善的邻国。为了实现东亚和平枢纽的远大目的，华北及蒙疆必须在国防方面、经济方面、特别是在开发利用资源方面，形成日华高度结合的地带。此外，在蒙疆，为了防共，并应造成军事上及政治上的特殊地位。此时，方面军以确保安定为一切工作的根本，以肃正作战为指导作战的准绳，确定了与治安建设并行的使命。

当时，方面军占领地区的状况，从我军兵力及治安实情看来，实际上势力所及只限于重要城市周围及狭窄的铁路沿线地区，仅仅是“点和线”，其它大部是匪占地区。因此，方面军为完成任务，必须制订建设华北的正式施策，对此虽曾作出计划，但到汉口作战结束以后，由于所需兵力得到增援，此项工作始得逐渐具体化。

为了保证安定，仅保持“线”的占领无何意义。必须保持“面”的占领，使华北在政治和经济方面都能独立经营。尤其应该承担开发和获得日本国内扩大生产所需重要资源的重任。为此，必须积极进行肃正作战，实现包括各个要地在内的“面”的占领。以武力为中心的讨伐肃正乃是保证实现安定的首要条件，治安建设的根本方针在于显示“皇军的绝对威力”。这就是方面军对完成任务的基本想法。

注:大本营指出的占领地区的面积和人口，据中国派遣军编写的统计资料，其情况如下:
一、全中国占领地区合计136万平方公里
蒙疆(察南，晋北、巴盟、察盟) 36万平方公里
华北(河北、山东、山西) 61万平方公里
陇海地区(苏北16县、豫北43县) 8万平方公里
二、全中国占领地区人口合计(1936年)17,000万人
蒙疆 552万人
华北 7,706万人
陇海地区 216万人
(以上数字有误，均按原文译出一译者)

军的思想准备，在方面军司令部编写的资料“华北一般状况”中，可以看到下列情况。

确保安定的基本观念

由于国府军及共产党军都以坚持抗日为口号，故保证实现安定的首要条件，是以武力消灭阻碍圣战的国共两军。同时，更重要的，是依靠皇军的存在，作为今后治安建设的核心。现在民心尚未安定，不断受到敌方威胁，因而治安建设的根本即在于尽量显示皇军的威力。

事变的结果表明，必须完全把握民心，使民众心悦诚服。为此贯彻圣战……共存共荣

的大义……清除弱肉强食的肤浅理论……严禁放火、掠夺、强奸……(中间略一笔者)

皇军的秋毫无犯、纪律严明与皇军威武，显示其表里的一致。应以恩威并用，成为指导圣战的根本观念。

治安肃正的根本方针

方面军为了确保当时占领地区的安定，特别是为了迅速恢复河北省北部、山东省、山西省北部及蒙疆重要地区的治安，自 1939 年 1 月至 1940 年 3 月间，分三期进行治安肃正工作，结果使各项施策渐入轨道。

方面军各时期的治安肃正方针如下，

一、肃正作战

通过讨伐作战，全部摧毁匪军根据地，同时彻底进行高度的分散部署兵力，随后即依靠这些分散的据点，对匪军返复进行机敏神速的讨伐，使残存匪团得不到喘息时间和安身处所。

二、各项治安工作

不要满足于一时的宣抚，重点在于永远获得民众，特别注意下列各项工作:

(一)复活县政，重建自卫组织，建设乡村自治。

(二)开通道路及水运，建设通信设施，以利于讨伐及补给，并振兴民间企业。并振兴民间企业。

(三)做好归顺匪众的转业工作，以杜绝流氓游民。训练青少年，恢复学校教育。同时，密切军队与民众的关系，而把握民心。

(四)恢复商业贸易机构及运输事业，以利于物资交流。

三、培植、整顿亲日武装团体，使之成为维持当地治安的核心。

二 肃正作战与洽安工作概要

要点

华北方面军在制订分发“治安肃正大纲”之前，即已按照该大纲的宗旨制订了“1939 年度治安肃正计划”，由年初开始，推行各项治安肃正施策。于 1939 年 2、3 月间，肃正冀中地区，在该地区全面完成了分散部署兵力。3 月上旬占领海州周围地区，打开陇海铁路的东方门户。同时在该地区扩大了分散部署兵力。7 月对蒋系中央军，继晋南作战进行了潞安作战，在晋南一带扩大了势力。此外，各兵团逐渐扩大主要城市周围及铁路两侧的治安地区。至第三期末的 1940 年 3 月前后，收到了如下的成果。

蒙疆地区除在全区扩大势力之外，进行了第一次、第二次后套作战，将治安区推进到安北、西山咀一线。

在山西省，晋西、晋南地区的山岳地带，虽有山西军及蒋系中央军的残余，东部省境仍有共产党各军存在，但平定了包括铁路两侧广大的晋中主要地区。在河北、山东及新黄河以东的河南、安徽、江苏各省，除省境一部分外，采取分散部署兵力，基本上被我占有。敌较大部队仅残存于山西省境及山东省东部

地区。

这样，华北治安经过三期的肃正，与以前相比出现了划时代的进展。

1939 年度的主要肃正作战，参着另表。

各项治安工作，随着肃正区域的扩大迅速开展，在 1939 年 1 月前后，仅仅限于铁路两侧数公里的治安地区，经过三期肃正，在蒙疆，全部县(旗)均已恢复了县(旗)行政;在华北的 388 县当中，已有 312 县恢复了行政。

为了恢复县政，复活了被破坏的行政组织，重建被毁灭的自卫组织，振兴产业，安定民生，整顿金融，复兴经济，以期民心之安定。进而恢复并重建交通、通信及运输，以利于开发产业，加强警备工作的顺利进行。同时，教育训练青少年，以期清洗抗日思想，早日恢复治安。一切措施皆以治安为第一，在军的领导下彻底施行。

在此期间，还促进了日本扩大生产所渴望的重要资源的开发，从而结合华北肃正建设，确立了日满华牢不可破的国防圈。

然而，自第二期以后，共军逐渐显著抬头，特别在第三期内，逐次蚕食蒋系军及杂牌军，迅速地扩大其势力。因而治安的恢复与其表面现象不同，一股隐患正在暗中滋长。

方面军针对此种形势，将 1939 年度肃正作战计划分三期施行。

第一期 1939 年 1 月－5 月

第二期 1939 年 6 月－9 月

第三期 1939 年 10 月－1940 年 3 月

华北方面军作战区分一览表				自 1938 年 12 月至 1940 年 3 月
	作战名称	期间	参加部队	说明
方面军	冀中作战（南号作战）	自 1939 年 2 月 2 日至 1939 年 2 月 20 日	方面军军直 110D、27D、10D、12A、114D	歼灭在深县，南宫附近蠢动之敌，我军包围占领敌人之根据地冀县，在各要地部署必要的兵力，逐次扫荡四出游击之敌。
	鲁西作战	自 1939 年 7 月 3 日至 1939 年 7 月 9 日	方面军军直 14D、10D、35D、12A、32D、114D	扫荡鲁西地区内顽强进行工作的共军，战果虽然不大，但对鲁西各要冲配备了进攻的兵力，治安圈显著扩大。 (共军约 2 万)
	晋东作战（一号作战）	自 1939 年 6 月 10 日至 1939 年 8 月 25 日	方面军军直 10D、35D、1A、20D、36D、108D、109D、4B	歼灭盘踞在山西省东南部的中央军及朱德的共军，突破其坚固阵地,克服地形的困难，歼灭所在之敌。尔后以一部常驻潞安及沁源，扩大治安地区。(中央军约 8 万，共军约 2 万)
	太行山脉肃正作战（ヲ号作战）	自 1939 年 11 月 11 日至 1939 年 12 月 7 日	方面军军直 110D、驻蒙军 26D、2B、1A、3Bs、3、4B、9B	从涞源南方地区扫荡盘踞在阜平周围的共军，彻底烧毁其根据地设施。 (共军约 2 万 5 千)
	东斋堂附近扫荡作战		方面军军直 15B、驻蒙军 2B	扫着盘踞在怀来南方长城线附近之共军，捣毁东斋堂附近的根据地。 (共军约 5 千)
第一军	扫荡南部山西军作战（S 号作战）	自 1938 年 12 月 18 日至 1939 年 1 月 10 日	第一军 20D、108D、109D	歼灭盘踞在吉县、大宁附近的山军，捣毁其根据地，使山西军战斗意志显著下降，收到政略上的极大效果。(阎锡山指挥的 5 个师约 1 万)
	扫荡北部山西军作战（N 号作战）	自 1939 年 3 月 1 日至 1939 年 3 月 22 日	第一军 109D、3Bs、7FB（协）	扫荡山西省西北部的山西军及共军，同时展开积极的宣传及宣抚工作。 (山西军及共军约 3 万)

	五台作战（十号作战）	自 1939 年 4 月 16 日至 1939 年 7 月 4 日	第一军 36D、109D、3Bs、4Bs、10D（协）、7FB（协）	讨伐肃清山西省东北部，特别是五台山周围的共军，尔后于要地驻兵，护大治安圈。(共军约 645 百)
	扫荡潞安周围作战（す号作战）	自 1939 年 10 月 2 日至 1939 年 10 月 9 日	第一军 20D、109D、4Bs、3FD（协）	歼灭企图夺回潞安平原而聚集于该地周围之敌，并夹击各处之敌，扫荡附近地区。(中央军 6 个师约 2 万)
	东作战	自 1939 年 12 月 3 日至 1939 年 12 月 18 日	第一军 37D、41D、108D、4Bs（一部）、9Bs（一部）	敌人企图以山西南部为重点，展开冬季攻势。各战区与之策应，广泛向我攻击。我军以果酸的反击摧毁敌之攻势。
第十二军	苏北作战（ト号作战）	自 1939 年 2 月 26 日至 1939 年 3 月 16 日	第十二军 5D、21D、114D、6Bs。华中派遣军一部，第四舰队协力	以切断敌人海陆补给为目的，占领淮阴、海州及附近的盐田，击破所在之敌，摧毁敌人鲁苏战区的基地。 (于学忠部下 4 万 5 千)
	讨伐于学忠作战	自 1939 年 3 月 25 日至 1939 年 4 月 25 日	第十二军 5D、21D、114D。7FB(协)	击溃拟横断津浦线北进的于学忠军，敌人分散为小部队，夜间向山东省南部逃窜。
	鲁南作战（キ号作战）	自 1939 年 6 月 7 日至 1939 年 6 月 25 日	第十二军 21D、32D、5Bs	对盘踞在鲁南地区的于学忠、沈鸿烈军及共军，一齐展开进攻，击破顽强抵抗之敌，摧毁敌人游击根据地。(敌约 10 万)
	鲁东作战	自 1940 年 1 月 29 日至 1940 年 2 月 15 日	第十二军 21D、32D、5Bs。华中派遣军第三舰队(协)	为了全面肃清分散盘踞在鲁东道东部的大小匪团，部队向广大的正面分进，向东方压迫敌人，各部队适时封锁间隙，痛击各处的敌人。
驻蒙军	春季反击作战（モ号作战）	自 1939 年 4 月 3 日至 1939 年 5 月 31 日	驻蒙军 26D、2Bs、KK	抢先反击敌之 4 月攻势，以粉碎其企图。各部队奇袭敌人将其包围，与撤退的敌人主力发生遭遇战，或追击敌人，给予毁灭性的打击。
	蒙疆地区冬季反击战	自 1939 年 12 月 11 日至 1940 年 1 月 12 日	驻蒙军 26D、KK、2Bs 一部	作为冬季攻势的一环，邀击向包头及绥远方面各警备地区来攻的敌人，继续向其反击，给以毁灭性的打击，
	第一次后套作战（巴号作战）	自 1940 年 1 月 14 日至 1940 年 3 月 1 日	驻蒙军 26D、KK、2Bs。27D、110D、37D、41D、3Bs、16Bs 各一部	为摧毁敌人的攻势企图，渡过黄河进攻伊盟地区，再转攻五原地区，击溃该地之敌。尔后，留蒙古军驻守，主力归还原地。
	第二次后套作战	自 1940 年 3 月 21 日至 1940 年 3 月 31 日	驻蒙军 26D、KK	击破企图夺回五原而来袭的敌人。敌人掘溃五加河，使附近泛滥，我军克服许多困难，辗转归还原处。

第一期肃正作战

(1939 年 1 月－5 月)

方面军在 1938 年 11 月 19 日完成了第十二军司令部的编制，12 月 2 日接受了有关基本任务的大陆命第 241 号命令，随后由于增加了第五、第十、第二十七师团，因而，从 12 月中旬以后逐次改变各兵团的部署。在 1939 年 2 月中旬，又增加了已经编成的五个独立混成旅团，奠定了治安肃正的基础，其部署情况如一下:

一、第一军管辖地区

第一军的作战地区，限定在山西省内方面军直辖的京汉沿线地区。其兵力为三个师团(第二十、第一0八、第一0九师团)、三个独立混成旅团(独立混成第三、第四、第九旅团)。警备京汉沿线的独立混成第三旅团，移防忻口镇以北(不包括忻口镇)的宁武东西地区。新编独立混成第九旅团归第一0九师团指挥，担任太原周围地区的防卫任务。

二、方面军直辖地区

以河北省及黄河以北的河南省为直辖区，兵力为四个师团(第十、第十四、第二十七、第一一0师团)、两个独立混成旅团(独立混成第七、第八旅团)。

第二十一七师团参加武汉作战以后，于1938年12月末调回华北，在1939年年初，接替了第一一0师团所承担的河北省东半部的防务及治安肃正的任务。

注:第二十七师团是在1938年2月13日以中国驻屯混成旅团改编的中国驻屯兵团为基干，于同年7月20日在天津编成的。现又回到原驻地。

第一一0师团，担任地区缩小到定县以北，以京汉及京古线为中心的河北省的西北方地区。

独立混成第七、第八旅团编成后，分别配属于第二十七，第一一0师团。

第十师团参加武汉作战以后，从华中转来，担任定县、彰德间以京汉线为中心的河北省西南部的防务。

第十四师团，1月末随着骑兵集团移驻蒙疆，负责新黄河以北的河南省大部地区。

三、第十二军管辖地区

1938年11月下旬，第十二军于执行统帅权力的同时，命第二十一、第一一四、独立混成第五旅团，负责管辖山东省全省及江苏、安徽省各一部地区。随后第五师团从华中转来青岛，于1939年1月10日隶属第十二军，使之负责管辖山东省东部。

2月中旬，独立混成第六、第十旅团编成，分别由第二十一、第一一四师团指挥。

四、驻蒙军管辖地区

1月10日骑兵集团(缺骑兵第四旅团)隶属于驻蒙军，因此，命第二十六师团移交包头及固阳地区。骑兵集团于第十二军司令部编成时，即归其指挥，担任河南省陇海沿线的警备，但由于变更隶属。从1月下旬至2月下旬之间移驻蒙疆，至3月中旬末，始完成负责地区的部署。

12月下旬，方面军根据第一期肃正计划，对所属各兵团下达任务如下:

一、驻蒙兵团继续执行原来任务.担任作战地区内的治安肃正工作，尤应确保察南要地，努力阻止匪军沿太行山脉向京津方向侵入。

二、第一军打击山西省北部残敌正规军，同时尽力扫荡同蒲路及正太路两侧。对同蒲以东山地.从西方及南方掐断敌人的联络补给要地，通过封锁困死匪军。

三、方面军直辖各兵团

第十、第一一0师团，各以主力肃情京汉路东侧地区。以其一部掐断通向京汉路西侧山地的要冲，协助第一军对山地的封锁。

第十四师团在其作战地区进行肃正工作，同时，以其一部扼住山西省边境。

第二十七师团，以主力对山西津浦路两侧地区之敌，以一部于津海道南部的津浦路东侧地区，支援该方面的第十二军的行动。

四、第十二军尽力肃清鲁北道及胶济、津浦两路沿线地区之敌，以一部占领莱州湾(旧

黄河河口东侧)的要地，切断匪军的海陆交通补给。

第一期的肃正作战，趁方面军增强兵力的机会，在固定部署前进行大规模的扫荡作战，肃清占领地区及邻近地区之敌，确保治安，为分散部署兵力打好基础，以期扩大治安圈。同时积极作战，切断敌人的交通补给，粉碎敌人的反攻企图，主要作战有山西南部扫荡战、苏北作战、春季反击、对北部山西军扫荡战、五台作战等。(参看华北方面作战区分一览表)

方面军的第一期肃正作战，收到了相当成果，据方面军的“战时月报资料”记载，3月份管内治安状况大致如下，

第一、一般状况

一、敌正规军(蒋系军)的行动依旧不活跃，皆力图保持其驻防周围地区。敌人企图于4月全面展开攻势，3月末逐次下达命令。

于学忠军由阜阳方面向东北前进，月末在宿县西南地区，被尾高兵团(第十二军)击溃。

各处游击队的活动，因我军积极的讨伐，也逐渐被扼止，但数百名的匪团依然在河北平原到处蠢动。

在一般兵团或部队的连接处，依然成为匪团的安全地带。

二、国共关系在表面上似仍继续合作，但蒋介石尽力扼制共产党势力的扩大，国共双方的下层机构相互倾轧渐趋激化。

三、敌方抗日的民族意识，依然不容轻视，通过我军继续分散部署兵力，逐渐使民众对皇军的道义有所认识。

四，敌人对铁道袭击次数:京汉路62起，津浦路21起，正太路13起，共计I12起(原文如此一译者)，比前月减少32起。

第二、各兵团管区的状况

一、莲沼兵团(驻蒙军)管区

治安一般尚好，但管外邻接地区依然存在敌较强的正规军，不断伺机侵入管内，兵团正在为即将到来的攻势进行准备。

敌方各系统军队现况如下:

(一)正规军

侵入晋北地区西部长城线东侧地区的傅作义军的王子修及孟文仲部队，3月初受到配合梅津兵团 N 号作战(扫荡山西军作战)的后官兵团(第二十六师团)的攻击，向长城线以西败退。傅作义及门炳岳军等接到程潜“4月下旬以后采取攻势”的命令，目前正在准备，傅作义已从兰州回五原。

(二)共军及共系匪军

盘踞在河北省东斋堂方面的共系匪团的一部约1,000人，分成三个梯团，从2月下旬侵入察南的中部，逐次渡过桑乾河，企图进入怀安西南地区。该部被常冈部队(独立混成第二旅团)在谢家堡附近山中击退。灵邱方面驻有共军第一二0师第三五九旅的主力，行动并不积极。

阴山山脉南侧地区的共军及共系匪团，目前虽不活跃，但通过群众工作正在扩大势力，该方面的国民党抗日匪团也逐渐受其影响。各地相继组成“战地动员委员会”，行动渐趋活跃。

(三)国民党游击队及抗日匪团

绥远民众抗日自卫军及察哈尔游击队，依旧分散在各地，阴山方面的第一路、第二路、第三路及第四路的一部共约1,000人，在大滩西方有与共系匪团合流的迹象。

第二战区第三游击队，在晋北地区浑源方面占有根据地，最近将其组织扩大为三个纵队六个独立支队，计16,000人，在察南晋北各地分散活动。

二、梅津兵团(第一军)管区

3月份的治安状况，由于N号作战及独立混成第四旅团的正太路北方地区的扫荡战，同时，在各地驻扎军队并进行治安工作，除河曲，偏关、苛岚方面以及五台山附近以外，在山西北部和平原地区治安有显著好转。

由3月中旬以后，敌正规军四个师从黄河右岸侵人山西南部，盘踞在潞安平原及中条山脉，有准备进行4月攻势的模样，开始活跃起来，但因我警备部队，尤其是中条山脉南部的牛岛兵团(第二十师团)及谷口兵团(第一 0 八师团)进行了先发制人的讨伐，到月末敌军并无大的活动。

敌军的状况如下:

(一)正规军

在中条山脉以内及其外围地区的正规军，以前由于我军扫荡作战曾受很大打击。其在4月攻势中的动静已如前述。敌人一向惯于反复袭击平原交通线，特别是对铁路进行袭击，由于警备队的积极努力并占领交通线附近要点，而有所减少。但是，敌人为了配合4月攻势，预料此种袭击活动将再次积极展开。

(二)山西军

在N号作战以后，敌人行动极为消极，仅在黄河两岸地区苟延残喘，但其保安队则仍分散在各地。

(三)共军

在正太路南北地区有活动模样，共军的内部活动渐趋深入细致，特别是朱德所在的晋南方面，由于工作很彻底，收集敌人的情报十分困难。

三、尾高兵团(第十二军)管区

3月上旬，继上月海州方面的肃正作战，下旬又在宿县及其西南方地区击溃了从阜阳方面东进的于学忠军，治安圈有了显著扩大。

四、井关兵团(第十四师团)管区

3月中旬以后，彻底实行分散部署兵力，经常搜寻敌人，不断进行先发制人的攻击，治安正向好的方向发展。但在作战地边界附近，特别是北部山地及其西方与西南方地区，敌人从3月下旬逐渐活跃起来，估计将出现全面的游击活动。敌情如下，

(一)正规军(蒋系军)

朱怀冰的第九十四师主力放弃温县北方根据地，移驻清化县北方山地及焦作东北方山地，企图东山再起。

骑兵第四师遭受我军肃正作战的重大打击，改编为新编第二十四师，移驻辉县西北地区企图反攻。但据俘虏讲，大部敌人没有战斗意志，希望投降。

孙殿英军从泽州附近，经过陵川，渐向林县方面移动，企图在彰德方面活动。

第一六六师从孟县地区向阳城方面移动。在黄河南岸的第一九六师向济源附近移动。庞炳勋部队从黄河南岸经垣曲向晋南地区移动。

(二)共军

在辉县北方山地及怀庆两方山地的共军，仍为属于第一二九师、第一一五师系统的部队。

(三)游击队及匪团

大部分以行政干部为队长，一部分由正规军直接指挥，但丧失战斗意志，希望投降者逐渐增多。

铁路破坏总队，在太行山脉拥有根据地，由少数人组成破坏班，秘密挺进，企图破坏

铁路，但由于师团分散部署兵力，在3月份铁路破坏事故急剧下降。

五、桑木兵团(第一一0师团)管区

各部队主要扫荡平原方面的残敌。在此期间，兵团直接指挥满城北方大册河河谷及白洋淀附近的作战(中号作战)，大致完成了对管内平原地区的扫荡。同时，治安工作也有进展。平原地区的匪团主要活动于管内东方边界附近。此外，还有潜伏的便衣土匪继续到处活动。敌人的政治工作仍很强，山地方面的匪势不可低沽。

六、本间兵团(第二十七师团)管区

兵团依据第一期肃正计划，3月的肃正讨伐重点依然针对南部地区。在此期间，对其它方面的匪团也继续进行讨伐，逐渐收到成效。月末占领了管内全部县城及地方交通、经济的要冲，完成了部队的部署，有组织的匪团已不存在。但是，在新占领的白洋淀周围及接近作战地区边界地方，由于共军的抗日共产政策，致使居民逃避，交通通信被破坏。这些地方治安的恢复尚需相当努力。

七、篠塚兵团(第十师团)管区

兵团继2月上旬在军统辖下的南号作战，展开了全面讨伐，尽力剿灭鹿钟麟及石友三军的败残匪团，尤其对石友三军，积极搜捕使之溃乱。敌人败残部队逐渐逃往山西。以后我军施行高度分散部署兵力，积极进行各种肃正工作，管内除濮阳、内黄、清丰、涉县、林县等五县外，均已占领。新占领地区为多年来共军的根据地，赤化思想很深，因此，各地区的部队以忘我工作及积极的讨伐克服困难。盘踞在京汉路西方地区及滹沱河河谷的共军与晋察冀军的行动已不甚活跃。

第二期肃正作战

(1939年6月－9月)

4、5月时，方面军由于新编的四个师团派往华北，命第三十五师团(师团长前田治中将，4月下旬到济南)担任新乡附近及其以西河南省的防卫;命原来担任该地防卫的第十四师团(师团长井关隆昌中将)担任该地以东及新黄河以北河南省的防卫;命第一军的第三十六师团(师团长舞传男中将，4月末到太原)接替第一0九师团作战地区的防务、第三十七师团(师团长平田健吉中将，五月中旬到运城)接替第二十师团作战地区的防务，命第十二军的第三十二师团(师团长木村兵太郎中将，5月中旬到济南)担任第一一四师团作战地区的防卫。

考虑对苏战备，调回在华常设及特设师团，并派遣新编师团与之接交，继续进行战备。此外、与诺蒙坎事件相关联，以一部兵团调往满州，进行准备。7月，大本营命令第十、第一一四师团归国。9月，命令第十四、第一0九师团归国。(注:第十四师团归国，延期到11月中旬以后)又在9月派遣第五师团去满州。

7月，独立混成第一、第十五旅团归属于方面军，9月，骑兵第四旅团复归方面军司令官指挥。

随着以上兵团的转出转入，方面军命独立混成第十五旅团负责以北京为中心的燕京道，命第一一0师团负责保定道及第十师团的旧作战地区，同时命原先归第十师团指挥的部队(独立混成第八旅团、第一0九师团的一部)及新编的独立混成第一旅团，归第一一0师团指挥。将第一一0师团负责的涞源县归入驻蒙军的作战地区(行政依然归河北)，调回的骑兵旅团，归第三十五师团长指挥，命其防卫归德附近陇海路沿线。

方面军于 5 月下旬，指示第二期肃正计划，命各兵团彻底施行分散部署兵力，继续积极进行讨伐，同时利用兵团调动的会合期间，肃清潞安平原、山东省西部及东南部的国共两军、摧毁敌之策源地。其主要作战有鲁西作战、晋东作战、鲁南作战等。

通过第二期肃正计划，到期末的 9 月，在“方面军战时月报资料”中，关于敌情及治安状况有如下的记述。

第一、一般状况

在山西省东南部地区，我军一号作战(晋东作战)结束，参加部队刚刚归还原驻地，敌认为日军败退，立即在潞安周围集中兵力，不顾我军屡次反击，声称要夺回长子及壶关，我军对此正准备予以扫荡。

阎锡山军未见有大的活动。

黄河及新黄河以南的京汉路西侧地区的敌人，乘我兵团移动之际，开始积极活动。因此，军在整顿兵团之前，拟先粉碎该敌，于是命井关(第十四)、前田(第三十五)两师团，对敌进行扫荡。

随着最近世界形势的变化、蒋政权内部和平运动的高涨，以及汪新政权的即将成立等，敌军及抗日分子的动向也发生了变化。由于国共矛盾的激化，加以汪系的策动，敌方内部斗争更加尖锐，因而近来投降归顺的匪团突然增多。

对天津水灾的紧急施策，通过本间兵团及天津日华机关的极大努力，已取得成效，逐渐恢复原状。

第二、各兵团管区的状况(笔者略)

1939 年 9 月间华北方面军综合战果（据战时月报）

兵团 \ 区别		交战次数	交战时敌方兵力	敌军损伤		我军损伤	
				遗弃尸体	俘虏	战死	战伤
驻蒙军		61	5,639	524	44	16	4
第一军		365	71,165	4,075	674	194	196
第十二军		447	85,228	5,345	394	105	201
直辖	第十四师团	45	18,600	476	52	37	97
	第三十五师团	134	17,564	447	29	16	44
	第一一 0 师团	225	37,843	2,142	373(774)	90	167
	第二十七师团	169	19,891	677	126	6	25
	独立混成第十五旅团	44	7,400	201	10	10	15
计		1,265	263,330	13,887	1,704	462	1,061
备注		( )内数字为投降者					

笔者注: 从上表可以看出，(一)在华北某些地方，每日平均有 42 次交战。(二)给与敌方的损伤平均每日遗尸约 460 具，俘虏 56 人。(三)我军损伤平均每日战死 15 人，负伤 35 人。

另据陆军报道部发表的从中国事变爆发至 1939 年 9 月，双方死亡数字如下:

敌方遗弃的尸体(仅为目睹者) 1,120,289

日本方面(陆军)战死者) 65,758

第三期肃正作战

(1939 年 10 月-1940 年 3 月)

9 月，在南京设立了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华北方面军隶属其下，但方面军的任务未变。

大本营于 10 月将第四十一师团、11 月将独立混成第十六旅团编入第一军的战斗序列，命该军的第二十及第一 0 八师团调回朝鲜及国内。又于 1940 年 1 月改编骑兵集团，2 月编入两个骑兵联队以增加其战斗力。

第一军使第四十一师团(师团长田边胜武中将，10 月 23 日到临汾)担任原第一 0 八师团作战地区的防务，使独立混成第十六旅团担任平遥、汾阳、离石地区的防务。由于第二十、第一 0 八师团调回国内，使第三十六师团担任以潞安为中心的山西东南部的防务。这一时期的主要作战为：潞安周围的扫荡作战、太行山脉的肃正作战、冬季反击作战、后套进攻作战等。由于共军势力广泛渗透、顽强进行活动，我各部队对其警备地区周围，经常反复进行肃正讨伐。

在此时期，国民政府军的冬季攻势，表现了从未曾有过的战斗意志。

在本期末，中国军的状况将在下一章叙述，在此仅就 11 月前后的显著动向记述如下。

方面军在 1939 年 12 月初，召开情报主任会议，根据世界形势的剧变(9 月 1 日德军开始进攻波兰，3 日英法对德宣战，16 日日苏签订诺蒙坎停战协定，17 日苏军进攻波兰)，并就中国的一般政情与华北方面的敌军动向，以及西北通道等问题作了说明，其中对华北方面的中国军状况作了如下的叙述。

一、在方面军占领地区周围的国民政府军，只要情况无大变化，仍继续采取消极抵抗，避免消耗战斗力。目的是要扩充实力，在其占领地区内，努力培养和扩充军政党一体化的抗战力量。

二、观察国民政府军的内部情况，其士气之低落自不待言，但也不能认为很快就会丧失抗战意志。

三。华北共军的配备状况

根据最近情报，共产势力渗透和华北全部地区，就连北京周围、通县、黄村(大兴)等地，也都有组织地渗透于民众中间。在山东方面，其势力更加迅速扩大。山西、河北的共军，过去是以扰乱我军后方、消耗战力、牵制我军行动等为目的，只是趁机进行游击而已。但是，最近他们接受的任务，规模既大而且行动积极，其情况如下:

(一)全面加强以西北根据地为中心的共产党阵营。

(二)在汪政权及华北特殊地带成立以前开展的游击工作，应加以推进。

(三)乘机进入冀东地区，切断京山铁路。

(四)加强与冀南解放军的联系，切断京汉、津浦两铁路，占领冀南各县。

四、在河北各地，国共纠纷不断发生，显示中共势力的猖獗。中共使地方自治组织共产化，蚕食国民政府行政机关，进而向国民政府军队内部伸张势力，并拉拢吸收散在各地的游击队及土匪。

中共势力对华北治安的肃正工作，是最强硬的敌人。为此，应加紧收集情报，确立排除中共势力的对策，实为当务之急。

华北方面军对于中国西北，即陕西、宁夏、甘肃，新疆等省的共产化，极为关心。为了防止共产化，除收集各种有关情报外，从 1939 年以来，曾想尽各

种谋略及措施。方面军在前述情报主任会议上，对中国西北状况有如下的说明:

一、在陕西方面，中共势力逐渐巩固，国共均势渐渐发生破绽。

二、回教军对苏联势力及国民政府方面的怀柔政策，虽采取不即不离的态度，但其动向与我军的谋略有最深刻的关系。

三、从苏联中亚运来的援蒋军需品渐渐减少，但另一方面沿西北通道正在逐渐加强军事设施，积极发展工业。诺蒙坎停战协定签订后。外蒙南部兵力增强，并派出党的得力干部和工作人员，看来是在策应西北工作。

四、兰州是中国西北赤化的策源地，实际上，是西北特别区的首府。已经进驻的苏军步兵超过 2,000 人，技术部队及政治部工作人员等约有 1,000 人，飞机约达 150 架。其它各类特种机关、兵工厂、燃料库、飞机场等，早已完备。现在陆续建筑工厂及军用住宅。为了避免我军的轰炸，上述设施均分散郊外，同时正在大规模地构筑坑道。在新疆省，从哈密开始，由猩猩峡至迪化之间，沿途各地驻有苏联军队。

军需品的运输极端保密，故数量及品种皆不得知，但运输量估计并不大。

五、通过中苏贸易协定，苏联企图垄断西北地区的贸易。这对我国在蒙疆地区的西北贸易将有很大影响。

在肃州(今酒泉一译者)附近着手开发煤矿和油田。汽车修理厂及其它工厂设施也正相继进行建设，建筑材料的运输也很繁忙。

由苏联境内阿亚古斯到塔城间的铁路建设已经完成，现在又向迪化(今乌鲁木齐一译者)延长铺设。新疆省内的旧骆驼道路现正改修汽车路，预计年内可以竣工。

六、西北共产地区，是以苏联的支持为背景，如果英法支持的重庆政权一旦破灭，将来可能在此留下抗日动力，与此直接接壤的方面军，今后需要对之采取万全对策。

三 各方面的肃正作战

五台作战(1939 年 5 月 8 日—6 月 25 日)

在山西省，除阎锡山的山西军外，蒋系中央军也进入该地，频繁活动。同时，中共势力的扩大也不可轻视，第一军根据方面军的指示，制订了山西省肃正作战计划，企图将治安加强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方面军从 1938 年 12 月中旬开始行动以来，首先扫荡了蒲县、大宁县，吉县附近的南部山西军，继而扫荡了太原西北地区的北部山西军及共军部队，重新在神池、静乐附近驻扎，以图恢复治安。于此，对西部地区实施扫荡之后，即进行五台作战，现将此次作战开始前的状况概述如下。

五台山及其东部山岳地带，东西约 150 公里，南北约 100 公里。这一地区，日军从未驻兵，因而成为中共势力的巢穴。1938 年秋，第一军虽在五台山周围进行过讨伐，但未能给予决定性打击，因而中共势力日益扩大，建立了巩固的根据地。

五台山附近是隶属于第一军的第一 0 九师团的作战地区，该师团从]938 年秋起，便在五台、东冶镇附近各部署了步兵一个大队。与此邻接的独立混成第三旅团于 1939 年春，从京汉线沿线地区移驻到北部同蒲路沿线地区后，在大营镇一繁峙间、崞县一代县间及原平镇附近各部署了一个步兵大队，另外独立混

成第四旅团在石太路以北地区，部署了一个步兵大队。

新归属于第一军的第三十六师团，从 4 月末逐次到达太原附近。方面军为了使其接替第一 0 九师团的防务，先令第三十六师团集结于第一 0 九师团的作战地区内，准备换防。同时，从第一 0 九师团抽出一部兵力，作为军的直辖部队。

作战指导 第一军(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中将)根据方面军的计划，在“5 月上旬至 6 月下旬，以一部兵力扫荡盘踞在以台怀镇及洪家寨为中心的五台山山岳地带之敌，尔后在其要地驻兵，对该地带进行彻底肃清”的方针下，将作战分四期进行，4 月 18 日对有关兵团下达了作战准备命令。

作战计划概要如下:

第一期(5 月 8 日开始约五天)

以第一 0 九师团及独立混成第三旅团的部队，包围歼灭台怀镇之敌。

第二期(5 月 13 日开始约三周)

以前期作战部队从五台、台怀镇一线及原平镇、代县、沙河镇一线，夹击西部五台山地之敌，并在各要地驻兵。

第三期(6 月上旬末开始约一周)

以第一 0 九师团的部队，于石咀、台怀镇一线附近准备前进，在龙泉阁南北线之间进行扫荡。

第四期(6 月中旬开始约两周)

以第三十六师团及独立混成第四旅团的部队在五台、东冶镇及孟县、上社镇附近准备前进，以扫荡洪家寨附近滹沱河河谷之敌。

作战经过概要 方面军于 5 月 1 日下达了有关发起作战行动的命令。各期作战经过概要如下。

第一期(台怀镇附近的扫荡)

第一 0 九师团佐佐木支队(步兵一个联队为基干)5 月 8 日从五台、独立混成第三旅团加纳部队(步兵一个大队为基干)9 日从大营镇分头开始行动，控制五台—河口村—石咀道路及大营镇—口泉村(石咀东北约 20 公里)道路，切断台怀镇附近及其以东敌之退路。

10 日佐佐木支队及加纳部队之一部，向台怀镇分进，压缩包围圈，但未遭遇大股敌人，11 日占领了台怀镇。

尔后，佐佐木支队沿五台—台怀镇道路，驻守各要地。加纳部队主力由来路返回大营镇途中，于口泉镇东北地区遭到敌人的顽强抵抗，因而转进上细腰间方面。但于该地附近，再次与优势之敌遭遇，我方不断出现伤亡。14 日，会同从沙河镇前来增援之部队，将敌击溃，15 日回到大营镇。

第二期(扫荡西部五台山)

方面军决定大体仍按原定计划继续进行作战。5 月 15 日命令第一 0 九师团及独立混成第三旅团进行第二期作战。

18 日，第一 0 九师团以约六个中队兵力，从河边村、东冶镇、瓦厂、台怀镇各地，独立混成第三旅团以步兵各约两个中队为基干的部队从原平镇、代县、繁峙分头开始行动，从四面八方一齐迸行扫荡，但未遇大股敌人。于是，独立混成第三旅团各队 20 日回归原驻地;第一 0 九师团在主要地点留驻一部兵力，21 日结束了第二期行动。

第一 0 九师团将作战地域防务移交给第三十六师团，5 月 22 日交接完毕。

第三期(扫荡龙泉阁)

5月22日，方面军命令第三十六师团实行第三期作战。

第三十六师团笠原支队(步兵一个联队为基干)6月4日夜从台怀镇出发，途中击溃一部敌人后，5日到达石咀。其后分为三个纵队前进，在攻击龙泉阁的同时，另以一部进至其东部地区，企图切断敌人退路，但敌主力已向东方远逃，部队在其附近一带进行扫荡后，于6月8日回归石咀.

第四期(扫荡洪家寨附近)

在本期作战中，决定第十师团以步兵约两个大队为基干，通过滹沱河河谷向小觉镇进攻，协助第一军作战。方面军于6月16日按照原定计划，命第三十六师团及独立混成第四旅团进行第四期作战。与此同时，关于作战路线，指示第三十六师团以东治镇一洪家寨道路及五台一十里铺(洪家寨北方约 20 公里)道路为基准、独立混成第四旅团以关头村(上社镇东南约30公里)一小觉镇道路及车轮村(上社镇东方约15公里)一洪家寨道路为基准，并规定6月19日从东冶镇、五台出发，20日从关头、车轮村出发。

第三十六师团，19 日分成三个纵队，右纵队(步兵两个中队，山炮一个中队为基干)由东冶镇经南庄道路，中纵队(步兵六个中队、山炮一个小队为基干)由五台，左纵队(步兵一个中队、山炮一个小队为基干)由南大贤(五台北方约5公里)分别向洪家寨前进，22日会合于洪家寨。其间，中纵队与左纵队曾于耿家庄附近，攻击了据守该地南北高地之敌，使其向东溃逃。

独立混成第四旅团于6月20日分成两个纵队，右纵队(步兵三个中队为基干)，左纵队(步兵三个中队为基干)，同时向清水口(洪家寨东方约5公里)前进，于21日两纵队合击占据清水口北方高地之敌约200人，并将其击溃。

第十师团的一部，17日到达洪子店(小觉镇东方约25公里)南北一线，尔后分成两个纵队前进，途中击溃小股之敌，22日到达小觉镇，与独立混成第四旅团取得了联络。

当时第一0九师团参谋山崎重三郎大尉(后为中佐)的回忆如下:

一、1939年5月的五台作战是继1938年秋季作战的再一次剿共作战。其战果与初次相同，毫无所获。

二、作战期间，几乎无法掌握共军的动向，甚至连共军的踪影也弄不清。因而，从未进行过较正规的战斗。另外，由于战地民众实行“空室清野”，第一线部队在作战期间也未遇到居民。

三，当作战开始时，方面军便发出训令，指示“作战部队应彻底追捕敌人。战场遗弃物资等由另行编成的收容班专负其责。要严肃军纪风纪。共军中有不少女兵，…”。但是，结果不仅没有共军遗弃的物资，也没有人见到女兵的踪影。

当时第三十六师团参谋小堀晃中佐(后为大佐)的回忆如下:

一、因共军在五台的寺院群周围拥有根据地，曾经认为可以逐步判明其情况。但是，作战开始后，敌情完全不明，宛如坠在五里雾中，进行无法捉摸的作战。

二、虽然采用在满洲施行的分进合击治安讨伐方式，但由于中共方面的情报活动周密而巧妙，我方的期望终归落空，毫无结果，

三、共军的纪律严明，例如对五台的寺院、村落等特别注意保护，不予破坏，使人感到很能团结群众，深得人心。

四、日军的装备，无论个人，部队，均过于笨重，因而无法追踪行动轻快的共军。

鲁南作战(193 年 6 月 7 日—6 月 25 日)

敌情及作战准备概况 鲁南地区(胶济路以南，津浦路以东的山东省东南部地区)自徐州会战后，因日军未曾驻兵，致使石友三、沈鸿烈(原青岛市长)等国民政府军在该地占有势力。于学忠任苏鲁战区司令官后，与共军共同在山东建立了游击根据地。

国民政府军第五十一军自 4 月上旬以来，分成小部队通过我警戒网，进入沂水、莒县、诸城附近。第五十七军在苏北作战时败退到诸城，但从 4 月下旬，又进入蒙阴、沂州以北地区。沈鸿烈指挥下的保安队、新编师等，部署于上述正规军的外围地区。共军的山东纵队则以泗水地区为根据地。估计泰山山脉以内中国方面的总兵力，包括正规军、杂牌军、共军共为五万—七万人，结成联合战线，以图再起。

第十二军决定剿灭上述中国军队，并对该地区进行肃正，乃以第五师团为基干，并增加第二十一、第三十二，第一一四师团及独立混成第五旅团的各一部，从 6 月上旬开始作战。

作战经过概要 各部队于 6 月 4 日从沂州、太平邑、新泰、莱芜、临朐、安邱、诸城附近同时开始行动，冒酷暑突破泰山险阻，到处击溃敌人，并直向莒县、沂水附近进攻。9 日，从北部进攻的部队占领莒县、沂水，从西部及南部进攻的部队，进占大店镇、河阳镇、坦埠、南麻一线，压缩包围圈，击溃了各地之敌。

敌部队企图避我攻击，向沂水西部山地、日照附近、蒙阴南方云蒙山逃遁。我方各部队穷追败敌予以严重打击。

方面军从 6 月 15 日进一步增加兵力，攻击正在沂水北部山地集结之敌，同时攻击云蒙山敌人，使其溃乱。更于 25 日包围攻击集结于蒙阴北部山地之敌，取得了战果。

当时的第十二军参谋松田正雄大尉(后为中佐)对此次会战回忆如下:

一、本作战是第十二军根据自己的意图而计划的，主要目的是:摧毁在我方驻地外围附近蠢动的敌游击据点，同时，在进攻地区的要地部署兵力。

二、敌主力为国民党系统部队，估计不会具有较强战斗力。由于敌人的战术是以游击战为主，我方则采取彻底的分进合围的方式指导作战，在所有道路上埋伏小部队，大张罗网，然后压缩包围圈。

三，空军部队在本作战中，特别紧密地给以合作，但为了使分进部队便于按规定的计划进行活动，曾要求其将重点置于搜索和联络方面。

四，作战期间，正值酷暑，第一线部队经过一个月的艰苦作战，在局部取得了相当战果。特别是第五师团长今村均中将，于作战结束后，仍长时期留驻于沂州附近，期使扫荡完满成功。对此，军司令官尾高龟藏中将也十分赞许。

五，作战结果，在短期内未曾出现铁路事故等，但随着时日的推移，游击根据地又形复活，并开始在胶济路、博山路方面进行活动。

通过此次作战，看来，国民党的游击据点已被扫清，并且没有由共产党取代的迹象。

鲁西作战(1939 年 7 月 3 日—7 月 9 日)

鲁西地区(津浦路以西山东省西部地区)自徐州会战后，虽屡次实行扫荡，但因我部队未曾驻兵，其治安恢复极差。特别是由于共军的侵入，已可判断赤化工作正广泛深入地渗透到该地。

方面军决定剿灭该地区共军及其匪团，杜绝其活动的根据，以扩大治安圈。为此，命第十二军及方面军直辖兵团，于7月上旬进行了扫荡作战。

本作战由方面军直辖兵团的第十四师团主力及第十、第三十五师团的一部以及由第十二军的第三十二、第一一四师团各一部参加。

负责南部地区的第十四、第三十二、第三十五师团的各部队于6月末开始行动，相继攻克了城武、定陶等敌根据地。北部地区的第十、第一一四师团各部队于7月初开始行动，南北呼应，对鲁西一带进行扫荡。

当时担任邻接鲁西的河南省治安肃正作战的第十四师团长井关隆昌中将，在复员后的上奏书中，对该地区的情况作了如下记载。

师团于1939年5月中旬，将河南省北部(指旧黄河以北一笔者)的治安警备任务移交第三十五师团，将主力移驻于河南省南部(旧黄河以南，新黄河以东一笔者)，司令部设于开封，直至回国(同年12月19日由青岛起航一笔者)前，担任该地之警备。在此期间，特别对河北、山东、河南省境附近残敌，予以歼灭，以粉碎敌人由新黄河沿岸进行游击的企图，以分散部署于各要地的警备部队，经常地反复进行讨伐，多次进行由师团长指挥的大规模扫荡作战，一扫管区内的残敌和匪团。另外，恢复自卫组织(指伪军一译者)，奠定了治安的基础。

驻蒙军及独立混成第二旅团的肃正讨伐

一、1939年度驻蒙军的治安肃正概要

驻蒙军根据方面军的计划制订的年度治安肃正计划，努力促进占领地区内的安定。然而，由于形势的变化，在第三期，还实行了对管区外的太行山脉肃正作战、五原进攻战等计划外的大规模作战。另外，由于诺蒙坎事件的刺激，加强了对苏、对外蒙的戒备。

首先，在第一期中，骑兵集团划归方面军后，于三月上旬，使之接替了第二十六师团及蒙古军在包头、固阳、萨拉齐地区的警备任务。各兵团为了扩大治安圈，高度分散部署兵力，积极进行肃正讨伐。但是，共军以内长城线山岳地带为根据，逐步增强其部队的战斗力，而我方仅以小部队进行奇袭的战法，往往不能应付。另外，为了摧毁敌根据地而实施的长期间、广范围的作战，使用大队以上的兵力进行，实为必要。(注:4月，在国民政府军发动春季攻势时，我军先发制人，以春季反击战粉碎其春季攻势。)

在第二期中，努力肃清内长城线山岳地带之共军及阴山山脉国民党游击队和匪团，同时谋求扩大治安地区，完成部队的分驻。于8月将安北及涞源县划入方面军的作战区。安北是在4月春季反击战时即行占领，由骑兵第十四联队担任了该地的警备。涞源县的防卫任务(不包括行政)，8月20日由独立混成第二旅团接替了第一一0师团。由涞源通往保定一线的南部地区，治安极差，主要利用由涞源通往北方的道路。从而，主要以地形上的理由，将其划归驻蒙军的作战地区。

进入第三期时，管区内的治安肃正工作大有改进，另一方面，如前所述，

对管区外实行了大规模的肃正作战和进攻战。

以独立混成第二旅团的行动为中心，记述如下:

二、独立混成第二旅团的肃正讨伐

1.谢家堡附近的讨伐

旅团于1939年度上半年，为了肃正涿鹿、怀来、蔚县，前后6次进行了谢家堡讨伐作战。谢家堡位于接近涿鹿县南境的内长城线以北地区，是在北拒马河上游山岳地带的共军根据地。为了逼近谢家堡，旅团除进行上述讨伐外，各部队相继击破敌人据点，推进驻兵地域，对抱有敌意的居民施行怀柔政策，努力扩大治安区，进而摧毁其根据地。

再者，军于进行“春季反击战”之际，旅团曾实行“宣、涿、蔚三县附近肃正作战”，以期改进管区内的治安。

2.灵邱周围的讨伐

旅团于1938年10月进驻灵邱县，至同年底连续进行三次讨伐。但是，因该地区是接近中共晋察冀边区中心的根据地的一部，尤其是灵邱南部山区是以上寨、下关镇为根据地的共军势力范围，故肃正工作极为困难。其村政权是由党所领导，居民从儿童到老农都彻底受过抗日教育的训练，壮年男子被征参军，各个村落均设有训练所。

1939年6月初以来，共军的行动转趋活跃。不仅在灵邱县，即便在浑源、应县也在农民中强制征兵，企图扩充部队。同时，尽力组织各地居民，建立游击队，整备通讯联络设施。因此，旅团必须摧毁其策动的根源。7月，进行了下关镇附近的肃正讨伐，但因雨未获成果，仅扫荡了灵邱以北地区的土匪。

10月，当旅团将灵邱地区防务移交给第二十六师团时，利用兵力会合之际，与该师团独立步兵第十二联队协力，再次对下关镇附近进行讨伐。24日开始行动，28日凌晨急袭下关镇，但共军早已退避，未曾发生大的战斗，摧毁各种根据地设施后，于30日返回灵邱。(注:灵邱、涞源县将是确保治安极为困难的地区)

3.涞源县的警备

1939年8月，独立步兵第四大队移防涞源县。20日，与第一一0师团的该地警备部队进行了接交。

涞源县，以内长城线分为南北两地区。南部地区占总面积的三分之一，因大部分为山地，故道路险恶，尤其是山区内道路两侧，悬崖峭壁较多。共军利用地形，经常伏击我运输部队。因此，地形险峻的南部地区的道路，由于治安不良不能通行。在北部地区，运输联络也必须严加警卫。

当地居民大部从事农业，但因产量不多，贫穷落后，人民生活极为困难，我县行政威令仅能及于驻扎地周围与主要道路附近。与此相反，中共势力则早已渗透全县。杨成武指挥的共军独立第一师即在该县编成，居民和士兵间多有亲友关系，互相保有深厚感情。因此，我警备部队在其军、政、民一体的敌性地区中，仅能保持着点与线的状态。

4.第三期治安肃正计划

旅团于1939年秋以来，对管区内东部及南部山地，彻底实行了肃正讨伐，同时，促进实现各项建设措施，以图强化治安。10月10日，旅团发布的第三期治安肃正计划如下。

1939年度第三期治安肃正计划

第一 方针

一、本期肃正旨在扩大第二期肃正之成果，同时实现军政民一体，期使治安日益加强，从而进一步促迸切实可行的建设措施具体化。

二、工作要点，对东部及南部山地，为了扫荡共匪巢穴，应以武力讨伐肃正为主，对其它地区，为实施各项建设措施，应以一般肃正工作为主。

三、加强，扩充地方警备机关，与促进治安工作相结合，于期末基本上能以实施中队的集结为目标。

四、本期自本年10月至1940年3月，为期6个月。

第二 要领

其一 军队进行的付伐肃正

一、各警备队之部署大致不变。

二、各区警备队仍继续实行高度分散部署兵力，在东部及南部山地内结合修筑道路，将一部兵力向前推进，分驻于内长城一线，防止匪贼入侵警备区，同时以之作为扫荡共匪之据点。为此，其一部兵力分驻如下:

1.怀来区警备队　谢家堡附近

2.蔚县区警备队　倒水口附近

3.涞源区警备队　独山城及东圈堡附近

三、东部及南部山地地带的讨伐，除由原来负责的警备队进行外，随时以旅团主力进行讨伐。

四、对其它地区出没无常之敌，应不失时机地由各分散部队自行出动讨伐，以期促进一般治安工作。

五、各分散部队，应尽力进行积极果敢的讨伐，更需注意与邻接部队的联络和协力，不给敌人以任何喘息机会。

其二 一般治安工作及新秩序建设措施

一、要领

地方警备机关的活动及一般治安工作.必须与军队的讨伐密切结合，同时加强警备用的道路及通信设施，以使居民安居乐业，促进和平建设。

二、关于地方警备机关

1.对政府警察机关及铁路局路警，进行指导训练，以期提高其能力，使之逐渐能以独立进行讨伐，确保治安，并能胜任铁路的守备。

2.警备机关之配置，必须适应治安状况。应做到期末进行中队集结时，在确保治安上，也不得发生任何差错，

3.对自卫团，随着警察机构的增强，逐步进行整顿，以期提高其素质，同时，尽量收回民间枪械，并减轻居民的财物负担。

三，对东部及南部山地内之共军有关粮秣的处理

1.为确保农民所有粮秣，不被匪团利用，责成政府有关机关，将村民收获的粮草运往安全地带，加以管理。必要时，可派遣军队进行保护。

2.进行第一项措施时，尚须保护其它地区的粮株不被掠夺，并严加监视向山地内运入粮秣物资，绝对防止共军获得粮秣。

四、户口调查及民匪分离

严密实行户口调查，并在各户安设门牌，以防止残匪尤其是匪首的潜入，而且便于搜查，特别是冬季旧正月前后，更应注意实行。

为了防止匪贼潜入，提高宣传、宣抚效果，应努力作好民匪分离工作。

五、关于青少年的训练

对青少年应加强训练，以期提高其素质，并尽力对受训者进行表扬和利用，从而通过此等青少年，促进一般人的思想觉醒。

六、警备道路、通信设施的整备

在修复被水灾破坏的道路的同时。应迅速修筑下列各道路。

1.察南管区内

(1)西河营一王喜洞道路

(2)明铺一王喜洞道路

(3)磐山堡一柳树王一太平堡一谢家堡道路

(4)桑园一沿河城道路

(5)永宁一大庄户道路

(6)延庆一对九石道路

(7)蔚县一端骨町一阳原道路

(8)北水泉一瓦窑庄道路

(9)西河营一永宿一洞沟道路

(10)永宿一倒水口道路

2.涞源县内

(1)上庄一东圈堡一洞沟道路

(2)涞源一腰站道路

(3)涞源一牌坊一独山城道路

七、宣传、宣抚及救济抚恤工作

1.方面军及政府均应熟悉治安的恢复状况、各种建设的进展实情、民生向上的真相等，藉以抵制敌方荒唐无稽的反宣传。适当作好抚恤工作，尽量收揽民心，使之依附日本。造成支持新政权的形势，从而提高建设东亚新秩序的意志。

2.利用飞机散布宣传文件，并于出动讨伐时，配备宣抚班随行，相机作好战地宣传工作。

5.涞源县南部地区的讨伐战(1939年10月31日—11月8日)

旅团根据前述第三期治安肃正计划，企图肃正涞源县南境方面的共军地区。于11月上旬，对该方面进行讨伐。当时，盘踞在该地区的独立第一师、游击第三支队等，似以走马驿镇、倒马关、银坊、乔家河附近作为根据地。

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于10月下旬对灵邱方面进行讨伐以后，率领独立步兵第一大队(大队长:辻村宪吉大佐)到达涞源，当即命令担任该县警备的独立步兵第四大队(大队长:堤赳中佐)进行讨伐准备。

31日，旅团长作了必要的部署:“堤讨伐队从插箭岭，首先对走马驿镇之敌，辻村讨伐队从白石口，首先对银坊之敌，分别进行袭击，11月2日半夜以后，开始行动。”

两讨伐队2日半夜，从长城线出发。辻村讨伐队3日晨，到达雁宿崖南方险峻的长隘路时，突然遭到共军的伏击，讨伐队立即展开攻击，极力奋战，但共军的士气也很旺盛，激战持续终日。

3日午后，旅团长得知雁宿崖情况后，立即采取措施增援辻村讨伐队。但是，共军在我增援部队到达以前，于4日凌晨前，即已撤离战场。

5日，旅团长判断“敌主力已向司格庄方面退走”，决定“迅速追击敌之主力，并将其捕获”。于是命辻村讨伐队为前卫，并部署其它各队，准备6日早出

发。5 日晨，新调入的独立步兵第二大队(大队长: 中熊直正中佐)主力到达该地。

6 日晨，旅团按照预定计划开始前进。途中驱逐小股敌人后，于同日黄昏，进入黄土岭村落。当面之敌并不与我正式交战，仅保持着接触而潜伏于四周的山中，估计敌主力已向乔家河方向退却。次晨旅团长根据敌人的行动，作出以下判断，“敌以一部引诱我方，而主力向黄土岭附近集结，企图从我旅团背后，进行攻击。”因此，旅团作了返回部署。前夜以来的大雨虽已转小，但浓雾弥漫，遮蔽了视野。

7 日正午，各队开始行动时，潜伏于各山顶之敌，突然转入反攻，将旅团完全包围，各处展开了激战。

16 时过后，旅团长进至堤讨伐队后方，听取了大队长的情况报告后，将指挥所迁至附近的一家独院中，立即召集各队接受命令。在准备下达整理战线的命令时，突然飞来迫击炮弹，于里院爆炸，旅团长当即死亡，旅团参谋等尽皆负伤。共军使用迫击炮，这是第一次。

尔后，各讨伐队各自继续战斗，将所在之敌击溃，于 8 日午后，占领了黄土岭一带高地。同日黄昏，独立第三大队长绿川纯治大佐到来，担任旅团的指挥(后称绿川支队)，并对附近进行了扫荡。但是，在战场上，始终未发现敌人。各队损失虽然轻微，但苦于缺乏弹药粮食，只是受到空中的补给。9 日夜。独立步兵第五大队(大队长: 森田春次中佐)到来增援。其后，支队在军的指挥下，为彻底肃正讨伐，进行了作战准备。

与我交战的共军，是以独立第一师第三团，独立第四师第二团、教导团等约 5000 人为主力的精锐部队。

三、太行山脉肃正作战（1939 年 11 月 11 日—12 月 7 日）

在驻蒙军中，阿部中将战死的消息，引起对事态的重视，从而对旅团努力加强了各种增援、补给措施及侦察联络。

在此以前，第一一 0 师团为了策应独立混成第二旅团的讨伐，于 6 日，派二个支队.从唐县、完县(保定西方)出动。10 日，其一支队进至银坊附近，与绿川支队取得联络，另一支队进至梁岗(完县北方约 45 公里)附近。此外，以第二十六师团编成的石黑支队(支队长: 独立步兵第十三联队长石黑岩太大佐)，也于同日逐次到达涞源附近。因此，驻蒙军决定“与第一一 0 师团协力扫荡银坊、走马驿镇附近的残敌，并于 10 日午后，作了必要的部署。但是，方面军改变了趁本次讨伐之机实行大规模肃正作战的决心，10 日傍晚，对各兵团下达了命令。其设想是“驻蒙军首先对涞源县东南地区，继而对西南地区，第一一 0 师团(配属第二十七师团的一部).对满城北部及阜平地区，分别进行肃正讨伐，第一军的一部，从五台方面进行策应”。这一计划是想要彻底摧毁华北中共势力的最大根据地，实行长期的讨伐。

驻蒙军以军参谋长为首的战斗司令部(设于涞源)，进行了作战准备。当前的共军扩大了监视网，并以一部经常扰乱我军后方，但其主力的动向不明。

当时蒙古联合自治政府的最高顾问金井章次，为了实行与本作战密切结合的政治工作，曾于涞源县设置办事处，进行了民情调查、宣传宣抚、警务组织等各项准备工作。

11 月 16 日至 I9 日，对涞源县南部地区进行了扫荡，但各队均未遭遇大股敌人。

23 日，开始第二期作战，25 日，占领了共军根据地阜平。共军回避交战，分散隐匿而退，其主力似向山西西部方面退却。各讨伐队因地形险恶行动迟缓

(行军时速，平地约 3 公里、山地约 2 公里、夜间减半)，不能捕获敌人。除将兵工厂、被服厂,粮秣屯积处、印刷所等全部焚毁外，并没收了文件及纸币。对残留的居民，进行了宣抚工作。

28 日。由于敌情变化，发现有强大的共军部队在东部地区出现。方面军遂变更计划，命令驻蒙军与第一一 0 师团对完县北部刘家台地区进行扫荡。因此，各支队停止西进，开始返回。

30 日以后，作战进入第四期。每当各支队进攻时，共军便立即退避不与我交战。因此，各支队彻底破坏了根据地设施。于 11 月 7 日，逐次返回原驻地。

注：石黑支队为了 6 日返回驻地，当走出山地将要乘车时，受到尾追共军(约 300 名以上)的攻击，支队对此予以严重打击，使敌人溃逃。在为期一个月的本期作战中，这是支队唯一象样的一次战斗。另外，在本期作战中，驻蒙军的损失是战死 4 名，负伤 10 余名。

第一一 0 师团地区的治安肃正

该师团实行 1939 年度第一期治安肃正时，将河北省东半部(冀东道及津海道的一部)的防务移交给第二十七师团后，改为担任河北省西北部(当时的保定道及冀东津海道的一部一后为燕京道)的防务。因此，防卫地区缩小一半，致使兵力充裕，治安肃正工作立即呈现活跃。至第一期末，管区内 38 个县中，除阜平县外，大致掌握在我手中，并完成了在平原方面的分散部署。

师团的配备，师团司令部所在地保定周围地区，作为师团直辖地区，以特种部队与步兵部队同样实行警备。步兵第一 0 八旅团于北京，步兵第一三三旅团于定县。各设司令部，分别担任保定道各半部的防务。在开展治安工作时，以大据点为中心，将小据点按卫星状态加以部署，构筑连结各小据点的呈放射状的汽车公路。其次，小据点再相互连接，形成环状线。尔后，将据点进一步向外推进扩大，修筑与上述相同的放射、环状道路。这样，环状线内的治安，有显著的恢复。

以下介绍冀南道正定县及保定道高阳县的状况，作为当时河北省内治安状况的一例。

注:华北方面军，调查了 1939 年度第一期治安肃正各项工作的现状，为了研究应进行补充和修正的事项，以及收集将来的政治经济工作基础资料，由司令部选用专家，组成调查班，秘密派往各方面。调查重点，主要是选择特定地区，进行彻底的调查，以了解共产势力的政治经济工作及其影响。本稿是 1939 年 3 月 1 至 29 日，由司令部嘱托江上利雄、佐佐木义武所作的调查报告。

河北省内治安状况调查报告(摘要)

冀南道的一般政治形势

通过此次空前的肃正讨伐、清乡工作，区域内大部地区行政机关的组织，正在进展中。截至 2 月末，全部 55 个县中，县长、联络员均已进入的县有 15 个，仅县长进入的县有 13 个，县连络员进入的县有 4 个，代理县长进入的县有 7 个，设有治安维持会的县有 5 个，任命县长而未进入的县有 5 个，未开展工作的县有 6 个。

过去，在河北省中南部地带，一般都说“皇军的占领区仅是点和线”，但现在，线在延长，点在增加，单线发展成网状线，局部的各点扩大到全区，个别地方正在由点发展成

面。在那里，军的宣抚班、治安维持会、县政府等一系列政治经济工作，得到强有力的开展。为了治安、作战、经济的复兴，必须将交通运输、通信机构的恢复、整备、创建等工作放在首位，这些工作目前也正在稳步进展中。随着治安的恢复，离铁路沿线较远的内地物资也已进入市场。

此次清乡工作，到现在虽已逐渐就绪，但从全面看，还只是处于初期阶段。由于匪占地区范围较广，实际上即使在已经肃清的县份，我方威令也只能达到县城附近。

山西省的山区是八路军的集结地带，平原地区的国民党部队，经过此次讨伐已被驱散。但冀南中心地带，仍有不断分散移动的敌匪中小部队，剿匪工作尚有很大困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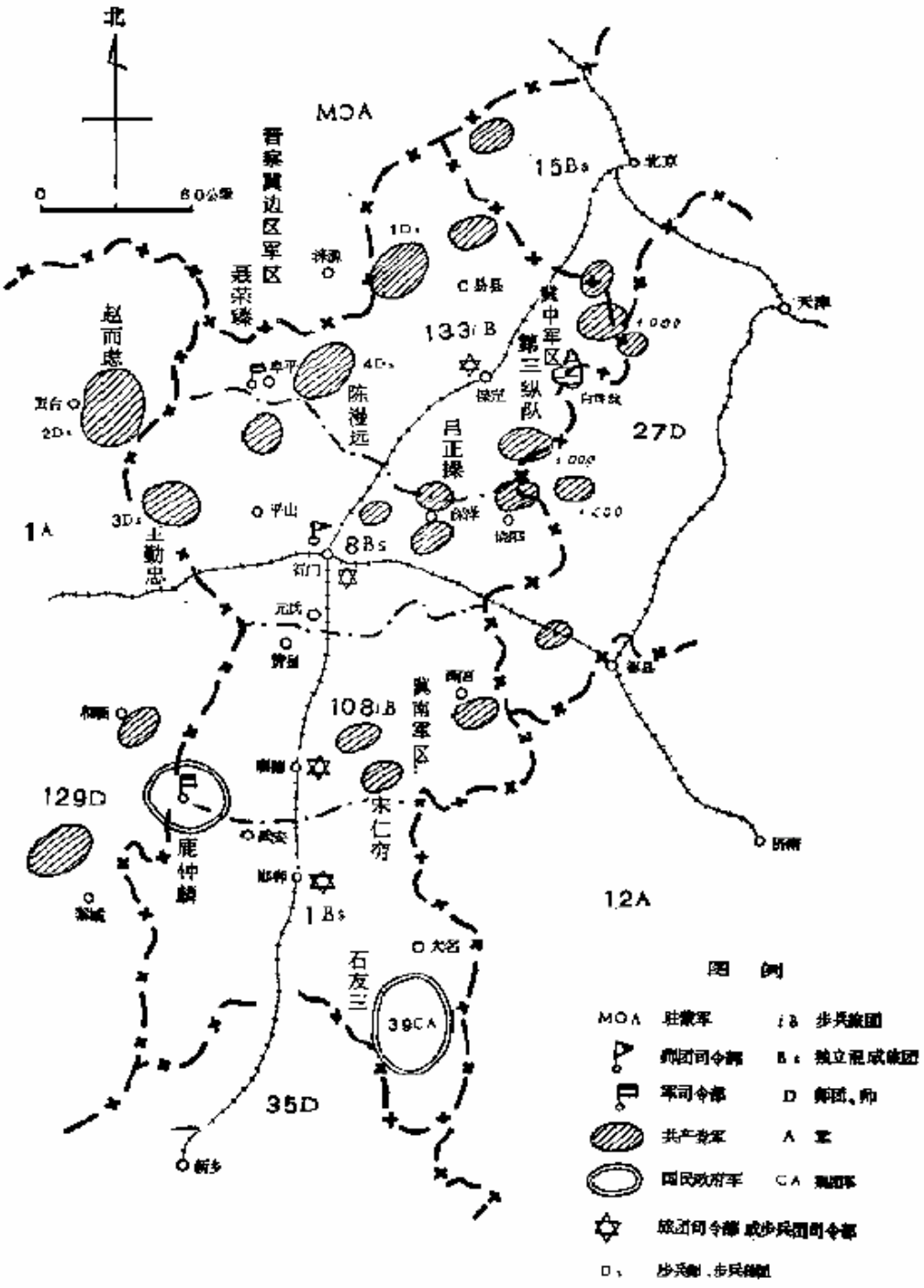


图3 · 第一百一十师团管内敌情概况图

(1940 年初)

另外，在现阶段，临时政府的省，道、县政府等一系列中国方面的行政机构，始终未能达到中央集权的程度。特别是县政府的行政，并未能执行临时政府的统一指令。实际上是以日军兵团长及其政务幕僚担任的特务机关长，承担县政的领导。当然县政的直接领导，是由驻扎该地的部队长担任，并由特务机关派遣县联络员予以辅助。因此，冀南道一般的政治经济指导方针，石门特务机关长是心中有数的。(以下笔者略)

正定县的政治状况

皇军进入正定县是 1937 年 10 月。保定陷落后，正定县人吴赞周(现河北省省长，日本陆士毕业，前东北军中将)深知皇军的坚定决心，为防止城内居民逃亡，作了很大的努力。皇军入城时，协助组织治安维持会，并和当时的军宣抚班结成一体，努力掌握对群众的宣抚工作，使治安维持会的内容，逐渐具备县政府工作的萌芽状态。1938 年 2 月，终于解散了维持会，开始由县政府进行工作。治安维持会的工作人员，全部成为县政府的新职员。同时，宣抚班撤出正定县。同年 6 月，设立新民会的县指导部，接着县联络员到任。至此，该县已具备了建立新秩序的条件。从而至 1939 年 3 月，日军警备队、县政府、新民会等军、政、会三者，成为正定县新的政治经济领导力量。

本县人口、产业的状况，摘要记述如下。

一，人口

事变前 城内 19,657 人 城外 246,807 人 共计 266,464 人

事变后(1938 年 7 月) 城内 20,351 人 城外 244,563 人 共计 264,904 人

总的来看，减少了 1,500 人。其中城内人口的增加，乃是由于从县内治安不稳地区逃到城内避难的增多了。

二，产业

事变前运出产品，棉花约 240 万斤，花生 130 万斤，上等土布 10 万斤，蔬菜 5 万斤，上等土布在绥远方面，其它在天津方面上市。运入产品主要是，食盐 150 吨，谷类 2 万余石，此外尚有煤、布匹、石油、烟草等，事变后，城内居民和其它县一样，主要是商业资本家未向京津地区逃亡，随着农村全面的平静化，城市与农村间的联系，也正在逐步恢复。

国共两党的活动状况

事变前，从本县国共两党的活动情况来着，共产党员在西安事变后进入该县，针对该县是地方教育中心的情况，着重对中学的教员、学生进行工作。因此，事变当时，这些党员及各学校的教员、学生，几乎全部逃亡。国民党于 1938 年(年代疑原文有误一译者)设立国民党党部，专门对青年进行训练和指导，但党的基层组织并无任何发展。至事变前，党部被撤消，踪影全无。其后，从事变后到最近，在作战的关键时期，八路军趁我后方警备能力薄弱之际，从山西省五台方面窜来，深入开展抗日游击工作。通过八路军政治部及晋察冀边区政府领导下的正定县共产党政府，进行抗日群众组织与动员工作，几乎席卷了正定县西北部的各个乡村。

另一方面，县的东南部迄今仍属国民党的势力范围，并受其指挥。在西北部一带的共产党地区，存在着经常转移、地点不明的共产党县政府;东南部地区也同样存在着经常转移、地点不明的国民党政府。因此，调查员 3 月上旬到达该地时，正定县内就有临时政府(即亲日的正定县政府)、共产党县政府和国民党县政府三个政权同时存在。当然，大部敌匪被肃清，武装的对抗势力已无明显活动，但仅其地下的秘密政治工作，便成为异常复杂和难以对付的问题。

全县的 240 个村庄中，能够执行县政威令的村庄，只不过 94 个，就连这 94 个村庄，在夜间也有很多靠不住的。如果能了解敌匪和敌政府的根据地，日军便可及时对其进行讨

伐。但是密探的敌情报告一般都不准确，故每当讨伐之际，多半是村民挥动着太阳旗表现出欢迎的姿态，只要在村民中不出现叛变的人，便很难识别穿便衣的敌匪。

挥动太阳旗的敌占区村民，即使遵守亲日新政府的法令，他们也不接近县政府，因为如接近县政府就会被敌匪断送他的性命。所以，如果对敌占区村长或村民的生命财产采取过分手段，则不仅白白地给敌匪提供反宣传资料，还会增加群众的对日恐怖心理，结果往往是得不偿失。当然，在县城驻扎警备的日军，如能进一步对乡村的各个要地实行分散驻兵，问题将会得到解决。但是，这在兵力上是无理的要求。县政府的自卫队如能于乡村重要地点实行分散驻兵也可以，而目前似乎还不具备这种实力。

因此，日军必须以绝对优势的武力为基础，在政治、经济、文化工作方面采取比敌方更为优异的措施，推动敌我势力中间的乡村，使之归附新政权方面，此外别无良策。另外，在正定县，作为工作的一种手段，正在慎重地研究对敌占区的经济封锁问题。

保定道的一股政治形势

随着治安肃正工作的进展，保定道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治安恢复的地方，仅限于铁路沿线和以主要县城连结的地带。政治恢复的状态，在全道 17 个县中，县长、联络员均已入城的有 10 个县，仅县长入城的有 3 个县，日军入城而县长未入城的有 2 个县(定县，阜平县)。因此，在保定道全面的政治领导及政治活动，有待于河北省公署迁往保定及特务机关开始积极活动后，才可望得到发展。

高阳县的政治状况

高阳县位于保定东南约 32 公里处，该县人口、产业、治安等状况如下。

一、人口、行政区划及人口的增减

全县约 3 万户，人口约 18 万，行政区划是在县政府下分为 3 个区、144 个乡。

1937 年 9 月，日军占领保定时，城内人口约 18,000 人。10 月，日军进行第一次轰炸及传闻八路军即将入城时，城内人口减少到 2,000 人。11 月，吕正操率领八路军 1,500 人入城，由于征集粮食及其它物资，仅仅留下的极少数地主等人也逃亡了。第二次进行轰炸更加快其逃亡。据说居民仅剩 1,000 人。12 月，日军进入该县，驻扎约 4 个月，难民陆续归来，其数目恢复到 4,000 人。

然而，1938 年 4 月，日军撤出县城的当日，吕正操率领八路军 1,000 余人再次入城，居民惧怕对汉奸的镇压及遭到轰炸的危险，仅数日便减至 2,000 人。9 月，由于进行第三次轰炸(居民 20 余人死亡)、以及 1939 年 1 月 23 日的第四次轰炸，致使居民全部离散。

1939 年 1 月 28 日日军入城时，仅有 100 多名极贫困的居民。其后，随着治安的恢复，居民陆续增加，至 3 月末，城内的居民大约有 3,000 名。

二、产业

高阳县是华北的著名工业区，主要为织布和染料，在县城附近有许多拥有动力机械、织布机械的现代工厂，年产棉布约 90 万匹，麻布约 15 万匹。农产品则有高粱、小米，小麦、棉花、玉米、豆类等，但因全县粮食不足，尚需输入三分之一。

事变后，大部工厂因逃避战祸而停产。

三、治安状况

该县的政治工作是由驻扎部队、县政府、宣抚班、宪兵队协力推进的。由于八路军吕正操的势力强大，只有县城周围的治安能够确保。

调查员逗留期间，通往保定的道路经常被破坏，很多电杆被截断，深夜还可听到枪声。

在县城内，居民虽逐渐增加，但全属贫民，工商业资本家无回城者。事变前很兴旺的工厂，如今则大门紧闭全部停产，城内的街道使人感到死气沉沉、毫无生气。

该县的农民极端贫困，城内居民大半沦为乞丐，部队的剩饭招来一群群饥民，形成一派悲惨凄凉的景象。

四、县政

第一次日军入城时，曾一度成立县政府，施政四个月，即随日军一同撤至保定。今年2月上旬，县公署再次设立。然而，租税收入分文无有，保卫团等组织也未能建立。在此情况下，首要工作是鼓励居民回城，为此，与部队协力积极进行活动。至于正式的行政事务，要等工商业资本家的归来，城市与农村的经济联系基本恢复后，才好开始实施。

五、抗日势力的活动状况

吕正操军队自1937年11月起的1个月及I938年4月起的10个月，前后于高阳县两度施政。第一次入城时，军政负责人颇有威望，施政仅一个月，深得民心。其善政之一，就是宣布全部豁免田赋。第二次入城后，其政治工作与第一次军政治部成员的政治工作不同，将该县隶属于1938年1月成立的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之下，调整了县的行政机构，施行了带有浓厚共产主义色彩的正规行政工作。(以下行政实施状况及同时期的群众生活实情从略一笔者)

师团继上述第一期工作，推进第二期治安肃正工作，并逐步取得了成果。8月，将以北京为中心的地区(后为燕京道)，移交给新建的独立混成第十五旅团，同时并使之担任冀南道的防务。10月开始的第三期治安肃正工作，在师团长桑木崇明中将10月20给现地视察的侍从武官所作的情况报告中，介绍其工作要点如下。

情况报告(摘要)

(以上略一笔者)师团的治安工作，在彻底地实行兵力分散部署下，使警备道路及通信网整备完善，并通过分散、集中及机动的方法，剿灭残匪。同时，将杜绝共产党抗日团体的活动作为首要任务。依靠训练青年与宣传、宣抚工作，努力收揽民心。实行户口调查，以使民匪分离。收回民间武器，并依靠加强警察力量，实行保甲制度等措施，增强自卫能力。现正紧密结合这些工作，努力扩充县政，发展民营事业，实现王道乐土。

迄今，其工作情况(包括京津地区原管区在内)如下。

一、应急道路

总长 约3,965公里

动用人员 约1,737,000人

二、警备用有线通信网

军用电话线总长 约1,034公里

警察用电话线总长 约600公里

三、青年训练及自卫团

青年训练所 约545处

青年训练结业者 约80,790人

自卫团员 约64,700人

四、无条件投降

投降匪数 约7,260人

收缴降匪枪支 约4,750件

师团根据当前方面军的指示，从本年10月至来年3月间，进行第三期治安肃正工作，

继续采取分散部署，力求训练周到，严肃军纪，并将工作重点置于模范肃正地区、铁路、主要道路、沿水路的两侧地带及开发资源地区，努力扫荡残敌，剿灭地下潜伏匪团，扩充整备自卫组织，制订计划彻底地实行治安工作，以期取得空前的肃正成果。此项工作正在逐步实施中。

注:师团总兵力为步兵 21 个大队，临时编成部队 6 个小队，骑兵 2 个中队，辎重 2 个中队，共计 90 个中队(722 个小队)，其分驻情况如下:

分驻 / 部队	铁路沿线外分驻地点				铁路沿线上分驻地点	合计
	中队以上(包括中队)	小队以上(包括小队)	小队以下	计		
步兵第一三三旅团（津田部队）	8	28	18	54	18	72
独立混成第八旅团（水原部队）	4	13	56	73	70	143
步兵第一 0 八旅团（石井部队）	1	25	44	70	41	111
独立混成第一旅团（谷口部队）	1	25	25	51	38	89
直辖部队		11	10	21	19	40
合计	14	102	153	269	186	455

师团负责警备面积，66,248 平方公里

占领地区，47,284 平方公里(约占 72%)

未占领地区，18,964 平方公里(约占 28%)

1 个中队平均负责地区 736 平方公里(如除去未占领地区为 526 平方公里)

师团负责范围的铁路总长 711 公里

直接警备兵力 14 个中队

1 个中队负责的警备范围 50 公里(1 公里约为 3 人)

师团交战次数，1938 年 8 月—1339 年 10 月约为 2,250 次(每日平均约 5 次)，敌人遗弃尸体约为 36,260 具，师团阵亡者为 533 人。

其次，关于第三期后半期的情况，概述如下:

1940 年初，当时师团的作战主任参谋中村三郎中佐(后为少将)对主要敌人的动向，作了如下的叙述。

一、管区内的敌人，使日军最感棘手者，为冀西及冀中军区的共军。彼等以省境及日军作战地区附近，或沼泽、河流等日军势力不易到达的地区为根据地，进行巧妙的地下工作及灵活的游击战。因此，了解和掌握其动向，极为困难。

二、共军的情报收集、传递，非常巧妙而且迅速。日军的讨伐行动，往往在事前便被侦悉。到处都有彼等安插的密探。就连日本方面的雇佣人员，对他们也必须提高警惕，以防他们通敌。与此相反，居民则害怕以后受害，几乎无人提供关于共军的可靠情报。

三，共军的行动轻快而敏捷，熟悉地理，因而无法捕获。相反，日军却多次遭到共军的伏击。另外，共军在白昼不进行集体活动，混在群众之中，不露形迹。

河北省特务机关，对 1940 年 2 月管区内的治安状况，概述如下。

一、国共激战的结果，国民党军败退到河北省南部，加之，盛传最近即将成立新中央政府，使彼等士气大为沮丧，国民党游击队的投降倾向显著，已至日趋没落之地步。与之相反，共产党八路军所取得的地盘，则占有保定道的全部、河北省80%的地区。如今，河北省成为中共独占的活跃舞台，这给抉植、建立新中央政权，带来致命的打击。

小匪团仍在暗中蠢动，反复持久地对铁路交通、通信网、列车、汽车运输以及对乡村进行破坏和袭击。同时，各伪县政权、征收机构等为了加强抗日战线而奔走不息。另一方面。渴望和平的农民，虽早已无法忍耐彼等的物资要求，但因惧怕匪团的暴力。只有对其屈服。此等情况，对于我方民匪分离工作，已构成严重的问题。

二、共产党的新动向

1.日英离间工作(天津党机关的指令略——笔者)

2.利用粮食缺乏，偏动群众(掠夺粮食、放火等扰乱工作指令略——笔者)

3.打入新民会工作(笔者略)

4.关于利用烽火进行联络的整备、训练工作(笔者略)

5.共产党匪团的动向

冀西、冀中军区共军，经过我多次肃正作战的创伤，尚未恢复，估计不至采取积极的行动。然而，冀察热挺进军侵入东斋堂方面，冀中军区与石友三军交战而南下的都队，已于2月28日结束战斗。正在逐渐返回旧地盘。

三、国民党军的动向(笔者略)

四、八路军的抗日工作

1.加强各种抗日团体。2.为内地匪团运送粮秣及被服。3.通过反宣传扰乱日军后方。4.宣传共产主义。5.除奸工作。6.严禁向日军占领地区运送粮秣及棉花。7.没收联银券。8.强行绑架受过日军教育的青年训练所毕业生。9.破坏、袭击铁路、交通、道路、电线、运输机关。10.征集新兵。11.为了瓦解治安军及其它武装团休，对其家属施加压力。12.合理负担、减息、改善生活。(各项说明笔者略)

五、河北省管区内各县收入情况(与事变前比较)

项目 管区别	A.事变前年度收入概算	B.1939年年度收入	比率B/A
河北特务机关管区	1,882,070,700	233,263,334	13/100
天津特务机关管区	5,651,293,700	3,185,065,061	56/100
北京特务机关管区	1,559,058,340	901,489,189	57.1/100
石门特务机关管区	5,248,398,000	517,975,897	9.88/100
河北省管区总计	15,182,682,740	5,626,860,370	36.6/100

进入1940年，师团对管区内外之敌，进行了积极的肃正讨伐，力求扩大治安恢复地区。特别是敌根据地，因处于防卫地区境界附近，曾多次与邻近各兵团共同进行讨伐。

另外，在此时期，由于国共对立激化，造成日军、共军、国民党军三者相互作战，结果，国民党军丧失了势力。

其主要情况如下。

一、获鹿、元氏西部山地的讨伐

1月中旬，水原重义少将指挥的独立混成第八旅团，在石门西部山地进行肃正讨伐中，得到国共两军正在获鹿南部地区交战的情报，旅团立即对之加以攻击，使国民党军在元氏

西部山地受到日军与共军双方的夹击而覆没，其后，共军迅速逃避。

二、赞皇及临城西部山地的扫荡

步兵第一0八旅团(旅团长:石井嘉穗少将)1月下旬在赞皇、临城西部地区，对国共两军进行扫荡，摧毁了根据地的设施(行政公署、抗日学校、兵工厂等)。

三、冀中及冀南的肃正工作

2月上旬，吕正操指挥的冀中军区共军，进逼国民党系统的石友三军南下时.冀县警备队于该地南方，将吕军的一部击溃。2月中旬，师团又收到吕军主力再次南下攻击石军的情报，当即出动主力。主要目的是要击溃吕军，怀柔石军。但是，石军受到吕军的进攻，损失甚大，并向大名以南败退，于是吕军扩大了地盘。另外，师团虽于 3 月初进行了讨伐，但未能找到吕军的主力部队。

除上述外，师团对冀中、冀南平原地区共军根据地，进行了强有力的肃正讨伐，给中共方面以深刻的影响。

1940 年 5 月 15 日的新华日报(中共机关报)，登载了冀南地区日军扫荡战和共军游击战的消息，其中叙述了日军第一一0师团及第二十七师团于1940年初开始进行激烈扫荡，致使中共方面陷于困境，对日军的行动，给予极高的评价。同时，对中共方面的反扫荡，作了自我吹嘘，并阐述了冀南平原游击战的特点以及今后的方针政策。

冀南的“扫荡”与“反扫荡”

(宋仁穷将军访问记)(未与中文原文对照一译者)

注:本资料是1940年7月11日，独立混成第一旅团的邑城警备队在西家庄(武安北方约10公里)附近的战斗中缴获文件的翻译资料。括弧内标题的宋仁穷，当时为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副主任兼冀南军区司令。

其一 冀南现状(笔者略)

其二 日军的军事进攻方式(笔者摘要)

日军在战略上的进攻，采用了“分进合击”与“分区扫荡”两种方式。去年1月大扫荡时，日军由数路进兵，实行“分进合击”，夺取了城市及我方据点。继而，在今春扫荡时，完全采取了“分区扫荡”的方式，并且逐渐采用了战术上的“分进合击”，将几个据点的兵力集中于一处进行合击。其目的在于歼灭我小部队，破坏我政治机关和群众团体，并增设小据点，建立伪行政机关，从而扩大其占领地区。

日军在平原地区的扫荡战，在战术上有许多特点，即:

一、惯用以快速部队采取“分进合击”的方式。

二、努力探知我方情况，进行袭击和伏击。

三、行军时一般都避开沿公路的村庄、森林等隐蔽地，归路与去路各异，以防我方的伏击。

四、战斗时一般首先进行火力支援，其后分成小部队，徐徐接近我方。

五、日军在各兵种间的配合，比较周密良好，射击也较准确。另外，战备优良，部队的运动性较大，但有与民众脱离、地理不熟、不信任伪军等弱点。

其三 我军反扫荡的方式（笔者摘要）

我军的基本方式是采用游击战，但在有利的条件下，并不放弃运动战。第一时期即敌人分成数路，进行“分进合击”的扫荡时，我方集中主力.首先打击敌人的一路，尽力粉碎敌人的围攻。在第二期，敌人完全占领城市，并以快速部队实行分区扫荡时，我方即以小

部队为单位，进行游击战。此时，地方游击队的活动甚为重要，八路军从自己的部队抽出一部，于各县配署一个连的兵力，作为游击队的骨干，进行游击训练。现在冀南地方游击队，大部均能独立进行战斗。尤其凭借两年多的平原游击战的宝贵经验，在警戒、侦察、宿营、行军、通信联络等方面，显示出较大的进步。另外，在作战上，对伏击、袭击、进攻、撤退等，也都考虑到平原地区特殊的战法。特别是平原地区与山地游击战相比，敌人具有强大的火力，而我方的装备、军事、技术素养等又居于劣势。但是，我方精通地理和熟悉民情，能自由来往于冀南各村落之间。这主要是由于我们与群众具有密切关系的平原游击战的基本条件。

其四 敌我的交通战

敌人为了缩小我根据地，切断我方联络，并加强其占领据点，扩大伪政权的势力范围，攫取我方资源及物资，以利于进行扫荡，最近大规模地修筑铁路及道路。因此，交通战在战略上，已具有重大的意义。

包围冀南的交通网，除京汉、津浦两大铁路干线外，在平原中部尚有沧石(沧县一石门)、石南(石门一南宫)、邯威(邯郸一威县)、大邯(大名一邯郸)等四大公路，另外.还有许多支线。

各据点均有道路互相连接，每个堡垒后方都有一条道路相通。在半年的扫荡中，敌人的道路约增加了四分之一，并计划铺设济郸铁路(济南一聊城一大名一邯郸)，以此将冀南分割成南北两部。沧石路已从两端开始修筑，我方正考虑采取措施对之进行破坏。

另外，敌人在修筑道路时，使用了四种毒辣方法。

其一是环状汽车公路。以城墙为中心，圃绕城外修筑一条环形路，将广大农村纳入城市的圈内，连我方根据地都包括进去。汽车在环状路上巡逻，使我不能接近，以便于防守其占领地区。

其二是平行汽车公路。从一城至另一城，从一个据点到其它据点间，修筑平行的几条汽车公路。这样，出动汽车时，即可任选一条通行，从而避免我方伏击，防止我方的破坏。

其三是放射线公路。即以一定的县城或据点为中心，从四面八方向该中心修筑公路。以冀南柏乡县为例，向县城中心已修有八条公路，任何一条都通到外部各地。

其四是路旁挖沟法。加高铁路或公路的路基，在路的两侧挖掘深沟，使我方不能接近或横穿，既保障道路的安全，又阻断我方的根据地。在京汉路的高邑至临城地区，已经采用此法，正在挖掘探沟。如能实现此项计划，不仅能切断冀南平原与太行山根据地的联系，而且能分割平原的游击区，从而带来很大困难。因此，必须认识到交通战在平原反扫荡战中所占有的极为重要的地位。

对敌人的这种交通设施，我方只采取零星的破坏行动是不够的。必须进一步采取更大规模的有计划的行动。在冀中地区动员破路的群众，一夜之间就达五六万人，但同时必须考虑到，在破路的群众当中，就有被敌强制修复道路的群众。这是白白地消耗民力。对此，首先必须大力组织祥众，帮助群众从敌方的劳役中摆脱出来。所有这些均属于破坏工作范围之内。

其五 冀南平原游击战的前途

两年多的冀南游击战和一年半的反扫荡战，总的看来，我方有极大收获。其中最大的收获是，我方掌握了相当丰富的平原游击战经验，因而树立了充分的信心。在冀南地区，我军、政、民各方面的建设工作，已经奠定了坚持游击战的基础。

在敌人方面，虽然增加了若干的交通网、据点，企图“将占领的点与线，进而扩大成面”。但是，敌人的目的并未达到，而且可以说是根本失败了。

如果分析过去的平原游击战胜利的基本因素，第一是党、政、军、民四位一体，紧密团结。在一年半的反扫荡过程中，这种团结日益密切，并且坚强巩固。第二是群众运动的

初步展开。在一般的情况下，群众的向背决定一切。群众是最可靠的支柱，我们的胜利唯一的依赖是群众的援助。第三是正规军、游击队、群众武装三者的有机配合。就好比正规军为骨、游击队为筋、群众自卫队为肉，互相有着血肉不可分离的关系。

当前，冀南处于非常严重的时期，我们通过灵活运用过去的经验，坚决依靠群众，必须作到破坏敌人的一切交通建设，粉碎敌人的扫荡，据此，坚信一定能打破这次危机。

四 中共各项工作实施状况

华北方面军为了掌握当地中共方面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工作的实施状况，于 1940 年 3 月—5 月，向各方面派遣了调查班。本资料是从各调查班的报告书—“冀南边区抗日赤化工作实质报告书”、“冀中地区共产党的组织及各项工作的状况调查资料”及“冀南行政参议会工作报告书”—之中，摘录若干，分类进行了整理，以下记述是中共各项工作实施状况。

文教(思想)工作

在察南地区，以革命的救国三民主义为基础，教育成年男女提高其政治、文化水平，以发挥其高度的抗战精神和行动能力为指导方针，并以教育儿童，培养其成为优良的第二代国民为目的。在社会教育方面，指导一股群众，对村政给予影响。另外，对日军占领地区内的居民，则主要是针对日方所实施的欺骗教育的阴谋予以彻底的揭露。

在冀中地区，以灌输抗日革命思想为目的，由县党委、军政治部等主持，对各村干部进行集中教育，对一般群众以讲演和演剧等形式进行宣传教育。

各地学校教育一般按以下各点实行。

一、小学校全部改称抗日小学校，教科书统一以抗日抗战作为内容。儿童的作文、图画、游戏等，也都要注意灌输抗日意识。

二，儿童学生，除按军队方式以连为单位进行组织外，并编成宣传队、儿童剧团、慰劳队，使其参加工作，边教育，边努力加强抗战气氛。

三、在以行政系统划分的小学区中，指定中心小学校，以此作为指导教育的核心，形成对其它小学校进行督促指导的组织。

四，教育者，由受过抗日共产教育的人员充当，县政府的教育科员(党员)，经常巡回视察各小学校，担任指导。

五、扩大设置各种教师进修学校、干部训练班，努力大量培养抗日工作干部。各教师要同时进行军事训练，以抗战言论集、抗日报纸等为教材，使其受到彻底的抗战教育。

社会教育一般按以下各点实施

一、群众教育，凡达到参加自卫团年龄的适龄男女，一律强制使其接受社会教育，经费由村公所负祖，学习课目为国难讲话，时事问题解说、政治军事常识、识字、歌曲等。

二、在察南，利用冬季农闲实行社会教育，称之为“冬季工作”。县政府首先组成“冬学运动实施委员会”，决定实施方法，区村也组织同样的委员会负责办理和进行该项工作。

三、在冀中地区，鼓励推广各地方的报纸刊物，以提高群众的民族意识和政治觉悟，使之理解持久战、游击战的意义及其重要性等，强调抗战必胜，建国必胜。另外，应用宣传教育方式，指导群众在政府支援下，自发地改善各自生活，参加抗战。

宣传工作

在各县组织的教育宣传委员会发行群众报纸，散发给政治机关、自卫团、救国会等机构。

对于日军占领地区内的群众，其教育方法是:(1)散发传单、小册子。(2)通过训练班，对干部进行专门教育。(3)秘密设置夜校和识字班。(4)秘密派遣教师打入日方教育机关，使之进行抗日教育，促使民心背离日本。

组成宣传队从事文化娱乐工作，要注意运用适合大众兴趣的传统娱乐形式。

县区的各机关及小学校，分别于所在地办理壁报，其登载内容，主要有新闻、漫画、打油诗、歌曲、标语等。

通过边区政府的机关报纸(晋察冀边区抗敌报)，募集捐款，以加强群众的抗日意识及扩大读者面，另外，县政府号召开展支援抗战的捐献运动。

经济工作

在冀中地区的经济工作中，对群众课以所谓“合理负担”，实际是很重的“累进负担”。例如土地，根据其所有亩数，按每 10 亩为 10 元，20 亩为 40 元，30 亩为 80 元，40 亩为 160 元，实行课税。对待富农则施加特别压力，横征暴敛。另外，还有所谓“平均地权”，如果地主不能忍受“合理负担”，而将土地变卖时，则由农民协会以廉价收买。其产品棉花、谷物等，都通过农会的调查，不许随意进行买卖。对谷物除允许留下最少限度的自用粮外，其余全部归公，作为共军的军粮及抗战战士家属的补助粮使用。

此外，共产党于 1939 年秋以来，制订了 100 万元的军费捐款计划。各县、区、村都组织了临时现金动员委员会，捐款按资产的多少。分摊给各户，强迫用现金或谷物缴纳。对于纸币，不用说联银券，连河北银行券，也严禁使用，全部使用边区及中国、中央、交通、农工等银行纸币，特别要使晋察冀边区银行的纸币大量流通使用。

从 1939 年 8 月起，于各县、村组织了棉花公司，除以 100 斤棉花 30 元的廉价进行收买外，还分配给由党领导经营的织布工厂，防止棉花外流。

禁止使用日货及其它外国货。

禁止运出所有物资，尤其对棉花严加管理，当发现运出者时，便以汉奸论处，实行枪决。盐、砂搪、火柴、电池、纸、药品等各种物资，利用行商，主要从天津方面运入。誊写器具及药品则通过铁路沿线城市的外国人设立的基督教会的信徒，以教会名义，交由共产党地区的基督教会，向共军和政府等进行交纳。

为了防止耕牛的减少，不准食用牛肉。公布禁烟、禁酒的命令。金属废弃物资全部交给农会。废除婚丧嫁娶的乐队，禁止浪费金钱。家畜的卖买，必须

经农会批准。直径一尺以上的树木，全部在农会登记，不得随意采伐使用。

另外，禁止养狗，由打狗队各村巡回，尽力将狗消灭。因为狗不仅吃粮食，其吠声还可能暴露共军的夜间行动。

在冀南地区，为了巩固该地区的抗日根据地，坚持困难的平原游击战，以期军事、政治的顺利发展，在财政、经济政策方面尽了最大的努力，冀南行政主任杨秀峰在区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公布实行如下的战时经济政策。

甲、妥善的土地税制度

首先整理田地的租借关系，废除分摊纳税，按累进税率实行公平负担制。

乙、战时经济制度

统一收支、公开财政、严惩贪官污吏，保证发给最低生活费。

丙、调整并确保金融

整理收回各地方纸币，禁止流通伪纸币和伪货币，限制法币的流通地区，设立地方银行。

丁、发展、改善合作事业

组织农产品的运输，供给物品和调整价格，建立低利及无息的借贷制度。

戊、统辖贸易

设立贸易局，有计划地输出土产品和吸收敌区物资，组织游击区的产品交换。

已、发展农村经济

增加战时生产，奖励发展农村副业及手工业。

庚、调整粮食

设立粮食管理机构，调整粮食的生产、消费、运输、分配和贩卖。

在察南地区，由于中共方面的势力逐渐伸展到平原地区，抗日政府从1939年 2 月，便加强了财政部门，对山区农村，经过数个月的田赋调查，确立了周密的田赋税制。平原的农村，因与日军势力交错，未能进行充分的调查，只规定了适当的税额。同时，为了将群众从日军方面争取过来，对纳税额又降低了四分之一，但强制交纳，严行督促。

产品向外县输出时，须向“输出货物税务所”纳税，并责成村自卫团长设立“偷运走私调查所”。为了从日军占领地区收集物资，派遣武装掩护队，企图强制收买，强行搬运。因此，游击区群众的去留，随着彼我力量的消长而变动。

产业经济政策方面，以最大努力扩充合作社。此外，通过春耕秋收运动，增加生产。设立秘密交通站，从事传送文件，运送武器、弹药、粮秣，以及管理物价、统制输出、修理制造枪械，回收废品等工作。

对抗属的优待工作

为了争取群众，以减租减息工作作为重点，取得一般群众尤其是贫农的欢心。同时，对抗战军人家属，根据边区政府公布的优待法令，实行了特殊优待。以察南地区为例，其优待办法如下:

一、物质上的优待—赠给从违反规定者手中没收的粮食、金钱以及布类。

二、劳动上的优待—由代耕团、村自卫团帮助耕种和收获。

三、一般的优待—实行减轻或免除纳税，补助儿童学费，援助丧葬及医疗

费用。

四、精神上的优待—在各种纪念日、庆祝大会上进行表彰，组织儿童慰问团进行家庭访问，指导一般群众对其表示敬意。

以上优待办法，给一般群众以很好的影响。然而，在日军势力范围内的地区，有因害怕家属受到危害，而隐瞒参加八路军的情形。因此，该项工作并未完全见诸实行。

除奸工作及民众连坐法

在察南地区，由各县各区的村自卫团的先进分子，组成“游击除奸小组”，努力进行铲除投降分子的工作。小组以组长和二—四名组员作为除奸的行动班，并由秘书及数名侦察员编成所谓“保安小组”，使之完成秘密工作任务。另外，为了彻底团结群众，在群众中以自卫团为中心，以压制亲日投降者的活动为目的，建立了民众连坐、互相监督的保甲制度。1939 年 8 月，根据边区政府命令，为了压制和防止群众中的投降通敌等活动，在每个县中都通过了“区村保甲委员会组织条例”及“区村保甲实施办法”的决议，并于 9 月末完成了组织工作。

制造、修理枪械等工作

解放区的工业，仅是经济方面开发工作的一部分。根据察南的实例来看，山地内根据地，为了武器弹药的自给，设置了枪械类的修理所和制造所，这些修理制造工作，表面上是由县政府、自卫团总队部干部、县工人救国会共同领导，而实际上则由经营委员会进行经营及制造技术上的领导。

武器工厂的材料来源，采取了以自卫团总队部为主，在区、村的群众团体协助下实行废铜铁回收的办法。回收的材料，立即送交边区的制造所，并按所交数量换给相应的手榴弹。但制造所的设备能力极为低劣，大部工厂是数十人以下的小工厂，仅能制造步枪和手榴弹，修理也只限于简单的小修。因而也难以确保对前线的充分补给。于是，鼓励采取积极手段，袭击新政权的武装团体，扰乱日军后方兵站，从而获得武器弹药。

山西省西北部的叛乱工作(晋西事件)

以下是上述方面军派遣调查班所作“山西省西北部匪情调查报告书”的摘要:

1939 年 6 月，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兼山西省主席阎锡山，因恐山西省西北部的中共势力渗透，正拟对该方面的山西新军进行肃清之际，山西新军在牺盟会及贺龙指挥的第一二 0 师支援下，从 11 月末至翌年初，攻击了阎锡山部下赵承绶所指挥的旧山西军。当时，赵承绶除任第七集团军军长外，还兼任山西省四个游击行政区之一的晋西北第二游击行政区公署主任，管辖 35 个县。

旧山西军由于内部有牺盟会分子扰乱，外有山西新军趁日军扫荡之际进行袭击，一举即被击溃，因此，第二游击行政区的行政权落入新军之手，主任由

暂编第一师长续范亭担任，副主任由牺盟会常务委员牛荫冠担任。

此即所谓晋西事件，现就中共方面如何进行部队内的赤化工作，以及如何对阎锡山的反共措施进行斗争等，概述如下。

1936 年冬，绥远事件发生后，全国抗日思潮高涨，在阎锡山统治下的山西省建立了牺牲救国同盟(简称牺盟会)，作为动员群众的组织。其目的在于“争取民族革命的彻底胜利，建设三民主义的中国，实现以人人享有劳动权利及按劳分配为宗旨的新社会”，会员以青年、官吏、学生等知识分子阶层为主。

其后，牺盟会员对阎锡山的以统一省民和加强军事力量为目标的抗日政策，给予积极的协助，使会的组织迅速扩大，并在行政、军事方面也建立了组织基础。但是，阎锡山领导山西的抗战，能力薄弱，于是中共势力乘机侵入，致使该会与共产党的关系日趋紧密。

继中国事变爆发后，太原，临汾等地相继失陷，因此，山西军也决定开展共产党所主张的游击战。阎锡山将山西省划分为七个游击行政区。每个行政区设置保安司令，使其统辖由群众组成的县游击队、保安队、政卫队、青年抗敌决死队。牺盟会的积极分子就是这些武装组织的骨干和进行政治工作的中心人物。在这些武装团体中，除以上组织外，还有以太原各工厂工人所组成的工人武装自卫团做为基干，而在牺盟会的领导下扩大了势力的武装力量，这就是所谓山西新军。

阎锡山对于在统一战线名义下，逐渐走向赤化的山西新军的情况感到忧虑，乃于 1939 年 6 月，采取了将工卫队改编为第二 0 七旅、政卫队改编为第二一二旅等对付共产党的措施。同时，拟将该新军置于旧山西军的统制之下。对此，新山西军如前所述进行了抵抗反击，并将各部队内的旧军系统军官，逐渐驱逐清洗，强行改编如下，从而促进了部队的共产化。

新部队名称	时间、地点、发动者	基础部队
决死第四纵队（队长：雷任民）	1939 年 12 月 13 日，在交城县塞则坪改编。发动者为地区政治委员雷任民，旅政治主任刘德明。	第二 0 三旅
决死第二纵队（队长：韩钧）	1939 年 11 月 8 日在隰县水上镇，政治委员韩钧主持。	决死第二纵队
第二 0 七旅（旅长：侯俊岩）	1940 年 l 月 2 日，由政治委员侯俊岩主谋，驱逐旅长后改编。	第二 0 七旅（旧工卫旅）
暂编第一师（师长：续范亭）	1940 年 1 月上旬，在兴县声明参加新军。	
新编四团（团长：曹诚）	1939 年 11 月，第十五团发起兵变，与山西军交战后，脱离第一九六旅改编。	第一九六旅第十五团
游击第三师（师长：侯光远）	I939 年 12 月 30 日，在兴县北方魏家滩被第四纵队强制改编。	

如上所述，新军再次编成，但于 1940 年 1 月 1 日又建立了‘晋西抗日拥阎讨逆总指挥部”，并以总指挥续范亭、副指挥雷任民的名义发表了宣言。这个宣言，一方面强调抗日统一战线，主张拥护蒋介石、阎锡山，另一方面却对阎锡山部下的旧山西军，上至集团军长，下至师、旅的首脑等极力加以诽谤。其用意在于排挤这些高级干部以削弱阎锡山的统治能力，同时笼络并掌握中坚干部，争取一般官兵。由此可以明显看出，共产党巧妙的军队赤化工作的迹象。

1940 年 1 月 20 日，国防会议命令阎锡山与朱德停战。然而，其内部纠纷

则在日趋尖锐。

3月19日，阎锡山就晋西事件发表宣言，声称“晋西北叛乱主谋者牺盟会的过激分子和新军，由于中共的支持，而脱离了战区长官的统制。”对此，共产党方面的薄一波等，于4月11日解释说:“晋西北牺盟会的政策与共产党的政策之所以类似，是由于抗战建国客观现实的要求，并非与共产党合并。牺盟会与中共军队关系密切，不过是从维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观点出发，进行必要的协力而已。”在山西新军叛乱的同时，在行政机构中，也清洗了旧山西系统的机关和人员。但是，其行政组织仍保持了原来的系统。中共提出了“国共合作，拥阎讨逆”的口号，企图将行政机关置于山西新军的统辖下，通过新军实现中共的统治。

新军通过牺盟会系统占领县政府，或依靠新军的武力扫荡，掌握了政权的领导。1月15日，暂编第一师长续范亭就任了第二游击行政公署主任，副主任由牺盟会总会常务委员牛荫冠担任。同时发表了“晋西北抗日拥阎讨逆行政实施大纲”。这个大纲乃是企图清洗行政机关、促进宪政运动、征收合理的累进税、实行抗战经济政策、普及社会文化教育等的施政方针。

其次，所有的工人、农民、教员、青年、妇女各救国会、儿童救亡团，以及文化界救亡会等群众团体，也全部掌握在牺盟会的统辖之下。

开辟晋西北解放区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共的目的是要以之作为晋察冀边区根据地与大后方陕甘宁边区的联络基地。该解放区的设置，由干牺盟会和山西新军工作的成功，促进了行政组织的改革和群众组织的加强，从而稳步顺利地取得了成果。

对日军的思想工作情况

大本营陆军部研究班于1940年9月，编写了“根据中国事变经验有关无形战争——思想战的资料(草案)”，并进行了研究。下面是从其第二号“华北共军对我军的瓦解工作要领”中的摘要。

华北共军对我军的瓦解工作，为中共八路军政治部所策划，除由各师、旅、团、营、连的政治部或政治指导员等优秀党员担任执行外，还指挥共产系统的匪团、行政机关、外围团体等加以实施。其工作要领为:

“揭露日本军阀的欺骗政策，使日军下级官兵认清共军的主张和政策，酝酿反战思想，进而使之转向共产革命。”

宣传重点如下:

反对日本军阀的侵略战争。

反对加重日本人民群众的经济负担。

中、日军民是兄弟，军阀是敌人。

八路军优待日军俘虏。

主张的要点是，此次事变是日本军阀和财阀相互勾结所进行的帝国主义侵略战争。日本国民不过是为满足军阀、财阀贪得无厌的欲望的牺牲品，对一般国民毫无好处，其立场与被侵略的中国人民完全相同。因此，中日人民必须相互协力，打倒共同敌人日本军阀。这与过去日本共产党所主张的反战纲领相吻合。在事变约一年以后，宣传重点又转向促使我军官兵丧失战斗意志，其内容

如下。

英、美、法、苏的对中国积极援助。

日军的战败与我收复失地。

揭露日军出征士兵家属及战死者遗族的惨状。

日本国内的经济压迫与反战运动的兴起。

对以上内容进行捏造和夸大的宣传。

宣传材料的收集，是选择既合时机又简单，并且富有刺激性的材料，即:

一、适应作战的进展——在每个会战或每个战斗中所取得的局部胜利，作为全面胜利进行夸大宣传。

二、巧妙利用生动的材料——从日本报纸中，抓住战死者妻女的自杀，近畿地方的风灾水患，关西地方的歉收等消息，巧妙地进行宣传，以动摇日军的军心。

三、利用日本国内的形势——夸大宣传日本国内的经济弱点，以及由于战争长期化而引起的经济崩溃，以促成思想的混乱。

四、利用国际形势——利用苏、英、美、法的援蒋态度，宣传将爆发日苏战争，或根据德苏互不侵犯协定，宣传日本日益陷入孤立无援的地步。

五、同情出征士兵的处境并抓住其弱点——激发士兵在军队内的不满及渴望回国的情绪，使之丧失斗志，挑拨官兵不合。

宣传方法，最初是散布(张贴)宣传文件，在墙上写标语，利用在中国的日本共产党员进行广播等，尔后越来越巧妙，如(一)在火线上进行喊话宣传，(二)进行有策略的通信宣传等。

此外，共军非常认真地进行“俘虏工作”。鼓励本国军民尽力捕获日本军官，对他们加以优待，并热心地进行思想工作。然后，以对日本军民进行赤化工作作为条件将他们释放(以下笔者略)。

俘虏工作是共军对日军的一项重要的思想工作，散布(张贴)劝诱投降的印刷品，或利用日本士兵俘虏的名义劝降，或将共军通行证撒布在我军附近，宣传其优待情况，以期作到便于投降，并对护送投降士兵者，给以相当的奖励。另外，还以悬赏办法鼓励其军民捉捕我军官兵。因此，我军士兵单独或数名一起行动时，受到当地居民或共军便衣队的突然袭击而被俘者不在少数。其它还有利用中国妇女企图进行引诱劫待的。

我方官兵因负伤而被俘时，彼等不仅不加以危害，不没收金钱物品等，也不作任何污辱、谩骂和处刑;相反，却给以优待，对负伤者给以治疗。除用日语巧妙宣传并探听军情外，还特别灌输共产思想，以搅乱我军及国民的思想。对俘虏的思想教育是由曾在日本留学的政治部人员或朝鲜人共产党员等充任，每日进行数小时的教育，更于每天用一小时，提出课题，进行讨论。另外，每天在娱乐时间，通过演剧进行思想工作，作为辅助教材。其它还通过政治部的年轻女工作人员，经常接近俘虏，以学习日语为名，宣传共产主义。

讯问俘虏的内容为:有关我军的兵力配备，各兵团的战斗力，下级官兵的生活状况以及思想倾向等。

召开共军士兵及地方群众大会，使俘虏登台，发表攻击日本军阀和财阀、歌颂共军及共产主义的讲演或演剧。此外，还指导俘虏写感想文章，以此作为宣传材料，寄送其战友，劝告投降，或对其家属及所属部队等发出“生命安全，目前正受到共军的优待，过着幸福生活”之类的通信。另外，对愿意回国的俘虏，以发展同志、进行反战运动、与日本共产党协作、宣传优待俘虏情况等为

条件，发给旅费，并派兵护送，予以释放。不愿回国者则编成特殊部队，从事对我军的反战工作。

1937 年 7 月至 12 月间，经驻中国的宪兵队办理归来的俘虏为 27 名，他们归来后，或到原部队或到宪兵队自首，或被逮捕，因而释放时承担的条件，均未能实现。

五 方面军对中共情报的收集

1938 年，关于方面军及有关机关对中共的情报活动，于前章方面军参谋部第二课及新民会调查科的情况中，已有所记述。进入 1939 年，对中共的认识有所提高，调查研究也有了进展。在此，根据方面军情报工作负责人会议记录加以介绍，并将驻中国宪兵队的情报业务及华北灭共委员会的组成情况记述如下。

方面军情报工作负责人会议

方面军子 1939 年 12 月 1、2 两日，举行了情报工作负责人会议。参加会议者，有方面军司令部的有关人员，各军、直辖各兵团及驻中国宪兵队司令部的情报工作负责人等。

会议的开头，方面军参谋长笠原幸雄中将作了如下的报告，指出今后华北治安的致命祸患，就是共军。只有打破这个立足于军、政、党、民的有机结合的抗战组织，才是现阶段治安肃正的根本。对此，迫切希望有深刻的认识，努力组织周密的情报网，掌握敌人抗战力量的实际情况。

当此世界情势急转，远东即将展开新的事态之际，情报工作者必须耳目更加敏锐，对各种事态的判断更加正确。我占领地区内的治安状况，因各兵团的最大努力，正处于逐步提高的阶段。尤其是最近，随着世界情势的转变及树立汪政权工作的进展，可以看出，敌方的军、政、党等各方面的抗战力量，逐渐呈现动摇的景象，不胜庆幸之至。但是，仔细观察当前形势，敌方的抗战力量正在日益隐蔽而顽强地发展，确为无可掩盖的事实。

以地方武装为中心的抗战组织及以共军为背景的群众抗战组织，正在日益加强和扩大其秘密活动。如今更驱使怀有抗日情绪的华北群众，进一步向抗日的道路上迈进。然而，在现阶段，治安肃正的根本意义，在于打破上述立足于军、政、党，民有机结合的抗战组织，这是各位已经深刻认识到的。

为此，首先必须弄清其组织，并进一步弄清作为其组织基础的军事、政治、思想、经济的根据及核心，必须使皇军的威力单刀直入地插进其要害。因此，目前各兵团情报工作的责任，就是要向皇军提供发动其威力的时期和方向。

各位对这点要有充分认识。因此，组织锐利周密的情报网，触及敌人抗战能力的核心，掌握其实质，至为紧要。特别希望今后对于成为华北治安致命祸患的中国共产党及共军的情报工作，必须全力以赴。同时，还要努力研究思想战的对策。

对我势力范围内的一般民众以及敌区的各阶层民众，要使他们充分认识当前帝国对华各种措施的真意和当前形势的真象，从而把握民心，粉碎敌人的抗战意识。同时必须进一步酿成协助我方建设的气氛。

第二课高级参谋滨田平为了提高情报工作，作了如下的报告。

一、讨伐成果的情报观察

过去往往认为情报工作只是让谍报人员去作，而在进行扫荡讨伐时，从获得情报的角度加以观察和利用，则作的很不够。由于讨伐是军队本身直接接触敌人，而且是不断地进行接触，如果采取一些方法、手段，则较之谍报人员更能得到可靠的情况。讨伐时不能满足于敌人的溃逃，还必须精心观察其结果，弄清匪团的性质、派系组织、装备和抗战能力以及与当地群众的关系等。为此，必须努力捕捉俘虏，获得文件。特别是进行讨伐的各级指挥官，更应关心情报工作，这比任何工作都重要。每当进行讨伐时，如果指导其在上报直接战果的同时，还必须报告情报方面的成果，相信情报工作就会更加提高，讨伐也能进一步收到效果。

二、关于谍报工作

方面军的谍报机关，设有特殊情报班，于各军配属其一部人员，或使之分担任务。特殊情报的特点，是能够比较正确地掌握敌人内部较大的动向。敌人的 4 月攻势，夏季攻势、9 月攻势等，其发动及部署的要点，都要依靠特殊情报侦悉。但是，特殊情报并不能指向所有的目标，只能抓住无数电波中所限定的目标。因为当敌人的部署固定而依靠有线电报通信时，肃正讨伐所必需的情报，如敌军匪的性质、系统、组织、抗战能力及与当地居民的关系等等，都可能逃出特殊情报网的网眼。

因此，正确的方法是，必须在粗大的特殊情报的网眼之中，尽量配备严密而机敏的谍报网，以控制全部占领地区。

取得谍报成果的必要条件是获得谍报“人才”和适当的谍报组织。这两点如不具备，不仅不能指望取得谍报的成果，反而会影响正确的判断。谍报人员必须具备的条件虽有种种，但最主要的必须具有灵敏的嗅觉及相当的文化程度和丰富的常识。具备此等素质的人，通过谍报训练，才有可能收到成果。方面军训练、使用曾经作为国共两党斗士活跃一时而转变了的人员，他们都比较具备上述条件，而且对国共两党也有相当的了解，因而取得了良好的成果。将来也有可能在各军配备上述人员。

今后的情报，必须日益精密，迫切要求查清作为敌人抗战力核心的党、军、政、民的组织及其组织基础的军事、政治、经济、思想的中心内容。为此，仅仅依靠在敌人外围配置的谍报组织，从外部人手获取情报，是不能得到圆满结果的。必须向敌方组织内部打入谍报人员，潜伏在敌人心脏之中以掌握其实质。建立这样的组织，当然会有很大困难，但各兵团的谍报网，将来必须向这个领域扩展。另外，以往的宣传，对敌人地区毫无渗透力量，如果利用上述谍报网作为宣传网，我认为一定能更好地发挥宣传效果。

发给大家的小册子“特务工作要领”，是中国方面密探人员的教育资料，可以作为我方从反面利用的好的参考资料。

注 1:“特务工作要领”于 1939 年 2 月 26 日，在南京城外大胜关菜田下水沟中发现后译成日文的。该书是战前南京密探学校为培养间谍所用的教材。方面军以之作为情报工作人员必读的谍报防谍参考书，发给有关方面。

注 2:在上述会议上，还就情报业务的具体事项、方面军的谍报组织、谋略工作的现况等作了说明。谋略工作除方面军实行的以外，希望各兵团也积极地实行，

注 3:据第三十二师团参谋长当山弘道大佐 1I 月 6 日的日记称:“师团负责地区内的匪数，约三万人，与 9 月末相比约增加一万人，其数字增多是根据情报网组织的情报所判断的。”但讨伐成果比 9 月减少约三分之一。另外，在 11 月 7 日的日记写道:“少佐以下及士兵、勤杂人员，开始了学中国话的教育，经过督促，约半年才得实现，每周进行两次。”兵团的实际情况，由此可以想见一斑。

当时，方面军参谋部第二课的有关人员是：高级参谋兼报道部长滨田平大佐、参谋堂之脇光雄中佐、中井春一少佐、尾关正尔大尉，一般军官茂川秀和中佐、河野又四郎少佐、前野荣吉少佐(开封情报所长)等。

此次会议。认识到共军是华北治安的致命祸患，并且针对此种情况，具体地研究了有综合、有组织的情报收集工作。由此可以看出其意义的重要。

驻中国宪兵队的情报业务

驻中国宪兵队，对国民党、共产党等的秘密组织及民心的动向予以深切关心，自建队以来，一直稳步进行活动，并且顺利地取得了成果。

1940 年 2 月下旬，在中国派遣军的情报会议上，作了“驻中国宪兵队的情报业务现况”的报告如下。

一、情报收集重点

驻中国宪兵队按照华北方面军司令官的意图，担任了以思想情报，特别是国共方面秘密组织的活动及民心动向为重点的情报收集工作。

二、组成并利用中的情报网现状

(一)各宪兵分队(包括北京及天津宪兵队总部)及宪兵分遣队为宪兵情报网的骨干。

配属于第一线各兵团的宪兵，分别部署在内地 200 个主要县城，与各宪兵队组织的情报网密切联系，以华北蒙疆的主要城市、县城等约 300 处为据点，构成有组织的情报网。

关于对共谍报方面，根据 1939 年 12 月方面军的命令，命所属各宪兵队组成对共谋略谍报网，当前在方面军占领地区内，治安肃正模范地区的中国方面各机构内部，依靠监察网组织，正在建立情报网。

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活动更加隐蔽，探知其真相也更加困难。因此，将来必须进一步加强这些谍报网，以期组成与其秘密活动相适应的、细致而强有力的谍报网。对此，目前正在研究探讨需要采取的技术手段。

关于邮政谍报网

在方面军占领地区内主要城市约百处，正在实行中国方面的邮政检查，这是文件谍报方面的有力机构，正在取得相当成果，将来颇有希望。

(二)宪兵可利用的情报网

尽量利用领事馆警察、中国方面警察、铁路护路警察等日中各警务机关，适应其特性，以之作为情报机关。尤其对中国方面的警察，应大力支持其情报机构的建成和整备，以便将来利用。

三、宪兵的各种主要情报收集手段

(一)邮政检查

(二)调查被检举的人

华北宪兵检举犯罪者的人数，每月约达 3,000 至 5,000 人。在对他们调查审讯时，从直接听到的事项中，可以获得比较确实的谍报资料。常常会由此发现重要的情报。

(三)检查及搜索

利用此种时机获得文件谍报。

(四)谍报人员

(五)无线电窃听

目前在天津、包头以搜索敌方及第三国无线电情报机关为目的，正在实行无线电窃听。

(六)有线电话的窃听

各宪兵队装备简易的窃听器，实行有线电话窃听。

由于驻中国宪兵队是在对共治安作战中起了重要作用的部队，故将其编制的变迁概述如下。

从来，在中国驻屯军中，配属有宪兵长以下的宪兵约 20 余名，1936 年 6 月新设了隶属于中国驻屯军司令官下的驻中国宪兵队。队总部设于天津。在北平、天津各设宪兵分队。另外，在丰台、通州、山海关、秦皇岛、唐山、塘沽各地分别设置了由总部指挥的分遣队。

1937 年 6 月，队总部设置了特高课，增加了兵力，加强了体制，不久适逢华北事变爆发。

1937 年 8 月 25 日，根据军令陆甲第 13 号,实行了中国驻屯宪兵的临时编制，并隶属华北方面军的指挥下。总人数为 237 名，队总部(队长:大野广一大佐)仍设在天津日本租界，直辖天津、塘沽、秦皇岛各分队。同时，在北平设置了特设北平宪兵队总部(队长:赤藤庄次中佐)，指挥通州、丰台、北平西城、北平东城各分队。此外，在第一军、第二军及驻蒙兵团，另行配属了野战宪兵及兵站宪兵。

1938 年 8 月 12 日，根据军令第 55 号，变更了编制，统一了各军配属的宪兵，重新设置了“驻中国宪兵队司令部”，下设十个宪兵队(38 个分队)和一个宪兵教练所，于 31 日编成，总人数为 1,624 名，任命佐佐木到一中将为第一任司令官(任期至 1939 年 9 月 4 日)。以后由北野宪造(任期至 1940 年 7 月 22 日)、矢野音三郎(任期至 1941 年 6 月 30 日)、城仓义卫(任期至 1943 年 8 月 26 日)各少将相继担任司令官。

规定驻中国宪兵队司令官“隶属于华北方面军司令官之下，指挥所属部队，掌管在华北方面军作战地区内的保安及军事警察，并管理宪兵教育工作”。各宪兵队分别设在北京、天津、济南、青岛、石家庄、太原、临汾，张家口、徐州、开封等地。驻蒙宪兵队编入张家口宪兵队内。

宪兵队司令部分为总务部(由总务，会计、第一课组成。部长为大野广一大佐)和警务部(由第二，第三课组成。部长为石田乙五郎大佐)两部。警务部第二课担任军事警察、外事防谍、经济警察、不良日人的管理，警务部第三课担任灭共工作、谋略防卫以及政治警察工作。

1941 年 5 月 22 日，根据军令陆甲第 17 号，改变了编制，6 月 24 日编成。总人数为 2,595 名。此次改变的目的是为了将驻中国常设宪兵队的性质改变为华北派遣野战宪兵队。因此，增加了队司令部的人员，名称也改为“华北派遣宪兵队”。

华北灭共委员会

方面军于 1938 年 11 月 12 日，命华北灭共委员会开始工作。这是驻中国宪兵队总务部长大野广一大佐以前提出的建议，并经佐佐木到一宪兵司令官、山下奉文方面军参谋长等同意而被采纳的。大野大佐重视在华北的思想战，主张以思想对思想，而且必须以日中军、政、民的全力进行战斗。当前，首先召集

各界人士，设置能够进行自由研究的综合调查部，作为军的外围机关。打算以此为中心，灵活运用其研究成果，建成一个反映华北全面灭共措施的委员会。

调查部设于北京市内的“黄城”，被称为“黄城事务所”，以研究第三国际、中国共产党、国共关系以及在满洲的剿共经验等开始了工作。在方面军参谋部第二课与宪兵队司令部中，指定主管人负责领导业务。在“黄城”事务所，任用有才能的左翼背叛者作为军“嘱托”参与研究。由内务省、司法省、兴亚院、各会社调查部等也派送人才，逐步充实了阵容。

在当地召开例会时，有满铁调查部和从国内来的专家参加。那时在日本国内，就连进行这种研究也要受到严厉的监督，由于很难得到这类文献，所以，“黄城事务所”的研究成果，实在是贵重而有意义的资料。当时，虽说“反共”，但大部分人并不理解共产主义的理论，所以对于启蒙活动，可以说具有较大的贡献。在灭共委员会方面，当初并无显著的活动。

1939 年 9 月 26 日，方面军修正了华北灭共委员会的规定，明确了中央和地方的组织关系。当天，方面军参谋长笠原中将，作为该委员会的委员长，修正了调查部的规定，整顿了业务内容和组织。根据华北共产势力的扩张状况。提出了推行更加强有力的灭共措施的意见。修正的规定如下。

华北灭共委员会规定

第一 本委员会基于华北治安肃正的根本意义，为了灭绝共产抗日思想，以调查研究及审议思想的对策为目的。

第二 委员会分为中央委员会、地方委员会，必要时设地区委员会。

第三 中央委员会设在北京，委员由方面军司令官从军、政、民中加以任命或委托。委员长、副委员长分别由方面军参谋长、参谋副长担任。

第四 地方委员会设在方面军直辖兵团的每个管区内，其委员由兵团长从军、政、民中任命或委托。委员长由该兵团的参谋长担任。北京附近不设地方委员会，其业务由中央委员会办理，

第五 地区委员会，由方面军直辖兵团长准照前项，在认为有必要的地区设置之。

第六 中央委员会，担任调查研究华北全面的思想对策的工作。

第七 中央委员会为了办理委员会的总务工作及经常进行调查研究，设立调查部，其规定由委员长制订，调查部设有部长、班长、调查部员及其他职员。部长由副委员长担任，班长由委员长从中央委员会委员中任命。调查部员由方面军司令官从军、政、民中加以任命或委托，其他配属人员，由委员长决定。

中央灭共委员会调查部规定

第一 调查部设于“黄城事务所”，负责有关思想对策事项的调查研究以及中央委员会的总务工作。

第二 调查部设四个班。

一、第一班担任有关下述事项的情报收集和整理工作。

(1)有关共产抗日团体的组织及策动情况事项。

(2)有关在学校、矿山、工厂等的共产抗日情况事项。

(3)其它有关国内、外人的思想事项。

二、第二班担任下述事项的规划起草工作。

(1)关于灭共亲日对策的事项，

(2)关于各阶层的指导及训练事项。

(3)关于地方委员会的领导统制事项。
(4)其它关于一般规划事项。
三、第三班担任下述事项的调查筹划工作。
(1)有关宣传机关事项。
(2)有关宣传资料事项.
(3 有关宣传方法事项。
四、第四班担任下述事项的调查研究工作。
(1)有关中国国民性的事项。
(2)有关灭共亲日理论事项。
(3)有关共产抗日管理法规事项。
(4)有关日、满、中及其它各国的灭共对策事项。
第三(笔者略)

笔者注:灭共委员会的日方委员的任命或委托，其情况如下。

军方关系一参谋部各课长，宪兵队司令部总务部长，同警务部长，方面军宣抚班长。

政方关系一领事馆，内务省警保局，司法省北京公馆、朝鲜总督府警务部，兴亚院联络部，满洲国政府治安部等的适任人员。

企业关系一华北开发，华北交通，华北电电等各会社代表。

在调查部中，虽有能干的中国人参加，但从灭共委员会全面来看，仅日方阵容较为完善，真正成为日中一体，则有待于1941年8月防共委员会的建立。

除以上外，方面军及军外的情报调查机关，其主要者如下:

1. 茂川机关(北京机关)，机关长茂川秀和中佐，以对中国(重庆)谍报谋略工作为主要任务。

2. 渡濑机关(天津机关)，首任机关长多喜弘少佐，继由渡濑八郎中佐接任，担任对苏谍报谋略工作。

3. 日高机关(方面军调防班)，机关长日高富明中佐，担任以第三国人为对象的调查防谍工作。

4. 华北方面军司令部特种情报班，从事变前即设于中国驻屯军司令部内，1939年隶属于方面军的编制之内。以秋富胜次郎中佐为班长，负责密码破译、窃听、探测方向、通信调查工作。

5. 兴亚院华北联络部政治部，通过本部的调查班，收集治安情报。另外，方面军第四课还通过特务机关收集治安情报。

6. 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是由华北开发有限公司所属公司的调查研究机关及满铁华北经济调查所综合统一组织，对有关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部门，主要依据书面情报，进行各种研究。

7. 华北交通公司特别调查班，通过铁路及道路交通状况的调查、通信情报、间谍等，收集治安情报。

六 华北、蒙疆的政情

树立临时政府中央政权的准备

为了准备树立中央政权，首先需要合并临时、维新两政府。于是，在1938年9月20日，成立了中华民国政府联合委员会，并举行了第一次、第二次会议。1939年1月、3月、7月分别举行了第三至第五次会议。这些会议是以协商交通通信、邮政、金融、海关、税收、盐税、文教、思想对策等具体事项为主，关于两政权的合并，进行了非正式的交换意见。

第六次联合委员会会议，是9月19、20两日在南京召开的。在上海的汪兆铭，趁此机会前往南京，与王克敏、梁鸿志进行了会谈(南京会谈)，具体协商了关于树立中央政权事项。

注：汪兆铭从逃亡河内到现在，其行动概况如下。

汪兆铭自从提出反共和平的声明以来，一直旅居河内，对大陆各方面的和平趋势的进展，煞费苦心，但重庆的压迫也越发激烈。由于3月21日其心腹曾仲鸣被暗杀，感到旅居该地的危险。因此，为了救出汪兆铭及便于和平运动的开展，特派影佐祯昭大佐、犬养健众议院议员前往河内，于4月25日与汪一同逃出河内，5月8日平安到达上海，并以此作为今后工作的据点。

汪兆铭认识到，今后的工作首先必须与日本取得密切联系，乃于5月31日访问东京，与平沼首相等要人进行了会谈。结果，了解到日本意图在于树立新中央政府，作为建设东亚新秩序的一个阶段。于6月18日离开日本回国。

汪兆铭在归途中经过北京，访问了王克敏等临时政府的要人，又至上海与梁鸿志等维新政府要人进行了会谈，要求他们协助建立新政府。另外，通过中华日报的复刊和广播，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并奔忙于对广东及其它地方的各项工作。8月28日在上海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六届全国代表大会”，使纯正的国民党开始活动，大会修改了党章，同时，确定了新的内政、外交纲领，发表了以“和平反共建国”为方针的声明。

日本方面大力援助汪兆铭，并且为了与东京进行联络，派遣影佐少将(1939年8月1日升任)于上海四川路设机关办事处，影佐为机关长。该机关代号为“梅华堂”，因此，参谋本部称该机关为“梅机关”，称汪工作为“梅工作”。

此时，陆军省部有关各课的基本意图是“妥善适应新的国际形势，加强推进汪工作，并统一集中内外措施，乘新中央政府树立前后的时机，努力迅速解决事变问题，如其不成、则断然转向大的持久战。”(10月30日陆军省部有关课所制订的“以树立新中央政府为中心，处理事变最高方针”)

蒙古联合自治政府的成立

蒙疆联合委员会创设以来，金井章次最高顾问兼任代理总务委员长。1939年4月29日，经各自治政府代表的推荐，德王就任总务委员长。自此，蒙疆地方建立独立的中央政权的空气迅速高涨起来。另外，由于受树立中国新中央政权工作的刺激，8月27日，在张家口召开的“树立中央政权促进大会”及29日在厚和(今呼和浩特—译者)召开的“第四次蒙古大会”上，通过了“迅速树立独立的强有力的新政权”的决议。

驻蒙军已于5月8日准备了“蒙疆建设基本计划”。其要点为“在促进蒙疆地方的统一、提高民生、民族协和的方针下，建设强有力的防共特殊地带。为此，在军的幕后指导下，蒙疆建设以1941年基本完成为目标，重新审查原来计

划，迅速制订将来的具体方案。”

据此，联合委员会立即听取各界意见，开始审查“蒙疆政权强化方案”。8月11日设立“政权统一审议会”(联合委员会总务委员长的谘询机关)。26日该审议会就新中央政府的组织机构、名称等进行协商的结果，建立了“蒙古联合自治政府”，决定从9月1日起开始工作。最大的问题是名称问题。因为当地方面，尤其是蒙古人，对蒙疆的独立，有着强烈的愿望，所以审议会提出的原案是“蒙古联合自治国组织法案”，但根据驻蒙军及陆军中央的意图，最后落实为高度百治政府。(注:德王将来独立业已内定，只是不便正式宣布，但德王常在非正式场合，自称为“蒙古邦”。)

9月1日在张家口成立了蒙古联合自治政府。德王就任了新政权的主席，最高顾问为金井章次，蒙古军总司令部长官为李守信，并任命了其它政府首脑。

所谓“将蒙古作为高度的自治区，承认中国主权，实行内政独立”一事，1938年末，日本政府在决定日中新关系调整方针之际，早已承认在案。这个方案对调和希望在中央政府下统一全中国的汪兆铭，与热望蒙古独立的德王之间的对立意见，暂时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然而，汪兆铭方面与梅机关之间，在上海的交涉(详情后述)迟迟不见进展。同样，在蒙古高度自治的问题上，汪兆铭方面.也难以表示同意。但于12月31日，双方终于达成协议，制订了“日华新关系调整大纲”，并在日本方面1940年1月6日的兴亚院会议上得到了承认。在“秘密谅解事项，其一之第三，新中央政府与蒙古自治政府间关系调整要领”中，决定如下。

鉴于蒙疆在国防上、经济上、日满中三国高度结合地带的特殊性，根据现状，承认其广泛的自治权，作为高度防共自治区，其权限按中央政府规定的内蒙自治法实行。而内蒙自治法的制订，预先与日本方面早已作了协商。

在中央政治会议之前，两政府代表会商，并作了书面协定:(一)中央政府基于现状。承认蒙古联合自治政府的高度防共自治权。(二)关于两政府的关系调整，依照本协定精神，在中央政府成立后另行协商。

其后，关于蒙疆的地位，于1940年11月，在日华基本条约中，用大致和以上相同的文词，作了规定，但内蒙自治法则始终未能制订。

至于驻蒙军司令部，兴亚院蒙疆联络部、蒙古联合政府的关系，每当处理业务时，往往遇到种种问题。在冈部军司令官的笔记中，也有如下记述:“在政府内部，日系官吏和当地人官吏，完全脱离，即在日系官吏内部，也有派系斗争，军幕僚与司令部人员，尤其是下级人员，任意与政府为难，常有强制实行的倾向。联络部隶属军司令官的统制之下，如不以军事力量为后盾进行工作，则将完全驾空于上或政令不能统一，似此，难免有被当地方面欺骗的危险。”

新民会的活动

1939年度新民会的活动，主要是扩充地方组织，努力进行彻底的教化，以适应确保治安奠定临时政府基础的需要。

组织训练工作，作为县指导部的实际活动，采取如下措施，(一)开设青年训练所;(二)为建设乡村作准备，设置实验村;(三)指导分会的组成;(四)组

成和扶植农村合作社等。

注:截至 1939 年末，组成分会 292 个，分会会员 125,582 名，开设青年训练所 115 个，毕业人数为 12,822 名，青年团 58 个，团员 260,337 名，少年团及少女团 88 个，团员 49,275 名。

宣传启蒙工作，由中央指导部发行了报纸“新民报”、周刊杂志“新民青年”等，并整理抗日图书，禁止阅读有关社会主义及国民党的图书。各指导部寻求机会举办讲演会、电影会、日语讲习会。另外，利用封锁天津英法租界的时机，于 7，8 月中在全华北展开了反英运动。

设置下列机关实行群众教化工作。

一、农村自治讲习会—培养讲习会的实际工作人员。

二、建设辅导委员会—促进农村改革工作，并成为农业合作社农村分会的基础。

三、新民会问事处—担任群众中的商谈、和解、调停工作。

四、新民茶馆—于进行教化的同时，听取群众的真正呼声。

五、阅报室—附设于茶馆内，陈列供一般阅览的报纸和有关新民会的书籍等。

改革工作的主要努力用之于合作社。

过去中国的合作社违反了本来目的，已成榨取机关。新民会接受从临时政府移让的有关合作社的一切经营，在新民会合作社中央会的指导下，重新组织各县合作社、乡村合作社，以谋求增进民众的经济利益和福利。为此，合作社实行了统一购买及统一利用贩卖事业、金融事业、设备器材等。1937 年末，新民会从政府接收的合作社总数为 1,975 个，至 1939 年末，增为 4,104 个，社员总数达 143,531 名。

在保定开设了新民医院，作为新民会的医疗设施。同时，在地方设立了 48 处按成本收费的诊疗所，努力普及卫生保健思想及掌握民心。此外，今夏大水灾之际，竭尽全力进行了救济活动。

9 月 12 日，安藤纪三郎中将就任新民会顾问，同时对该会首脑进行了调动，并洗刷了原来的满洲色彩，以期整顿刷新该会阵容。此外，新民会会长职务，因行政委员长王克敏力辞，一直空位。至 12 月 2 日，决定推戴王委员长就任会长，形成了名副其实的政教一致、府会一体。同时，内政部长王揖唐、安藤顾问、缪斌中央指导部长三人，就任了副会长，顾问辅佐官片桐护郎少将就任了顾问，使部的阵容为之一新。

当时，兴亚院华北联络部次长森冈皋少将(后为中将)回忆如下。

一、一般群众并不理解新民会是中国的机关，认为与军宣抚班一样，是“大日本新民会”(军宣抚班由于削减陆军军费以至撤消，而与新民会合并。因此，新民会就越发带有日本气味)。

二、新民会在最初原拟成为思想教化团体，但其后却变成上意下达、下情上报的政府专用机关，更因合作社的关系终至变成进行经济工作的机关。因此，大部分与实践不相适应的思想运动均成泡影。军方本来着重致力于精神方面的培育，但其结局，虽强行灌输占领军所赶制出来的“新民主义”，却非当地民众所能接受。

三、军方对新民会的人员，尽量少安排日本人，而多用有才能的中国人，但获得人才

并不容易。

四、总之，必须采用最容易掌握人心的指导原则，开展与民众生活密切关联的各种运动。

天津租界问题

1939 年，日本.与英、美、法各国间的关系，围绕在华权利问题进一步恶化。

问题之一，即在日军占领地区内有关第三国的活动和权益向题。在这方面，由于日军作战行动虽使第三国活动受到制约，但仍然阻碍着日军作战行动及当地政策的执行。而且中国方面利用第三国进行反日活动，特别是各国的租界，成了争执的中心地。

在上海和鼓浪屿(厦门)公共租界中，也经常发生暴力事件，英、美、法共同协力对抗日本，形成了难以对付的局势。

天津租界问题，基本上是英、法与日本在对华政策上的冲突，具体表现在租界的维持治安及有关通货尤其是法币的争执方面。天津租界是由英、法、日、德、意等国的租界地所构成，德、意尚属协调(原文如此—译者)，而英、法租界，由于中国行政权和日本军事力量均不能达到，以致事变以来，成为抗日策源地。例如，通过无线电将日军的行动拍发给重庆和香港;或庇护暗杀中国要人的暗杀团，或向重庆、延安系统游击队，以法币贩卖武器弹药及其它必需品，或禁用及伪造联银券，以及通过操纵法币扰乱联银券的行情等等。这样，在治安及经济方面形成了一种不治之症。对此，日军从 1938 年末起，限制了通往英、法租界的交通。19399 年 2 月予以解除。虽然采用了软硬兼施的各种措施，但情况终未好转。至 4 月 9 日，在英租界电影院内偶然发生了暗杀天津海关监督程锡庚事件，致使事态更趋严重。

事件一发生，天津市公署立即向英总领事提出严正抗议，要求引渡犯人。15 日通过日英共同搜查，检举了四名嫌疑犯。调查结果，判定其为犯人后，日本方面便要求引渡。但是，英国方面以证据不充分为理由，拒绝引渡，交涉难以进展。5 月 6 日，天津防卫司令官(第二十七师团长)指出，英法租界是抗日共产分子阴谋活动的策源地，为各种暴力行动的避难所，并警告“庇护暗杀犯人，是对日军的间接敌对行为，是对东业新秩序建设的挑战”。

6 月 13 日，天津防卫司令官终于发表了隔绝英租界的声明和布告。14 日，自午前 6 时起，进入了实力行动，对英法租界外围的七条通路及从万国桥(今解放桥—译者)起到白河下游，开始了盘问和检查。声明中宣布“为了解决问题，并不仅仅是单纯的引渡犯人，而是要求英法改变援蒋态度，根绝金融、经济、思想的扰乱政策。在英租界当局认识华北的新形势，并与日本互相协力.，共同建设东亚新秩序之前，决不罢休”。阐明了日本方面的意图。

6 月 23 日，临时政府通过驻北京英、法大使馆，向英法两国提出以下五项最低限度的要求。华北方面军对此全力支持，并发表声明坚决贯彻这一意图。

一、将租界内的恐怖分子及共产系统分子立即引渡临时政府。

二、协助临时政府实行通货政策，特别是在租界内禁止旧法币的流通及现银运出。

三、协助临时政府检查管理租界内的中国银行、钱庄及商行、公司等。

四、对违反临时政府政策的设施、言行、出版物等，严加取缔。

五、今后实行共同管理。

于是，事态从禁止法币流通的老问题，发展到新的局面。在这期间，英国方面一直进行着各种阴谋活动，但对封锁租界则感到无法应付，因此，提议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日本政府表示同意，并邀集现地有关人员，在东京进行了交涉。

东京会谈从 7 月 15 日开始，有关原则问题于 22 日达成协议，24 日进入天津问题的具体讨论。然而，26 日美国政府突然通告日本，废除“日美通商条约”(1911 年缔结)，希图牵制日英会谈。因此，英国态度立即转为强硬，并提出“禁止法币流通和移交现银意味着英国政策的根本改变，并且对第三国也有深刻影响，因而不能同意”的反对意见，因此，双方形成了根本的对立。

当时，鉴于法币正处在严重的危机之中，英国及重庆政府为了维持其价值，付出了极大的努力。

交涉越发难以进展，英国方面明确表现出要借国际压力，谋求会谈的对其有利开展。因此，日本方面撤回现地代表，于 14 日离开了东京。

18 日，由于英国方面建议抛开法币问题进行讨论，因而 21 日会谈终于破裂。

从此，在华北，以新民会及其它民间团体为中心，展开了积极的反英运动。

注:1940 年 4 丹，英国对挪威作战失败后，转向了妥协的态度。4 月下旬，根据英国方面的建议，再次举行了东京会谈。交涉得到顺利进展，终于在 6 月 19 日，达成了日英协定，20 日达成了日法协定。于是，现地军队于 20 日 8 时，解除了对天津英法租界的封锁。

七 中国方面的状况

国民政府(蒋政权)的抗战态势

武汉陷落后，自 1939 年 1 月 20 日起至 29 日止，国民党召开了第五届五中全会。

蒋介石在会上，以“抗战第二期的政策战略”为题，发表演说，提出基本方针:“在抗战第一期，努力消耗日本的力量，掩护我后方的准备工作，以奠定长期抗战的基础为其主要任务;在第二期，继承前期的成果，努力发挥抗战力量，坚决达到抗战的胜利和完成建国的目的。”并且抨击了对日和平论，强调坚持抗战。另外，五中全会决议，合并原来的“国防最高会议”和“中央政治委员会”，改为“国防最高委员会”。2 月 1 日，蒋介石就任委员长，总揽党、军大权，进一步加强了他的统治力量。

关于第二期作战方针，何应钦作了如下发言。

国军的第二期作战是:一方面保持我军的有利形势，继续消耗敌人力量，同时在另一方面，积极进行部队的整备训练，培养战斗力，寻找机会，转向大规模的攻势，以驱逐入侵之敌。

为此，注意事项如下:

一、各战区的第一线，要保持从武汉转进后的状态，并以约三分之一的兵力，加强扩大敌占区内的游击，以牵制和消耗敌人的兵力，造成于我军有利的形势，以便今后作战的顺利进行。

二、将全部正规军分三期实行整备训练，待训练结束后，预定开始大规模的反攻，但在情况有利时，随时进行反攻。

三，努力从事积聚武器，调整指挥机构，整备交通，扩充空军等各项工作。

关于第二期作战指导，中国国民党的党史中有如下记述。

作为本期作战的设想，特别值得提出的是，通过游击战与正规战的巧妙配合，不论南北战场，均应广泛地开展游击战，使敌人无暇应付。其实施要领，不仅是单纯的阻止敌人西进，在后方地区应努力培养我军战斗力，动员群众一致抗战，即所谓“变敌后方为前方”。

关于整训与部署

“整训”的意义在于改善编制，充实装备，统一人事和财经，励行教育训练等，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完成今后的作战准备。

武汉会战以前的中国军作战兵力，约为 200 个师，但在三年后抗战第二期末，已达到 296 个师、29 个旅，总兵力为 500 余万人。另外，部队的整训与作战同时进行，一方面加强第一线部队，进行积极抗战，另一方面，将长期战斗部队，撤回后方，进行了整编和训练。

抗战第二期内，重新划分的战区如下(1939 年 1 月)。冀察、鲁苏方面为游击战区，其它各战区以约三分之一的兵力，担任敌占区的游击。

第一战区 河南及安徽一部。

第二战区 山西及陕西一部。

第三战区 江苏南部、安徽南部、江苏东部及浙江、福建两省。

第四战区 广东、广西方面。

第五战区 安徽西部、湖北北部(长江以北)、河南南部。

第八战区 甘肃、宁夏、青海、绥远方面。

第九战区 江西西部、湖北南部(长江以南)、湖南省。

第十战区 陕西方面。

冀察战区 冀察方面。

苏鲁战区 苏北及山东方面。

另外，为了统一指挥南北两战场的各战区，在桂林及天水(别名秦州—甘肃省)增设行营，撤消了广州、西安、重庆的行营。

与此同时，为了整顿党及行政机关，特别是其所属组织，于 3 月在日军占领地区内，设置了“战地党政委员会”。根据 1 月召开的五中全会决议，以蒋介石为委员长，统制战地，其目的在于使党、政工作配合军事上的需要。在各战区设置分会，统制省以下的党及行政所属组织，担当发动群众一致抗战的任务。

2 月，在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长陈诚的主持下，召开了军队的政治工作会议，检查过去政治工作的缺陷，同时，讨论了今后的工作实施要领，并立即执行，其要点如下。

指出抗战第二期方针必须重视政治工作，据此，军事委员会决定“军队的政治工作，

必须以党为基础”，各部队一律组织特别党部，进行政治训练，使之担负特殊任务。

为此，各军事学校应制订政治训练计划，增进抗战建国中坚干部的政治才能，以巩固其信念，有重点地实行政治教育，此乃当务之急。

另外，在加强军队政治教育同时，还须融洽军民感情，为了实现军队行动与群众力量密切配合的军民合作，必须逐步采取措施对群众进行动员、组织训练。

军事委员会于5月公布了“游击队调整办法”，随后陆续制订了补给、训练、奖惩、纪律等20余项办法，以加强和扩大游击体制。

7月6日，当中国抗战二周年前夕，蒋介石以“告战地民众书”为题，发表广播讲话。其中阐述了“游击队的根据地，既扩大而又巩固，我们已经能够充分发挥‘变敌人后方为前方’的战略。近一年来，在敌人后方，我们的一切行动及配备，已经取得了与全面抗战的紧密联系。今天，在我们广阔的战场上，对敌已形成重重包围，并能进行前后夹击的形势”。号召民众积极发起游击战争。

然而，国民党系统军队的政治工作和游击战，与中共方面相比较，则相形见拙，不够熟练和妥善。故在国共并存的地区内，共产势力掌握着主导权，而且国民党方面逐渐受其侵蚀。斯诺对此情况，叙述如下。

蒋介石采用共军的几点意见编成游击队。但是，这些新编的游击部队，由于多种原因，未能获得成功。其理由之一是，由于没有独立的军事的、经济的及政治的基础，所以多有瞬息之间即被歼灭。而且，游击队的政治领导者，也不具备依靠人民力量建立根据地的技术和经验。想在一个晚上，把不惯于与农民互相协力的旧式军官，变为能得到群众信赖和支援的民主主义者，是不可能的。

中共的动向

中共中央委员会于1938年10月，在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对于今后的方针作出重要的决议。即一致确认领导抗日战争是党的责任，领导权不能让给国民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在统一战线内有团结也有斗争，“一切都通过统一战线”的妥协主义是错误的；全党应从事组织人民的抗日武装斗争、扩大解放区和人民军队;党的主要活动方面在于日军的后方;依靠国民党军队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或将人民的命运寄托于国民党反动派领导下的合法运动的想法，是错误的。

根据这个方针，八路军、新四军在日军占领地区内的各个地方，建立了“抗日民主根据地”，广泛建立了人民武装，其势力有了显著扩大。

1939年10月10日，中央委员会决定了“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指出由于第二次欧洲大战的爆发，日本以全力进攻中国，企图迅速处理中国问题，并准备在将来将冒险行动扩大到国际范围。为此，日军在其占领地区内，扫荡抗日根据地，并且一定要从事经济开发、树立傀儡政权。对我方则以政治攻击为主，军事攻击为辅。所谓政治攻击就是分裂抗日统一战线，分裂国共之间的合作关系，并诱使国民党政府投降。

中共为了党的团结与扩大党的势力，对日本及国民党采取了积极的姿态，并且努力防止动摇。

中共中央1940年1月28日向党内发出指示，明确了当前党的政策的基本

方针是:一方面坚决反抗投降派、顽固派的军事攻击和政治攻击;又一方面，积极发展全国党、政、军、民、学各个方面的统一战线，力争国民党中的大多数，力争中间阶层，力争抗战军队中的同情者，力争民众运动的深入，力争知识分子，力争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抗日武装、抗日政权的发展，力争党的巩固和进步。

通过这样的斗争，共产势力显著扩大。对此，胡乔木曾有如下叙述:

截至 1940 年抗日战争三周年纪念日，中国共产党领异的人民抗日军队，从三年前的四万余人，已发展到近 50 万人，抗击了在中国的日军的半数。在三年的作战期间，夺回了县城 150 处。解放区和游击区的人口，发展到近一亿。共产党员也从三年前的四万人发展到 80 万人。从辽宁、察哈尔、热河、绥远直到广东、海南岛，到处都有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组织。(未按中文资料核对一译者)

在此期间，共军与人民抗日武装组织结成一体，在各地展开了活跃的游击战。根据中共方面的资料，其概况如下:

一、将华北第一个解放区晋察冀边区的基地一五台根据地，向北部太行山脉一带扩大，抗击日军的治安肃正，进行了活跃的游击战(反扫荡)。

二、冀中平原游击战在地形上极为困难。1938 年末至翌年春，第一二 0 师进入冀中，支援了吕正操的部队。其后，针对日军的扫荡，不断地进行反扫荡，使日军“将占领的点和线，进而扩大成面”的企图，未能实现。平原游击战胜利的基本要素，在于党、政、军、民四位一体，紧密团结，以及正规军、游击队、群众武装三者的有机配合。

三、1939 年春，肖克组织了冀察热挺进军，在平北、冀东地区进行游击战，开始建设冀热辽边区的抗日根据地。

四、从 1937 年末开始，刘伯承指挥的第一二九师，于晋东南的太行、太岳地区开辟抗日据点，在山地进行游击战，并图加强该据点。

五、在冀南，于 1938 年 8 月设置冀南行政主任公署以来，与冀中相呼应进行平原游击战，特别是通过军民结合的广泛群众组织，围绕交通道路进行了斗争。

国共矛盾的激化

1938 年末，国共矛盾已如前述，但进入 1939 年后，国共的地方冲突事件在各地有所扩大。与此同时，国民党还开始了有组织的反共工作。1 月召开的国民党五中全会，为了加强国内统治，采取了各种措施，再次统一了 CC 系统及兰衣社等组织，分别组成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及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另外，三民主义青年团也于 9 月再次实行改编，在陈诚领导下，加强了对抗共产党的青年工作。

6 月，国民党公布了“异党活动限制办法”，9 月又公布了“异党活动问题处理方案”。前者规定严格限制共产党的思想、言论、行动，同时还附加了实行连坐法、保甲组织和特务工作，后者则是对共采取军事处理。共产党对此加强了党的保卫工作及反间谍斗争，并一心一意地努力扩大其势力。

①本书中的所谓“治安肃正”、“肃正作战”、“肃正建设”以及“肃正工作”等，其中“肃

正”一词，不仅是日本侵略者对我国的军事侵略，同时也包括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的侵略行动。—译注。

第三章 1940年度的治安战

一 根据全面形势的剧变所采取的各项施策

针对国际形势发展制订应付时局的措施

在欧洲方面，1940年3月苏芬停战不久，4月战端又起。4月9日德军向丹麦、挪威进攻，立即将该两国占领。继于5月10日，德军又突然在西线大举进攻，将英、法、荷、比军的主力击败，而向英法海峡和巴黎继续进击。英国派遣军40万人在敦克尔克陷于重围，直到6月上旬才算突围成功。6月10日意大利参战，14日巴黎陷落，22日德法签订停战条约。及至8月，德国对英本土的空袭突然升级。

在日本朝野，见到欧洲战机的动向，加深了对南方的关心，随着德军“闪电战”的进展，乘有利时机南进的呼声立即抬头。于是转变外交，建设高度国防国家、确立举国一致体制等问题，顿形表面化。7月16日米内内阁总辞职，22日近卫内阁成立。27日大本营和政府联席会议，通过了政府的《基本国策纲要》(26日阁议决定)，同时决定了《伴随世界形势进展对时局处理纲要》。本纲要列入国家机密，决定了日德意三国协作方针，以及解决中国事变问题和南方问题等重大国策。

纲要的提案理由如下:

……总之，帝国为了应付世界局势的变动，改善国际国内的形势，必须迅速解决中国事变问题，同时抓住有利时机解决南方问题。为此，在国际上，加强同德意的政治团结，迅速调整对苏外交，在国内，强化战时体制，充实各项战备工作，实为当务之急。

纲要的方针和事变处理要领如下:

伴随世界形势进展对时局处理纲要

方针

帝国为了应付变化着的世界形势，改善国内外的情况，应迅速解决中国事变，并抓住有利时机解决南方问题。

在中国事变尚未解决之前，应考虑内外情况，决定向以对南方施策为重点的局势转移。

对以上问题的各项准备应加紧进行。

要领

第一条:为了处理中国事变问题。应集中运用政治军事的综合力量，特别要彻底杜绝第三国的援蒋行为，采取一切手段，务使重庆政权早日屈服。

对南方施策，应利用形势发展的良机，积极促其实现。

第二条:对外施策，在加速解决中国事变的同时，应以解决南方问题为目标，按下述要领进行:

一、首先以对德、意、苏施策为重点，着重于加强同德意的政治团结，谋求对苏国交的飞跃调整。

二、对美应坚持公正的主张，严肃的态度，为了贯彻帝国必要的施策，对与之俱来的

形势恶化，固然在所不辞，但也应深切注意其动向，尽量避免由我方引起不必要的摩擦。

三、对法属安南及香港按下述要领行事:

(1)为促使法属安南(包括广州湾)彻底断绝援蒋行为，并要求其同意负责对我军的补给，允许我军过境及使用飞机场，为帝国获得必要的物资给予方便。为此，根据情况可以便用武力。

(2)对香港，为彻底切断在缅甸的援蒋通道(指滇缅公给—译者)，要求予以配合，并为消除敌意加强各项措施。

(3)对租界，首先要求消除敌意及撤退交战国的军队，再逐步导致由中国收回管理。

(4)采取前两项措施时，有关使用武力问题，按照第三条所示。

关于当时统帅部的指导思想，曾任参谋本部作战课长的冈田重一大佐回忆如下:

肩负着中国事变的重担而又对南方行使武力，这是极端冒险的行动。然而解决中国事变又别无良策。中国事变乃是国际形势之一环，如果错过这一最后机会，则不仅过去的努力成为泡影，而且日本还不得不退回到中国事变以前的状态。经过反复考虑的结果，认为无论如何总得摆脱解决中国事变的困扰，从而必须利用国际形势的非常局面。中国事变放在以后听其自然解决，当前则正是南进的天赐良机。这是统帅部内心的意图。

其后，面对新的形势，中央的各项措施都是按时局处理纲要的精神逐一进行的。9 月 23 日华南方面军，为达到切断援蒋补给线的目的，开始向法属安南北部地区进军。27 日日德意三国条约签订。

在此以前，大本营鉴于中国派遣军宜昌作战的进展状况，为了确保宜昌，6 月 16 日向武汉地区增派近卫、第四两师团。又根据华南方面的情况，6 月 26 日奉天皇命令将近卫师团编入华南方面军所属的第二十二军。继于 7 月 23 日以“大陆命”第 438 号把华南方面军调出中国派遣军的战斗序列，归入大本营直辖。这一系列调动的理由，是为了适应变化多端的国际形势，谋求政战两略的步调一致，以便在运筹上作到神速自如。

这些措施遭到了中国派遣军的极力反对，因为中央统帅部和中国派遣军以及华南方面军之间，在对形势估计上持有不同的意见。中国派遣军认为，应结合扶植汪政权工作、“桐工作”(对重庆工作代号—译者)等的进展，对重庆政权施加军事压力，以期早日解决中国事变。而中央统帅部和华南方面军则认为，应该适应世界形势的发展，着重解决香港和法属安南的问题。

7 月 23 日“大陆命”第 439 号，对中国派遣军和华南方面军分派了任务。在该命令中，特别强调了应付形势的变化加强对第三国的战备问题。

“大陆命”第 439 号命令

一、大本营的目的在于迅速解决中国事变。为此，必须努力摧毁敌人继续战斗的意志，同时为适应情况的变化， 迅速加强对第三国的战备。

二、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须按下列指示，负责摧毁敌方继续作战的意志。

(1)确保西苏尼特王府、百灵庙、安北、黄河、黄泛区、庐州、芜湖、杭州之线以东地区，并保证宁波附近要地之安定。首先加速恢复内蒙地方、山西省北部、河北省北部、山东省各重要区域，以及上海、南京、杭州一带的治安。

(2)确保岳州以东扬子江下游的交通安全，以武汉三镇、九江为根据，摧毁敌人继续作战意图。作战区域大致在安庆、信阳、宜昌、岳州、南昌之间。

(3)超越上述地区的地面作战，另行指示。

(4)适时进行全面空战，扰乱敌之战略中枢，阻止敌空军的重新编成，空战范围为中国全境。

(5)在上述每一作战中，有关海岸及沿海水域以及空中作战，必要时应与华南方面军司令官、中国方面舰队司令官协商进行。

(6)为了促使抗日势力衰亡，应加强对中国全境的谋略工作。

关于华南方面对中国的谋略工作，着由华南方面军司令官区别情况予以处理。

(7)根据作战上的需要，可派出部分军队暂时进入满、中国境附近的热河省内。

三、华南方面军司令官须按下列指示，负责摧毁敌人继续作战意图。

(1)占领广东附近、汕头附近和海南岛北部的各要地，及沿南宁——龙州道路地区，协同海军切断敌方补给联络线。

广东附近的作战地区，大致为惠州、从化、清远、北江及由三水到下游的西江之间。

(2)超越上述各地区的地面作战，另行指示。

(3)当中国派遣军或中国方面舰队(指日本的侵华舰队—译者)由华南实行空中进攻作战时，应密切与之配合。

(4)在中国派遣军的指导下，加强对中国的谋略。

(5)为了解决中国事变问题，应作好对第三国作战的必要准备。

根据以上各项，过去赋与中国派遣军司令官的任务，现已变更如下:

一、解除在华南地区的任务，

二、在保证治安稳定的地区内，增加了宁波附近地区，第十一军的作战地区包括宜昌。

三、空中进攻作战范围仍为中国全境，但必要时应与华南方面军司令官协商进行。

四、负责加强对全中国的谋略工作，关于对华南方面的谋略工作，着由华南方面军司令官区别情况予以处理。

促进汪蒋合流工作

3月30日，新国民政府成立。今后的问题是，日本将在何时承认新政权，以及签订建交条约。日本陆军当局想在承认之前，首先促成新政权和重庆政府的合流，从而全面和平解决中国事变问题，因此加紧了对重庆的工作。然而，在这一问题上，思想并未得到一致，从派遣军到国内，存在各种各样相互对立的意见。

有关这一情况，当时的海军省军务局长阿部胜雄少将(后升中将)在5月上旬召开的参谋长会议上，曾作过如下发言:

其中主要的对立意见有:一、主张重点放在以重庆为对象解决事变问题的方案，和主张以扶植新政权为主而不考虑重庆动向的方案。二、主张从战胜国应得权益出发的日本本位主义的方案，和主张着重于对新中国的建设，而避免榨取政策的方案。三、主张放弃华南、华中，确保华北的意见，和与此相反的重视华中、华南的意见。由于这些对立意见，使有关部门在事变处理上大伤脑筋。

根据当时陆军省军务局课员石井秋穗中佐(后升大佐)的回忆，1940年可以说是徘徊于重庆工作和南京汪政权工作之间的一年，也就是徘徊于事变速决和

长期持久的问题之间的一年。恰好就在此时，欧洲西线战场形势急剧变化，我们的视线也开始移向南方。

关于承认新的中央政府问题，曾任中国派遣军参谋的(土屈)场一雄中佐说明如下:

中国派遣军总部当局坚持既定方针，以汪蒋合流为目标迅速解决中国事变，综合各种意见，在当地统一指导各方面对重庆的工作。在五月上旬作出决定，尽最后努力争取在秋季解决事变问题。如果这一方案落空，约在年底以前作最后决定一正式承认新政权，转入长期持久战的新局面。

关于这一问题，石井中佐回忆如下。

汪兆铭等在新中央政府成立之前。就曾要求我方及时予以承认。而政府当时决定，“正式承认新中央政府的时机，将考虑内外形势而定，约在日华基本条约签订之时”。如果仅是缔约交涉，并不需很多时日。然而，就在 4 月 11 日兴亚院的联络委员会上，讨论条约起草时，对汪政权在事变解决中能起多大作用产生了疑问。另外，对“桐工作”(重庆工作)的进展却寄与很大希望。因此，不得不设法拖延签订条约和承认新政权的时间。

5 月 29 日，兴亚院专门委员会草成条约初稿，30 日拿到陆军省审核时得出的结论是:一、如果承认汪政权，就必然形成长期持久战。二、关于长期持久战的决心和处置，另行研究。三、即使承认汪政权，该政权也无发展前途。

这些意见，和过去的见解是一致的。

对于重庆的和平工作，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但是，客观形势不允许我们对新政权的承认长期拖延。至 9 月末，看出“桐工作”已经无望，从而，只能由政府进行最后的和平工作，视其结果作出决定。

我于 10 月初开始起草长期持久战的方案。1940 年，是对重庆政权和汪政权衡量取舍问题，进行激烈争辩的一年。

4 月 1 日，阿部信行大将被命为对华交涉的特命全权大使。他的任务是:一、对新中央政府的协作(根据内阁总理大臣的指示行事)，二、在中国，日本与第三国的关系及日中新关系的条约签订事务(根据外务大臣的指示行事)。有关重要政策的处理及有关治安问题，应与有关陆海军最高指挥官协商进行。另外，与兴亚院联络部虽无直接领导关系，但有关业务可进行联系和协商。对我在华的外交机关，根据工作需要可给予指示。

梅机关(对汪工作)的大部分成员均被编为全权大使的随员，并准备根据新政府的邀请，派出影佐少将为军事委员会的最高顾问，青木一男为经济委员会的最高顾问。日华条约交涉，从 6 月初开始，日本政府提出了兴亚院审议过的提案。这一提案主要是依据去年末，日华调整协议(密约)的精神加以若干修正而成的。8 月 28 日，阿部大使和汪代主席间的条约交涉宣告结束。

国共走向妥协的努力及双方的交涉

1940 年春，八路军在河北省和山西省中北部，迫使国民党势力后退，并在山东省西部进攻孙良诚、高树勋两部，而进入山东西部、河南东部、安徽北部地区，企图与由长江以南地区北上的新四军会合。

中共中央领导对国民党的斗争，逐渐强硬。5 月 4 日对中共东南局发出以

下指示。

注:东南局是1938年到1941年代表中共中央在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等省的党的领导机关。由于当时的领导者项英(新四军副军长兼政治委员)有严重的右倾思想,因而中共中央才要求他坚决执行中央方针。

国民党反共顽固派执行防共、限共、反共政策,并以此为投降日本作准备的时候,我们应强调对国民党的斗争,不应强调统一。对于一切反共顽固派的反动法律、命令、宣传、批评,我们均应提出针锋相对的办法和他们作坚决的斗争。斗争是克服投降危险、争取局势好转、巩固国共合作的最主要的方法。必须以斗争求发展。所谓发展,就是不受国民党的限制,越出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围,不要别人委任,纵无上级发给的军费,也要独立自全地放手地扩大军队,坚决建立根据地,在根据地中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例如在江苏境内,应不顾反共分子的限制和压迫,西起南京,东至海岸,南至杭州,北至徐州,尽速将一切可能控制的区域控制在我们手中,独立自由地扩大军队,建立政权,设立财政机关,征收抗日捐税,设立经济机关,发展农工商业,开办各种学校,大批培养干部。(以上按原文译出,经与《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一文对照,日文有颠倒次序及词句删改之处——译者)

如果按照这一指示使事态发展下去,其结果必将因国共全面冲突而招致统一战线的崩溃。然而在对日抗战过程中,国共分裂是不利的。因此,双方均深感有调整关系之必要。于是7月16日在重庆进行和平谈判。国民党政府统帅部派出何应钦,白崇禧,中共方面派出周恩来、叶剑英为代表进行会谈。在此以前,中共方面曾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所谓《六月提案》。其要点如下:

一、保证各抗日党派的合法存在权;

二、释放在狱中的共产党员,解除对中共刊物的出版限制;

三、解放(日文原文如此—译者)游击区的地方政权;

四、组成陕甘宁边区23县的边区政府,使之隶属于行政院,以现边区主席林祖涵任边区政府主席;

五、第十八集团军扩编为三个军九个师,其所属游击队应与各战区游击队享受同等待遇;

六、新四军增编为七个支队;

七、中共军队和国民党军队之间应设作战境界线,

八、对中共军队的武器、弹药、粮秣等的供给,应与国民党军队同一标准。(未与中文资料核对——译者)

国民党当局也于7月2口提出了相对的提案,这个提案不仅阻止中共扩大势力,并且削减中共现有的势力,限制中共的独立自主,要将中共完全置于国民党统治之下。7月16日,双方讨论了经过修正的7月2日提案,即所谓《国民党的7月提案》。

周恩来把国民党的7月提案带回延安,经过研究,又提出了对中共有利的《八月提案》。其后,周恩来又于9月提出稍作让步的下列提议。

一、第十八集团军的作战地区应从第二战区扩大到山东全省和绥远一部。

二、第十八集团军、新四军和各地游击队的全部军费应由国民党政府支给。

三、各游击队的游击区限定于战区之内，各战区内的中共军队和国民党军队划分作战境界，各自在所管境界内进行战斗。

(未与中文资料核对—译者)

上述多次的交涉，并未解决任何根本问题。中共方面继续加强独立自主，以既成事实使国民党承认。而国民党方面则指责“中共不服从中央指挥，在指定战区以外进行活动，任意扩充军队，破坏中央行政系统，不攻击日军反而企图吞并政府军”。并令中共军全部撤到黄河以北地区从事抗战。

中共对国民党方面的指责和命令当然不能服从，各地的国共纠纷始终不断，尤以江苏、山东地区为甚，事态日趋恶化。

注:在国共双方交涉期间，共军对日军进行了百团大战，这是值得注意的一件事。

现将其后状况概述如下:

10 月 19 日,国民党当局命令中共所有军队在一个月内全部撤到黄河以北,中共对此命令未予服从。12 月 9 日又再度命令中共:“黄河以南的第十八集团军，须于 12 月底以前过江北上，江南的新四军限 12 月底撤至长江以北，翌年一月末移驻黄河以北。”对此，中共方面于 12 月 21 日提出‘对中共军队的扩编、补给应与政府军一律平等、解除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将担任封锁的政府军调往抗日前线”的强烈要求。

至此，国共关系益趋恶化，形成无法妥协的局面。

二 华北方面军关于肃正工作的施策

1940 年春中国军和地方治安状况

在华北占领区内的重庆系军队，由于日军的讨伐及其后方补给的缺乏，势力不断缩小。共军则巧妙地乘隙渗透其势力，或以武力迅速扩大地盘。

华北方面军与占领区外围的重庆系军队相对峙，而在占领区内特别在山西北部、东部、河北一带及山东大部地区，共军无论在质量上、数量上均已形成抗日游击战的主力。因此，占领区内治安肃正的主要对象，自然是中共势力。方面军对中共的活动予以深切的注意。

1940 年 3 月末，当时在华北的中国军队分布状况，据中国派遣军的《战时月报》记载如下。

华北方面的敌情概况

一、内蒙地区

在后套方面，傅作义企图夺回五原，从 3 月中旬开始进攻，21 日占领五原。到 25 日，由于我驻蒙部队的反击。其主力撤退到临河以东地区。

二、山西地区

3 月上旬，共军第一二九师的三八五旅和第一一五师的三四四旅侵入林县、陵川一带(太行山脉南部地区)。给中央军第九十七军和新编第五军以重大打击，收编了第九十七军的大部兵员，新编第五军所属约 3,000 人向日军投降。

在晋南方面:卫立煌一面在陵川、高平集结第二十七，第九十三、第十四、第四十七

军共约十个师的兵力，准备进攻太行山区的第十八集团军。同时，卫立煌于 3 月 19 日亲赴泽州，同朱德等共军首脑会谈，协商解决国共纠纷。事后，共军陆续撤退，该地区的纷争暂告结束。

在晋西方面: 山西军受国共纷争的影响，更由于共产势力的渗透，各地发生内讧，指挥紊乱，战斗力显著降低。重庆政府唯恐山西军的共产化，乃于 3 月中旬，命中央直系第九十军(三个师)，东渡黄河进驻乡宁，对山西军进行督战。

三、河北地区

在冀南和鲁西一带，石友三军(冀南地区游击队)受共军第一二九师三八六旅和东进支队的压迫，兵力丧失大半，于 3 月中旬撤至定陶、曹县一带整编，并企图东山再起。另外，在河北省内的国民党势力也日渐衰微。冀察战区司令官鹿钟麟于 4 月上旬，提出辞职逃往省外。以后由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兼任该职。

四、山东地区

苏鲁战区的第五十一、第五十七军仍彷徨于泰山山脉一带，战区司令官于学忠于 4 月 1 日成立战地党政委员会支部，企图加强军政两方面的活动。

在鲁北的共军，以一一五师为基干的东进纵队(由一一五师副师长徐向前指挥)，在鲁西以一二九师正规部队为基干的东进挺进纵队(肖华指挥)，和在鲁东、鲁南的山东纵队(第一一八支队)以及在皖北、苏北的新四军部队等，为削弱国民党势力，壮大自己力量，正在积极行动。

鲁西地区的菏泽、郓城、平阴、肥城、济宁、鱼台、汶上、嘉祥、矩野、聊城、博平等各县的大部分均为共军所掌握。

五、华北方面占领地区内的敌兵力如下。

1940 年 3 月末

正规军	中央军	约 38 万	约 500,000	总数约 735,500
	中共军	约 13 万		
非正规军（匪团）	共产系游击队	约 11 万	约 334,400	
	共产系匪团	约 5 万		
	国民党系游击队	约 6.7 万		
	国民党系匪团	约 7000		
	纯匪团	约 1500		

原文数字如此—译者

六、国共对立的状况

如前所述，在华北方面，国共对立气氛日益激化。在山西北部、河北南部、山东西部等地，两者间的战斗正在进行。这些情况预示双方由合作逐渐走向破裂。而各处均以国民党势力的败北而告终。这些事实，充分说明今后治安肃正的对象，无疑是共产党势力。

注: 1940 年 3 月 22 日，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曾向陆军次官提出过下述报告，他提出要警惕中共和苏联的结合。要积极利用国共相剋的时机解决中国事变问题。当时，共军虽正在积极扩充军队，但尚未掌握其确实清况。

对国共相剋的观察

一、(笔者略)

二、(前段笔者略)共产党首脑自去年以来，屡次向重庆政府要求将共产党地下工作所取得的成果合法化，承认共产党据有的地盘，支给与现有兵力相称的军费(当时只支给八路军每月 60 万元，新四军每月 25 万元的军费)。但是，重庆政权却于去年末秘密颁发了《禁

止异党活动办法》，对中共上述要求予以拒绝。中共则决心壮大实力，争取就地自力生存，将分散的兵力集中统一，进而破坏当地国民党的行政组织，建立共产党的行政组织，自行征税，袭击中央军及其行李辎重，以获得武器弹药。

三、总之，在国共斗争的现阶段，重庆政府已在某种程度上有放弃华北的打算，共产党则极力巩固既得地盘，扩充武力，就地图存，进而驱逐国民党势力。这实际上不过是争地盘的斗争而已。

然而共产党一旦沟通其占领的地盘及补给路线，特别是打通西北的通道，即可直接得到苏联援助，那就无论对国民党或对日军都是严重的问题。鉴于苏联已与芬兰和解，如果重庆政府的抗战态度软化，估计苏联很可能直接援助中共。

四、中国派遣军，在当前密切注意国共相剋的动态，及时地利用有利的机会，做为解决中国事变转折点。

五、共军的编制概要(参看插表)

华北、华中治安状况概要 1940 年春，当时的华北、华中部分城市的治安状况(见插表)

注:该资料是兴亚院华北联络部政务局调查所委托新民学院职员本田多利卫氏，于 1940 年 2 月 14 日至 3 月 9 日间所作的实地调查报告书的摘要。这是军外人士对治安状况的观察，颇值重视。

华北、华中各主要都市及其近郊的治安状况

调查项目 / 地名月日	治安状况		交通通信状况		维持治安的手段	意见
	昼间	夜间	铁路	电话线路		
上海市 及其附近 2.14 至 2.28	1.公共租界的治安状况较好，日本人和亲日人士单独行动不安全，租界地更为危险。2.2 月 15 日起，海军陆战队解除交通限制。	公共租界特别是英法租界单独行动极为危险。	上海—南京，上海一杭州间列车一日运行两次，夜车因不安全已停驶。	电线被切断，电线杆被破坏等事时有发生。	英法租界公共租界的部分地区由该两国军队及工部局警察维持。除上述地区外，由日军、日本领事馆警察，上海特别市警察维持。	英法租界及难民居住区是流氓盗匪的温床，是治安上的一大病根。
南京 2.21 至 2.22	1.城市治安良好，单独行动亦无危险。2.城外数华里以内安全，稍远即有危险。	城内虽较安全，但单独行动无保证	最近良好，夜间亦无危险。	切断电线事最近显著减少。	1.城内外由日军、中国警备队警察共同维持。 2.汪政权的军队、警察正在培训组建阶段。	比上海诸事就绪，治安维持亦较好，但仍未完善。

徐州 2.25	1.城市平静，但城外 2—3 华里的村庄、昼间单独行动亦有危险。	城市比较安全，但单独行动不安全，城外则更危险。	本年内陇海线未遭破坏，津浦线被破坏事故甚多。	各地电线，电线杆均发生过破坏事故。	1.各主要地点均有日军驻在与当地中国警备队、警察共同维持治安。2.自去年 9 月在徐州成立了中国青年党，在日军的指导下，培养其成为新民会的前卫战士。	地处华北华中的连络要冲，蒋介石的扰乱破坏不断，治安状况难称良好。
开封 2.25	城内治安较好，单独行动亦无危险，但 城外则极为危险。	城内单独行动亦甚危险。	开封—大同间的列车一日运行一次，开封—新乡间的新开线一日运行两次，最近时遭破坏。	最近未遭破坏。	城内外的治安由日军和中国警备队、警察共同担任，警备队是由投降兵组成的。在市、县自去年 5 月以来已组成河南省自卫队	由于和据点郑州接近，四周的状况极不安定。
太原.榆次 3.1 至 3.4	两地在城内单独行动均较安全，城外则不安全。太原、榆次间的长途汽车曾发生被共军袭击等事故。	城内安全，城外危险，省内 95 县仅有 60 县尚可听令于省政府。	太原—运城间，太原—大同间列车每日运行两次，路轨时遭破坏。	在夜间电线和电线杆被破坏事故，最近渐减少。	1.两地均有日军和中国警备队警察维持治安。2.最近中国方面积极加强警备兵力。	受阎锡山的山西门罗主义影响，气氛确与其他地区不同
保定 3.6 至 3.7	1.城内和城外数里内治安良好。2.城门守卫只有中国警备队独立担任，	城内安全。城外单独行动难于保证安全。	保定—北京间一日运行三次。保定—石门，一日运行两次，未发生破坏事故。	本年只发生过 1—2 次破坏事故，最近并未发生。	1.城内治安由日军、中国警备队警察共同负责。2.中国方面的警备兵力遂渐加强，各县的	在其他地方很少见的安定局面，城门并不设岗哨。

					保安队正在组建。	
满城 3.9	县政府所在地及其附近治安较好。城西北，西南的山地中共军的传动频繁。	夜间中共军侵入，拉走青年，掠夺物资	昼间保定满城间长途汽车正常运行。	城内电话畅通，保定满城间长途电话线路时被切断。	少数日军和县警备队维持治安。1939年4月保安队成立。	城外山岳地区有中共军独立第一师杨成武部队活动，其势力不可轻视。

1940年度肃正工作的根本方针

华北方面军过去一年的治安肃正工作，由于各兵团的积极努力，不仅占领区内的治安已经恢复，而且各项建设的施策也逐步迈入正规，出现了正常发展的局面。但距离解决事变所需要完成的肃正建设目标尚远，必须进一步努力奋斗。因此，1940年度，不仅要在上年度的基础上继续推行各项施策，争取治安地区的扩大，更须推动有关建设部门，为奠定东亚新秩序的基础—“华北特区”的建设而奋勇前进。

在作战方面，自去年第二期以来，共军势力逐渐抬头，及至第三期，已开始对重庆军及杂牌军进行蚕食，其势力迅速发展壮大，不容轻视。如不及早采取对策，华北将成为中共天下。为此，方面军的讨伐重点，必须全面指向共军。另外，由于交通运输断绝。严重影响华北建设。因而整顿交通运输，尤其是开通内河航路，对肃正建设的促进，治安地区的扩大，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治安工作，要求将政治上、经济上处于重要地位的“模范区”，与铁路、水路等沿线的“延长治安区”连结贯通，以逐步扩大治安区域。在“模范区”要结合巩固治安，着重加强自卫组织和扩充以自主经济为基础的合作社组织，以实现名副其实的“模范治安区”。同时，要做到食用充足，稳定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努力促使民众生活的安定。

1940年度的肃正建设计划分为两期，第一期由4月到9月末，第二期由9月到年底。

1940年度肃正建设的基本方针

1940年度的肃正建设工作，要在去年的基础上，尽快建成特殊地区巩固的华北，用以示范并指导中国的治安建设。

为此，应以“治安第一”为各项施策的基础，将各项工作有机地统一于剿灭共军的前提之下，继续实行高度分散部署兵力，积极进行讨伐，同时，将治安建设的各项工作集中于“模范区”的建设，要引导中国方面各行政机关，积极自觉地扩大群众组织，特别要整

顿新民会以加强其领导。

另外，凡对我国生产发展有用的重要资源，应促进其开发及取得。

1940年度第一期肃正建设计划

方面军于3月19日，召开各兵团参谋长会议，传达了事变第四年的“肃正建设的有关实施方案”，在会上，多田方面军司令官在训话中表明了下述决心。

实现肃正建设，其前途甚为辽远。尤其敌人积极强化地下组织，继续进行顽强抵抗，要剿灭这种地下组织的势力，存在很大困难。在建设方面，也由于事变的长期化带来各种障碍，欲求速见成效，看来更为困难。此外，现阶段所采取的高度分散部署兵力的战法，对军队的教育训练产生不利的后果。针对上述问题，方面军根据过去一年的宝贵经验和治安建设的成效，决定了下期肃正建设的方针。要求全军一致，为确保治安，促进华北特殊地区的建设。这是解决事变的关键所在。必须共同奋勉，为皇纪2600年增光。

当时的方面军司令官为多田骏中将，参谋长为笠原幸雄巾将。参谋副长为平田正判少将。参谋的阵容如下:

第一课 田村义富大佐，友森清晴中佐，加登川幸太郎大尉，赖富美夫大尉。

第二课 浜田平大佐，堂之脇光雄中佐，田中忠胜少佐，尾关正尔大尉。

第三课 副岛太郎大佐，小幡一喜中佐，堀内秀生少佐，中山忠雄大尉。

第四课 有末精三大佐，山田英男中佐，官本悦雄少佐，浅井勇大尉。

方面军在这次会上，下达了实施 1940 年度第一期肃正建设计划的命令如下:

一、方面军在1939年度第三期肃正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充实各项施策，作好本期工作。

二、所属各兵团各部队应按附件1940年度第一期肃正建设计划完成各项任务。

方面军有关统一规划事项，必要时另行指示。

上述命令附件的“1940年度第一期肃正建设”纲要如下。

一、扩大 1939 年度肃正工作的成果，务使讨伐肃正更加彻底，进一步加强各项治安工作，切实恢复冶安，并推进“日满中连锁国防经济”的建设。

二、在讨伐肃正方面，各兵团仍须继续执行“高度分散部署”现行办法，振作士气，坚持彻底讨伐，并加强谍报工作，千方百计查清敌地下组织，特别着重以下两项。

1.讨伐重点指向剿灭共产匪团。

2.肃清京汉、津浦两线中间的冀中地区，打通滏阳河及卫河水路。

三、在治安工作及各项建设方面，仍以“治安第一”为基础，各地根据具体情况，指导中国各机关，采取迅速有效措施。

1.强化自卫能力，安定人民生活，建立合乎民情的基层组织。对模范区的一切措施，均应优先促其实现。

2.推进“日满中连锁国防经济”的建设。

四、积极培养治安军及其他中国武装团体，使之迅速增强战斗力，在皇军的支援下，逐步成为地方治安的骨干。

五、随着治安建设的发展，日军应逐步集结，恢复常驻态势，加强教育训练。

六、年度第一期肃正建设的期限，为 4 月到 9 月的六个月。

会上，方面军参谋长笠原在说明上述纲要之后，并作了以下讲话。

各兵团长，今后对各自作战地区的作战、政务，应负统一指挥之责，并须全力以赴进行肃正建设。各兵团特别是各军应切实掌握所在地的中国省公署，推动适合各省特殊性的政策并促其实现。对各自负责的地区，必须满怀热情，主动承担建成王道乐士，完成第一期肃正建设的任务。所谓对省公署的掌握，只是对各兵团长提出的要求，其他各下级军队指挥官不得直接干涉不必要的政务，这是我们的一贯方针。今后随着治安状况的好转，军队将逐步脱离政务，全力从事讨伐训练等军队任务。

接着，参谋长又反复强调了作战和政务的有机一元化问题;各兵团积极完成任务问题;根据各地区的特殊性，如何把各项施策具体执行等。

基于上述纲要，制订的要领如下:

要领

其一 彻底的讨伐肃正

一、为使讨伐肃正作到彻底，前期肃正计划中已有指示，除按各该项指示外并依照以下各项实行。

二、关于继续实行高度分散部署兵力积极讨伐问题。

1. 各兵团于治安良好地区以外之各地，仍须执行高度分散部署兵力，并以之为据点积极进行讨伐，逐步使据点成为确保治安的有力支柱。

2.各部队已经克服了长期分散部署兵力的不利条件，更应经常鼓舞士气，积极进行讨伐，以期扩大讨伐成果。

3.发挥谍报作用，扩大谍报机能，挖出地下匪团。

三、关于讨伐重点问题

讨伐重点在于剿灭共军。为此，要善于利用国共的相互倾轧，在皇军势力暂时不能控制的地区，应默许那些不主动求战的杂牌军的存在。必要时，甚至可以引导他们占据真空地带以防止共军侵入。在皇军势力到达后，着手建立政权的地区，对投降的匪团，一律按照“无条件投降”的规定处理，对投降后的匪团，要无遗漏地给以生活安排。

四、关于讨伐肃正的重点地区问题

1.讨伐肃正的重点地区为京汉、津浦两线之间，特别是冀中地区，要随着打通水路进行肃正讨伐。下记各兵团应以较大兵力使用于该地区:

第二 0 七师团，第一一 0 师团，独立混成第十五旅团，第十二军。

讨伐地区的范围及其时机，应与打通水路相一致。

2.根据山西省北部地区共军的情况，由第一军及驻蒙军对之进行彻底肃正作战。其时机依据情况预定大约在 6 月或 6 月以后。

3.第一军于 4 月下旬开始晋南作战，将治安区扩展到平陆、沁水及泽州平原。为此，在本作战期间给第一军增加配属以下兵力:

由第十二军派出步兵一个大队

由驻蒙军派出步兵两个大队

第三十五师团应准备以一部兵力协助本作战。

五、关于打通水路问题

为打通水路而进行的讨伐，应按以下各项实行:

1.时机和参加兵团:

(A)第一期

保定水路┐　自 4 月上旬　┌第二十七师团

石门水路┤ ━至 5 月下旬━ ├第一一 0 师团

滏阳水路┘　　└独立混戍第十五旅团

(B)第二期

┌第二十七师团

卫河水路自 6 月上旬至 7 月下旬　├第一一 0 师团

├第三十五师团

└第十二军

2.实施要领

(A)参加第一期讨伐的各兵团，于 4 月上旬开始行动，到 4 月下旬部队到达水路沿线一带结束第一次讨伐，将部队进行必要部署，尔后以此为据点进行连续反复的讨伐以打通水路。

在此期间，各作战地区内的第一水路输送队的临时办事处及其指挥的部队，均应归该地区的兵团统一指挥。

(B)第二期的实施要领另行指示。

(C)第一期，水路输送队的主力应按第一项指示部署于水路沿线，但须按第一、第二两期的时间划分，相应转移其主力。

(D)讨伐实施完了后，应在水路沿线各要点经常保持足够的兵力，并准备部分水上游动兵力。

(E)下记各兵团须于 6 月末以前，编成下述水路警备队:

第二十七师团 500 名

第三十五师团 150 名

第一一 0 师团 500 名

第十二军　　350 名

六、兵力转属、配属问颐

1.4 月上旬，由第十二军抽调一个步兵大队，在晋南作战期间配属于第一军，至 5 月下旬再转属于第-一一 0 师团。

2.5 月下旬，由第二十七师团抽周一个步兵大队，转属于第十二军。

3.4 月上旬，由驻蒙军抽调两个步兵大队在晋南作战期间配属于第一军。

七、关于控制兵力

根据作战的需要，为便于集中使用兵力，须准备下列兵力，必要时由方面军司令官调用。

下述兵力，在调用以前，仍可按正常情况使用。

第一军　　步兵二个大队

第十二军　　步兵二个大队

驻蒙军　　步兵二个大队

第二十七师团 步兵一个大队

第一一 0 师团 步兵二个大队

八、对占领区以外的谋略工作

对占领区以外的敌人，进行劝降以及谋略工作，除特别指示者外，统由方面军直接进

行。

其二 各项治安工作的进行和经济建设的推进

按附件《1940度建设纲要》指示各项结合本期任务进行。(建设纲要原件缺如一笔者)

其三 对治安军及其它中国武装团体的培育指导

一、对治安军队及其它中国武装团体的培育指导，除按前期计划中指示各项办理外，当地部队应直接予以指导援助。上级部队长也应亲自进行视察检阅，以促进其成长。此外，按以下各项办理。

二、关于治安军

治安军，应在本年9月以后，主要部署在所编成的地点附近的指定地区，并加以教育训练，使之成为皇军的助手，能够独立负担维持治安的任务。

本年秋计划新编成16个团，编成位置等如附表第一。

各兵团为使治安军顺利编成，应通过青年的训练，作好召募优秀青年入伍的准备工作。

三、关于剿共军和绥靖军

对剿共军，应采取逐渐整顿减缩的方针，淘汰不良分子，加强训练，使其成为可信赖的武装团体。

对绥靖军的处理，亦按上述精神办理。

注:剿共军是由投降的武装团体编成的，绥靖军是以吴佩孚绥靖委员会的地盘为基础所组织的部队，两者均非正规部队。一笔者

四、关于县警备队

县警备队是普及县政的推动力量，维持当地治安的骨干。因此，对其实力的扩充整顿，人员的刷新，部队的训练，均应抓紧。对模范地区的警备队，更应尽快整顿、训练，务必在本期末以前使其能承担上述任务。

为对县警备队进行经常性的训练指导，急需派出专职联络员。在该员未派出之前，暂由我驻县守备队派出适当的军士(上士或中士)一名，担任县警备队的训练及指导。

上述军士在派出期间应列为编外，遗缺可另行补充。

模范区警备队之枪支不足时，应由各兵团在其增加装备项下以缴获枪支给子补充。兵团增加装备用的枪支(规定限额为4,000支)，其不足部分可向方面军申请借与。

五，铁路警务机关

对铁路警务机关的整顿，应按《铁路警务机关整备纲要》进行。务必使其尽早成为皇军的得力助手，能够独立担当铁路的警备。(参阅附表第二)

各兵团应积极支援，指导各铁路警务机关的充实和训练工作，经常进行检查。根据其战斗力提高的程度，逐步将警备任务向其移交，尽量收缩皇军的直接警备兵力，直至最终撤出铁路沿线。

六、青年训练

对青年的训练工作，务求进一步普及深入，用以扩大在民众中的影响。

其四 交通通信

一、警备道路

对作战地区的警备道路，要及早整修加固以备军用，防止在雨季发生交通中断等事故。

主要交通干线的治安一经恢复，要尽快恢复汽车运行。

二、警备通信

各警备部队所属系统间的通信，应以有线通信为主，并尽力加以扩充。

第二十七、第一一0师团、独立混成第十五旅团及十二军作战区内的各警备队，相互间应构成警备通信线路。

沿已开通水路的重要地区，也应构成直接水路警备和水运上所必需的通信网，努力修

整有线通信线路。

其五 宣传

一、宣传工作，除按前期计划中所示有关宣传各项外，应根据以下各条指示进行。

二、占领区内的宣传

1.务使民众了解:新中央政权的成立，即意味着蒋政权的垮台。这是亲日防共实现和平的新阶段。今后只有新政权才能为民众谋福利。

2.新中央政权完全继承临时政府的施政方针，委任华北政务委员会代行其政务，一切有关民生福利仍按旧章以安民心。

3.应使华北民众明了，在华北政务委员会和新民会表里一体的施政指导下，团结一致拥护华北的特殊体制，积极参与治安建设，就是真正增进民众的福利，明确华北民众努力的方向。

4.随着治安工作的进展，各地要在适当时机，向民众说明肃正建设的具体事例，用以揭穿敌方的欺骗宣传，增强民众对日本的信赖。

三、占领区以外的宣传

大力宣传肃正建设的真相，使民众相信帝国对事变处理的坚定决心及实力。对第三国，要使之认识到，援蒋实际上并不能维护其在中国的既得利益。

其六 其它

本计划与各地区的特殊性如何适应问题

本计划主要是以河北、山东等地的肃正建设现状为依据而制订的。其它如在政治上有特殊地位的内蒙，治安恢复缓慢的山西、河南、苏北等地区，可根据本计划的精神，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制订具体的实施计划。

附表第一

治安军编成预定表		
招募地区	编成兵力	预定驻兵地点
长谷川兵团地区(独立混成第十五旅团)	二个团	北苑
	二个团	通州
	一个团	保定
本间兵团地区(第二十七师团本间兵团)	二个团	开平
	一个团	滦县
	一个团	天津
	一个团	马厂
饭沼兵团地区(第一一0师团)	一个团	保定
	一个团	正定
	一个团	定县
饭田兵团地区(第十二军)	一个团	济南
	一个团	泰安
	一个团	滕县
备考	一、每团应征新兵定员为1500名 二、驻兵地点根据情况可以变更。	

附表第二 铁路警务机关调整进度表

其一 方面军管区内(不包括驻蒙军管区)

一、人员装备

1939年12月末
人员 6,000(其中日本人1,500)
步枪5,000
1940年9月末
人员 9,000(其中日本人3,000)
步枪 7,000。
轻机枪 50
1940年12月末
人员 10,000(其中日本人3,000)
步枪 7,000
轻机枪 100

二、接替警备任务的时间

1940年3月末
京山线全部
京古线全部
石门以北
济南以北
1940年9月末
胶济线全部
津浦线济南一蛛埠间
石太线全部

其二 驻蒙军管区内

1940年9月末
人员 1,700(其中日本人500)
步枪 1,700
轻机枪 60
重机枪 8
1940年12月末
人员 2,000(其中日本人600)
步枪 1,700
轻机枪 60
重机枪 8

在参谋长说明之后，平田参谋副长又就有关作战及政治经济的肃正建设实施要领，作了以下的补充说明:

其一 与作战有关的问题

一、彻底的讨伐肃正工作

高度分散部署兵力的现状，对军队的教育训练极为不利，早日恢复集中部署，是我们最希望的。然而，考虑到华北治安的现状，为争取尽快恢复集中兵力，在目前一段时期，仍不得不继续执行分散部署。如果我们过早进行集中，地方治安就会再度呈现混乱，过去的努力势必化为泡影。

分散部署兵力是治安工作的支柱，以此为立足点才能进行灵活机动的讨伐，因此它应该是攻势据点。这就是说，分散部署决不是守势部署，而是对地下活动相当深入的匪团，

在特殊情况下的唯一的攻势部署。要这样认识问题，并要经常保持主动灵活的弹性。

分散部署已实施了很长时期，各部队有可能完全陷入被动守势，而忘记分散都署的积极意义，不思进取。对此，分散的各部队，必须大力振奋士气，发扬积极进攻精神，充分发挥分散部署的特点。所幸目前大股匪团已分崩离析，甚少具有集体威力，即使以小部队进行讨伐，也无任何危险，这正是积极讨伐的大好时机。

目前的情况，匪团已经分散隐蔽，而致力于巧妙地扩大地下组织，企图进行顽强的抗战。对此，我之最大的弱点，不在于兵力之不足。而是在于很难及时获得可靠的情报。如能克服此种困难，则讨伐肃正是轻而易举的。至今各部队虽已尽到很大努力，但大都未能收到相应的成果。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之谍报网存在缺欠。为了对付积极的、有组织的地下匪团，我也必须建立一套有组织的巧妙的谍报网。

为此，就需要很好地配备军队的情报机关，而统一其行动，还要巧妙地组织中国方面行政、警察等机关的话动，尤其要利用有能力的间谍人员。这是必须千方百计努力去做的。

如此，方能掌握敌匪军事、经济、政治等抗战力量的中枢和根据，一举而剿灭之。

各部队，尤其下级部队，在情报收集上，往住因袭旧套、不图创新改进。对中国方面各机关以及当地民众的组织利用等，还必须认真热情地加以指导和推动。

以上各项施策的最根本的问题，是争取民众，使之成为自己人。

二、讨伐的重点目标

共军对我占领区的进犯越来越频繁，已成为今后肃正工作上最严重的问题。根据过去经验，由于我军的讨伐，在杂牌军被消灭后。结果，其地盘往往反被共军占据。有鉴于此，今后的讨伐肃正的重点必须集中指向共军，全力以赴，务期将其全歼。这是我们在计划中明确的意图。为此，必须考虑到我军的兵力与整个治安工作的关系，如果是在讨伐后，不能立即采取恢复治安措施的地区，而且该地区的匪团对皇军又无求战行动，为防止共军乘虚而入，宁可不对其讨伐，暂时默认该匪团的存在，反而对我有利，

但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注意对情况要有正确判断，如判断错误，不仅失掉对敌剿灭之机，且会影响部队的士气，使之误认消极的讨伐行动是对的，其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有关这类决定，必须由高级司令部作出，不能由下级司令部擅自决定。高级司令部根据当时当地情况作出正确判断后，指示部队采取相应行动。作为下级部队，只应进行积极果政的讨伐，发扬旺盛的士气，必须实行严格的监督，断然不许下级部队根据自己的判断决定是否进行讨伐。

三、讨伐肃正的重点地区

在计划中所指定的讨伐重点地区，是方面军从全局观点决定的。此外，各兵团也应有各自的讨伐重点地区。

京汉、津浦两线的中间地区

该地区接近京津，是华北的中枢，是匪团尤其是共产系匪团的根据地，目前治安肃正工作进行缓慢，治安状况极端不良。在下期必须清除祸根，取得治安肃正工作的实效。为此，第二十七、第一一 0 师团应在第十五混成旅团的协力之下，自 4 月上旬在方面军统制下，与有关兵团相配合，准备进行讨伐。

山西北部地区

在这一地区，近来共军的渗透颇为显著，任其发展下去，不久即可能变成完全赤色地带。若不趁其根基尚未固之前，彻底予以剿灭，则其祸害恐将波及河北、蒙疆。因此必须对其活动严加监视，必要时立即进行讨伐。在此情况下，第一军须极力控制同蒲路北段以西地区，对以东地区的共军势力严加警戎，切勿使其扩展。

晋南地区

在我占领区中，晋南是有蒋直系国民党军残存的唯一地区。对这一地区的作战，主要

是将敌全部歼灭，并迫使敌人放弃渡过黄河的企图，从而扩大我治安地区。本作战根据第一军的计划实施，随战况的发展，必要时拟令第三十五师团以一部予以策应。

四、打通水路

河北省的水路，从来即为运输物资的主要于线，由于沿岸治安不良，至今仍未打通，各项运输不得不专赖铁路，致使物资交流受阻。其后果反而影响冶安的确立，阻碍各项开发建设的进展。

方面军把打通水路问题，作为下期施策的重要内容列入计划，务希各兵团齐心协力完成这一任务。预定打通的水路颇长，限于兵力不能同时进行，拟将北路和南路分两期进行。第一期打通北路，与冀中地区的肃正工作同时进行，按前述方面军命令，统一各有关兵团的行动。

打通水路的要点

所谓肃正水路沿线，并不单指狭长的水路线的肃正工作，而是与全面的肃正作战互为因果。另外，对水路的直接肃正警备，其必要性也和确保铁路一样，虽然水路不象铁路那样经常进行运输，也无重要设施，在防护观念上两者有所差异。但在确保水路这点上，也按确保铁路同一要领乃是绝对必要的。为此，除对沿岸一带的治安维持和在水路上的直接兵力配备之外，还必须拥有水上的警备兵力，不可疏忽水上讨伐。

水路警备队

水路运输的大部为民用物资，不可能长期依靠日军进行警卫及掩护，应在治安恢复的同时，逐步将此项任务移交给中国方面的有关机关。因此，必须着手准备编成水路警备队。但在治安尚未恢复、水路警备队实力尚未充实之前，仍须由我军担任掩护。

五、控制预备兵力

根据作战需要，方面军有时可能对某地重点使用兵力，如果方面军不控制一部分预备兵力，则必须完全依赖各兵团协助。所谓控制预备兵力，以不妨碍该兵团的作战或不致招来治安上的困难为限度，为此，需要规定控制兵力的标准，作好随时可以接受任务的准备。

当抽调这一部兵力时，除特急情况外，一般均应给予充裕的时间，各兵团无须经常集结待命。控制兵力的多少以及准备的大致标准，前面已有指示。

六、治安军及其它中国方面武装团体的培育指导

有关这一问题的必要性，业经三令五申，方面军对之抱有很大期望，仍希各兵团予以协助。

治安军

由于各兵团的协助，派出军事顾问专任指导，希望在下期末以前，使其能担任部分治安任务，在兵力方面也应由现在仅有的 15,000 余人，到本期末再增加 30,000 人。为此，要求各兵困予以协助，使青年训练工作进一步普及和加强。

剿共军及和平救国军等

这些集团，与其兵力相比所耗经费过多，且有可能遗患于未来，因此，应采取逐步淘汰方针，保留精干，使其成为可以信赖的武装团体。

县警备队

为恢复治安，方面军一直对县警备队寄予最大的期待和关心。今后要按定员比例派出常驻指导员，可挪用我军部分装备，补助其武器的不足，在方面军允许的最大限度内，采取各种手段予以协助。各兵团应考虑方面军期待之殷切，对其整备扩充付出最大努力。到下期末以前，起码应在治安模范地区，能达到不直接依靠皇军，独力成为维持治安的骨干。如此，方可称为名副其实的模范地区。

此外，省、道警备队，实质上并无对其辖区进行讨伐警备的能力，只能守卫其驻在的城市。今后可否按县警备队，特别是模范地区县警备队的要求加以改编和增强，希望进行

研究并采取适当的措施。

铁道警务机关

对铁道警务机关的整备扩充问题。鉴于铁道的重要性，迫切希望为其实现而努力。各兵团应以各该警务机关为友军。援助、指导他们积极训练加强警备，务必使它们在下期末的前后，能够独力承担华北大部的铁路(不包括山西)警备任务。这次对驻蒙军作战地区内的铁路警务机关的调整，重新确定调整目标，要受交通会社的指令，这已在本年度的调整大纲中作出决定。其与各警务机关的任务交接时机，原则上已经规定，具体交接时间和方法，可根据各有关兵团长相机决定。

七、以瓦解敌军为目的的谋略工作

利用中央政权成立的机会，方面军进一步加强既定施策，对持有观望态度的国民党军将领进行怀柔工作。

在当前，方面军除正在进行谋略工作的对象以外，并拟对占领区内外的敌正规军进行工作。至于潜伏于占领区内的游击队、杂牌军、匪团等，对其中利用价值较大的也应进行工作，但总的看来有利用价值的不多。对这些集团的处理，仍按“讨伐的重点目标”所指示的要领进行，应否列入谋略工作对象，要由方面军决定。

八、交通通信

关于经常的交通警备问题，依据建设总署的计划精神进行，但各兵团对警备治安上必需的警备交通和警备通信，应尽力保证其安全畅通。特别是对方面军肃正重点地区的冀中，由于地处各兵团邻接的作战境界，因而成为治安不良的祸因，各兵团部队必须设法确保相互间的交通联络。

九、宣传

中央政权的成立，标志着对事变的处理已进入新的阶段，应充分利用这一时机，为今后施策创造条件。估计这对华北人心将会产主各种影响，使之进一步理解我方的态度和方针。为此，既可安定民心促进肃正建设工作，迫使敌人放弃抗战意图；又可使第三国对帝国的实力和既定方针加深认识，从而加速事变的解决。

十、兵力集结的问题

兵力集结，作为军队教育训练的前提条件，是极为重要的，但这要取决于治安恢复的进度。治安恢复得慢，兵力集结也不得不推迟。高度分散部署兵力已经一年有半，为军队的建设着想，这种状态不应再行继续，各兵团应本此精神，全力以赴，促进巩固的治安早日实现。

方面军的安排是:在本年末以前。各兵团步兵的三分之一，特种部队的大部分，集结在便于教育训练的较大单位。集结所需的收容设施，现已着手进行准备，一定要使这项设施能够如期使用，以利下期肃正建设的开展。

其二 关于政治、经济问题

一、华北建设的目标

随着中央政府的成立，根据华北的特殊地位，为了在国防、经济、思想各方面形成一个与日满紧密合作的地带，已决定各项建设的目标，正在争取其逐步实现。

1.国防

为了确立我军专心对苏作战的态势，首先必须树立日本对华北的政治支配力，谋求亲日反共思想的彻底深入，使民众真正心悦诚服。

2.经济

实行笼络民心的各项政策。对于粮食问题，首先要争取华北自给自足。对于棉花煤炭等，应与日满交流，借以提高生产力，为充实日满的总体力量作出贡献。

3.思想

确立和推广新民会的指导理想，建设一个由真正的日中合作思想控制的华北。以促进东亚建设，不使错误的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有可乘之机。

二、刷新充实以省公署为核心的地方行政

按照方面军的意图刷新、充实省以下地方行政，是防止华北中央化和治安肃正工作上至关紧要的问题。为此，首先必须加强省公署本身，改进行政措施，以期深入到各县。中国方面的人事刷新和日本方面指导力量的加强，是达到这一目的的先决条件。

对中国方面的指导，各兵团长可责成所属特务机关实施之。

三、新民会的改革、加强及对其指导

新民会经此次统一改组，机构加强，阵容一新。在军的指导监督下，以实现王道为目标，以组织华北民众为使命，迈出了第一步。以后陆续发表中央和地方的人事任命，并令其着手制订各项规章制度，但是，目前其内部未臻完备，各种工作尚未纳入正轨。因此各兵团应迅速完成统一改组的各项措施，确实掌握好新民会，使之承担起组织民众的使命，并成为领导华北民众的真正核心。

对新民会的监督指导，应根据“中华民国新民会指导纲要”由兵团长责成所属特务机关具体执行。要注意除随军进行宣抚的场合外，下级部队的指挥官不得干预新民会的工作。

四、经济建设的重点

在经济建设方面，考虑地理、政治、经济等有利因素，应以治安状况较好的河北省、山东省为重点地区，在施策上应以纲要所列各项为重点。

1.调整粮食供应

目前治安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粮食供应问题。为此，方面军以最大的关心与各方面积极交涉，并寻求一切解决方法，特别在青黄不接的 6 月份，要采取应急措施，务期保证供应，以安定民心。

2.增加对日供应重要资源

为保证日满两国的生产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期待于华北资源的供应，尤其是煤炭的供应。这些物资的充分供应，适足以说明华北的特殊地位。因此，不能满足于计划所列各项指标，更须设法进一步增加煤、盐、棉花的生产，并且也要为军用物资的收集作出贡献。

3.金融通货对策

华北的货币，联银券的流通使用，已成既定事实，且经新中央政府承认。

联银券的发行额，随华北建设的发展而急剧增加，因而对维持货币价值应给予最大关心，为此，方面军提请各有关方面注意。各兵团应努力防止通货膨胀，奖励储蓄，限制非紧要事业的投资。另对，外间谣传联银券将贬值一事，应严正表明既定方针不变，肃清谣言。

五、对匪区的经济工作

匪区的经济谋略工作，敌人比我方活跃，我应积极与之对抗，并采取对策破坏其抗战力量。目前，对匪区的经济工作，已经形成一个敌前作业的重要部门。为此，首先要杜绝一切物资资敌，同时要设法吸收潜存于敌区的我方必需物资。但是，对没收的旧币的使用，要事前请示方面军批准。

六、文化工作

有关文化工作，为了实现治安第一的目的，作为建设纲要的重要内容已有明确记载，兹不赘述。

曾任华北方面军参谋部第四课高级参谋的有末精三大佐，就方面军传达肃正建设施策的情况，特别对华北政治经济的概况，叙述如下:

1.1939 年末，赴任到北京之初，曾与临时政府实业部部长王荫泰晤谈，王曾表白“政治的要谛在于民生，民生的基本在于食，华北政治的先决条件在于吃饭问题”。他这种一针见血的话，使我深受感动。当时的华北，尤其北京、天津等城市，缺粮情况极为严重。正如以下电文所示，请求东京等方面予以援助，采取有效措施，保证粮食的绝对量，同时，稳定华北物价和联银券币值，努力促使粮食上市。

附电文

总参四电第 211 号(1940.3.12)

收电人陆军次官

发电人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

当兹新中央政府即将成立之际，安定占领区的民心，是巩固新中央政府及开展对重庆工作的至关重要问题。日前听取了有末大佐有关华北粮食问题的说明，情况实为严重，如不求助于各方的认真支援，不只华北遭殃，我各占领区亦将受害，甚至其不良影响将波及日本国内。因此，派遣军拟暂时适当削减对日供应，由华中抽出一部米和面粉供给华北，以缓解其紧张形势。

华北过去依靠从满洲运进的杂粮以补主食之不足，但自满洲粮谷统购以来，流入华北之量锐减，以致加剧了华北缺粮情况，根据日满华一体、有无相通的精神，希望中央促使满洲适当开放对华出口。另外，粮食紧张的主要原因，是物价飞涨和物资屯积所致。为根本解决问题，维持联银券的币值实为重要。对此，特请格外予以援助。

2.日系势力的活动状况

日本在对华政策上，最成问题的是军宣抚班、新民会、华北开发会社等。尤其是在经济界活跃的日系人士，不考虑中国人的实际情况，日系人士之间又互相拆台，造成很坏影响。为此，方面军于 1940 年 2 月 23 日，解散了宣抚班，3 月 4 日统一改组了新民会，鼓动中国人的自发活动，努力促使军、政、会一元化。

1939 年到任的多田方面军司令官是我军屈指可数的中国通，熟悉中国实情，关心民生，深体民心，充分理解政治战略的要谛，深得中国方面的信赖。

3.对共问题

来自特务机关等部门的第四课系统的政治情报，第二课系统的特种机关所提供的特别情报、谋报，和第一课掌握的来自第一线兵团的作战情报、以及宪兵队系统的治安情报，由于彼此派系不同，以致这些情报缺乏综合性和一贯性。他们在口头上都喊剿共第一，但对共军的实际情况认识不足，作战与政务分道扬镖，各行其是，在“百团大战”中之所以受制于中共，其原因即在于此。

4.其它问题

随着汪中央政权的戍立，出现了种种问题，如与华北政治经济的特殊性相关联的苏北和豫北地区的归属向题，南京倡导的东亚联盟与华北新民会的关系问题，正统国民党进入华北问题，如何对待中国青年党问题，以及中国派遣军与华北方面军在作战思想尤其是有关政治谋略上的意见分歧，和对共军认识不足等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调整，使方面军司令官以及有关人员大伤了脑筋。

方面军对思想战的指导方案

方面军在制订 1940 年度第一期肃正计划的同时，确定了“华北地区思想战

指导纲要”，印发所属单位及有关部门、会社、团体。并要求付诸实行或予以协助。同时有限制地印发了“附录书”作为上述纲要的参考资料，该件列为极秘文件，禁止公开和复印。

方面军的目的，在于普及和贯彻灭共亲日思想。因此，要求不能单纯停留于宣传，必须使之融汇贯通于总体战的各个分野，成为进行战斗的思想武器，用以击败反动思想。尤其要通过基层组织，使亲日灭共的思想涌现于华北民众之间。就是说，要在新中央政府华北政务委员会成立及新民会改组的新形势下，为了对付共产主义思想的渗透和事变长期化的趋势，指明建设东亚新秩序的方向，统一思想，以加强和扩大与军事、政治、经济各项政策融合一体的思想战。

当时中国驻屯军宪兵司令部总务部长大野广一大佐(后任中将)对此叙述如下:

在对共作战中，单靠武力战斗难以与之对抗。极力主张必须统筹军事、政治、经济、思想等各方面的工作。于是，以前年黄城事务所起草、灭共委员会决定的“华北灭共对策纲要”为基础，制订了可以称为总体战大纲的“思想战指导纲要”方案。经过方面军的研讨修正后，正式决定预布，并以命令形式促其实施。但是，因一般人对武力战斗以外的其它方面研究不够，特别是对思想战的理解不足、所以使这一大纲贯彻到基层、付诸实施，要用相当长的时间。

思想战指导大纲的内容如下:

华北地区思想战指导纲要

第一 指导精神

遵循我建国精神，消除东亚积年之祸根，重建明朗的新中国，实现东亚民族复兴，用以建设新秩序，使皇道之光普照四海。

第二 指导方针

思想战应本上述精神，发扬日本民族誓死必胜的整体力量。在此基础上，致力于瓦解敌方的抗战意志，并使中国民众，尤其要使知识阶层及青少年，认识到自己应该成为东亚新秩序的共同建设者，从而指导他们积极投入建设行动。

为此，首先日本国民均应认识到自己做为指导者的重大责任，谨言慎行。同时，应排除错误的优越感，以日华融合的同胞友爱为基础，以具体实现以下各项做为当前的目标，

一、根除共产势力，宣扬新民精神，以建设王道社会。

二、开发产业，发扬东亚文化，以实现民政的改善及安居乐业。

三、纠正中国民众以往的排外的、唯我独尊的民族意识，实现睦邻友好。

四、促进日满华的共同防卫、经济一体化，以完成紧密的互助体制，实现真正的共存共荣。

第三 指导要领

一、思想战应与武力战以及经济、民生、教育等各项工作互相配合同时并行，在一元化的领导下，使全部机关形成一体，而各自发挥其机能的特性。

二、使皇军官兵及侨居官民彻底理解此次圣战之目的及其成为长期总体战的道理，带头示范，谨言慎行，消除蔑视中国人的歪风，各尽职责，军民一体，欣然向新秩序迈进。

三、根除一切阻碍建设新秩序的势力及企图，特别期望根绝共军的势力及抗日运动，同时使中国民众了解和敬畏我方具有贯彻长期建设战斗的实力和决心。

四、抨击、排除共产主义、错误的三民主义及依赖欧美的思想，按照新民精神进行刷新统一，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奋斗目标。

五、对于新政权，要使其履行日华协定及其它商订的事项。同时，指导民众，尤其是

政府中的要人从根本上了解体会我方的指导精神，向建设东亚新秩序迈进。

六、协助新民会及其它群众组织，使之在教化上、思想上、经济上以至于政治上各个方面成为领导群众行动的团体，以克服旧势力，获取群众。

七、改正教育的指导方针及内容，同时加强初等教育及训练青少年。对宗教团体亦应给以正确指导，使之积极参加建设新中国的工作。

八、除开展宣传、教导工作外，应确保民众日常生活的稳定，增进民众的福利。从物质、精神两方面进行思想革新，使民众心悦诚服。

九、监视敌区及占领地区内的军民思想动向，促进敌军的内部崩溃，促进军民的和平反共气势，实现亲日融合等等，并应采取适当的对策，以适应此种局势。

十、在目前情况下，有关政治、经济、教育以及文化等方面的各项政策，应着重从思想对策的角度加以考虑，然后贯彻执行。

另外，在“华北地区思想战指导纲要附录书，中有以下各章:

第一章 对中国人的指导

第二章 对日本人的指导

第三章 对外国人的指导

第四章 思想策动的摧毁

第五章 对敌工作

在这个小册子里，详细地叙述了具休的工作实施要领及指导上的注意事项。下面从第一、第四、第五章中分别摘录其若干节。

第一章内容为:第一节、宣传，第二节、教导工作，第三节、民众组织工作，第四节、模范地区工作，第五节、新民会的指导要领。

第一章 第三节 民众组织工作

第一 指导方针

组成华北民众组织的目的，在于使之成为华北新秩序体制的骨干，同时，在日华关系上，使之成为最确切地体现新秩序的基层组织。为此，应采取如下对策:

一、农村以乡村自治组织为单位，首先组成县的民众组织。

二、农村自治组织的基干是保甲组织和合作社组织。

三、在城市中，对商业团体、文教团体等，系统地进行指导。在必要的地区，可特别进行工人的组织工作。

四、农村及城市中民众组织工作的监督指导，在当地日本驻军司今官(小地区指挥官以上)的幕后指导下，由当地行政长官执行之，但各行政长官应以当地新民会指导者的身分进行指导。

五、民众组织工作，应在行政长官的监督指导下，由新民会负责。

六、有关培训华北民众指导者以及建立其横的组织工作，应指导新民会努力完成之。

七、民众的经济组织，应先从有利于改进治安与提高民生入手，然后逐渐导致经济上日华不可分的形势。为此，应以农村的基本经济组织一合作社为骨干，使之与生活必需品和土特产品的交易、配给机构连结起来，以确立符合上述意图的一系列经济体系。

上述合作社、交易机构均各设中央领导机关，避免在协助或指导上出现差错。同时，目前在中央和各地设置日军指导下之官民合作的经济委员会，以期增强上述各个机构的运营能力。

第二 指导上的注意事项

一、此种民众组织应在指定的模范地区以及必要的地点首先建立，并以此为据点，逐

渐向其它地区推广。

二、在上述模范地区，应结合组织民众工作同时开展各种工作，并与华北的各项工作相配合，首先使本地区在日华协力下，实现民众的安居乐业。

三、在建立此种组织时，需要根据其土地状况，分别轻重缓急采取适当的步骤。

四、过去在各地建立的这类组织。应逐渐统一于此种新组织。

第三 合作社指导要领

华北的合作社组织的任务，是构成东亚新秩序经济结构中的基层组织。由于合作社组织还担负着治安、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任务，因而要以完成本职任务为主，同时在推动以上各项任务中做出贡献。

一、合作社的组织

组织合作社，原则上应以乡村为主，但也不必局限于此。社员由区域内的居民互助结合，使每户都加入合作社组织，固然最为理想，但也要允许自由加入。合作社以社员交纳的股金为资金，应使每股股金固定平均，采取无限责任制或保证责任制。

为了发挥干部的主动性活动，应由各社社员中选拔干部，设立总会及理事会做为办事机关。合作社的名称，为了明确其基本性质，应加以统一。

二、对合作社经营的指导

对合作社事业的经营，应按下述方针进行指导，以发展农村产业的生产力，谋求社员的生活稳定为根本目标，并确保其经营活动的长期延续性。

合作社的业务涉及到金融、购买、贩卖，生产及消费使用等许多方面。因此，在这些业务之中，必须针对华北农村的特殊情况考虑其轻重缓急，围绕特定业务的重点，进行综合经营。

三、合作社的普及工作

在当前情况下，合作社工作除担负经济组织的本来任务外，并负有其他很多使命。如掌握民心、治安工作、筹办驻在兵团的食粮、普及联银券等等，都必须抓紧进行。但是，要合作社本身发展到能够完成这些任务的程度，在中国经济社会条件下尚难办到。因此，随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上述条件，乃是当务之急。

为了使当前的合作社工作起到担负上述任务的作用，不应坐待正规合作社的成长，而应首先利用简单组织起来的合作社(互助社)，或组成简易的合作社将工作开展起来。

第四节 模范地区工作

模范地区的指导目标，为了在该地区推行包括治安、政治，经济及文化等各方面的工作，以显示模范区的新秩序，应实施以下对策:

一、对模范地区的指导，应按照第三节民众组织工作的要领进行。

二、实现指导机关的一元化统治。为此，除应明确规定各个部门的分担业务外，同时要保持紧密的联系，不要使中国方面产生政令不一的感觉。

三、在进行指导时，应考察该地区的特点，决定工作重点。调查研究其治安状况、产业经济状况、风俗民情、工作经费以及指导者的工作能力等各方面的状况，决定工作步骤及方法，使各项工作适应实际情况。

四、进行指导时，不应过于施加压力干涉，要尊重中国人的意见，参照从来的风浴习惯，努力使中国人沿新秩序的理想路线，自发地做出成绩。

五、具体的指导内容为:整顿县的行政和乡村的自治组织。统一领导合作社，并指导合作社的具体工作，指导劳工工作，增加模范地区的生产，以及整顿、加强经济流通机构等。要把上述各个方面的工作有机地连结起来进行指导。此外，还应考虑加强地区内的综合经济实力以及交通、通讯，卫生等方面的工作。

第四章 对思想策动的摧毁

第一节 监察及搜集情报

一、加强统制监察组织的对策如下:

1.增编日军方面的警务机关。

2.在整个华北地区改编和加强中国方面的警务机关。为此，向该机关内派入必要的日方指导员。

二、各个日华公私机关获得的情报，应及时或定期向有直接关系的机关报告或通报。

三、情报的综合整理工作，由最高军司令部负责进行。注意观察敌方，尤其是共军的组织情况、各种工作，对民众的影响，以及我方思想工作的效果等。

四、最高军司令部指令中央灭共委员会，专门负责整理上述情报中有关共军的部分。

第二节 摧毁思想策动的根源

第一、对敌方，尤其是对共产军、匪的扫荡。

一、以皇军的武力进行扫荡

1.进行讨伐行动时，重点指向共产军、匪，彻底扫荡，摧毁其游击根据地。

2.兵团长或守备队长，为了统一进行治安肃正工作，根据需要可统一指导当地的日本及中国方面的各个机关。

3.为了不失时机地进行讨伐，兵团长或守备队长统辖当地各机关的情报工作，使之做出迅速、准确的匪情报告。

二、以警务机关的实力进行扫荡

1.对共产军、匪的扫荡原则上主要依靠军队的武力讨伐，但对小股匪团及武装的共产抗日团体，也可在军的警务机关的统辖下，由各警务机关协作，编成武装警察队进行讨伐。为此，规定在必要时，可接受辅助宪兵的派遣或部队的协力。

2.进行武力讨伐时，最重要的是要统一领导各警务机关的行动。因此，应实行以军的警务机关为中心的警务统制，在其统一指挥下进行武力镇压及搜查检举。

对非武装但有势力的共产抗日团体的检举镇压，大致以前项要领为准。

3.为了不失时机地进行讨伐，各机关应在统一领导下进行活动，迅速准确地搜集情报，并将其结果进行通报。

第二、对共产抗日团体的破坏。

其一、共产抗日分子的检举、扑灭

对共产抗日分子的搜查侦探工作，务必做到严密周到。为了准确，迅速地检举，扑灭共产抗日分子，应实施以下对策:

一、实行彻底的户口调查，并进行及时的盘查搜索。

二、为了取得准确的谍报。应获取和培养优秀的谍报员。为此，要注意利用检举、逮捕的犯人或叛变分子。

三、对有左倾嫌疑者及伪装的叛变分子，要严密监视其言行。对一般叛变者也应加以相当注意。

四、为了提高搜查侦探网的组织及机能上的实际效果，应谋求实现民众的警察化，并大力加以普及。

五、教育、训练日华双方的宪兵及警察官，在提高其知识见闻及技术能力的同时，采取培养侦探及科学的搜查等方法，以期不断提高检举效率。

其二、消灭共产抗日团体据点

共产抗日团体的主要根据地，在城市里，是外国租界或外国人杂居地等受外国权益庇护的地区，以及铁路、工厂、学校等地方。在农村、山村，则建立所谓游击区，做为策动的据点。因此，为了消灭这些据点，除采取前述措施外，还要实施下列对策。

一、对于外国租界方面，除督促外国官宪进行检举镇压外，还要采取将其诱出租界，

或秘密行动的办法，直接检查搜捕。

二、对于游击区，除采取反共宣传及秘密行动，进行内部破坏，使匪民分化外，并组成以间谍、叛变分子为主的特别搜查班，积极进行检举镇压。

第三节 对思想策动的取缔

第一、取缔结社、集会及有多数人参加的活功

对共产系统及其它反国策、反时局的结社加以镇压。为此，实施以下对策。

一、对于结社、集会及有多数人参加的活动，命其事先申请许可，明确其应负的责任。

二、对非法、秘密的活动，应依靠监视及情报工作，予以检举处罚并使之解散。

三、对于带有政治、文化、或社会科学色彩者，应特别加以注意。对于其它方面也应进行充分观察。

四、应特别注意在学校、外国租界及教会内进行的策动。

第三、对言论、著作及印刷出版的取缔

一、确立检阅制度，杜绝借合法手段进行思想策动。同时，对非法的思想策动，严加取缔。

二、对于日、满及外国的出版物，应加强检阅制度，经过严格挑选方许进口。对于日本的出版物，应与国内当局保持紧密联系，采取措施防止产生不良影响。

三、对过去的出版物重新进行严密的审查。

四、对图书馆、学校、教会的检查、搜索工作，应彻底进行。

五、税关、列车及其它地方的检查工作，应彻底进行。

第三、对戏剧、电影的取缔

一、在民众娱乐中，戏剧、电影影响最大，因此在取缔管理的同时，应注意加以指导，使之成为思想诱导的工具。

二、加强检阅制度，对违反东亚新秩序建设精神的戏剧，电影，要严加取缔。

三、指导剧作家、演员及电影界人士，使之创作、演出健康、明朗的作品。

四、对于日、满及外国的电影，经严格选择后方许进口。

五、实行配给统制。

六、制作符合新指导精神的健康、明朗的电影，促使广大民众观看。

第五章 对敌工作

在摧毁敌人战斗意志的同时，煽动国共抗争，使敌军从内部崩溃；鼓动敌方势力范围内的中国民众，掀起高昂的反战和平气氛，诱导民心，使之反蒋排共归附于新政权。为此，实施以下对策:

一、对敌方军队进行各种宣传，鼓动和助长回避战争及反战的气氛，使敌丧失战斗意志，煽动官兵的不满情绪，挑拨官兵不合，使之意志颓废。同时，加强优待俘虏工作，诱敌投降和逃亡，从思想上瓦解敌方军队。

二、利用国共合作中的矛盾，尽量采用宣传、谋略等各种手段，煽动两党之间的摩擦，破坏两者的合作，以导致“抗日救国”统一战线的崩溃。另外，采取适当的谋略工作，促使国民党军主动地去扑灭共军。

三、彻底揭发、宣传苏联及共产党的阴谋罪恶。使尽人皆知如不迅速扑灭共产党，就不能避免苏联的赤化侵略、破坏民生福利的道理。要使民众树立排苏灭共的观念，同时，强调宣传皇军圣战的目的，诱导民心逐渐亲日。

四、强调即使继续抗战，中国也绝无战胜的可能，反而只能使国家、国民陷于贫困悲惨的结局，从而助长反战和平的气势。同时，采取措施，攻击蒋政权的错误政策，使民心背离蒋政权，归附于新政权。

五、对敌宣传，主要依靠我方飞机散发宣传品，无线电广播，邮寄宣传文件，指挥潜

入敌区的工作人员，利用回教徒，天主教徒、德意人士等，以及尽量操纵外国记者为我宣传。同时，与敌区内的反共、反蒋分子秘密联系，巧妙地予以利用。

六、有关对敌宣传工作，应与华中、华南方面军、海军及大使馆方面紧密联系，使宣传方针及内容，在完全统一的步调下进行。

引用英美法苏人士及在外华侨的言论、文件，或者通过这些人士进行宣传，效果极大。因此，由中央与驻外国的大、公使馆武官取得联系，将第三国人和中国人的姓名、中国的政治团体和思想团体的名称，写进宣传文件中是有利的。

七、从敌区内部发行的报纸杂志及其它情报中，不断调查敌势力范围内中国民众的国民精神、社会形势、国民生活及军队内部的情况，特别是注意调查其弱点，以确定相应的宣传目标、范围、时期、材料及方法.针对重点尽力发挥。努力做到先发制人、出敌意料，并顽强地进行此种宣传。同时，应经常调查宣传的效果，适应当时情况，及时改变方法及内容。

关于确立秩序的军律布告

为了确保治安，深深感到，必须使军队严守军纪，当地民众严守社会秩序，以形成军民一体的体制。因而，军部为了“进一步向当地军民贯彻圣战的宗旨并促其实现，专心谋求达到此一目的”，以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及中国方面舰队司令长官的名义，于 1940 年 6 月 11 日发布了“在大陆占领地区内，对扰乱建设新秩序者，不论其为日人、华人或是第三国人，皆按军律严加处罚”的布告。

与过去不同的是“占领地区内实际上具有临战地区的性质。因而不承认犯罪当事人的国籍区别”表明了有如布告中所说的严加处罚的强硬态度。

华北方面军也发表了报道部长的讲话，彻底贯彻上述宗旨。

但是，随着事变的发生，来华的日人猛增，其中有不少想发横财的唯利是图者。因此，对不良日人及与之勾结的第三国人等加以取缔，对于巩固占领地区的治安极为必要。在此以前，中国派遣军于 4 月 29 日发表了“告派遣军官兵书”，阐明了处理事变的根本态度，要求官兵应有思想准备。其中，关于不良日人的情况有如下叙述。由此可以了解到发布布告时的情况。

随军进入大陆的日本人中，固然有不少人在宣抚、看护方面做出了献身的活动，有的业已殉职，有的仍在继续工作。但是，从现状看，也有不少人在做着有损于日本人体面的事情。除很多人犯法以外，还有很多人在做着虽不到犯法程度，却是很不道德的事情。这虽很遗憾，但必须承认现状确实如此。

巡视一下上海、南京、天津、北京等地夜间的情况，即可看出达到何等地步。在酒绿灯红的背后，经常搞些不正当行为。有的人欺骗、恐吓中国人，以获取不正当的钱财和利益;有的人为了贪图私利，甘心资敌，有的人成为外国人、中国人的工具，竟做出不利于我方之事。更有甚者，让外国人假借自己的名义，为了谋求个人利益而违抗全面的统一领导等等。此种情况若任其没展下去，不仅会使圣战收不到效果，而且将会导致日华两民族间永久的抗战。因此，派遣军官兵必须以身作则带头遵守纪律，促使不良日人反省觉悟，避免造成冒渎十万英灵的结局，必须以此心情努力清除不良现象。

如果十万英灵看到为了养肥不良日人而导致日华两民族再次抗争的后果，九泉之下何以瞑目？告慰英灵，只是礼拜献花是不够的。应竭尽全力，实现在其遗骨之上建立日华的永久结合。这是活下来的官兵的共同义务，也是对英灵最好的供奉。

华北政务委员会的成立与新民会的改组

1 月的青岛会议上，决定在国民政府迁都南京时，解散临时政府，成立华北政务委员会，做为中央与地方的中间机关。1940 年 3 月 30 日公布了该委员会的组织条例，委员会同时宣告诞生。当天并发出布告，强调“过去临时政府管辖区域内实行的政治、经济、金融、建设等各项工作，均一如既往进行处理，不因本会的成立而变更”、“国民政府政纲中虽有设立中央银行、统一币制的规定，但不会使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受到任何影响”，以此防止民心动摇。

国民政府在公布条例的同时，任命了以下官员:

委员长 王克敏
委员 董康、王揖唐、苏体仁、余晋和、赵琪、江朝宗、马良、潘毓桂
常务委员兼内务总署督办(兼任) 王克敏
常务委员兼财务总署督办 汪时璟
常务委员兼绥靖总署督办 齐燮元
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 汤尔和
常务委员兼实业总署督办 王荫泰
常务委员兼建设总署督办 殷同
常务委员兼政务厅长 朱深

在华北行政机构进行改革告一段落后，6 月 6 日，王克敏委员长、朱深政务厅长辞职，遗缺明令王揖唐(考试院长)、祝惺元(政务厅外事局长)分别接任。另外，汤尔和死后，由周作人继任教育总署督办。政府顾问一职自 1939 年 10 月以来一直空位，此次借委员长交替的机会，聘清新民学院副院长佐藤三郎(预备役陆军中将)、前大连市长丸茂藤平两人，于 6 月 6 日就任。

华北政务委员会的任务与权限，在该会组织条例第一条中规定为“国民政府为了处理河北、山东、山西三省及北京、天津、青岛三个特别市管辖区域内的防共、治安、经济以及其它由国民政府委托的各项任务，并监督所辖各省、市政府，特设华北政务委员会”。该委员会的管辖区域应在以上三省之内。但临时政府时代管辖下的河南省北部(1 市 44 县)及江苏省北部(17 县)，为便宜计，并未移交国民政府，仍由华北政务委员会管辖(为了在江苏省北部执行行政工作，在徐州设有苏北行政专员公署)。1940 年末，又增加了安徽省北部的 10 个县，使其管辖地区由过去的 388 县增加到了 398 县。

另外，由国民政府委托委员会的事项，即 1939 年末，调整日华新关系内部协议中秘密谅解事项第一项所记载的，主要为在华北的日华协作事项: (一)防共及治安协力，(二)经济提携，特别是开发利用国防上需要的地下资源，以及日、满、蒙及华北之间的物资供求，(三)有关聘请、任用日籍顾问、职员等事项。

委员会所需经费，应由国民政府一并拨付，但根据已达成的谅解，暂以关税剩余的六成、盐税收入的七成及统税的收入做为委员会财政来源。委员会委员的任命是根据行政委员长提名由国民政府任命的。准许委员会拥有直属的绥靖军(治安军)。实际上除对外关系外，在内政方面采取了很少受国民政府统制的自治体制。

地方行政制度，在委员会以下设省及特别市，省以下设道、市、县，并任命了省长、道尹、市长、县知事。这些都不符合国民政府的法令，但做为过渡办法，仍按以往惯例实行。道尹在警务、财政、教育、建设各方面，对县政进行指挥、监督。

1940 年 8 月，河北省由 4 道划分为 8 道。山东省也准备由 4 道划分为 10 道。各省的道名(道公署所在地及所辖县数)如下:

河北省(130 县)

保定道(清苑、22 县)、真定道(石门、15 县)、冀东道(唐山、11 县)、渤海道(沧县、19 县)、燕京道(北京、15 县)、津海道(天津、12 县)，顺德道(邢台、22 县)、冀南道(邯郸、14 县)。其中渤海，燕京、真定、顺德 4 道为新设，石门、唐山 2 市为省公署直辖，北京，天津两特别市为政务委员会直辖。

山东省(105 县)

(原有建制)

鲁东道(烟台,15 县)、鲁西道(济宁，32 县)、鲁南道(益都、21 县)、鲁北道(德县，37 县)(此外尚有济南,芝罘两市和省公署直辖的威海卫、龙口，以及青岛特别市)。

(预定新建制)

登州道(烟台、10 县)、莱潍道(潍县、8 县)、青州道(益都、11 县)、沂州道(临沂、7 县)，兖济道(济宁、12 县)、泰安道(泰安.7 县)、曹州道(荷泽、13 县)、济南道(济南、7 县)、东临道(临清、17 县)、武定道(惠民、13 县)。

山西省(92 县)

雁门道(榆次，25 县)，河东道(运城、36 县)、冀宁道(临汾、31 县)。

河南省(44 县)

豫北道(新乡、19 县)、豫东道(开封、约 26 县)。

苏北地区 (17 县)

关于新民会的改组

新民会于新政府成立前，即已着手改组。1939 年末、趁刷新新民会领导阵容的机会，开始对该会的机构进行了改革。当时，主张新民会与军宣抚班合并、统一对民众的领导力量的呼声甚高。因而，在军部、兴亚院联络部、临时政府及新民会首脑之间，对其具体方案进行了审议。尔后，军宣抚班于 1940 年 2 月下旬宣布解散，3 月 1 日与新民会合并。

在此时期进行合并，其理由一方面是考虑到新国民政府成立后的华北政治形势;另一方面则是内部问题，即为了打开新民会工作的僵局，以及节减日方的军费，其经费由中国方面负担。

3 月 8 日，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了大新民会的组成仪式。宣称:“更加发扬政教一体，官民一体的精神，更加强调思想的统一，组织的普遍化”。并且决定了以下的新纲领:

新民会纲领

中华民国新民会为新中国建设之精神团体，与临时政府表里一体，同为国家机构的民众实践组织。其纲领如下;

一、发扬新民精神，显示王道。
二、实行反共、复兴文化、确立和平。
三、振兴产业，改善人民生活。
四、睦邻结盟，以建设东亚新秩序。

与新纲领同时制订的新民会章程规定，“新民会分中央总会和地方总会，后者由省(特别市)总会与县(市)总会组成。中央总会由全体联合协议会、中央委员会及中央机关构成。各地方总会同样由各联合协议会、委员会、事务局构成。各总会的隶属系统与行政系统相同。本会的基层组织单位为分会，由会员按地区系统和组织系统组成。”

3月30日华北政务委员会成立后，新民会将临时政府使用过的五色旗定为会旗，象征华北的五族协和与和平。

与此同时，制订了“民国二十九年度工作实施要纲”，其主要内容如下:

年度工作的首要目标在于确立新民会的指导理论，第二目标为谋求各个组织的扩大和加强。

指导理论的研究普及工作为:由中央总会确立新民主义理论，决定对共产主义、修正的三民主义的对策，阐明新民会的政治性质，此外，并从事整理抗日图书、编制禁书目录等。

扩大组织工作的重点为:(一)努力吸收会员，指导其在尽可能广泛的范围内组成分会。(二)使合作社、青年团等组织与组织分会工作紧密联系。(三)全面协助军方的模范地区工作。(四)在前线地区，与军方统一进行宣抚工作。

在推进上述各项措施时，应重整新民会的阵容，加强会的团结。8月17日，推举新任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揖唐为新民会会长，并任命华北政委会委员、各总署督办、省长、特别市长、苏北行政专员等为新民会中央委员会委员，形成政会统一的体制。(注:安藤、缪斌仍为副会长，片桐仍为顾问。)

三 各方面的治安肃正工作

方面军按上述第一期计划迸行肃正建设，专心致力于完成治安工作和开发、建设华北，实行了高度分散驻兵和连续不断的讨伐。此外，方面军集结兵力，对肃正重点地区的冀中、山西北部、山西南部进行肃正作战，力图消灭敌根据地。

方面军虽将重点目标指向共军，但从实施的作战目的来看，可以区分为:既有将共军与重庆军分别作为主要对象之时，又有将两者共同作为主要对象之时。另外从作战成果看，重庆军比较容易击败，但要捕捉、消灭采取退避分散战术的共军则极为困难。而且共军更能巧妙地躲过日军的进攻与冲击，使之转向重庆军；或者径自袭击、蚕食重庆方面的势力范围、以扩大其地盘，并组织群众实行扩军工作，逐渐扩大共军势力。

8月20日爆发的“共军百团攻势”的奇袭，给日军以极大打击，从而促使日方重新认识共军，并使以后的治安肃正工作空前加强。以下就山西、山东、河北方面的各军、兵团的状况，依次加以叙述，

山西省南部的肃正作战

主要肃正作战如下:
春季晋南作战(4 月 17 至 5 月 8 日)
乡宁作战(5 月 10 日至 5 月 20 日)
晋南反击作战(5 月 15 日至 6 月 20 日)

一、春季晋南作战(1940 年 4 月 17 日至 5 月 8 日)

1939 夏秋时，由于晋东作战和潞安扫荡作战，日军占领了潞安地区，但其南面山地以及中条山脉地区仍在重庆军占领之下,成为其在华北的第一个据点。此外，潞安北面山地为朱德领导下的共军根据地，企图向潞安平原扩张其势力，正与晋南重庆军相对峙。山西省西南部仍为阎锡山指挥的山西军盘踞，但由于共产党的策动，内部发生纠纷。为监视和防止该部动摇，李文率领的重庆中央军约三个师由陕西开进乡宁一带，监督山西军进行作战。

在上述中国军当中，晋南的重庆军抗战意志特别强烈。3 月中旬以后，将其一个军从黄河南岸向高平(潞安南约 70 公里)一带推近。晋南重庆军以卫立煌指挥的中央军约 20 个师为基干，加上其它 10 个师，总兵力约为 30 个师。该军利用险峻的山地构筑坚固阵地，从黄河南岸领取补给。

进入潞安平原的共军，随着重庆军的变更部署而向北部地区后退。该方面国共矛盾表面上保持平静状态。

日方担任山西省防御任务的第一军，于 1939 年前半年曾得到第三十六、第三十七、第四十一师团和独立混成第九、第十六旅团的加强，但从后半年夏秋起，由于第二十、第一 0 八、第一 0 九师团逐次复员回国，其兵力变成三个师团和四个独立混成旅团。军方将第三十七、第四十一师团部署于南部同蒲线地区，第三十六师团部署于潞南地区，另外将独立混成旅团部署于北部地区，分别担任警备。

第一军长期以来企图消灭晋南一带的重庆军，以扩大治安地区。方面军也认为有此必要而将其纳入年度的计划。于是从第十二军及驻蒙军抽出一部兵力配属于第一军，令第三十五师团的一部从清化镇向泽州活动以协助第一军。

第一军命三十七师团攻击运城以南中条山脉的中国军，命第四十一师团从沁水东面、第三十六师团从陵川，高平袭击各自面前的中国军，进占泽州平原，然后搜索歼灭晋南的中国军。第三十七师团 4 月 17 日开始进攻，当晚进抵黄河一线。第三十六、第四十一师团 20 日开始攻击，击败凭据坚固阵地迸行顽抗的中国军，于 25 日占领泽州。第三十五师团的一部，27 日占领天井关(泽州南约 15 公里)切断敌之退路。

以后，军方即于新占领的平陆(运城南约 30 公里一黄河河畔)、张马(翼城东南约 30 公里)，沁水、阳城、泽州驻扎部队，并在其附近进行扫荡，努力扩大治安圈。

在这次作战中，值得注意的特点是:在潞安以南地区的共军，在作战将要开始前，即将地盘让与进入该地的精锐的重庆军、而退避到潞安以北地区。以后，重庆军因遭日军猛攻而败退时，共军则乘机进入沁河一带。

二、乡宁作战(1940 年 5 月 10 日至 5 月 20 日)

5 月上旬，由于晋南作战，致使同蒲路沿线地区的警备力量减弱，此时，前述李文指挥的重庆中央军前来袭击，于是在各地展开了激烈战斗。

第一军，决定将山西西南部的中国军在黄河左岸地区予以歼灭，定于 5 月 10 日命第三十七，第四十一两师团向乡宁方面进行作战。5 月 15 日，第三十七师团占领乡宁后，由两师团夹击中国军，予以重大打击。军方断定预期目的已大体完成，且因晋南方面情况告急，乃命令两师团自 17 日开始转回。两师团在返回途中进行扫荡，于 20 日回到汾河平原。

三、晋南反击作战(1940 年 5 月 15 日至 6 月 20 日)

第一军在上述晋南作战时，判断与我交战的重庆军为 19 个师 2 个旅，除夏县东面中条山脉外，晋南一带的重庆军，特别是第十四、二十七、七十一、九十三各军已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为此，授予攻占泽州附近的第三十六师团以奖状。

然而，重庆军始终企图反攻，夺回晋南地区，尽力加速恢复和增强其战斗力，乘乡宁作战日本警备兵力减少之际，在晋南地区积极进行反击。我各警备队以寡兵奋战将其击退。

第一军乘重庆军出击的机会，拟消灭该军以扩大晋南作战成果。当即命令各师团进行反击。第三十六师团在泽州西面及天井关西南地区，第四十一师团在阳城地区，第三十七师团在绛县、夏县、闻喜以东地区，分别击败重庆军，使其反攻企图遭到失败。

第三十七师团地区的警备及治安情况

第三十七师团(师团长:平田健吾中将)自 1939 年 6 月中旬接管以运城为中心的晋南 17 县的防卫任务以来，尽力实行讨伐，加强警备和治安工作，几乎未得一日安宁，期使治安迅速巩固。据该师团的“情况报告”所载，截至 1940 年 7 月底治安情况如下:

目前管内敌情，不仅兵力减少到只有大约六万人，而且其作战意志及行动最近表现消极，各师的实际战斗力，相信已显著下降。

师团在作战过程中，相继获得要地。第一线部队向前推进以期扩大占领地区，并且坚决更高度地分散部署兵力，笼络民心，以巩固治安。因此，在管内尤其是平原地区，治安极为稳定，晋南地区的明朗形势深为各地所称道。

其次，回忆在作战中致力于治安工作的成效，当时师团管内处于四面临敌的华北最前线。由于各部队及机关的勤奋，使居民能较快地信赖皇军。居民人数比驻兵初期约增加四成，在东亚新秩序下共同安居乐业的现状，出乎视察者们意料之外。县政也在迅速恢复，我军驻兵之初，县政刚刚就绪的只有 9 县，而现在已有 14 县。政治体制大致接近完备并达到行政独立自主的程度。此外，因事变而停顿的一般工业，已得到恢复，并且日趋兴旺。治安状况正在顺利恢复中。

第三十七师团地区尽管处于四面皆敌的险恶条件下，但管内治安仍能顺利好转，其原因之一，认为是由于共军未在此地进行渗透工作。

第三十六师团地区的警备及治安情况

第三十六师团(师团长:舞传男中将)于1939年12月上旬从太原一带移驻潞安地区，与第二十师团换防后，接管了山西省沁县、榆社、武乡、黎城以南、沁河左岸地区的防卫任务。以后，即进行上述肃正作战，努力扩大和充实治安圈。师团对1940年7月末前后关于警备及治安状况所作的《情况报告书》中有如下记载。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共军“百团大战”即将开始前，师团是如何观察共军的。

一、敌情

目前，在师团的作战地区内，八路军所属第一二九师的一部(约 2,000 人)在襄垣{潞安北约 40 公里}，潞城(潞安东北约 20 公里)、黎城(潞安北约 40 公里)，平顺(潞安东 30 公里)等县。中央军所属的第二十七军(约 8,000 人)在陵川附近，第九十三军的一部(2,000—3,000 人)在高平以西沁河河谷，仅有小的蠢动，而且由于屡次与我作战，其战斗力均有显著下降。但是，共军第一二九师专门对我交通线进行游击战，其它中央军也正企图转入游击战。敌人的主力逐渐向黄河河畔的济源、垣曲集结，但尚未发现积极行动。

二、师团的配备

师团把警备范围分为四个地区，由步兵团长山内少将指挥的步兵两个联队(步兵第二二二、第二二三联队)、山炮兵一个联队(缺四中队)、野战重炮兵二中队、迫击炮一大队及其它部队担任自高平以南地区的警备，由步兵一个联队及山炮兵一个中队担任自虎享镇(潞安西北约 50 公里)附近，经潞安至荫城镇(潞安正南偏东约 20 公里)以南地区的警备，由步兵一个大队及山炮兵一个中队担任以长子(潞安西约 30 公里)为中心地区的警备，由搜索联队担任以潞城为中心地区的警备，将工兵的主力及山炮兵一个大队及其它部队部署于潞安附近。上述各警备队分驻于约 70 个地方，并派出大约 50 个分哨，分布在约 500 公里之间。

三、治安

由于春季晋南作战与晋南反击作战，管内治安有显著好转。

过去山西东南地区为敌中央军在华北的唯一据点，最近由卫立煌的精锐部队所占据，潞安以北及东北已成朱德率领的共军根据地，其威力已深入民心。由于过去对皇军撤退后的惨祸有深刻的体验，因此，能协助我军领导民众有威望的人很少归来(指 1938 年日军暂时撤离这一地区时，凡协助日军者均按汉奸论处而被中国军所杀)，以致各项治安工作进展迟缓。后来，由于我军在屡次作战中给了敌人以毁灭性打击，同时进行宣传、宣抚工作，逐步增强了对皇军的信赖，因而各项工作正在顺利展开。

截至今春，从潞安开始，依次设立了潞城、襄垣、长子等县公署，新驻兵地区的泽州、高平也已成立县治安维持会，县政开始恢复。日华军民协力加强中国方面的自卫力量，并将工作重点转向安定民生。目下民心趋于稳定，正在协力维持治安，因而管内洋溢着明朗气氛。

山西西北部的肃正作战(1940年6月6日—7月8口)

山西省西北部是共军一二 0 师及前发生兵变的山西新军的根据地。第一军在方面军指导下与驻蒙军相配合，企图消灭盘踞在兴县、临县，岢岚及岚县地区的共军，以防止该地区的共产化，并削弱中共在同蒲线北段以东策划的活动。为此，自 1940 年 5 月中旬进行了作战准备。

参加此次作战的部队为第一军的独立混成第三、第九、第十六旅团，驻蒙

军的谏山、石丸两支队。第一军决定的计划如下:

一、独立混成第三旅团在面对黄河作战开始前，应首先消灭岢岚附近的共军。然后从岢岚附近开往黄河一线作战，与驻蒙军相配合，消灭保德东南地区的共军。

二、独立混成第九旅团应首先消灭岚县附近及交城西面之共军，然后从该地开往黄河一线作战，与独立混成第十六旅团相配合，消灭据守在兴县及临县北部之共军。

三、独立混成第十六旅团应向方山及临县北部地区进行作战，切断岚县及兴县方面之敌向西南方向的退路，与独立混成第九旅团相配合消灭驻在之敌。

根据以上部署，6 月 6 日开始作战，各计伐队在各地击败共军的抵抗，于 6 月 25 日前后进入黄河左岸地区，然后返转来对所负责地区进行了扫荡。

参加此次作战的共军约 33,320 人，遗弃尸体 3,418 具，俘虏 219 人;日军死 89 人，伤 79 人。此次作战的特点是:共军抵抗的顽强，及伺机对日军进行攻击。

据中共方面的记录，包括此次作战在内，在 1940 年内山西省西北部的情况如下:

1940 年初，晋西北行政公署设立后，在 2 月 1 日的第一次行政会议上，制订和公布了促进宪政运动、扩大抗日革命武装力量，改善人民生活等六大施政纲领。

日军为了破坏晋西北新政权的建设，在 1940 年内进行了春、夏、冬三次空前的大扫荡。

在春季扫荡中，敌人集中 12,000 余人的兵力，占领了方山、临县、岚县。我军经过 38 天的激战始将敌击退，并收复上述三县。

6 月，敌以两万余人的兵力进行了夏季大扫荡。我军在 58 天内大小战斗 251 次，经苦战后粉碎了敌人的扫荡。特别是二十里铺(兴县)、米峪镇(静乐县)的战斗最为激烈。

8 月，在百团大战中，第一二 0 师、山西新军以及地方武装力量，全力以赴参加战斗，进入太原、忻县、崞县、朔县、大同等地后，50 天内作战 316 次，使敌人遭到极大损失。

敌人为了进行报复，立即以两万余人的兵力发动了冬季大扫荡，对晋西北实行了惨酷的“三光政策”。我军经过 35 天、300 余次战斗，终于粉碎了敌人的扫荡。

以上是这一年中第一二 0 师所进行的四次大的作战。

冀中、冀南及山东的肃正作战

方面军在年度计划的第一期，将关系到打通水路的肃正讨伐地区，选定为津浦、京汉两线中间一带，尤其是冀中地区，并以之作为第一重点地区，实施作战如下:

一、冀中作战(4 月 11 日—5 月 31 日)

方面军于 3 月 23 日召开了参加作战兵团的第二十七、第一一 0 师团及独立混成第十五旅团的会议，然后令各兵团分头准备作战。其设想为:首先对白洋淀(保定东约 50 公里)附近，继而对滹沱河、滏阳河、子牙河沿岸地区进行扫荡作战、以打通保定水路、石门水路、滏阳水路，然后为确保这些水路继续进行讨伐。

各兵团按照这一计划，从 4 月 11 日到 16 日进行了第一次扫荡作战，自 18

日到 28 日进行了第二次扫荡作战，占领各水路要点，以后到 5 月 31 日反复连续讨伐，对附近一带进行了肃清扫荡。

在此期间，冀中的共军及土匪虽然只是分散退避，但另方面在西部山地，拒马河河谷及冀东的热河、蒙疆边境、特别是在南口、蓟县方面，共军的策动却活跃起来。所在的警备队对该方面反复进行了讨伐。另外关东军从 5 月 8 日至 6 月 12 日，接着又在 7 月 28 日以后约 3 个月内，将驻在热河的部队及其它讨伐队调入冀东地区，驻蒙军的独立混成第二旅团也予以策应，与第二十七师团及独立混成第十五旅团相配合，对满、中边境山地方面反复进行了讨伐。

二、冀南作战(1940 年 6 月 4 日—7 月 31 日)

方面军为实施第二期打通水路的计划，在第十二军司令官饭田贞固中将统一指挥下，令第三十二、第三十五、第一一 0 师团的各主力部队参加，自 6 月 5 日至 7 月底，对盘踞于河北、河南、山东三省边界附近的共军进行了冀南肃正作战。

首先为了消灭黄河以南的中国军。由第三十二、第三十五师团的各一部自 6 月 4 日开始行动，到 6 日扫荡了东明周围地区的共军根据地。

接着，各兵团讨伐队为了隐匿行动意图，尽量在接近讨伐目标的前方选定出发线，6 月 10 日从东、西、南、北各方面一齐向濮阳分进合击。濮阳周围是冀南共军巩固的根据地。12 日各兵团进入濮阳附近，但共军早已分散逃避。据判断主力似在朝城西北、郓城、钜野一带，等待日军撤退后，相机重返原地。

各兵团在附近一带要地分散部属兵力，直到 6 月下旬为止，进行了反复扫荡，并且打通了卫河水路。

对此次作战，第十二军作战主任参谋松田正雄大尉曾有以下回忆:

1.作战设想，是根据以往经验，要在当时占据地区的边缘附近悄悄地逐渐开展，缩小包围，各个击破。部署时为了不使敌人漏网，利用飞机放烟雾标出位置，仔细考虑了防止共军脱出包圈的对策。

讨伐的对象固然是共军，但石友三等的部队也在附近。对此，决定凡与重庆系统无明确区别的部队，可不必犹豫一概予以攻击。

2.作战期间，在很多情况下，不能确知各讨伐队的位置，即特殊情报也不能收效。我为了指导战斗，尽量以飞机进行侦察联络。但是，即使发现共军，由于战场极为辽阔，仍然不能及时指挥将其捕获，以致未能取得象样的战果。

3.关于当时第十二军的治安工作:

盘踞在各兵团作战境界附近的共军根据地，军方指定为“灭共地区”，讨伐及治安工作的各项措施，均不受作战境界的约束。在研讨了由当地单一指挥官统一领导的方法后，白 1940 年初，部分开始实行。

军方为了使武力战的施策与思想、经济、政治范围的各种施策相得益彰，对于制订全面的治安施策曾经煞费了苦心。然而，由于对共产主义本质的理解及所采取的对策不够充分，同时作为异民族的日军处于孤立地位，加以不能在经济上支援中国，因而不能制订出有效的施策。结局，只有考虑使日军占领地区的居民尽可能得到安居乐业，并以此向群众进行宣传。蒋介石在内战时，为了使共军与人民分离，采取了极端的“空室清野”政策，结果反而召来民众的反感。军方未实行这种政策。

三、山东(鲁西、鲁南)的肃正作战

扫荡陈光支队:1940 年 4 月下旬至 5 月中旬，第三十二师团的一部及独立

混成第十旅团的主力，在鲁西地区对陈光指挥的共军东进纵队进行了扫荡。但是，并未取得显著效果。

扫荡高树勋军:此次扫荡从5月上旬至下旬，与上项作战同时进行。当时共军因受到压迫逐次南下，我军即对鲁西地区苟延残喘的高树勋军进行讨伐，并打击了该军。

鲁南剿共作战:重庆政府的山东省主席沈鸿烈，痛感山东省及苏北、皖北地区共军兵力的迅速扩大，国共矛盾更加深刻，深恐中共势力渗透，因而要求部下积极进行剿共。

第十二军，为了鲁南地区的肃正，命独立混成第五、第六旅团及第三十二师团的一部，自9月中旬到10月上旬，以鲁村为中心，对蒙阴地区的沈鸿烈军及以沂水西南地区为根据地的中共徐向前军，进行彻底的反复战斗，使之四散溃逃。

第三十二师团地区的警备与治安情况

第二十二师团(师团长:木村兵太郎中将)，是1939年3月在第一师团留守部队基础上编成的，5月编入第十二军的战斗序列，在与第一一四师团交接后，担任山西省西半部的防卫和治安肃正任务。另外，独立混成第十旅团以后备各部队为基干，于1939年在华北编成，隶属于第十二军，主要担任胶济、津浦沿线地区的警备。

以后，两兵团负责地区的肃正建设虽逐渐有所进展，但第三十二师团的《情况报告书》有如下的记载:

一、敌情

目下，作战地区内存在的匪团，有正规军，共产党各种部队，杂牌军以及土匪，总数约二万人。这些匪团大部分活动在与邻接兵团作战地区的边界或山地。训练、装备很差，战斗意志不高。特别是由于国共斗争日甚，匪团矛盾也加深，不断出现前来投降者。

然而，最近一部分共军从山西方面进入作战地区，逐渐对蒋系军(匪)进行拉拢或强制合并。对此活动不可忽视。

二、治安肃正工作逐渐恢复，强调治安肃正以讨伐为主。在高度分散部署兵力情况下，不分战斗兵种，断然排除万难，连续进行讨伐。

第二十七师团地区的警备与治安情况

第二十七师团于1938年7月以中国驻屯兵团为基干而编成，是继承40年来中国驻屯军传统的师团。该师团参加攻占武汉战役后，调回华北，于1939年初接替第一一 0 师团担任河北省东半部的防务。独立混成第七旅团配属于该师团后，担任南部地区的警备。

关于第二十七师团管内及周围的治安状况以及肃正建设的情况，师团长本间雅晴中将在I940年12月1日所作《师团情况报告书》中有如下叙述:

一、敌情

师团管内及周围之敌，为共军、国民党系正规军及杂牌军等。在接管防务时，其兵力约九万人，主力在津海道一带，一部分盘踞在冀东道北部山区，不断进行武装活动。在天津周围，国共双方的各抗日闭团体以英、法租界为根据地，活动频繁，采取暗杀、放火、破坏铁路等各种暴行挠乱治安。因此，在天津以南地区，只能在津浦线两侧数公里之间，勉强保持着艰难的治安状态。但经我连续反复进行果敢讨伐，使敌战斗力逐渐削弱，陆续向西部及南部作战地区的边缘逃避，或四处逃散。至1939年5月底，在管内已见不到有组织的强大匪团存在。

然而，残存的匪群逐渐便衣化，巧妙躲开我军讨伐，转向地下活动。现在正尽力加强及扩大其抗战力量，企图依靠游击战夺回我守备兵力薄弱的乡镇，或策划破坏主要交通线等，其活动愈来愈加阴险顽强。

为此，师团逐步加强和扩充谍报网，训练投降的土匪及中国方面的自卫机关(伪军—译注)，以此为骨干组织多数的特别工作队，对潜伏的匪团进行严格的侦察、剔抉以期将其消灭。同时，各地驻屯部队只要发现匪情，立即出动反复进行猛烈果敢的讨伐，使之彻底覆灭。结果，经过一定时间，敌人的战斗力和战斗意志显著减退，使长期在师团作战境界附近妨害治安肃正工作的主要匪团退至管界以外，或向我投降。管内残存的敌便显著减少，本年四、五月在冀中地区肃正作战告一段落时，敌之兵力不过有2,800人左右。

然而，到今夏青纱帐起，逃到管界以外的匪团重新潜入管内开始蠢动，不断袭击我小的据点、破坏交通、电线等，反复进行游击、破坏活动。此种活动，在8月下旬自百团攻势后至9月中旬最为活获。各防御地区部队以最严密的警戒和果敢的讨伐，终于结束了局部地区敌人的策动。以后，随着农作物的收割，管内进行清扫，敌又重新转向地下活动。

另一方面，以天津英、法租界为中心的抗日分子，由于我方对租界严行隔离，加以日英东京会谈的进展，第二次欧洲大战爆发，英国对日态度的大转变，以及汪精卫的和平运动与去年9月以来蓝衣社干部的数次被检举及投降等原因，抗日活动已被扼止。如今管内治安已有显著进展。

然而，如上所述，随着国民党系匪团的南逃，管内及周围残存之敌，形成一色的共产势力。其赤化及抗日工作，更加隐蔽，活动也更加积极顽强。不仅如此，蒋介石最近也高唱将于冬季攻势中，在河北破坏铁路，袭击乡镇。对此不可有半点疏忽。(以下略一笔者)

二、治安肃正及建设

师团所采取的方针，起初将治安肃正重点放在武力方面，一心想要消灭作战地区内的匪团，以期稳定治安、改进民生，从而实现华北的明朗化，并对长期建设作出贡献。1939年4月以后，彻底实行了高度分散部署兵力，扼住了匪的交通，并且进行了彻底消灭残存匪群的讨伐作战。各部队不断击败多数敌人，正节节获得胜利。但是，正当此时遇到天津租界问题及去年夏季空前大水灾。为了应付这些事件，在长时期内，不能将所属的机动力量分出一部分使用。(以下略一笔者)在本年度，除高粱收割之前匪势仍将活跃一时外。大体上正在按照预定的肃正建设进度进行。在此期间(1939.1.10—1940.11.30)，出发讨伐次数大小合计29,168次，讨伐战斗次数为2,759次，敌参战兵力633,312人，敌遗尸24，476具，缴获步枪20,131支，俘虏4,491人。敌战斗力显著削弱。从而促进了治安肃正工作。另一方面，我忠勇的官兵丧失了649人，负伤1,378人，甚为遗憾。

与武力工作并行的文化政治工作，特别注意争取民众，密切结合肃正讨伐以促进各项工作。首先尽快恢复管内42县的县政，调整及扩充地方自卫组织，确立乡村自治以期安定民生。在各项经济工作中，开发产业、恢复贸易、运输等，以利于物资的流通。此外，整顿、扩充交通通信设施，使讨伐与补给得以顺利进行，并可振兴民间营业。恢复教育机关，普及小学教育，努力诱导纯洁的少年，积极训练青少年，密切军民关系等。经过努力实行这些措施，逐渐收到实效。此外，滦州及沧州地区的模范区工作正在稳步进展。治安、政

治、经济、文化等各项工作，到今年 3 月已奠定了基础，现正继续向前发展。鉴于这些措施效果显著，现正向其它各县推广中。

三、英法租界问题

自去年 6 月 14 日开始封锁租界以来，一年多严格的隔绝工作，顺利收到效果。受租界掩护的抗日共产分子所祸害的天津及其附近的治安，得到极大改善。被我封锁的英、法租界当局，由于受我严格封锁及国际形势转变的影响，自去年底以来态度大有改变，如今对我提出共同搜索租界内抗日共产分子等要求均已应允。

在经济方面，租界内工商业日趋萧条，内外贸易也因我采取汇兑统一政策及输出输入管理相结合的办法，已形成日商逐步蚕食外商地盘的状态。

租界封锁解除后。师团仍在严密监视租界当局的态度，指导他们协助我建设新秩序。解除封锁后，一度衰颓的该两租界，虽然表面看来恢复了某种程度的繁荣，但师团期望使日人势力尽量向两租界内推进，夺取他们的商权，同时，并尽可能参与其行政权。

如今，我国国力，尤其是皇军的威力深深渗透两租界，特别是我宪兵常驻租界，给英、法人及该租界内的华人以极大威胁。租界内的英国军队自本年 8 月 18 日撤出天津，以后租界的警备主要由英工部局义勇队(由英、华人组成)承担，目前似有由美国军队担任警备的趋势。

治安肃正的根本问题在于军队的精锐，但鉴于各部队长期以小部队高度分散部署，经常进行讨伐，因而特别需要保持军纪，风纪，提高教育训练，端正工作态度等。为此，强调克服一切困难，加强监督指导。此外关于官兵的素质问题。该报告书写道:

自去年以来，由于多次的补充和调动，兵员现有人数为 11,546 人，其中新征入伍者为 1,841 人。下级士官的 1,896 人中，新征入伍者有 898 人，军官中约三分之一为现役军人。

独立混成第十五旅团的治安肃正工作

旅团在 1939 年 8 月 15 日，以第一一四师团为基础在华北编成后，接管了由第一一 0 师团担任的燕京道地区(涿、固安、房山、良乡、苑平、大兴、昌平，通州、顺义、怀柔、密云、三河、香河、平谷、蓟等县及北京市)的防卫任务，第一任旅团长为南云亲一郎少将。旅团司令部设于北京市内交通大学的校舍。由炮兵大队、工兵中队、通信队驻在北京及其附近担任小地区的警备，独立步兵第七十八大队担任北京西北面、第七十八大队担任北京南面、第七十九大队担任北京西面及西南面、第八十大队担任北京东北面、第八十一大队担任北京东北面及东面各地区的警备。I940 年 3 月会同驻蒙军进行了对东斋堂方面的肃正作战(“卜”号作战)，随后，我驻兵于门头沟及房山西面山地，扩大了两个矿山地区的治安圈。

各警备队根据匪情随时出动，连续数日或十数日反复进行讨伐。在此期间，旅团经常抽出兵力加强其它方面，或按旅团计划进行肃正作战。

旅团长兼任北京防卫司令官，除担任讨伐警备外，并负责政务指导，加以暂时或长期由他指挥的部队众多，需要处理多方面的业务。关于这些实际情况，

长谷川美代次少将(后升中将，在任期间为 1939.10－1941.8)，在冀中作战终了的 1940 年 5 月 31 日所写的笔记“就任以来约八个月期间的主要感想”中有如下记载:

一、敌匪的蠢动，在所谓粮食青黄不接时期特别显著。对此，各警备队不辞辛苦积极进行讨伐。然而讨匪有如驱赶苍蝇，驱之复至，徒劳无功，需要有这样的精神准备。由于匪的语言风俗与居民相同，他们在得到居民帮助，或强迫居民帮助下，出没无常，并且对当地情况非常熟悉。

二、各警备队要巩固各根据地的防备，不使敌有隙可乘，这样可增大流动兵力积极讨匪。警备队在部署兵力方面，必须考虑兵力的高度分散部署，不致减低其灵活性，以便互相支援。

三、北京周围亦有不少土匪，数十人成群地出没于各地。土匪为其生存而苦害居民。彼等骚扰的地区，匪群大小虽有所不同，但各有自己的地盘为其活动区域。

四、共军在 1939 年初，盘踞于北京西面的山地，但至同年年底，其势力即向北京北面山地伸张，逐渐向东接近冀察热边境的山地，终于伸展到平原。当然也有一部可由北京西面山地进入东面平原。匪中最顽强而兵力较大、地下工作巧妙的有朱占魁部，该部以涿县、固安(北京南 40 公里)、大兴县(北京南 20 公里)为地盘，频频蠢动。包森、单德贵、杨作霖等以蓟县(北京东 80 公里)，三河(北京东 45 公里)、平谷(北京东 55 公里)为其地盘。肖克以西面山地为地盘，黑玉春,郑九如以密云县(北京北 65 公吸)为地盘，进行活动。

五、上述各匪的装备以步枪为主(新旧杂牌不等)，只有共军有时还使用手榴弹和地雷。

六、为了不让森林多的固安方面之匪易于隐避和逃窜，命平原警备队准备大量的锯，用以采伐树水，以便于了望。同时，限制种植高粱等高杆作物而奖励种麦。因此，在固安县地区到四、五月间麦苗发青，而靠近匪区则可看见地皮(高粱未长起能看到土色)，彼我势力范围能以明显区分，甚至在高杆作物茂盛时期，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平原地区之敌匪挖掘道路改成交通壕，为了做到各村之间的联络和防备我用汽车袭击，更掘开 20-30 米间隔的横断壕。为此使村民付出极大劳力。

七、北京周围的山地，树木少而岩石多，地皮外露极为险峻。在此通行的道路，多系仅能成单行前进的小道，路而又多露有尖角的石头(因流水冲去砂土所致)，步行极难。当初为了便于山地讨伐而穿用水袜，不但脚疼而且袜底很快磨坏。最后决定改穿军靴，但年岁大的部队长却又感到行动不便。

八、各警备队的防卫，是在部队驻地的四周筑起高墙(利用破坏的房子和砖)和土壕，加高了望楼以便监视，增强防卫力量。因此，匪的经常来袭已显著减少。但是，上述建筑物只能抵御步枪的射击，而不能抵御火炮。

九、对居民的宣抚，使之靠拢日军，尚需下一定工夫。白天匪来，则日军讨伐，日军去，则匪又来，致使居民无论对匪或对日军均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因此在匪情严重的地方，我警备队如有长期驻扎的迹象，则村民即可放心，并与我协力，此种实例不少。由于语言、风俗、习惯不同，在讨匪、宣抚以及各项指导方面有很大障碍。象多田方面军司令官所说的那样:“能使一个中国人信服就能使百万人信服。”真正做到却也困难。

我军如果能严守纪律、风纪，对居民无不正当行为，就能使居民对我敬仰信赖，这是绝对必要的。

十、中国方面的武装，有自卫团、警备队、警防队等。

警防队(司令王铁相与治安部齐燮元上将对立)驻在密云、蓟县等地。时常单独行动，或配合我军，但其实力不大。该队也有携带武器集体逃跑(3 月 7 日在石匣镇约有 30 人携械逃跑)，及私搞鸦片买卖的情况(以后被重新编成治安军分驻于涿县、固安、平谷、蓟县、

顺义、密云等地.与警防队相同)。

十一、关于北京的特殊性

北京是军事、政治、经济的中心，将领、高官、财界要人等往来频繁，每次均须采取措施加以保护，而过往的军队.也不少。为此，由旅团长兼任的北京防卫司令官，除作战任务外，还必须考虑各种应酬、交涉等等公私事务。

此外，尚有多项业务如:为了制订北京市的防卫、防空计划及实施演习，常常要与方面军司令部、宪兵、民团和中国政府进行交涉、谈判.还必须采取措施整顿驻北京军人的风纪，处理“恐怖”事件，以及解决北京市民的食粮问题;又要指挥特务机关及北京兵站事务所，在宣抚工作方面，既要指导县联络员，又要与新民会保持联系;对在乡军人会、国防妇人会、日华青年团、铁道护路队等还要负责教育、指导。此外，在西欧德、意军与英法军的战斗开始后，驻北京的英法军将对意军(为数极少)如何处理问题，也要加以考虑。

以上是日本方面肃正建设的概况。在此时期，中共方面的政治、扩军工作进展速度非常快。

四 中共在华北的政治工作及军事方针

政治工作的重点

政治工作，根据各边区和各边区内各地区的实际情况，其重点有所不同。晋察冀边区具体的政治工作重点，可举察南、冀中地区的情况为例加以说明。

中央灭共委员会调查部自1940年6月18日至7月19日,对察南地区的“抗日赤化工作的实质”以蔚县为中心作了实地调查，在其报告书中以“最近的政治工作重点”为题，有如下记载:

(一)中共工作人员，在军事上虽采取守势，但在政治工作方面。则按照共党的政策采取坚决的抗战态度，努力争取群众。

(二)边区以自给自足及改善群众生活为目标，制订增产计划，按长期游击战方针及发展生产政策开始第一阶段工作。

(三)为了促进边区宪政运动，在民主集中政治的名义下，着手建立类似苏维埃式的政权。

(四)以所谓动员全民武装、广泛开展群众性游击战争为宗旨，对过去的群众团体运动，除留少数干部维持原状外，全部编入武装团体，扩大和加强人民武装自卫队，并对他们进行训练，以便配合正规的战斗部队。

(五)对日军占领地区，采取拉拢、瓦解等手段，不断进行地下活动，特别着重于削弱中国方面的机关，破坏和扰乱日本方面的治安和财政经济。

(六)对日军占领地区的人民，以宣传背离日军及新政府机关为重点，采取以下方法，从民心的背离逐渐导向反抗运动。

1.以日军对中国当地政权的干预和新政权的卖国政策等为内容，捏造诽谤宣传。

2.广泛散布中国军人及公务人员的无礼、渎职、无能等流言。

3.扰乱经济、例如采取抬高物价、囤积物资、现金的黑市交易等手段，以贬低蒙疆票、联银券的币值，阻止其流通。另一方面则维持和提高法币价值，扩大边区银行纸币的流通。

中央灭共委员会所调查同一时期的冀中地区西南部(由定县、安国到无极、

饶阳一带地区)的情况如下:

冀中地区为建立军事、政治游击根据地的重点。但是，由于平原地带的自然条件对军事行动有一定的困难，因而努力从事政治根据地的建立。办法是先建立起分散的小根据地，然后在其中间建立中心根据地。

地方共产党组织的主要领导力量是军内的共党组织，由于领导部门经常游动，而固定于地方的基层组织尚不健全，因此，在执行政策方面，形成以下那样由武装力量强制执行的情况。

一、各项选举虽普遍实行，但群众能够产生何等政治力最颇成疑问。

二、武装力量为后盾动员群众，对争取中农、贫农虽有进展，但由于领导部门的游动，对群众的影响有限。

三、按照中共中央指示，实行各项经济政策的另一方面的结果，增加了物资征用的负担，改善民生的措施也不完备。

行政组织与民众组织

中共争取群众工作的特点是，一方面改革行政组织及群众组织，以期使之加强和扩大，另一方面积极行使笼络民心的政策。开辟冀南游击区的领导人杨秀峰说:“群众工作是政权工作的基础，开辟冀南游击区的宝贵经验说明了密切群众工作和政治工作的关系是何等重要。”

关于行政组织的改革问题，晋察冀边区政府于1939年3月5日公布了“晋察冀边区县、区、村组织法条例”，确定成立各级人民大会，使人民参与政治。

对于政治工作基本单位的“村”尤为重视。下面对新村政权详加说明，作为工作人员指导居民的参考资料。(注:根据灭共资料“察南边境抗日工作实况调查报告书”)

一、所谓新村政权即村公所。村政权是国家的支柱，是边区政府、县政府、区公所一切工作的基础。

二、村政权是团结人民的中心机关，是保持政府和人民密切关系的机关。在抗日战争时期，遵照政府的命令，进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废除苛捐杂税，优待抗日军人家属，选举区长、村长等工作，为抗战和人民的利益而努力。

三、新政权中必须排除汉奸。选举作风民主、为人民大众服务的、热心抗战的村长和办事人员，以改革村政权。

四、村中最高权力机关是村民大会，其常设机构为村民代表会。村民代表会位于村公所之上，为村的最高机关，由村中选举热心抗日救国受村民信赖的人做为村民代表。村长、村公所要服从村民代表会的决定。此外，由村民代表会推荐，由村公所组织的调解、经济、生产、教育等委员会的委员，担任各项工作。

五、村民不能放弃自己的权利，必须经常协助代表会监督各代表的工作。

其次谈到有关加强群众组织的问题。群众组织中有武装组织及非武装组织。前者是八路军的游击队、自卫队等脱产的军事组织。后者有农民救国会、青年救国会、工人救国会、妇女救国会、文化界抗战建国会等，及各县的抗日救国联合会。这些都是存在于直接生产和民众生活之中的组织。其名称、组织各地

区有所不同。兹举冀中地区为例，其情况如下。(注:根据灭共资料“冀中区中部方面实情调查报告书”)

一、人民武装自卫队

为了使共区农村现有的农民自卫队，本着全民抗战精神，发挥更大作用，《冀中区人民武装自卫队组织条例》规定任务如下:

1.协助抗日作战，开展游击战;

2.侦察、警戒、防止泄密;

3.维持地方治安、剿灭通敌分子、镇压汉奸、逮捕敌人间谍;

4.传递情报、运送军需物资和伤员;

5.破坏敌军交通、维护我军交通以及协助构筑工事。

自卫队的组织系统如下表。

自卫队的组织系统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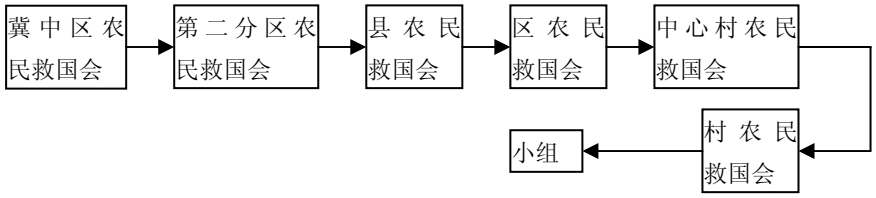
县总队部
队长 1名
军事干事 1名
政治工作员 1名
区大队部
大队长 1名
政治指导员 1名
军事干事 1名
政治干事 1名
政治工作员 1名
中心村或大村中队部
中队长 1名
政治工作员 1名
军事干事 2—4名
第一分队 壮年队 26岁—40岁的村民
第二分队 青年队 17岁—25岁的村民
第三分队 守护队 41岁—55岁的村民
第四分队 妇女队 16岁—55岁的村民
第五分队 儿童队 11岁—15岁的男女

以中心村及大村为单位成立中队部，大村超过编制的人员及人员不足的小村编成混合部队，由附近大村的中队部指挥。在分队编制以外，组织游击小组(或班)及除奸、侦察、担架、运输等小组，或组织联络队、响导队等。

由于自卫队是与群众日常生活紧密结合的半武装组织，其特点是:能够出色地发挥固定谍报网的机能，干部大多数是贫农，容易同情共产党的政策，防止村内群众的脱离，并能积极配合抗战等。

二、农民救国会

通过保护农民的日常生活利益，使他们组织和团结起来，同时动员他们支援抗战，因而这是中共最重视的群众组织。



冀中地区的政治工作(行政组织、群众组织)一览图(见下页)

三、工人救国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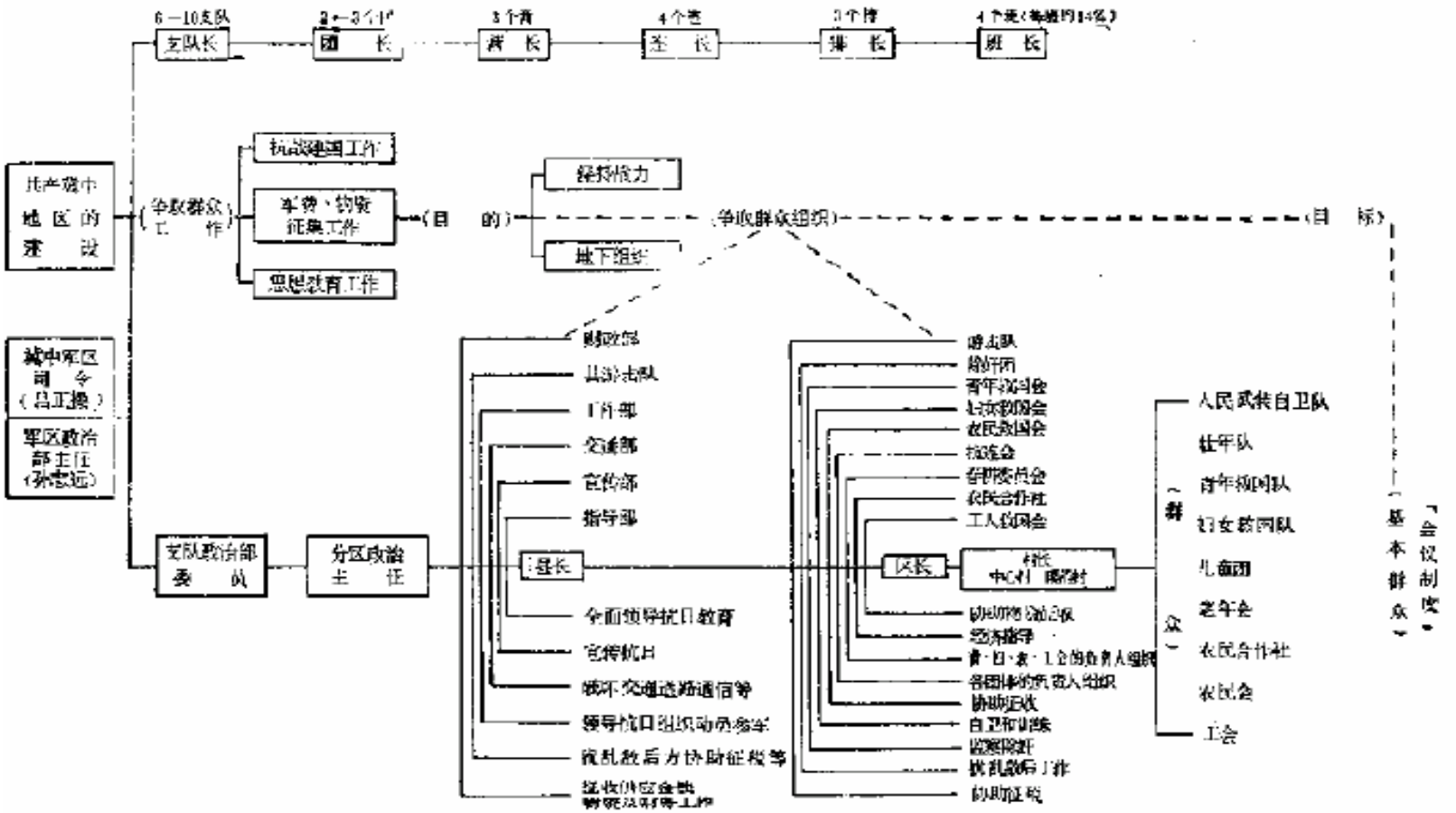
以游击地区的雇农、手工业者为组织对象，但人数少，活动也不积极。

四、青年救国抗日会

该会为八·一宣言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下发展的青年群众组织，主要利用青年的积极性，作为群众组织的骨干。另外编成青年抗日先锋队作为青年的武装组织.

五、文化界抗战建国救国会(简称文建会)

其前身是文化界抗日救国会，以在文化界工作的人员为会员，从事教育、宣传工作。


6—10支队
支队长
团 长
营 长
连 长
排 长
班 长
共产党中地区的建设
争取(群众)工作
抗战建国工作
筹资、物资征集工作
思想教育工作
(目的)
保持实力
地下组织
争取群众组织
(目标)
「会议制度」
「基本群众」
城中军区司令(吕正操)
军区政治部主任(孙志远)
支队政治部委员
分区政治主任
县长
财政部
县游击队
工作部
交通部
宣传部
指导部
全面领导抗日教育
宣传抗日
城市交通道路通信等
领导抗日组织动员参军
战后方协助征粮等
区长
村长
中心村 一般村
游击队
妇救会
青年救国会
工救会
农民救国会
抗联会
各阶层代会
农民合作社
工人俱乐会
协助军队
自卫和训练
监视敌伪
战后方协助征粮
人民武装自卫队
壮年队
青年救国队
妇女救国队
儿童团
老年会
农民合作社
农民会
工会
(群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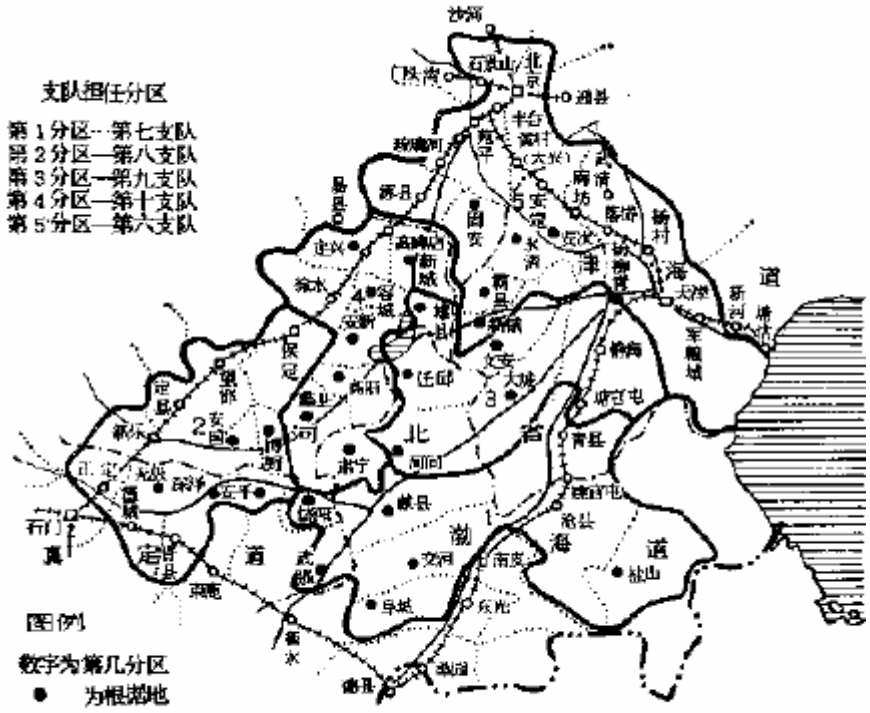


图 5· 冀中区分区区划及工作分担一览图

这些群众组织的共同特点是以中农、贫农为主，积极进行活动。中共在抗日统一战线的名义下，主张全民组织、全民抗战，但其真正的基础则是建立在中、贫农阶层。

中共地下工作的一例

中共的地下工作大致分为两方面，一是以加强党的领导力量为目的的内部监察，一是以扩大党的力量，削弱日方力量为目的的对敌斗争。对敌斗争方面的工作大体分为宣传教育工作、经济工作、政治工作、侦察及恐怖行动。对此无需一一叙述。单举从方面军情报资料中摘录的一例—打入山西省祁县(太原南约 60 公里)县公署内的中共地下组织工作概况，即可看出中共在亲日政权中地下活动之一斑。

祁县的赤化是从 1936 年西安事变后开始的。当时潜入该地的工作人员，专门致力于从内部破坏阎锡山的势力，尽量扶植牺盟会、学校、农村内的反阎力量，在“七七”事变爆发时开始积极活动。1938 年底，组成祁县县委以下的党组织，继而着手筹备青年、农民、工人、妇女、儿童等救国会以及日军地区工作委员会等。该县处于日军势力之下以后，第一任代县长王殿元(党员)即致力于赤化职员的工作。并同时负责向八路军、伪县政府(指抗日政权—译者)等供应物资。第二任县长史步鳌(支部书记—1940 年 10 月被检举)仍继承前任工作。1939 年 10 月以来，在城内秘密成立“日本军地区工作委员会”，县长兼任主任委员，县政府的秘书和各科长任委员，各科其他成员为工作员。他们从城内各商店数次征募现金、棉布、靴鞋等共值一万数千元的物资，由该委员会供给中共方面。另外通过各小组

向共军提供城内日军或警备队出动讨伐的情报。并向上级党组织定期报告县财政、教育、交通状况。1940 年 4 月以来每月对县公署职员进行一次军事训练，其秘密意图.实际上是要帮助叛乱的武装势力。

县警备队自成立以来，即有共产分子潜伏在内。1939 年 9 月由第一二 0 师政治工作员协助，在队内发展了三十名共产党员，并组成县警备队第五支部，利用日军及县警备队使用的密探，秘密成立了收集情报办事处，向共军提供有关县内外日军及县警备队的装备、兵力、计划、行动等情报。此外，并配合县公署支部宣传班在城内印刷厂印刷及散发抗日传单。为了掩护这一行动，他们拉拢日军及县警备队使用的密探。使之报告假情报等。

在县警察署内，由第一任县长介绍入党的民政股长专门负责对署员进行赤化。1939 年 4 月又以警察署长为书记，组成警察署支部，吸收优秀分子加入上述日军地区工作委员会。

为了在小学校内成立支部和进行抗日教育，史步鳌任用共产党员为第一新民小学校长。此后，该校长秘密与县长及一二 0 师政治工作员联系，在城内争取了四个小学校的校长和职员.成立了城内小学校第二支部，竭力对学生灌输共产和抗日思想。

在祁县车站，自 1939 年 4 月以来已有共产党员潜伏并逐步发展党员，1940 年 4 月组织了祁县车站第一支部，在附近进行宣传并将该车站有关各种运输状况、设施、日军、警备队、警备手段等情报，不论大小，全部报告共方。

在祁县有军管的棉布工厂，1939 年 4 月，由该厂工人救国会会员中的优秀分子组成工厂支部，以该厂电工长为书记，与一二九师交通队秘密联络，并多次给来袭的共军引路，幸被我军击退。

此外，在县公署以下六个支部中，分别设有秘密谍报网，收集和送出有关日军军情及新政权下的财政、教育、交通等的情报。作为外围团体的农救会、工救会、妇救会、青救会、儿童救国会等，分别负责筹办各种物资，策动拒绝为日军劳动，慰劳八路军等活动。特别是青救会，积极破坏和妨害日军方面的通信线路，督促为共军送交军需物资，宣传共产抗日思想。儿童救国会也在教员的指导下，主要从事传播抗日赤化思想及向各村送信等活动。

八路军的行动方针

1940 年 8 月，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在延安中共干部会议上作了以“坚持华北抗战和最近三年的总结”为题的报告。指出华北抗战、对决定此次战争的胜负具有重大意义。因而强调必须广泛地开展反汪、反投降、拥蒋及统一战线运动，坚持长期的，彻底的抗战。以下摘自“灭共资料”：

坚持华北抗战和最近三年的总结(摘要)

一，坚持华北抗战的条件及意义

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坚持了华北抗战，广泛地开展了华北游击战，这是由于有了如下的特殊条件:

在日军占领地区的空隙，建立抗日根据地。有华北人民强烈的民族意识，广大青年的反日运动，以及与上述条件相结合的八路军的作战行动……。坚持华北抗战对全国抗战具有重大意义。

战略上的意义一掩护西北，保卫最重要的国际交通线，牵制日军半数以上的兵力，巩固了华中、华南战线。

政治上的意义—认识到日军征服华北是不可能的，因而增强了全国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心。

经济上的意义—削弱日军力量，促使其在持久战中必然崩溃。

二、华北抗战中所采取的行动方针

(一)坚决执行三民主义、抗战建国纲领及蒋委员长的指示;

(二)在敌人后方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

(三)改善人民生活，调整阶级关系;

(四)武装人民，广泛开展游击战;

(五)以游击战为基本战略，在有利条件下进行运动战。

三、日军统治华北的办法

日军在以军事进攻为主的时期，企图以烧杀和恐吓占领全华北，已遭失败。

从军事进攻转向以政治进攻为主的时期，其基本方针为“治安肃正”，实行长期战的措施。即以八路军、共产党为主要对象，特别是以对山区的肃止讨伐和治安工作为重点。最近在加强以华制华阴谋的同时，破坏我国的资源财富，对抗日根钻地疯狂地实行经济封锁。

四、总结最近三年的收获

(一)动员了全国人民参加抗战;

(二)歼灭十万日军，八路军扩大到二十万人的正规部队，培养了十万游击队干部;

(三)建立了以群众运动为基础的广大抗日根据地;

(四)给了人民抗日民主权利和自由;

(五)实行了减租减息，改善了人民生活，提高了抗战积极性;

(六)采取了广泛开展生产运动、开垦荒地、发展手工业、振兴生产消费合作社等措施，对日本的经济封锁果断地进行了斗争;

(七)实行了抗战文化教育政策，揭露和粉碎了敌寇、汉奸、汪派、托派的无耻宣传;

(八)以上收获，是由于下列因素取得的:八路军和群众的鱼水关系(军民一致)，军内保待坚强的政治团结(官兵一致)，依靠中共一贯正确的领导和八路军的英勇奋斗，并采取了卓越的战略战术。

五、今后的行动方针

抗战三年的成绩证明，党中央的统一战线战略是完全正确的，在这一路线下所采取的各项措施也是正确的。今后即应遵照此一正确的方针、政策，坚决贯彻执行统一战线，团结，国共合作，三民主义，并适应华北的形势，贯彻既定的战略方针和各项措施，坚持抗战到底。

由于汪精卫傀儡政府的成立，日本侵略势力和汉奸的新的政治攻势更加猖狂，“以华制华”的阴谋更加毒辣，对此，我应做好下列工作:

(一)广泛开展反汪、反投降、拥蒋及坚持抗战运动，清除华北抗日阵营内暗藏的汪派汉奸，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

(二)广泛开展宪政运动，实行民主政治，为了抗战和人民的利益，加强和扩大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工作，努力造成全国的生动的典范。

(三)华北抗战对决定中日战争胜负有着重大意义。因此，我们有华北三年抗战的基础、全国的抗战组织、尤其是我党中央的坚强、正确的领导，则不论日军如何反复扫荡，如何施展政治阴谋，只要我全体人民同心协力坚持华北抗战，经过长期的扫荡和反扫荡的激烈斗争，最后以反扫荡的姿态参加全国反攻，相信定能将日军一举赶到鸭绿江边。

五 对“百团大战”的作战

（晋中作战、晋察冀边区肃正作战）

共军乘其势力的显著增强，突然发动的“百团大战”，给了华北方面军以极大打击。因而促使方面军，特别是情报工作负责人作了深刻的反省。从此以后，对共情报机构进行了空前的改革和加强，并使治安肃正工作得到彻底改善。

“华北方面军作战记录”有如下记载:

“盘踞华北一带的共军。按照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部署的所谓‘百团大战’，于1940年8月20日夜，一齐向我交通线及生产地区(主要为矿山)进行奇袭。特别是在山西其势更猛，在袭击石太路及同蒲路北段警备队的同时，并炸毁和破坏铁路、桥梁及通信设施，使井陉煤矿等的设备，遭到彻底破坏。此次袭击，完全出乎我军意料之外，损失甚大，需要长时期和巨款方能恢复。

“我军受此袭击之后，为了不再发生同样过失和保持军的威信，乃企图进行晋中作战以使共军彻底溃灭。”

以上记载了共军采取与过去游击战完全不同的战术，乘日军不备，突然以大部队的运动战进行攻击情况。这是初期情况，以后共军再次发动攻势，日军对其反击，一直继续到12月上旬。

此次作战可分为共军方面的第一次攻势(8月20日夜—9月上旬)和第二次攻势(9月22日—10月上旬)；日军方面的第一次反击(9月1日—9月18日的第一期晋中作战)和第二次反击(9月23日—10月11日的察南南部边界反击作战，10月11日—12月4日的第二期晋中作战及10月13日—11月26日的晋察冀边区肃正作战)。

由于共军大规模的奇袭攻击，导致华北方面军更大规模的反击战，进而发展到消灭共军根据地的作战。下面就作战经过概要及其影响加以叙述。

共军攻势开始前的一般情况

一、敌情及治安恢复情况

1940年7月底，华北方面军管界内的敌情及治安恢复情况，如附图。(此图略)

二、日军的警备部署

当时华北方面军的部署，按一一0师团的平均驻兵密度计算，大致在42,078平方公里约驻一个师团，568平方公里约驻步兵一个中队。

三、共军攻势的征兆

在此次攻势前，日方虽也曾得到一些情报，表明共军有进行事先侦察、移动和集结兵力、积聚物资等活动，以及居民逃避等情况，但并未看做发动攻势的前兆而引起重视。日方从未想到中共势力竟能扩大到如此程度之，日方对中共真实情况的调查研究及其统一指挥大部队作战的能力的情报，收集得很不充分。同时，中共一向对其行动意图巧妙而严格地加以保密，因而完全出乎日军的意料，取得了奇袭的成功。

据有关人员回忆，当时从司令部到第一线警备队一致认为：“事后回想，确有先兆，假如联系各种情况加以分析，共军的攻势或有可能判断出来，但当时

考虑得太轻率了。”

例如:华北方面军参谋长向陆军次官的报告(10 月 13 日)中“袭击前的一般征兆”一段，曾有如下叙述:

一、共军向地盘以外移动

共军移动和集结其兵力，扬言是要与中央军一战，巧妙地转移、引诱、欺骗日军的注意力，从而大规模地集结其兵力。

二、敌方谍报工作情况

敌在此次袭击约一个月前，即令很多密探进行侦察。为此，敌采取了向村民摊派情报任务、强制或绑架爱护村居民使之提供情报等手段。

注:独立混成第四旅团司令部所在地的阳泉，在盂兰盆会期间，发现很多平日未曾见过的健壮男子前来游逛，市场上卖东西的人有半数改换了新人。事后查明从 8 月前后经常出入阳泉车站的一个男子，据说是共军某部的参谋长。

三、居民避难

对敌人的袭击，居民最为敏感，必须特别注意他们的动向。即此次来袭之前，井陉煤矿附近及其它地方的居民也有预先警觉而逃避的。

四、积聚物资及其他征兆

袭击前，采取向各村强征面粉，或征用民夫、搬运工具等方法，积聚粮食等物资。

五、在石门地区发生丢失修理铁路的工具，以及铁路仓库起因不明的火灾等情况。

共军第一次攻势与日军的防御战斗

关于共军奇袭时的情况，“华北方面作战记录”叙述如下:

石太路方面:

奇袭石太路沿线的敌军为第一二九师约 6,000 人及晋察冀边区第二、第十九团及抗日军政大学学生队等。8 月 20 日夜，娘子关、程家脖底、岩会、乱流、辛兴镇、芦家庄等地我各警备队，突遭敌奇袭。公路、铁路被破坏，因而各部队无法得到增援，孤军作战，终于将敌击退。

独立混成第八旅团负责警备地区内的井陉煤矿，8 月 20 日夜，遭到敌人内外夹攻的袭击，设备彻底被破坏。

同蒲路北部方面:

从 8 月 20 日半夜遭敌奇袭,同蒲沿线及其以西地区的我警备队虽将敌击退，但铁路受到极大损坏。独立混成第九旅团前往扫荡了太原及忻县以西地区之敌，独立混成第三旅团扫荡了原平镇以西地区之敌，29 日分别返回原驻地。

同蒲路南部方面:

敌军对介休、霍县附近铁路沿线各地进行袭击，但均被我第四十一师团的各警备队击退。

东潞路方面:

经过 8 月 20 日及 21 日两天，决死第三纵队约 1,500 人一齐来袭，被我第三十六师团各警备队击退。

京汉路方面:

来袭之敌为晋察冀边区冀南军区的一部及一二九师之一部等约 8,000 至

10,000人。23日第一一0师团在负责警备地区讨伐了高邑一带之敌约1,000人，25日讨伐了柏乡南面之敌约2,000人，及狐狸村残敌约1,000人，独立混成第一旅团讨伐了正在磁州以南蠢动中之新编第一旅。

以下详述石太路、同蒲线北部及京汉路方面各兵团之情况。

据中共方面资料，共军将攻击重点指向石太路沿线地区，由其最精锐部队担任。即以聂荣臻部队的十五个团向平定、石门一线，刘伯承部队的十五个团及炮兵团向平定、榆次一线进行攻击。

独立混成第四旅团的情况:在共军攻击时，独立混成第四旅团(旅团长:片山省太郎中将)部署于石太路沿线。各警备队，除一部分外，均突然遭到共军的奇袭，因不能相互支援，只得各自进行防御战斗。据有关人员的回忆和笔记，当时情况大致如下:

一、阳泉的旅团司令部及独立步兵第十五大队队部的情况:

旅团参谋土田兵吾中佐，于20日24时稍前，接到娘子关警备队长池田龟市中尉第一个打来的电话，大意说:“虽遭共军攻击，但无论如何也要独自将其击退，请放心。”接着从寿阳警备队也有同样的报告。土田参谋立即前往片山旅团长宿舍报告以上情况后，急速赶到旅团司令部(司令部距宿舍约700米)，当时阳泉市内已有一部共军潜入，参谋已有可能遭到射击，情况十分紧迫。参谋到达司令部后，首先就警备问题对驻在阳泉的直辖部队作了指示，同时。大致弄清了各地情况，但有线通信业已中断，以后只有靠无线电进行联络。

阳泉警备队队部(队长:独立步兵第十五大队长德江光中佐)在20日傍晚接到密探的报告，大意说:“在阳泉以南约80公里的地点驻有兵力约2,000人的共军”。当时判断:这股共军即使万一来袭，徒步行军也需要两天时间，因此，当日并未采取紧急措施。另外，据说在20日白天，阳泉街上(人口约2,000)的情况也与平日不同，许多居民往来闲逛，但也未引起有关警备人员的注意。偏偏就在这天夜里，接到的第一个报告，却不是来自友军，而是敌人袭击的枪声，

旅团司令部位于街的西北侧，警备队队部位于街东的阳泉车站南侧。可以听到距队部东北约一公里处的桥梁附近的激烈枪声。南面约300米处有一座庙的高地(全街的制高点)很快被共军占领。共军从高地一面用步枪射击，一面不断发出喊声。

二、娘子关警备队的情况:

娘子关警备队(队长:池田龟市中尉)方面，8月18日接到密探的报告，大意说:“共军数千人的大部队有向程家胧底一带南下的意图”。随后又接到由自卫团送来“很多共军侵入了坡底村(娘子关西约3公里)”的报告。警备队主力立即出动，当日半夜，在坡底村以南地区以快速袭击将共军击退。另外，东塔崖警备队伏击共军，使之向北退却。

20日将近半夜，另一部共军袭击了磨河滩村(紧靠娘子关西面的村子)以西的各警备队据点。

关于20日半夜至21日的战况，“娘子关警备队战斗要报”有如下记载:

20日夜，中队长带领二十人乘摩托车从地都村(河北省边境的村庄)附近出动，回到娘子关站令战士下车，宣布注意事项后，刚要下令解散时，突然遭到

从西面 300 米铁路上捷克式枪的猛烈射击。当弄清为敌人的急袭后，中队长以下 20 人立即向敌人攻击，时间是午夜 24 时。正在此时，恰巧一列车载有退伍回国的部队(车内约 800 人)到达娘子关车站。

笔者注:回国部队第一批 800 人，第二批 400 人。第一批到娘子关，第二批到阳泉。第一批由指挥官包括三谷炮兵大尉在内四名军官率领，兵员系由炮兵、辎重兵、卫生兵等混合组成，一开始几乎都是赤手空拳，后来有效地使用少数武器参加了警备故斗，直接或间接给敌以显著威胁。

敌逐渐向坡底村方向退却，中队阻之于城西村南面旧关街道，正严密警戒中。

21 日 3 时，敌约 200 余人企图渡河南进，中队彻夜战斗将敌击退。

21 日白天，估计敌不会南下。即回中队用早饭，正在以啤酒接待回国部队时，遭到来自北边高地敌人的射击。敌逐渐增加兵力占领了河北村北面、坡底村东北面、城西村北面各高地一带阵地后，一齐开始射击。这样被敌包围，中队以少数兵力，力图阻止敌人进入，决定首先守住兵营附近。

回国部队因井陉方面情况紧张不能出发，而在娘子关待命。

回国部队从车站到兵营往返取饭途中，就有三人受了重伤。午夜 24 时起天气变坏并降雨，兵营一带彻夜严加警戒。

三、寿阳警备队的情况:

20 日 23 时前后,有电话向警备队长原田寅良中佐(独立步兵第十四大队长)报告说，“马所及芦家庄一带有很多敌人在集结中”。但随后由于与寿阳以南各警备据点的通信完全中断，因而情况不明。从北面来的第一个报告，是无线电报告，大意说:“遭到优势的共军包围攻击，正苦战中。”以上情况虽用电话向阳泉的旅团司令部作了报告，但以后电话中断。

(注:与旅团之间的无线联络始终未断。)

警备队长勉励各警备队坚守阵地，同时，重视北面(孟县)地区的战况，当即向孟县派出增援部队(抽出传令兵及其他兵员 30 人编成混成小队，带有步兵炮一门)。

自 20 日夜至 21 日晨，各方面均已展开激战，但 21 日入夜即告平静。寿阳南面上湖、马所的据点，在第一夜中均已被共军攻破并占领。寿阳我实力薄弱，仅有警备队长以下约一个小队的兵力。但在由五名宪兵领导的中国县警有力协助下，使重要设施及县城得以坚守到底。

自 8 月 22 日至月底，旅团内各地区的情况如下:

一、阳泉一带的情况

20 夜，据判断直接攻击阳泉的共军兵力，至少有 2,000 人，但日本方面的警备兵力包括中国警备部队在内仅有约 700 人。即，日军:旅团司令部约 30 人，独立步兵第十五大队队部约 50 人，山炮兵大队约 400 人，辎重兵中队约 100 人，连同工兵及其他，总计约 680 人。

中国警备部队:县警察队、保安队，警备队能使用的合计为 40—50 人。

20 日夜，占领庙高地的共军，从高地上用日本话一面高喊:“投降吧!不投降就全部消灭!”一面进行攻击。对此，日军方面虽采取了局部反攻，但只有付出伤亡并未成功。在阳泉的日侨(约 500 人)中，已经认定绝望，甚至出现了穿

起好衣服准备就难的景象。

开始旅团司令部对各方面的战况完全不明，经过两三天时间才逐渐弄清。认为从全面战况看来，阳泉以北地区战斗激烈，以东地区尚无问题。此外，从缴获的地图可以看出，石太路上的各警备队，均遭到五至十倍于我的共军攻击。阳泉西面的无名桥梁、辛兴镇、坡头、测石、落磨寺镇各据点，均受到毁灭性的损失，直到 24 日前，终为共军所占领。

24 日,由太原用空军飞机直接联络，我飞机对阳泉庙高地果敢地进行了俯冲轰炸。25 日，开来了由独立步兵第十一、第十二大队各抽一个中队的增援部队。26 日以后，阳泉警备队逐次开始反击，29 日将坡头、测石一带的共军向南击退。30 日扫荡了东北一带地区。

二、娘子关一带情况

娘子关警备队，自 22 日晨遭到共军迫击炮的猛烈轰击。11 时前后，共军的军使手举白旗来到娘子关送劝降书，池田队长愤然予以拒绝，并答复说:“共军须立即后退，如仍在原地不动，我方即开始攻击。”遂令军使返回。

当日夜，警备队渡过桃河，奇袭正在磨河滩村集结的共军约 500 人，予以毁灭性打击。在此战斗中，因有回国部队(三谷大尉指挥的步兵约 150 人)及碰巧来娘子关的酒井装甲列车队的协助，取得了大的战果。

在东面的苇泽关方面，23 日判明有共军约六、七百人进占地都村附近铁路及其南北高地。警备队于 24 日对苇泽关北面高地及地都村以北的共军进行攻击，并将其向北方击退。25 日，在地都村北面与西进的井陉部队取得了联系。

26 日警备队向西方出击，将包围各据点的共军击退，恢复了与程家胧底、下盘石的联系。27 日，由独立混成第八旅团派遣的增援部队(步兵约一个大队)抵达娘子关露营。警备队在严密戒备的同时，并掩护铁路及铁路用电线的修复工作。

三、寿阳、孟县方面的情况

独立步兵第十四大队的警备地区方面，在从北面的上社镇一带撤出战斗中，因是山岳地带，步兵炮队等虽付出较大伤亡(战死 44 人)，但主力则沿制高地点南下撤退至孟县。

此外，寿阳、芦家庄东北面的据点，只有孟县和太安坚守到最后，其它据点则均被共军占领。大队长以手下的兵力(约一个半小队、步兵炮一门)，于 25、26 日向张净镇、马所进行反击。此时虽有空军协助，但共军巧妙利用地形，轰炸效果不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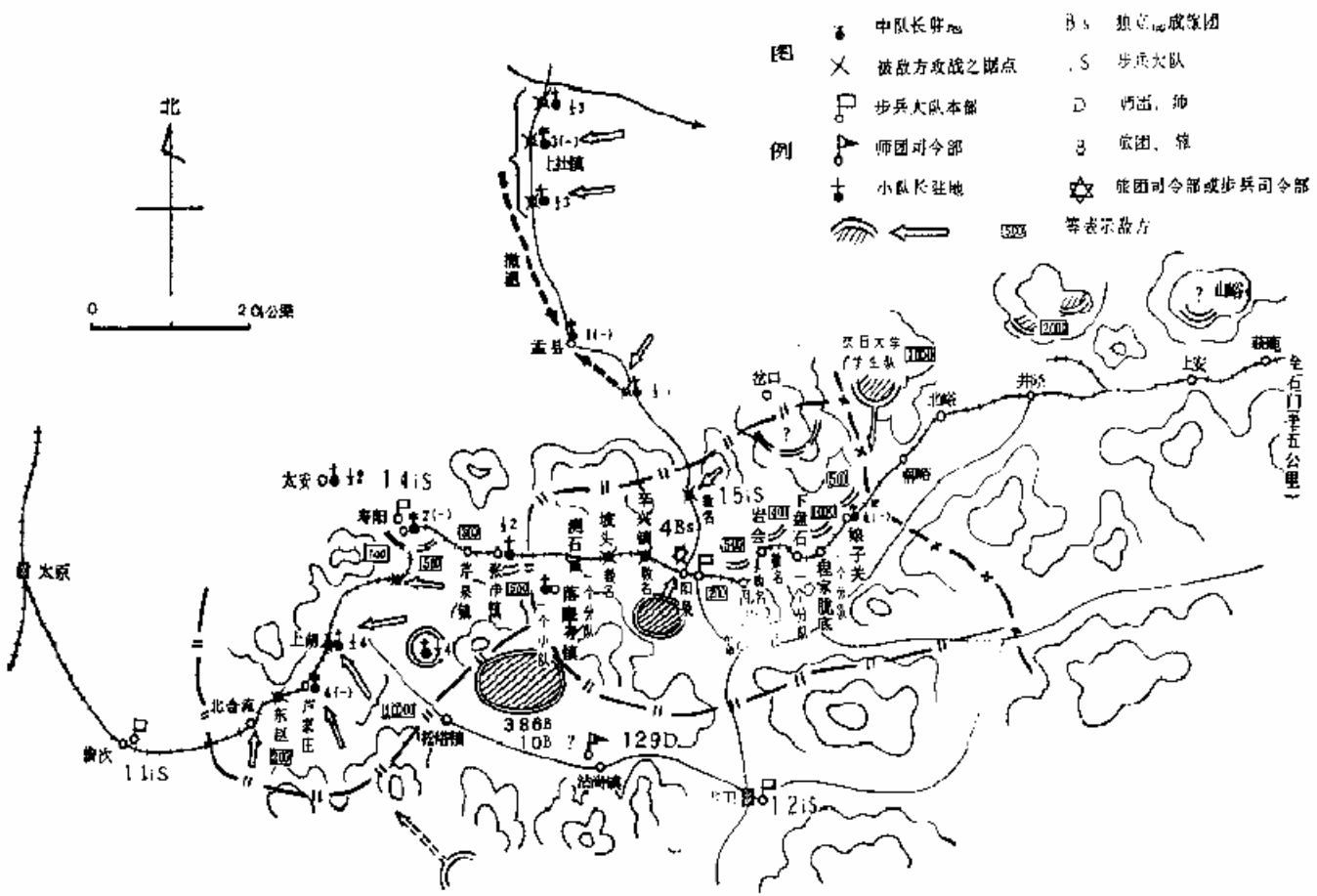


图 6，百团大战石太线沿线地区之战况概要

（1940年 8 月22日—23日）

第一军司令部的紧急措施。第一军司令部(军司令官:篠塚义男中将，参谋长:田中隆吉少将)，21日晨从旁系电话中收到第一次报告说:“石大路到处正遭八路军袭击……”但以后再无更详细报告，有线、无线完全不通，立即陷入情况不明状况。

当日午后，由朝枝繁春参谋同乘飞机进行空中侦察，方弄清石太路沿线全面情况。军司令部乃召开紧急幕僚会议，当即采取增援措施，并派遣了军的参谋泉莱三郎中佐、朝枝繁村大尉二人前往阳泉独立混成第四旅团司令部进行联络。

朝枝参谋对当时情况叙述如下:

军直属部队中当时手下因无可用之兵力，乃由军司令部临时抽出包括卫兵在内的共约40人，组成混成小队，当即指挥该小队开往阳泉。先乘火车至榆次，然后徒步突破敌阵，三日后至寿阳，经一周时间始达阳泉。

石太路沿线各小据点(以分队为主)大半已被消灭。可以望见沿线制高点上之共军了望峭。多处枕木被烧毁，铁轨被拆除，铁路桥梁大部遭到破坏或损伤。沿途村庄，居民或逃走或被八路军带走，房屋皆空。至阳泉旅团司令部时，全面战况业经脱险，已可安心。但是，此等局面的出现，认为是由于许多运送退伍士兵回国的列车偶然停留于娘子关、阳泉之间，使敌人判断错误，因而停止其攻势。

以后我等于援助首次反击作战后。于9月初乘飞机返回太原。

独立混成第八旅团的情况:关于独立混成第八旅团(旅团长:水原义重少将)司令部在战斗初期采取的措施，该旅团参谋泉可畏翁中佐回忆如下:

旅团为加强铁路警备，严格实施铁路爱护村的分工负责制、赏罚规则等，结果，自1940年初以来，创七个月无事故的纪录。

然而，8月20日半夜，据报告:正定至石门之间的小铁桥首先遭到袭击，造成一定损失。继而石太路的获鹿、微水镇之间的铁路被炸毁、石门以西的电话线不通。21日拂晓，井陉地区又遭到优势共军攻击。据此，旅团司令部已知事态极为严重。

以上情况陆续向旅团及第一一0师团长饭沼守中将报告，同时，从所属各大队中抽出兵力编成临时支队(独立步兵第三十三大队长指挥的步兵约四个中队为基干)后，命令立即快速向微水镇前进。旅团司令部率领直属部队(步兵约十个中队为基干)乘装甲列车快速向井陉前进。

注:据一一0师团长饭沼守中将记录:师团长20日夜接到独立混成第八旅团的电话报告，得知石门附近情况，但以后电话不通，情况不明。21日傍晚，得悉石太路全线遭敌袭击。师团长于23日派轻装甲车队及步兵一个大队前往井陉地区增援，同时，派出后方主任参谋调查现地损失情况。

旅团判断，在所负责警备地区内，共军的攻势以袭击井陉三煤矿及石太路的要地(井陉以西险峻山地的铁路桥和隧道)为重点。另外，并破坏获鹿、微水镇的铁路、公路，企图阻止来自石门的增援部队。各地战况如下:

一、井陉新矿的情况

新矿位于总矿的北面约1.5公里，当时约有一个分队负责警备，遭到约1,000名优势共军的围攻，在寡不敌众情况下，全矿被敌占领。各处重要设施被焚，损失极大。(注:共军利用矿井通敌分子，切断铁丝网电流，即由该处侵入。)

二、井陉总矿的情况

总矿与新矿同时受到优势共军的急袭，经警备中队长以下全员奋战，坚守所负责的地

区。然而，虽明知新矿情势危急，却无法采取救援措施。(注:主力部队正向深县方面出动，煤矿警备力量减少一半)。

三、阳井煤矿的情况

阳井煤矿在总矿的西南约二公里，当时有一个步兵小队负责警备，遭到优势共军袭击，激战至21日晨，该矿得以确保。

四、井陉以西铁路警备情况

在井陉以西地区，井陉西面北峪警备队(步兵一个小队)于20日半夜遭敌袭击，经各守备哨所顽强抵抗，守住各负责地区。然而部分铁路桥及其它设施被破坏。另外，该警备队情况曾一度陷于危险中。

五、增援部队的行动

旅团增援部队于21日午后由石门出发，急行军奔向井陉。但是，途中铁路及公路被破坏，因修路及排除地雷，致使前进迟缓，22日午前始达井陉，与独立步兵第三十四大队长取得联络。为应付当地战况，由增援部队的主力负责扫荡新矿以北地区，及各煤矿的警备任务。另外，由于西部地区(井陉车站以西省境之间地区)警备小队的情况完全不明，在增援一个步兵中队的同时，首先派出得力的侦察军官去娘子关联络。(注:各自于23日取得了联络)。

旅团长痛感有必要对西部地区进行扫荡，亲自统一指挥两个步兵中队和工兵中队，自24日早扫荡西部山地，同时由工兵中队紧急修复铁路桥梁和隧道。

独立混成第九旅团的情况:独立混成第九旅团负责警备太原附近及北部同蒲线南段地区。同蒲路北部沿线及其以西地区的警备队，从20日半夜，虽击退前来急袭的八路军第一二0师的主力，但铁路遭到严重破坏。

注:独立步兵第三十九大队，担任沿忻县—静乐道路地区的警备，自20日半夜遭到优势共军的攻击而连续激战。但因是山地，据点相互呼应和增援极为困难，静乐地区的一部分暂时被共军占领。北部同蒲线方面的情况想来大致与各地情况相似。

旅团自22日至28日，以主力进行了反击，扫荡了所负责的地区。

第一一0师团的情况:袭击京汉线方面的共军，是晋察冀边区军的一部及第一二九师的一部共约八千至一万人，在第一一0师团负责地区的保定、石门、顺德(今邢台，下同—译者)各地区的铁路，遭到若干破坏。师团在23日扫荡了高邑附近，25日扫荡了柏乡以南(均在石门、顺德之间)。另外，独立混成第一旅团扫荡了正在磁州南面地区活动中的共军。

共军第一次攻势中日本方面所受的损失

一、人员的伤亡

在独立混成第四旅团管内，暂时被共军占领的据点，在石太沿线的小据点约20个，阳泉—孟县—上社镇公路的据点若干个。到8月底战死者60名及多于该数数倍的负伤者。其他如华北交通系统的铁路员工、中国方面的县警备队员等也有不少死伤和失踪者。

在独立混成第八旅团管内，伤亡最大的是井陉煤矿的中国矿警，日系职员(主要是技师)，有的失踪(被拉走)。

独立混成第三、第九、第十六旅团管内同蒲线以西地区的警备队也大半遭

到袭击，若干小据点被孤立，遭到全歼的损失。

二、铁路破坏情况

共军的第一次攻势，以破坏交通和通信线路为目标，并且为了取得心理上的效果，因而造成损害极大。10 月 15 日，华北方面军向陆军省提出的“遭受损害的恢复情况”的报告中，有如下的叙述:

遭受损害的中心为石太路，京汉路及同蒲路北部虽也有一些地区受害，但运行尚无障碍。京汉路自 8 月 25 日，大致已按行车时间表开始白天运行。同蒲路也于 9 月 8 日全线通车，并最大限度地增强其运输能力，以弥补石太路的不足。石太路于 9 月 20 日紧急抢修完毕。

石太路破坏极为严重，规模之大无法形容，敌人采用爆炸、焚烧、破坏等方法，企图对桥梁、轨道、通信网、火车站设施等重要技术性设备，予以彻底摧毁。在进行破坏时，隐密伪装得极为巧妙。

破坏的详细情况:

1.各处破坏铁路。自 8 月 20 日半夜，与袭击同时进行，阳泉、寿阳之间直至 9 月 4 日仍不断遭到共军袭击，使抢修工作受到妨害。

2.破坏最严重的是芦家庄西 185 公里处及 61 公里处的两座桥。前者被炸坠落，后者虽未坠落，但修复也有同样困难。

3.对铁轨的破坏，于各地袭击的同时，进行长距离的破坏。主要是将枕木与铁轨集中一起予以烧毁，大部铁轨已不能再用，一部分铁轨则由很多村民运往内地。

4.对车站设施，则焚毁其房屋，破坏水塔及水泵。

5.通信方面的破坏，是将电杆从根部据断，切断电线，砸碎磁瓶，并将铁路电杆烧弯。

6.从爆炸结果看，估计事前对其干部进行过相当训练。另外敌人使用的炸药总量约有 5,460 吨。

三、井陉煤矿破坏情况

据独立混成第八旅团泉可畏翁参谋的回忆如下:

井陉煤是炼钢用煤，当时为供应满洲鞍山制铁所的重要原料。井陉三矿井中最重要的新矿井损害最大，至少半年以上不能出煤。总矿及阳井矿虽遭优势之敌的攻击，但均被击退损坏不大。此次事件后，由九州紧急派来权威的矿山技术专家，经现场视察后，其看法大致如下:

新井的各项设施是被放火烧坏的。因此，起重机及选煤机等各种机器，是因被火烧过热而损坏。如火灾后突然冷却(救火时放水或下雨等)机器即变脆弱不能使用，幸而未遇骤冷，修理后尚可使用。

当时正值机械缺乏之际，仅受以上程度的损坏，实属侥幸。

第一期晋中作战(第一次反击作战)

(1940 年 8 月 30 日一 9 月 18 日)

遭受共军奇袭的第一军，随着对情况的判明，当即采取对共军分区，分期各个击破的办法，进行反击作战。首先命令独立混成第四、第九旅团在石太线以南地区搜索消灭第一二九师。

“华北方面作战记录”中的部队行动概要有如下记载。

参加兵力:

独立混成第四旅团的步兵四个大队(配属以第三十六师团一个步兵大队为基干的支队)

独立混成第九旅团的步兵三个大队(配属以第三十六、第四十师团各一个步兵大队为基干的两个支队)

作战经过概要:

独立混成第九旅团 8 月 30 日自太谷、榆次之间地区，独立混成第四旅团 9 月 1 日自平定、和顺、辽县、榆社一带互相策应前进，击溃沿途各地之敌，进入松塔镇(寿阳南约 25 公里)及马坊镇(松塔镇南约 20 公里)，对敌进行了扫荡并破坏其后方设施。9 月 4 日开始返回，至 7 日分别回到原地。

以后敌人仍以强力部队分散活动于各地，方面军命令与之继续作战，部队自 9 月 9 日起重新开始作战，予敌以彻底扫荡，取得相当成果后，于 9 月 18 日结束。

关于这次作战情况，独立混成第四旅团长片山中将回忆如下:

八路军的工作已深入到居民当中，村民正如“空室清野”的标语那样，几乎逃避一空不见踪影，并且好象曾经积极协助八路军。因而在作战期间，日军的动向被详细地泄露给八路军，但在日本方面则对八路军的情报完全不明。八路军的行动变化无常，在一地仅住数日即行转移。在险峻的山岳地带，其游击行动非常灵便。与此相反，日军的行动由于用马驮运行李辎重，部队及个人的装备过重，比起轻如猿猴的八路军来显得十分笨拙。因此，任凭如何拚命追击也难以取得大的成果。

朝枝第一军参谋有如下回忆:

八路军的抗战士气甚为旺盛，共产地区的居民，一齐动手支援八路军，连妇女、儿童也用竹篓帮助运送手榴弹。我方有的部队，往往冷不防被手执大刀的敌人包围袭击而陷入苦战。

共军的第二次攻势

(1940 年 9 月 22 日—10 月 2 日)

暂时分散退避的共军，企图再次发动攻势，以相当大的兵力，从 9 月 22 日晨向同蒲线北部宁武附近，22 日夜向察南的蔚县、涞源方面，24 日向晋东南的辽县、榆社一带局部地区进行袭击。

察南南部方面(独立混成第二旅团负责地区)

9 月 22 日夜，优势的共军袭击了察南南部的涿鹿、蔚县、涞源(独立混成第二旅团负责地区)一带的各警备队。当时我方虽受到相当损失，但驻蒙军很快转向反击，至 9 月底横扫了这些敌人。(详情后述)

同蒲线北部方面(独立混成第三旅团负责地区)

独立混成第三旅团自 9 月中旬以来，虽扫荡了活动于宁武以南地区的共军(第一二 0 师之一部)，但以第一二 0 师主力为基干的共军在宁武周围逐渐集结

兵力，于 22 日晨乘虚袭击日军。对此，独立混成第三旅团自 23 日开始反击作战，26 一 27 日从宁武、忻县方面进击，扫荡了原平镇以西地区的共军。

榆社、辽县方面(独立混成第四旅团负责地区)

从 9 月 24 日晨，榆社、辽县之间的各警备队(独立步兵第十三大队)及东潞路的小滩镇警备队，同时遭到共军急袭。这是第一二九师第三八六、第三八五旅所属的共军精锐部队，其兵力约 8,000 人。榆社一辽县道路上的榆社、常家会、王景村、铺上、管头等地的警备队，虽尽力进行防御战斗，但终因寡不敌众，大半遭到全歼(战死约八十人)。

针对以上情况，独立混成第四旅团，令独立步兵第十一、第十二大队的各主力快速奔赴前线，对榆社一辽县间的共军进行反击，至 10 月 2 日前后，扫荡告一段落。

第二期晋中作战

(1940 年 10 月 11 日—12 月 3 日)

如前所述，以第一二九师为主体的共军，经过再次采取攻势后，将主力盘踞于从武乡以东到黎城以北的山岳地带，另一部盘踞于沁源一带，对辽县一榆社一武乡道路及东潞铁路进行顽强袭击。

第一军企图趁此时机消灭该部共军主力，毁灭其根据地，以绝后患，因而进行了第二期晋中作战。其作战经过概况，“华北方面军作战记录”中有如下记载:

10 月 11 日，以独立混成第四旅团从辽县一带，以第三十六师团的一部从潞城一带，南北呼应搜索辽县、涉县、潞城、武乡地区之敌，进行扫荡，破坏其根据地，于 11 月 14 日结束了第二期第一次作战。

接着自 11 月 19 日，对沁县一带之敌开始第二期第二次作战。第三十七师团由沁县、虒亭镇(沁县南约 40 公里)、南关镇(沁县、平遥间)，独立混成第十六旅团由平遥、介休、霍县一带，第四十一师团的步兵一个大队由洪洞以东地区分别向沁源及郭道镇(沁源以北约 20 公里)压缩进击，但并未遭遇大股敌人，将沁河一带的共军根据地予以破坏后，各部队遂即回转，到 12 月 3 日作战完了。

由于此次作战，共军蒙受相当打击，以后遂专搞游击战，再未进行大的反击。

注:在此次作战中，虽未查明彼我全面的损失，但在第一军方面损失最大的是独立混成第四旅团，(根据旅团第二期晋中作战详报)战死 71 名、负伤 66 名、失踪 2 名。共军遗弃尸体 1,204 具，俘虏 240 名。另据旅团战死名簿记载，从 8 月 20 日至 12 月 3 日在旅团战死的 276 名中，8 月 60 名、9 月 142 名、10 月 62 名、111 月 8 名、12 月 4 名。在共军攻势时期，损失虽很大，但并不象中共方面所宣传的那样。

晋察冀边区方面的肃正作战

察南南境反击作战(1940 年 9 月 23 日—10 月 12 日)

一、独立混成第二旅团方面的战斗

盘踞在磐山堡(涿鹿东南约 30 公里)以西至涞源西面察南南境一带的共军，自 9 月 22 日夜开始一齐向我进攻，切断通信电线、破坏道路，不仅攻击最前线的各警备队，并且攻击了蔚县方面后方地区的据点。

当时驻蒙军为防备五原的傅作义军来攻，自 9 月 12 日，将主力集结于包头、安北、固阳地区。但判断傅军并无进攻模样，遂于 20 日命令各部队返回原驻地。独立混成第二旅团以两个步兵大队及炮兵队的主力参加了上项作战。正当该部尚在归途之中，共军乘虚向我进攻。且因汽车中队未至，兵力不能自如运用，加以通信电线切断，情况不明，各警备队只得单独作战。

24 日，旅团长人见与一中将在蔚县设战斗指挥所。据 25 日得到的情报，在涞源县警备队独立步兵第四大队方面，若干守备队有全部被歼之势。蔚县地区方面(由独立步兵第三大队负责)，大队主力由包头归来，当即驰援永宿、草沟堡(均在蔚县东南地区)濒于危殆的守备队。在磐山堡方面也正在击退共军的顽强攻击。

于是，旅团长作了以主力救援涞源县方面的部署，但一路上到处埋有地雷，设有障碍，道路均被破坏，部队前进缓慢。

另一方面，军方对此情况也逐渐重视起来。25 日以后，才以设法由第二十六师团抽出兵力以加强旅团，但共军在攻击察南方面同时，对第二十六师团管内的同蒲路北部地区也进行了攻击，因而欲抽出救援的兵力确非易事。

在涞源方面，28 日晨，救援部队勉强到达县城附近。共军解除了包围向南退去。29 日，应援各队进抵军的管界长城一线，随后即扫荡残敌、恢复治安、以及进行下期作战的准备工作。

关于此次作战中彼我的损失，根据军的统计:敌遗弃尸体 1,199 具，运走尸体 727 具，俘虏 6 人;我战死 133 人、生死不明 31 人。

二、插箭岭守备队的战斗

警备涞源县的独立步兵第四大队，广泛分散部署于交通不便的山中。

9 月 23 日夜，各据点同时遭受共军急袭，各自孤军奋战。东圈堡(当时也称东团堡)及三甲村的守备队虽奋勇战斗，但终为玉碎。(注:共军最后从两阵地撤退时，在墙上写下“该阵地日军守备队打的勇教”等字样而去。另外，在以后的共军战斗详报中，对此情况也有详细记述。)

插箭岭曾由第二中队(中队长:税所三郎大尉)守备。人见旅团长赞扬该中队:

...共军为了夺回其根据地涞源地区，经过秘密策划，由独立第一师师长杨成武亲自率领其主力包围涞源县城，另外派遣约两千数百名兵力一举消灭插箭岭警备队，以支援涞源平原作战，并尽快解除对其主力侧背的威胁。

中队长努力侦查敌情，在识破敌人的计划后，立即做了紧急警备部署，令各岗楼严守阵地，以防敌人来袭，同时伺机予以反击，并制订了消灭敌人的措施。

22 日刚刚入夜，敌即以优势兵力将我完全包围，利用黑夜向我逼近，对阵地各部队反复顽强仲锋。中队最后与 20 余倍之敌相对峙，与大队主力的联络完全断绝，孤军死战整七昼夜，干部、士兵相继伤亡，弹药渐渐缺乏，但士气益发振奋，坚守阵地，毫不动摇，不断进行壮烈的手榴弹战和白刃战，直到最后。在此期间，并曾果敢进行反击，摧毁其锐气，毙敌三百余，终于保住两公里宽的阵地，击退了敌人，其中第一,第四两岗楼为中队阵地的

重点，敌人的冲锋最为激烈。负责守备第一岗楼的船冈伍长及第四岗楼的宇田伍长等远离中队主力，以不足一个分队的少数兵力，而对二、三百敌人的猛袭，毫不屈服，决死奋战坚守阵地。以后，若干增援到来，更加顽强战斗，完成了中队防御的重任。

为充分说明战况，根据“第二中队战斗详报”补充如下:

(一)22 日，得到有关敌侦察班活动的情报，中队立即加强警戒。但对敌部队的行动则完全不明。

(二)共军的装备比过去有所改善，钢盔数也见增多，判明攻击部队中有迫击炮 3 门、重机 1 挺，轻机 15 挺，手榴弹极为丰富，但系粗制品。

(三)共军对阵地实行夜袭，一夜之间多次进行反复冲锋，这是过去袭击中未曾见过的战术。白天在周围高地上构筑阵地进行狙击。其射击准确度良好，一般说来部队训练有显著提高。

(四)23 日，中队积极出击，力争击败敌人，但敌兵力极为强大，不易击退。看情况，除大队队部外，各警备队似均在激战中。因而决定在救援部队到达前，死守现有阵地。

(五)敌将兵力逐渐向北移动，采取包圈形势，连夜进行攻击，而且每到夜间攻击更加猛烈。29 日，见我救援部队将要到来，便逐次后退。

(六)交战 150 个小时，敌战死约 250 名、负伤约 300 名;我战死 1 名，负伤 5 名。

驻蒙军司令官冈部直三郎中将在 9 月 24 日的笔记中写道:“对蒙疆地区，进行如此规模并且有组织的攻势，还是第一次。今后必须加强戒备。”另外，在 10 月 4 日的笔记中，写了对此次作战的感想:

此次作战，系敌乘我兵力减少之际，又适值各大队长(笔者注:独立混成第二旅团)在张家口开会，故在初期我军行动不利，且因汽车部队从包头归来较迟，增调兵力困难，致使共军得以任意活动约达三天之久。回顾平素的警备措施，存在下列缺陷，对此，我深感惭愧。

(一)各守备队在民众工作方面，在领导密探组织、警察队收集情报等方面，有很多地方应该检讨。

(二)最前线部队的防御设备，一般不够完善。平素如能选好地形，确定驻兵的地点及防御设施的位置，方可以少数兵力、极小损失，坚守数日。与此相反，此次全部被歼的部队，皆因驻兵地点的地形不良及防御设施又不完备所致。

(三)最前线守备队的弹药储备极少，以致第二天即告弹药不足。

(四)对敌兵力估计过高，因此，作战行动有过于慎重之感。

三、浑源、灵邱方面的战斗(1940 年 10 月 8 日—10 月 12 日)

浑源、灵邱地区由第二十六师团独立步兵第十二联队的第一、第二大队负责警备。在这方面，共军的活动虽无大的变化。但由于这里的治安情况一直不佳，各警备队不断在附近进行讨伐。

10 月 7 日，联队长坂本吉太郎大佐得到情报称:“独立第一师及其他共军的大部队由涞源方面西进，正向繁峙县东部及北部边界移动中，准备伺机袭击浑源—灵邱间新建公路及各地守备队。”联队长当即命令第二大队长消灭这股敌人，以粉碎其企图。

8 日午后，讨伐队在大安岭(平型关正北偏西约 10 公里)附近搜索到共军并

给以大的打击。8 日夜，即在该地附近宿营。但驻扎在浑源—灵邱公路上的枪风岭守备队(37 人)及南坡头守备队(中队主力正参加上述讨伐队，41 人留守)，8 日半夜受优势敌人的攻击，遭到毁灭性打击，兵营也被敌占领。

9 日，联队长及讨伐队长得悉上述紧急情况，急行军赶至现场，夺回守备队阵地。随后，以联队主力在浑源—灵邱公路西侧地区进行讨伐，至 12 日结束。

晋察冀边区肃正作战(1940 年 10 月 13 日—11 月 2 日)

方面军为适应驻蒙军的情况，改变原定计划，领导了对晋察冀边区中共根据地更大规模的肃正作战。从南、北拒马河上游地区至阜平一带，由驻蒙军、第一军、第一一 0 师团、独立混成第十五旅团的各讨伐队以及临时混成第一 0 一旅团参加作战。自 10 月 13 日开始，经过三期的反复讨伐肃正，对中共根据地进行了覆灭战。至 11 月 2 日，作战虽告结束，但仍以独立混成第十五旅团的一部在东斋堂方面作长期驻扎之势，做为打入中共势力圈内的楔子，随后又命令旅团继续进行讨伐。

从中共方面的记录看“百团大战”

关于百团大战问题，在中共方面出版的《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八路军百团大战特辑》中，以“震动全国，使敌胆寒的百团大战”为题，大书特书。其内容大部分是歌颂共军的英雄战绩，故省略细节，对其有关作战部分大要转述于下:

注:此次作战，在共军是极特殊的一次，故其实施目的以及影响值得注意，其所阐明的政治目的为:“汪精卫投降日本后，在国内对抗战发生动摇，企图压制主张抗战到底的中国共产党，而将投降、妥协的浪潮扩及全国。中共中央预见到反共投降高潮即将到来，因而发动百团大战，以伟大的胜利粉碎反共投降派的理论，坚定全国人民的抗战信心。另一方面，在调整国共关系的谈判方面，向国民党主动提出解决方案。”另外，对于军事目的则称:“粉碎日军对共产党的压制，阻止(破坏交通线)其向内地进攻。”

轰动全国的百团大战

1940 年为希特勒以“闪击战”席卷西欧、国际法西斯最活跃的一年。在中国，滇缅公路被封锁，国民党统治区投降、妥协的空气浓厚，反共逆流高涨。日寇策划进攻西安，昆明、重庆，企图迫使中国投降，同时打击英、美在远东的势力，阴谋与希特勒相呼应。八路军的“百团大战”就是在这样情况下发动的。这就是自 8 月 20 日至 12 月 5 日所进行的大战。最初，由八路军 115 个团、40 万人的兵力为核心参加战斗，全线同时开始攻击。进攻的目标为华北各主要交通线。攻击重点为正太铁路，作战范围为晋察冀全区、晋绥大部、热南(热河以南)等广大地区。

此次作战的特点，不同于过去的游击战，此次除八路军 115 个团的 40 万人外，并有广大地区的民兵参加。在朱司令、彭副司令统一指挥下进行作战。在敌人对我方意图事先毫无所知的精况下，全线同时展开奇袭。作战计划是在一个月以前完成的，各军区对敌情、地形的侦察，兵力的部署，道路的选择，爆破器材的准备，宣传品的印制，武装团体及居民的动员，补给物资的集聚、转运等工作进行了周密的准备。另外，此次作战极为激烈，

我方虽也损失甚大，但敌人伤亡数倍于我，使敌心惊胆寒。以此作战粉碎了敌人的“囚笼政策”(笔者注:是企图封锁中共地区使之孤立然后分别予以消灭的政策)，并在阻止敌人进攻西北和重庆方面向西南后退的同时，也阻止了当时向日本投降、妥协的逆流。

一、第一阶段

中心任务是破坏交通。攻击目标为，石太(石门—太原)、同蒲、平汉、津浦、北宁、平绥、京古，石德等铁路，代蔚(代县—蔚县)、沧石(沧县—石门)、平辽(平定—辽县)等公路。打击重点为石太铁路。战斗自 8 月 20 日夜 20 时至 9 月 10 日连续进行 21 天，完成了我预定计划。

聂部队

在聂荣臻司令的指挥下，由晋察冀 46 个团参加。其中 15 个团分成 3 个纵队，破坏从平定到石门之间的石太铁路。另以 25 个团分别向各处前进，破坏北宁路、平汉路北段(平定以北)、津浦路(德县以北)、京古路及沧石公路。

对于石太路上的重要据点娘子关，我军于 20 日夜，首先解决了驻在村内的伪军，然后强行攻击凭险以优势炮火进行顽抗之敌，经 3 个小时的激战，终于全部肃清该敌，黎明时我国旗即已飘扬于娘子关上。

炸毁井陉煤矿也告成功。20 日晚，我军由优秀的工人作向导肃静地前进，越过外壕，破坏电网，投掷手榴弹，随后冒炮火以梯子登上丈余高墙。经过两小时的激战冲进新矿井内，完全占领敌人的工事。我军当即破坏了新矿井的机器 14、汽缸 10、风车 3、水库 2、烟筒 2、电机房、车站及其他工厂设施。据某被俘日本技师说，“损失达一亿元以上”.这些机器的修理与恢复，需半年以后方能再用。

晋察冀部队自 20 日至 22 日三天内破坏了石太路东段(从阳泉至石门之间)各处，并攻破沿线敌据点。敌(独立混成第四、第八旅团)战死一千余名，缴获步枪达一千余支。

以后继续攻击孟县内之敌，攻破北会里、东会里、河底镇、上社、中社、下社等据点，并破坏了所有的公路。

刘、邓部队

由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指挥的第一二九师、晋东南新军、冀南部队等 40 个团和炮兵团、特务团以及决死第一、第三纵队的 5 个团等参加了战斗。以主力 15 个团和炮兵团攻击平定至榆次之间的石太路，以 8 个团的兵力破坏了元氏至安阳(彰德)之间的京汉路，以 9 个团破坏了石德路南段及邯济(邯郸—济南)公路。另外，对太谷至临汾之间的同蒲路、平遥至壶关之间的白晋路，分别由第一二九师的 7 个团及决死队 5 个团，进行破坏，并以两个团负责破坏临汾、屯留公路。

当我军势如潮水扑向石太路时，敌尚在睡梦中，由于我连续奇袭攻击，震动二百华里的地域。沿线所有敌守备据点及其部队均被歼灭，所有桥梁、隧道、水塔、车站等建筑物均被彻底破坏。

狮垴山位于阳泉门前，控制石太路，是关系作战全局的重要地点，我军迅速将其占领，并由山顶猛击阳泉之敌。阳泉为敌独立混成第四旅团司令部所在地。片山旅团长，自 21 日上午起疯狂地开始了猛烈的反攻，恶战一直持续到 29 日。在此期间，敌人除动员全部兵力外，还武装了全体日本侨民，并以百余架次的飞机轮番轰炸。但我军固守山头，继续英勇反击。阳泉以西的多数据点也展开了激烈战斗。敌人的联络被切断，增援被阻止，陷于孤军作战而被消灭。我第一二九师在石太路经过 20 天的战斗，胜利后开始转移。敌人又以七、八千人的兵力分五路向我晋中地区进攻，企图插到我军的背后，但我军主力已经全部转移。以后又经九昼夜的战斗粉碎了敌人的合击阴谋。

在以上期间，石太路沿线的片山旅团所属德江、原田两大队被歼灭，坂井、铃木两大队及第三十六师团的永野支队也被歼过半。

冀南地区方面，在陈再道同志指挥下，冀南的铁路、公路均被破坏得支离破碎。特别是石德路，由三万余民众参加，连路基均被拆除。

贺、关部队

贺龙师长、关向应政委指挥的第一二 0 师和决死第二、第四纵队共计 22 个团，击败同蒲路(大同一太原之间)、汾离公路(汾阳一离石之间)全线之敌，重点置于太原附近，阻击敌人向石太线增援。

8 月 21 日，第一二 0 师第三五八旅攻占了从静乐到忻县公路上的要点康家会据点。我军乘黑夜强行袭击，突破数道铁丝网，首先占领了敌人的大碉堡，将残敌赶进小碉堡内，并逐次将其攻破，全部予以歼灭。占领该据点后，继续对同蒲路进行破坏。

二、第二阶段

这一阶段是对敌阵地的攻击，时间自 9 月 22 日至 10 月上旬。我军为了继续扩大第一阶段战果，将作战重点置于歼灭敌人、消灭交通线两侧及侵入解放区的敌人据点。

其中大的战斗有:榆社、辽县战斗，晋察冀的涞源、灵邱战斗，冀中的任邱战斗，冀南的石德络及邯济公路的破坏，晋西北的同蒲路、宁武附近的袭击与破坏等。

在此，仅以榆社、辽县的战斗为例加以说明。榆辽公路为敌人横断太行山脉费时一年余修成的，由片山旅团设坚固据点负责掩护。但因我军攻击，所有据点悉被扫除，道路被彻底破坏。

9 月 23 日晚，第一二九师第三八六旅，在陈司令(指陈赓司令员一译者)指挥下攻击榆社城，将 400 余敌人压制在狭窄地区。但是，阵地四周皆为绝壁，并围以数层铁丝网，设有现代化工事构成的碉堡群。我军英勇战士在有组织的火力掩护下，把用几个长梯接起来的云梯架于绝壁之上，冒着敌人的火力，登上四丈余高的碉堡，用水浸湿棉被堵塞枪眼。我山炮火力压住敌人，工兵挖掘坑道在敌碉堡下面埋上大量炸药。25 日午后开始第三次总攻，敌人的主要碉堡均被炸飞了。我突击队冲入，展开了白刃战。除少数敌人逃走外，藤本中队长以下全部战死于碉堡内。

对管头的攻击，与榆社同时进行。我军切断敌人的水源，夜间登上悬崖，接近敌人。经三昼夜激战后，日军只有数名生存，乘夜逃去。(注:管头、石匣为榆社一辽县间的据点)

25 日开始对石匣敌据点攻击，当夜攻占该地。敌虽顽强抵抗，我部队却勇敢突入，以数百枚手榴弹全歼守敌。就这样，沿榆辽公路的碉堡群悉被肃清。

三、第三阶段

经我一个半月连续不断的攻击，使华北敌人陷入极端混乱局面。伪军纷纷动摇，敌占区民众为之振奋，伪政权濒于崩溃的状态。敌于忧虑愤怒之余，慌忙调动大军，对我华北各解放区进行报复“扫荡”。于是“扫荡”与“反扫荡”便构成百团大战的第三阶段。

这一阶段的时间自 10 月 6 日至 12 月 5 日约两个月。首先在太行山区开始，逐次扩及平西、晋西北、晋察冀、雁北、太岳,冀中、冀南、大青山等地区。在本阶段，我军曾进行数次歼灭战，著名的关家垴歼灭战，即其一例。

当时，太行山脉各地反扫荡气势非常高涨。关家垴歼灭战为彭德怀副总司令亲自指挥常胜之师进行的。敌第三十六师团岗崎大队，10 月 20 日从沁县出发东进，30 日夜到达关家垴(武乡东面)地区，已经疲惫不堪。这时，我第五、第六、第十旅及决死队各一部展开了猛烈攻击。彻夜反复进行白刃战，31 日又经数次反复冲杀，终于歼灭了冈崎大队的大部。另外，使从辽县、武乡赶来救援之敌受到极大损失。

百团大战自进入第二阶段开始，华东八路军也参加了大战，并沿津浦路、胶济路、陇海路、大运河地区进行了破坏交通战、攻击敌据点和反扫荡战。

四、战果与影响

此次经过三个半月大战，虽历经艰难困苦，但均被我军高昂意志所克服，因而经常掌握主动，终于在伟大胜利中完成了任务。

百团大战对国内外影响极大，在政治上，正当国际形势发生巨大变化之际，粉碎了敌人企图使国内顽固派投降的阴谋，制止了顽固派的妥协逆流，振奋了人心。在军事上，粉碎了敌人的“囚笼政策”，同时牵制了企图进攻大后方的敌大量兵力，不仅破坏其交通线拖住其后腿，而且取得了如下战果。

在此期间，交战 1,824 次，敌人伤亡，计日军 20,645 名，伪军 5,155 名，俘虏日军 281 名，伪军 18,400 名，攻占敌守备据点 2,993 处，缴获步枪 5,400 余支，轻重机枪 200 余挺及其它大量武器弹药。破坏铁路 948 华里，公路 3,000 华里及桥梁、车站、隧道等 260 余处，解放了煤矿工人 10,000 余人，铁路工人 2,000 余人及被拉去修路的同胞 600 余人。

这是中国抗战史上一次空前规模的进攻战斗，给全国军民以极大鼓舞，很多报纸发表了庆祝社论，大后方的民众纷纷寄来祝词和鼓励信。但在大战中却未得到友军国民党部队任何配合协助和补充。卫立煌将军虽命令晋南部队协助，但被蒋介石命令制止。此时国民党军队已完全停止抗日，忙于对我方制造摩擦。

日寇东条陆相在 1941 年议会上所作的一年来军事总结报告中说：“1940 年度敌军(指国民党军—译者)几未进行反攻，仅有共军于 8 月在华北进行的大规模出击而已。”事实上八路军在抗战中抗击了敌之大部，而国民党却消极抗战积极反对我们，这就是中国抗战中两条军事路线的鲜明写照。

此次大战显示的我军威力，使敌人及国内顽固派觉醒和惊讶。以后，敌对华北解放区的残酷“扫荡”愈加强化，顽固派害怕人民力量的增大，反共活动更加积极了。

(以上未按中文资料校订—译者)

六 从“百团大战”中取得的教训和对中共的观察

第一线兵团取得的教训

遭受共军“百团攻势”的日军，从各地的兵团直到各军、方面军，均由痛苦的经验中取得了宝贵的教训，改变了对共产党的认识，从而采取各项治安施策，使华北的治安肃正效果得到空前提高。

下面提的“教训”是笔者根据第一军及第一一 0 师团等给方面军的报告摘要整理的。当时方面军特别要求各兵团提出作为教训的事项，并且每次均将其报告印发各有关方面。

第一、一般教训

一、平日对争取民心和积极灵活的治安行动

(一)为了笼络民心，应该抓住直接影响民众生活的切实问题进行治安工作。进行宣传、宣抚工作，应尽量提示具体、简明的内容。此次，凡平日治安工作较好的地区就能得到民众的积极协助。

(二)如从居民方面收到有关敌人情报，应不辞劳苦，立即出动。

(三)警备队的一举一动应时刻严肃军纪，而且要采取积极灵活的治安措施。特别要显示出能使居民对我衷心信赖的实力和威容，这一点最为重要。

二、一般民众提供情报的问题

(一)教导民众如得到有关治安工作的特殊情报，应立即通知日军。为此，必须迅速整顿和确立重要地区的保甲制度。

(二)要巧妙利用民间的秘密帮会(青帮、哥老会等)的联络组织。

(三)要考虑建立对日军的秘密情报联络处，以便使民众可以安心为我联络情报，而无事后受害之虞。

(四)将谍报网扩大到敌区内，且有必要进行使谍报人员打入敌部队内部的工作。

过去谍报人员住于我势力范围之内，由于共军禁止通行，而不能进行活动。另外，虽有困难，希望能做到与敌部队内主要人员取得联络。

(五)有可疑征兆时，不能仅凭谍报人员，而要亲自进行讨伐，实施武装侦察及捕捉俘虏。更须注意从敌区居民方面收集情报。

三、军队自行收集情报与防谍

这次经验说明，只依靠密探，在紧急情况时就会失掉价值。军队必须亲自采取下列办法积极收集情报。

(一)由我军领导，用当地人组织训练的特别工作队潜入敌区侦察。

(二)由我小部队进行武装侦察时，潜伏下侦察员。

(三)用军犬、地雷、照明、巡逻及其它方法，做好发现敌人接近的防备措施。

尽力逮捕潜入我治安地区的敌人密探、工作人员等，并要利用俘虏、归顺者侦知敌人的企图。不要受共军“声东击西”的反宣传的欺骗，对便衣敌人的活动及妇女儿童的动向均须特别予以注意。

第二、共军情报活动的特点

一、利用民众

共军的民众工作，既广泛又彻底，其工作直做到我警备队的周围，拉拢或威胁民众以收集情报。共军惯于事前进行周密侦察，特别在进行袭击的前一天派出便衣到靠近铁路的村庄，向村民探听情况。例如，数日前敌人的参谋就曾化装便衣由石太路的上湖站乘开往太原的火车进行侦察。

二、行动意图的隐匿及伪装

(一)经常改变或伪称部队番号。例如令部队在行动时用旧第一旅、新第一旅、独立第一旅的称号，或令各地部队使用同一个部队的名称等，使人难以掌握其真相。第一二 0 师对外一律不用部队番号的标志，或散布更多杂乱的部队番号。

(二)夸大宣传兵力，往往一面场言袭击小警备队以一部分进行牵制，一面却以主力向其它方面进攻(声东击西战术)。此外，还有表面伪装进攻阎锡山的山西军，而实际是准备攻击日军的实例。

(三)在准备期间通报命令时，不用无线电而用书面传达，对下级指挥人员不过早告知作战意图，参谋亲自侦察石太路，对连以上干部在袭击前两、三天，对排以下干部在到达目的地稍前才说明行动意图。对阎锡山的山西军(作为友军)在开始攻击后才用无线电予以通报。

(四)部队到达开始攻击的地点以前，均分成小股进行各种活动，并且以夜间行动为主，白天分散隐蔽，停止一切移动。运送粮秣虽征用当地居民，但采用一村转一村的接力传递方式，难以判断其运送方向。

(五)宿营时躲开大的村庄，利用山间或小村。隔断宿营地与外部的交通，严防密探侵入，禁止村民外出。

(六)在我警备队附近，秘密通过我警备间隙时，留下一些部队或以地方部队部署于其它方面，令其积极活动进行牵制。

(七)袭击时所用向导，采取拉拢或强制手段，使用平常与我军有接触的村民或被我军使用过而逃跑的中国人。

(八)当共军袭击时，动员大批居民予以协助，首先切断通信电线和破坏道路，使日军难以相互支援，并孤立各个警备队。

{九}有关事前征兆

共军对隐匿企图作得非常巧妙，既周密又彻底，仔细研讨，百团攻势开始前有如下征兆:

1.匪团的移动，特别是向地盘以外移动频繁。

2.宣传中央军(重庆方面)北上的情报。

3.夸示共军对中央军交战。

4.敌人加强谍报工作，尤其是强拉爱护村民提供情报。

5.去匪区的交通逐渐困难。

6.居民避难，爱护村民放弃对铁路的警戒。

7.在敌区积极集聚物资。

8.举行秘密会议。

9.对我友军武装团体进行策反工作。

以上情形，当初如果不是当做局部地区的现象而放过，并对之加以深入而有组织的观察，速向邻近或上级部队报告，则百团大战的企图，或有可能在事前察觉。

第三、有关警备的参考事项

一、铁道警备

在以少数兵力守备大段铁路，及敌企图进行大规模破坏来袭的情况下，单靠驱逐破坏者，或仅仅加强直接警备，是不能完成警备铁路任务的。必须尽早识破敌之企图，积极击破敌进行破坏的据点及其支援部队，为此有必要保有机动兵力，彻底进行报复攻击。否则就会使敌人力量增长得以反复进行破坏。

对于长期单独作战的小分遣队，必须充分准备粮秣弹药，构筑坚固的防护设施。

无线电通信，系按平时的通信规定设置的，出现了极大的不便和障碍，需要做好准备，更换一套按战时规定的通信设备。此外，灵活运用烽火等信号进行联络的准备工作也不够充分。只有通信鸽被极有效地利用了。

二、对重要设施的特别警备

由于对敌人的力量估计和行动的预测不够准确，遭到了极大损失。因估计错误，致使我对保卫重要设施及加强通信联络的准备工作做得很不够。这种疏忽，也表现在对井陉煤矿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及对石太路警备产生太平观念。

此外，重要地区的警备兵力不宜频繁更换。如在井陉新矿，下级士官以下 14 人的分遣队每天进行更换，其警备设施也不完善。

三、兵团相互间联络协调问题

独立混成第四、第八旅团负责地区的边境一带，因系山地，讨伐与治安工作比较困难，兵团之间的情报交换，平时也不够密切。

四、警备兵团的编组问题

独立混成旅团是参照满洲的独立守备队，精心编成的专门担任警备的兵团。对以游击战为主之敌，在警备与讨伐方面已取得大的成果。但是，在象这次的反击作战中，长期以之做为旅团进行机动作战时，则需增加通信、补给等特别配属部队。

五、提高警务机关能力

对付共军，必须全力以赴，确立最有效、最能持久的保甲制度。此外必须迅速加强铁路警务机关及煤矿警备队的训练。有关配备、设施问题要与当地部队密切联系。

第四、烧光敌根据地作战的教训

一、必须进行教育训练，使部队能以克服险峻地形，做到行动敏捷，以便在战斗时迅速迫近敌之侧背，否则，要想捕获共军是不可能的。

二、为了烧光军事设施，各纵队应分别配属工兵，令其携带炸药燃料，并且要教导他们如何进行破坏。

三、共军有时探知我对空标志而予以利用，故对符号应适当变更。

四、对收集与利用敌方资料，应于事前进行教导。过去曾有将相当重要的资料全部烧毁的事例。

五，烧毁敌根据地时，曾有民伕等(指日军带来的民伕一译者)进行掠夺，强奸等破坏军纪行为，需要注意。

六、共军采取派通敌分子或其士兵混进日军征用的民伕中，以附近村公所为联络据点，探听我方动静的方法。

七、共军在撤退时，经常将难以搬运之物埋藏于附近地下。要注意使用当地居民进行搜索。

共军方面取得的战斗教训

关于共军在百团大战取得的教训，冀西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部所写的战斗详报中有如下叙述。

注: 以下资料载于《偕行社记事》1941 年 8 月号

冀西第一军分区司令部战斗详报

1940 年 10 月 29 日

署名

司令 杨成武

政治委员 罗元发

副司令 高鹏

参谋长 黄寿发

第一，敌(日军，下同)的优缺点(笔者摘要)

一、优点

1.敌之阵地设施、防护工事及配备适当。

2.敌之军事保密工作良好，不易收集情报。在我攻击前，未能探知敌人的确实兵力。

3.敌在守备时的还击及反攻极为勇敢、坚决，防御可谓积极。9 月 22 日三甲村(涞源县)战斗，8 月 22 日井陉旧矿战斗等，由于敌人连续猛烈的反攻，以致我军不得不撤退。再如东圈堡(涞源县)战斗，我军占领敌人四个碉堡后，敌仅二十余人守一个碉堡，即在如此情况下，敌仍集中火力反复出击。因此，我方只好放弃了两个碉堡。

4.敌人能巧妙使用集中火力特别是掷弹筒，发挥了相当威力。在东圈堡战斗时我伤亡二百余人中，半数为掷弹筒所造成。敌人为了集中火力，事前对阵地前要点进行了测量及周密的射击准备。此外，集中射击与出击部队的联系，既密切又巧妙。

5.敌擅长白刃战，其体力、技术均较优。

6.敌在濒临被歼时，主动破坏武器及其它军用品，以防落入我军之手。这是精神教育

的效果，值得我们学习。

二、缺点

1.敌各据点，因配置过于分散，兵力难以及时集中。因此，敌人的出击或反攻多次受阻，以致损耗兵力，最后失去力量，转入单纯的防御。此种实例颇多。

2.伪军多系由土匪和吸鸦片者所组成，彼等武器少、体力弱、战斗力低。

3.敌碉堡背后的掩护设施有缺点。在东圈堡战斗时，敌伤亡中的大半是在后面被手榴弹爆炸造成的。

4.敌人的警戒不严，当我急袭时，往往是顾不得穿好衣服就仓猝应战。

5.敌夜间射击不准确。涞源县三甲村之敌，一夜中盲目射击，浪费了弹药。

第二、我之优缺点(笔者摘要)

进攻作战的经验过去虽然很少，但将来此种机会可能增多。各级干部必须从此次作战中吸取宝贵的经验教训，灵活运用于未来。

一、在我军缺少重武器装备的现状下，袭击是特别有利的战法。在此次大战中创造了许多以袭击取得胜利的典范。但是，并非所有的袭击均获成功，其成败取决于干部的决心与指挥是否得当。

例如在南线，三团三营袭击井陉旧矿时，由于联系不佳，失掉使用第二梯团的战机。此外，各级指挥员因缺乏坚定的攻占信心，以致未能取得彻底成功。

在北线，一团的两个连，在袭击涞源县南坡时，由于联系不好，进至最后铁丝网一线后，却在扩大战果中失败了。二十团袭击漕沟堡时，连续进攻三昼夜未能成功，即因干部决心不坚定，准备不充足，联系不好所致。

特别是：夺取敌人的碉堡或房屋后，必须坚决保住，在第二梯团扩大战果前，绝对不能放弃阵地。

袭击时，要靠果敢的一击达到目的，否则.第二次就更加困难了。因此，必须抓住时机，以必胜的信心，勇敢的行动，在短时间内消灭敌人。

二、要正确判断敌人的兵力，绝不允许过高估计敌人兵力而产生恐怖情绪。

三甲村战斗中，从涞源增援之敌不过百余人，而我干部竟报称有150人。

第一团的侦察连在进攻金家井时，该地之敌为数十人，但侦察连判断为百数十人，就不战而退了。

在防止过高夸大敌人兵力的同时，也必须纠正轻视敌人的错误。例如，去年反扫荡时，第一次在涞源附近的战斗中，由于轻视敌人而被包围，遭受重大损失，破坏了整个作战计划的完成。此次涞源战役，也有同样错误。例如，22日夜袭之所以未能取得战果，即因对敌缺乏正确判断所致。

在调查敌情时，不仅要调查兵力、装备、防御工事等情况，还必须查明指挥官的能力及个性，反战、厌战的程度，平日与民众的关系及受我宣传的影响如何，敌人所施行的欺骗、教育情况，以及士兵的军事素养、年龄、战斗能力等，以便对彼我力量做出准确的对比。

三、开辟与选择前进路线及确定队形时，应注意避免无意义的损失.选择能完成战斗目的的最好方法。

笔者注:共军对这样以大部队进行运动战、攻坚战未有经验，其所提出的教训多系有关基本战斗原则的检讨，因而大部予以省略。

第三、各种战斗要领(笔者摘要)

一、围攻碉堡法

抓住奇袭的时机最为重要:对掩护工事要集中使用黄色炸药。在进行破坏时，以火力掩护一齐冲进。这是三团各营攻击井陉新矿时使用的方法。三团攻击东圈堡时，依靠地道

进攻成功。

在三甲村用以下方法强行突破:

首先，适当地部署好第一、第二梯队，做好准备，将支援火力集中于敌薄弱部位后，突击部队即秘密向该部位集结，在火力掩护下强行袭击。

对据守于坚固房屋中的敌人，采用火攻较好。将装有硫磺的手榴弹投入屋内，使之爆炸，效果很大。三团试用此办法已获成功。今后应制造此种手榴弹。投入浸透硫磺的棉花，虽也能使房屋燃烧，但不如手榴弹的效果大。

二、关于通过铁丝网和外壕的办法(笔者略)

三、攻击堡垒及围墙时注意事项(笔者略)

四、对敌人的反攻和迎击应注意事项

有不少实例，是由于使用第二梯团的方法不当而未能成功的。如井陉旧矿、漕沟堡、上庄的战斗，其失败原因即完全由于未能充分掌握第二梯团，以致使第一梯团不能抓住时机扩大战果。

五、关于追击

在以前的战斗中，急追、猛迫皆不彻底。无论多少人皆不允许以困难为藉口放弃追击。

六、关于通讯联络

在此次作战中，我通信联络错误很多，必须加以改善。

南线的葵家庄战斗，由于团指挥部无特殊标志，致使通信员一个晚上未能找到团长。另外，在第二十团，营、连、排曾失掉联络。在三甲村战斗中，一、三团发生错误的重要原因，也是由于不注意通信联络的方法及通信器材不齐备所造成的。

对电台的失职更有改正的必要。三团通信主任收到给首长的电报竟未报告，为此已受到处罚。

各级指挥部门要按军区规定，白天用旗，夜间用灯火进行联络。

七、关于弹药的节约及炮兵的使用

此次战役中，对节约弹药已有相当进步。例如，三团在南线战斗中，消耗子弹仅 6,000 发，一团在南坡头(灵邱县)战斗中只用 900 发。但从各个部队来看，进步还不大。例如，二团在南线消耗子弹 15,000—16,000 发，一团在南坡头消耗手榴弹约 2,000 棵，为数均过多。

炮兵的炮弹消耗数量过大，皆因炮兵缺乏经验及运用不当所致。今后禁止炮兵夜间乱射。按我射击技术的现有水平，夜间使用炮兵尚不适宜。营以上干部有必要学习特种兵种，如炮兵、骑兵、工兵等的指挥能力。

收集弹壳也是我们的重要责任，军区早已对此下过命令。今后领取弹药须以弹壳交换。不仅要收集自己的弹壳，敌人的一也要收集。此次三团成绩很好，但其它各团尚未遵照执行。

八、关于白刃战

在此次战斗中，从我军进行的白刃战看，损失较大，其原因是由于体力弱、技术不熟练和不够顽强。

除以机械体操增强体力、臂力外，为了提高白刃战的技术，还必须实行以下措施:整备防护用具，改良刺刀及建设军区的制造工厂，改善保健给养，战斗部队的干部及全体指战员每人要携带长刀一把，在进行白刃战时长刀最为有效。

九、对道路及电线的破坏工作

战役中对道路的破坏工作，不够彻底，使敌人增援部队得以很快修好，在涞源作战中，敌增援倘再迟延数日，则胜利将会更大。由此证明，我军干部对今天的交通战缺乏足够的认识。

在华北敌后抗日游击战中，交通战是一种主要的斗争形式。如不重视交通战，就不可能打败敌人的“囚笼战术”和扩大点线的计划。

我应从战略、策略的观点来认识今天的交通战，将交通战列为日常持久的工作，各部队不论向何方移动，均必须破坏敌人的交通。交通破坏成功，才是完成了任务，否则，即是失职。

(一)汽车路的破坏方法

在路面上挖成闪电形的沟，连续埋设地雷。破坏坡道。

(二)破坏铁路沿线的电线

铁路沿线的电线为数极多，沿平汉路两侧总计有 64 条电线，以前采取的方法是将一根电线的某一处切断，但给敌人造成损失不大。今后要进行大规模的破坏，由部队在两端警戒，将其间电线全部切断，并收回所有切断的电线。如在各地均实行此种方法，则敌人修复就要困难得多。四支队一次曾获得价值十余万元的电线，而且需要一周左右方能修复，给敌人造成很大损失。各部队采取此种方法时，应将收集的电线送交司令部保存。

此外，占领敌阵地时，在破坏敌之工事的同时，要注意收集铁丝网。

十、关于消除游击主义

部队中残存游击主义，对部队的发展不利，必须迅速消除。

例如:

(一)在战斗中不考虑全局，任意行动、后退等，以致打乱统一行动。

(二)对必要的阵地，不重视占领，应该坚守的阵地也不构筑必要的工事。对应确保的阵地，在防守中缺乏顽强抵抗的毅力。此外，还有擅自脱离战场的行动，都是游击主义的表现。

(三)虚报或不及时通报情况，也不积极的收集真实情报，有的情报未加整理，杂乱无章即向上级报告。

(四)不注意侦察、警戒，特别是由于在战斗时期，忽略对两翼的不断警戒，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十一、关于对参战民兵的指导

参战的民兵，有高昂的战斗意志，熟悉地形，但缺乏实战经验，容易陷于恐慌。由于组织性较差，必须注意不要过分使用.，

此次战役中，一团将民兵派到前线，使之搬运梯子靠近城墙时，敌人炮火飞来，民兵惊慌逃跑。民兵的惊慌有可能引起部队混乱。

民兵的迫切问题是解决给养。打胜仗时，也要给民兵一些战利品。情况允许时，将发给部队的物品分一部分给民兵。密切军民关系，提高民兵热情，这对其它方面也将起到大的宣传作用。

对民兵因未受过教育而犯的错误，必须合法解决。例如，任意征用死伤人员的武器及争夺、破坏、少报、隐匿军需品，或不及时报告敌情，以及民兵违反群众纪律等情况，部队的干部必须对民兵负责人进行教育和指导。

十二、关于严守军事秘密

由于保密做的不好而遭到不必要损失的实例很多。如此次涞源战役，政治机关发送和散发文件、宣传品，以及召开会议的时机都为时过早。《抗敌报》刊载了统一作战的意图，对此，应做为利敌行为给以处分。此外，部队里还存在发送未经审查的文件、不肯绕道而暴露行动、泄漏部队番号和事前不进行戒严等情况.

十三、关于指挥退却战斗

不能切实掌握部队，退却时无秩序、无计划、不指定掩护部队，也不占领必要阵地，而表现出混乱状态。

十四、干部的战术素养问题

最大的缺陷是牺牲精神不足及决心不当。必须强调干部平时的战术学习。

(以上未按中文资料校正—译者)

华北方面军加强和调整情报机能

共军百团攻势给与日本的苦痛经验，促使情报工作者奋然而起。尔后，进行了空前未有的调整和加强对中共的情报机能，并将取得显著效果。在这以前，方面军司令部参谋部第二课分为一般情报和特殊情报，未设对共的专职参谋；参谋部第四课(通过各地特务机关)、宪兵队司令部、兴亚院华北联络部、中央灭共委员会(调查部)等，虽各有其正式的调查研究及情报收集工作，但未能将所有成果加以综合利用，这是情报机能上的缺陷。另外，在中共不断进行地下活动期间，对其实际情况的掌握和活动情报的收集，也没有多大成绩。此次中共方面的百团攻势，可谓恰恰击中我方这一弱点。

曾任当时第二课参谋的横山幸雄少佐有如下的叙述:

方面军以重庆为重点的情报活动，取得了相当成果。特别是在特种情报的密码破译方面，平均破译明白程度可达 80%。对苏情报活动较困难，收效不大，但仍在继续努力中。至于对中共方面的情报工作则更差，而对作战情报和治安情报的综合利用也不够好。各有关部门正在继续努力解决中。由于中共地下活动的巧妙，在他们即将显示出实力之前，很难掌握他们的实际情况。方面军也早已察觉到华北治安的症结就是中共，因而逐渐扩充情报机能，于 1940 年 8 月人事调整时，采取措施设置了对中共情报专职参谋负责该项工作。但是共军恰于此时似有先发制人之意，发动了奇袭。因此，方面军参谋部，尤其是第二课痛感责任之重大，乃全力以赴进行对中共的研究和调查。

第二课一方面尽力收集中共活动的情报，并支持“黄城事务所”(中央灭共委员会调查部)进行对中共势力的实况调查。另一方面，特种情报工作人员夜以继日地为破译密码而努力，中共的密码与重庆不同，破译极为困难，至 1941 年 2 月中旬才破译成功一部分。此项工作是开辟前人未走过的道路。以后，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虽时进时退，但对中共的密码破译工作迄未停止，在调查研究及作战讨伐上均发挥了很大作用，终于“转祸为福”。(这是遭受共军百团攻势时，方面军参谋长笠原幸雄中将的话)。

方面军对中共的观察

共军为何发动百团攻势，如何观察中共势力的实际情况，如何评价其实力，以及正在深刻化的国共关系的将来等等，是方面军当前最关心的问题。随后，对这些问题的观察，及前述对共情报的积极活动，都有明显的进步。从 1940 年 10 月上旬方面军参谋部所写“对华北方面共产势力的观察”和同年 1 月上旬所写“对共产军的观察”中摘要说明如下:

其一

对华北方面共产势力的观察

1940 年 10 月 1 日华北方面军参谋部

一、现有势力

从数字上看，共产党的基干部队(包括一一五师、一二 0 师、一二九师及晋察冀边区第一至第四师)大约 20 万人左右。共产势力(包括共系匪及其他带有共系色彩势力的总合)估计大约为七、八十万人，并以相当速度发展扩大。

二、关于国共关系

共党方面最终目的在于打倒重庆，由自己掌握中国全部主权。但是，在目前情况下，由于实力薄弱尚不能取代国民党，故其当前的任务是以促使日本与重庆长期对抗为主。今日倘使国共矛盾激化，势必加深重庆的颓势，这对拖延日华事变的目的不相吻合。因此，中共在其力量扩大至能以支配中国的程度之前，可以看出其所采取的策略是，一方面表面上对重庆表示服从，另方面则阻止重庆媾和的动向。

重庆方面.从来视共产党为其隶属，要求共党服从的态度则丝毫未变。

最近由于德、英开战和国际形势的剧变，以及日本对西南路线的封锁等原因，苏联援蒋的地位提高了，从而共产党对重庆的态度也逐渐强硬起来。本年 7 月在重庆进行的国共谈判协定正是这样达成的。

于是使人感到华北共产党在 8 月 20 日以后的活动，可能就是由于上述协定，为显示自己力量，或是基于协定中所约定的某种积极活动所致。

三、共产军、匪的动向

1.共产党一向主张军队按照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原则，以政治工作为重点，军队对此采取支持态度。

2.直系基干部队以山西山岳地带的根据地为中心，迄未向外积极行动，最近则尽量在根据地附近充实和扩张其战斗力及势力范围。今年夏季以来，似有扩充编制的迹象，在各地曾出现新的部队番号。同时，有情报说:在各地，尤其是在山西方面正在实行大规模征兵。此种情况估计可能与 7 月的国共协定有关。

共军全盘编制为数甚少，装备不良，故认为.几乎不可能具有大兵团的作战能力。但其上层干部多是久经锻炼具有丰富经验的人，尤其对分散在广大地区的小股邻队能以巧妙地指挥和运用，这一点值得注意。

3.共军、匪的机动游击战法极为巧妙、顽强，成为我治安上最大的祸患。他们回避与日军直接战斗，采取乘日军配备空虚、搜索我小部队进行袭击等方针。但最近在 8 月 20 日以后放弃了以往的方针，对山西、河北的全部及蒙疆的一部分地区，果敢地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全面的、有组织的出击。破坏铁路、公路、通信线路以及袭击日军的小部队。要考虑共军此种企图，在今后长时期内是否还会断然进行，或者根据兵力的扩大而采取某些新的作战方式。

4.观察到共军的通信联络技术比国民党系军队有显著的进步，无线电技术甚为优秀。

其二

方面军特报第 3 号　　情报判断资料

华北方面军参谋部

1940 年 12 月

对共产军的观察

一、要点

华北共军从今春以来，进行了扩充和改编，估计正规军和游击队共计约达 25 万人以上。但由于 8 月百团大战以后，经我军 4 个多月的彻底扫荡，其根据地设施大部被摧毁，三年积累的战斗资材消耗殆尽，其基干部队也遭到很大损失，估计需要相当时间方能恢复。

估计共军今后将蛰伏于仅有的地盘，为挽回颓势而进行顽强的建设以及继续以前的游击活动。其与重庆国民党的关系，从今秋以来，虽急剧恶化，但因此断定国共将立即分裂则为时尚早。双方仍将保持如共产党所表明的那种表面上合作的方针：共军方面的让步，是将险恶的对立感情隐忍于内心。估计大致找到了暂时妥协之点。

然而，与过去矛盾相比，其本质的对立感情已表面化。如果重庆方面以强硬的态度企图彻底压缩中共地盘，估计不但和解会有相当困难，而且，双方统制内部蕴藏的危机也将暴露，如此即给予我方进行思想攻势以可乘之机。

总之，国内外形势虽然对华北共产势力未必有利，但以之作为肃正对象予以剿灭，不消说，则是确保治安的中心课题。尤其是共军移驻华北更加直接影响华北治安，因此要特别注意其动向。

二，扩军工作与我方的观察

共军的扩军工作似自本年 5 月左右开始。其内容如下:

1.游击队的正规军化

地方游击队原来虽有某些机动性，但其活动地区有所固定。由于我军彻底实行分散部署兵力，不仅使其地盘逐步缩小，且有被我各个击破的弱点。共军此次扩编部队，其用意在于使地方游击队逐步正规军化，克服过去的地盘观念，机动灵活便于集中使用。同时并要解决过去因地区差别而造成的各地游击队的给养问题。

从本年 4 月印制的一二九师野战军暂行编制表(缴获文件)及其外围部队的太行纵队等的暂行编制表可以看出：共军的发展意图是从游击队向正规军方向发展。按一二九师暂行编制表军队分为下列四种。

野战军(正规军)

地方军（正规化的地方游击队）

游击队(各县有 100—300 人的基干游击队及区游击队)

自卫队（担任乡村自卫的民众组织)

野战军及地方军、游击队均为脱产的武装组织。

2.整顿指挥系统与确立军政一元化机构

上述两个文件表明，军队的编制似在紧缩领导机关，充实战斗单位，避免各级指挥机关的重迭，同时调整地方军队、游击队与正规军之间(野战部队)的关系。为了便于协同动作及补充兵员，由野战军的旅长兼任地方部队或游击队的支队长，并规定支队的作战指挥受野战军统一领导。

以旅为战略单位，师则统辖直属部队及所有军事机关，负责一方面的作战、部队的补充、训练，补给、卫生，以及与地方行政的联系等。

在百团大战中，各师除以过去固有编制为基础的旅以外，还统一指挥数个旅或支队等在同一方面作战的部队。如第一二 0 师师长贺龙统一指挥一直在山西西北部的一二 0 师、暂一师、新编旅、独立支队及决死纵队等；又如第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统一指挥一二九师和从山西省东南部到冀南地区的约 12 个旅及决死纵队、太岳纵队等；晋察冀军区司令聂荣臻统一指挥晋察冀边区部队及冀中区、冀东、冀北地区的各部队，此外，山东方面徐向前指挥的情况也是同样。

在军的改编前后，对冀中、冀南两行政区实行合并，其意图是要确立一元化的军政机构，使巩固的山区游击根据地与平原方面的资源地带，形成军事、行政上的统一，以便进行坚韧灵活的游击战。

3.观察

扩军工作与百团大战确有不可分的关系。然而，百团大战的动机，究竟是单纯要牵制日军进攻、夸耀共军实力而采取的示威行动?或者根本就是共军战略的转移?对此，虽然尚

无确实资料证明，但据说 9 月在延安召开的北方局扩大会议上，决定了从过去的相持阶段向反攻阶段转移的各项工作任务。如把扩军内容和百团大战的周密准备等一并加以考察时，则百团大战与扩军工作均应看做是共军战略转移的一系列工作。从来对客观形势的估计自以为是的中共，过于相信其在华北工作的进展，认为在此基础上必将有飞跃的发展，因而可以想象，在扩军方面，思想上也会同样教条式地开展武装民众的工作。

扩军的结果，共产党势力明显地从质向量的方面转移。由于军队的质量下降，弱点开始暴露，有关军民脱节趋势，士兵丧失斗志，以及补给困难等的情报逐渐增多。

百团大战以来，据朱德发表的伤亡人数约达一万八千人。三年来惨淡经营积累的资材几乎全都耗尽，根据地的设施遭到破坏，加以与重庆的对立激化，军费支付已感困难。因此，要想恢复重建，绝非短时间内可以完成。

然而共军对扩军带来的许多缺点也有充分认识，从最近在山东方面得到的有关第四期整军计划来看，特别提出要加强政治工作，教育军队作到军民一致。因此，倘使共军得到足够的时间和地域，则可不致重蹈复辙。

方面军对国共矛盾的观察

共军百团攻势的目的之一，也是为了有利于调整国共关系的谈判。方面军对此问题早就抱有极大关心。兹就 12 月上旬对这一问题的判断及有关事态进展加以叙述。以下是前述“对共产军的观察”中第四项之三的结论部分。

对最近国共关系的观察

国共关系恶化的原因，如前所述，既是当地部队的冲突，也是由于国民党以执政党自居，总想用实力一举解决所有问题，但其内幕，则可以看出，在重庆国民党内部主张加强抗战阵营的统一，抑制中共越轨非法行动的浓厚气氛正在兴起。

重庆政府态度强便化的原因，固然是当地党、军生死问题的反映，但应该看到以下客观形势也是其重要原因:

1.看穿苏联对华援助是有限度的，因而确信即使对中共采取强硬态度，苏联对华的援助也不会有大的变化。

2.美、英积极的援蒋政策有望。

3.估计目前战局不会有大的发展，藉此机会企图强化抗战阵营的统一。

共产党对此则指出：破坏抗战阵营统一的不是共产党军队，而是高唱反共的重庆内部的投降分子，并通过所有机关展开积极的宣传和理论斗争。

国共矛盾虽然不外是合作本身内在的本质矛盾的表面化，但可以看出，重庆方面对依靠苏联的态度有了一定程度的明确，以及在把共军的行动看成是反蒋运动这一点上，与过去重庆的态度也有所不同。此外，在共军方面，其争执的中心则在于生死攸关的军费和驻地问题，因此，加深了双方对立的感情。

然而，在目前形势下，国民党要想强制推行可能招来抗战阵营分裂的反共政策极为困难。共产党也因策划持久战，尽量不采取可能使国民党反动政策更加激烈的行动。因此，可以料想，双方可能把对立感情隐藏起来，从政治上的妥协方面先行打开目前的危机。

国民政府统帅部于 10 月 19 日，以后又于 12 月 9 日严令共军“移驻黄河以北”。对此问题，方面军在 1941 年 1 月初所作“对国共斗争形势的判断”中，就曾断言:“结局，共产党方面虽将让步以至妥协，但不会完全履行重庆方面的

要求，斗争的祸根依然存在，.且将更加深刻化。”

至1941年1月中旬，在安徽省南部，包括新四军司令部在内的共军九千多人，遭到重庆军的攻击而溃灭，一时出现了国共或将分裂的局面。(注:即“皖南事件”)

对此，方面军在《战时月报资料》中“国共关系”一项，有如下叙述:

国共关系

一、新四军的情况

江南新四军，根据蒋介石的命令，于去年12月，一部分开始向江北移驻。但是，至1月停止了移动，而且新四军军部及直属部队第一、第二、第三支队的各一部分又返回泾县一带原来的驻地，并向重庆方面要求经费、弹药，以推迟移动。对此，顾祝同自1月9日命第一四四、第五十二、第一0八、第七等各师在泾县以南地区将新四军包围，俘虏军长叶挺及干部多人，给新四军以毁灭性打击。重庆政府又于17日命令解散新四军，将叶挺等干部交付军法会议，并严令逮捕在逃的副军长项英，警戒共军的报复。

江南新四军虽四散溃乱，但中共中央不顾蒋介石的解散命令，于1月20日，重新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及其他领导干部。23日由新任干部联名向全国发出通电，表明拥护三民主义、遵从孙中山遗训，剿灭叛徒，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江北新四军集结于淮安以东地区，暗地建设坚固的地盘。与韩德勤部队之间的斗争正酝酿中。

二、第十八集团军的情况

顾祝同对新四军的攻击和重庆解散新四军的命令，给第十八集团军的冲击之大是不难想象的。直到现在，对于重庆反动分子虽进行指责及示威宣传，但部队的行动大致保持冷静，看来似有回避冲突之势。在1月中旬以前，与卫立煌、阎锡山等所谓“友军”之间的联络，表面上也很积极，甚至在冀东方面极小的战斗，也以朱德的名义向何应钦报告，这是过去未曾有过的事例。但是，从1月下旬这样的通报及报告即已绝迹。

自1月中旬，晋东南、冀南、山东等地共军有逐渐集结兵力的倾向。其意图虽尚不能判明，但从顾祝同对新四军进行攻击、汤恩伯集团剿共部署的具体化等情况，已可看出重庆的决心。估计共军或许是预料到对方的攻击而集结战斗力。

为了援救苏北，要调动一部分部署于山东省南部的部队。而目前以此为目的进行的主力移动，已有征兆。

共军没有对抗蒋系军的实力，且不希望与蒋分裂，尽量缓和蒋系将领对共的感情，以期扭转形势。为此，12月朱德通电胡宗南，称赞他是黄浦的权威，抗战的伟人，不要轻信目前的谣言，为亲日分子所诽动，希能保持友好关系，向抗战建国大业迈进。并派去了联络参谋。其意图是不难想象的。

三、蒋系军的态度

重庆政府，自12月即令汤恩伯集团军移驻于河南省南部，监视共军执行命令。1月中句下令解散新四军后，又令汤恩伯除指挥第三十一集团军以外，并统一指挥骑兵第二军(何柱国)、第三集团军(孙桐萱)之一部，负责剿灭豫东、皖北地区的共军。正当1月下旬分别进行部署时，吕集团(即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一译者)的“和号作战”与佐久间部队的“五号作战”开始了。

在陕西省方面，1月10日将第一战区、第八战区的管辖界限改变为豫秦省境。陕甘宁边区的北，西、南三方面均被划入第八战区。第三十四集团军(胡宗南)编入第八战区的战斗序列，且将驻豫西地区的第三十六军、新十二军也编入其属下而开始移动。

1月末，第一军(丁德隆)与第三十六军交接黄河河防，不久即将移动，其动静虽不明，可以想象，或有对共军采取积极行动的意图。

在其他方面，仍不断有局部地区的抗争。目前情况尚在防备共军的报复，一面监视其行动，一面保住自己的地盘，并未出现消极态度。

总之，国共关系正在逐渐沉静，今后无论能否达成某种妥协，但在目前共军不能以实力对抗蒋军的情况下，其活动范围只能在日军警备力量较弱的占领区内，或蒋系势力较弱的杂牌军的地盘内。从确保华北治安的观点看，必须严密监视其动向。

关于皖南事件国共双方说法不一，按重庆政府方面记录述说如下:

命令长江以南的新四军首先于 1940 年 12 月 31 日前向长江以北移动，然后于翌年 1 月 31 日前向黄河以北移动。而新四军违抗命令未向北移动，进入南京、上海、杭州三角地带，企图占领该地区。于 1941 年 1 月 5 日，在三溪(安徽省南部泾县，旌德县境的一个小村)包围攻击了中央军第四十师。因此，顾祝同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发布了制裁命令，自 1 月 6 日至 14 日打散了叛军。

17 日，军事委员会命令取消新四军番号，逮捕叶挺予以军法审判。

根据中共方面的记录则有如下叙述:

蒋介石企图削弱共产党的力量，1941 年 1 月又策划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蒋介石强制命令原在安徽省南部的新四军司令部及其所属一万余人向长江以北移动，却于途中设伏以待。1 月 7 日，竟以八万余兵力对该部进行了包围攻击。新四军部队遭到极大损失。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牺牲。蒋介石此一阴谋实现后，立即宣布取消新四军的番号，并命令攻击新四军的其它部队。

为此，中共中央于 1 月 20 日，任命在江北的陈毅为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新的军司令部于 1 月 29 日在苏北成立。此时新四军虽只有九万人的兵力，但在新的军司令部领导下，改编成七个正规师，继续坚持抗战。对反共投降派，则从大局出发，不采取任何报复及使事态扩大的部署。

国共矛盾以皖南事件为顶点而极端尖锐化，但尚未到全面决裂地步，其根本对立状态则继续存在。

七 华北方面军第二期后段的肃正建设

(1941 年 1 月—3 月)

中共势力的盛衰及华北治安的好转

方面军经过中共百团大战的考验及采取彻底加强各项治安措施，收到极大成果。由于这一主要原因，使华北的治安在 1941、42 两年有了飞跃的改进。从治安战观点看来，这是第二阶段。

1941 年是华北治安战第二阶段的第一年，以下所述即 1941 年 I 月至 3 月第二阶段初期有关肃正建设的情况。

年初华北方面一般敌情

华北方面军，对1941年1月当时的敌情曾有如下观察:

一、全面情况

去秋以来，急剧恶化的国共关系，由于1月的皖南事件，预料事态可能达到最坏的局面。但是，共军没有报复的决心和实力。以后国共双方则把险恶的对立感情藏于内心，似乎逐渐进入小康状态。

华北的共军正忙于处理国共冲突的善后工作，和恢复去秋以来屡遭我军讨伐所受的损耗，其活动表现消极。自 1 月中旬虽有逐渐集结兵力的模样，但对其企图尚无可供正确判断的资料。

蒋系各军，忙于对付共军和第四期整训，也看不出有积极的企图。在新旧正月前后，几乎连游击行动也未出现。

二、蒋系军的情况

(一)对敌军企图的判断

敌判断我军目前不会进攻，一方面以一部在我后方进行游击及特务活动，另方面则专心致力于整训军队及对付共军，看不出有积极的企图。估计目前此种被动的持久形势仍将持续下去。

有情报称，蒋系军计划将于今春 3、4 月间进行反攻。但军方目前尚未见到此等征兆。然而不能断定，敌人在第四期整训结束时，是否会乘国际形势的微妙变化之机进行惯例的反攻。因此，必须密切注意作好侦察。

(二)教育训练情况

以蒋介石为首的各个将领，对教育训练极为重视，现正努力

研究}-}.实战为墓础的战法和提高千部的能力。

自去年 6、7 月开始的第三期整训，到 IU 月末结束。自今年

I 月开始顶定四个月的第四明整训正在进行中，特别集中力量对

千部进行教育。

另外，致力于游击战和特务工作。为了扰乱我占据地区，止

在组织和训练专门的部队。

(三)各个战区敌军的主要动向

第八战区

绥远方面，因物资缺乏补给困难的情况已表面化，逃跑者不断发生。另外，虽有便衣欲潜入我占据地区内部，但由于我方采取严密的警戒，未能发挥实际效果。

陕西省方面，实质上全被胡宗南掌握，一般说来，战斗力及战斗意志相当充实。目前，一方面以主力对付陕甘宁边区的共军，另一方面担负着对阎锡山督战的任务。

第二战区

阎锡山的山西军仍无积极的战斗意志，以南部的第三十四、八十三军的一部勉强进行游击活动。最近虽重新将独立旅改编为师，但实质上战斗力并未提高。其所以改编为师，想是重庆政府要使山西军中央化的一种措施，

晋南方面的中央军，目前因整训关系，不致有较大的积极行动。

第一战区

因我第十一军在豫南作战中的进展及汤恩伯军的败退，卫立煌把黄河河防部队及整训中的各军集结于新郑、临汝地区，准备反攻，并由晋南调来一部分兵力。看其行动甚是不稳。

冀察战区

任命卫立煌兼任第三十九集团军总司令，高树勋为副总司令，以此加强中央的统治。

鲁苏战区

韩德勤在与新四军作战后，由江苏省主席转任军事委员会参议，任命王懋功为新的战区副司令。此外，江南的第六十三师转移到江北编入第八十九军。

三、共军的情况

(一)我军扫荡作战的影响

由于去秋以来连续扫荡作战，特别是毁灭根据地的作战，物质上、精神上均给共军以极大打击。共军蛰伏于残存地盘之内，埋头于恢复战斗力及重建根据地工作。然而，由于急剧扩军，素质下降，战士逃跑现象增加，且因物资缺乏，加深了对民众的榨取。加以我军讨伐带来的战祸，造成匪区民众穷困，出现军民背离的倾向。察南大庙上附近农民袭击共产系县政府的事件，即其一例。彭德怀说，以游击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作为本年度的中心课题，其急于实现自给自足的情势，已由此间稍息得到证实。总之，共军本身内在的弱点业已逐渐暴露出来。

(二)各个地区的主要动向

晋西北贺龙集团

1940年1月初，在晋西北地区内设置了新军区。在贺龙的领导下，统一了山西新军及决死纵队，拟建设党政军一体的巩固地盘。但是，我军在山西西部作战中，扫荡了敌在兴县一带的根据地。在此次作战中，敌人很快退到陕西境内，虽强令民众“空室清野”进行逃避，但因我军驻在根据地附近反复进行扫荡，民众见共军只是宣传，并无保护民众的事实。于是靠近日本的倾向有所抬头。在1月下旬，一二0师正规部队的连长率兵前来投降，这是少有的现象。

晋察冀边区的聂荣臻集团

冀察省境地区山地内的共军，目前正在努力补充损耗、恢复战斗力及重建被毁灭的根据地设施，虽不致有大的积极行动，但有逐渐北上的征兆。盘踞在满华国境一带的李云长冀东军区部队，活动渐趋积极。冀中地区吕正操的一部分，从12月下旬有向冀南地区方面南下的模样。

晋东南及冀南地区的刘伯承集团

遭我晋中作战打击的一二九师主力，正逐渐在辽县东南及南面的晋冀豫地区集结中，有的情报说是企图东进，有的说是要攻击重庆军的第二十四集团军(军长庞炳勋)。但是，究竟是何企图尚不明确。此外，据传冀南各部队正向苏北方面移动，不知真假。在鲁西的杨勇、肖华等部队正在攻击濮阳一带的重庆第三十九集团军，看来是要占石友三的地盘，也许是故意扬言以隐匿企图，也许是为了对付卫立煌、汤恩伯的剿共部署，而令一部分部队向苏豫皖省境一带移动，以便与苏北方面保持联系。

山东方面的徐向前集团

第一一五师及山东纵队整军业已结束，前者改编为六个教导旅，后者改编为五个旅。最近泰山山脉的共军在费县以北地区集结，可能有某种新的企图。山东省南部的郯城一带约有一个旅似正向苏北南下。

苏皖地区

在苏北方面，第十八集团军的一部分(一一五师的第三四四旅)与新四军取得联系，企图以主力共同盘踞于淮安以东地区，并巩固其地盘，目前尚无向北面移动的征兆。

盘踞皖北地区宿县以西的第四纵队，随着我“五号作战”(骑兵第四旅团的豫南作战)的进展，似有扩大地盘的意图。

陕甘宁边区

陕西省内的共军，号称约四万人，其主力正与包围他们的蒋系军相对抗。绥远省伊盟

地区似有很多工作人员潜入进行工作，但尚未见有大部队北上。

占领地区内的治安，由于 1940 年秋的肃正工作而得到空前的提高。但是，离主要城市及交通沿线越远的地区治安越坏，特别是冀中、冀南接近敌区地带，仍在袭击日军警备队，不断破坏交通及电话线。此外，最近随着共产势力的东进，在冀东的蓟县、遵化以及山东的胶济沿线，扰乱治安的现象非常显著。

在城市里的恐怖事件，与 1940 年夏以前相比大见减少。但至 1940 年 11 月底，竟发生了方面军的参谋在北京市内白天被暗杀的事件，使方面军首脑们受到很大冲击。这是后来加强对重庆方面的特务及中共方面秘密工作进行检举和肃清的主要原因。

上述暗杀事件的经过如下，

(根据北京卫戍司令官—独立混成第十五旅团长—长谷川美代次少将的笔记)

11 月 29 日午前 9 时 30 分，方面军参谋高月保中佐和乘兼悦郎中佐二人，从中央饭店骑马上班，行至军司令部以西约 300 米处，遭到骑自行车的中国人用手枪射击，高月中佐背部中弹落马，送至医院即行身死。乘兼中佐虽非重伤，但也身中了两弹住院治疗。凶手可能是二人，身穿便衣，骑无牌号自行车很快逃走。根据方面军的命令，自本日起撤掉汽车上带有军官阶级的标旗。

笔者注：事后，旅团长统一指挥由其它兵团紧急派来的部队，加强对各城门的警备及对自来水、电线的保护，采取了特别警备措施。并协助宪兵进行盘问、搜查。另外，自 12 月 5 日在北京城墙的缺口处(31 处)安装了电网。直到年底将凶手及其同伙全部检举后，于 1941 年 1 月 15 日解除特别警备。

第四章 1941年度的治安战

一 指导对华长期战的各项措施

对华长期作战指导计划

大本营陆军部在制订“中国事变处理纲要”之前，便从战略、政治策略、思想战等各方面，根据其草案探讨了对华长期战的具体指导方针。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使人感到在兵源仍然窘迫的形势下，被拖入持久战的危险日益迫近。

然而，如何应付势必到来的长期战，这是过去一直多方考虑的问题。如前所述，在陆军省部方面鉴于在华日军兵力递减，为使国力和军备保有余裕以应付长期战，修改了以前的“修正军备充实计划”，由1940年7月提出“更改军备充实计划”。对在华兵力定额作出如下规定，并内部商定了兵力的分配。

1940年度平均77万(年初85万、11月下旬72.8万)

1941年度平均65万(预定华北25万、华中30万、华南10万)

1942年度平均55万(预定华北25万、华中15万、华南15万)

1943年度平均50万

联系上述兵力递减情况，曾经研究了在任何局势下也应固守的地区和适应局势变化可以撤出的地区。

1940年11月14日，参谋总长对中国派遣军传达御前会议决定的“中国事变处理纲要”，同时，指示根据本纲要做出具体研究。11月28日，中国派遣军第一课高级参谋真田穰一郎大佐进京，就一般局势和今后的方针汇报如下:

一、据观察，一年来，我军政治策略、战略之各项措施颇有成效。估计敌方战斗力也已消耗二、三成左右，但敌方士气仍很旺盛。

二，在我军配备方面，目前军、师团的后备兵力甚为薄弱，缺乏余裕。兵力配备不齐，给作战造成极大障碍。正在扶植的新国民政府武装力量，有正规军队约15万和数量大致相等的警察部队,预计今后2年将各扩充为大约1.5倍。

三、我军在华兵力状况

华北25万

华中29.6万

其中第11军21.8万，第13军7.8万

华南16.6万

定员外约1.6万

计72.8万

空军是华北8个中队、华中6个中队、华南6个中队，共计20个中队。

四、占领区的治安现状，按优劣顺序为：蒙疆、三角地带、武汉地区、华北，而以华北最差。

五、占领区将按下述要领进行治安肃正。

1941年度巩固华北。为此，派遣军由华中抽调两个师团增援华北，以期彻底整顿治安。在武汉则对江南地区进行收缩性的整顿。

1942年度设法肃正襄西地区及三角地带。1943年度彻底肃正占领区内部。

情况许可时，打通京汉线以沟通华北、华中，但这似乎要待1944年以后方可实现。

参谋本部也逐渐露出一种倾向：认为应趁削减兵力计划实施之前，全力以赴进行一战。当时的第二课高级部员服部卓四郎中佐(后升大佐)曾有如下回忆:

总之，对华作战已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不过由于在华兵力必须于1941年内缩减到平均65万，因此，考虑世界局势，乘目前仍保有72万的兵力，先施加一次压力，打好基础。待1941年夏秋之后仍不见转机时，便只有收缩兵力转入持久体势。

这种见解就是只采用武力战，而把持久战的战略转移推迟到1941年夏秋季之后。这并不是“中国事变处理纲要”的基本精神，但在纲要的“要领事项”中，把向长期战转移的时机规定为“结合指导全面局势的适当时机……”，因而带有灵活性。

如是，对华作战的指导思想逐渐成熟，12月26日，东条陆军大臣与杉山参谋总长会谈，确定了以下的基本方针。

一、必须使“中国事变”尽快获得解决。为此不仅要考虑南方，尚需确立以中国和北方问题为主的方针。

既要继续对重庆施加军事压力，又须着眼于经济压力—即加强全面封锁。此外，治安肃正是解决事变的必要条件，故须特别注意加强扶植汪政权的武装力量。

二、近来对解决事变问题，有偏重政治谋略的倾向，但无甚效果。今后极需集中情力于直接有助于解决事变的政治谋略及作战谋略上。

三、当前，对华作战纲要的内容是，彻底肃正华北治安、空军进攻作战、对华集中作战谋略、加强封锁以及扶植中国武装的治安警察力量。

1941年1月16日，大本营陆军部对上述设想加以具体化，制订“对华长期作战指导计划”如下:

对华长期作战指导计划(要点)

一、直到1941年秋为止，应毫不松懈地继续对华施加压力，在此期间，竭尽一切手段，尤其利用国际局势变化，谋求“中国事变”得到定局(第一期)。

1941年秋后转入长期持久态势，并在数年后确立在华50万兵力体制(第二期)。

二、作战目的是以维持治安、肃正占领区为主，不要进行大规模进攻作战。必要时可发动速战速决的奇袭战，但以返回原驻地、不扩大占领区为原则。

三、在第一期夏秋之际，发挥综合作战能力，给敌以重大压力，谋求事变得到定局。

但要考虑欧洲战局的变迁和国际政局的演变(调整日苏邦交等)，妥善调整政治和军事的策略。

四、继续抓紧利用空军进攻作战的威慑作用，并开辟其它作战途径。

五、在此期间设法加强陆地、海面及空中封锁。

同时切断法属印度支那运输线、骚扰滇缅公路，以海军封锁海面、以陆军进行封锁海港的作战等，加强对华经济压力。

六、充分灵活运用目的在于对华施加压为的政治谋略。

七、政务领导工作要符合“中国事变处理纲要”精神，特别要为充实帝国国力、加强国防贡献力量。

八、改革体制及其它种种制度，以求适应长期战方略。

在此之前，中国派遣军于1月13日汇报了根据陆军中央部“对华长期战指导计划”(草案)编制的下述计划:

一、1941年度按照现行作战任务，大致确保现有占领区。特别要在夏秋之际，发挥综合作战威力，对敌施加重大压力。在华北要歼灭山西南部中央军。

二、在夏秋之际，最大限度地发挥空军进攻作战的威力。

三、在整个作战期间，加强对陆地及海面封锁。特别是以上海、天津及汉口为重点，严禁流入、流出。

四、根据“中国事变处理纲要”制订政治策略方针。在占领区内特别设定对敌隔离区。

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当时的意图是，无论是为顺应中央部的意旨一要在1941年内掌握解决事变的头绪，还是考虑明年以后的国际局势，都必须于本年内在歼灭敌人有生力量方面取得显著成果。

二 1941年初期华北方面军的肃正建设

方面军1941年度肃正建设计划

方面军于2月25、26两日召开了管内参谋长联席会议，传达了新年度的肃正建设计划。

这一计划的基本精神为:鉴于国内外的形势和方面军的任务，在1941年度，应使作战及肃正建设等项工作更加积极开展。此项计划具体推进时，在时间和地区方面也要使重点集中，从而尽快地在全中国，首先在华北促进中国事变的解决，以适应国际局势的转变，重新调整我国体势。据此，本计划强调了重点集中和力量统一。

本计划的指导方针如下:

方面军历来以治安第一为行动措施的指导方针。在1941年仍应沿袭执行，且应更加彻底地进行肃正工作，迅速恢复治安，安定民生，促进重要国防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提高我军的独立生存能力，以此体现日、华紧密合作地区的楷模。

至于实现此等行动措施的具体手段，应确定明确目标，而后有机地统一行动措施，矛头集中指向同一目标。由于事属紧急，必须使一切行动措施，能有重点地和统一地发挥日、华、军、官、民的总体力量。

方面军鉴于当前的形势，为了使各项行动措施迅速而有效地向前推进，最为重要的问题在于一切行动坚持重点集中和力量统一。

方面军认为，华北治安肃正工作至今未能满意的根源，在于共军对群众的地下工作正在不断深入扩大。因此，决定以对共施策为重点，积极具体地开展各项工作，并且努力尽快恢复治安。虽然按照事变转入长期持久战的指导思想制订的长期肃正建设计划，迄今尚在研究之中，而“迅速恢复治安”分阶段的目标也不明确，但是，在1941年度要彻底进行正式的剿共治安战。已经成为空前未有的大事。

做为这一判断根据的敌情和治安状况，方面军对之做了如下的观察:

一、方面军面临的敌情

根据方面军的判断，蒋介石在今春 4、5 月间，照例企图进行局部反攻。但此次将与过去不同，不仅限定目标，而且事先做了周密的准备训练，以期取得实效。对此，我军有注意的必要。

共军由于受到我多次讨伐以及国共相争等原因，其军事行动曾一度似趋消极。但实际上，一方面是要极力避免因全面武装斗争而造成实力消耗，以期保存和扩大自己的兵力，另一方面则是企图以军、政、党一体的有机活动，在军事以外的政治、经济、思想等各部门积极开展工作，以扩大发展党的势力。因而在我占领地区，以及蒋系实力薄弱地区，对群众的地下工作日趋活跃，且其工作效果扩大到更广泛的地区，从质的方面来看，其深度确是在不断提高。尽管蒋系军队一直处于颓势，但华北的治安肃正工作并未收到顶期的效果，其根本原因即在于此。

据此，方面军将工作重点置于对共施策上，进一步针对实际情况，予以加强。

二、治安状况

华北的恢复治安和建设工作，逐渐走上稳步提高的途径。其原因：由于去夏以来，随着各兵团实施更加积极的措施和讨伐，以及对共军内幕和各项工作的真相逐渐了解，从而促使我军的肃正建设措施更加具体化，并增加了分析、思考的深度。

从作战方面来看我军实施的措施，诸如：烧毁根据地的设施；采取居坐战术(“蘑菇”战术之意一译者)、噙付战术(咬住不放的战术一译者)，或夜间和拂晓前突然袭击等战术；最近还有由特种突击队编成的以敌方指挥官为目标的兵团；或利用壕沟划定敌我势力范围的方法向外扩展；以及加强经济封锁等，不断出现努力创新的迹象。再以铁路事故为例：在 1939 年度，每运转 1,000 辆列车中，按比例就有两辆被破坏。至 1940 年度减低到 1.8 辆。这是从统计数字中所显示的治安逐渐恢复的一例。但是可想而知，敌军现正收敛锋芒，养精蓄锐，努力推进地下工作。因此，仅据上述情况，不能认为华北治安已有进展。今后必须-百倍提高警惕，加强戒备，积极具体地做好各项工作，以期尽快巩固治安。

在根据上述观察和方针制订的 1941 年度肃正建设计划中，特别强调的重点事项如下。

1941 年在肃正建设上的重点事项

一、关于行动措施的重点集中问题

肃正的重点，仍然在于剿共。全部措施均指向示范地区，特别是华北北部及重要国防资源所在地区，以便尽快体现成果。

在采取措施时，必须统筹军、官、民的总体力量，并将其集中于重要地点，而本年度尤须注意引导华方机关使之主动、积极地进行工作，进而使之在协力治安工作的同时，并促进农村自治自卫工作全面稳步地开展，领导他们自动地为剿共工作做出贡献。

二、关于剿共问题

由于对共军的外貌已逐渐认清，今后将能准确地掌握其实质，只要采取可靠的行动措施，尽快将其剿灭的时期可望到来。

剿共一事，仅靠武力进行讨伐，不能取得成效。必须以积极顽强的努力和统一发挥军、政、民的力量，摧毁破坏敌的组织力量和争取群众为重点。对此，方面军深有体验。

此外，尚应进一步加深对共产党(军)的研究，掌握其真相，避其所长，攻其所短，将一切努力和行动措施集中于此，以期尽快剿灭之。

三、关于作战问题

利用此次增加兵力的机会，方面军对驻于晋南地区的中央军尽量以大的兵力进行作战。除计划扫清黄河以北敌军外，主要应对共军根据地进行歼灭战。此外，各兵团在各该作战地区内应一如既往积极进行肃正讨伐工作。至于新增派的兵力，准备在将来主要部署于华北北部地区。

四、关于分散部署兵力问题

为了使分散部署兵力起到进攻据点和治安支撑点的作用，如果从部署的目的及治安的实际情况等出发，对现状仔细加以研究，则可看到有更加集中的可能和必要。固然治安现状在各地千差万别，一律集中，确有困难，但仔细领会本年度方针指示的“行动措施应重点集中”的精神，充分利用交通、通信网及中国方面武装团体的装备，并结合加强自卫团等，可将小兵力的分散部署逐渐加以集中，使其掌握具有灵活性的战斗力。因此，应考虑进一步厉行这方面的教育训练，并加强领导。

五、关于对中国方面行政机关的指导问题

为使我军以治安第一为基础的各项措施，形成中国方面行政机关全力协助的重点，必须尽量渗透政治力量。

以上，虽是一向应特加注意的问题，但仍有轻视中国方面的行政机关、使之软弱无力的倾向。如此，不但与我基本国策背道而驰，同时亦不符合通过精心哺育，使其协助我军巩固治安的本意。据此，在本年度内，应努力做到，大力培养中国方面行政机关，授以应有的实权，使其自觉认清巩固治安的职责，以发挥其行动的积极性。

近期以来，诸如华方独自建立各种防共机关，以及即将参加 3 月 30 日开始的华北全区域的治安强化运动，凡此等等，都使人想到: 我军以前的措施已逐步产生效果。

对这些机关，应给以实权和责任，避免不必要的干涉。应经常由大处、高处加以监督指导，特别是对其长官尤应注意，力戒无谓的掣肘。我军只应明确指出应达到的目标，对实施方法的细节，则任其自理。

对职员中素质不良、工作不力，甚至近乎消极抗日的不良分子，应予淘汰，代之以由新民学院，新民会、中央训练所等培养和再教育出来的少壮官吏，使之铲除陋习，主动做好工作。

六、关于治安军问题

在 1941 年度内，应使治安军的主力逐渐向冀东道方面集结，使其达到能不依靠日军、独立承担确保该地区治安的任务。

以上计划，对促进治安军的实力，提高其它警备机构的能力，减轻我军负担并最后替代我军，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我军尚应继续领导，并极力防止治安军与其它机关发生摩擦。同时，在问题的处理上，力求做到稳妥圆满，从而使其真正能成为政府的绥靖部队，做出应有的贡献。

七、关于促进农村自治自卫的问题

实现政治力量的渗透，绝非短期所能奏效。因此，乡村不能坐待自上而下的行政渗透，而必须自力更生进行建设。尤其是稳步推动乡村自卫工作。

为了尽快地恢复占领地区的治安，在争取农村民众的同时，必须加强领导，不使成为共产势力的温床。相反进而使之主动驱逐共产势力，则是极为重要的。鉴于农村自治自卫是中国固有的民族政治特色，因而，以此做为措施的中心，使其自发地掀起自治活动，这是巩固治安的第一步。为达到自治的目的，必须加强自卫组织。要改变过去的方针，逐步加强自卫团的武装力量，使农村依靠自己的力量驱逐共军，为恢复治安做出贡献，奠定安居乐业的基础，从而促进自治。

八、关于示范地区工作问题

关于示范地区的工作，本年度的目标，是将各地区原来的任务，进一步加以检查研究，而后竭尽全力使之在本年内贯彻实现。

本来，指导示范地区的目标，在于高度发挥各该地区有关治安，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综合工作效果。从而，显示模范的新秩序的姿态，逐步向外地普及、推广。但鉴于各个地区的不同情况，应使其各自采取与其本来任务相适应的措施。例如被指定为以开发重要国防资源为目标的示范地区，则应杜绝因治安不良而不能完成任务的情况发生。

九、关于新民会问题

应使新民会进一步将矛头指向剿共工作。

共党的地下势力是华北建设的主要敌人，使用新民会所组织的斗争力量与其对抗最为适当，但必须尽快加强其工作内容。同时，逐步由县城走向农村推进工作，使之对共党势力采取攻势。为此，在扩大对新民会本身的基层组织同时，积极促进和扩大乡村自治自卫组织，并与民众打成一片，形成以新民会地方分会为核心，依靠其斗争力量及组织力量，驱除共党势力。

再者，华北的民众团体，在以新民会为主的原则下，应使中国青年党或劳工基层组织、爱路组织，在其工作方面避免与新民会发生摩擦，以便逐步达到统一的指导方针。

十、关于经济建设问题

为彻底开发利用国防资源，并使之适应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首先应以提高占领地区人民生活、安定民心为当务之急，应明确认识到，在民心背离的情况下，所从事的各项建设或国防资源开发利用等工作，都不能取得预期成果。因此，方面军在经济建设上，应一方面力求稳定民生，一方面充分开发利用重要国防资源，提高我军独立生存能力。并且要妥善安排两者之间的有机配合，以达到增加生产、流通物资为重点的施策方针。

重点地区，仍为示范地区。在进行具体指导时，应一如既往，尽量任用华人和努力吸收当地资金。近来，当地资金逐渐出现，对此须注意推动。

十一、关干加强经济封锁问题

对于所在地的敌区和匪区，虽早已实施经济封锁，但由于有关计划及相互间的联系等未臻完善，迄今收效不大。为了取得封锁的实效，需要采取更高度的统制措施。近日内，方面军即将制订相应的大纲，下达指示。

十二、关于我军就地自给问题

方面军考虑到可能就地筹办的军需物资的质量、价恰、补充数量以及预算等问题，确定主要对与被服、粮秣有关的各类物品，及部分武器、医疗器材、建筑材料实行就地筹办。部分武器材料亦可就地维修，并应利用当地装卸力量，以保持、增强我军的战斗力和机动力。对间接的经费，在可能范围内，考虑用华方预算加以解决。上述我军就地自给问题，随着治安的稳定，生活的改善，经济和生产的发展以及粮食、金融、通货各项政策的具体化，正处于逐年提高的过程。

在本年度内，方面军应致力于沟通日、满、华的军需实际情况，并调整各军需产业之间的关系。此外，考虑到准备应付更大的非常时局，要在提高民生的同时，利用培养当地人力、物力资源，以进一步扩大我军就地自给能力，并要厉行节约、降低消费、撙节军费开支，以保持和提高我军的战斗力和机动力。

关于部队的教育训练及其它各项措施如下:

一、部队的教育训练

方面军为使治安建设取得更大成果，在各项施策中必须以皇军的精锐强大为主。集于战局的长期化及高度分散部署兵力的现况，应特别注意整饬军纪，提高士气，加强训练。为此，必须彻底贯彻领导者以身作则的精神教育，并经常监督指导，特别要严格执行信赏

必罚及干部教育的方针，以提高部队战斗力。有关细节，统以“1941年度关于教育的指示”为准则。在方面军所进行的特别教育中，对于炮兵、工兵军官，应充实方面军炮兵、工兵训练队的定期教育、实施临时的军官以下的集中教育及巡回教育。关于对步兵军官编成训练队问题，应做好准备工作，尽快促其实现。在考虑筹办干部候补生队，及整顿充实各下级士官候补生队，特别在提高教官、助教的师资质量的同时，应排除万难，根据中央的规划积极实施学校教育、选拔合格人才，分别派遣学习，并使其在学完归还后从事普及教育工作。

二、关于提高部队效率及兵员保健的对策

关于通过一系列措施，破除陈规旧习，创造性地提高部队效率的问题，虽一向为我军极端重视，但其实际效果，仍不够理想，不能适应战时、战地的实际情况。对此必须竭尽全力彻底加以改进。

提高部队效率的重点，在于铲除实行治安第一的障碍，并以“挖空心思”、“深刻思考”、“反复分析”等刷新思想为基础，以期尽快取得成果。

我军的卫生状况，与1939年相比，1940年度战争病员或送回国内治疗人数，均约激减了三成。但是，为使部队更加精锐，必须进一步提高其体质。因此，队长以下各级干部，必须提高对兵员保健工作的认识和关心。应以热情亲切的态度，特别是以骨肉至亲的心情从事此项工作，并努力采取与部队实际情况相适应的切实可行的有效措施。但应特别加强领导，切勿陷于保育第一，有失养成强健兵员的原则，并应注意不使产生作战军要求执行任务的障碍。

冀东作战与冀中北部作战

方面军根据年度计划，由5月末至6月中旬之间，首先开展了冀东作战(5月29日—7月21日)，继而由6月6日—7月10日间又开展了冀中北部作战，收到对冀热边界地区及白洋淀附近共军彻底扫荡的成果。

冀东作战(冀号作战)

冀东地区居民，历来受满洲和中国两方的影响，强烈的亲日和反日感情相互交织。在职业方面，以务农为主，但由于地处长城线山岳地区附近，多属荒地，农民生活艰苦，而天津市周围的居民，则依靠当地的经济力，唐山附近的居民，则依据开滦煤矿等为生。本地区是中共冀察热边区根据地。1938年春季，中共第四纵队进入该地区开展游击战，同年秋。由于日、满军的讨伐，其建立根据地的计划受到挫折。1940年春成立了晋察冀边区冀东军区。该军区在司令李云昌(副司令包森)之下，由第十团(团长陈群)、第十二团(团长包森)、第十三团(团长单德贵)等组成。兵力约2,000名。”此外，估计尚有特务团、政治工作人员约200名，独立游击队200名。党组织在冀东区党委员会之下，设有东部地区党委员会，唐山市区党委员会，天津特别市党务执行委员会，但对其所在地党的干部姓名以及基层组织等均不得知。同时，做为行政机构，在遵化县还成立了晋察冀边区第十三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但其细节不详。另外，在晋察热交界地区，设有以肖克为司令的平西军区，行动异常活跃。

在该地区的剿共战，一向与关东军协作，多次进行共同作战。迸入1941年后，由2月23日至3月8日间，关东军在热河部队与独立混成第十五旅团协同进行了“蓟平密(蓟县、平谷、密云)肃正作战”(“ホ”号作战)。又从4月1日至同月末止，在盘山地区进行了作战。由这一时期起，共军经常有便衣进行

活动，从而增加了对地下工作人员的剔抉、扫荡的困难，所谓“剔抉剿灭”一语，也从此在我军内部开始使用。

冀东作战，系由第二十七师团及独立混成第十五旅团的各主力和关东军独立守备步兵第一、第七、第九、第十六、第二十七大队参加，治安军〔华北政务委员会的部队〕也出动了部分兵力。5 月 29 日对盘山地区根据地，由四面进行了围攻。随后，急追分散退却的敌军部队，并努力挖出化装便衣的敌人。敌逐渐向西北方面移动，逃窜到满洲国的山岳地带。此次作战，至 7 月 21 日大体完成。独立混成第十五旅团长长谷川美代次少将(后升中将)对此次作战曾有亲笔记录如下:

一、5 月 3 日，冀东作战预定由 5 月 20 日开始，为期 30 天。但由于第二十七师团的某种原因，推迟了开始日期。

二、不采取以大部队同时进攻的方式，代之以包围根据地，在包围圈内剔决搜捕地下工作人员及便衣共军的方法。

三、努力挖出敌军隐藏的武器，取得了较大成果。

四、盘山的共军，改穿便衣，与家属一起逃走。

五，敌部队四散后。我军划分地区，分别驻兵，进行扫荡。

六、7 月 4 日有 59 名治安军士兵逃亡。

七、进入 7 月青纱帐起，行动困难。

八、7 月 18 日召开了有关强化治安的联席会议。会上要求各县密切协作，做好进行讨伐及治安工作。参加会议的有各县长、县联络员、警察局长、新民会的政治工作人员等。

曾任第二十七师团参谋的大村荣中佐对此回忆如下:

第二十七师团于 1941 年 10、11 月间，进行了玉田、遵化地区的讨伐作战(“ホ”号作战)，在两次的冀东作战中，对共侦察及剔抉工作均不彻底。虽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那是由于中共方面的地下工作不够健全，以及我第二十七师团由中国驻屯军时代开始，就驻扎于此，对作战地区情况深为熟悉之故。

冀中北部作战(冀北作战，新号作战)

在方面军的指导下。由第一一 0 师团主力及第二十一、第二十七师团、独立混成第十五旅团的各一部参加。对敌第十军分区(司令朱占魁)根据地的白洋淀以北地区进行了肃正作战。

我作战部队，6 月 10 日开始行动，逐步压缩四周的封锁线。6 月中旬消灭了新城附近朱占魁的据点，取得了极大战果。

注:朱占魁，以后于 11 月 27 日在大李各庄(保定南方约 30 公里)被我第一一 0 师团步兵第一六三联队俘获。

第一次治安强化运动的展开

(3 月 30 日—4 月 3 日)

以“保卫华北”为重任的华北政务委员会，藉该委员会成立一周年纪念日

的时机，主动加强华北治安工作，由3月30日开始，以五天时间，对全华北的军、政、会各机关及全体民众，进行总动员，展开了大规模的“治安强化民众运动”。为此，王揖唐委员长于20日发出布告，强调指出：“没有巩固的治安，就谈不到安居乐业，我全体军、官，民，应同心同德、不能只依靠友军的力量，而应积极主动地作好治安工作，通过自己的努力，将华北建设成为幸福的乐土。”同时，并对实施目标做了如下的指示:

1.培养和加强区、乡、村的自治自卫力量;

2.加强扩大民众组织;

3.剿灭扰乱治安分子。

王委员长于3月30纪念日的当天，就确立华北自力防卫体制的必要性做了说明，要求大力开展治安强化运动。

中国方面，以自己的职责，主动积极地开展治安强化运动，是前所未有，值得注目的事清。此种运动、以后相继举行了第二次(7—9月)；第三次(11—12月)；第四次(1942年3—6月)；第五次(10月)，在肃正治安上取得极大的成果。

另一方面，我华北方面军也与中国方面紧密联系，为支援此一运动的全面展开，制订了如下计划:

“治安强化运动”实施计划

1941年2月15日华北方面军参谋部第四课

第一、实施方针

一、利用3月30日华北政务委员会成立一周年时机，使华北全体官民在建设新生华北的感召下，积极主动地从事强化治安工作，并要达到下列目的:

1.务使认清确立治安一事，中国官民的职责，比日军更为重大。这是导致安居乐业的首要条件，从而使其积极加强村镇自治自卫工作。

2.加强华北政务委员会的政治统治力量，以期扩大华北政务机关的政治统治范围。

3.宣传华北全体官民在纪念新生华北的感召下，一致奋起，主动、积极地从事强化治安工作，以摧毁敌占区和亲敌地区人民的斗志，促进亲敌的第三国的反省。

二、本运动应长期坚持，并不断扩大成果。

第二、实施要领

一、华北政务委员会决定由3月30日到4月3日之间(为期五天)，开展治安强化运动，使军、政、会各机关及民众与各该地区的日军协作，从事强化治安工作。但上述运动，应根据各地不同情况，经与日军各部队协商，得延长或缩短。

二、军、政、会各地方机关，与各该地区的日军协商制订本运动的工作计划，但应考虑各地的情况，在军、政、会各机关及民众的有机配合下，融洽地进行各项工作。

三、各地日军，应按各该地区的现状指导中国方面，使其主动积极地对强化治安做出贡献。

四、工作内容，概以下述要项中适合当地实情者做为实施重点:

1.扩大，加强和训练自治自卫组织。(剔抉、破坏共产党组织；训练行政机关职员；扩大实行保甲制的地区；统一实行户口调查；扩充及训练自卫团；进行警备演习；传达情报，修筑道路、城墙、电线杆、壕沟、桥梁等。)

2.扩大、加强民众组织。(合作社的扩充和加强，扩充训练青、少年团，妇女会，劳工协会等。)

3.治安军、警备队等协助上述(1、2条)工作，单独或与日军协同进行讨伐及示威行军等。

4.普及宣传东亚新秩序的观念及日、满、华条约内容。(通过讲演、电影、图片、宣传画、广播、演剧及小册子等方式。)

第三、宣传实施要领

一、预备宣传

3月中旬，华北政务委员会公布实施“治安强化运动”，由王委员长，齐治安总署督办，林情报局长等作关于强化治安的必要性的广播。其内容，由同盟通信社、中华通讯社进行报道。

在进行以上工作的同时，张贴贯彻上述内容的“传单”和“宣传画”。

二、运动中的宣传

对中国军、官、民和日军协力，主动、积极从事治安工作的实况，由各地日、华新闻通讯记者、摄影班、电影班加以报道，并向第三国通讯社提供资料。

华北广播协会向管内及敌地区进行广播，并由地方各电台作为本地新闻进行广播。

三、事后宣传

根据各地日军的报告，组织本运动的综合战绩材料，由华北政务委员会公布。

玉委员长以广播形式对本运动的成绩加以总结，并提出继续向强化治安迈进的要求。

参谋长或军报道部长广播感想。

(以上向中国全国转播并对敌区广播)

除令武德报社发行图片特辑号外，并利用兴亚照片厅进行宣传。

今华北电影公司向各电影院提供新闻影片，此外，我军也购进影片，在各地巡回放映。

根据方面军的观察，此次运动在全华北广大范围内蓬勃展开，收到预期的成果。应该看到，这是由日方在幕后暗中极力指挥下所促成的。这是以政务委员长为首的中国各界要人，率先活动了第一线，并在一元化的领导下开动所有的宣传、报道机器，唤起了广大民众的自觉和热情，从而展开了前所未见的军、政、会、民，同心合力的民众运动。

三 对华北地区共党实力的观察

方面军，早在1938年秋季即认定共党势力为华北治安之最大隐患。并为查明其实况，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但由于共方严格而巧妙的保密，使我在收集情报方面终于未能掌握其真相。以共军“百团大战”为契机，方面军上下，全力以赴采取措施，始逐渐取得一些成果。

方面军司令官，在1941年1月10日的兵团长集会上训示说:“在加深对共党及其工作调查研究的同时，具体地掌握其实质，从而制订出适合于当地实际情况的具体对策……必须以超越他们的热情和魄力，顽强进行作战和政治工作。”在1月27日方面军的情况报告中也提出:“我军应探明其组织和活动的根源所在，采取军政统一的措施，尽速将其剿灭”，力图促进调查研究工作。在4月10日的方面军情况报告中又提出:“由于逐渐掌握了共党及共军的真相，我军当前正以百倍信心采取措施、迅速将其剿灭的时机指日可待”。“我军基于过去的经验和研究，在采取避其所长，攻其所短的具体措施上，已有一定程度的自信”。这表明在调查研究方面已取得了进展。

在此期间;对调查研究作出贡献的机关，不止一、二处，中央灭共委员会调查部(通称黄城事务所)，即其中之一。黄城事务所做为方面军参谋部第二课的

外围组织逐步提高了它的性能，受到宪兵司令部的热情支援，扩大了调查研究的范围。在对共施策的建议、启蒙、宣传等方面(如发行《剿共指南》)颇为活跃。

值得注目的是，在当时参谋部第二课的业务分担表(表格从略—译者)中，新设了专职主管对共情报的参谋，说明治安情报活动日益受到重视。

注:《剿共指南》为1941年6月15日创刊的一种月刊。其目的是为了剿灭中共，首先应正确了解敌方各项工作，为我制订剿共对策，做出贡献。主要发给活跃在剿共第一线的部队及政治工作人员。(由各部队本部，特务机关，宪兵队，国策公司等掌握。)关于该刊的性质，编者在创刊号中作了如下说明:“华北民众之敌是中共、八路及抗日分子，如不将彼等消灭，就不会有华北治安的稳定，没有治安的稳定，就没有民众的安居。有了华北一亿老百姓的乐业，才能有华北新秩序。在未消灭共产党、八路军前，华北圣业则难奏效”;“对于擅长真假虚实，奸策权谋，谣言诡辩的共产党、八路军，必须具有明察秋毫看穿其用心的能力。从其地方工作的主要因素中，寻求中共大局的动向，综合前线地方的形势找出其全面的实质。”“近代的武装斗争，政治为主要的因素。在剿灭以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为进攻手段的八路军时，我方的武装斗争也必须具有高度的政治性。”

中国共产党组织系统概况

根据《剿共指南》，华北地区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系统概要如下。(以下按日文原著译出，未予校正—译者)

注:《剿共指南》编辑人员对本资料附有如下说明:

关于组织方面的保密工作，共方做得十分严密，特别是党组织较其它组织的保密程度更高。因此，要求材料完全可靠，殊属困难。本资料系以截至1941年8月期间的情报为基础加以编纂的。以后有所变动，在所难免。

一、中国共产党机关的机能(笔者略)

二、中共中央部(笔者略)

三、北方局

与事变前在中共中央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下的情况相同。其地点游动于山西省辽县(左权县，以下同—译者)、武乡、黎城及河南省的涉县(涉县属河北省—译者)等各县境间，与第十八集团军司令部共同行动。

书记 杨尚昆

组织部长 李雪峰(或刘锡五)

宣传部长 李大章

宣传委员 克寒(兼新华日报华北版主任)

军事部长 朱德(或彭德怀)

统战部长 杨尚昆

秘书长 李伯剑(杨尚昆之妻)

委员:朱德、陆定一、罗瑞卿、彭德怀、邓少萍、林祖涵、贺龙、聂荣臻、刘伯诚

(一)北方分局

由于华北党组织及其影响地区的扩大发展，根据1938年延安中共第六次扩大委员会

决议，于1939年初设置了北方分局。分局所在地点为河北省平山县，管辖区域为河北省的大部、山西省东北部，察哈尔省的南部。在设立北方分局的同时，并组织了晋察冀北嶽区党委员会(原名晋察冀边区党委员会，1941年改称北嶽区)，冀中区党委员会，平西区党委员会，冀东区党委员会等。

书记长 彭真
秘书长 姚伊林
机要科长 周亮
组织部长 刘仁
干部科长 张瑞华
社会部长 徐建国
军事部长 聂荣臻
统一战线部长(书记兼任)
晋察冀北嶽区党委员会(在平山县)
书记 刘澜涛
组织部长 赵振声
民运部长 林铁
社会部长 李博
第一地区党委员会(在涞源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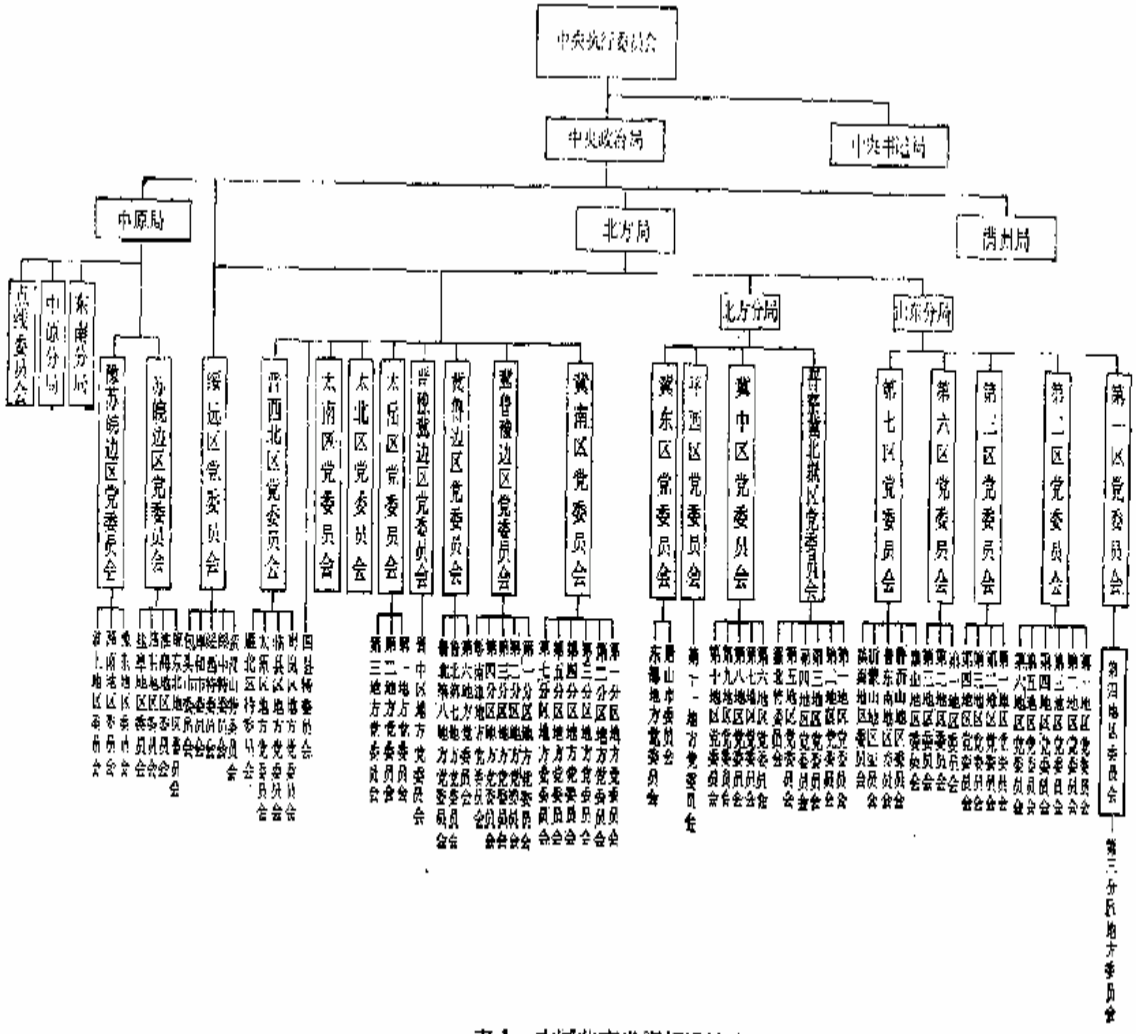


表1·中国共产党组织系统表

书记不详
管辖县 龙华、徐水、蔚县、易县、满城、涞源。
第二地区党委员会(在五台县)
书记 张连奎
管辖县 繁峙、代县、孟县、五台、寿阳、忻县、定襄、阳曲(太原)、崞县。
第三地区党委员会(在唐县)
书记 李广
管辖县 阜平、定北、唐县、望都、完县、曲阳。
第四地区党委员会(在平山县)
书记 栗再温
管辖县 灵寿、行唐、建屏、井陉、平山、平定。
第五地区党委员会(所在不详)
书记 李光汉
管辖县 浑源、灵邱、广灵、阳原、天镇、应县。
察北特别地区党委员会(在张北)
书记不详
管辖县 德化、多伦，商都、宝昌、集宁、张北。
冀中区党委员会(在安平县)
书记 黄敬
组织 刘亚林
宣传 周国舟
社会 张国坚
军事 黄奥义
第六地区党委员会(在束鹿县)
书记 张达时
管辖县 赵县、深南、束鹿、元氏、栾城。
第七地区党委员会(在安国县)
书记 孙明
管辖县 安国、无极、深泽、晋县、定南、藁城、新乐、安平、深北、正定。
第八地区党委员会(在饶阳县)
书记 罗玉川
管辖县 文安、饶阳、武强、河间、交河、献县、大城、献交、任河、青建国。
第九地区党委员会(在博野县)
书记 吴立人
管辖县 望都(南)、高阳、蠡县、清苑、博野、安新、肃宁、之光、徐水。
平西区党委员会(在房山县)
书记 马辉之
第十一地区党委员会(在新城县)
书记 马载
管辖县 固安、雄县、霸县，永清、安次、容城、定兴、新涿、宛平。
冀东区党委员会(所在不详)
书记不详
东部地方党委员会(所在不详)
书记 周文彬

管辖县 遵化、丰玉遵、迁遵兴、迁涞卢、昌滦乐。

唐山市区党委员会(所在不详)

书记不详

天津特别市党务执行委员会(所在不详)

书记不详

(二)山东分局

该分局与北方分局同时成立.首任书记为原山东纵队司令郭洪涛。1940 年郭氏转调延安，由原山东纵队政治委员朱瑞继任书记。山东分局为山东省党的最高机关，游动于山东省沂水、费县、蒙阴、临沂等各县境间，管辖陇海线以北江苏省、河南省及山东省全部地区(卫河以北为冀南区)。

(以下笔者略，以下各项的细节亦略去)

(三)冀鲁边区党委员会(在乐陵，于 1938 年 3 月组成)

(四)冀南区党委员会(在威县、于 1938 年 7 月组成)

(五)冀鲁豫边区党委员会(在清丰、于 1940 年 4 月成立)

本地区事变前即设有直属于河北、河南、山西各省委的党组织。事变后，于 1940 年 3 月下旬，原在山西省东南省境的第一一五师第二纵队东进至此，迫使丁树本部队南下后，即驻扎该地，纠集旧党员，于同年 4 月，成立本委员会。

(六)晋冀豫边区党委员会(在涉县)

1939 年 1 月间，撤销了原来的山西省委，重新组成本委员会。

(七)太岳区党委员会(所在不详)

(八)太北区党委员会(在榆社县)

(九)太南区党委员会(在平顺县)

(十)晋西北区党委员会(在兴县，约在 1940 年 2 月间组成)

(十一)绥远省委员会(又称:绥远区党委员会，在大青山。1938 年 9 月成立)

晋察冀边区政府的组织概况

根据“剿共指南”，中共晋察冀边区政府组织的概况如下:

晋察冀边区政府

以陕甘宁边区为根据地的红军，由于 1937 年的国共合作，利用参加抗日战线机会，打着“建立抗日根据池”的招牌，开始了致力于争取民众的工作。1937 年 12 月成立了晋察冀边区政府筹备委员会，为建立边区政府打下了基础。翌年，1938 年 1 月 10 日在阜平召开了军，政、民代表大会。成立了晋察冀边区政府，选出了宋邵文、胡仁奎、刘奠基、聂荣臻、张苏、孙志远、李杰庸、娄凝先、吕正操等九人的行政委员会，并决定以宋邵文为主任，胡仁奎为副主任。该政府管辖地区，包括山西东北部，察哈尔南部，河北北部、中部。下设行政机关，有行政主任公署一处，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十三处。

晋察冀边区政府:

主任 宋邵文

副主任 胡仁奎 秘书处长 刘奠基

民政处长(兼) 胡仁奎 财政处长(兼) 宋邵文

教育处长 刘奠基 实业处长 张苏

司法处长 王斐文 经济部长(兼) 胡仁奎

粮食总局长 邵式平 贸易总管理局长 胡仁奎

行政委员会委员

聂荣臻、吕正操、宋邵文、胡仁奎、娄凝先、孙志远、张苏、刘奠基、李杰庸。

附属机关:

防卫队、公安总局、晋察冀边区银行、贸易总管理局、粮食总局、印刷局、石印局、晋察冀日报、边区导报社、抗战工厂、警务训练班、税务训练班等。

冀中区行政主任公署(在安平县)

随着军区的发展，在吕正操的领导下，于 1938 年 3 月成立了冀中区行政主任公署，管辖第七，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一行政督察专员公署。

主任 吕正操

副主任 徐达本 副主任 李耕涛

秘书主任 吴砚农 财政科长 王焕如

民政科长 高持真 教育科长 王心田

实业科长 苏杰如 司法科长 张津田

视察主任 郑绍周

第一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在孟县)

专员 吕东

管辖县 五台、繁峙、代县、崞县、忻县(东)、定襄、孟县、平定(北)、寿阳(北)。

第二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在灵邱县)

专员 李涛

管辖县 灵邱、广灵、浑源、应县.

第三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在易县)

专员 陈一凡

管辖县 蔚县、涞源、徐水、满城、定兴、易县、龙华。

第四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在唐县)

专员 张冲

管辖县 完县，望都，唐县、定北、曲阳、阜平、新乐。

第五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在平山县)

专员 程宏毅

管辖县 正定、获鹿、井陉、建屏、平山、灵寿、行唐。

第六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在房山县)

专员 朱基文

管辖县 宛平、房良、涞涿、涞水、宣涿怀、昌宛。

第七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在安平县)

专员 英树声

管辖县 献县、饶阳、安平、武强。

第八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在定县)

专员 兰田

管辖县 晋北、晋南、晋深极、安国、深泽、宁北、束北、赵县、藁城、深南、藁无、束冀、栾城、定南、深北。

第九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所在不详)

专员 邱清哲

管辖县 大城、青县、河间、任邱、文安、建国。

第十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在安新县)

专员 张孟旭

管辖县 安新、新安、清苑、蠡县、博野、之光、高阳、肃宁。

第十一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所在不详)

专员 李凤林

管辖县 安次、永清、固安、霸县、雄县、容城、新涿、新城、定新。

(原书缺第十二一译者)

第十三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在遵化县)

专员 朱麒林

管辖县 蓟平密联合、迁遵兴联合、丰滦迁联合、平密兴联合、蓟玉宝联合、丰玉遵联合、昌滦乐联合、蓟玉三联合、遵化、迁滦卢、玉田。

第十四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所在不详)

专员 张李进

管辖县 龙赤、龙延怀、昌宛、丰滦崇、龙崇宣。

第十八集团军管下各军区概况

关于第十八集团军管下各军区的组织状况，在《剿共指南》中有如下的记载。

一、晋察冀边区军区

现以聂荣臻为司令，统辖冀西、冀中、平西、冀东等四个军区。

(一)冀西军区(1937 年 10 月成立)

1937 年 9 月在平型关对日作战中一败涂地的八路军，10 月以后，以一一五师的一部为中心，以聚集河北省北部的残兵败卒、保安队、自卫团等为基础，整编为抗日军，组成晋察冀边区部队，创设了该军区。到 11 月共成立了四个军分区。

军区司令 聂荣臻

政治部主任 舒同

晋察冀边区军 约 30,000 人

第一军分区

司令 杨成武

副司令 高鹏

政治部主任 罗元发

所属部队 第一、三、六、二十五、二十六、三十四团、游击第一、二，三支队。

管辖县 易县、涞水、涞源、定兴、徐水、蔚县、阳原、广灵、灵邱、浑源。

第二军分区

司令 郭天明

政委 赵尔卢

所属部队 第四、十九、二十六团、恃务团，(主力在五台县、一部分在平山县)

管辖县 五台、孟县、平定，寿阳(北)、定襄、代县、繁峙。

第三军分区

司令 黄永胜

副司令 詹才芳 政委 王平

所属部队 二十团、游击军第一、二、三支队。晋察冀边区游击军(第一、二、三支队，

特务大队)。

管辖县 阜平、曲阳、行唐、唐县、完县、满城、新乐。

第四军分区

司令 陈正湘 副司令 叶长庆(庚)

参谋长 王作藩 政委 刘道生(正)

所属部队 第五团、特务团、正新行灵游击支队，平井获游击支队、教导团。

管辖县 平山、获鹿、井陉、正定、灵寿。

第五军区

为了节省兵力和便于指挥作战，由本年 5 月划归第一军分区。

(二)冀中军区(成立于 1938 年 6 月)

事变爆发后不久，当时正在组织晋察冀边区的聂荣臻，派遣孙志远对残存于冀中安国县地区的吕正操部队进行改编，置于八路军指挥之下。于 1938 年 6 月，又将该部改组为十八集团军第三纵队，任命吕为司令，兼任冀中军区司令。

军区司令 吕正操:

副司令 孟庆山

参谋长 沙克

政委 程子华

第三纵队总兵力约 13,700 人。

第六军分区

司令 王长江

代理司令 张孙实

政委 曹复兆

所属部队 冀中警备旅(第一、二、三团)十六、二十一团。

管辖县 晋县、藁城、束鹿、栾城，赵县、宁晋、深县。

第七军分区

司令 于权臣

副司令 崔文宪

政洽部主任 饶同国

政委 吴某

所属部队 第十七、二十二、三十一团。

管辖县 定县，安国、安平、深泽、无极、深县。

第八军分区

司令 常德善

参谋长 王某

政委 李某

所属部队 二十三、三十团，抗日第三团。

管辖县 大城、青县、河间、献县、交河、饶阳、武强。

第九军分区

司令 刘子奇

副司令不洋

政委 魏洪亮

所属部队 第十八、二十四、三十三团(约 2,600 人)。

管辖县 安新、清苑、高阳，任邱，蠡县、博野、肃宁。

第十军分区

在此次冀北作战中，被击溃的朱占魁匪部，似南下，或向唐县方面败逃。

司令 朱占魁

参谋长 肃津槐

政委 帅荣

所属部队 第二十七、二十九、三十二团。

管辖县 新城、固安、永清、雄县、霸县、新镇、文安、容城、徐水。

回民支队

司令 马本(鸣)齐

参谋长 吴兆升

政委 郭陆顺

所属部队 三个大队

(三)平西军区(冀察热，成立于1938年12月)

1938年秋，以宋时轮为总司令的冀察热部队，由于受到日、满军彻底的讨伐，一时陷于被歼灭的境地。至12月，一二0师副师长肖克，组成了北上挺进军，纠集宋时轮、邓华部队，在平西、察南及热河省境，设立了临时军区，开展游击活动。

军区司令 肖克

参谋长 程世万

政委 伍晋南

所属部队 第六、七、八、九、十团。平北游击支队(龙门、赤城、延庆、昌平、怀来)，平西游击总队(以宛平县为中心进行游击)。

(四)冀东军区(成立于1938年4月)

自1938年春季以来，第四纵队以冀察热边区为根据地进入冀东展开游击战。同年秋，由于日、满军的讨伐，建立根据地的计划受到挫折。1940年春划归晋察冀边区，以李云昌为司令成立晋察冀边区冀东军区。在本年 6 月的讨伐中，摧毁其根据地，第十一支队长陈群战死。

军区司令 李云昌(又名李云长)

副司令 包森

第四纵队(现在是否尚用纵队名称，不详)

第十一团(团长不详)

第十二团(团长 包森)

第十三团(团长 单德贵)

二、晋冀鲁豫边区军区

现以刘伯承为司令，统辖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等四个军区

(五)太行军区(成立于1940年8月)

随着晋东南地区八路军势力范围的扩大，5月以后，设置了十八集团军直辖的太行军区司令部，将该地区划分为五个分区，同年8月编制完毕。

军区司令 刘伯承

政委 邓小平

政治部主任 蔡树藩

第一军分区

司令 秦继为

政委 郭一峰

政治部主任 杨堂永

所属部队 第十一旅(三十一团)
管辖县 元氏、赞皇、临城、内邱、顺德、沙河。
第二军分区
司令 范子侠
政委 赖隔发
所属部队 第十一旅(三十团)
管辖县 平定、昔阳、和顺、寿阳(南)、榆次、太谷、祁县。
第三军分区
司令政委不详
管辖县 辽县、榆社，平遥、介休、武乡、沁县、沁源、襄垣。
第四军分区
司令 石志寺
政委 杨某
所属部队 第十一旅(三十二团)
管辖县 襄垣、黎城、潞城、长治、壶关，平顺。
第五军分区
司令 友定钧
政委 鲁瑞林
所属部队 第十二旅(三十四团)
管辖县 武安、涉县、林县、邯郸(西)、磁县。
(六)太岳军区(1939 年秋成立)
太岳地区原为山西牺盟会的地盘，1939 年成立太岳军区，以背叛了阎锡山的薄一波为司令。
军区司令 薄一波
所属部队 决死第一纵队
第一军分区
管辖县 心源、屯留、长子。
第二军分区
管辖县 安泽、浮山、赵城、洪洞、临汾。
第三军分区
管辖县 平遥、介休、灵石、霍县。
本军区内的干部兵力均不详。
(七)冀南军区(成立于 1938 年 8 月)
由一二九师徐向前为司令。以小股匪团为基础，加上八路军的部分基干部队编成冀南军区部队，并设立了军区，以后由宋仁穷任司令，去年 7 月军区改编。
司令由原东进纵队司令陈再道就任，宋仁穷转任政治委员。
军区司令 陈再道
参谋长 文建武
政委 宋仁穷
政治部主任 刘志坚
第一军分区
司令 丁先国
参谋长 王明坤
政委 刘光明

政治部主任 彭学桂
所属部队 新编第九旅、第二十六团、第一军分区游击队。
管辖县 大名(元城、魏县、漳河)、成安、临漳。
第二军分区
司令 吴成忠
副司令 魏开荒
政委 王贵德
政治部主任 贺亦然
管辖县 高邑、柏乡、尧山、任县、南和、隆平、钜鹿，平乡。
第三军分区
司令 张维翰
副司令 赵海枫
政治部主任 甘思何
所属部队 新编第八旅、第三军分区游击队
管辖县 邯郸、永年、曲周、广平、肥乡、邱县、鸡泽、馆陶(广曲、永肥)。
第四军分区
司令 杨鸿明
参谋长 陈明义
政治部主任 孙王明
管辖县 冀县、新河、南官、清河、威县、广宗。
第五军分区
司令不详
参谋长 李连宗
政委不详
管辖县 阜城、武邑，衡水、枣强，景县、故城。
(八)冀鲁豫边区军区(成立于1941年2月)

由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改编的第十八集团军第二纵队，号称冀鲁豫边区部队，以冀鲁豫边区为根据地，进行游击活动。本年 2 月于濮阳县河西李庄，以杨得志为司令，弹辅仁为副司令，正式成立了冀鲁豫边区部队，加强了行政组织，积极建设抗日根据地。另一方面，在鲁西至豫北的地区，由原东进挺进纵队司令肖华为司令，于去春成立了鲁西军区，本年6月两军区合并。将所属部队改编为第二纵队。任命干部如下:

第二纵队
司令 杨得志
副司令 杨勇
兼边区军政委 苏振华
边区军司令 崔田民
兼边区军政治部主任 唐亮
参谋长 卢绍武
因对军分区以下情况不明，暂按过去两分区原状记载如下:
旧冀鲁豫边区军区
第一军分区
司令 朱诚
副司令 颜东山
政委 王凤梧

所属部队 第二纵队第一旅、军分区游击队
管辖县 南乐、清丰、内黄、彰德、汤阴
第二军分区
司令 周柱生
副司令 李静宜
政委 张应观
所属部队 第二旅、鲁西南独立团
管辖县 曹县、菏泽、定陶。
第三军分区
司令 赵基梅
副司令 张耀渙
政委 谢副林
所属部队 第三旅
管辖县 濮阳、滑县、东明。
旧鲁西军区
司令 王叙坤
政委 李冠元
管辖县 以肥城为中心。
第二军分区
司令 冯鼎平
管辖县 以郓城为中心
第三军分区
司令 张维瀚
(九)晋西北军区(1940 年 11 月成立)
为了统一晋西北地区各方面抗日部队的指挥系统，加强军政合一的抗战体制，以贺龙为司令，续范亭为副司令，关向应为政治委员，组成晋西北军区。该军区将全西北地区划分为四个辖区，分别设置军分区司令部。
第二军分区(第二行政战区)
司令 彭绍辉
副司令 张希钦
所属部队 独立第二旅，新军暂编第一师
管辖县 岢岚、保德、河曲、五寨、神池、朔县。
第三军分区(第三行政战区)
司令 张宗逊
所属部队 第二 0 师、第三五八旅
管辖县 阳曲、静乐、岚县、忻县、崞县、宁武。
第四军分区(第四行政战区)
司令 王尚荣
副司令 雷任民
所属部队 独立第一旅、决死第四纵队
管辖县 方山、临兴、离石。
第八军分区(第八行政战区)
司令 韩钧
副司令 侯俊岩

所属部队 第二决死纵队、工卫队(二０七旅)

管辖县 文水、交城、汾阳、祁县、太原。

第五军分区(第五行政战区)(1941 年 3 月新设)

司令 郭红

所属部队 第六团、警备六团，第三大队

管辖县 怀仁，右玉、平鲁、朔县(北部)。

(十)鲁南军区

军区司令 张光冲

副司令 李荆山

管辖县 沂州、郯城、费县、泗水、曲阜、峄县、滕县、邹县、宁阳。

(十一)淮海军区

军区司令 覃侹

参谋长 张克辛

政委 金明

管辖县 赣榆、海东、沭阳、宿迁、泗阳，淮阴、涟水、灌云。

(十二)鲁北军区(冀鲁军区)

山东纵队第六支队司令邢仁甫，原盘踞于乐陵、德平一带。今春改编为第六旅，建立了鲁北军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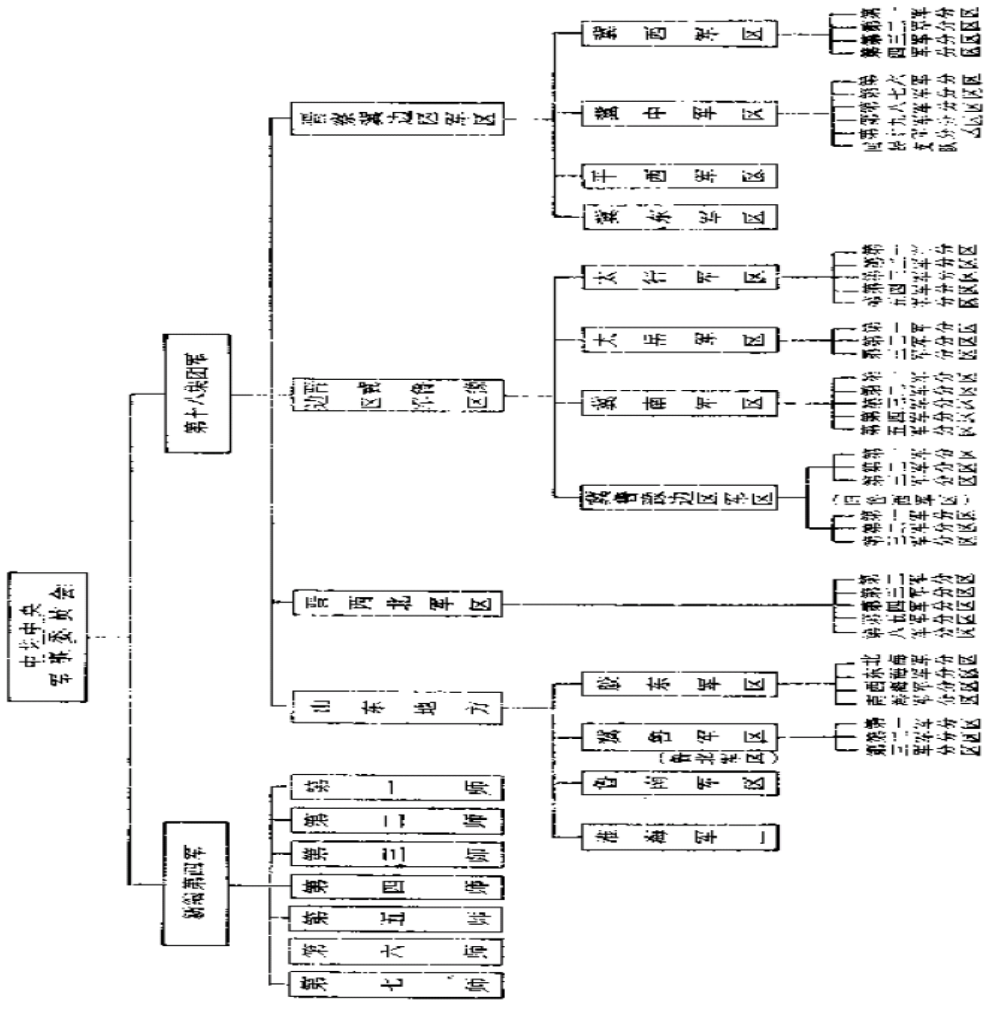


表 2 中国共产军组织系统表

对共军战斗力的观察

方面军第二课，在6月下旬对共军的战斗力、今后的意图以及国共关系等，做了如下的观察。据此，可以看出方面军的调查研究工作，比过去有了相当的进步。

注:本资料为中原会战结束后，立即进行的对敌军的全面观察。选自7月16日召开的总军情报会议文件。

对共军战斗力的观察

关于共军的军事实力，必须将其正规军、游击队和潜在于人民群众阶层内的敌性武装力量一起加以计算。因其本身战斗力低劣，即使是正规军，也超不出土匪的战斗力水平。在评价共军战斗力时，往往与其群众有机的组织活动和党的政治工作力量混为一谈，被其巧妙的游击战所迷惑，因而常有评价过高的倾向。

一、抗日意志及斗志

抗日，为共产党现阶段的中心思想。由于党的政治工作，抗日意志一般高昂。但一般群众、士兵的思想基础薄弱。因此，与其说是相信党的宣传，不如说是有“恐日”的倾向。

关于党员人数，据推测，在正规军中约占兵员的30%至50%，在地方自卫团中约占1%左右。其抗日意志坚强，成为核心力量。

在战斗意志方面，由于领导采取保存实力的方针和一般兵员恐日倾向的影响，逐渐消极和回避战斗的倾向显著。

二、人的素质

(一)干部的素质

在部队干部中，虽然尚有所谓红军时代的较长党龄和军龄的人，但大多担任所属部队的领导干部。一般干部，则以事变后参加共军的知识分子占多数。由于这部分干部多属事变后仓促扩军中大量补充进来的，尚未经过正式军事训练。在军事方面比不上有战斗经验的老红军，他们一般多为政治干部。指挥作战的干部概由有战斗经验的人充当。

(二)士兵的素质

士兵的素质，低于干部。特别是从去年春季以来的扩军工作来看，素质明显降低。(各种统计表格，笔者略。以下各项同)

从一些统计来看，士兵大部是在1939年以后补充的。由此不但可以看出共军积极扩军的意图，也可看出所谓“老八路”的比率降低了。

(三)关于训练情况

共军对干部的教育、训练工作极其重视。自从扩军以来，将教育机关由陕西省推进到前线，开设抗日大学分校七处，并在各师、旅、团，分别成立干部训练班、教导队、随军学校和流动训练班等教育机关，在所盘据的地区努力提高干部的索质。

从一些统计来看，全体干部中约有半数在上述军事教育机关受过正式训练，其中绝大部分充任政治指导员。

当前共军正以整训和收粮工作为重点，力图提高干部的素质。

对士兵的教育，虽以精神教育为主，但根据俘虏谈话、缴获的文件和侦察情报等推测，其进展迟缓，效果不大。

三、装备情况

野战军(指正规军及准正规军)一旅的编制定员约一万人，其装备为:

步枪 5,500 支
手枪 750 支
轻机枪 150 挺
重机枪 24 挺
迫击炮 16 门

以上虽为额定标准，但兵员仅约半数，装备最高也只有半数左右。准正规军则更少，士兵不超过 3,000 名，步枪不超过 1,500 支左右。

根据一些统计观察，值得注意的是：其士兵及装备，均以去年夏季百团大战以前为顶点，以后逐渐递减。共军在没有后方的情况下，单靠动员根据地民众进行补允，其扩军工作看来似已达极限。

四、扩军工作与民众武装力量

共军为了使游击队正规化而进行的第一期扩军工作，已于今年一、二月间基本结束。除新四军的大规模扩军外，华北各部队一律改为旅的编制(在晋察冀边区，仍沿用支队制)。然而，其扩军工作不仅远未达到计划要求，而且看来已很难再有进展。由本年初开始的扩军工作，据我军的观察，主要是动员民众武装的活动。

据我方的观测：其原因固然是共产党武装群众教条式理论的实践，另外也有以下的客观需要。

1.兵器、弹药供应困难。

2.脱产的专业部队与其根据地的粮食生产之间的关系，大致已达饱和点。

3.由于我方政治力量的渗透，尤其是建立并加强了农村自卫力量，因此，使匪区感到有必要武装民众和组织民众。

4.为了调剂匪区劳动力减少和工业建设之间的关系，农村劳动力已达不能再减的地步。

共军正在进行的群众武装运动，不单纯是武装民众，而且具有以此运动为中心进行组织民众的特点。就是说，要在有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五的党员和先进抗日分子的领导下，使之做为军的助手，灵活运用。但是，这一武装力量，仅占自卫队员的 5％—10％左右。所以战斗力极为软弱。

总之，共军本身的战斗力，依然异常低劣，而今后也不易很快提高。然而做为我治安肃正的对象，在估计其军事实力时，则必须将共军及其潜在民众之中广泛的武装力量考虑在内。在民众和共军的相互关系上，不论是由于共军的压力或是思想上的影响，群众有机的组织活动与党的地下工作相配合，就能起到加强共军实力、协助其战斗的作用。因此，也可以说，实际上扰乱我治安的就在于这些民众。

五、关于共军意图的推测

共军目下正专心致志于扩军、整训、保存和培养其实力。从其实力来看，暂时不会进行冒险性的大规模进攻，但以收粮工作和掌握民心为目的的小规模的活动，却将逐渐活跃起来。

(一)共军的扩军工作，从全局来看，没有显示出大的进展。即从缴获的文件等加以观察，兵员、装备与去年 8 月间的最高点相比，也有减少。特别由于去年我军对敌根据地的歼灭作战及后方供应困难，匪区地带人力物力资源缺乏，扩军工作陷于停滞。

由于士兵的素质低下，急需加紧训练。对此，山东、冀中方面，已在着手整训。

(二)共军目下正为适应形势的变化而专心致力于保存和加强实力的工作，极力避免无胜利把握的战斗和无益的消耗。因此，据我军观察，共军不会单纯为了协助中央军，或只为取得宣传效果，而轻易冒险进行大规模的进攻。今后可能在不致损耗兵力的范围内.采取继续开展小规模的游击活动以掌握民心的方策。

(三)由于匪区地带内的物资，特别是粮食的不足，筹集粮食的工作将日趋活跃，而且当前已进入便于开展游击战的青纱帐期，在今后一个相当时期内，敌人的蠢动将逐渐活跃起来。

六、对国共关系的观察

国共关系，由于目前正处于国际形势的急剧转变时期，双方均未表明态度。从中央到地方，双方关系处于停顿状态。今后如何发展变化，一时尚难预测。但据我方观察，由于中共方面的让步，上层领导之间的对立，可望进入暂时平稳状态，大致或可维持现状。

(一)关于重庆方面对共政策的预测

德苏开战，轴心国方面的负担增加。料想将会引起日本国际关系的恶化。由于苏联回到反轴心阵营，可以断定与重庆间的外交关系必将好转，重庆对抗战前途亦可稍形乐观。但苏联参战的结果，其对华援助的比重势将有所减少，同时苏联通过共产党对重庆的牵制，也将日趋困难。因此，趁此时机，重庆有可能要确立对中共的政治领导权，以便统一国内体制，进而逐步加强对中共的镇压。

然而根据我军预测，为了牵制皇军留在满洲，重庆仍将谋求发展和苏联的外交关系，而且出于抗战的需要，极力避免国内相争的方针亦将不变。因此，主要将采取政治手段对中共进行镇压。

(二)中共持久战的方针，不仅不会变化，而且由于德苏开战，更有必要坚持这一方针。一向以苏联实力为背景的中共，今后其对重庆的牵制，亦将不能取得较大成果。因此，中共将在表面上向重庆做出政治上的让步，但对重庆的抗战方针，则仍将进行鞭策。

当然，如果事态发展到要取消陕甘宁边区，或是重庆方面要以武力置中共于死地那样情况时，则是另外一回事了。但是，从当前来看，重庆政府尚无断然采取如此强硬政策的决心。

根据上述国共关系今后的发展。虽然预想到重庆方而将会采取对共强硬的政策，但亦不会超出以政治手段确立领导权的范围。而中共则有鉴于周围形势，表面上有所让步，仍将支持重庆抗战。据此，可以料想，上层领导间的对立，将进入暂时平稳的状况。

但基层方面，国、共的对立，除上述政治方面、思想方面的重要因素外，还有很多直接关系到死活的问题。因此，根据我方的观测，斗争仍将继续下去，不过在上层领导妥协方针的影响下，不致有大的发展，将维持时松时紧的状况。

剿共工作的参考

据《剿共指南》一书摘要如下:

中共计划的减轻民众负担政策

中共为了争取农村民众，以便用于抗日战争，积极策划减轻农民历来深以为苦的各种负担，并以此博得农民的信任和欢心。其主要措施为减租减息、合理负担及统一累进税等三项。如将其政治意义及工作步骤加以剖析，既可做为我灭共工作的参考，也有助于了解中国农民历史的痛苦。

一、减租减息

中共抗战四年来，坚持实行了“二五减租、一分利”(从原租额中减去25%，借贷利息不得超过一分)，并宣称这一政策对于促进民族统一战线取得了伟大的成果。减租减息的第一阶段，对地主、资本家，由各地总动员委员会进行说服教育。在第二阶段由救国会主持协商，采取根据申诉进行调解的形式。而在现在的第三阶段，则普及推广1940年2月及1941

年 3 月 20 日所公布的条例。

此项条例，以不改变历来的土地关系及借贷关系为前提，在当前战争阶段，基本上不是解决土地向题，而是在调整农村阶级关系、巩固抗日统一战线的宗旨下，寻求适合于当前实践要求的政策。然而，这一政策笼络了占华北农民总数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贫农，使人口不到百分之一的地主、资本家的地位自然降低，因而它含有阶级斗争性质，可以巧妙地在无形之中达到其目的。

二、合理负担

中共沿袭阎锡山的总合税法，并加以发展，制订了合理负担制。但未形成所有地区的统一制度，对群众的负担也未必合理。其大要为：(一)全县的负担由边区决定，村的分摊金额由县决定，各户负担标准的等级由村公所决定，不准其它机关、个人介入。(二)将各村划分为一等村到十一等村，按等级决定分担。村内各户分为二十等级(以财产和收入状况为标准)，按等级计算分担比例。总之，这种合理税制具有阶级性的累进税和统一税的特点，在这一点上与过去有明显的区别。

以山西省和顺县第四区三奇村为例，在全村 183 户中，富户 21 户，一股民户 96 户，免除负担并受救济者 6 户。合理负担的比例是，占全村户数 11%的富户，担负全村粮秣的 80.7%、款额的 63.9%。而占 88%的中、贫农则以极轻的负担享受全部利益。此种情况说明，农村旧的支配阶层的地位将逐步被消灭，一般农民的政治、经济地位得到了提高。这样一来，虽然由于支配阶层逃往城市、物资不足等原因使民众的负担过重，但可以看出，以中、贫农为基础争取民众的工作，大体上有了进展。

三、统一累进税

中共晋察冀边区，于 1940 年底公布了统一累进税实施办法，并于 1941 年 7、8 月间开始逐步实行。其理由可以说是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过程中的政治需要。

(一)由于合理负担不健全，税收机关不统一，税种繁多，人民的负担过重和征税的无计划性等原因，造成各级政府的财政紊乱。因此，将多达 20 余种项目的捐税加以综合，以便征税机关在征税标准、单位、计算、次数等方面实现全边区的统一。

(二)由于合理负担制的缺陷，挫伤抗战经济力的发展，形成统一战线的障碍。为了减轻民众负担和增加边区收入，于是计划扩大和加强抗日根据地。主要在于实行更加彻底的阶级课税，促进反对封建旧习，改变历来的分散状况，统一全边区的税收工作。这对加强抗日的政治力量和民众的组织力量，具有改革的意义。

针对以上情况，在灭共政策上必须加以考虑的现阶段的特点是:

(一)统一累进税，是比合理负担前进一步的税制，这证明做为抗日推动力量的中贫农组织，有了质的变化。

(二)行政的支配力量，彻底统一了计划，实现了抗日民众团体间紧密的有机的合作体制。

(三)随着以贫农为中心的人民代表机关的健全，扩大了基层组织大众的发言权。如维持历来的合理负担不变，则将不利动员民众的工作。

所谓统一累进税，是由历来无计划的任意分摊方式，改变为根据周密调查，明确“标准亩”“富力”的统一计算单位，以及免税点和累进率的统一规定等，几乎是可以机械地实现量入为出的财政原则的方针。然而根据现在边区政府的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条件，以及与日军之间的战斗关系，究竟能实现到何等程度，尚属疑问。

以上一系列政策的调整、改革的过程，反映着中共本身的边区行政力量的发展，各种人民团体的建立和健全，反封建斗争的前进，以及民主革命在向质的进展等重大事实，对此，必须加以注视。同时，税制是培养敌抗战力量的财政基础，也是敌以减轻负担为诱饵，争取民众的策略，因此，必须重视并掌握其真实情况。

对游击战

本稿摘自原冀中某游击大队长对日军讨伐行动的感想。

应将扫荡战改为歼灭战

八路军游击队不仅与党、政、军、民有着密切的结合，而且干部、士兵也均抱有对主义的信仰和正确的政治态度，民族意识相当高昂。因此，扫荡示威进行恫吓，对他们并不能起到挫折、瓦解的作用。为了消灭他们的实力，应制订并实施以小部队的游击战一举加以歼灭的计划。

战斗准备的必要事项

一、收集情报及灵敏的行动

第一线的各据点，应构成精密的情报网，从事收集有关一切动向的情报。轻装出动，每人必须自带食粮及联络用具，尽量利用骡马，避免使用车辆。

二、炮兵及重火器会暴露企图，应控制使用。掷弹筒、轻机枪，效果较大。

战斗中的注意事项

一、情况万一陷于不利，避免无谓的消耗，速战速决，速进速退，是游击战的一贯战术。

二、增援部队，不宜过早参加战斗，应查明四周情况，力求不失良机。

三、爱护俘虏，给予安慰和优待，尽力使之投降。

敌政权机关是歼灭战的主要目标

政权机关是支配游击地区的居民和支援游击队的根本。因此，消灭政权机关远较消灭游击队的效果为大。据此。应认清歼灭的目标是各个政权，对此不可轻视。

实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以争取民众

一、应施行针对民众现实要求的战时行政，不断为改善民众生活，加强组织民众而努力。

二、在各行政机关中附设政治宣传队。各部队在战场配置执行宣传、宣抚任务的政治工作人员。

三、各县训练农村的优秀分子，使其担当该村的地下工作，收集有关民众动态的一切情报。

四、各级行政机关及政治工作人员应不断报告有关当地一般带有政治性的问题，供上级机关做为施政的参考。

五、与日军共同参加作战的中国警备队，应严格加强纪律，并消灭各级行政机关的不正行为。

对农村共产党组织的侦察要领

本稿选自某宪兵分队多次侦察的经验报告。

一、组成以检举为目的的特别班，事前进行教育。

二、捕获和利用敌方密探。

对党组织的侦察工作，应捕捉其组织内的分子。但是，最下级的党员和脱党分子利用价值很小。

捕获方法:(一)利用外围团体成员，逐步引诱或绑架其主任级人员。(二)由俘虏中查出党员。(三)逮捕来自敌区的联络员。(四)利用敌方合作人员。(五)利用有党员嫌疑的家属。(六)逮捕后不强迫招认，要加以爱护，消除其恐怖感，使其主动招供。(七)引诱或绑架时，应在居住村外执行，不使村民查觉。

在使用时:

(一)注意要善于理解被反利用者的立场和心理。例如：在甲村逮捕者，如在甲村使用，有使其暴露汉奸身份的危险。

(二)在使用范围上勿犯错误。即：必须注意勿使任务过大。

(三)布置反利用工作，与其通过翻译，倒不如直接将意图充分告知被反利用者。用此方法，效果良好。

三、对村的侦察法

村是党组织的工作单位和基层组织，是我们的接触对象。通晓农村，是了解农村组织实际情况的第一步，并且可以由此了解到该村出身的领导机关的人事关系。对一村进行侦察时，应注意的事项是：(一)中心村的组织强、党员多。在与县委和外村干部有往来的村，一般要有两名联络员。一名接待日军，另一名负责与外村联系，通知他们日军来村的情况。如果将他逮捕，即可了解其领导者一书记的情况。(三)外围团体的成员，不了解横的组织关系，可利用他进行引诱或绑架其它嫌疑分子的工作。(四)通过向农民了解对统一累进税为感想，可以获悉当时有关人员的情况。(五)小组人员中，无土地的人居多数。他们白天在田地装作佃户，监视农村的反党言论和行动。

四、扩大侦察网

所谓扩大侦察网，是指由一村顺序向它村发展，直到能在一区进行一齐检举的程度而言。对于这种侦察网的扩大工作，应查明村和村的组织工作交流情况。为了交流工作，书记、宣传员、组织人员等须出席参加他村的会议和干部会。因此，我侦察目标应针对他们。此时，应使被反利用人员捕获他村的侦探人员。

五、确定检举时机

虽依情况而异，但在一般情况下，应避免侦探率在60%以下进行检举。即使是对党组织已了解清楚，但对外围团体，特别是对其干部一级尚未侦察清楚时，进行检举也是危险的，并且将降低效果。

华北治安的实质

治安问题决不是仅仅依据一时的、表面的、局部的现象就能判断的。当然，不论在面上或深度上都必须经过长期的、慎重的研究才能确定。但当时对此认识不足，因此，在“剿共指南”中多次指出。兹摘录其“华北治安的本质”中的一节如下：

下表为判定我方占领地区及威力渗透地区内治安状况的尺度，敌性地域不在此限。即在上述地区内，由于城市和农村以及地方的特殊性等，也各有不同。同时在判定我政治力的深度时，对敌人工作的渗透程度也应加以考虑，不可满足于统计数字增减而忽略其实质。

治安的实质

- 敌性武力（中共系、蒋系和土匪）（正规军，游击队，自卫队）的存在与否及强弱
- 地下势力
  - 中共的党组织和活动的增减状况
  - 民众运动的组织和活动的增减状况
- 敌行政组织施策的深度和发挥机能的状况
- 新政权政治力量的渗透、扩大和加强状况
- 民众的日常生活（经济的、精神的、社会的）安定状况
- 抗日思想（共产主义的、民族斗争的）的增减
  - 关于向亲日的、新秩序的思想转变状况
  - 对东亚共荣圈的认识和积极合作的状况

四 1941年夏季的各项主要施策

肃正建设三年计划

华北方面军认为，必须深刻理解治安战的本质。特别是共产势力的实际情况，并认清我占领地区及其周围的治安状况，对之采取相应措施方可取得实效。为此，进行了上述各项的调查研究工作。中原会战一经结束，参谋部内部负责人员之间立即进行了彻底的讨论，确定了“进一步加强我军、政、民组织的一元化，在长期计划下采取牢靠措施”的方针，逐步谋求各项对策的系统化。

关于在此期间的情况，当时方面军作战主任参谋、本计划起草人岛贯武治大佐叙述如下:

方面军通过对中共势力实际情况调查，做出了如下的结论:“他们是党、政、军、民结成一体的组织，具有明确的使命观。他们为了实现革命，力图通过争取民众，组织民众，以扩大加强其势力。他们巧妙地把思想、军事、政治、经济的各项措施统一起来，且将其努力分配于七分政治、三分军事之上，从而使我方单靠军事力量无法进行镇压，也必须统一发挥多元的、综合措施。

然而，异民族的日军是否能较好地抓住中国民众的心理，制止中共势力的扩大，进而将其消灭？对此，在方面军幕僚内部出现了悲观和乐观两种意见的对立。最了解中共的实际情况的第二课(情报)参谋认为：中共具有惊人的实力。百团大战中，我军的扫荡作战仅是将其驱散，殆未取得歼灭的成果，终归于徒劳。对擅长游击战及退避战术的共军，以武装讨伐犹如驱赶苍蝇，收效极微。因此，主张招抚分散各地的灰色败残部队，给予占领地区，使其防止共军的浸透，日军只宜做其后盾。

第四课(政务)参谋则认为：保存灰色部队恰如豢养暴力团体，受其危害的是民众。其一切非法行为，将全部转嫁于日军。且有向中共通风及被蚕食之虞。因此，不应采取此等姑息方针，而应发扬王道主义，培养华北政务委员会的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并与军事措施相配合，向建设“明朗华北”的大道前进。

第一课(作战)参谋的主张：不反对招抚优秀的武装团体，而培养政治力最和经济力量也属必要。但是，我方的长处在于军事力量强，敌方短处在于军事力量尚未充分成长起来。当前共军正处于建军过程之中，趁其萌芽时期对之进行扫荡，并结合政治、经济等各项措施，稳定地坐镇华北，通过长期努力，进行主动的、有计划的肃正建设，相信定能达到确保安足华北的目的。在这一方针上达到了思想的统一。

方面军经过以上研究，决定从新的观点出发，为首先查明华北占领地区的治安实际情况，要求各兵团从军事、政治、经济、社会的各个观点出发，将各自负责地区划分为“治安地区”“准治安地区”，“未治安地区”并要求对其状况提出报告。

“治安地区”即我方治安稳定地区。“准治安地区”即敌我双方势力均进入

占领地区三种治安状况的标准表				
		治安地区	准治安地区	未治安地区
		一、治安确立，仅依靠中国警备力量即可确保安定的地区 二、新政权的措施大致浸透、各项建设措施有进展者 三、民心大致安定，对我方的措施合作者	一、军事方面的治安大致安定，其他方面尚不安定，彼我势力交错的地区 二、新政权的措施，由于日军的经常驻在，才能实现 三、敌方的游击行动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均属活跃	一、作战讨伐时暂时的消灭了敌人势力，但作战完了后，又成为敌人的根据地，平常为由敌人占据的所谓敌地区 二、新政权的措施几乎没有渗透
军事	作战讨伐	一、分队以下的行动自由 二、仅以中国方面的警备力，即可维持治安	一、大致需要常驻中队的兵力，小队以下行动不安全 二、中国方面的武装力量不能单独确保治安	一、大致使用大队以上的兵力，有继续组织作战讨伐的必要 二、中队以下的长期行动危险
	袭击破坏	一、除对交通线小规模的袭扰外，几乎没有破坏活动。 二、铁路由“华北交通会社”自身担任警备	一、对交通、通信线的破坏频繁 二、对日军的小警备地点袭击频繁	
政治	行政机关	一、主要县城、城镇、乡村到处设有行政机关 二、大致遵守法令	一、虽已设置，但未能充分发挥作用 二、在无威力下无法行使法令	不能设置
经济	学校	布置了学校逐渐普及了新民教育	学校有名无实，甚至有的夜间变成敌人的学校	同上
	物资取得和纳税	一、不用武力即可取得物资 二、纳税率 2/3 以上	一、在武力支持下可能取得物资 二、纳税率 1/2	如以武力强制执行可暂时生效
	交通通信其他建设关系	一、交通通信邮政业务大致正常 二、各种建设正在进展	一、军用以外的交通通信机能停止 二、建设施策尚未实施	
社会	群众组织	新民会组织普及各处	组织几乎未能普及	不可能组织
	文化思想	表面亲日反共，但内在情况复杂	敌方宣传工作人员的活动等活跃	
备考		本表的标准系根据一九四一年七月方面军所发表的见解及有关人员的回忆整理制成		

的地区。“未治安地区”指敌方势力范围的地区。(参见上表)。

参谋部第四课由行政方面进行了治安状况的调查，1941 年 6 月末，华北县政控制状况如下表内容所示。

县政控制表										一九四一年六月末			
省别	总县数	恢复县数			未恢复县数	县政控制比率				示范地区县政控制比率			
		县公署	治维会	计		联络村	保甲村	纳税村	平均	联络村	保甲村	纳税村	平均
河北省	一三 0	一二八	一	一二九	一	78%	76%	74%	76%	88%	85%	84%	86%
山东省	一 0 五	一 0 二	0	一 0 二	三	69%	55%	68%	63%	91%	79%	84%	85%
山西省	九二	六六	九	七五	一七	64%	27%	59%	53%	79%	66%	74%	70%
河南省	四四	四一	0	四一	三	70%	72%	69%	70%	90%	80%	90%	87%
苏北地区	一七	一六	一	一七	0	58%	40%	43%	47%	85%	67%	71%	74%
淮南地区	一 0	四	0	四	六	45%	25%	22%	24%	—	—	—	—
计	三九八	三五七	十一	三六八	三 0	72%	61%	69%	67%	89%	80%	84%	84%
备考:一、本表不包括未占领地区。二、由于山东省的联络、保甲、纳税村，山西省的保甲、纳税村，河南省的保甲村的恢复率部分材料尚未到达，故仅按有报告的县计算													

据此看来，山西省、苏北及淮南地区的县政控制情况虽较其它各省进展迟缓，但其示范地区有所进展。河北省，不仅特定地区，即全省县政普遍有所开展。

此次调查的特点是从县村的联络组织、村的保甲组织及纳税状况进行观察的。华北控制的县，平均比率虽达 69％，但即使县行政机关比较完备，对其基层的控制仍极困难。华北约有 30%的地区仍然为我行政威力不能达到的地方。

恢复县政的县数为 368 县，这是根据 1940 年度末，398 县中的 344 县(86%)恢复了县政。与以前相比，治安状况有所提高，约有 90％的县行政机关恢复设置。

方面军依照前载“治安状态的标准表”加以综合判断，截至 1941 年 7 月，日军与共军的势力大致相等，即主要城市、交通干线、重要资源地的周围，约有全面积的 10%可以看做治安地区。中共势力圈内，约有 10%为其中心根据地，是日方不能插手的地区。剩余 80%为双方势力交错的地带。其中约有 60%大致认为属于日方实力占优势的准治安地区。

方面军在上述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又制订关于肃正建设的长期计划。即逐渐把巩固治安地区的任务移交给中国方面的行政及警备机关，日军则主要将其势力范围逐渐向敌方推进，扩大治安圈及准治安地区。为此，必须将各项措施全面系统地加以推进。但这毕竟不是短期内所能做到的。因此，拟订了既不急于求成，又不稍有放松的扩大华北治安区的三年长期计划。

在三年计划中逐年应达到的目标如下:

三年计划达到的目标			
	治安地区	准治安地区	未治安地区
1941 年 7 月	10%	60%	30%
1941 年（第一年度）	20%	50%	30%
1942 年（第二年度）	40%	40%	20%
1943 年（第三年度）	70%	20%	10%

注：1.未治安地区，由第二年度开始使其缩小。2.第三年度使其加速进展，达到满洲国的治安状况。3.现有兵力不减少。

按照治安状况划分的各地区的施策大纲如下:

一、在治安地区，直至县城、乡村，均设有华北政权行政机关，使之遵守法令，且有中国方面警备力量承担治安的工作。日军尽可能早日撤出，而向准治安地区推进。应推进文化的、经济的施策，使居民得以安居乐业，使中国方面积极的活动，以促进亲日反共形势的发展。

二、在准治安地区，部署固定的日军主力，在其指导、支援下，建成并加强县警备队及保乡团等，以图控制县政。应不断搜寻中共的势力，加以扫荡，扼制其活动，削弱其势力。逐渐提高中国方面的政治，军事力量，使之过渡到治安地区。

三、“未治安地区”是中共方面的根据地和策源地。不断对之进行有计划的讨伐作战，并拆除、破坏其设施及军需品，使中共方面不能安身和进行建设。作战结束后.日军虽然撤退，但应反复进行扫荡，使中共方面难以重建根据地。随后，日军进驻、分散部署，设置行政机关，使该地区向“准治安地区”发展。

这样地划分地区，限定时间，以扩大，巩固治安地区，不断采取主动进攻并且有计划的综合性措施，就是本计划的目标。

岛贯武治大佐对此做了如下的叙述:

历来的高度分散部署兵力，由于缺乏确切定期的肃正目标，常常变成静止的防御。我如不主动进行讨伐、扫荡和剔抉，则中共方面也不对我进犯。乍看起来，相安无事，宛如缔结了互不侵犯条约。但在此敌我共存期间，中共却在民众中秘密进行工作，以充实其力量，一旦时机成熟，即可一举转向进攻。百团大战就是最好的例证。

因此，我军施策的目标是采取主动进攻的，有计划的措施，就是要：划分地域，限定时间，巩固治安地区，隐蔽准治安地区的兵力，有计划地进入治安地区，并以剩余的兵力向未治安地区挺进，使之向准治安地区发展。

最终目标在于把一亿民众拉到我方，为此，必须争取民心。民众向哪一方面靠拢，关键在于哪一方面能保护其生命和保障其生活。换言之，亦即决定于军事力量的优越，治安的巩固，产业经济的发展，以及生活安定的程度。因此，必须促进中国方面主动积极地工作，采取符合上述目标的各种措施，综合地、系统地加以施行。

由于是与一亿民众建立新的组织，不论投入多大兵力也不可能在短期间内著有成效。因此，既不宜急于求成，也不可坐失时机，希望以三年计划，稳步取得成果。

方面军在这一期间对共政策的探讨，最主要的就是上述肃正建设三年计划。岛贯武治大佐更举出以下各项加以说明。

一、隔离线的构成

古时候中国的城市用城墙围绕起来做为民众对敌人入侵的防护措施。在中国本土和满洲，蒙古之间建筑了万里长城。这对外敌入侵究能起到多大防御作用且当别论，但它是保护中国本土及民众的象征。值此与中共争夺民众之际，把在我保护下的民众用这样的隔离线围绕起来，划出界限加以防护，不但可保居民安定，对于促使民众向我方靠拢，也有很大效果。在准治安地区和未治安地区的交界处，修筑适当的隔离壕沟或小堡垒(岗楼、据点之类)或两者并用，是阻止共军入侵的有效方法，因而广泛采用了这种方法。

这种方法对于维护铁路交通也具有成效。在京汉路两侧各 10 公里的地带就修筑了长

达 500 公里的隔离壕沟，以与共军根据地相隔绝，切断了冀中，冀南的丰富物资向其根据地运送的通路，起到经挤封锁的作用。

总之，适应对共作战的主要特点，而采取争取民众、组织民众的措施，是受到了重视的。

二、新民会的思想战

方面军扩充了新民会做为建立反共势力的精神依据。为了动员民众对共作战，根本问题在于使民众感觉到方面军的各项方针、措施能给他们带来幸福；为此，策划了普及新民精神的活动。

三、中国方面武装团体及自卫组织与日方的合作

为建成与加强中国方面的武装和自卫力量，最后使之成为对共作战的主力，采取了各项必要措施。

第二次治安强化运动的推进和扩大

治安肃正的成果，虽然依靠军事力量的肃正作战及与之紧密配合的一系列政治措施得以扩大，但只有获得当地居民的热烈支持，才能巩固所取得的成果。

华北政务委员会根据预定的计划，决定由 7 月 7 日开始，以两个月时间开展第二次治安强化运动。

第二次治安强化运动:王揖唐委员长指出运动的方针为:“剿灭成为新生华北唯一祸患的中共及其武装团体，使民众得到安居乐业的幸福”，而以“实行剿共、巩固治安”做为工作的重点。他号召“华北民众在运动中，排除万难，予垂死之敌以最后的打击。”

运动开始后，王揖唐委员长和齐燮元治安总署督办，以及各省长、道尹、县长等分赴各该管辖地区进行巡视和鼓励，或身临前线指挥讨伐，或领导加强自卫组织，建设治安道路等，在华北展开了严肃认真的工作。在部分地区。由于斗争的激烈，甚至在日、中民间也出现了不少的牺牲者。

9 月 8 日，第二次治安强化运动结束。这次运动不仅在巩固和改善治安方面取得了空前的成果，同时也培植了华北中国方面官民反共自卫的意识，为今后更加活跃地开展实践运动打下了基础。

特别是以农村民众自卫武装为核心的治安力量的发展，给敌方以极大威胁。根据当时情报，冀中区第八分区司令常德善针对上述情况特发出如下指令。

一、日军的治安强化运动，由点、线地区逐渐加强，不断对共军中心地带采取包围进攻的形势。因此，我军应与游击队密切配合，一面袭击扰乱点、线上的日军，一面防止其外窜，加强警戒日军出击。

二、加强人民武装，安定人民生活，掩护农民耕作，以粉碎日军的治安强化工作。

三、开展广泛的民众武装斗争，一面掀起参军热潮，一面不分男、女，老、少实施军事训练，并在学习军事技术的同时，研究敌方的技术。

另外，在晋察冀边区第一专区贸易局的“资金贷款工作总结”中指出，“7 月以来，对阳曲、定襄、代县、忻县、寿县、孟县等准备贷款总数 50 万元，但由于敌第二次治安强化运动，贷款总数减少了一半”。又在该局发行的题为“新形势下贸易工作的方针”小册子中，也有如下的叙述:“7 月下旬对各县的贷款、

放款工作，由于敌人扫荡作战以及治安强化运动，受到极大的妨害”。

华北防共委员会的建立:华北政务委员会在策划开展治安强化运动的同时。为了在组织机构上也集中全力从事反共斗争，于1941年4月8日公布了华北防共委员会的组织大纲(由16条组成)。8月24日该委员会举行了成立典礼，任命了委员，积极开始活动。

该委员会是华北政务委员会的直属机关，联合华北一切反共力量，以加强剿共工作。这是根据日、满、华共同宣言的精神所制订的彻底消灭赤祸的永久性对策。该委员会虽为剿共工作的策划和决议机关，其决议事项须送政务委员会，由委员长命令施行。但在采取紧急对策时，委员长得权宜处理，事后再行报告。该委员会为中央机关，根据需要除在各省、各特别市设立分会外，并可设置其它必要机关。

委员长由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任，委员由政委会委员、各总署督办、政务、秘书两厅长、新民会正副会长以及由社会上有名望人士充任。另设包括日方人士在内的顾问、专门委员若干名。

关于华北政务委员会的治安强化运动及其防共活动，岛贯武治大佐谈了以下的感想:

“政府官员亲临第一线指挥运动，培植了中国方面官民热烈的自卫反共意识，促进了基层的积极实践运动。特别是以农村民众的自卫武装为核心，发展了治安力量，对中共方面威胁极大”。

晋察冀边区肃正作战

本作战的冀西地区是晋察冀边区的中心根据地。处于南北约300公里、东西100公里险峻的北部太行山脉地区。该地区的共军约四万多人，在其领导下的民众，均受过充分的组织训练，其战斗力不容轻视。

方面军为了消耗、困死该地区的共产势力，以主力参加此次作战，采取了彻底的封锁和消灭共军及其根据地的行动。同时，配合军事行动，积极开展了政治、经济、文化等项工作。

方面军的作战计划

方面军于7月9日，根据年度计划，下达了关于晋察冀边区的肃正作战命令。命令中，对作战计划、宣传报道计划和收集情报计划，做了秘密指示。在本地区，虽为方面军继1939年秋及1940年秋之后，再次进行的肃正作战，但每次皆因情况变化而发展成为大规模的作战。这次编入的年度计划，是在充分研究了历次的经验和成果，通过周密的准备而制订的。

华北方面军命令 7月9日北京

一、各兵团、各部队应遵照晋察冀边区作战计划做好统一作战准备。

二、作战开始时，关于兵力的调转及共它前项计划以外的必要事项，另行下达命令。

华北方面军司令官

事务处理者 多田骏

(笔者注:多田司令官 7 月 7 日晋升大将，并收到了转任军事参议官的命令)

晋察冀边区肃正作战计划

第一 方针

在击溃晋察冀边区共军及消灭其根据地的同时，结合封锁，破坏其自给自足，进而消耗、困死该地区的共产势力。

第二 指导要领

一、进攻兵团及包围敌区的各兵团(以下称封锁兵困)相互协助，务使充分发挥作战效果。

二，作战一开始，进攻兵团的主力应尽快进入定县及石门附近之后，努力消灭盘踞安国东方及束鹿方面直至滹沱河沿岸之敌。最低限度亦应一面将该敌压向西方山地以内，一面反转回头继续向敌区进攻。

二，进攻兵团之一部，应迅速将兵力由北京附近向良乡、高碑店间推进，配合主力进攻敌区。

四、进攻时，应击溃敌集体战斗力，特别应做到机动迅速，在敌人化装成便衣以前、努力将其捕获。

五、击溃敌集体战斗力后，暂在敌区要地驻兵，并以之做为据点，急袭、抓捕潜伏山内及流动的敌匪，或追踪予以消灭，或烧毁、搬走敌人的设施资材等，以削弱敌人势力。

在此期间，特别应以果断、积极的行动使敌无时无地得以存身。我可根据情况，抽调兵力集中使用。

六、封锁兵团，在作战期间应紧密联系，加强封锁，防敌脱逃。为此，根据需要，除将一部分兵力向封锁线附近推进外，并加强封锁的设施。

根据情况抽出一部兵力，加强进攻兵团的战斗力，并使一部分兵力越过封锁第一线，向敌区挺进。

七、作战时，力求捕获敌军党的首脑，破坏党组织的中枢，使其组织力量陷于混乱。

八、应使敌区的民众认清此次作战的真意，并使良民和共产党分离。特别是将其优秀分子送至后方，进行宣抚，尽量使之为我所用。

九、为了达到以上两项目的，除对进攻兵团配备必要的宪兵外，应进行有效的宣传和政治工作。

十、作战结束后，进攻兵团虽各返原建制，但由于对敌区继续进行封锁，应尽量将封锁第一线向前推进，以扩大作战成果。

十一、作战确定由 8 月 X 日前后开始，大致期间为两个月，分三期进行。

第三 军队分派

进攻兵团，全部由方面军直辖。

军队分派如下。转移指挥，另下命令。

甲兵团 兵团长 第二十一师团步兵团长(盘井虎二郎少将)

第二十一师团步兵一联队

第一军步兵一个大队

(笔者注:此外炮兵、工兵、通信队、野战医院等细节从略)

乙兵团 兵团长 步兵第一三三旅团长(井田美武少将)

步兵第一三三旅团

(笔者注:此外由第一、第十二、驻蒙军及由第二十七，第三十五、第一一 0 师团的各

种配属部队细节从略)

丙兵团 兵团长 第三十三师团长(樱井省三中将)
第三十三师团主力
(笔者注：此外由第一、第十二军的配属部队细节从略)
电信第五联队(细节笔者略)

预备队
第一军的步兵三大队
第十一装甲列车队主力
除以上外，对封锁兵团配属通信部队。
(笔者注：封锁兵团为第一军、驻蒙军、第二十一师团主力及第一一 0 师团，其细节略去)

第四 各兵团的行动

其一 作战准备期

一、各进攻兵团的作战准备工作，尽量隔地分别进行，努力取得突然袭击的成果。
二、作战准备期间，应加强山地训练，对困难地形以及夜间活动，应特别熟习。
三、进攻兵团大致截至 8 月初旬，按以下规定集结，继续进行作战准备。
甲兵团 北京附近
乙兵团 石门附近
丙兵团 太原附近
关子预备队的石门集结，另下命令。
四、担任捕掳敌方干部、收集物资、进行宣传、修筑公路及政治工作等的特设部队，须预先进行训练。
五、封锁兵团按照方面军作命甲第 334 号，1941 年经济封锁要领，根据需要加强措施，严防敌人脱逃。

其二 第一期作故

第一期作战，按照方面军的规定，在此期间应向敌区进攻并击溃敌集体战斗力，预定自作战开始后约两个星期，
一、封锁兵团，随着作战的开始，切断与敌地区的一切交通，以防止敌人逃脱，在不得已情况下，应将逃出之敌予以歼灭。
根据情况，第一军、驻蒙军，可使其一部越过封锁线向敌区挺进。特别是第一一 0 师团，在滹沱河河畔进行作战时，应协助乙、丙兵团阻止敌向东、北、南方逃窜，并协助做好收集情报工作。
二、甲兵团于 X+2 日前进入良乡，高碑店以后，西向进攻敌区，击溃敌之集体战斗力。特别应迅速占据易县—涞源道路，以切断敌之南北交通。
三、乙兵团于 X-3 日，以一部由京汉沿线出发，迅速进入安平、深县一线，以阻止滹沱河畔之敌东逃，并以主力于 X 日由定县附近进入安国附近，由该地东方向南方与丙兵团的进攻相配合，努力歼灭敌人，最低限度亦须将敌向西方山地内压缩。
另以其一部于 X 日以前部署于望都附近，准备日后迅速进攻。
四、丙兵团，于 X 日以主力进入石门附近，继由束鹿方面向北与乙兵团相配合，努力歼灭敌人，最低限度亦须将敌向西方山地内压缩。
另以其一部于 X 日前，分别部署于微水镇及井陉的北方地区，准备日后的迅速进攻。

五、乙丙兵团，继滹沱河河畔作战之后，向西进攻敌区，击溃敌集体战斗力。

六、进攻兵团的作战地界规定如下:

甲兵团、乙兵团间

定县一村雨山(西 30 公里)一明星山(西南 9 公里)一七海山(西北偏西 14 公里)一羽衣山(西 12 公里)一天女山(西 3 公里)一涞源

乙兵团、丙兵团间

定县一西板村(西北 8 公里)一占里(西北 12 公里)一灵山镇(西北 14 公里)一キヌ村(西北 8 公里)一棒山(西北偏西 17 公里)一六甲山(西北偏西 18 公里)オサ山(西北 16 公里)一南禅房(西北 9 公里)一大营镇

其三 第二期作战

第二期作战，在此期间，各进攻兵团应分别在各该作战区内搜索、扫荡残敌，并搬出和破坏敌资材设施，预定继第一期之后约七个星期。

一、封锁兵团，与第一期作战相同。

二、进攻兵团，在各作战区内的要地，分驻必要的兵力，并以此为据点，急袭、搜捕潜伏和游动于山地内的敌匪，或追踪歼灭，或剔抉剿灭化装便衣的敌人，或烧毁搬出敌之设施资材等，尽力摧毁敌人的战斗力。

在此期间，应以果断、积极的行动，使敌人无时无地得以存身。

三、根据情况，进攻兵团得相互调用兵力，以增加某方面的战斗力，或打破作战地界，使一部兵力向另一方面进驻。

四、在此作战期间，尽量避免战术形式的固定化，不断修正改进，力求做到出其不意。

五、有效地利用碉堡，使之能以敏捷机动兵力，防止发生意外损害。

六、作战地界另行规定。

第五 兵站、交通、通信。

一、封锁兵团，应负责进攻兵团的供应，并给以援助。负责供应的兵团如下。

第二十一师团 甲兵团

第一一 0 师团 乙兵团，丙兵团(在第一军作战地区内行动者除外)

第一军 丙兵团(在第一军作战地区内行动)

第一军、第二十一师团、第一一 0 师团以外的封锁兵团应支援在原作战地区行动的进攻兵团的供应。

二、第二十一师团，第一一 0 师团，在北京一石门间京汉路沿线地区设置必要的供应点。随着作战的进展，应各自对所承担兵团的供应工作做到畅通无阻，按其给养兵额，输送积存大约三个月的军需物资。

第一军在东冶镇附近积聚必要的军需物资。准备时须特别保密。

三、进攻兵团，应由供应点将军需物资自行运往前方。但根据情况，也可由担任供应兵团运送之。

四、进攻兵团的人马，什物向后方运送工作，由担任供应的兵团承担。

五、努力做好征集现地物资，以及对遗弃、缴获物资的收集、后运及其利用等工作。

六、由进攻兵团的集结地点到发动作战地点的铁路输送工作，应在行动开始前以最短时间完成，并应注意保密。

七、为了适应作战期间兵力的转调，在京汉路沿线须准备必要的铁路材料。

八、易县一涞源道路修筑未完成的区域，力求结合此次作战予以完成。

九、各进攻兵团，应尽力修筑为供应、运输物资、联络等所需道路。

十～十三、(有关通信事项一笔者略)

第六 宣传、政治工作

按另外规定进行。

第七 作战后的处理

一、作战终了后，进攻部队应依次向以下地点集结，根据另外的命令返回原建制。

甲兵团 保定附近

乙兵团 石门附近

丙兵团 太原附近

二、封锁兵团为了扩大战果，应加强对敌区的封锁，尽量向封锁第一线推进。

三、作战结束后，仍需根据情况进行反复的作战，为扩大战果而努力。根据需要由方面军统一掌握。

晋察冀边区肃正作战宣传报道计划

7月16日

第一 方针

一、宣传报道工作，应使民众深刻理解华北共军为日中的共同敌人，使之看清我军不将共军驱出华北决不罢休的决心和实力，并认请只有结合作战努力开展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工作，才能完全达到剿共目的的道理，促使日中民众协助上述各项工作。

二、应使民众周知，晋察冀边区共军的存在实为华北治安的最大隐患。肃清该共军，不但对边区民众，即对华北全区民众的生活提高，也将做出极大的贡献。

三、对作战地区内居民及共军的宣传，应以达到以下目的为重点。

(一)使一般外围分子从共军的核心分子中分离出来，以达到使党、军分裂的目的。

(二)策划共军与一般民众间的离间工作。

(三)使中共中央对共军盘踞华北感到绝望。

第二 实施要领

宣传报道，应尽量做到根据具体事物，特别是用事实作证明，以取得成效。

一、作战准备期间

(一)作战准备期间，采取一切手段隐匿我方意图。

(二)由方面军统一规定随军记者的派遣及配属。

二、作战期间

(一)报道

1.方面军主要处理有关作战意义、综合战况等政治方面的向题。第一线主要报道局部的战况，官兵奋战的状况，特别要报道共产地区的实际情况，例如有关共军暴行、虚伪的政策和民众生活疲惫等情况。

2.作战开始时禁止报道，待摧毁敌之集体战斗力的目标已经确实，方可解除禁令。具体时间由方面军通报。

<table>
<tr><td colspan="5">晋察冀边区肃正作战情报收集计划</td></tr>
<tr><td rowspan="2">方针</td><td rowspan="2">区分</td><td colspan="2">驻蒙军，第一军，第一一O师团，独立混成第十五旅团，华北宪兵队</td><td rowspan="2">备考</td></tr>
<tr><td>主要应于作战前收集的事项</td><td>主要应于作战期间及作战后收集的事项</td></tr>
</table>

在收集肃正讨伐所需资料的同时并为今后确立治安的参考，特别应详细掌握共产势力的实际情况	收集要领	一、边区内共军各师及其它匪团的现驻区(尽量详细)以及其隶属系统、特别是根据地。 二、共军，匪、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所在。 三、边区政府以下行政公署的所在及其主任、组织。 四、武器弹药制造所以及仓库、被服、粮秣库、印刷所、金融机关、教育设施的所在。 五、地形，交通通信网的状况以及军的组成装备上需要加以考虑的事项。	六、共军、匪，各种机关等今后的动向，特别是移动情况。 七、共军、匪的战斗力的估计及战术中的特殊事项。 八、共方实施的对民众思想、招兵、行政、经济，金融工作(包括对日军占领地区内的)等的真相，以及民众的反映。 九、武器、弹药、资材、粮秣等及其原料的供应路线及真相。 十、地方资源，特别是煤炭、民众必需物资等的状况。 十一、驻军要地的资料。	一、主要俘虏尽量送到各兵团司令部，以便取得情报成在其它方面为我利用。 二、努力收集各种文件，其中重要的应按顺序尽速送交方面军司令部。 三、应特别注意勿使敌人得知我方收集情报的意图。
	希望报告到达的日期	每次尽量迅速送出，综合材料在9月25日以前送出	现存资料9月25日送出，其他收到后立即发出	
	报告要领	（笔者略）	（笔者略）	

3. 尽量利用照片。通讯、报道的检查全部由方面军进行。

4. 方面军根据需要，特别是在第一期末，发表战果。

(二) 宣传

1. 方面军用飞机散发传单，对作战地区敌人及敌区居民进行宣传。第一线兵团用自己准备的宣传品及方面军颁发的宣传品，主要对进攻地区的敌人及居民进行宣传，为此，以运用政治工作班为宜。

2. 对进攻地区内的敌方宣传，应全部破坏和涂掉。

3. 对俘虏及强行拉走的居民尽量加以利用。

三、作战结束以后

(一) 关于作战成果由华北方面军发表公告。

(二) 第一线兵团尽快报告以下事项:

1. 敌方宣传情况。

2. 对我宣传报道的意见。

作战经过概要

此次作战因受关东军特别演习(关东军由 7 月上旬开始举行的大规模集中动员的秘密名称，简称为“关特演”)的影响，比方面军年度计划顶定的日期推迟了约一个月，8 月中旬开始发动。方面军 8 月初召集了情报主任参谋会议，与此同时，根据早已下达的作战计划，正式开始了作战准备工作。

中原会战结束后，指定参加此次作战的兵团第二十一师团主力向保定地区，第三十三师团主力向太原附近分别集结。以后，第二十一师团主力根据作战计

划的部队区域划分，接管了改称乙兵团的第一一0师团的步兵第一三三旅团(旅团长津田美武少将)原来负责的警备地区。以改称甲兵团的第二十一步兵团长盘井虎二郎少将所指挥的步兵第八十三联队为基干的部队，由方面军直辖向北京集结。另外，在作战计划中。改称丙兵团的第三十三师团主力，开战之前由太原向束鹿(石门东方约75公里)、辛集镇(束鹿西方约10公里)附近移动。

参加作战兵团特别是进攻兵团甲、乙、丙各兵团，在作战准备上应注意事项如下:

一、普遍了解共军战术。

二、加强通信机关(无线电装备)和厉行情报特别训练。

三、增加携带炸药及其它破坏器材。

四、方面军发动作战时，特于北京司令部内设战斗指挥所，在石门设情报所。

8月14日开始了第一期作战，作战经过如下。

第一期作战(8月14日—9月4日)

一、第一次作战(8月14日—21日)

1.对古北口、密云地区作战。

甲兵团于8月14日由北京经铁路运输进入古北口南方地区，扫荡了属于平西军区的共军根据地古北口、密云等地区。在几天的战斗中，与担任该地区警备的独立混成第十五旅团以及在古北口附近担任警备的关东军各一部紧密联系，为肃正讨伐做出了努力，但迄未遭遇大敌，只有少数共军巧妙地向热河省内山岳地区逃避。

2.对冀中南部地区作战

乙兵团、丙兵团，8月14日一齐开始行动。乙兵团由京汉路的定县，新乐附近向东南方，丙兵团由石德路(石门一德州间)的辛集镇、束鹿附近向北方，两兵团相互呼应，对滹沱河南方地区的共军根据地展开了扫荡战。

继而，乙兵团的水上部队(步兵第一一0联队长水上渊藏大佐指挥的部队)，新美部队(步兵第一六三联队长新美二郎大佐指挥的部队)分别在新乐的东南方及安国(新乐东方约60公里)南方渡过沙河，丙兵团的滨田部队(步兵第二一四联队长滨田十之助大佐指挥的部队)、河村部队(步兵第二一三联队长河村参郎大佐指挥的部队)向深泽—安平—饶阳大道以北滹沱河南岸地区压迫共军，尽力搜捕敌军，并摧毁了分散藏匿的各种设施。

在此次作战中，据悉第十军分区司令朱占魁15日在水上部队占领其根据地大保镇(安平西方16公里)前，向西方逃去。第十八、十九两团长负伤。冀中南部地区扫荡作战的战果如下:

共军战死570人，俘虏17人。

缴获迫击炮2门、自动步枪2支、步枪300支、手枪51支、手榴弹1,290颗、地雷25个。此外，被服、军需品等甚多。

新任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8月18日由空路飞往石门对第一一0师团司令部、19日乘装甲列车去晋县对第三十三师团司令部、20日对保定的第二十一师团司令部，进行了就任后的首次巡视，视察了前线情况。

二、第二次作战(向冀西地区进攻，8月23日至9月4日)

方面军由于对平西地区及冀中地区第一次作战的顺利进展，决定由8月23日开始对主要目标北部太行山脉的冀西根据地进攻，18日下达了进攻及实行封锁的命令。

8月23日—27日的进攻情况如下:

23日拂晓，甲兵团由红煤厂、涿县、涞水附近分三路纵队西进。北、中纵队23日傍晚进入北拒马河谷的张坊镇附近，24日急袭肖克指挥的约有千人的部队，25日黎明，将敌

压向拒马河的溪谷，击败敌军，俘 600 人。

23 日拂晓，乙兵团由定兴、方顺桥附近分三路纵队西进，对盘踞于满城北方的北楼山附近的第一军区司令杨成武指挥的约有五千人的部队开始了围攻。由于一部分共军据守北楼山西方的坚固阵地进行顽抗，我军在空军的密切配合下展开了肉搏战，痛击该敌，使其向北方溃逃，

23 日拂晓，丙兵团由新乐、正定、井陉附近分三路纵队一面扫荡各该地区的共军，一面向西北进击，继而北进。24 日攻占了晋察冀边区根据地的阜平及冀西根据地的陈家院(石门西北约 50 公里)。在进攻陈家院附近时，得到独立混成第三、第四旅团各一部的紧密合作、继于 27 日在抗日大学所在地的陈庄(阜平南方约 30 公里)附近击败聂荣臻指挥的有力部队。

8 月 28 日—9 月 3 日的战况如下:

乙兵团，28 日以后，以其一部在久能山(易县西北约 40 公里)附近紧追第一军分区杨成武部，同时将攻击目标指向第三军分区黄永胜部，并与第二十六师团以及独立混成第二旅团的一部协作.对聚集于该地区内的共军进行围攻。于 29 日至 9 月 2 日间，在倒马关一带地区反复进行了扫荡。

丙兵团，28 日以后与独立混成第四旅团取得联系，对陈庄、陈家院一带及滹沱河流域继续进行了扫荡。

甲兵团则开展了蓬头(易县西北 35 公里)周围的扫荡战。

如上所述，8 月 23 日以来的作战进展顺利，共军根据地的陈庄、阜平直到各军分区的根据地均归覆灭，各分区共军也由于我在各地扫荡的结果，大部化为小部队分散逃避，潜伏于各该所在地区。

截至 8 月 31 日，已查明综合战果如下。

共军战死□□95 人 俘虏 153 人。

缴获山炮 2 门、迫击炮 1 门、重机枪 7 挺、轻机枪 13 挺、步枪 450 支，尚有其它军需品甚多。

摧毁设施——陈家院的边区司令部、第一至第四各军分区司令部、兵营 10 所、军需品仓库 17 处、武器弹药制造所 9 处、火药库 7 处。

第二期作战(9 月 4 日—10 月 15 日)

9 月 2 日，方面军决定由 4 日以后转入第二期作战，命令各进攻兵团，分驻于作战地区搜索、剿灭残余共军，并消灭其根据地。各封锁兵团在继续进行封锁的同时，将其一部分驻于进攻兵团的后方地区，搜索剿灭残余的共军，并摧毁其根据地。

9 月 3 日及 9 月 4 日分别撤消了设于石门的情报所及北京方面军司令部内的战斗指挥所。

各兵团根据上述方面军的命令使相当于步兵大队、中队的单位分驻于作战地区的各要地，一面搜索扫荡潜伏的残余共军，一面破坏敌根据地的设施和运出物资。

方面军认为，晋察冀边区的肃正工作有很大进展，大致收到了预期的成果，决定在此次作战结束后，以经济封锁巩固、发展作战成果。据此，于 9 月 24 日命令进攻兵团集结转进。

甲兵团到 10 月 1 日，在完成所担当的任务之后，逐次向新乡附近转进集结。乙兵团于 11 日开始转进，返回第一一 0 师团长的属下，丙兵团由 11 日，逐渐返回原建制。

第二十一师团完成对敌经济封锁任务后，做为担当“あ”号作战(大东亚战争初期的对同盟国军进攻作战)的兵团，10 月中旬以后，向胶济沿线的张店、青岛附近，第三十三师团主力向砀山、徐州、宿县附近转进集结。

曾担任封锁的各军、兵团，由 10 日开始，逐次撤出其进驻的兵力，大致以下述界线

为前沿，对敌经济封锁继续到10月15日前后。

第一军 娘子关一孟县一上社一石咀一神堂堡。

驻蒙军 下关镇一上寨一浮图峪一镇边城附近之内长城线。

独立混成第十五旅团 镇边城一长操一周口店。

第一一0师团 行唐一灵寿一平山一南峪

第一军作战经过概要

兹将担任封锁的各兵团中第一军的状况概述如下:

第一军，命独立混成第三、第四旅团参加作战。由第三十六、第三十七、第四十师团抽调必要的部队配属于该两旅团，使之具有长期的独立作战能力。该两旅团各组成数个支队，划分为占领封锁线部队和随时随地搜索敌人的进攻部队，准备作战。

8月11日至14日间，该两旅团相继开始行动，24日按计划完成了对娘子关一石咀一神堂堡的封锁线，对该地区进行了彻底的扫荡，摧毁了共军后方设施、工厂、武器制造所等，没收、缴获了很多武器、弹药、工具、火药等。

方面军直辖各兵团和驻蒙军共同向阜平平原及其南方地区进攻，为了一举围歼晋察冀边区部队的主力。以主力继续进行封锁。另以一部于8月31日突入该地区。由子共军早已四散逃避，因而未能给予重创，对当地敌人进行了搜索扫荡。

9月4日，随着方面军向第二期作战的过渡，该两旅团各以一部继续进行封锁，另以主力分散驻守于晋察冀边区部队原第二分区部队盘踞地区的附近，尽力剿灭残匪。另外并对屡次向省外逃窜企图重新集结的共军加以痛击，力图彻底摧毁其根据地设施。

10月10日根据方面军的命令，逐次返回原驻地。此次作战虽未能予共军以致命打击，但在摧毁根据地及由于沿省境设立了无人区(真空地带)，给共军极大的损害。

政治及宣传报道工作

方面军在进行此次作战之际，考虑到只有把行使武力与大力推行政治、经济、宣传报道等各项措施结合起来，才能实现剿共肃正作战的目的，使作战与7月初开展的第二次治安强化运动结合起来。为此，积极地进行了政治工作及宣传报道工作。

下面是独立混成第四旅团的政治工作之一例。

旅团关于与作战结合进行的政治工作，于1941年8月3日预发的“独混四旅作命甲第 127 号命令”中详细地作了计划和准备，尤其重视政治工作班的活动。除令参加作战的各个支队进行组织训练外，旅团方面也严选日中人员予以周密的特别训练，做为各支队的政治工作班的基干要员，8月11日配属于各支队。

旅团计划的政治工作要领其要点如下。

晋察冀边区西边肃正作战政治工作要领

第一 方针

一、配合作战开展政治工作，以搜索剔除共军的地下工作。对敌地区的居民，主要通过宣抚促使匪民分离。

二、结合上述工作，进行有关共军的调查研究。

第二 指导要领

一、各部队，预先做好政治工作班的准备工作，作战开始时，除按方针指示事项实施外，并使之担当搜索敌情及搜索潜伏匪徒及隐藏物品等工作。

二、对敌封锁，首先按照历来的经济封锁线及此次作战中重新划定的封锁线进行双重封锁。

三、历来的经济封锁线，继续照常封锁。新封锁线除经日军许可者外，一切人员及物资禁止通过。如有违犯者，不论其有否敌性，立即逮捕，关押或枪决。

四、封锁部队及进攻部队，应使所属政治工作班从事没收共产地区敌性物资并积极实行经济封锁。

查获没收前项敌性物资的部队，可自行将其保存或委托最近的封锁部队保管。

五、各部队可由共产地区招致有力的居民前来，并给以优待，让他们在阳泉、平定、寿阳或太原等我势力范围内看到安居乐业的情况，然后放他们回原地，用以揭露共军的欺骗。

六、封锁部队应加强两封锁线附近的政治工作，严防敌向根据地以外分散逃避。同时，为支援进攻部队的政治工作，特别是为将来实行经济封锁，尽量使政治工作班进入敌地区，从事收集情报等工作，直接协助进攻部队。

七，旅团，为了调查下列事项，组成一个调查班。

对于共军和居民以及其它地区进行调查

1、共军的实际情况及其施策的情况。

2、政治、经济、思想等各项工作的要领及其组织等。

第三 组成及装备(笔者略)

第四 实施

一、各部队均配属适当的政治工作班，或将其投放于敌人之中，配合作战和封锁，使之承担以下任务:

1.对难民及良民化的共军进行宣传，宣抚，破除其反日意识。

2.查获及没收敌性武器、被服粮秣等。

3.剔抉残余败兵及敌性居民，杜绝共产党工作人员打入活动。

4.建立自卫的民众组织。

二、招来的居民，按照俘虏处理，于阳泉集合后，送往大原收容所，委托新民会总会加以指导，其标准为一个大队定员 20 人。

三、调查班应以新封锁线为根据地，对共产地区的党、军、居民等进行现地实际情祝的调查，尤应掌握作战最初的实际情况，收集将来对共施策的资料。

调查研究结果，应于作战结束后约 15 日内报告旅团长。

第五 表扬、奖励及经费

笔者注:此项内容为特别工作费，抚恤金的支付，奖状、奖金的发放等事项。(原文略)

在肃正作战中，过去虽也进行了与之相结合的政治工作，但此次却是方面军自上而下极为关心，并经过大力准备而实施的。这是此次作战的特色。

关于宣传报道工作，方面军按照前述“宣传报道计划”，在整个作战过程中，主要使用飞机散发传单，对全部作战地区的敌人进行宣传。各兵团对进攻地区的敌人及居民，主要以飞机和由政治工作班等开展宣传活动。

特别在第二期作战部队分散驻守期间，对敌区居民进行巡回放映电影、演剧及医疗等宣抚工作，收到了很大效果。

在作战期间，动员日、中双方的报道机关，适应作战的需要，努力进行了

恰当的报道。

8月24日,方面军报道部长关于晋察冀边区的剿共作战发表了如下的谈话:

此次日军进行作战的晋察冀边区，是华北的抗日根据地中实力最强、成为华北治安最大隐患的地区。今年初夏以来，日军在冀东，冀中作战中，到处击败，捕捉敌军。俘虏了第十三团长陈群，使第十军分区司令朱占魁负伤。另外还取得很大的战果。此次作战，不仅彻底粉碎了敌军事抗战力，而且由于新中国行政机关、县警备队及农村自卫团等的主动的协助，剔除了渗透于该地区的红色势力，取得剿共之实效，使治安范围得到扩大。

特别是由7月7日开始的第二次治安强化运动开展以来，由于华北当局的领导得当，不断稳步而顺利地收到实效。尤其是在靠近敌方的地区，加强了反共的自卫组织，并以警备队和其它武装团体，对散在各处的共军断然进行讨伐，省长、县长等亲临战场，挺身于剿共作战前线，更是过去未有的创举。

这一事实表明，在受共军迫害的华北民众中间，能迸发出剿共热情。

然而真正恢复华北的治安，单纯依靠新中国方面各机关的自卫活动是不能达到目的的。必须依靠日军强大的武装以彻底消灭共军根据地。

现在日军进行持续作战的冀西地带，是晋察冀边区的中心根据地，南北30公里、东西100公里，处于险峻的太行山北部地区。

自1937年秋以来，聂荣臻在该地区收集残兵败将，成立了红色边区政府，在延安中共总部的领导下，从事赤化华北工作。其残余兵力，正规军、游击队总计约四万人，编制装备虽不算优秀，但习惯于山地，熟悉地理并且依靠有彻底的民众工作基础的游击战，其战斗力实有不容轻视之处。

此次作战的特点，与历来在该地区进行的作战不同，而是使用了绝对优势的兵力，并由政治工作班积极开展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工作，配合了日军的军事行动。

所有这些，都是由敌区周围的封锁部队配合活动，共同为歼灭华北红色政权取得的空前成果。(以下笔者略)

此次作战的成果

此次作战的综合成果如下:(据第一一0师团的材料，截至作战中途的10月27日)

敌方损失，遗尸5,616具。俘虏3,769人。

主要缴获:

迫击炮7门、重机枪14挺、轻机枪54挺、自动步枪103支、火枪784支、步枪2,413支、子弹116,777发，手枪444支、刺刀3,707把、手榴弹144,504颗。(以下笔者略)

我方损失 战死84名、负伤224名。

上述数字，做为对共肃正作战战果是十分巨大的。方面军的综合战果数字不明。然而此次作战的收获，战果尚属次要，主要在于扩大了我治安圈及对中共施加的压力，从而使之陷入经济穷困等方面。当时方面军作战主任参谋岛贯武治大佐曾有如下叙述:

一、配合此次作战，第一一0师团将第一线向西推进，比以前更能增加对中共方面的压力。同时，独立混成第二、第十五旅团为了协助作战，对北京西方山地内的中共根据地区进行讨伐，扩大了驻兵地区，确保涞源—易县道路，分割了敌地区，从而更加稳定了北京附近的治安。

二、破坏了敌地区内的武器制造所、军需品储藏所等根据地设施，在经济方面也给以巨大打击。并且对于使敌区居民摄服于我之威力方面，也收到不小效果。

三、假设我方有多余的兵力，则可继上述破坏作战之后，分散驻兵，一举使敌区成为治安地区，果能如此，当然极为有利。但此次作战则无力分散驻兵，其效果逐渐消失，致使敌方势力得以恢复。因此，殊有反复进行破坏作战的必要。如果不能做到使敌放弃占据根据地的意图，使居民背离共方，作战即不能算是彻底。

四、象晋察冀边区这样的大根据地，仅以一个兵团进行讨伐是难以取得成果的。因此，必须由方面军统一领导，以绝对优势的兵力给以致命打击后，再由各兵团严密地继续予以粉碎性打击，方可望取得持久的成果。

此次作战结束后，晋察冀边区内的动态虽不得而知，但从“驻蒙军战时月报”对1941年末的状况所作以下记载中，即可推测彼时的作战成果。

一、晋察冀边区之敌，由于前者与我作战所受创伤未愈，加以粮食极缺，虽仍在进行局部反击以突破我封锁网，但并无以全部兵力进行反攻的企图。

二、察南东部地区的平北游击队，由于我长期进行扫荡及其它工作，已向满洲国方面逃避。但随着讨伐队的返回原驻地，最近有再次向原根据地方面移动的倾向。

教训及意见

现将当时有关人员的回忆及独立混成第三旅团保存的记录(意见集)，作为此次作战教训加以整理汇总如下:

一、有关共军的事项

(一)战术

1.共军回避交战，采取退避战术，专心致志保存其战斗力。加以支援共军的民众，具有高度的警惕性和巧妙地传递情报的能力，并有可怕的谍报组织，因而想要捕捉歼灭共军，至为困难。由于此种情况，在作战中使敌在人的方面损失不大，我方的死伤也极少。关于指导退避作战的具体事实，据俘虏称，与日军发动作战的同时，聂荣臻向全军重申了:“敌进我退，敌去我追，敌多我避，敌少我打”的指令。在党、军及行政机关的全面统制下，确定了退避的部署。命各机关分散混入部队之中，在严密的保卫下，先行退避，显示出党、军、政三位一体的作风。

2.为了在冀中地区实行退避战术，中共在修建地道及其它隐匿设备方面，付出的心血确实惊人。

3.对于劣势的日军，则出乎意料地勇敢进行挑战，并突然袭击企图围歼。其负责掩护主力退却的部队，即使兵力薄弱，也必进行顽强抵抗。

4.共军在进行袭击、伏击、防御战斗之际，特别注意选定有安全退路的地点做为战场。由于共军在险峻山地行动敏捷，尽量避开驮马可能通过的地区，多在山后小路进行夜间活动。

5.共军常潜伏于离开主要交通道路的山中村落。

6.当宿营时，通常不在大的村庄，而分散于小村或山中。

7.共军哨兵在退却之际，有故意向与主力相反方向退避的倾向。

8.为了便于退避，有时使用石头等做为秘密路标。

(二)战斗力

1.共军以回避战斗为主，因而对其战斗力不能轻易判断。但其抗战意识似有较前降低模样。

2.共军的基干战斗员约占20%—25%，其他属于强行征集的民兵，素质低劣。在独立混成第三旅团地区，曾见到若干正规共军的投降士兵，这是过去所见不到的。

敌方的宣传中出现不少“反对投降”的字句，说明内部有投降气氛，估计这是出于防止投降的需要。然而，在第二十一师团的俘虏中发现有妇女军官，忠于共产主义，宁死不屈，拒绝自首。

3.一般装备不良，缺乏弹药。但到作战末期，得到补充，随身携带弹药极其丰富。

4.冀西山地内，各处多设有手榴弹制造所，原料极多。

(三)共军的民众工作

1.共军的民众工作极为彻底。居民对有关八路军的情况，均不轻易出口。各村的“空室清野”，也均严格执行。

2.民众对共军的态度，并非心悦诚服，似在压力之下盲目服从，但其中也有抗日思想和抗战意识狂热的分子。例如:

在独立混成第三旅团内曾出现如下事件:

(1)两名特务人员捉到当地居民，令其带路，当接近敌村时，带路的居民突然大声喊叫“来了两个汉奸，大家出来抓啊!”

(2)冈村支队的一个中队，当脱离大队主力分进之际，带路的当地居民将其带进不利的地形，使我陷于共军的包围之中。

(3)草野支队两名士兵，由于迷失方向，被村民带到敌军第四团第二营营部所在地。

3.敌地区的民众，对我治安地区的情况，一无所知。

4.敌区的居民，被动员起来，密切协助共军抗战，达到所谓军民一致的状态，这与华中的情况不同。

(四)武器、被服及其它的隐匿要领

在周密计划下，预先准备好隐匿地点，采取的方法既巧妙又敏捷。举例说明如下:

1.在被服工厂院中，铺石的路面，走路时听到有怪声，掘开一看，埋有被服、工具等物。在工厂内存放物品的屋里，将不同土色的地面挖开，也发现同样的情况。.

2.梯田的石墙内，以及石阶的下面，隐藏着武器。

3.把物资隐匿在山谷深处，没有人马出入痕迹的山上小屋里。

4.乍看象是垃圾堆的场所，在垃圾覆盖下隐藏着钢材、器械等。

5.把物资隐匿在山脉的岩石下或村庄后面、山腰处的洞穴(从道路上不能见到)等处。

二、关于情报、宣传报道事项

(一)利用居民及俘虏，对搜索和刺探敌情效果极大。但对居民的话不可轻信，尽量分别听取多数人所说的情况，并须加以综合分析。

(二)侦察特务工作队，在难以获得居民及俘虏时使用之，颇有成效。以便农进行近距离的侦察活动，价值很大。

(三)村内留下的人员，虽是病人，也许是密探，或是监视隐藏物资的人。对他们进行严格讯问、调查，反过来为我利用，可以取得成效。

(四)通过从敌方缴获的文件，容易探知敌情及隐匿设施。

(五)以炮兵镜细心地监视敌情很有成效。

(六)将搜索据点推进到封锁线外(敌地区内)对于获得情报效果甚大。

(七)应禁止向敌区远处派遣少数人员，使其孤立活动。

(八)对敌宣传，以通俗易懂的文件，绘画攻其弱点要害，对敌区的民众工作易于收效。

(九)印刷物不宜随便乱贴。应召开民众大会，会上由村中有力人士说明宗旨，其内容要使一般人都能接受。张贴文件不仅限于屋外，室内也有张贴的必要。

(十)在准治安地区，敌我的政治工作活跃展开，双方的印刷品、壁画等大量张贴，民众因而中毒，似属实情。

(十一)巡回放映电影、演剧等，收到很大效果。电影主要内容为治安强化运动、自卫团的活动、修筑治安道路等。

(十二)用医疗药品进行宣抚收效甚大。这主要说明，如从政治、经济及其它物质与精神两方面同时进行工作，必将产兰效果。

三、关于政治工作事项

(一)政治工作班的组成和运用，应使之与其所属部队的行动紧密配合。在封锁部队中应有重点地统一使用，在进攻部队中以担当敌情搜索、宣传等单一任务为宜。

(二)根据经济封锁要领，对断然进行封锁的敌区居民进行匪、民分离工作十分困难，必须与宣传、宣抚工作同时进行，并且应有重点地固定地进行工作，方有成功希望。

(三)民众工作，应寻求时机，与居民经常进行恳切的接触，特别是与男女青年亲密交往，易于收到实效.

(四)设置无人地带，认为有以下效果:

1.可以摸出敌人对“准治安地区”的情报收集工作，民众工作，党、军的组织工作等的规律。

2.可使敌区居民获悉我方的实力和坚定的决心，从而促使其失掉对共军的信赖。

(五)政治工作班的组成，虽根据情况而定，但各县如按以下形式组成，效果可能较大。

1.班长(由日系职员或区长等信得过的实力人物担任)。

2.自卫团,合作社、新民分会等的指导员。

3.情报宣传员。

4.武装工作人员(特务工作队、县警备队、新民武装工作队)。

四、关于进行作战事项

(一)当探知敌潜伏人员时，应立即采取逮捕措施，企图采取翌日拂晓突然包围等办祛，颇多招致失败。为此，平素即须进行夜间随时出动及在地势不平的山岳地带夜袭的训练。

(二)支队向敌区进攻时，根据敌情，成一路纵队，不如分成较小的数路纵队前进比较妥当。但必须绝对确保相互间的通信联系。

(三)共军占领阵地时，通常在其后方置有相当的控制兵力。

(四)在讯问当地居民及俘虏时，通过雇用的佣工等华人进行，效果显著。进行战斗时，使一部分部队改穿便衣，效果较大。

(五)通过固定路线，不仅不利于捕捉敌人，且有遭受伏击和触雷的危险。

(六)据俘虏称，日军到达村庄立即放火，因而易于看出其所在位置。并且指出日军后方一般警惕性都不高。

五、其它

此次作战之际，从方面军司令官到第一线兵团长等均强烈要求，对待民众必须严格遵守军纪，因而进攻作战期间，一直保持良好的纪律。另一方面，观察共军对民众的态度，其纪律更是严格谨慎，亲密无间。例如:使我方工作人员伪装敌方工作人员潜入村庄，妇女，儿童等毫不恐惧地与之接近，这样事例很多。

总之，关于我方对民众的态度，不但是我军本身，就是为我所用的密探、苦力或者有协作关系的中国方面武装团体，均感到有更加提高道德观念的必要。

在共军方面，为了争取民众的支持，对军纪的要求极为严格。例如在行军

中，有人摘了路旁树上的梨子给在押的俘虏，俘虏拒绝接受，并说农民的东西不能随便吃。又如关押在龙华县公安局的一名八路军士兵，曾因在某村宿营时与一妇女秘密谈话而受到处分，其军纪之严以至子此。

五 1941年秋季各项施策的推进

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

以经济战为主体的治安强化运动 鉴于第一次、第二次的成果，为了使之更加飞跃的发展，于11月1日至12月25日间，开始了第三次的运动。运动的重点在于进行灵活的军事行动的同时，断然进行强有力的经济战。即彻底封锁所有敌占地区，一切物资一概不准外流。另一方面，积极确保能够获得的物资，并实行合理的配给，促进华北经济自给自足，以期安定民生。

方面军于9月10日对各兵团(特务机关)及民办公司发出通报,要求依据“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实施要领”开展此次运动。并同时通报兴亚院联络部要求根据“要领”指导华北政务委员会，采取相应行动。

注:由于现存资料的关系，只发表日方材料。

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实施要领

1941年9月10日

冈村部队本部

第一 方针

扩大过去治安强化运动的成果，采取更加机动和进攻性的活动，以期加强治安工作。为此，重点指向经济方面，彻底实行经济封锁，促进重要物资的生产、供应，加强我战斗力和经济力，摧毁敌匪的抗战意志。

第二 指导要领

一、应使一般群众普遍理解，为了安定华北民生，巩固治安，必须彻底实行经济封锁的重要意义，从而使其自觉地投入运动。为此需要说明:

1.现在敌匪的抗战能力，是依靠来自我势力范围的物资及第三国的援助才得以维持的。因此，应充分理解彻底封锁物资外流，是进一步扩大敌人目前最感痛苦的经济危机，并以此为突破口，迫其放弃抗战意志的切实可行的有效措施。

2.应强调敌区物价昂贵，经济危机的严重情况，使民众自觉认识到如不切断与敌地区的经济联系，我亦必将逐步被卷入敌人的经济混乱旋涡中。

应使明确认识，凡为了个人利益和敌区进行交易者，就是扰乱大众经济生活的汉奸，必须加以打击。

二、应使民众彻底理解:为了华北人民生活的稳定和提高，必须摆脱依附英、美、苏的经济，确立东亚共荣圈的自给自足经济的重要意义。

因此，应增加华北各种资源的生产，特别是促进今年收割期农产品的上市，为确立自给自足经济做出贡献。

三、关于自治自卫工作的组织和训练，由于前两次的治安强化运动，已有很大跃进。但是，为了使之发挥更大作用，应通过上述经济封锁及获取物资的运动，使各种自治自卫组织相互连结，加强有机活动，促进对敌匪及中共组织的攻击，以便建成牢固的治安经济阵营。

四、应强调为了加强经济封锁，不仅需要农民的支持，更重要的是需要工商业者，特别是大商人、公司、合作社等积极主动的支持。在彻底实行经济封锁的同时，要调整和加强物资流通机构。

五、经济封锁虽应各按其领导的指示进行，但需要发挥日华军、官、民的总体力量。此外，还须强调采取滴水不漏的严密措施的重要性。

六、在这次运动中，应比过去更加支持和推进新民会积极主动的活动。通过此次运动，并应领导新民会进一步扩充和加强其势力。

七、应对过去治安强化运动的成果加以研究分析，在运动开始前，应做好符合形势要求的计划和准备工作，以切实体现此次运动的精神，并使运动做到重点集中。

第三、实施要领

一、此次运动，凡前两次治安强化运动计划中曾经指示的事项，一律继续遵照执行。关于经济封锁，应按“1941 年度经济封锁要领”精神，在强力统制下加以实施。

二、此次运动的实施，大致规定为自 I1 月 1 日至 12 月 25 日之间。但由于农产品的上市及当地其它情况，可作若干变更。

三、鉴于过去治安运动的成果及华北的现状，应对下列各点，特别加以注意。

1.应使日华官民彻底理解此次运动的精神及要点。为了使其自觉参加运动，首先要做好准备工作。为此，应使新民会进行活动。

2.应对第二次治安强化运动的成绩进行研究，深刻探讨成败优劣的原因，铲除祸根，整顿体势，以便使此次运动取得充分效果。特别应改变历来依据私情，轻易变动人事的做法。在此次治安运动中，明确规定根据成绩表现择优提拔，以期实现人事工作的明朗化。同时并淘汰懦弱无能及对形势抱观望态度的人物。

3.为了促进各种自治自卫组织间的有机活动，应特别注意以下各点:

(1)做好毗邻的保甲之间的联系，以堵塞村与村，县与县之间的空隙。

(2)合作社，为了充分支援经济封锁及促进物资上市，应加强经营管理，特别要密切与保甲组织、交易市场、及农业仓库等之间的联系。

(3)省、县警备队、保甲自卫团、各种武装团体及宗教团体等，应经常密切上下之间的联系，并做好在危急时守望相助迅速救援的措施及训练。消灭由于敌匪袭击造成的被绑架和解除武装等事故，坚定对农村自卫的必胜的信心。

(4)明确划分各种工作队的任务，消除对立摩擦，在工作中做到互相联系。

4.面对敌方对治安强化运动加紧破坏的情况，应予以反击，并进而在敌地区扩大我方势力，加强各种自治自卫组织的攻势行动。

为了在省长、市长、道尹、县长等的一元化的领导下，一致对敌，应实行数县联合讨伐，特别是省、县交界附近的剿匪讨伐等。

5.利用秋收季节，在各机关及民众密切配合下。努力做好农作物的收集、保卫等工作。

为此，应在各地遍设农产品仓库，并加强防御设施。

6.指导各种公司、合作社、买办、大商人及其他一般工商业者(特别是华人方面的)，使其经济观念能与新体制相吻合。又为了促进经济封锁和物资的上市，应进行必要的机构改革，使其积极主动地支持治安强化运动。

7.对于未经许可私自与敌匪地区进行交易或囤积居奇分子等，应指导民众把他们做为公众之敌加以排斥。此外，节约消费、奖励储蓄、回收利用废品等是稳定民众经济的最重要事项，应做为民众运动，加以开展。

8.各矿山、煤矿、工厂、公司等使用多数华人职工的场所，为了自给自卫及增加生产，尤应整顿和加强以下设施。

(1)整顿工作人员及包括其家属在内的社员组织工作，使共军无法潜入。

(2)对工作人员及其家属以及他们住在农付的生活福利设施应加以整顿，使他们主动地保卫爱护所属的矿山、公司，并培养他们成为提供劳动力的源泉。

(3)采取上述措施时，特别应与新民会保持密切的联系。

9.过去的治安强化运动，由于各机关、团体、领导的带头示范，促使民众奋起，此种作法更应加以推广。各级领导应深入第一线进行适当的领导和鼓励。使此次运动更加积极地开展起来。

省长、市长、道尹，县长等，不仅作为行政机关长官参加，并要以新民会职员身分投身运动，努力体现行政机关和新民会的表里一致，以利加强和扩大新民会的工作。

四、此次运动所需经费，另行规定。

此次运动执行情况及详细成果虽尚未明确，但经济封锁似有很大影响，兹述其概要如下:

华北治安强化运动，在以后的1942年3月至6月中旬之间，又以“东亚解放，剿共自卫，勤俭增产”为目标，开展了第四次运动。同年10月上旬，又开展了第五次运动，提出“完成建设华北和大东亚战争，剿灭共产党与肃正思想，确保农产、降低物价，革新生活、安定民生”四大口号，使民众运动与武力肃正结合在一起。

另一方面，南京的国民政府也与华北治安强化运动相呼应，展开了新国民运动。国民政府以清乡工作和新国民运动为两大基本任务。前者于1941年6月10日召开了第一次清乡地区行政会议，自7月以来，进行了扬子江南岸地区的清乡工作。新国民运动是在“纯正国民党”四中全会(11月9日至11日)时提出，于11月30日的日、满、华共同宣言一周年纪念日，以建设新中国促进全民总奋起为目的，加以实施。

汪主席于11月26日会见中外记者团，阐述了如下旨趣:

新国民运动，是认清我们自身的弱点，并有改正的勇气，而向和平反共建国迈进，以期安定民生，确保治安的运动。此运动，不象过去的新生活运动那样，另设专门机关，而是由宣传部、社会运动指导委员会等政府机关和纯正国民党、东亚联盟等民间团体结成一体，期待民意的振兴。

如上所述，随着时局的重大变化，在华中、华北群众之间逐渐见到民意兴起的景象。

中共方面的对策 华北治安强化运动，似给中共方面以相当的影响。中共方面采取各种对策的情况也逐渐查明。“剿共指南”对中共在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时的情况做了如下的叙述。

中共方面的“治安强化运动”对策

一、对治安强化运动的反宣传

当进行第一次治安强化运动时，中共方面对此只是用恶性的造谣宣传加以回击。但是，第二次农村武装自卫政策一经展开，中共立即显出惊慌失措。随后到第三次的经济封锁政策加强时，敌方才开始采取认真具体的对策。

敌进行反宣传的文件、新闻、传单等的大意如下:“所谓治安强化运动是灭亡中国的运动，是蹂躏、污辱民众，没收金钱，替日军卖命的运动”。“这个运动是为了抓壮丁、修城墙、修道路、增加据点、征收各种捐税等”…增加敌占区内同胞的痛苦，严密统治，企图防止抗日活动的运动”。“敌人不仅是掠夺金银，就连盐也不放过，因此，同胞受到极大的痛苦，敌人所说的治安强化是最残酷的罪恶手段”等等。

中共方面进行如上宣传的目的，就是企图把中共自身历来实行的强制征收、掠夺、暴行等转嫁给日军，从而转移民众怨恨的目标。

另外，对于中国方面在此次运动中的异常活跃，则宣传是“日军强迫的行动”或“日本为了弥补兵力不足，战斗力的下降等。”并散布谣言，把群众对这次运动的理解和支持，说成是“由于日军的命令和严惩的结果”。

二、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的对策

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和太行军区司令部，强迫敌地区内的居民，用各种方法费尽心机采取对策。在10月的联合布告中有如下叙述:敌在每次进攻前，先派出很多汉奸、特务、化装成小贩和乞丐等各种伪装人物潜入我根据地，侦察我军事政治状况，并诱惑、利用人民，调查储藏财物，粮食等的地点，散布谣言，扰乱民心和社会治安，作为扫荡抗日根据地的内应和响导。我们必须动员军、政、民一切力量，铲除这些汉奸，特务分子，保证人民生命和财产的安全。为此，由10月15日开始实行全区戒严，同时，并规定以下事项:

1.加强农村的警戒

对农村要冲，分别派出青年抗日先锋队、自卫队的强壮男子站岗放哨。日夜不断，加以警戒。

2.严密检查行人

凡未携带通行证、武器证明以及行迹可疑者，立即扣押，移交政府或驻军加以调查、处理。对武装汉奸，断然逮捕，遇有抵抗，当场击毙。

3，切实进行户口调查

各村政府必须在限期以内造出户口调查簿，经常调查户口。军政机关应随时派遣人员协助调查。各户对来历不明者，不得任意留宿，熟人投宿时，需要取得村政府的许可。

粮食、器皿等物品，必须搬到村外远处，密藏在安全场所，实行“空室清野”。

一切盗匪行为，均披认为是对日军扫荡的策应，严加惩处。

各村居民发现情况可疑者，应据实密报，一经查明情况属实，应立即加以处分。

4.各级政府、武装团体、群众团体等应积极领导、支援做好上述各项工作。

三、经济封锁的影响和敌方的对策

由于经济封锁，向敌地区流出的物资迅速减少，敌方物资缺乏，物价腾贵的现象到处可见。

敌北方当局，在11月10日的军政负责人会议中指出，“经济封锁是关系到中共生死的向题”。“由于日军的经济封锁非常严密，我方的物资供应仍然困难。但我方也实行了经济反封锁，禁止原料外流，同时发行纸币，联络商人努力做好吸收必要的军需物资工作。然而，由于市场各商店均关闭门户，因此有必要采取适当的措施。”

在保定道敌区的山地方面，由于粮食、物资极端缺乏，群众贫困已达极点。

因而曾发生山地农民袭击平地居民的激烈斗争事件(11 月下旬唐县南城村)。敌人想方设法采取对策，想要通过破坏封锁，从京汉线以东平原，收集并输送物资，以及强迫施行统一累进税以取得物资，对我方进行扰乱。

在五台附近的敌地区出现了小麦一斗售法币 30 元的高价，食盐价格也高达我地区的五、六倍。

敌人对我隔断壕(惠民壕)颇感苦恼。11 月 18 日晋察豫边区政府召开了各军分区司令部、各行政专员公署的联合大会，对如何防止我方修筑封锁壕及通过封锁壕的方法等进行了研究。

以上表明，我经济封锁确实给敌人以极大的影响。对此，他们采取对策，号召“加强对敌贸易战”。即:

1.在输出方面，应制订缜密远大的计划和建立组织，通过调查各地区的产物、奖励现地物资的输出、扩大输出地区等措施。使之转向出超，用以粉碎日军经济掠夺及“以战养战”的阴谋。

2.在贸易战方面，不要从单纯的经济观点出发，而被少数营利者所乘，移出外汇，只许交换根据地所必需的物资，外运货物售出后收取伪币(联银券)。禁止再换成边区币。

3.贸易机构，是健全贸易取得胜利的第一要素，必须依靠强有力的贸易机关和商业组织，加强对敌的贸易斗争，杜绝奸商的资敌活动。此外，为了获得对敌经济斗争最前线的堡垒，使之发挥最大的机能，强调要统一集中所有的经济力量。

四、“联防”和“封锁线”政策

该项政策系由冀南军区政治部发布的，是针对我治安强化运动。为了防止我方日常进攻造成的影响而实施的农村自卫政策的一例。

所谓联防，就是组织民众将村与村、区与区，县与县联合起来进行民众抗日自卫工作。封锁线就是为了巩固联防，在敌我根据地交界的附近进行军事、政治、经济封锁的连锁线。

联防的任务是:

(一)监视谍报活动。(二)武装群众。(三)肃清日方密探。(四)防止联银券流入和禁止物资的流出流入。(五)防止日方宣传的流入。(六)防御土匪和确保治安。(七)处理抗日工作交通情报网等。

联防组织:

在村分队、区大队、县支队等团体之外，设置将以上互相联合起来的村、区、县的各“联防站”，承担重要的任务。村联防站长，由其所在村的自卫队长担当，负责指挥所担当的几个村的通信联络及军事行动。

封锁线:

是把几个联防站连结起来，以其中最接近日方根据地的村，做为封锁村。在联防站长指挥之下，由各村的自卫队和模范班进行工作，贯彻执行封锁政策。其任务是:

1.对于运进日方地区的物品及由日方地区出入的人员，进行检查和取缔。

2.逮捕或杀死少数的日军、新民会员、密探及新政府方面的行政机关人员。

3.遇有日军进攻时，侦察其行动、方向和企图，向联防站报告。

冀南军区指令实施的联防工作的具体内容如下:

1.平时的办法

将平时不用的器具、物品及不能携带的物品等挖洞埋藏起来，尽可能地减

少可燃性的器具和燃料，做好“空室清野”的日常准备工作。白天由妇女、儿童或男人，夜间由壮年自卫队员或模范班员严加戒备。

出入村落，虽属工作人员亦必须出示通行证件，夜间使用暗语口令。发现土匪时做好进攻的准备。此外，并努力做好收集日方情报、侦察日军行动等工作。

2.日军进攻时的办法

当日军接近到15华里时，向联防站区大队队部报告，派出侦察员进行侦察活动，发出警报，通知村民向指定地点集合。同时处置衣、食、燃料等物，开始“空室清野”，村内武器，由群众携带，同时与各联络站进行联系。此时的警报，用鼓声表示日军已接近15华里。十华里以内则鸣锣报警。

日军接近六华里时，由向导带路，男女老幼、伤病员开始撤退，一般男人，按照自卫队长的指挥从事通信情报工作。一有机会即开始进攻，掩护村民撤退。自卫队长要与联防站、邻村保持密切联系，指挥自卫队员进行攻击、潜伏及收集情报等工作，并负责鸣警笛，表示日军已接近五华里以内。

3，联防戒严的办法

戒严中，退到邻村时，应向邻村报告，并受其指挥。离开邻村同本村时，共同检查有无外村人，对持有日方证明书者应隔离盘问敌情，不要加以汉奸罪，须送上级机关处理。

外村人中有行动可疑者，如为十华里以内的村民，派遣自卫队员前往调查其身分，如该村不能证实其身分时，应与十华里以外的外村村民，一同送上级机关处理。

戒严值岗放哨中，须严格遵守秘密暗号口令，并与通行证并用。如两者不兼备者，值岗人员应将其送往村分队。紧急戒严时，一般可以进村，但不准出村。戒严中，违反联防动作及故意喧嚣鼓噪者，应加以处罚或训戒。

4.自卫队长在联防中的任务

训练自卫队员；提高情报通信效果，做到及时可靠；听从上级自卫队长和联防站的指挥。

以钟、铜锣、鼓进行紧急警报，通知群众日军已进入接近距离内，并且根据击敲的方法表示东西南北的方向。

遇有土匪袭击时，联合邻村将其歼灭。土匪人数众多时，首先牵制，然后向县政府报告，请求游击队、正规军出动。

5.区自卫大队的联防任务

区大队部设联防分站，与各联防站及其他区大队部保持联系，定期交换情报。

在所属区内，日方如有行动，应根据情况，指挥区内群众武装准备对日军作战。如区内有野战军或救国团队时，应对之投送情报及通知暗语口令。

每半月召开联防会议，由联防站的负责人及模范班中队长参加。

如日军占领地与我几个区相连接时，应定期召开各区联防委员会，商计对日军的对策。

6.县支队的联防任务

县支队设联防总站，领导联防委员会的工作。

如本县内的日方据点接连邻县时，本县得与邻县协商，设置县联防委员会，讨论联防封锁事宜。

肃正作战及其成果

1941 年秋季以后，开展既对共肃正作战主要有第一军的沁河作战，第十二军的博西作战，第二次的鲁南作战等。对重庆军也进行了河南作战和汾西作战。

以对共肃正作战为主，按山西、山东等地区分别叙述如下。

沁河作战

(9 月 20 日—10 月 20 日)

第一军在中原会战结束后，又讨伐了晋南各地的残敌，并向新占领地区配备了警备兵力，努力进行肃正工作。但是由于地区广大。我兵力显得不足，特别是晋察冀边区肃正作战开始后。这方面的兵力就更感薄弱。在此期间，晋南的共军加强了沁源地区附近的根据地，并迅速向南方马壁村(沁水东北约 30 公里)附近扩大了势力。另一方面，在中原会战中对日军进行最顽强抵抗的重庆第九十八军(军长武士敏)全军幸免溃灭，退却到原第九十三军的地盘。但因给养无着，战斗力逐渐衰退(最初兵力约 20,000，到 9 月仅有 7,000 至 8,000)，在与共军对抗中，又被压缩到东山峪村(马壁村东方约 26 公里)附近，因此未能采取任何积极行动。(注：据说因第九十八军是陕西军，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曾将过重任务强加于该军。)

对此，第一军曾命令第三十六师团对九十八军进行劝降，第九十八军表面.应允，实际观望不前，态度暧昧。

在此期间，我军企图“击溃沁河河畔的共军，威慑第九十八军，使其归顺，从而将该地区加以肃清”。为此作出以下计划，并进行准备。关于开始作战时间，参照晋察冀边区肃正作战进度，预定为 9 月下旬。

第一 方针

军决定歼灭扫荡沁源及马壁村附近、沁河河畔之共军。对敌之中央军则采取谋略活动使之归顺，或保持中立，不得已时亦将其歼灭。

第二 指导要领

一、首先歼灭府城镇、马壁村、谭村附近的共军主力。为此，一面严加保密，一面在另外地方进行作战准备，俟机迅速机动急袭敌军。

二、其次调转一部兵力，歼灭绵上镇、沁源、松交附近的共军，各兵团开始进攻的时机由方面军统一掌握。

三、击败敌军集团部队后，分驻于原敌盘踞的地区继续搜查、歼灭残余敌匪。消灭敌军根据地，扫清其势力。

四、对中央军(第九十八军)进行谋略活动，使之归顺或保持中立。为此，对中央军只进行警戒、监视，不进行攻击。

如果敌人主动向我进攻，可于击败马壁村附近共军之后，将其歼灭。

五、命浮山南方的山西军，在翼城、临汾平地阻止共军逃脱，协助我军作战。

六、作战开始为 y 月 x 日，作战期间预定约 4 周。(以下笔者略)

此次作战，由第三十六、第四十一师团及独立混成第十六旅团的各主力，独立混成第四、第九旅团的各一部参加。

各兵团于9月20日在严格保密之下，向预定地点集结兵力，于22日开始一致行动。第三十六师团由南方及东方、第四十一师团由洪洞、临汾前进，当各军进入马壁村各目标地点附近时，共军似已察觉我方意图而隐匿无踪，各队几乎均未遭遇敌人。以上两师团到26日为止，彻底扫荡了马壁村附近一带，在此期间，独立混成第十六旅团，在灵石、介休、南关镇一线构成阻截线，防备敌人逃脱。

另一方面，中央军第九十八军对我方工作未予答复，而且采取了反抗态度，以其一部向我石哲镇警备队进攻。因此，我军决定于27日将其歼灭。第三十六、第四十一两师团于结束马壁村的扫荡后，逐步向东方转进，于28日将第九十八军彻底包围，29日开始了进攻。

第九十八军企图向东方突围，但未成功。因司令部遭到突然袭击，指挥机关已被击溃，仓促之下未及抵抗，即陷入混乱状态，全军溃灭。在此次战斗中，俘虏敌军长武士敏以下3,007人，遗弃尸体1,348具。(注:武士敏由于重伤，收容于潞安医院后，于10月1日死亡。)

我军歼灭敌第九十八军后，除以一部兵力对东峪村周围地区残敌进行扫荡外，调转主力拟搜索久据东峪村周围地区的共军决死第一纵队及新编第六旅主力进行歼灭。至10月5日左右，判明敌准备向包围圈外突围，或分散潜伏。于是，各讨伐队于6日一齐开始前进，7日各队进入沁源附近，到10日为止，对该地区周围进行了搜索扫荡之后，返回原驻地。在此次作战中，对共军战果很小，未达预期成果。

博西作战

(“は”号作战—9月19日至10月1日)

第十二军(军司令官土桥一次中将)将该年度肃正地区的重点确定为津浦路以东、胶济路以南山地一带的共军根据地，并在9月进行了博西作战，10月进行了郯城周围的扫荡战，11、12两月进行了第二次鲁南作战。

博西作战的目的是要剿灭盘踞在博山(济南东南约 75 公里)西方地区的共军，同时做好博山附近重要资源(产煤)地区的治安肃正工作。

独立混成第六、第十旅团主力及第三十二师团、独立混成第七旅团的各一部参加了这次作战。关于作战经过的情况，参谋本部的《主要作战梗概》一书中记载如下。

第十二军企图对盘据在博山西方地区的共军山东纵队第四旅及第六旅的一部，围歼于胶济线以南，博山—莱芜—泰安道以西及以北的地区。首先，在作战地的四周构成两道封锁线，继而于9月19日以进攻兵团急袭、包围，在摧毁敌根据地的同时，为了搜索逃脱的敌人，对博山南方地区进行了扫荡。敌采取了“空室清野”战术，我军在作战期间几乎未能与敌大部队遭遇。于是，蹂躏敌根据地，破坏其设施，大量收集敌性物资，征集匪地区居民使之移居满洲。因此，对敌地区居民的影响极大。

注:

1.交战的敌兵力约4,000人，敌遗弃尸体282具，俘虏642人，我方死2人，伤7人。消灭敌设施：兵工厂8，手榴弹制造所1，被服厂2，粮秣积存处1，区公署2。

2.第十二军由10月10日起以第三十二、第十七师团扫荡了鲁南郯城西北地区的共军，并进行了消灭根据地作战(“れ”号作战)。

第二次鲁南作战

（“ろ”号作战—11 月 5 日至 12 月 28 日）

此次作战目的是要剿灭沂蒙(沂州、沂水、蒙阴)地区的共军，消灭其根据地，同时开展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期使治安肃正工作的空前提高。

第十二军根据方面军的意图，使军的主力(第十七、第二十一、第三十二师团及独立混成第五、第六、第七、第十旅团的各主力)及配属的第一军的各部队(第三十六师团及独立混成第三、第四、第九旅团的各一部)参加作战。对该地区采取了彻底包围形势，并为急袭敌人、一举歼灭进行了准备(注:第二十一、第三十三师团于参加中原会战及晋察冀边区肃正作战之后，10 月下旬第二十一师团向胶济沿线的张店、青岛地区移动，准备作战；第三十三师团向砀山、徐州、宿县附近移动，成为第十七师团的后阵)。其规模与方面军直接指挥的晋察冀边区肃正作战不相上下。

关于此地区的敌情，第十二军参谋大桥武夫少佐有如下叙述:

沂蒙地区的共军以徐向前为总司令，以山东纵队之主力(司令张经武—第一、第二旅)及第一一五师陈光所指挥的部队为基干，据判断兵力约为 30,000 人。徐向前的司令部在孙祖(沂水西南约 40 公里)，张经武的司令部在张铁谷(孙祖西南约 4 公里)。这些共军，在沂州(临沂)、蒙阴、沂水的三角地带(土地肥沃，农牧业颇盛，并富有矿产资原)的沂河流域发展势力，进行赤化工作。

作战经过概要如下

第十二军首先构成了对沂蒙三角地带的封锁线，同时，军的主力于 11 月 5 日拂晓，由四面一齐开始进攻。第二十一师团(步兵十大队)由沂水南北一线向西方，第十七师团(步兵七大队)由临沂及其东北地区向北方及西北方，第三十二师团(步兵九大队半)以主力由蒙阴、新泰一线向东方，逐步压缩包围圈，努力搜索歼灭企图逃走或潜伏之敌。11 月 11 日，第一期作战终了。由 12 日开始进入第二期。各兵团分驻要地，剔抉、扫荡残敌，并力图消灭其根据地。陈光指挥的一一五师的部队，向云蒙山区逃避。徐向前及张经武的司令部似潜伏在官庄(孙祖北约 10 公里)附近山岳地带。为此，对该山岳地带进行了彻底扫荡。

在此次作战进行中，当地中国方面各行政机关、民众团体等，做为治安强化运动的一环，与我军始终积极合作。如:沂州道尹王九思亲自指挥警备队进攻中共方面根据地侍郎宅，并参加其它扫荡战。同时还积极修筑对敌隔断线(有壕沟及岗楼阵地)。

作战持续进行近两个月，于 12 月 28 日结束。根据 11 月 20 日的调查，敌遗弃尸体 1,654 具，我缴获很多武器、被服，破坏了其根据地的各项设施。

第一一 0 师团地区内的肃正建设工作

一、钜鹿地区之一例

步兵第一四 0 联队第三大队(队长石桥兼雄少佐)是被一一 0 师团长称为模范大队的部队。其 1941 年 8 月至 12 月的警备状况如下。

1.大队部设于矩鹿(顺德东北约 50 公里)，担任钜鹿、平乡，广口等三县(东西约 30

公里，南北约50公里，周围约160公里地区)的警备任务。

2.部署了十个主要据点，各驻一个分队以上，并各辖两个中队的中国治安军。大队长得到情报时，不论其兵数多寡，不分昼夜立即出动，坚决采取急袭、击败敌人的方针。平时除控制一个半中队(约200名)的兵力外，并直接掌握县警备队治安军等约200－300名，总计400-500名。以此兵力不断进行机动讨伐。

3.将连接各据点的基干道路，改修为汽车公路，配备汽车分队，进行巡回警备。通信联络，以有线为主，发现被切断时，即使深夜也须立即抢修。另外，受到敌人袭击，则采用掷弹筒发射信号弹或紧急射击等方法进行通报。

4.治安状况，自1941年后半年以来日趋好转，到1942年春，已达到如饭沼师团长所希望的“在警备区内，随处都能平安无事地自由行动”的地步。

5.加强支援、指导，务使中国方面治安军能独立活动。

二、藁城、无极地区之一例

骑兵第一一0大队(配备步、炮兵各一个中队)担任藁城(石门东方约20公里)地区的警备工作。该队是被师团长称誉为模范地区的模范队。当时的大队长加岛武中佐(后升大佐)对该地区的肃正建设工作叙述如下。

1.1940年秋以后，在藁城县进行了实现模范地区的工作，在这一工作中，严防单纯进行活塞式的讨伐，而把讨伐、肃正、治安等工作紧密结合起来齐头并进。就是要切实掌握由石门特务机关派遣的县顾问、新民会员、宪兵分队员等，在共同方针下，紧密配合部队行动。同时，力图做好指导培育中国方面武装团体的工作，以便使之有效地发挥作用。

2.选拔精通华语的基层于部(下级士官)配合优秀的华人编成特别工作班。其任务主要是揭发检举敌方的地下工作人员，收集特别情报，进行群众工作等。这项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效果。

3.藁城县的治安比其它地区特别好的原因之一，是由于该县县长德高望重，工作有方，且与日军经常保持密切联系，掌握和领导民众极为热心等。该县长对加强县公署干部骨干的教育和编组县警备队，以及训练各村的优秀青年等工作，都尽了很大力量。因此，逃往外县的有力人士陆续归来。

4.根据师团的指示，藁城和无极县界之间挖筑了一系列隔断壕(主要道路口设置了了望岗楼)，并在该地区进行了积极的讨伐和肃正工作，从而粉碎了敌方策划的活动。

5.随着石德铁路的修建，改修了道路，并采取措施修建滹沱河桥梁工程及增产棉花、小米等，在安定民心上取得了很大成果。总之，应当相信，治安的根本，首先在于抓住民心。

该大队由1941年7月前后开始，按以下阶段逐步将治安地区推向滹沱河北岸的无极县一带(未治安地区)

第一阶段，为了先从滹沱河北岸地区，继而向无极县推进治安肃正工作，兵团增强了兵力，进行了积极的讨伐、宣传、宣抚等工作。在此期间，一面进行滹沱河架桥工程(河宽约800米)，一面以一部兵力进驻北岸地区，修筑了警备据点。继而通过特别工作队的活动，努力消除敌方的干扰破坏，并掌握各村的有力人物。在此期间，设立了县公署，县长积极从事县行政领导的警备工作。其后，修理整顿了主要道路和通信线路，确立了治安警备的基础。

第二阶段，以宣传、宣抚工作和贯彻特别工作为重点。

第三阶段，掌握县公署、编组并加强县警备队、警察局、负责指导各乡村自卫、保甲组织等工作。

第四阶段，支持县长掌握行政机关，根据县的指导计划，促进训练青少年及群众工作。

第五阶段，在讨伐、警备、情报活动及侦破敌方地下工作等方面，尽量使中国方面武装团体合作，从而使之能逐步接替我军。另外，部队最初进驻无极县时，共方工作队、游击队四处潜伏，居民毫不合作，气氛令人可怕。对此，各队首先由所在地开始进行肃正。逐步向四周扩大。但终归抓不住真正的敌人。部队在行动中经常受到来自住房的窗口，墙上，丘陵树林中的突然射击。偶而发现敌人，紧追过去，却无影无踪。以后得知他们挖有地道，地道的入口设在仓库、枯井、小丘的洞穴等处，地道四通八达，其至有地下集合的场所。军用犬对于发现这些地道起了作用。

然而日军总象是在和鼹鼠作战一样，旷费时日，真想举手服输。以后逐渐得到居民的协助，肃正工作才有了显著的效果。

讨伐肃正作战的成果

对治安战的实际情况或是讨伐、肃正作战的成果，很难全面叙述。

此外 1941 年秋季，山西、山东、河南各地作战顺利进展，治安强化运动也愈益高涨。12 月 2 日，方面军发表了如下一段战报，要求面临重大时局的我军官民应更加奋起。

重庆政权为了获得反轴心国家的援助，以蒋共合作伪装统一战线，极力隐蔽与中共之间的摩擦斗争。然而在与中共盘踞地区相接的华北，两者的摩擦斗争从未间断。特别是由于我对蒋、共两军进行的猛烈肃正讨伐，更加助长了两者的矛盾。到处展开了争粮食夺地盘的军事冲突。重庆叫嚷的蒋共统一战线，势同缘木求鱼。以最近为例: (一)10 月上旬，山西、陕西省境，傅作义部队和共军游击队的冲突，(二)10 月下旬在山东省南部徐向前军和蒋系第五十一军于学忠之间的冲突，(三)10 月末山西南部共军第一二九师和蒋系范汉杰的冲突，(四)10 月 27 日蒋介石命令于学忠、何柱国等对共军进攻。

如上所述，蒋、共在地方上的斗争，依然极其激烈，事态日趋严重。只有在微妙的国际环境影响下，形式上的蒋共合作的破绽才有所弥补。

其次，从我方实施的主要作战来看，规模最大的是对盘踞在山东南部的共军的作战，目下扫荡战仍在进行中。在消灭敌根据地剔抉红色地下组织等方面，业已取得很大战果。另一方面，由 10 月下旬开始的对山西省西南部的中央系第九十军及第一师的汾西作战，战果不断扩大。11 月 10 日对据守禹门口洞窟阵地誓死抵抗的敌人，断然进行了夜间袭击，取得了毙敌 1,555 人，俘虏 2,238 人的战果。

另一方面，由 11 月 1 日起持续两个月的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正在强有力地展开。在第一次、第二次治安强化运动以加强群众自卫力量和提高反共思想为目标的基础上，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又增加了对敌经济作战的内容，军、官、民正在一致奋起大力推进中。

以上是大东亚战争爆发前，华北治安战的一般状况，1941 年以后，时局急转直下，大东亚战争下的中国战场的地位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关于这一时期的华北治安战的情况，将于本书下卷叙述。

下册目录

第一章 大东亚战争开始前后的治安战
一、华北方面军的各项紧急施策
当前形势和方面军的一般施策
发动南方作战时华北的作战和警备
接受基本任务 肃正作战 警备及管内治安状况 促进作战 研究及训练 设立对共调查班进行情报谋略活动
冬季肃正作战
冬季山西肃正作战 第十二军肃正作战
二、政务、经济的指导和当地的情况
政务指导的基本方案
华北政务指导要领 方面军政务指导机构概要 省以下各地方行政指导一华北的特务机关 蒙疆的政务指导机构
华北的政治情况和新民会
租界行政的移交 中国武装团体的状况 新民会的体制和性质的改善
蒙古联合自治政府的施策
经济指导的紧急措施
华北经济指导方案 紧急检食对策 经济封锁
南京国民政府的动向
“同甘共苦”声明 内外各项政策
华北、华中接壤地带移交华中
移交经过 军事措施 行政措施
三、思想战的指导
思想战指导纲要
华北民心的动向
思想战的进展
四、中共及重庆政府的动向
中共的各项施策
大东亚战争以前的政策 对大东亚战争的方针 开战后的动静 重庆政府的动向
第二章 1942 年度前半期的治安肃正工作
一、大本营对华处理方案
建立对重庆谍报路线的工作
对华积极作战的研究
加强国民政府的措施
财政等的支援 清乡工作
二、华北方面军的肃正建设施策
1942 年度治安肃正建设计划大纲
各兵团的年度肃正建设计划
三、华北方面军的警备阵营
新师团的编制和战斗序列的变更
方面军的兵团部署
四、华北各种主要措施的实施概况
大力推动经济建设
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

对伯工作(对阎锡山工作)
五、华北全区的长期肃正作战
四月中的敌我情势
第二次冀南作战(十二号作战)
冀中作战(三号作战)(5 月 1 日—6 月 20 日)
冀东作战(一号作战)(4 月 I 日—6 月 10 日，8 月 11 日—9 月上旬)
晋冀豫边区肃正作战(C 号作战)
山东方面的作战
蒙疆方面的作战及警备
夏季占领地区内治安概况及肃正逢设的成果
中共方面的政治攻势
第三章 1942 年度下半年的治安肃正情况
一、整个形势的急剧变化与五号作战的准备工作
大本营及中国派遣军的作战准备工作一从设想四川作战到准备工作的中止
二、华北方面敌情概况
重庆军概况
中共及共军的状况
小康状态的国共关系
三、华北方面军的作战、警备情况
作战、警备概况
五号作战准备工作
冀东一号终期作战·
东平湖西方剿共作战(“リ”号作战)
第三次鲁东作战(“と”号作战)
四、推行治安建设各项措施的概况
加强特务机关与扩大、巩固治安圈
华北、蒙疆的政治情况
新民会的活动
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的开展
五、对敌经济封锁
概况
经济封锁的执行情况
物资配给、物价、货币流通的情况
从敌区获取物资
中共方面的经济反封锁
六、中共方面的贫困及其对策
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彻底实行新土地政策
实行精兵简政
生产自救运动
重建冀南根据地实况
七、向对华新政策的转变
关于设置大东亚省的问题
国民政府的参战问题

当地军方的意见及对华处理根本方针的贯彻
八、新政策在华北的实行情况
华北方面军的新姿态
中国方面的参战体制
华北日军官兵的思想动向
第四章 1943年度的治安战
一、关于华北方面军的全面施策
新年度的作战警备计划大纲
关于进攻作战的研究
兵备的整顿
兵力的集结训练与警备部署
中国方面武装团体的充实、整备
二、华北方面军的春、夏季肃正作战
1943年春冀西作战(“は”号作战)
1943年春太行作战(“ヨ”号作战)
四十号作战(5月24日—6月20日)
1943年夏太行作战(“シ”号作战)
第十二军管区内的肃正作战
三、蒙疆方面的对苏作战准备
一向的作战设想
促进作战准备
作战准备纲要的指示
情报部的设置
四、推行新政策引起的波澜
中国经济情势严重及其紧急对策
华北、蒙疆的经济政策
清丰事件
五、华北方面军秋、冬两季的肃正作战与治安特别施策
8、9月份的敌情与治安恶化的原因
—中共党、政、军的组织
秋、冬两季的肃正作战
治安特别措施
华北特别警备队的建立及初期作战
预料中的治安新情况
第五章 1944年至1945年的治安战
一、京汉作战与华北治安的对策
京汉作战(“コ”号作战)概要
确保新占领地区的治安
兵团转调和新兵团的编成
华北的全面治安和警备
华北特别警备队的第二期作战
中共方面的军事状况(1944年)——局部的反攻
二、对华政治谋略的施策
改变对中共态度的工作

中共对形势的判断
对重庆的政治工作
重庆方面的政治状况
三、战局恶化中的各种紧急措施
(1944 年后半年至 1945 年初)
中国派遣军态势的转变
华北方面军冶安警备和兵力配备的变化
确保经济和运输的对策
四、1945 年 4 月至 6 月的状况
中国派遣军的新作战计划
华北方面军的状况
最后的和平工作
五、战争结束
日本的停战
中国方面的状况
结束
译后记

第一章 大东亚战争开始前后的治安战

一、华北方面军的各项紧急施策

当前形势和方面军的一般施策

1941 年 12 月 8 日黎明，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接到发动“あ”号作战(南方作战)的特别电报之后，立即命令实行“对华北敌国权益处置要领”。随后召集各兵团长举行会议，会上大家重新表示完成任务的决心。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即席作了训示:“一、希望振作士气，促进治安肃正，二，要在前线指挥，克服一切困难。”训示的基本精神如下:

方面军鉴于其政略、战略上的地位及任务，感到所负责任更重，无论遇到任何困难，应欣然加以克服，进而推动华北境内的治安及建设，继续压迫重庆政权，保证资源的获取，从而对领导日华合作的(指日本与伪政权合作一译注)全面战争作出贡献。

对事变的处理，是我国不可动摇的国策。新的作战并未减轻方面军的任务。随着新的作战的扩大，华北方面军将转到次要地位，加之由于兵力的抽调，难免陷入防守观念。如果看清将来战争发展的趋势，必须尽快确保华北的安定，并且要保持能以适应新意图的形势，此点极为重要，切须铭记。

安达参谋长，对这一训示作了解释。其讲演内容如下:

不难预料，重庆政权将以此作为反攻良机，而采取各种活动与美英相策应。

特别是在华北，共军和支持他们的民众以为抗战前途有了光明，试图积极进行反攻和破坏活动。

今后形势的发展，与“あ”号作战的进展有极大关系。估计欧洲的形势，特别是随着德、苏战争的推移，重庆的动向将有重大的变化。在此情况下，有时可能在其武力、谋略、政治以及经济等方面暴露出弱点，对此，我们应当密切注视形势，尽力抓住良机，采取适当的措施。

方面军今后可能还要减少一些兵力，尽管如此，还要极力确保现有地区，而且对敌人的活动，应以先发制人的手段展开积极作战，促使治安更加良好。还要努力开发重要资源，取得所需物资，以培养我国国力。驻军在当地应力求自给自足，减少国家负担，使我皇军全面作战能够顺利进行。同时，对重庆政权应严加压迫，使之不能蠢动和抬头。

“あ”号作战的开始，是实现使建设东亚共荣圈前进一步的国策。为此，方面军应在中国大陆发挥坚定的支撑作用，对全面战争作出贡献。

参考: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冈村司令官的意图极为积极，比起以前更加重视占领地区以外的情况，特别是重庆方面的情况，也就是对中国事变的解决极为关心。有这样一段事情: 开战前的 11 月 27 日，在南京召开的方面军司令官会议上商谈中国事变处理方案时，曾讨论了对重庆的进攻作战问题。在当时第十一军司令官阿南中将的“从军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第十一军述说虽可以经由湖南奇袭重庆为最后手段，但应随着摧毁敌战斗力的作战，同时加强策略宣传，以谋求局部停战，达到保境安民为目的。甲集团(华北方面军一译注)述说要以十个师团兵力越过秦岭进攻重庆。如果是这样大规模的进攻计划，当然第十一军也应三路并进从正面进攻。这就是会议时的一段议论。”实际上，当时并没有具体计划，可

能是出于对英美战争前途的忧虑，谈到解决中国事变的一种方案。但是，未出半年，这一设想就具体化了。这一点或许有助于理解方面军司令官的想法。

至于开战前后的心情，从《冈村大将日记》的下面几段话可以看出。“11 月 30 日，日美交涉毫无进展，帝国正处于空前严重时机。我是乐观主义者，但考虑到战争的前途，多少也有些担心。”又，“12 月 28 日，近来，一得暇便立刻进入沉思默想之中，往往考虑到南方作战告一段落后的对外方针究将如何?于是就更加希望中国的全面和平。”

其次，值得注意的是，方面军的一般措施非常重视重要国防资源的开发和获取，这已成为治安战的一个主要目的。过去把治安摆在第一位，就是要使华北成为东亚共荣圈的一部分。参谋长在讲演中说:“今后为了对我国皇军全面作战有所贡献，应加强治安，开发并取得重要国防资源，提高当地自给自足能力。”“华北的国防资源及交通线的确保，其重要性更加增大，这已成为方面军的半个使命。”这就是说，华北担负着建设和确保大东亚战争兵站基地的任务，在形成东亚解放战争重要一环的使命中，其比重逐渐增大，因此，治安战的目的也随之有所变化。

方面军的一般施策，仅能从这些训示和讲演之中见到一些，还缺乏有关具体内容的史料。

12 月 22 日，烟总司令官视察华北各地的敌国权益接收后的情况来到北京，冈村司令官向其报告了当前的形势及方面军的一般施策，其内容如下:

在开战后十天之内，由于我军迅速而且公正地对权益的处理及初战的辉煌胜利，加以相应的宣传等，给敌人及一般民众以相当影响，华北形势对我有利，目前看不到敌人的特殊活动。占领区域内的中国民众，现在都认识到日本惊人的实力，通过治安强化运动，有逐渐服从我军强力领导的趋势。

然而，国民党的军队，已于 12 月 30 日接到反攻指令，共军也频繁宣传日本与英美开战对中国如何有利，一部分匪众有蠢动迹象。我军应随着宣传的深入，利用此一时机，以局部攻势使之发生动摇，因势利导，努力促使敌方崩溃。

在上述形势下，有关方面军的施策，曾在上次兵团长会议上作了明确指示，大致依据 1941 年度肃正建设计划，本着努力确保现有占领地区，继续压迫敌人的方针，加紧推行下列各项重点施策:

一、振作士气，积极作战，彻底讨伐。

二、确保重要资源，为充实我国防力量作出贡献。

三、促进现地自给自足，以减轻国家负担。

四、加强对中国方面的政治指导，使政略、战略的措施无懈可击，努力发挥总体力量。

此外，考虑到与苏联开战时我军的对策，势将抽出一定的兵力，军队的部署需作必要的调整，应始终坚持确保现有占领地区的边缘，以局部攻势作为完成任务的主要方法，对此问题正在研究中。

以下就方面军的军事、政务、经济、思想等各种施策执行情况加以叙述。

发动南方作战时华北的作战和警备

接受基本任务 中国派遣军根据 12 月 3 日发出的大陆命①第五百七十五号，以总作命②甲三二六号命令所属各军执行的基本任务，兹将其中有关华北方面军的各项摘录如下:

一、华北方面军必须确保西苏尼特王府、百灵庙、安北、黄河、黄泛区一线以东地区

的安定，更应迅速恢复蒙疆地方、山西省北部、河北省及山东省的各重要地区的治安，并努力压迫敌人。

二、在前项以外地区实施地面作战时，必须按另外发布的命令进行。

三、华北方面军与第十三军之间的作战地区的边界线如下;

山东、河南两省与江苏、安徽两省的边界线在1942年1月1日0时以前，仍按原来的边界线。

四、为了促使抗日势力的衰亡，华北方面军应对面前的敌人进行谋略工作。

五、华北方面军司令官除上述各项外，并应施行下列各项措施:

(一)加强对敌封锁。

(二)确保重要资源地区及主要交通线，努力培养我军的战斗力。

(三)根据作战需要，经总司令官许可，得以部分兵力派至满华国境线附近的热河省内。

根据上述命令，总参谋长作了如下的指示:

一、对敌封锁应按下列各项实施:

1.在需要的处所，构成适当的切断线，严禁物资的流进流出。

2.对我占领地区内主要城市的物资，严禁向敌方流出。

3.特别注意向敌方流出物资的主要道路及我兵团之间的间隙部分。

二、对我军战斗力的培养，应按下列各项实施:

1.确保占领地区内的重要资源地区，使其资源便于开发、取得及运输。

2.加强我军在当地自给自足的能力，积极取得并利用占领地区内外的资源。

3.在取得占领地区以外的物资时，应妥善计划，不使削弱我军对敌的封锁。

三、航空部队(略)

在这项命令中所存在的问题是，作战地区的边界线的变更以及强调加强对敌封锁和战斗力的培养。这些都是重要问题，应另行叙述。

当时，华北方面军的战斗序列，其概要如下:

在青岛以及徐州附近集结的第二十一、第三十三师团，根据11月6日大陆命第五百五十五号，分别编入南方军、第十五军的战斗序列，在近期将脱离方面军司令官的隶属及指挥。第十七师团为第十三军所属部队，现仍配属于第十三军。

独立混成第九旅团主力，为了参加第十一军的汨水作战(“沙”号作战，后发展为第二次长沙作战)，在太原附近集结以后，于12月8日夜出发。

华北方面军战斗序列概要

(括号内为师团长、旅团长)

华北方面军司令部

司令官 冈村宁次大将

方面军直辖兵团

第二十七师团(富永信政中将)

第三十五师团(原田熊吉中将，指挥骑兵第四旅团)

第一一0师团(饭沼守中将)

独立混成第一旅团(铃木贞次少将)

独立混成第七旅团(林芳太郎少将，配属于第十二军)

独立混成第八旅团(吉田蜂太郎少将)

独立混成第十五旅团(田中勤少将)

注:骑兵第四旅团(佐久间为人少将)是隶属骑兵集团的部队。

第一军司令部
司令官 岩松义雄中将
第三十六师团(井关仞中将)
第三十七师团(长野祐一郎中将)
第四十一师团(清水规矩中将)
独立混成第三旅团(毛利末广少将)
独立混成第四旅团(津田美武少将)
独立混成第九旅团(池之上贤吉少将)
独立混成第十六旅团(若松平治少将)

第十二军司令部
司令官 土桥一次中将
第二十一师团(田中久一中将)
第三十二师团(井出铁藏中将)
独立混成第五旅团(内田银之助少将)
独立混成第六旅团(盘井虎次郎少将)
独立混成第十旅团(河田槌太郎少将)
注:第十七师团(平林盛人中将)、第三十三师团(樱井省三中将)及独立混成第七旅团现正配属于该军。

驻蒙军司令部
司令官 甘粕重太郎中将
第二十六师团(矢野音三郎中将)
骑兵集团(西原一策中将)
独立混成第二旅团(真野五郎少将)

此外,当时方面军的主要幕僚如下:
参谋长 安达二十三中将、参谋副长 有末精三少将,第一课长 山本茂一郎大佐、第二课长 本乡忠夫大佐、第三课长 广濑四郎大佐、第四课长 西村乙嗣大佐,高级副官 木村千代太大佐

肃正作战 “あ”号作战将开始时,方面军根据情况判断,预料到重庆将与英美呼应进行反攻,共军随着新事态的发展将开始进行破坏活动,方面军以“一举将敌对势力的权益掌握在我军手中,先发制人,粉碎敌方的企图,宣扬我军威力,防止民心动摇,确保境内治安”为主要目标,指导各兵团进行积极的讨伐,确保资源及交通线。
其主要肃正作战行动如下:
第二次鲁南剿共作战(11.5—12.23)此次作战是我第十二军利用鲁南共军(徐向前所属的山东纵队)与重庆方面的于学忠军之间的矛盾,以消灭共军为目的,从11月5日开始的作战。各兵团在包围进攻之后,以长期驻守的战术,进行顽强彻底的扫荡,摧毁敌人根据地设施,并进行了政治、经济及劳工等工作。从12月1日开始,进入第二期第三阶段作战。共军在开始时采取退避分散、空

室清野的战术，因此很少得到捕获机会。但是，到12月中旬左右，由于天寒和饥饿，从潜伏状态，逐渐集结兵力开始游动。各兵团趁机在作战地区内外开始活动，继续扫荡，给共军以严重打击，遗弃尸体超过五千。

山西省的肃正作战以陵川附近为根据地的重庆第一战区第二十七军(在华北唯一的中央军)有南下迹象，方面军抢先展开攻势。即以第一军的第三十六及第四十一师团的步兵约七个大队、第三十五师团的步兵约二个大队的兵力，于12月14日开始包围作战，予敌严重打击，遗弃尸体超过一千。因其主力逃脱，作战于21日结束。

独立混成第十六旅团，为了整顿和改变新警备地区的现状，对盘据在太原西北地区的共军决死第二、第四纵队，从12月20日开始，到年底为止，进行肃正讨伐(独立混成第四旅团的一部也曾参加)。本地区原属独立混成第九旅团的防区，因该旅团参加第十一军的长沙作战，故太原的警备由第四十一师团的一个步兵中队接防。

渤海道地区的肃正讨伐第二十七师团从11月下旬到12月中旬，在渤海道西部(河北省东南部)进行了肃正作战。继此，从17日以步兵约四个大队及搜索队的兵力，与独立混成第七旅团相协力，讨伐了渤海道东南及山东省境内的中共游击队，到年底取得了相当可观的肃正效果。

鄂尔多斯作战为了封闭重庆军的冬季反攻，驻蒙军骑兵集团主力与蒙古军鄂尔多斯挺进队，在12月25日，渡过结冻的黄河，于月底在齐登(包头东南约70公里)附近，进行了歼灭战。后在1942年1月17日，再进至鄂尔多斯新民堡(包头东南偏南约70公里)，奇袭第八战区傅作义所属骑兵第七师等，随后摧毁该地附近敌根据地设施，20日撤回原防地。

警备及管内治安状况鉴于国防所需的华北资源的价值显著增加，确保这些资源已成为华北方面军的重要使命。因此，敌人策动的目标，也针对这些资源及运输资源的交通线，其方法越来越隐蔽和巧妙。但防止此种活动不能分调多大的兵力，各兵团应与肃正作战互相配合，努力于事前侦悉敌人的企图，采取各种辅助手段，特别是要指导并加强民间会社的自卫及警防组织。

在这期间，未曾蒙受很大的损害，但据“方面军战时月报资料”记载，管内治安状况如下:

华北治安概况

大东亚战争爆发以后，由于敌方错误判断我军在中国的兵力将要减少以及根据蒋介石加强游击战的指令等，从1月中旬前后开始，其游击活动显然活跃起来，匪害次数比上月有所增加，尤其是推行策略性的宣传，以致对新中国武装团体的策动和唆使民众破坏通信线路事件随之增加。

由于大东亚战争初战的胜利，迅速机敏地对敌对势力权益的处理，解除在中国的英美军队的武装，以及香港的陷落等，使占领区内中国一般民众对我国的实力及真实意图加深了认识，依靠日本的心理有所增长。

然而，敌方大事宣传驻华日军将要撤退，日本必败，以扰乱民心，策动反日，其谋略工作也有逐渐增强的倾向，这些都是值得注意，应予警惕的。

蒙疆地区治安概况

一、察南东部地区的平北游击队，因我军长期的扫荡及各种工作，虽然逃向北方崇礼县和满洲国方面，但在讨伐队回到原驻地后，最近又有向旧根据地移动的倾向。

晋西北的共军尚未发现特殊活动情况，依然加紧募兵并扩张基层组织。日前去兴县晋西北军区的干部，似已回队，估计其行动将趋活跃。

巴盟地区的绥蒙游击队，由于我警备队及警察队的讨伐，他们在各地辗转移动，其势力似有削弱。但据报告说，敌人企图对丰镇以西铁路沿线及银矿山(绥远北方约90公里)附近我方警备机关开展冬季攻势。同时，对共产党向商都方面的渗透也应注意。

二、傅作义向我地区派遣便衣队的活动，从黄河封冻前已开始活跃。

后套(五原地区)、伊盟(鄂尔多斯方面)的敌人，进入冬季逐渐活跃。估计敌人在警戒我军对其进攻的同时，在局部地区似有向我进攻的企图。

三、在阳原(察南)西南方山地，最近有乔日成残匪盘据蠢动。

四、苏联外蒙军，担心我方进攻，似有许多特务潜入内蒙。

关于“中共今后动向”，方面军参谋部第二课在剿共方针中，有如下的记载

一、加强宣传战

在开战初期，由于日本取得伟大胜利，显然使敌方的宣传遭受很大的挫折和困难。但是重视宣传战的共军，巧妙利用每天的战况和世界的形势，进行欺瞒夸张，鼓舞自己队伍及其势力范围内的民众的士气，以图保持和加强战斗力，同时对我方进行巧妙的策略性宣传。

三、展开游击战

估计敌人不会立即以正规军进行大举进攻，但有可能随时随地进行游击战和选派工作队员从事破坏通信和交通线的工作。值得忧虑的是，敌人可能对我军的生产机关、军需资源地带或警备兵力不足的地方，以扰乱治安为目的，向我进行袭击或策动。

三、加强谋略战

(一)对新中国的武装团体，设法使其内部瓦解，或策划背叛逃亡。从根本上破坏治安机构的各种谋略活动将更加激烈。

(二)预料敌人将使其工作人员潜入我方生产机关、工厂、军需资源存贮地、重要都市，与内部工作者互相勾结，搜集情报、暗杀要人，放火、破坏，散布流言蜚语，进行各种扰乱活动。

四、加强民众武装的动员

对共区民众加强训练，同时更企图掌握我占领地区的民众，对之加以训练、指导，使之武装起义。为实现以上各项工作，共党的地下工作，在各方面表现活跃。

五、反经济封锁

敌方为对付我方的经济封锁，推动其自给自足的经济政策，禁止向我方地区流入物资，今后还要加强这种政策，防止我军从敌区得到物资。

参考:

中共的抗日根据地建设状况

中共以陕西北部为根据地，在日军占领区内建立所谓“解放区”，在这里组织党、政、军的各种力量。在华北的军事组织，于第十八集团军属下，分设两个边区军区和两个直辖军区。

晋察冀边区军区，自1937年10月成立以来逐渐扩大，设置了冀西、冀中、冀东、平北四个军区。冀西地区有党政军的中枢机关。在太行山脉北部及河北平原地区，设置了根据地。因此，它威胁着华北主要交通线、铁路及政治经济中心城市等战略要点。

晋冀鲁豫边区军区是在1940年8月成立，由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四

个军区组成。党政军的中枢机关设在太行山内，特别是有向东方扩大势力的企图，以囊括山东省西部及其北部的广大地区。

晋北军区，成立于 1940 年 11 月，包括山西省西北部及蒙疆的晋北地区。此地是通往陕西省和晋察冀边区的走廊，也是进入阴山山脉及热河方面的根据地。

山东军区，因远离中共中央，设立较晚，在 1941 年春开始成立。由鲁南、鲁北、淮海、胶东军区组成。

通过 1941～42 年的“精兵简政”政策，进行了内部整顿，其党政军的组织都有显著的改变。

促进作战研究及训练 部队多年以来，进行高度分散部署，难免使教育训练工作受到影响，加之这次新作战的开始，动员兵力大为增加，当然要抽出许多有经验的干部，致使兵员的素质下降:

方面军根据这些情况，要求将重点放在提高“警备”教育之上，通过干部教育以提高教育水平，加强对部队的机动灵活的教育，方面军司令官亲自检查各部队的警备情况，听取有战斗经验者讲解战例，努力发扬其成绩。此外，研究中共的游击战法，特别是对如何能够捕获歼灭“退避潜伏之敌”这一问题，上下一致进行研究，提出创造性的意见，虽曾逐次得到一些成果，但仍是今后有待研究的重要课题。

方面军为实现确保占领地区治安这一基本任务，作了必要的训练和研究，此外，对占领地区以外地区的进攻作战也作了研究。

方面军要求各兵团，“根据形势的变化，或策略上的需要，或是由于更积极的企图，必须对外围敌军展开进攻，为此，应不断地对这些问题作好准备和研究”。

作为研究主题的外围地区，应考虑五原、延安、西安、郑州等方面。对西安的进攻战已经作了研究。到 1942 年 1 月末，在第一军制订了对伯工作(对阎锡山的工作—译注)的“陕西省进攻战”，在方面军制订了以武力压迫重庆为目的的“西安洛阳作战”等方案。该两者均含有摧毁延安的意义。

对苏备战的研究和训练工作比以往要求的更为具体和迫切了。

大本营在开战前曾考虑到“对美英荷作战同时又不得不对苏作战的情况，这对日本来说将是最险恶的局面。此时，要从中国派遣军抽调相当兵力转向北方，但派遣军应确保日本必须的国防资源，尽力防止敌方势力抬头，确保我军在中国大陆指导战争的基地”。要求当地各军研究准备兵团转调办法和今后的警备形势。

对此，华北方面军在 12 月 23 日，向派遣军作了报告，报告中说:“有关同苏联开战的方案，考虑到将被抽调所需要的兵力，届时军队的部署应作适当的变动，坚持确保现在占领地区的边缘地带，并以局部攻势完成此等任务，现正以这些问题作为主要课题进行研究中。”

大本营根据需要，拟向满洲方面转调兵力，指定从华北调第十七、第三十二、第三十六、第四十一等四个师团，从华中调第六、第二十二等两个师团。12 月 29 日，以大陆指③第一千零六十三号指示进行对苏作战训练。并要求各该兵团“在不妨碍现在任务的情况下，实行必要的对苏作战训练”，“暂定截至 1942 年 3 月底以前，力求按期大体完成基本教育”。

注:对关东军在 12 月 3 日，以大陆指:“适应形势的推移，限 1942 年春以前，进行作战准

备，并逐渐补充和加强”

据此，方面军及被指定的兵团，制定了移动计划，努力进行干部教育。方面军在北京召集所属兵团的旅团长级干部，讲习了对苏战法，以便进行普及教育。但因忙于肃正讨伐，几无宁日，加之各部队驻地分散，训练很难进行。

设立对共调查班进行情报谋略活动 华北方面军为适应新形势，采取了各项积极的措施，特别重视情报活动。在12月8日兵团长会议上，参谋长作了如下讲演:

情报工作的重点，在于探察“あ”号作战战况的推移和动向，使对敌人及民众的各种指施适应对华作战警备的任务。

为此，观察面前的敌军政战两方面的动向，注意占领地区内各阶层各方面的情况变化，采取必要措施，防止发生意外灾害，同时抓住敌人的弱点，利用可乘之机，不断地抢在敌人前面，努力推动各项措施的实现。

随后在12月23日发出了“方面军情况报告”，其中有如下的叙述:

随着大东亚战争的爆发，中国事变的性质必将发生变化。值此时机，方面军决定在情报工作上，适应各种措施确定重点，特别对开战以来有关影响占领地区内治安和苏联外蒙动向的情报，都要尽力搜集。

必须强调政战两方面的情报与各阶层情报的搜集及其统一处理。所有这些情报，大体分为军事情报和治安情报两类。

在军事情报部门中，方面军为了进一步加强对中共党、政、军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于12月设立了对共调查斑。过去在北京设有“黄城事务所”作为参谋部第二课的外围机关，但随着它的机能的扩大，已经成为军内的机关。其总部设在北京的“六条公馆”，在济南、太原、石门派出支部，配属于驻在当地的兵团。总部拥有成员七、八十名，开始时以黄城事务所成员为基干(不用中国人作职员)，逐渐增加了陆军中野学校毕业生、宪兵、各兵团的情报军官及富有学识和经验者。支部成员为五至十名，必要时由总部增援。主要业务: (一)调查敌方工作的实际情况，分析缴获的文件; (二)研究治安对策，并作出有关献策; (三)综合、评价送来的情报; (四)对当地驻军，进行有关中共势力情况的教育; (五)编辑发行“剿共指针”等资料。在1942、1943年期间其成绩最为显著。

治安情报，以各地特务机关、兴亚院以及各会社(公司)的调查部为主体进行活动，并以军事行动范围以外的情况为对象。即(一)行政机构的整顿及工作情况; (二)纳税情况; (三)通货流通情况; (四)物资上市及配给情况; (五)交通通信机关的建设及被破坏的情况; (六)民众对新政权的支持及理解的情况; (七)日语教育及其普及情况; (八)民众的心理状态及生活情况。上述各项是调查了解的主要目标。

关于谋略工作的开展，已在上述兵团长会议时强调，或诱导敌人实现局部停战、或参加和平归顺我方、或诱导使之成为摇摆不定的中间势力，12月23日的“方面军情况报告”中，对其实施的情况有如下叙述:

随着新作战的进展，逐渐予敌以深刻影响，鉴于策略上的措施，尚有不少工作，现正努力进行中。

1.扰乱中共的工作，在中共内部结成反共派别，使之引起相互矛盾和摩擦，从内部促成思想上的分裂，这一扰乱工作已经准备完毕。

2.对伯工作(对阎锡山工作，以后叙述)

3.与“对伯工作”相关联，目前对傅作义和于学忠的工作虽正在着手准备，但尚在联系阶段。

4.随着此次开战，要注视部署在所辖部队中的投诚部队的动向，针对情况作适当指导，但目前尚无特别动摇迹象，大体保持平静。

反谋略事项。由于作战资材及民用物资等管理和收藏设施不完善，容易成为潜入敌人的谋略目标。如将这些东西焚毁或作废，一旦需要时，就会影响战斗力。因此，避免大量物资堆积一处，要加强警备，妥善储存，周密注意，以保安全。所幸这些方面，尚未遭受大的损失，但通信交通设施遭受破坏的事情则尚未绝迹。

冬季肃正作战

由于方面军各次的肃正讨伐，共军在表面上的活动很少，专心于精兵简政的方针，积极进行地下活动，推动民众武装，准备进行反扫荡。另方面，在 1 月前后的游击期一过，重庆军的蠢动，虽暂呈平静局面，但进入 2 月，其局部进攻和扰乱活动又活跃起来。

注:关于民众武装，在前年 12 月，第十八集团军司令部对边区武装委员会作了如下的指示:(这是六条公馆搜集的情报)

一、全边区民众应在反扫荡战斗中，组织并武装“民兵青抗先基干队”及自卫队。

二、民众应准备的事项:(一)彻底做到空室清野；(二)建设泥土房屋；(三)迅速转移牲畜；(四)组织商人武装；(五)在进行以上工作的同时，武装准备委员会应检查全面工作情况。

三、军事机关，应对于实弹射击、投弹、野外战斗演习、露营训练及武器使用、保管和检查工作，进行指导。

四、政治机关，应对正规军，游击队及民兵自卫队具有正确的认识，了解有关武装委员会的纲领和民兵的具体工作，以及目前抗战的状况。

注:蒋介石于 1 月 23 日向各战区发出特别指令，以侦察日军状况、研究总反攻时的进攻战术及振作士气为目的，命令第一线守备部队以一个月为一期，规定地区和时间，轮流展开活动。

方面军根据年度计划(后期)的作战指导纲要，从 1 月以后，展开了对华北全区的积极的肃正讨伐作战。首先订出计划施行的是第一军的冬季山西肃正作战、第十二军的鲁中及鲁西作战，其它各地如冀东、冀南、河南各地也都进行了猛烈的肃正讨伐。

方面军的交战次数，仅在 1 月份内就达 1,682 次，每日约有五、六次战斗。

担任苏淮地区防务的第十七师团，在 1942 年 1 月 1 日，又调回第十三军。

以下概述主要肃正作战的情况。

冬季山西肃正作战(一号作战) 第一军计划从 2 月上旬开始，约以一个月的时间，在山西全境进行剿共作战，企图击溃共军和彻底摧毁其根据地，获得并搬运其武器和物资，以便扩大治安地区的范围。为此，在 1 月 11 日，下达了作战命令，命第三十六师团在晋东南地区、第四十一师团在沁河河岸地区、独立混成第三及第十六旅团在晋西北地区、独立混成第四旅团在石太线南方地区，分别进行肃正作战，又命第三十七师团在夏县周围及中条山脉南部进行扫荡。在这次作战中，所用兵力计有步兵约二十三个半大队，山炮兵约二十七个中队，野战重炮兵约两个大队。此外，方面军命第一一 0 师团的步兵约三个大队及第二十九独立飞行队的主力，与第一军协同作战。

作战经过概要如下:

晋东南地区 第三十六师团是由师团及步兵团司令部、步兵第二百二十二、第二百二十三、第二百二十四联队、山炮兵、工兵、辎重兵等各联队等(编制定员为 13,952 名)所组成，驻扎在泽州、潞安、沁县地区，担任太行山脉南部地区的肃正警备工作。

第一期作战(2 月 2 日—7 日) 各部队拟对桐峪镇、洪水镇两地附近进行分进合击。于 2 日至 4 日之间，由辽县、沁县、襄垣、潞城出发进至目标附近，但共军事前即已分散潜伏，未遭遇大的部队。以后我各部队在该地一带进行了扫荡。

第二期作战(2 月 8 日—25 日) 师团主力与从京汉西方武安西进的第一一 0 师团的部队协力，在涉县、黄泽关(涉县东北 36 公里)、黎城北方、桐峪镇东南的广大山岳地带进行了扫荡。交战次数虽不多，但因这一带是第十八集团军的根据地，缴获了许多武器和资材，摧毁了各种施设。在此期间，师团的一部从襄垣地区向沁县东南地区，随后又在潞城北方地区进行了彻底的扫荡。为了说明这一时期部队行动的实例，从第一军作战记录中摘录有关步兵第二百二十三联队(联队长:高木正实大佐)的行动如下:

高木部队，8 日向外搬运在洪水镇附近发现的钢材，9 日从该地出发，黄昏进至黄烟洞(洪水镇东南偏东 15 公里)，10 日发现了很多武器和资材，在其附近一带进行扫荡，摧毁了该地的敌方各种设施之后继续南下，击溃各地之敌，于 16 日进至黎城东北地区。随后，为了奇袭涉县附近之敌，于 17 日黄昏由该地出发，18 日进至西达城(涉县东南 24 公里)及涉县北方地区，但因未能与第一一 0 师团取得联系，遂从该地区上溯漳河上游，在东崖底(桐峪镇南方 6 公里)及黎城北方地区进行了扫荡，25 日在黎城集结。在这期间到处与敌人展开交战，击溃敌军约达 1,200 人。

参考:

黄烟洞的战斗 黄烟洞是个被险峻山岳所围绕的谷底小村庄，早就是第十八集团军的武器补充据点。设有兵工厂、地下作业场、仓库等，从石太路方面运进钢材，制造补给武器弹药。第三十六师团早拟攻占黄烟洞，曾数次试行进攻，但都未能成功。1941 年 11 月 11 日，在步兵第二百二十二联队长葛目直幸大佐指挥下，以混成步兵三个大队为主力，采取攻坚战术进行猛攻，于 17 日将其攻陷(共军守备兵力约一个营)。我方虽付出相当大的牺牲，但摧毁了根据地设施，缴获了很多生产器材和武器。

第三期作战(2 月 26 日至 3 月 4 日) 各部队大体上按照预定计划进行了扫荡，随后回到原驻地。因有情报称，从洪水镇逃向张店(沁县南约 35 公里)附近的共军约有一个团，袭击我警备区。为此，在辽县附近集结的葛目部队立即转向张店附近一带进行扫荡。

在上述摧毁共军根据地的战斗中，取得了一些宝贵的经验教训，在“第三十六师团步兵第二百二十二联队战斗详报”中有如下记载:

第一 捕获歼灭敌人的适当手段及意见

一、以大部队从正面广阔展开包抄，然后逐步缩小包围圈。这样的战术虽然需要大量兵力，而且很难隐匿我军企图，但对聚歼善于逃避的共军，确属有效办法。

其要领及注意事项有以下几点:

1.部队应以几个纵队同时展开，再分散至大队、中队、小队、分队，构成有如网眼的小单位，不论地势如何都要大小不漏地齐头并进进行扫荡，此时尤应注意与其它部队之间

不要出现空隙。

2.小部队的齐头并进，由于地形以及有无需要扫荡的村庄、灌木林等原因，前进速度当然不同，在各部队出现差距时，在其间隙部分，易被敌人逃脱。因此，要密切与左右的联系，在作计划时，对一天的行程要留有相当余地。

3.越接近目的地，越要使包围圈更加严密、牢固，此时兵力如有余裕，可留置一部于重要地点，并以之进行扫荡或掩护后方的运输，这也是一个有利方案。

4.在构成包围圈时，从四面包围不是完善办法，应从八面、十二面，从各种高低不同的地势分进合围，这点十分重要。

二、为隐匿我方意图应采取的手段

对善于侦悉我方进攻意图的共军，隐匿我军企图是围歼敌人的重要条件。

1.故意向真正作战的相反方向前进，用这种假动作欺骗敌人。

2.从远处的集结地，发挥机动能力一举形成包围圈。

3.在攻击准备期闻，要加强防谍观念。

4.在攻击前进时，要避开有名的道路和村庄。

5.利用穿便衣的尖兵和侦察员。

三、采取奇袭包围的方法

夜间采取大规模的灵活行动，乘敌不备，在拂晓前完成包围或隔断敌人。此时倘遭遇敌方步哨或警戒部队，切不可受其牵制，主力应迅速穿过继续前进。马匹和苦力〔被强征的苦工—译注〕的声音容易暴露企图，应将行李，马驮部队留在后方。重武器及炮兵等，应使之不误天明以后参加战斗，随后向前追赶。

四、包围圈要适合兵力，限制在某种程度的小地区，形成细小的网眼，必要时可以反复进行彻底的局部包围。

五、采取反转攻击法

敌人每于我部队通过后，逐渐在我后面集结，因此，我佯向某方前进以欺骗敌人，在适当时机，迅速掉转头来进行攻击。在有多余兵力时，可构成两层包围圈，对于从第一层包围圈逃出而放松戒备的敌人，可由第二层包围圈部队协力，予以夹击。

第二 发现敌人隐藏物资的方法

一、向居民，俘虏进行讯问，利用苦力、翻译、工作队搜集情报。

二、登上村庄的高处或屋顶仔细眺望时，往往能发现情况反常的地方，那里无路可通，要靠地道或梯子等搬进物资，此等迹象即敌隐藏物资的所在。

三、敌人隐藏的物品，多在离村庄 50—200 米远的断崖、地缝、梯田(都是从道路或村里不易看到的地方)。因此，搜索时必须以一部人力搜索村内，另以主力搜索村庄周围。要注意敌人多在攀登困难的断崖绝壁中间，挖设横洞，用“悬吊法”隐藏人员或物资。这种地方都有巧妙的伪装，必须多加注意。

四、在隐藏物资的洞穴上，往往放些煤灰、干草、马粪，或立有墓标等进行伪装，或由房屋内部挖有横洞与之通连。

五、隐藏物品的地点，往往埋设地雷，多在小棍棒或木片上，拴上地雷的细绳作为记号，对此应加注意。

六、适当使用善于发现问题的士兵和富有经验的人员。搜索应付出必要的时间，也要将重武器及炮兵部队包括在内，如有可能应使用较大的兵力。

第三 宿营及给养方面有关参考资料(原文省略)

笔者注:作战地区虽是共军根据地，但空室清野只有村内做得彻底，实际很少需要送粮食来。这一地区过去曾多次进行肃正作战，原以为敌方房屋烧毁殆尽，但从这次大规模作战看来，烧毁的仅是一部分，部队在宿营方面未感到困难。

第四 其他

此次作战彻底破坏了敌方物资，给敌人以很大的打击，但在另一面，敌人为了报复和掌握民心，预料将更加积极宣传日军的暴行。此外，对我方通信及交通线的破坏将更加活跃。

二、根据此次经验，敌人对物资的隐藏和地雷的埋设方法将更加巧妙。

三、此次敌区一般居民受损害的为数不少。如果不采取只处置确属敌方物资的方法，将使民心叛离，带来很坏的影响。

沁河河岸地区—第四十一师团

第一期作战(2 月 2 日—16 日)。师团在 2 月 2 日凌晨从安泽、霍县、灵石、介休、沁县、府城镇(安泽东方 10 公里)同时开始行动，于 3 日拂晓对盘据在沁源一带的决死第一纵队及新编第六旅完成了包围网，虽然一再压缩包围圈，但敌人还是逃脱了。于是，在作战地区内进行了大规模的扫荡。为了彻底扫荡沁源周围地区，从 8 日以后，令各部队以最小的分队为单位分驻各地，进行了严密的讨伐，以摧毁敌人根据地，搜索敌人物资。

第二期作战(2 月 17 日—28 日) 师团从 17 日以后，撤回分散部署的部队，以一部兵力转向沁水，主力则一面扫荡，一面南下，对马壁村(沁水东北 10 公里)附近之敌进行了剿灭战。在 21 日夜间，从沁水、浮山、府城镇一线，缩小包围圈，随后进行扫荡，取得了很大战果。在此次作战中，山西军第六十一军(军长梁培黄)以其主力，作为我方友军参加了战斗，此点值得注意。

石太线南方地区—独立混成第四旅团

第一次作战(2 月 1 日—6 日)旅团(由独立步兵第十一至第十六大队组成)从 1 日以后，逐渐由太古、芦家庄(榆次东北约 25 公里)、和顺出发，搜素驻在宜城镇(和顺西方 45 公里)地区一带以新编第十旅为主力的部队，在 5 日进行包围并迅速袭击时，敌已逃脱。

第二次作战(2 月 7 日—20 日)旅团以主力在宜城镇附近一带进行扫荡，同时以孟县警备队在该地东北地区扫荡了晋察冀军第十九团。

第三次作战(2 月 21 日—3 月 4 日)旅团原计划在石太路北方地区及东部省境地区进行扫荡，但为了消灭新编第十旅旅部及专员公署，以主力在榆社北方山岳地带反复进行了扫荡。

晋西北地区—独立混成第三、第十六旅团

独立混成第三旅团的作战(2 月 3 日—3 月 6 日)旅团(由独立步兵第六大队至第十大队组成)为了搜索暂编第一师，第一次在石佛河(五寨西方 30 公里)，第二次在保德，第三次在苛岚附近，试图包围急袭，但敌人早已分散逃逸，一无所获。在此期间扫荡了上述各地附近敌人盘据的地区。

独立混成第十六旅团的作战(2 月 5 日—3 月 5 日)旅团(由独立步兵第八十二至第八十六大队组成)为了歼灭盘据在兴县一带的第一二 0 师(师长贺龙)及第二 0 七旅，旅团在 2 月 5 日从岚县南北之线向西挺进，至 2 月 25 日，各讨伐队分地区进行扫荡，有的地区还反复进行了包围急袭。虽取得相当成果，但敌决死第十四纵队及独立第一旅的一部依然盘据在其以南临县附近。因此，旅团以主力南下扫荡了临县、离石以北的地区。

晋西南地区 第三十七师团是由师团及步兵团司令部、步兵第二百二十五、第二百二十六、第二百二十七联队、山炮兵、工兵，辐重兵各联队(编制定员13,952名)所组成，担负黄河河防及以运城为中心的地区的肃正警备任务。

在此地区扰乱治安的是重庆方面的游击队和土匪。师团遵照第一军的全部山西地区的肃正计划，从1月6日至22日，肃正夏县平地，随后从2月15日至27日，扫荡了中条山脉(芮城西方)南部地区，摧毁了敌人根据地。

有关上述冬季山西肃正作战，在“第一军作战经过结束语”中，有如下的记载:

此次作战，对敌人的战斗力，尤其是游动兵团的战斗力未能予以彻底打击，深为遗憾。但全面摧毁了敌人根据地及盘据地区，缴获了许多战利品，认为对共军打击甚大。特别是我军以统一时间，在全山西广大地区同时发动进攻，使敌人大部不能逃到远方，同时使敌人相互之间的联系发生困难。可以断定，通过今后的彻底经济封锁和连续不断的讨伐，将使敌人战斗力益趋削弱而走向崩溃的道路。

潞安特务机关在2月的月报中，对此次作战后管辖区内的治安状况，作了如下叙述。

共军似正企图展开全面游击战，扩大抗日根据地，同时通过地下工作，扰乱我方治安。盘据在陵川地区的第二十七军在所辖各县内设置“县游击支队”，积极收揽民心和征集粮草。一部游击队员出没于我军兵站线附近，割断通讯线路，抢夺合作社运输的物资，夺取居住证，袭击县警备队分驻所。此等情况不胜枚举。

3月份的月报中还有如下一段叙述:

中共以恢复和重建由于此次作战被破坏的根据地及经济作为当前的紧急施策，重新组织各县政府，彻底精简机构，同时依靠民兵和出工的办法，来扩充军队，并通过春耕的措施，强调增加生产，努力增强抗战力量。

壶关、陵川一带的中央军，一方面展开游击战，一方面加紧整顿部队和收集粮草。

从这些情况可以看出此次作战给予敌人的深刻影响。

第十二军肃正作战

鲁中(十号)作战(2月5日—26日) 第十二军以步兵19个大队(其中有驻蒙军独立步兵第十一联队长指挥的步兵 3 个大队参加)为了歼灭盘据在以临朐南方、博山东南方山岳地带为根据地进行活动的于学忠(鲁苏战区司令)所属的重庆军，于2月5日发动攻势，随后缩小包围圈，摧毁了敌人根据地的设施。

从12日以后，转入第二期作战，到26日在沂水东北及西北地区进行了扫荡，同时另以一部在日照北方追及于学忠部，但未能将其捕获。又，对新编第四师长吴化文进行的归顺工作也尚无结果。

鲁西作战(3月1口—7日) 为迫使持观望态度继续活动于山东省西部平原地区的孙良诚(第三十九集团军副军长兼鲁西公署主任、第一游击队总指挥)速作决断，对之进行包围作哉，由第三十二师团在矩野西南地区，骑兵第四旅团在单县附近，分别击溃敌有力部队，获得了战果。后来，孙良诚终于率领所部二万五千人归顺我方，4月22日发出参加和平阵营的通电。汪兆铭主席即日任命他为第二方面军总司令。

孙良诚的行动，对重庆方面在华北的将领，在心理上给于很大影响，从此以后，归顺部队逐渐增加。

冀东道肃正作战一第二十七师团

冀东地区，是中国关内连接满洲的要地，鉴于其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特殊性.敌我双方都非常重视确保该地区。当初，该地区民众的抗日思想十分张烈，中共方面从中国事变爆发以来，即曾努力扶植军事势力，但由于距离山西根据地太远，以及日军方面的强力肃正，难以取得进展。然而从1940年秋以来，在山西的日军对敌加强了压力，敌遂沿太行山脉北上，其东进部队行动显著活跃起来。从此，在冀东方面沿长城线的山地一带似已扩大了根据地，其活动也渐趋积极。

冀东道当时是第二十七师团驻中国的步兵第一联队(队长:田浦竹治大佐)及辎重兵第二十七联队(队长:中西学中佐)担任的北部防区。师团将防卫重点放在中部(津海道)、南部(渤海道)防区。在步兵团长指挥下，分别部署了驻中国的步兵第二、第三联队，主要担当冀中方面的治安肃正工作。方面军的意图，拟在将来由治安军担任冀东地区的警备，而将1941年5月1日治安军第一期建军部队(第一至第三集团)和在同年 11 月第二期建军部队的主力(第四至第七集团)移驻于该地区，与日军共同担任剿共作战。

1942年1月上旬，当地共军对训练尚未成熟的治安军同时开始了攻击，使已经出动讨伐的治安军，在玉田、遵化之间的山谷地带遭到伏击，约有两个团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在此次战斗中担任治安军教官的日本军官七人战死，治安军的团长一名负伤。日军警备队也立即展开扫荡，但共军乘势竟对日军也进行了多次袭击。中共冀东军区(司令:李运昌、副司令:包森)以铁厂镇(丰润北 80公里)一带为根据地，第十一团向玉田，第十二团向乐亭方面游动，冀察热东进纵队进入冀东道西北的山区。

师团在1月10日，从中部防卫队(驻中国步兵第二联队)抽调步兵一个半大队，使之增援冀东道西部地区，同时于24日任命在沧州指挥中部、南部地区的步兵团长铃木启久少将为北部防卫司令官。

铃木少将转移到唐山后，2 月上旬在全区开始了扫荡。此时搜索已经发展了地下组织的共军已属困难，但偶尔也展开激战。2月5日在遵化县甲庄子的战斗中，田口休助中佐(指挥驻中国的步兵第二联队的集成大队)战死。2 月 17 日确已判明，冀东军区副司令包森在遵化县毛家庄战死。肃正讨伐进入 3 月份仍在全区继续进行。

此次中共将攻击重点指向治安军，这显示出中共为了分化瓦解治安军，而采取的软硬兼施的两面手法。而过去一向是巧妙地进行地下秘密工作。方面军对共调查班于1941年12月对此曾发行了有关调查资料以唤起注意。

其要点如下:

在冀东地区发现的敌方所谓伪军伪组织工作

地下工作方针

冀东地方，如从敌人政策的深度来看，比晋察冀边区尚处于落后阶段。然而中共政治力量，是在与华北新政权之间的激烈斗争中产生的，故其中心工作是对华北新政权的各种组织，实行打进、利用、扰乱、诱惑等所谓的“赤化工作”。

伪军工作

中共对伪军的工作，以新政权的治安军、警防队、警备队为主要对象，对之进行瓦解或争取。其基本方针是，“如保留其原来立场有利，即不使之投降，而以之做为抗日力量留在敌人内部；倘已暴露不投降将有被消灭的危险时，应断然使之投降”，其所采取的手段如下:

一 政治手段

与上层军官亲密交往，针对武装队(指治安军等伪军，下同。一译者)所发生的怀疑、不满和动摇的情况，巧妙地进行煽动宣传。对士兵则加强宣传工作，或促使士气低落。优待俘虏，不没收其私物，对之进行教化。在言语或文字中不提伪军，不进行谩骂。

二 军事手段

原则上以政治争取为主，尽可能不进攻武装队的据点，但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必须事先经司令部或政洽部批准，方可进行攻击。如受到武装队的攻击时，虽可进行自卫还击，但原则上避免杀伤，重点放在缴获武器上，并要进行煽动宣传。

对有密切关系的武装队，在军事上退让一步，如通过八路军地区时，应将该地开放给与方便，以便取得政治上的利益。

三 与新政权武装队的交涉

交涉谈判，由团级以上的军政机关进行。

各部队与武装队的按触，应在广大范圈内进行宣传。在交涉中，要保守已方的秘密，不对无关人员谈论，在进行交涉时不要使农民有所察觉。未经上级机关批准，不得为有关武装队购置物品。

此种工作的要点为“在长期坚持工作中，利用伪组织为掩护以达到我方目的，甚为必要。因此，应有计划、有组织地结成各种社会关系，在内部进行组织工作”。并指出“应有计划地使可靠党员打入伪军或伪组织内部，搜集交通通讯机关及机要部门的情报，利用伪组织及伪设施为我方进行通讯联系，这点极为重要”。

此外，争取神父、教士，与之建立友好关系，利用教徒与自己地盘以外的抗日匪团进行军事上的联系等。这从各地发生的事例可以证明。

在方面军参谋部制订的“剿共指针”中，关于1942年以后中共的“伪军伪组织工作”有如下的记述:

中共的伪军伪组织工作

对新政权武装部队及官员、公务员，停止过去那种称之为“汉奸”和谩骂的作法，从1942年前后开始，实行怀柔政策，称之为“身在曹营心在汉”。其目的是先使他们中立，然后转向反日抗日。以期在中共总反攻时发动“内应暴动”，从内部攻击日军。

甲、对武装部队的手段:

(一)使之放松警备和保护敌方工作

在警备方面尽量放松，默许中共工作人员通行和运出物资，工作人员潜入我方时，在住宿、证件、联络等方面给与便利，以免被我方破获。

(二)获得枪枝弹药的供给及出售

目前，共军获取枪枝弹药十分困难，据说七成是靠新政权提供的。所采取的方法是由武装部队直接或通过农民间接转卖，甚至无偿将武器等供给敌人，有时采取故意被俘解除武装等手段供给敌人武器。

(三)用为作战时的内应

共军在袭击我方据点时，或开城迎入，或协同共军进攻皇军，或在作战时故意放枪，通知情报、便敌早期逃逸，或投奔敌人，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四)对武装队员家属工作

共军详细调查我武装队员家属的身分，并了解他们的兴趣嗜好及朋友关系，通过家属、亲戚、朋友间接怂恿他们抗日，或发出书信，秘密争取他们，使他们仍潜伏在我方。

(五)令其传递情报

将我方的行动、措施、计划等一一通报给中共。·

乙、对官员、公务员的手段:

(一)使之破坏我方措施和进行资敌活动

使官员消极怠工、作风败坏，使我方一切措施归于失败，或从反面加以利用进行资敌活动。

(二)奖励反日的贪污行为

故意制造贪污行为或压迫民众，破坏民众对新政权的期望，离间民众使之与政府及日本分裂。另一方面宣传新政权腐败堕落的行为，甚至冒称日军作出恶劣行为，挑拨日军和民众的关系。

(三)对各机关乘机进行反利用

使党员及工作人员打入新政权的行政、经济、文化各部门工作，或使我方工作人员转向敌人，利用这种条件进行资敌活动。利用建设施工掌握民众，以便从中捞取好处，或利用经济机关之便以取得物资，利用通信交通之便，传送情报或设立通信网。

(四)情报方面

与前述对武装部队的方法相同。

其他方面的冬季作战

河南方面 骑兵第四旅团在 2 月 7 日至 18 日之间，迎击向新黄河右岸淮阳附近袭来的汤恩伯及何柱国两集团的有力部队，当即将其击退。第三十五师团也在 2 月下旬，扫荡了渡过新黄河向我袭来的孙桐萱所属部队。

河北方面 第一一 0 师团所属各部，不断展开剿共作战，有的部队几乎是连日不断地进行战斗，取得了不小的战果。尤其是 2 月 5 日在南宫西南地区对冀南军区第四旅进行的扫荡; 2 月 7 日在保定南方蠡县附近对第九军分区部队进行的讨伐，都取得了相当的成果。

但是，河北地区比其它地方的民众生活和文化程度较高，更因中共势力进入的较早，其地下组织发达，因此，对这种地区不能只停留在讨伐肃正工作方面，挖出间谍的工作是极为重要的。

警备石门地区的独立混成第八旅团长吉田峰太郎少将向烟总司令官所作的“情况报告”中，关于管区内的治安情况有如下的记述:

旅团根据所属大队及旅团的计划，在管内地区屡次进行扫荡，并与各地小部队的积极肃正讨伐相配合，使敌匪势力显著减少。但在我势力范围以外的地区，敌方宣传及各项工作则相当深入。依靠配属的宪兵等，在破获共产党地下组织方面，现正取得成效。对山区经济封锁的加强，由于我军的部署和构筑的工事以及中国方面各种设施的配合，已经取得了成果。

二 政务、经济的指导和当地的情况

政务指导的基本方案

华北政务指导要领 大东亚战争开始时对华北政务的指导，是根据“对英美开战时有关华北政务指导要领”施行的。12 月 8 日兵团长会议上，参谋长在讲演中对其宗旨作了如下的说明:

“あ号作战”时政务指导的要点，在于通过方面军以坚决态度和必胜信念制定的积极措施，防止民心摇动，更加坚定中国各机关依附皇军的信念，使之向日华一体确保境内治安的方向迈进。同时要使之成为东亚自给自足势力范围的一环，协助开发和取得资源。各

兵团应通过特务机关、新民会等各种机构，采取一切手段，使之了解皇军实力和日本民族之伟大。此外，要努力揭发扰乱民心的敌性分子，同时使民众牢记日华同生共死的道理，忍受消费品的统制和限制，并使之协助增加生产和开发资源。

为此。在加强指导的同时，应使之认识世界形势，特别要认清实现东亚民族解放的大好时机，从而积极协助我方的政务指导和对英美采取的措施。

据观察，自从开战以后，华北民心甚为稳定，对日军的信赖加深，以解放东亚的热情协助日方的气氛逐渐高涨起来。我军拟加强此种气氛，以使华北成为进行大东亚战争的据点为目标，进行政治指导。坚决贯彻既定方针，指导中国方面将各种措施集中于“强化治安”与“安定民心”方面。

1.在方面军司令官统一指挥下刷新和加强政务指导力量，进行强有力的一元化领导，不拘泥细节，切实掌捏政治大纲。

2.提高中国方面行政机关，特别是道公署的机能，加强新民会、县警备队以及农村自治自卫能力等，以扶持中国方面的政治力量和武装力量，使之能够积极参与我军的施策，进而无需我军直接援助，就能确保本身负责范围的治安，最大限度地发挥中国人的能力。

为了使中国方面积极进行活动，强调要求各军和兵团采取“间接统治”的方式，为治安而行使指挥权时，应限制在必要的最小限度。

方面军政务指导机构概要 方面军司令官在作战方面应受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指挥，但关于政务工作，则受陆军大臣的直接领导，应掌握华北政务指导大纲精神，根据战时高等司令部勤务令第九条规定的行政统监权，统治监督占领地区内的行政。即对华北有关全面的重要事项，可直接指导华北政务委员会，或根据需要(主要为有关经济事项)使兴亚院华北联络部(代理长官 盐泽清宣少将)担任幕后指导。因联络部长官直接受命于兴亚院，在机构上属于二重系统。

华北方面军参谋部第四课业务分担表			
			1941 年 12 月 1 日第四课制订
区别	军官、高等文官		业务
课长	高级参谋西村乙嗣大佐		掌握课内业务
有关政务及对外活动事项	参谋片山二良中佐（中村参谋）	（笠井半藏中佐）	一有关中央政权及华北政权事项；二重要对外活动事项；三课内教育事项；
		参谋塚本政登士少佐(大槻中佐〕	一有关作战命令、训令、训示、会议事项；二有关新民会事项；三有关劳工事项；四有关特务机关人员的教育事项。
		大槻实中佐（塚本参谋）	一有关模范地区事项；二文教及社会团体事项；三思想宗教事项；四地方行政事项。
		笠井中佐(大槻中佐〕	一有关中国方面财政事项；二特别工作费事项；三有关道、县联络员事项；四有关直辖特务机关事项；五有关地方行政事项。
		浅野修中尉山西中尉	一有关政务、经济、情报事项。二国际法关系及其他必要事项。
		大沼喜久雄陆军教授	
	(兼)参谋茂川秀和中佐		一有关中国青年党的指导事项；二其他所有 O 标记的业务。
	(兼)参谋斋藤钟三少佐		一有关第四课与报道部联络事项
经济关系	参谋中村祐次少佐	加藤晋主少佐久保中雄主少佐(兼)大井大尉	一有关金融事项；二资金审查事项；三有关产业(农产、轻工业)指导事项；四有关军管理工厂事项；五有关进出口及配给机构及其运营事项；六有关各开发公司及其事业事项；七有关“物资对策委员会”事项；八免税及报关事项。

	(片山参谋）	渡边岸郎少佐（加藤少佐）	一有关总动员事项；二有关物资动员事项；三有关产业(农业、轻工业除外.、开发指导事项；四资源调查事项；五事业审查事项；六有关马产及马政事项。
交通关系	（兼）参谋西野恒夫中佐		一有关运输统制事项
		上村竹治少佐	一有关铁路事项；二有关道路、汽车路事项；三有关船舶、港湾、水运事项；四通信(电政、邮政、广播)事项。
		平岛三树大尉	一治水、水利事项；二都市计划事项；三电业事项；四有关建设总署事项；五有关航空、气象事项。
庶务	平松安雄中尉（浅野中尉）		一庶务；二机密文书保管；三阵中日记及月报；四功绩登记；
备注	一在本表以外，有十三名“嘱托”，在本课工作。二根据业务的闲忙，互相支援，以推动业务顺利进行。		
注：第一课参谋福田毅大尉兼管有关航空及气象事项。			

当时，在政务工作方面，辅助方面军司令官的为参谋部第四课，其所担任业务的情况有如以上附表。

另一方面，在华北政务委员会内、各省及各特别市政府，根据日华顾问订约，设有顾问部(由最高顾问、顾问、顾问辅佐官等组成，其身分为日军的“嘱托”—日军聘用的编外人员。—译注)。顾问部是为协助中国方面的行政、司法、军事、警察等业务而设，因此顾问担任的工作是向中国方面各长官提出建议，回答其咨询，特别是为了顺利推动业务，在日本与中国之间，调整双方的关系。当时华北政务委员会最高顾问为佐藤三郎(预备役陆军中将)，丸茂藤平，并兼任新民会的顾问。

注:华北政务委员会任用和招聘了由方面军司令官推荐的日本技术员、教授、教官、教导员等为政府职员，其具体数字不详。

省以下各地方行政指导一华北的特务机关 方面军除统治监督华北全部行政之外，并直接担任河北省、北京及天津两特别市的政务指导，山西、山东、河南各省，则分别由第一军、第十二军、第三十五师团担任指导，其具体业务由各省及各特别市特务机关负责。对道以下各地区的行政指导，由各师团、旅团适应各地情况，命所属特务机关负责，这些地区的特务机关，为了对中国的道公署、县公署进行幕后指导，派有道、县联络员(当时称省顾问、县顾问均非正式职称)。

各特务机关长，一方面作为兵团的政务幕僚参加政策的规划和制定等工作，另一方面作为政务执行机关担当着极其复杂的多种工作。

1941 年 12 月在华北的特务机关的概况有如下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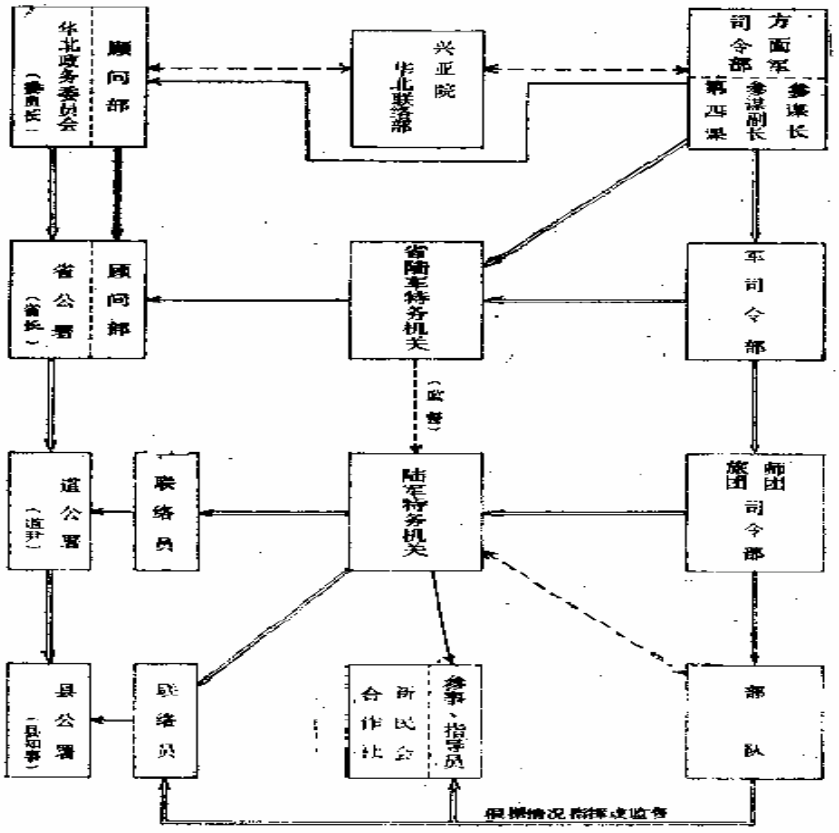
华北方面军管内（蒙疆地区除外）特务机关一览表							
							1941.12
特务机关名	配属部队		机关长	政务指导公署数			
				省、特别市	道、市	县（局处）	计
河北省（保定）	直辖		铃木繁二大佐	1	1	22	省 1，特市 2，道 9，市 2，县 131，局 1 处
北京			松崎直人大佐	1	1	15	
天津特别市			雨宫巽少将	1			
天津	27D		山下哲夫中佐		市 3 1	40（局）处	

石门	110D		石田丰藏大佐		市 3 1	37	
邯郸		1BS	冈田舆作中佐		1	河北 11，河南 6	
河南省（开封）	35D		高田利贞大佐	1	市 1	河北 3，河南 6	省 1，道 2，市 1，县 4，县（淮）2
新乡			大江庸吾大佐		1	19	
归德		4KB	原田喜代藏中佐		1	13，淮 2	
山西省（太原）			植山英武大佐	1	市 1		
临汾	1A	41D	关根淳一郎中佐		1	19	省 1，道 4，市 1，县 92
运城		37D	斋藤俊三中佐		1	15	
崞县		3BS	若山庸一少佐			12	
太原		9BS	恩田忠录中佐		1	12	
阳泉		4BS	千叶一良少佐			9	
汾阳		16BS	宫内幸五郎中佐			13	
潞安		36D	深见幸次少佐		1	12	
山东省（济南）	12A		河野悦次郎少将	1	市 9 1	95	省 1，道 10，市 2，县 105，专 1，市 1，县 25
芝罘		山东机	新乡荣次中将		市 1 1	16	
苏北（徐州）		17D	江田稔中佐	专 1	市 1	苏 12，淮 8	
海州			赤枝孝之少佐			苏 5	
合计			21	省 4，特别市 2，专 1，道 25，市 7，县 396，局 1，处 1			
备注	一“专”是苏北行政专员公署，“苏”是苏北地区、“淮”是淮北地区、“局”是新海设治局、“处”是兴隆县办事处 二青岛特别市的政务指导，由兴亚院华北联络部青岛派驻所担任 三太原特务机关，在独立混成第九旅团调走以后。关闭一个时期。						

在 1941 年底中国地方行政机关，在总县数的 398 县之中恢复了 366 县。

但是，经详细调查县政恢复的情况，实际上行政命令仅能达到县城及其附近地区而已，大多数达不到边远的乡村。特别是山西的太行山脉地区和靠近黄河的西部山岳地带以及河北省的津浦、京汉两铁路的中间地带，山东省的中部山岳地带，均为非治安地区。(1941 年底，在华北政务委员会的名义统治下的土地总面积约为 85 万平方公里，人口约为一亿一千万)

华北的政务指导机构有如下图。



备注:

1.==>指挥 →幕后指导……>联络调整

2.兵团(军、师团、旅团)长须将讨伐肃正与政务指导结成一体来规定所属部队及配属机关的任务，并对之进行监督指导，负有确保作战地域内治安的一切责任。

3.兵团参谋长受兵团长之命，分别监督指挥作战幕僚的参谋部及政务幕僚的特务机关，负责指导治安肃正计划的统制和施行。

4.特务机关长受兵团参谋长的监督指挥，参加有关政务指导的策划，指导省、道、县的政务施行。治安恢复以后，如果县的行政指导可从部队指挥官处分出时，就直接指挥县联络员、新民会指导员担任县公署的指导。

5.各部队指挥官，专门担任管辖地区内的治安肃正工作。为此，指挥或监督地区内的宪兵、县联络员、新民会指导员。在一定的方针下谋求治安的恢复。

方面军虽以这种组织对中国行政机关进行幕后指导，但为促使中国行政官员自觉地行动，应尽量使中国方面的人员站在前面，不干涉其细节，适当给以指导。由于中国方面的自觉性难以树立，因而第一线部队和特务机关等基层单位，从对治安负责或政治兴趣出发，多有深入参与政治的，这是实际存在的情况。因此，方面军特别用很大力量，扩充各特务机关和提高道、县联络员的素质。

1941 年 11 月，召集县联络员、新民会县次长等共 116 人，就剿共工作及乡村自治社会的建设，集训了一个月。此外，并在日本国内另行招募新民会会务职员，以此等办法来提高日系指导员能力。

大东亚战争爆发时，方面军在“政务指导要领”中增加了“加强特务机关”

一项，指示由所属兵团，抽调必要的人员，配备到各特务机关，或从新民会日系职员中抽调适当人员临时到特务机关工作，以此充实特务机关的力量。

此外，由方面军参谋部塚本参谋充当教育主任，从 12 月 4 日到 10 日，对“中国派遣军特务教育队”约 100 名毕业生进行了特别教育，随后将他们分配到各特务机关工作。关于这些人员的服务要领，在 18 日向各特务机关长发出通知如下:

一 要使他们成为特务机关加强军风纪的核心，注意予以指导。

二 在特务机关长直接监督下，使他们担任收集情报、辅助制作计划，联络、视察等业务，避免在外常驻或单独工作。

三 服装，要尽量着用军服。

注:“中国派遣军特务教育队”在 1941 年 9 月成立于南京的江宁，负责对中国各地特务机关的人员进行教育。由于过去特务机关的人员除机关长外，大部都是部队的文职人员或“嘱托”，因此教育队的目的就是要从军人中选拔长于此道的专家分配到特务机关。教育队的队长为派遣军的参谋副长(首任队长土桥勇逸中将，其后任为野田谦吾中将)。学生队长为乌饲恒夫大佐。学生是由各兵团选拔的大学和高专毕业的优秀预备军官约 200 名。教育期限分为三期，第一期三个月，第二期三个半月，第三期六个月。到 1943 年初，根据“对中国处理根本方针”的精神改编特务机关，解散了教育队，到此为止，从该队毕业的人员共约 650 名。

教育内容，除一般的政治、经济、文化课程外，特别要教导作为政务指导人员所必需的知识和技能，尤应着重于精神要素的培养。该教育队还起到挖掘军内人才的效果，据说毕业生在各地的活动，都受到了好评。

另一方面，活跃在治安肃正第一线的部队是如何进行政务指导的，现举一例加以说明。从第一一 0 师团步兵第一百三十九联队长长岭喜一大佐于 1941 年 11 月 28 日召集所属宪兵、联络员、新民会职员开会时，以部队长身分所作指示的摘要中，可以看出当时联络员等人的工作方法和存在的问题，以及肃正建设各项措施的情况。

长岭部队长的指示(摘要)

以下所讲的都是本部队根据师团、旅团的肃正建设计划提出的要求。

一、牢记对中国方面进行指导的重要性

师团肃正建设计划有五大重点:(一)积极不断的讨伐;(二)彻底加强对山区的经济封锁;(三)加强农村的武装;(四)铲除共产党地下势力;(五)推动中国机关(包括新民会)的活动。其中除第一项积极不断讨伐，中国方面是处于协助日军的地位外，第二至第五项则完全以中国方面为主，日军则属于对其推动支援的性质。这就是说，在师团计划五大重点之中，有四点是在此参加会议的宪兵联络员、新民会职员应当担负的工作。这也是师团即皇军对诸位所期待的，其意义的重大，切望深刻体会，努力工作。

特别是本联队管区以内，并无大规模的敌正规军，只是一些伪县政府及伪区公所所属的武装团体和土匪。因此，地方上的大部分治安肃正工作，相信中国方面是可以承担的。

二、加速治安肃正工作

最近，为指导后期肃正建设计划，在石门召开了部队长会议，师团长对与会的全体部队长作了极其强烈的训示，要求“到明年 3 月，无论如何也要完成师团管内重要地区的肃正工作”。我们有义务必须竭尽全力实现这一训示。为此，若以过去的速度进行治安肃正工作是不够的，为了到 3 月以前能达到师团长的要求，必须大大地加快速度。

你们若以一般的方法指导中国方面工作，提高速度十分困难。自事变以来我从事多年指导中国的业务，深知其中情况(长岭大佐1938年曾任华北治安军军事顾问)。搞这项工作，必须任劳任怨，坚决引导中国方面尽力加快速度，只要拿出献身战场的精神，这是能够做到的，否则到3月就不可能完成肃正工作，那时我们就违背了师团长的命令。

三、推动中国方面开展活劝

师团的肃正计划五大重点之一，就有推动中国方面(包括新民会)的活动一项，这是你们诸位的全部责任。这一重点能否实现，全看你们的努力如何。至于如何推动中国方面的活动，其具体方式方法，诸位的上级特务机关长虽已作了全面的教导，但最重要的是使他们站在前面进行工作，避免不必要的干涉，要使他们负起责任来。在某种程度上要大胆地信任他们。同时，还必须具有使他们不得不追随和听从我们幕后指导的强烈意志和信心。看看柏乡县构筑封锁构的事例，再看看近代征服异民族和征服以后应如何统治的历史，就能够懂得，利用汉民族本身的力量来统治汉民族是如何的重要。

四、加强县警备队

本联队的方针是在管区的外围县境，构筑隔断壕，并在此部署日军防止敌军侵入，管区以内则完全以中国的武装团体担任警备。为此，希望各县的警备队要排除万难，加强组织，增加人员，此事对县联络员寄以最大的希望。

对预算及武器不足等问题，不要诉苦抱怨，坚决实现军队的要求。

五、促进县警备队的活动

希望促使县警备队单独或数县联合实行讨伐，日前任县拟订了此种计划，立即对之表示极大的敬意。

六、县知事励行亲身视察检阅

要指导县知事、县警察局长对保甲自卫团、县警备队、乡村自卫组织等勤加检阅或视察。王揖唐委员长不顾年老挺身出巡各地的模范行动，应予效法。

七、加强农村自卫力最

至 3 月底止本联队管区十三县的全部农村(山地封锁沟以西除外)都要成立保甲自卫团，要在村庄周围挖沟筑墙，增加扎枪、手榴弹、洋炮。特别要在下列地点加强农村自卫力量。

(一)沿本联队管区和邻接部队交界处县境构筑隔断壕的村庄。

(二)铁路和山地封锁沟中间的村庄。

要指导和训练各乡镇保甲自卫团与邻村相互协助，对抗敌匪。县知事、警察局长、警察分所长、新民会职员等，应经常巡视农村，提起警惕，检查对付敌方来袭时的动作。

八、中国万面对经济封锁的活动

目前对山地的经济封锁，完全由日军及其指挥下的部分警备队、警察直接在封锁沟进行监视，中国各机关对经济封锁工作尚未见有所行动。诸君要通过保甲制度，推动负责监视和监察封锁的机关及负责统制购销的机关积极行动起来，以使封锁更加严密。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毫无疑问，有大量物资流出封锁线以外。蒋介石在江西对共产地区所施行的经济封锁，就是利用保甲制度才完成的。这是值得深思的。

九、经济建设

对此问题，相信特务机关长已有指示。本管区内有关植树造林和粮食、草料的增产，应迅速制订计划，不失时机地动手淮备种子、开垦田地，以便明春立即投入生产。此项计划要在12月份内作好，并提交特务机关长及本部队。

十、武装青年训练生

青年训练生是新民会的卫兵，应当率领这支卫兵，离开县城进入农村，从事各项工作，特别应使之努力加强乡村自卫力量和铲除共产党的地下势力。过去指责新民会只在县城内

埋头干办公室工作，希望今后彻底加以改变。

十一、宣传

在宣传工作上想进一言，即如元世祖(忽必烈)所说的“应天唯以至诚，拯民莫如实惠”，又如有的共军干部看到石门的繁荣而放弃抗日的信念。这就是说，用远大的理想和大东亚新秩序的信念作为新民会工作重点，向乡村民众灌输是很难收效的。还是给他们以实惠，这是比任何工作都重要的。以我军占领地区的实际发展状况，向敌方和民众进行宣传.是十分有利的办法，以上所述仅供参考。

十二、配属宪兵

有关配属宪兵，诸位的工作，已由有关教育负责人作了详细指示。只是从目前情况看，在本联队管区内已无大股敌军，主要任务是铲除共产党地下工作者，而这项工作需要靠配属宪兵的侦查，对此艰巨任务特别希望各位努力完成。

对地下工作的侦查，在日本国内尚有很大困难。何况在语言不通的外国，其困难程度是很明显的。因此，对各位的辛苦，衷心表示同情。对这种困难的工作切忌急躁。前军司令官多田骏的“治安工作必须抓紧但不可急躁”一语，值得深刻体会。

十三、联队的治安肃正计划

在此仅就联队肃正计划的必要事项叙述如下:

(一)首先以赵县、隆平、南和为重点，在与其邻接部队交界(县境)的地方构筑隔离壕，将日军、县警备队及保甲自卫团部署该线进行守备，防止敌军侵入。

(二)其次，将重点移向铁路和山地经济封锁沟的中间地区，加强该地区的保甲制度和乡村自卫力量。到 3 月底，该地区的日军将任务全部移交中国方面的武装团体(县警备队、警察)，然后撤走。

(三)赵县、元氏、高邑、柏乡、尧山、内邱、邢台、任县等八县的治安工作，要提高到石门模范区的水平，而县城及县以内的警备。则让中国方面自行担任。

诸位指导中国的工作，要符合上述计划要求。

十四、警备电话和自行车

在赵县、隆平、南和新近已分驻日军，有线电话线不敷使用，希望县里购买部分警备用的电线，借给日军使用。根据师团命令，在各大队内分别编成自行车讨伐队，各县要准备自行车十辆，借给日军使用。

最后想讲一讲诸位以及诸位与派出的日本守备队之间的融洽和切实执行命令、指示问题。

无论收揽多么能干的人才，如果日本人之间彼此不和，就绝对做不好指导中国方面的工作。囚此，希望顾全大局，放弃小我，同心协力团结一致。在现地工作的日本人最需要的是“人和”，这虽然是众所周知的，但由于我们修养不深，往往是懂得道理而不能实践。在满洲的日本人高唱“日满亲善”，对此，曾经听到满人说:“搞日满亲善，莫如先搞日日亲善，日本人之间互相反对，甲所说的事和乙说的事互不一致，我们满人不知何所适从。”这是有必要深思的。

诸位上级特务机关长的命令，以及在剿共及治安工作上对诸位有指导监督权的联队长和大队长的指示，都必须诚心诚意认真执行。对于命令和指示怀有私心、采取消极反抗态度、没有工作热忱的人，不管多么有才能，不仅没有资格在大陆第一线工作，而且作为军队的文职人员，应该说是违反军纪的行为。

蒙疆的政务指导机构 华北方面军司令官不参与蒙疆的政务指导工作，其行政由驻蒙军司令官统治监督。方面军根据需要监督指导兴亚院蒙疆联络部(长官:岩崎民男少将)。联络部长官虽然担任蒙古联合自治政府的幕后指导，但是该政

府内的最高顾问以下的日系职员已形成各部门实际工作的核心。(首任最高顾问为金井章次，1941 年 11 月 27 日辞职，后任为大桥忠一。政厅内日系职员约占全体职员的 10%，警察系统职员约为 22％。)因此，蒙疆与华北有显著不同，与满洲国相似。在此，日方的意图易于贯彻，相反却削弱了当地蒙古人、汉人等的积极主动性，但在日本的强力指导之下，正在向“高度防共地带”的建设迈进中。经常出现的问题是，军、联络部、政府不同系统的各机关之间的意志沟通及各机关内部的人和间题。为了有机地结成一个整体，曾不断努力加以解决。

驻蒙军的特务机关人事安排如下:

厚和特务机关(机关长 小仓达次少将)

大同特务机关(机关长 铃木重种中佐)

包头特务机关(机关长 稻森利助中佐)

德化特务机关(机关长 松尾勇大郎中佐)

阿巴嘎特务机关(机关长 牧野正臣中佐)

注：阿巴嘎特务机关，是关东军情报部支部，兼驻蒙军的特务机关。

这些特务机关，在事变当时是政务指导机关，随着各政厅内的日系官员地位的巩固，逐渐从政务上放手，而改成军直辖的情报(谋略)机关。1939 年 3 月 16 日，发出了停止政务指导的命令。它和华北的特务机关的性质完全不同。

华北的政治情况和新民会

大东亚战争刚一爆发，王揖唐委员长立即发表声明，阐明了全面支持日本进行战争的决心，尤其在华北经济政策方面，要与日本更加紧密联系，要求华北一亿官民团结一致，即使不直接拿起武器，也要充分尽到参战的责任。

随后，为了贯彻各项施策，于 I942 年 1 月 14 日召开各省长及特别市长会议，会上王委员长明确指出华北参战的三大方针:(一)确保治安，安定民心;(二)开发重要物资，采取粮食对策;(三)树立非常时期的经济体制。会后，各省管辖下的道、县、市长也逐级召开会议，以便与从 3 月末开始的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相配合，将政策贯彻到一般民众中去。

租界行政的移交 3 月 28 日，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将天津英租界行政移交华北政务委员会。该租界在开战时，由军接管，改称“极管区”，由第二十七师团长统辖监督该区行政。政务委员会接收后，使之作为“特别行政区”隶属于天津特别市，由该市长负责处理新的行政。广东英租界的行政，在 3 月 25 日移交国民政府。移交经过如下:

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对有关在中国接收敌性权益事项，与国民政府之间的协调问题，在 1 月 20 日，决定如下:

一、天津英租界及广东英租界的行政，移交国民政府，其时间另定。

二、敌国系统的文化设施(学校、教会、医院等)，在我方不需要的，以及上海公共租界的特区法院和重庆系统的文化设施等均移交国民政府。

三、在上海公共租界接收敌性权益进行工作时，只要不妨碍我方政策，应尽量使中国方面积极参加协助工作。

四、在进行以上各项工作时，应采取适当措施，扩大其政治效果。特别应指导国民政府不要只顾收回权益，而应使之欣然协助日本帝国完成战争。

2 月 18 日，日本政府也发表了关于移交的声明。2 月 24 日发出移交的命令。

中国武装团体的状况 对国民政府的正规军及其他武装团体，日方根据1941年1月的“中国武装团体整备及指导纲要”，进行了调整和指导。1941年12月3日的总长指示中，亦要求根据上述纲要执行。这些武装团体的任务主要是在我军占领地区内协助我军维持治安。在纲要的“方针”部分有如下的记述:

一、中国武装团体，当前，以协助我军占领地区的治安肃正工作为主，并且以成为国民政府推行政策的支柱为目的，除另有规定者外，考虑各地方的特点，以乡土自卫，保境安民为整顿、指导的主要目标。

二、将来，随着事变处理的进展及国民政府的发展，逐渐在整个占领地区统一进行整顿，刷新军容，以日军为后盾，独自担任治安工作，可能时，则使之协助日军作战。

三、整顿、指导及运用大纲等，实际上均由日军统制之。

“指导要领”中规定:“中国方面的武装团体，为国民政府直辖部队、华北治安军、蒙军及其它武装团体，隶属于国民政府、华北政务委员会及蒙古联合自治政府”。“整顿装备的数量为:国民政府直辖军队约在十一万以内，华北治安军约在十万以内(包括剿共军)，蒙军约在一万以内”。

在华北及蒙疆的中国方面武装团体中有:(一)治安军(中国称为华北绥靖军)、蒙古军、部署在华北的国民政府的直辖军及日军各兵团所指导的投降部队和谋略(特务工作一译注)部队等，(二)省、特别市、道，县、市等的警察队、警备队及蒙古警察队;(三)乡村武装;(四)铁路、水路、通信警备队(如华北交通会社及华北电信电话株式会社的警备队);(五)工厂、企业的警备队;(六)其它被批准持有武器的团体。

在华北由政务委员会的治安总署(督办齐燮元)管理军事及警察等一切治安业务，华北绥靖军总司令部由治安总署职员兼任。由华北方面军军事顾问(部长田岛彦太郎少将)负责对之进行指导。

治安军自从建军以来已有二年，总兵力为五万四千人，其主力由第一至第七集团组成(每个集团为两个团)，部署在冀东道。第三期建军的部队(从1941年12月开始)共六个团，正在保定及通州地区进行训练。此外，在密云、平谷附近有担任警备的警防队(司令王铁相)约四千人，预定最近改编为治安军。治安军存在的问题是，训练不足，尚不能独立作战，将来增加兵力时预算相当困难，并且需要成倍增加日军教官。

在投降部队中，对兵力多而且素质较好的部队，给以“剿共军”的名称，由华北政务委员会发给固定军费，令其在当地日军指挥下，担任治安警备。“剿共军”总兵力约八千，分为第一至第三路军，部署在河北省的顺德附近和山东省莱阳附近。其它投降部队，一般称作“皇协军”，暂时发给军费，目前逐步进行整顿，准备将来解散，其总兵力约有一万七千人。

在开封东方陇海铁路沿线，有“和平救国军”(为国民政府直属部队，由第一至第三军组成，亦称开封绥靖军)共约二万五千人，在该地兵团长的指导下，担任鹿邑、亳县两处的行政。方面军拟于将来命该军担任涡河(由开封东流向蚌埠)以南的县政，指导其逐步扩大治安地区的范围。

和平救国军，是以旧军阀吴佩孚的地盘为基础，它与豫东道地区有较深的乡土关系。该部队驻地与重庆军第一线邻接，一直保存到战争结束。该部队受到华北方面军的支援，自主地担任该地区内的军事和行政工作。

县警备队，是在日军进驻以后，为加强县自卫力量，逐步改编了旧有的县保安队及警备队而形成的。方面军对其实力评价很高，十分重视。至1941年底，兵力约达九万五千人，步枪约有七万九千枝，轻重机枪约230挺，手枪约5,000

枝，自动步枪约 400 枝，每县平均有 253 名，枪 222 枝。对于县警备队的指导工作，在各县由日本驻军担任，在中央归治安总署管辖，军事顾问部担任指导。

警察也逐步恢复了事变前原有的组织，经过改编重新教育，到 1941 年底，总人数达六万九千人，其中半数配备有轻武器。每县平均有 144 名，配备枪 68 枝。由驻各县日本宪兵担任指导。警察的中央领导机关为治安总署警察局，他们也受军事顾问的指导。

新民会的体制和性质的改善 随着事变的发展，新民会从思想团体向政治团体演变，由于这次战争的爆发，要求在体制和性质方面，有更大的改善，以便积极展开活动。

12 月 13 华北方面军参谋长召集新民会中央总会日系职员，就该会今后的活动以及日系职员应有的精神准备和行动准则等问题，作了指示，并要求各兵团贯彻执行。指示中强调“目前皇国正处于前所未有的时期，应使华北成为日华合作的模范地区，为了能使华北民众与中国共产党分离，只有依靠新民会的活动。更为重要的是，使中国人心向新民会，积极参加新民会的活动”。因此，必须支持“以中国人为中心进行新民会的活动”，“积极发现优秀的华人领导者”。

有关方面军培植指导新民会的设想，冈村司令官曾向新民会最高顾问铃木美通提出了殷切的希望，在 8 日的兵团长会议上又印发了“新民会扶植大纲”及“大纲说明”，明确了以下意图:

一、“方面军竭尽全力加强扶持新民会”

自从去年 11 月 30 日，缔结日华基本条约以来，中华民国南京政府已为国际所承认，对该中央政府的扶持和加强乃是日本坚定不移的国策。然而华北的特殊性在条约上也有所规定，政治事务由华北政务委员会执行。为了使政务委员会具有实力，必须扶持和加强作为其基础的新民会。这样首先加强华北，同时也就是加强了中央政府。如果立即将华北一切都使之南京化了，那并不是加强南京中央政府的明智作法。

华北始终处于日华的特殊地位，只有依靠日华关系的巩固，以及同被加强的华北、华中保持正常关系，南京中央政府才有可能得到正常的发展。

考虑到对华北当前敌人共产党的对策，大家知道，共产党以党、政、军三位一体，与民众的关系有如鱼水，正在积极争取民众，我方也必须以军、政、会三者与之对抗，打一场争取民众的战争。现将双方阵营加以对比，我方在军事上占绝对优势，在政治上也未必很差，但以新民会与共产党相比，则处于极端劣势的地位，对共政策的困难性，可以说就在于此。

以上两点就是必须加强和扶持新民会的理由，方面军不惜一切努力推动新民会的发展。

二、“新民会为彻底的中华民国的新民会，决不可成为日本人的新民会”

华北的中国知识分子，厌恶国民党腐败作风，倒有些憧憬着共产党。然而现在亲身体验了中国共党的实际情况，终于感到厌弃，因而希望自己在华北结成第三新势力。新民会对中国的知识分子说来，是他们唯一的希望所在，是作为东亚新秩序一翼的新中国建设的基础，同时也是革新日华合作的必由之路。因此，可以说只要使中国人活跃起来，新民会就有可能充分地发展。如象现在这样以日本人为中心进行活动，不仅妨碍第三势力的结成，而且.也不可能从教化团体性质再向前发展。

但是，这绝不是说日本人就不需要了。正相反，要使中华民国新民会得以顺利地成长，则绝对需要日本及日本人的大力支援，尤其是在情况复杂的地方，日军、宪兵以及日本侨民等都必须挺身而出，促使中国人的新民运动顺利开展。

三、“国民党与东亚联盟的关系:所谓国民党(指汪伪国民党一译注)乃是同志益友，而

东亚联盟则是思想精神的一致”

新国民党和新民会是中国新体制的姊妹组织，其地位是对等的关系。从树立革新思想的历史来看，说新民会比国民党先进并不过分。因此，去年中央部曾经决定，在华北由新民会，在华中、华南由国民党，划分一地区各自协助治安肃正工作，互竞其善。现在国民党不将力量集中于华中、华南、有些反而进入治安已经恢复的华北，这是迹近避难就易的行为，是不能允许的。国民党是不应进入华北的。东亚联盟的思想，和新民会纲领中的善邻结盟的思想相一致，新民会没有任何理由反对具有共同思想内容的组织。因此，新民会应团结一致，普及东亚联盟的思想。但是，在华北于新民会以外另建立东亚联盟支部，以及在新民会内进行东亚联盟支部的活动，都是不许可的。在此应该注意的，是国民党利用东亚联盟中国总会为外围团体，而将各党各派纳入国民党内的政治手段。因此，新民会有责任指导东亚联盟保持其原来纯粹的目的。

总之，不论是对国民党、或是对东亚联盟，新民会都应站在启蒙立场主动加以指导，万万不可处于被动地位。

四、“新民会日系职员的立场是顾问和监察，日本人参与新民会应坚持少而精的原则。”

新民会应改变协和会(伪满的组织一译注)的想法，它是彻底的中国人的新民会，应改变过去那种狭隘的指导方法，对于中国人以自己的意志所结成的革新势力，应给以极大的关心和声援，使其愿望得以正当实现。但是，由于各地治安尚未稳定，需经常进行频繁讨伐，这对于没有政治部队的日军来说，就需要一定数量的日本人，加以很难找到中国知识分子，在这种困难情况下，必须逐渐由中央部门培养中国人以之替换日本人。

12 月 24 日，新民会适应新的形势，为了促使完成其本来的使命，召开了临时全体联合协议会。过去一向采取下情上达的方式，按照县联合、道联合、省联合协议会的顺序最后召开全体联合协议会。但这次则作为紧急措施，而对全体协议会上决定的各项方针，采取了逐级向基层组织进行上意下达的方式。

全体联合协议会，明确了适应时局的新民会运动方针，提高对时局的认识和自觉性，以积极推进向来的基本工作，并对于治安对策(防止共产党及其他不法分子的策动，进行宣传，搜集情报)及确立自给自足经济政策，建设新民农村自治社会等具体工作方针一一作了指示。

为使新民会真正成为以中国人的力量和由中国人负责的组织，逐步进行了机构改革。首先，在中央总会设立了政治局和宣传局，整顿了中央领导机构，在地方撤销了道办事处，新设并加强了道总会;在县总会内设立了自卫科和训练科。县自卫科是将过去一直实行的“农村自卫”运动纳入本机构之中的;训练科主要是将县公署领导的“保甲训练”，从民众组织的立场，采取由新民会协助进行工作的方式。

此外，充当县联络员从事地方行政工作的日系职员，统一安插在新民会内，使之兼任县联络员工作，从而使民众组织与行政组织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

蒙古联合自治政府的施策

12 月 10 日，蒙古政府发表声明并发出布告，阐明了大东亚战争解放东亚的意义，号召蒙疆民众奋起“打倒、驱逐中国共产党，奠定管内治安，振兴产业，从精神和物质两方面全力协助日本”。尤其是政府主席德王，强调兴亚协力政策，于 1942 年 1 月 17 日，颁发了“兴亚手谕”，用以鼓舞斗志。同时为了集中蒙疆民众的总体力量，组织了“兴亚协力会”，设总部于张家口，并在察南、

晋北各政厅及各盟公署所在地设立分会，在市、旗、县公署所在地设立支会。政务院长(吴鹤龄)就任会长，各行政机关的长官担任直接领导。该会纲领定为:(一)发扬东方道义，(二)协助大东亚战争，(三)确立治安，(四)提高民生。进行活动的第一步，先由捐献军用飞机运动开始，接着发行公债，召开“打倒美英”民众大会等等。

政府规定从1月1日到3月底,为第二次施政跃进运动时期(第一次为1941年9月)，进行贯彻政策的活动。其重点是加强和推动地方行政基层组织，同时整顿户口、加强自治机能、进行宣传工作、调整物资收集配给机构，以期扩大和加强治安地区，在全管辖地区同时开展活动。

通过实施新制度，街、镇、乡、村的组织，取得相当好的成果，如民众生活和文化程度高的察南、晋北、巴盟工作进展顺利。但在其它地方、特别是在地籍整理上有困难的地方，只能为今后作些基础工作。

在晋北政厅，一向就以灭共工作为施政的重点，结合此一运动，将警察队、自卫队与军队结成一体进行讨伐，并积极开展了宣传和有关民生的工作。

注:当时的行政区由二政厅(察南、晋北)、五盟(巴彦搭拉、锡林郭勒，乌兰察布，察哈尔，伊克昭)组成，总面积约45万平方公里，人口(1940年6月底调查)525万人(其中汉人502万，蒙古人15.4万，回民3.8万，日本人3.3万)。

当时的武装部队，正规蒙古军约有6,000人、武装警察队约有5,000人、准正规的投降部队约有7,500人。

蒙古军在1940年进行整编，由总司令部(司令李守信)、骑兵四个师(各师到基层都是三三制)、直辖炮兵队、通信队、汽车队、以及军政、教育等机关所组成，部署在日军警备区外围的蒙旗地带。

总司令部设在厚和(今呼和浩特—译注)，第五师师部在土木尔台、第六师师部在大树湾、第七师师部在德化、第九师师部在百灵庙。驻蒙军的军事顾问部负责培养和加强部队的工作。这些师均为野战部队。

投降的绥西联军、白凤翔等部队驻于包头西部及西北地区，与在五原的重庆军之间，起到缓冲地带的作用。

现将蒙古军整编后的状况概述如下:

通过1942年底的军制改革，整编了骑兵四个师，编成野战第七、第九两个师，部署在商都、六合营。同时新编第二、第六，第十、第十一、第十二共五个防卫师(各师的兵力1,000名左右)，其指挥官由盟长、旗长等行政长官兼任，使蒙人地区的行政和军事成为一体。

在肃正讨伐方面，由1942年底直到1943年春，在察南延庆地区参加了独立混成第二旅团对共军肖克部队的讨伐，立了大功。此外并时常支援第二十六师团在阴山山脉内进行的扫荡，和骑兵集团、战车第三师团在鄂尔多斯的作战。后来，1944年底，在中公旗防卫战斗中已经成为能以独立作战的部队了。

1945年春，再次进行了军制的改革.军政机关过去设在厚和的总司令部内，在张家口只设有蒙古军联络部，但在本年4月，将联络部升级，在政府内设置军事部(部长李守信兼任)，军事部统辖军政，警察两项业务，撤销了治安部。同时将汉族地区的武装警察队改编为第三、第四、第五师。从此，蒙古军担任汉蒙两地区全部蒙疆的防卫任务，虽已构成代替日军之势，但其实力还很薄弱。此外，它还负有对外蒙和苏联准备作战的使命，但除监视国境、搜集情报之外，训练和构筑军事施设，都未能进行。

妨碍居民自卫能力加强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大部蒙古军官兵出生于东蒙，存在乡土观念，汉族地区实行保甲制度有日本行政官吏介入其间等，因而使军、官，民之间的感情缺

乏联系，这是需要指出的。

经济指导的紧急措施

华北经济指导方案 方面军为完成大东亚战争，承担着培养和补给日军战斗力的任务，同时还要确保占领地区内的治安和民生，因此，必须竭力作出贡献，使日本能以安心达成其战争目的。华北的经济指导方针是，“尽快确立军、官、民的自给自足经济，以确保民生，并在减轻我国经营华北的负担的同时，尽最大努力供应我国所需要的战争资源”。这一方针，从以前通过肃正建设计划时起，一直努力执行到现在，今后仍无变化，但在要求的程度上，则更加强烈和迫切，必须向“飞跃的战时经济体制”迈进。

此际，切忌急剧的变革，应将和平产业部门尽量让给中国方面，促使其积极活动，并设法促进军管理工厂的移交工作(1941 年 7 月 7 日发表声明，对 40 个工厂解除军管，现正办理交接手续)。

紧急粮食对策 确立粮食对策是治安工作和安定民生的基础，是完成各项政策的根本。由于大东亚战争的爆发，华北粮食依靠管区以外供给已感困难，必须紧急确立日华军、官、民粮食自给的体制。

当时华北粮食需求情况，主食的自给率(生产对需要的百分比)，可推断如下:

面粉为 53%，杂粮为 98%，军用大米为 20%。

如果不把满蒙、华中、南方的援助算在内，即使调用现有库存粮食，并且严格执行配给及调整消费，米到 1941 年底，小麦到第二年青黄不接时，估计就要陷入极其危险的境地。

方面军预先曾采取对策，与各有关机关作了相应的调整，兴亚院联络部在 12 月 8 日，制定了“紧急粮食对策”(包括确保、保有、配给、增产等各项措施)、“小麦征购促进对策纲要”、“主要粮食配给统制纲要”、“非常物价及物资对策纲要”等，并力图贯彻执行。此外，为了保有主要粮食，调整供求及平衡价格，设立了财团法人华北食粮平衡仓库，于 12 月 1 日正式开业。由于各地谷物仓库设立迟误，为此，对特务机关长进行了督促。1942 年 1 月 15 日，方面军召集了“政务关系军官集会”，除根据既定的粮食增产五年计划之外，又就执行“华北紧急粮食对策纲要”及“华北紧急增产实施要领”作了指示。其施策要点有三:

一、为了能以简易迅速地增产，立即打井 20 万眼，通过改良局部土地而改善水利。

二、促进粮食上市，并作好由敌匪地区取得粮食的工作。

三、加强以日华人为对象的重点配给，严格实行对消费的调整。

执行时，在军的强力指导下，以日华官民的精神总动员为基础，要求合作社系统、从事爱路工作的华北交通公司、担任技术指导的华北产业科学研究所、负责水利建设的建设总署、作为收货机关的小麦协会，粮食平衡仓库、作为调查机关的华北交通公司资源局及满铁调查所等，加强联系，实行强有力的统制。要避免只根据局部要求而陷入封锁经济，必须考虑到全管辖区的整体。关于紧急打井计划的设想如下:

打井 20 万眼的增产计划，是根据产业五年计划对各种农作物增产计划、土地改良事业及水利事业等，紧急加强的措施，是紧急粮食对策纲要的主要项目。因此，应迅速动手，到 4 月底最少打四万眼，到 6 月底打八万眼，其余到明年 3 月底全部完成。华北政务委贝

会为支援打井工作，无偿供给烧砖用媒，并发放贷款。

方面军的上述施策，立即开始执行，到 1 月底接到各地关于打井准备调查、粮食仓库的建设以及紧急粮食增产委员会成立等的情况报告。兴亚院在 2 月 5 日召开了中国蒙疆粮食对策会议，采取了从满洲调进杂粮，从华中调进面粉的办法。

经济封锁 关于加强经济封锁问题，在指导战争方面也极重视。1941 年 12 月 3 日，在中央命令和总长指示中，对此亦有所指示。方面军也对整个华北实行统制，并指导认真进行封锁。在上述 1 月 15 日召开的政务关系军官的集会上，方面军参谋副长也提出如下的强烈要求:

自正式开始经济封锁以来，仅四个月，成效可观。重庆政权和中共的经济状况，估计今后更将陷入困境。现在正是进一步施加压力使之屈服的好时机。此外必须彻底切断外围的旧法币地区，否则随着旧法币的贬值。物价上涨的恶劣影响将有波及华北之虞。所以，方面军指示，必须更加严密地切断华北外围地带。

在华北内部地区，方面军指示的封锁地带有晋察冀、晋冀豫边区根据地，由于该地区物资贫乏，更应严加封锁。然而，委派各兵团封锁的地区，尤其对于物产丰富的敌区。希望尽量考虑新的办法。即应权衡剿共方针与获得粮食问题的轻重，除对应剿灭的主要敌人外，不要一律加以封锁，要运用我方政治力量及收购机关，主动有计划地收集物资。

各兵团与敌区之间应构筑严密的封锁线工事，以防止物资的外流，同时在武力支援下，设法收购敌区的物资，尽力推行封锁政策。

中共对此虽然采取了各种对策，但由于天灾、经济政策失败、日军的压力等等因素，解放区的经济状况非常穷困。另一方面，蒋介石在 1941 年的新年献辞中提出了经济优先于军事的论调，即所谓“今后，对日战略，其比重为三分军事，七分经济”。在当年 3 月的八中全会和 6 月第三届全国财政会议等，也都企图加强经济战。

大东亚战争开始以后，海上通道被切断，于是效率不高的滇缅公路地位变得重要了。因此决定了扩充该公路、在确保从盟国运来物资的情况下转入攻势的方针，以图首先确保经济上的优越地位。

南京国民政府的动向

“同甘共苦”声明 汪兆铭主席得悉日本对美英宣战后，立即召开紧急中央政治会议，决定了政府的态度，宣言“根据日满华的共同精神，为了实现建设东亚新秩序的目标，与友邦同甘苦”(所谓同甘共苦声明，有别于以前的共存共荣)，从即日起与敌对国家断绝外交关系。继于次日即 11 日,召集各政厅长官共同决定了一系列政策:(一)迅速确立治安，(二)扩大生产，节约消费，(三)扫除英美思想，发扬建国精神，(四)活跃民众运动，(五)推动全面和平，(六)增强军事力量等。14 日又召开地方长官会议，传达了政府的方针。此外，新闻广播有关单位，从 9 日起，同时展开宣传东亚民族解放的大规模活动。汪主席也在 18 日通过南京广播电台发表讲话，号召全国人民奋起支援日本进行大东亚战争。但在此时，国民政府内部对中国是否直接参加大东亚战争却成了问题。

烟总司令官在日记里，曾有以下的记载:

国民政府主要首脑间，关于国府参战问题有两种议论。一种是认为没有实力的参战是没有意义的，一种是为了统一并振作民心，而且从与日本共甘苦的观点出发，认为可以参

战。后者在口头上说的动听，但其真意则是想由国民政府接收英美的权益。另外，想要在战后和平会议上占一席位，其内心包藏着严重的功利思想。汪主席似乎就属于后者。

国民政府为了日华合作。尤其是密切两国经济关系，采取了各种紧急措施。最大问题是币制改革，驱逐旧法币，废止军票，逐步统一发行中央储备银行的储备券。(旧法币和储备券的兑换率为二比一，到 1942 年 6 月 30 日全部兑换完毕，在华中政府管辖地区，只流通储备券一种货币。从日华协力的立场出发，在 1941 年 6 月 21 日，青木一男、犬养健、福田赳夫、滩波理平、桥井贞等就任国民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的顾问，他们对金融工作作出了很大的贡献。12 月 19 日，重光葵被任命为新驻华大使，于 1943 年 1 月 10 日到任。)

内外各顶政策 随着南方作战的进展，华侨工作成了紧急问题。政府过去设有侨务委员会，在法属印度支那发行有华侨的报纸，并向南方各地派遣大批工作人员，努力争取华侨。战争爆发后，侨务运动随之迅速展开。12 月 23 日，刷新了委员会的阵容，同时派遣政府要人分赴广东、汕头、香港各地，并在汕头设立了侨务特派员公署。其目的是要使华侨与英美断绝关系，停止支援重庆，将其精神和经济力量转向于建设新中国。

上海公共租界在日军的管理下，正在设法复兴，国民政府未参与此事。我军在接收该租界后，排除原参事会内的敌对势力，于 1 月 7 日，由冈崎胜男就任参事会议长，由日、华、德、瑞士的代表分别就任参事会的副议长及其成员。

在此以前，汪主席于 1941 年 11 月的国民党四中全会上，提出开展“新国民运动”的号召。1942 年 1 月 1 日，发表了运动的纲领。纲领中写道:“遵奉三民主义，完成中国革命，要对大东亚战争作出贡献。”这是新中国全体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具体说来，就是想要清除旧有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组织全民力量对整个国家和社会作出贡献。所以称之为改善生活、改造精神的革新运动。

这一运动，计划将宣传、组织、训练工作分为三期进行，包括政府机关、党、各种民众团体在内，开展广泛的活动。7 月 9 日，在中央政治会议上决定了实施大纲，开始进入了具体活动阶段。至于运动与东亚联盟的关系，在决议中写道:“新国民运动重点放在国内革新，东亚联盟的重点是对外团结一致，都是站在一个出发点，期望达到同一目的”。

华北、华中接壤地带移交华中

河南、安徽、江苏各省北部的占领地区，因是华北、华中的接壤地带，使之归南京国民政府直接管辖，还是依旧作为华北政务委员会的势力范围，对此，当地日军犹豫不决。这是多年来在军事、行政、经济上的悬案。此次首先在日军方面，将这一地带从华北方面军作战地区分离开来，迈出解决问题的第一步，然后再去解决行政方面的问题。

移交经过 1940 年 3 月 30 日，在南京成立了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作为新中国的中央政府。但是，该政府与当初的期望相反，不得不以比预料更小的区域作为其势力的基地，因此，扩大其政治及经济力量，成了基本课题。华北、蒙疆在中国事变爆发后不久即分别建立了新政权，其复兴建设的进展远远超过华中。南京政府虽为中央政府，但从当时的实力和政策方面考虑，决定承认蒙疆的高度自治，对于华北则根据其特殊性，使之作为中央和地方的中间机关，成立华北政务委员会。

华北政务委员会，根据该会组织条例(1940 年 3 月 10 日公布)第一条规定“在河北、山东、山西三省及北京、天津、青岛三特别市辖区内处理防共、治安，经济及其它由中华民国政府委任的各项政务，并且监督辖区内的各省、市政府”，同时发出指示“临时政府时期管辖区域内实施的政治、经济、金融、建设等各项工作，一如既往进行处理，不得因设立本委会有所变更”。

在南京政府方面，并不喜欢根据华北的特殊性强调其自治，而是想要在将来将华北切实掌握在中央统辖之下，当前之计，首先在上述组织条例中，将华北政务委员会的管辖地区，从临时政府时期的版图中，划除华北、华中接壤地带的江苏、安徽、河南各省北部地区。然而，实际上，有关接壤地带的所有工作，几乎不得不全部委由华北政务委员会承办。在华北方面则采取“舍名就实”的态度，表面上虽然作了很大让步，但对缩小华北自治权和移交管辖地区却表示了强烈的抵抗，

在日本方面，本想以分治合作方针扶持各政权，从中尽力调停。但自中央政府成立后，为了加强其威信和政治力量，采取了分阶段逐步解决向题的态度。有关管辖区域问题，“华北、华中接壤地带”的“苏淮地区”(江苏省北部的徐海道地区，一市十七县和安徽省北部的淮北地区四县)，因接近南京，农产品、盐、矿产资源颇丰，既富有经济力量，又为铁路、运河等交通中枢，汪主席早就强烈要求移交该地区。

于是，中国派遣军、华北方面军、兴亚院联络部、中国方面以及当地关系方面等，从 1941 年初开始，几经协商后，于大东亚战争爆发时采取措施将该地区移交华中。

12 月 10 日，中国派遣军下达总作命甲第三百二十七号附件:“华北、华中接壤地带处理纲要”。将军事，行政、经济等各项移交工作，分阶段各在不同时期进行，以避免引起混乱和动摇。

华北、华中接壤地带处理纲要

第一 方针

华北、华中接壤地带中，华北方面军作战地区内的河南省北部，在目前仍维持现状，徐海道及淮北地区，在 1943 年初从华北分离，改为国民政府的直辖区域。

为此，应速作准备，一俟准备完了，逐步实行移交，移交细则另行规定。

在进行移交时，应采取妥善办法，避免招致人心不安和动摇。

移交时期另行规定。

第二 要领

一、军事另行规定

二、政务

(一)徐海道及淮北地区，暂作为国民政府直辖下的特殊地域，中国方面的政务由苏北行政专员公署(暂定名称)执行，苏北行政专员，隶属于国民政府行政院长。

国民党的活动，由中国方面处理。

(二)徐州兵团长，对徐海道及淮北地区有关中国方面政务的幕后指导，应受总司令官的指挥，而通过特务机关长执行工作。

(三)苏北特务机关及海州特务机关，仍隶属于徐州兵团，继续执行原来的任务，不受登集团(第十三军代号一译注)特务机关本部长的指挥。

(四)为使徐海道及淮北地区经济问题的处理顺利进行，总军司令部、华北军、当地军有关人员之间，应采取措施密切联系。

徐海道及淮北地区的经济指导工作，由华北方面承担。

以上现场问题的处理，华北、华中方面均通过总军司令部，由特务机关长负责解决。

三、财政

(一)徐海道行政费，以往作为徐海道政务费列入国民政府的预算中，今后将其作为苏北行政专员公署行政补助费支出，为此，暂由华北的中央税项下拨付。

(二)淮北地区行政费，与徐梅道行政费一并包括在苏北行政专员公署的行政补助费内。

四、治安

(一)绥靖军仍保持现状，隶属于军事委员会。

(二)警察队、自卫团等地方治安机关的组织系统，暂仍保持现状。

(三)治安费所需款项，作为经常费用列入行政专员公署财政预算中。

五、教育

(一)教育组织及其监督系统，继续维持现状。

(二)教科书，尽速采取措施，改用国民政府制定的课本。

六、社会设施、社会团体

按国民政府的政策处理，其与政策无碍者，不妨继续存在。

七、思想

新民会的省总会、道办事处、特殊地区办事处等，均予以撤销，但对其人员，应由推行中国方面政策的东亚联盟组织尽可能予以吸收。

八、交通、通信

(一)铁路在正式处理以前，仍保持现状，使我军军事运输和对日供应物资运输得以顺利进行。

(二)大运河、内河等航运，华北、华中方面的内河船舶，应一并加以利用，以便使物资流通顺利进行。

(三)连云港的建设和经营，因与铁路方面有关，应根据“二”之(四)，以现状为基础，由华北交通公司执行之。

(四)汽车运输事业，亦暂以现状为基础，作为华北交通公司的一项事业予以经营。

(五)通信亦继续维持现状。

九、通货

在徐海道地区应暂准为“联银券”流通地带，继续保持现状，以缓和徐海道金融的急剧变化，并防止由于“联银券”的不稳定引起全华北的动摇。

淮北地区暂时保持现状。

十、物资

对于物资流通，不应掣肘，尤应考虑华北的需要(主要为农产品)。为确保其需要，应采取特殊的措施。

军事措施 在上述纲要下达的12月10日，中国派遣军根据“总作命甲第三百三十六号”，对部下的方面军及各军下达了基本任务，其中命令将原属第十二军作战地区的苏淮地区移交给第十三军。即:

华北方面军、第十三军之间的作战地区的境界规定为山东、河南两省与江苏、安徽两省间的境界。

当时担任这一地区防卫的是第十七师团。该师团原系第十三军属下的部队，从1941年2月以后，隶属华北方面军，从第二十一师团接替了该地区防卫任务。中国派遣军在发出上述命令的同时，又发出了总作命甲第三百二十七号指挥转移的命令:

一 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将第十七师团(兵站汽车一中队及防疫给水部的一部在内)及在徐州的陆军病院划归第十三军司令官指挥；将驻徐州附近的宪兵队划归华中派遣宪兵队司令官指挥，此外，苏北及海州特务机关归我直辖。

二 第十三军司令官在一定时期内，对徐海道地区的治安及警备，仍保持现状，特别应与华北方面军密切协力。

三 第十七师团长，有关政务工作应受我的直接指挥。苏北及海州特务机关配属于第十七师团。

四 前项各部队的指挥转移时间，定为1942年1月1日0时。

第十三军根据上述命令，于12月25日发出了“登集作命甲第四百五十四号”命令，布置了各兵团的基本任务。按照这项命令，第十七师团，1942年1月1日0时恢复原建制，并将汽车第二十六联队的一个中队、徐州陆军病院、华北防疫给水部济南支部徐州派驻所、苏北及海州特务机关配属于该师团以保证作战地区内的安定。

但是，问题并未由此得到解决。徐州宪兵队虽在华中派遣宪兵队司令官的指挥下执行任务，但有关编制部署、教育训练、人事等一切事项，依然由华北派遣宪兵队司令官掌管。

徐州陆军病院也是同样情况。虽划归第十三军指挥配属于第十七师团，由于隶属系统的关系，该病院的教育训练、人事等，仍由华北方面军司令官负责。

为了统一责任，根据中国派遣军4月6日的上报，于4月27日将华中派遣宪兵队及华中陆军病院予以改编，新设了徐州宪兵队及徐州病院，这样，问题始告解决。

行政措施在行政方面，由于现在的江苏、安徽两省政府力量不足，改为国民政府的直辖地区，乃于1942年以后，将准备完毕的部门逐步办理移交。1月24日，苏淮特别行政区筹备就绪，2月19日于徐州市设立了行政区公署。苏北及海州特务机关，归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直辖，配属于第十七师团长，有关政务问题则不经过第十三军而直接受总司令官的指挥。但是，有关经济指导问题，仍由华北方面担任，实际情况并无变化。为了防止因急剧变动引起人心动摇，决定使财政、治安、教育、交通通信事业、通货等仍保持现状并使之继续发展。后来又逐步解决了一些问题，但直到停战为止，在华中、华北一体化问题上仍是一个悬案。

三 思想战的指导

思想战指导纲要

华北方面军报道部针对日益紧迫的形势，从11月初，一直进行着“对敌宣传攻势”及“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时的宣传”，于12月3日又制定了“あ号作战时的华北宣传计划”，在计划中的方针指出:

美英两国在东亚是日满华三国的共同敌人，这一点应使中国民众有深刻的认识，以便将民众心理集中在东亚民族解放这一问题上。强调消灭与美英勾结的重庆政权及中国共产党，乃是华北全体居民的责任，以此推动占领地区居民积极主动地与我方协力，并设法分裂和争取敌区内的民心。

本计划的重点为:(一)对中国的宣传以中国政、会、民各机关团体的活动为

主;(二)对占领地区的宣传以安定民心为主要目标，并贯彻此次战争是东亚民族解放战争的意义；(三)对非占领地区的宣传，应使其酿成反蒋反共的气氛，期使敌方抗战体制崩溃；(四)使在华日侨提高自觉，对战争作出贡献。

报道部还制定了“处理英美权益时的宣传报道计划”，计划着重提出“本措施系根据国际法规的合法行动”，“安定民心”，“利用此一时机提高反对美英的思想”等。

此外，方面军在实施军事、政务、经济等各项政策时，应抓住机会，强调:(一)阐明大东亚战争的意义;(二)提高向东亚民族解放迈进的觉悟;(三)重新认识在东亚新秩序建设中华北的特殊性(以上各点后来经新民会采纳为针对时局运动的基本方针)。

12 月 8 日，方面军司令官按照“华北政务指导纲要”中所计划的那样发表声明，阐述了在东亚解放战争中华北参战的实际意义，并对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提出了全面协助我方施策的希望。该委员长也在当天发出了全面协助，特别是在经济政策上团结一致协助日本的训令。该声明和训令，通过军和行政机关系统，向全体进行了贯彻。

方面军为了进一步全面推动大东亚战争时的思想战，12 月 8 日，制定了以下的纲要，并于 10 日作了传达。

对美英战争的思想战指导纲要

第一 方针

一、此次对美英的战争，是新秩序对旧秩序的对抗斗争，阐明东亚解放圣战的意义，指出挑起战争的责任在于美英。强调日华满三国为了确立东亚共荣圈，应当互相协力，分担战争义务，直到最后胜利。因此，华北应自觉地作为日华满三国合作的模范地带，努力完成任务，以期安定和振奋民心，而使敌人动摇分裂。

二、在华日侨，尤应深刻体会“宣战大诏”，以冷静刚毅的态度，完成作为战争核心的天职。

三、为了完成思想战，应使中国各机关积极地进行工作。

第二 指导要领

一、关于开战的意义和目的，应照下面所述进行指导:

此次战争是对美英东亚政策的清算，美英等旧秩序国家长期以来，为维持其势力和妄想达到称霸东亚的野心，打着和平的幌子，助长东亚祸乱。这次战争是解放东亚的大好时机，是日华满三国为了民族自卫和建立东亚共荣而进行的圣战。应使之牢记这是一场正义战争，三国共同协力，必能突破任何困难而达到最后胜利，这是深信无疑的。

二、关于敌方的不义和弱点的宣传，应作如下的指导:

此次战争完全是美英方面阴谋挑起的，其渊源甚远，自过去数世纪以来，美英就对东亚进行侵略和榨取。敌人无论使用如何美妙的名义，其真正意图，从此次欧洲战争中依靠美英的国家的悲惨命运已可清楚看出。应以其极端利己的行为，与我方坚定不移的理想加以对比，着重进行宣传。

当前华北面对的敌人是中国共产党及共军，它与美英的阴谋串通一气，助长华北的祸患，必须将此事实更加明确地揭露出来。蒋共合作的重庆残余政权，不过是在彼等利己势力勾结中存在而已。其结局必将走上欧洲依靠美英的国家的悲惨道路。对此应借开战的机会使之重新加以认识。

三、关于开战所引起的社会变动，应按下述要求进行指导:

战争将引起物资不足，物价上涨，在生活上多少要造成困难。必须使民众认识，为了建立东亚共荣圈内“自给自足经济”，这是难免要出现的暂时困难，应该甘心忍受。要强调

节约和增产，并积极协助政府推行经济统制，决不可引起不安和动摇。

四、开战后华北的前进方向依然不变，对此应作如下指导:

此次开战，对于以治安为主的华北施策，不应有任何变更，必须更加促进日华合作的发展。为了完成兵站基地的任务，更应强调现行的施策，使所有华北的人员各安其位，努力工作。

五、利用作战报道进行思想指导。

在对美英作战的过程中，适时利用作战情况的报道，使之相信我方必胜，同时严加取缔流言蜚语，努力防止由于敌方的虚假宣传使民心发生动摇。

华北民心的动向

日英美开战后的数日内，华北的民心，政治、经济的动向平静，几乎看不到动荡不安的现象。兴亚院华北联络部对管内的一般动向，于 12 月 17 日，向兴亚院作了如下报告(要点):

(一)开战第一天，受到相当冲击的华人，一般表现出忧虑的状态，但在第二天就恢复了平静。我军初战的战果和宣传指导，使他们对时局的看法有何变化，现在尚难断定。但是，一贯横行的英美蒋方面对日本的诽谤宣传却被压了下去。这可以断定，对华北民心给了相当好的影响。

(二)民众的心理状态，因其立场和处境不同，似有各种表现。一般看来，估计对日本持积极态度或表赞同的约占 20%; 对日中合作表示不关心的约占 40%，民族意识旺盛，反对日本的约占 40%。知识分子有信赖日本的趋势，但学生和英美系知识分子的反日倾向却仍然很严重。一般民众则希求和平与生活安定，因为战局的一进一退，立即给他们带来影响。

(三)对战争结局的看法，大部分人在其内心顽固地认为，“日军初战虽占优势，但在长期战中不能取胜”。并且认为:一旦苏联对日宣战，日本将处于最后的难局。这种潜在的对日观念，今后必须充分加以注意。

(四)根据调查民众对时局关心的事项的结果，痛感政府当局有大力加强启蒙宣传工作的必要，同时觉察到在我方也有必要注意对民众的思想指导。

(五)在金融物资方面，虽然多少受些影响，但因我方处理得当，目前无大动摇，大致尚属年静。部分民众有囤积现象，在小商店和粮食商人当中，有居奇拒售倾向。

兴亚蒙疆联络部，对蒙疆的一般动向，12 月 24 日作了如下的报告(要点):

(一)汉族知识分子，对日本与英美作战的实力怀有不安的心情，但由于初战告捷，对日本的信赖有所加强，一般对日方的领导表现出协力的意向。但仍有部分人过于相信英美的力量。南方作战激化转调驻蒙日军时，有的担心共军、傅作义军及马占山军难免对蒙疆再次发动进攻。

(二)居领导地位的蒙古人，从内心欢迎日本大获全胜。但在上层人物中，有的认为日军主力转向南方，治安形将恶化，而往他处避难，有的主张赶快运用实力实现蒙古独立;有的公然宣称战争最后将以英美胜利而告终。

(三)一般民众不论汉人或蒙人对时局都不关心。但在农村，有的人因受共军的宣传和重庆广播的影响，过分信赖英美实力，不相信日本的战胜，对此动向应予警惕。

以上是开战初期的状况，后来随着战局的发展，产生了种种想法。1942 年 1 月 12 日，华北联络部次长盐泽少将，曾到大本营作了如下报告:

自从大东亚战争开始以来，华北的关系非常容易处理了。新民会副会长殷同说:“从欧美势力中解放东亚这一问题已经明确了”。但另外有的对东亚战争的长期化担忧，有的担

心日本势力将代替美英势力大举进入中国大陆。今后必须对处理在华的权益、军管工厂问题、租界问题及汪政权参战等问题，迅速确定方针。此外，殷同等人认为，将来汉民族与日本民族之间，对各自势力推进的方向，也有必要进行调整。

参考:

关于电波战 在思想战方面，必须确立理性概念和进行适当的宣传教育。当时与宣传工作有关的“电波战”的情况，在“华北方面军情况报告”中，有如下记述(要点):

过去，对天津英、法租界内与重庆、香港通讯的敌性电波，曾进行了侦查和干扰，并为破坏其宣传广播，努力开展了电波战，但因人员和设备不足，未能收到预期效果。接收租界以后，此一问题宣告解决。但重庆的秘密电台，仍潜伏于京津两地的各角落，而中共方面正在我占领地区内，到处积极进行活动。我军除尽力对其挖掘外，并在运城、开封设立了野战广播局，主要对西安进行谋略宣传广播。此外，在华北各主要地区，指导华北广播协会逐步设立广播电台，使之进行与治安肃正有关的广播。(军方为了支援华北广播协会，自 1940 年 6 月以来，制造了强力无线广播器和对重庆定向天线，以之封锁敌性通讯，并对中国内地进行广播。)

思想战的进展

中国政府各机关，不仅要说明大东亚战争的理性概念，而且要通过具体实践，加以彻底明确，主动地对各民众团体进行领导。华北防共委员会(委员长王揖唐)，按照 12 月 11 日的决定，在各地召开了“华北反英美民众大会”。12 月 16 日开幕的华北合作事业总会(理事长王荫泰)，宣布了总会的使命为:“华北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强化治安，即剿共。合作社的工作重点不仅是对敌进行经济封锁，而且应使处于敌我势力下的民众生活形成鲜明的对比，以便从中共方面分离并夺取民众”。会上还制定了各地合作社的活动方针。

有关学校教育，自从临时政府成立以来，以取缔抗日、容共、党化(蒋系国民党思想化)教育，铲除英美思想、重新教育教员、改编教科书、普及职业教育等为方针，努力促使各学校的复兴。特别是对于教员，以新民思想大力进行再教育，并在教学课程中逐渐推广了日语教育。

大东亚战争开始以后，作为紧急措施，在日军管理下接收敌性的各种学校，其处理办法为:(一)小学校全部、中学校尽可能“改编为中国公立或只由华人经办的私立学校”，不能改编的予以关闭，(二)高等教育学校原则上予以关闭;(三)关闭学校的中国学生，转学到其它中国学校。根据以上方针，截至 1942 年 3 月，在关闭的 135 所小学校中恢复了 84 所，在关闭的 49 所中学校中恢复了 35 所。燕京大学、协和医学院、济南齐鲁大学，历来敌对行为极为明显，不仅实行抗日思想教育，并且是美国、重庆谍报活动的据点，对此均予关闭。

其次再讲基督教的情况。战争爆发以来，北京教区华人教徒，在“自主、自养、自传”的口号下积极展开活动，于 1942 年 3 月中旬，脱离了美国基督教卫理公会。美国教会管理人方面也予以响应，将教会的一切财产无偿地移交给中国方面。此种情形很快扩展到全华北，三十多个教派、二千多所教会、三十万信徒，组成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开始走上了独立自主的道路。

对中国政府和民众的此种行动，方面军应以此次开战为转机，加紧实行强有力的思想攻势，以期具体贯彻思想战指导纲要。1942 年 1 月 15 日，在政务军

官集会时，方面军要求各兵团应特别注意下列各点积极进行指导:

一、对于思想上站在抗日阵营的华人，特别是有识之士，应强调指出，继续抗日是地道的英美走狗，是榨取东亚的帮凶，是对大东亚的全面背叛，应采取相应措施使之转向和平阵营。

二、对于亲日阵营内的中国人，要强调皇国的盛衰，亦即大东亚兴废的关键。使之理解日华不可分离的命运，特别要使之认识到华北是日华合作的模范地区，担负着完成大东亚战争兵站基地的任务。

三、应当明确认识，此次战争并非白色人种与有色人种之间的斗争，而是驱逐近百年来侵略东亚的美英势力以解放东亚的圣战。要粉碎敌方离间日德意轴心国的阴谋，对此应加注意。

除以上措施外，特别要调查在中国的日本人的思想动态，针对敌方的思想攻势，采取提高防谍思想、取缔谣言等防卫对策。现从方面军参谋部在 3 月初所写的“对日本人思想动态的观察”中摘录如下:

一、大东亚战争爆发，气氛稍现紧张，但一般公司职员、商人等日本人，尚未脱离住在大陆享有治外法权的唯我独尊心理。军人中有一部分仰仗战地特权、行为不检、破坏军纪风纪的分子。官员、公务人员中，有持雇佣观点和进行贪污活动的分子，以颓废萎靡情绪散布流毒的也大有人在。

二、泄漏军事机密，大都是由于缺乏防谍观念造成的过失。必须将“防谍即针对各国对我进行秘密战的防卫战”的观念，贯彻到一兵一卒，以至每一国民。

三、反军反战的言行，乃是忘掉了国家民族的立场，只顾个人利害及幸福。其思想根源出于个人主义的功利主义、享乐主义、乌托邦的人道主义、绝对平等主义，必须牢固树立贯彻日本精神的指导思想，坚决改革不正风气。

四、战争长期化、缺乏物资、治安不良、中国人强烈的民族意识等，使日本人的信念受到压力，从而产生败战的意识，有的进行恶意的批评，有的制造流言蜚语，特别是在大陆居住的日本人，深深沾染了所谓殖民地的气氛，对此除有待个人修养之外，还应进行适当的指导。

五、必须排除当地各机关的对立争执，创造明朗的工作环境，使不满分子及敌人在我内部无活动之余地。

存在上述不利于实现国家目的的思想是自然的，此外，各民族具有特殊的民族精神，对此已倾注了相当力量进行处理。但是仍有一部分人的情况很不理想。其中也有为敌人利益奔走的。中共正是乘此空隙积极展开了思想攻势。例如，中共机关报《解放日报》在 12 月 17 日，发表了如下的社论:

“在中国的日人反战同盟延安支部”，为了反对新侵略战争展开斗争，决定在 1942 年春，于延安召开华北各地反战团体代表大会。以八路军及新四军里边的日本兵为主体组织的“反战同盟”、“觉醒联盟”，仅在华北就有十处。这些团体的日本兵，在俘虏生活期间，清算了过去的帝国主义思想，成为反战战士，成为与共同敌人作战的中国人民的战友，开始了新的生活。他们在前线与中国士兵一道，从事对敌军的工作，有的在后方学习革命理论，为将来工作作好准备。这样的日本人虽然为数不多，但已经成为日军一支革命力量，也是中国抗战的有力支援者，他们在这方面已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即将召开的大会，将提出以对日军的宣传工作为中心的课题。

过去一年来，看到日军士兵的情绪和行动，发生了一些变化。这表现在俘虏的增加，从厌战情绪向反战情绪发展，军纪松驰，出现了援助八路军等崭新的事实。

但是我们不能过高估价这些事实，也不能以此很快就断定反战情绪已经充满日军中，或日军已经开始崩溃等等，现在还未能达到对全部日军发生影响的程度。日军由于士兵的

素质低下，战斗力虽有些下降，但还不能认为是普遍现象。虽也出现了向八路军自动投降者和支援者，但这也属于个别的情况。现在可以断言的是，今天的日军已不是四年前那种样子了，他们已经容易接受我军的政治工作，这确实是事实。由于太平洋战争的初期胜利，他们的厌战、反战情绪，也可能被冲淡而模糊不清。但是战争变成长期消耗战，随着日军势力的削弱，这种情绪将加速发展而达到高潮，我们的反战宣传，一定能被日军士兵所接受。(以上仅按日文译出，未与《解放日报》核对。—译注)

注:冈村方面军司令官，看到很多被中共俘虏的日军士兵坦白了军情，也有的逃亡投敌或思想接近中共，殊为慨叹。更有甚者反为中共所利用(所谓以夷制夷)，对此他叙述如下:

中共俘虏我方负伤或逃亡的士兵时，先将他们交给中共阵营内的日军士兵或日本通，让他们对俘虏进行人物鉴定，认为可以使用的就留下，没有使用价值的就释放。被释放回到我军的逃亡士兵由日本军法会议以投敌罪予以严重处罚。被留在中共方面的，要接受教育训练，即所谓洗脑筋，然后使之从事对日宣传谋略工作，或参加第一线战斗。在对中共讨伐作战时，在中共遗弃的尸体中发现有日本兵的尸体，使我前线官兵极为愤慨，也有再次成为我军俘虏回来的。

四 中共及重庆政府的动向

中共的各项施策

大东亚战争以前的政策由于苏联和德国缔结了互不侵犯条约，以及日苏中立条约的签订，在1941年前半年，中共对于日德与苏联的关系，采取不明朗的态度。但是到同年 6 月德苏开战以后，中共表现出鲜明的态度，对外强调结成国际反法西斯战线，对内坚持国共合作，主张各党派团结一致，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对 8 月底以后的日美谈判，估计日美有可能妥协，极力提倡加强中国本身抗战的力量，以阻止美国的对日妥协，期望日美谈判不能成功。对此可从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所载消息中清楚地看出。中共甚至希望日中、德苏间的战争进一步扩大为广泛的国际战争以至世界战争。因此，在国内以调整国共问题为中心，与重庆政权反复进行折冲。此外，对各党派进行工作，强调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主张实行民主政治。

从以上中共的态度可以看出其政策为;(一)通过国内团结、加强抗日战线，肃清重庆政权内部的对日妥协的空气，使之对日继续抗战。(二)钉住日本大规模的兵力，阻止其北进，牵制日军对苏的军事行动以拯救苏联的危机。(三)防止美国对日本妥协，促使其参加战争。

上述情况，主要是在中共宣传方面明显表现出来的迹象。但是，中共党政军在各地的实际行动，其重点则放在:(一)始终为本党的势力进行工作，即整顿加强抗日根据地。(二)使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成为精锐部队。(三)贯彻政治工作及群众工作。

中共估计，临近12月，日美必将开战。11月26日在延安召开了“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会”。参加这次大会的有汉、满、蒙、回、苗各民族及东南亚、印度、缅甸各地区代表共130余人，开始了国际统一战线具体的活动。

随后，在 12 月 4 日，在延安召开了“中国青年反法西斯大会”，会上通过

了“我等誓在蒋委员长的领导下，与全国青年共同协力，为消灭法西斯战斗到底”的宣言。

对大东亚战争的方针 战争刚开始，中共中央立即于12月9日，对各级党政机关，发出了有关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的指示，同时发表了关于太平洋战争宣言，表明了态度和方针。其宣言的要点如下:

太平洋战争是日本法西斯为侵略美英及其他国家而发动的非正义的掠夺战争，美英及其它各国崛起反抗，是保卫独立、自由、民主的解放战争。日本此一侵略行为，与日本对中国、德意对欧洲及苏联所进行的侵略行为是同出一辙的。现在全世界的国家和民族明确地分为，进行侵略的法西斯阵营和进行解放战争的反法西斯阵营。法西斯阵营在开战初期可能取得一些胜利，在一个时期内也可能继续这一残酷战争，但不久就要出现资源枯竭，其国内人心动摇，最后导致失败，所以反法西斯阵营一定能够取得最后胜利。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为打倒日本法西斯，必须动员全部力量，完成以下各项任务:

一、中国和英美及其他抗日各友好国家，结成军事同盟实行配合作战，同时在太平洋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抗日战争取得全面胜利。

二、全国军队在积极打击敌人的同时，还应积极准备大规模的战略反攻。

三、八路军和新四军排除一切困难，坚持在华北、华中的敌后抗战，粉碎敌人的扫荡，大力牵制敌人。

四，对日军和日本人民，对朝鲜，越南等民族，对中国被占领地区内的民众，要大力进行反对日本法西斯阵营的宣传鼓动，促使他们在日本内部建立反法西斯阵营进行斗争。

五、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国民党、共产党及其它各党派的合作，解决国共两党之间的纷争，恢复新四军，发给八路军军费和弹药。

六、对亲日派和亲德派加以制裁，肃清敌人的第五纵队。

七、实行民主政治，全国各党各派及无党无派的代表，在政治组织上，要能够分担抗日建国的责任。

八、南洋及其它各地华侨，应加强团结和联系，排除分裂活动，与各友好国家政府及其地方民众协力，反对日本法西斯的进攻。

通过以上要点，可以了解中共的一般态度。现摘记有关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的指示如下:

一、结成并发展全中国人民、华侨及南洋各民族的抗日反法西斯的广泛的统一战线。这一统一战线的组成分子，包括反对日本侵略的一切民族、政府、党派、各阶层的人民以及日本国内的反战分子和日本各殖民地的人民。这是政治的，同时也是民众的联盟，是上层的，也是下层的联盟。并使之实现中美英和其它太平洋各国的反日军事同盟，建立宗主国政府与当地居民的合作，同时改善当地民族的经济地位，组织民众，在所有日军占领地区内展开游击战。

二、通过与英美的合作以消灭日军，是中国民族解放的前提，中国内部要团结，改革政治和军事，积极牵制和打击敌人，以准备反攻，是英美战胜日本的重要条件。

三、应当大力开展南洋及英美各地的华侨工作。对华侨的工作方针是使全体华侨团结起来，进行反日斗争宣传，支持祖国的抗战，参加并援助居住地政府的一切抗日活动，纠正华侨内一部分共产党员的极左倾向，使他们与居住地的中国大、公使馆，领事馆及国民党部合作。

四、在华南，海南岛、越南及日本在南洋的占领地区等处，应努力展开游击战，与各抗日友好国家及英美等军事行动同心协力，并要得到他们的援助，务使游击队的各项政策，适应反日统一战线的要求。

五、在南洋各地的工作。应与当地民族的共产党员取得联系，纠正他们中间存在的左

倾倾向，使其展开统一战线的工作。

综合上述各项方针政策，其重点可归纳为:(一)结成太平洋地区各民族的统一战线;(二)缔结太平洋地区各国的军事同盟;(三)在日军占领地区后方全面展开游击战;(四)大力开展华侨工作;(五)促进华侨及各民族内的共产党员的活动;(六)实现中国内部各党派的参政。

开战后的动静 中共的对外对内政策概如上述。1942 年 1 月 1 日,《解放日报》的社论“元旦献辞”对战局的前途和新的任务，作了如下的论述:

1942 年是在东西两战线展开空前激烈战斗的一年。日本、德国继续进行更加残酷的战争，对被占领地区将更进一步加紧压迫和掠夺。然而反侵略战线方面的力量日益增强转入反攻，全世界的战争将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法西斯阵营一定遭到惨败，民主国家将走向最后的胜利。

国际的新形势对我国抗战展开有利的局面，预示了中国的必胜。但这一胜利不是拱手旁观即可得到的，也不是中国一个国家即可得到的。胜利到来的快慢，取决于各民主国家的努力如何，以及我们的斗争进行的如何。

这一空前未有的反侵略战争，对我国提出了新的任务。这就是迅速准备反攻、加强内部团结、进行民主革命，加强敌人后方工作、发展民族经济。完成这些新任务的关键，是发扬严肃紧张积极进取的攻击精神。(以上仅按日文译出，未与《解放日报》核对。一译注)

在中共的对外政策中，值得注意的是其对日苏关系的态度。当重庆《大公报》要求苏联对日立即宣战时,《解放日报》在 12 月 16 日发表社论说:

苏联，在实际上已经参加了反侵略阵营，对日宣战只是时间和形式上的问题。现在苏联面对轴心国的中心德国，只有打败德国，才能确定最后胜利的局面。目前要求苏联参加太平洋战争，这是过分的要求，反侵略阵营在此期间，应当作好反攻准备，支援友好国家的战争。(以上仅按日文译出未与《解放日报》核对。一译注)

由此可以看出，中共避免刺激日苏之间的关系。

在对内问题上，调整国共关系是重要政策之一。德苏开战以后，中共对重庆政权的态度有了很大缓和。在同年 10 月前后，中共中央对军队以及各行政机关，发出了指示。(传说中共鉴于德苏战争中莫斯科危急，召集了临时中央委员会议，提出与国民党妥协的建议。)

大东亚战争开始以后，由于两党妥协，中央部门关系逐渐好转，但在地方基层的对立并未有所缓和，武力冲突依然激烈。中央的妥协也是出自政策的立场，每当遇到根本问题时，依然发生对立。

重庆政府的动向 重庆政府和党的首脑得到大东亚战争爆发的报道之后，认为“日美的冲突，是中国外交的胜利，中国的国际地位终于提高了”。当天对日本发表了声明，并在 9 日正式对日德意宣战。又对美英苏以电报提出立即组织反轴心国共同军事会议的建议。

11 日行政院召开紧急会议，会上决定与美英合作，与苏联接近。为了加强与美英荷澳的联合，20 日与各国大使进行了协议。23 日宋子文就任外交部长，企图与美国的谈判得以顺利进行，并加强以蒋介石为中心的政权。

23 日，根据罗斯福总统的提议，在重庆召开了美英重庆各国代表的军事会议。讨论了派遣重庆部队对缅甸进行紧急防卫，美国在滇缅公路上堆积的、已经交付的援蒋物资转交给英国，以及长期援助重庆计划等问题。26 日英国与重庆缔结了军事协定。美国和重庆之间在实质上发生了新的关系，这是中国大陆方面战争区域的性质发生变化的最大原因。

12 月 10 日，蒋介石发表了“告全国民书”以鼓舞士气，指令各战区开始

全面的积极行动。从15日开始，以十天的时间，召开了国民党九中全会，讨论了对新局面的政策，在反轴心联合的根本方针之下，通过了(一)设立战时参政会，(二)委任蒋介石全权行使国家总动员法，(三)制定国家土地管理法等决议事项。

①大本营陆军部命令。
②中国派遣军作战部命令。
③大本营陆军部参谋总长指示。

第二章 1942年度前半期的治安肃正工作

一、大本营对华处理方案

建立对重庆谍报路线的工作

随着在南方各方面作战的胜利，作为下一步的施策，对重庆的作战方案和对苏、对澳、对印的方案都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在开战前夕的10月下旬，东条内阁在重新讨论国策时，就“与美、英、荷开战将对重庆有何影响”问题举行了联络会议，会上做出了如下的判断:

一、对美，英、荷开战，将使蒋介石依靠ABCD(指美、英、中、荷四国—译注)阵营的团结而进行长期抗战的决心更加坚定，与美英等国的协作越发巩固，抗日战争将坚持到底。日华全面和平势将推迟到全部战争终结才有可能。

二、由于丧失上海、香港等援蒋据点，帝国南进活动进一步开展而切断了滇缅公路运输线，日本保持了在南方作战的成果。南洋华侨的援蒋中断，致使蒋在财政经济上受到压力，从而削弱其抗战力量。与此同时，一般民众，甚至重庆政权的主流派，继续抗战的斗志也会受到很大影响。在那些灰色的将领中，有更多的人投靠南京方面。于是引起重庆统一战线的分裂，蒋政权势必越来越衰弱。

这种判断，是在不直接对重庆政府加强更有力的政治、策略等各种施策的情况下做出的。因此，在11月15日的“关于促进结束美英荷蒋战争的腹案”中，虽然认为迫使重庆政府屈服投降，除运用对美英荷战争的间接成果外，还必须直接加强对重庆政权的作战，但是，当时确已无此余力，故未作具体作战计划。所以重庆政权在日本对美英等开战后的动向，就成了日本大本营和政府十分关心的事情。特别是作战初期顺利进展时更是如此。从12月15日前后开始，参谋本部认真研究了对重庆工作。正如预料的那样，重庆方面没有对日全面和平的动向。因此决定暂不进行和平工作，静观事态的发展。首先制定了一个建立谍报路线的方案。这个方案经联络会议研究讨论，于24日决定了“根据形势演变对重庆迫降工作的有关事项”。其要点如下:

大本营陆军部主管部门应首先建立对重庆的谍报路线，努力侦察重庆方面的动向，此时概不涉及投降条件等事项。随着形势的演变，适时地从谍报工作转入迫降工作，但其时机和方法另行规定。进行此项工作时，应利用国民政府(指汪伪政权—译注)。

根据这一决定，当天即向中国派遣军发出了如下的指示:

关于建立对重庆的谍报路线的指示

一、日本帝国根据附件第二“根据形势演变对重庆迫降工作的有关事项”，利用形势的演变，特别是作战的成果，掌握有利时机，为了策划迫使重庆政府投降，首先建立对重庆的谍报路线。

此工作委任大本营陆军部执行，各有关机关予以协助。

二、大本营陆军部统一领导第一项工作的大纲，主要委任中国派遣军来执行。

三、中国派遣军必须遵照下列各项进行工作。首先以上海租界、香港等地为基地，调查并利用新争取过来的中国要人或其他外国人以建立对重庆的谍报路线。

1.对我方意图须严格保密，特别是对可利用的中国、外国要人进行调查时，务须周密

谨慎.

2.应采取统一措施进行工作，避免把工作交给直属军以下的人分担。

3.如果必须委托大本营陆军部以外的与帝国有关系的机关(包括以这种机关为背景的个人在内)协助时，事前应取得中央的谅解，务希谨慎从事。

4.不许通过轴心国和中立国的外交官宪进行对重庆工作。

5.于1月底前确定关于建立谍报路线的具体计划，为此，必须事先取得中央的承认。

6.不得暴露我方的企图，应特别周密注意。

附件二、(笔者略)

注1:传达本指示时，大本营曾作如下的说明:“开战后，在外务省、兴亚院，海军、民间等中间，有种种对重庆工作动态，所以大本营陆军部针对这种情形急速予以统一领导。

注2:自1940年以来，虽然禁止现地驻军对重庆进行和平工作，但并非完全不要谍报路线，如1941年7月冈村大将就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时,据说就接受过建立工作路线的特别命令。

注3:作为上述指示的具体措施，日本参谋本部第八课，对居住在香港，而且与重庆保持着联系的要人，如胡文虎(星岛日报社社长)、郑晓棠(富中行总经理)、陈济棠(重庆政府的政府委员)、杜月笙(原上海财界要人)系统，以及许崇智(陆军上将)、颜惠庆(原驻苏大使)、宋美龄和宋霭龄的朋友李星衡(财界要人)、林康侯(万国红十字会分会长)等名流，请他们出来工作，并计划由国民政府最高军事顾问影佐祯昭少将控制使用他们。

工作的具体化并不容易，直到预定的1月底，工作计划未见进展。3月12日左右，参谋本部主管人到南京与中国派遣军有关人员协商后，制成一个方案，但是这个方案在根本上有些地方与对重庆的判断不相符合。

中央方面在2月初，对今后的战争领导方案进行了研究讨论，并在3月7日的联络会议上通过了“世界形势的判断”、“今后应采取的战争指导大纲”以及其它决定。其中对于“重庆政权的动向”作了如下叙述:

一、重庆政权的抗战力量虽然日趋低落，而且其财政经济状况已陷于困境，但仍依靠党和军队的威力，坚持强韧的抗战意志，并期待着反轴心阵营的最后胜利，尚不致放弃抗战。而且最近日益加强了同苏联的合作，并设法同印度民族接近，与此同时，并致力于抗日统一战线。

二、如果美英援蒋的滇缅公路切断，轴心国战果的扩大，以及其它对美英苏的依赖出现不可靠的情况，再加上见到日本实力逐渐增强，则其抗战体制最后必将崩溃。

在这里所讲的与开战前的判断略有差异，即无需等到全部战争结束，重庆抗战体制有可能招致崩溃。但是，在“今后应采取的战争指导大纲”中，关于对重庆的方案仍然只是决定要竭力设法建立一条谍报路线。

烟总司令官对此做出判断:“除以武力使重庆屈服外，别无解决办法”。他在3月14日的日记中写道;“大东亚战争以如此战果胜利进展，而重庆方面却一直没有倾向和平的迹象，反而更加强硬起来，中央对此稍感焦虑。因此，大本营内部甚至有人指责派遣军过于谨慎。”

3月27日，中国派遣军接到大本营的指令，“建立对重庆的路线，6月底以前暂且只限于利用在香港、上海、西南三个地区掌握的中国人的谍报路线”，而且在指令中还附记有“在中央统制之下，除派遣军总部外，可不参加此项工作。”

但是建立对重庆谍报路线工作，不一定是容易完成的。重庆不能轻易动摇，从而在香港、上海所掌握的中国人也不好行动。根据他们的说法，“在唤起舆论

向蒋呼吁，并取得明显成果以前，要听任他们去做。希望对他们的职务、住地都不要加以限制。”当时的情况就是如此。

此外，3 月 31 日，大本营还做了有关“对华宣传谋略”的指示如下:

日本帝国大致在平定缅甸北部之际，积极地大规模地开展厌战及反对英美的思想运动。特别要同中国方面紧密联系。

一、统一国内电台，对重庆进行广播宣传攻势。

二、通过特定掌握的重要人物，对重庆进行广播讲话或让他们发表声明。

三、选拔投诚的士兵、掌握的人物及第三国人等，对他们进行教育后，使之潜入现地进行宣传，特别加强厌战，反英美思想运动。

四、在中国各地，发动适合当地情况的民众运动。

五、利用本年夏秋季节，在配合欧洲战局所采取的政治、战略措施的同时，实行宣传谋略攻势。

在此时期，应对严加挑选的特定将领进行争取工作，开展利用国共关系的工作，以及与作战有直接关系的谋略等活动。

当时中国方面于 30 日，即国民政府迁都及华北政务委员会成立两周年纪念日这一天，更加积极地展开了思想攻势、归顺工作以及民众运动等等。

其后，因形势发生了变化，大本营如后所述，对重庆采取武力解决方案的比重益形加大。因此，于 7 月 11 日大本营参谋次长就对重庆谍报路线的建立工作，给派遣军总参谋长发出指示。下达指示时附有说明: “从轻松的意义看来，所以作为次长的指示发出，中央也不着急，而要谨慎从事，这不是和平工作。”指示内容如下:

一、希望建立对重庆中枢部门的谍报路线，侦察其政治动向。

二、应将以香港为据点的对重庆谍报路线加以整顿收缩。

三、对与本工作有直接关系所掌握的重要人物，应限制在最小限度。

四、担当直接工作的人物，应严加保密，避免与外界接触。

五、占领区的日华官民对重庆中枢部门的谍报工作，仍需予以监视。

六、利用国民政府职员直接进行本工作，要给对方以和平工作的印象，因我方意图有被察觉之虞，应极力加以防止。

对华积极作战的研究

大本营鉴于南方作战初期的顺利进展，早在 2 月前后就作出了形势判断: “为了完成长期战争，一反过去预定采取的守势战略，现在已是转而采取攻势战略的时机。”因此，对于战前所预定的攻取地区以外的，即对外围要地积极进行局部作战的方案进行了讨论。但是，对于全部兵力的运用，以及在中国战场上进行大规模的作战，未做具体研究。在 1942 年 3 月 7 日召开的联络会议制定的“关于今后应采取的战争指导大纲”中的对重庆方案，也只是根据 1941 年 12 月 24 日通过的“根据形势演变对重庆迫降的工作有关事项”制定的。具体说来，也就是前面所说的对重庆谍报路线的建立。在这次会议上，政府方面提出了“如果在军事上没有解决的办法，就放宽和平条件，通过外交途径求得解决”的方案，但因当时的形势不适宜，终于被否决了。另外，在参谋本部内部，根据既定计划在南方作战告一段落后，将长期驻华的三个师团调回日本，而重新编制

六个驻华警备师团，现正进行准备工作，其军备设想也颇消极。

另一方面，中国派遣军始终对中国事变的解决表示强烈的关心和责任感。随着南方作战的进展，对中国方面的积极作战也做了种种研究。中央也曾预先暗示，“开战后，如果形势许可，则增加在中国方面所需的兵力，以加强对重庆政权的压力。”但由于增加兵力的时机不明确，尽管感到有向四川发动进攻作战的必要，却未能制定出相应的作战计划。

派遣军各部队从 1 月末以来经过调整后，制定了一个方案，并于 1942 年 12 月 20 日向中央提出了申请。这个方案的设想是:“预定在今年夏秋季节，华北方面军对西安进行作战，第十一军对长沙、常德进行作战，两方面的作战均应击败面前的敌军，特别要寻找中央军予以击破，同时要占领各主要地区，藉以加强对重庆的压力。”大本营对此避免正面的回答，一直拖到 3 月 29 日，才召开幕僚联络会议，决定了“1942 年度在中国方面维持现状”。派遣军领会中央的意图尚未确定，乃继续进行研究。

华北方面军参谋岛贯武治大佐对当时的情况，有如下的叙述:

华北方面军正在全力以赴进行剿共作战，以期迅速恢复治安，但如能增加作战所需兵力而形成有利局面，认为可以设法歼灭西安方面胡宗南指挥的重庆嫡系第八战区的部队。然而当时第八战区的部队在与我军对阵的同时，与延安的共军也处于对峙状态。如仅将西安攻下，反而对华北的主要敌人共军有利，因而考虑在下一步就消灭延安。

这件事已被列入方面军的 1942 年度肃正建设计划之中，而且于 1942 年 2 月初向中国派遣军作了报告。但是，中国派遣军比起西安作战来，更为重视长沙、常德作战，至于消灭延安更是不在话下了。

注:方面军把西安作战称做“五号作战”，到 5 月间又改称为“五十号作战”。

参谋本部自 3 月 7 日召开联络会议以后，开始研究南方作战第二阶段的设想。与此相关，在中国战场如不更加积极地使用武力，就无法使重庆早日投降的想法，开始抬头。特别是军部上层早就迫切希望尽快解决中国事变，因此更增强了这样的气氛。

3 月 19 日杉山参谋总长上奏“关于今后的作战指导”条陈时，在其研究中的中国事变处理方案的腹案中，有关于动用武力的积极措施。其要点如下:

在整个形势，特别是对苏形势许可的情况下，希望利用大东亚战争的成果，对中国事变的处理，断然设法尽快解决。

考虑到切断滇缅公路后，要使全中国普遍受到影响，最快也需要几个月的时间。选定这一期间开展积极的行动，是对我方有利的。

作战要领，从其它方面调遣几个兵团与驻华兵团一起，共同进行大规模作战。

作战的目的在于:歼灭敌之中央军，或攻占战略要点，使重庆政权受到直接威胁，或策划分裂瓦解其各部队，便重庆政权更加丧失控制力量。

进行上述作战时，应密切结合政治谋略，特别是要加强经济的压迫。

由此看来，该腹案只不过是极不明确的作战设想而已。但是，3 月下旬大本营在讨论今后作战指导方案时，关于对华处理问题，攻占重庆论已成为争论的核心。

3 月 27 日，参谋本部作战指导班起草了“对重庆作战指导纲要(草案)”。4 月以后，在参谋本部内外进行了审议。在 4 月 1 日的“大本营机密战争日志”中记载着“自中国事变发生后，这是前所未有的处理事变的绝好机会，如失此良机，就只能在英美蒋结成一体的体制下进行处理。因此，设法使之脱离这种

体制乃是成败的关键，这是不容犹豫的。”

4 月 6 日，杉山参谋总长视察南方的归途中，在上海与烟司令官恳谈，传达了上述关于对中国事变处理方案的内情。4 月 16 日在召开军司令官、师团长会议时，第一部长向后官总参谋长汇报说:“对华处理问题，始终要积极迫使蒋政权屈服，现在正研究讨论包括完成大规模作战在内的具体方案。”自此以后，在中国派遣军内部也开始加紧了迫使重庆屈服方案的研究工作。此外，4 月 16 日前后，在中央统帅部的“对华形势的判断”中，有如下的记述:(摘要)

“重庆政权长期抗战的结果，对反抗轴心国有利。现在企图在对内方面迅速加强其长期持久战的态势，在对外方面则促使英美加强对东亚的关心，并策划拉拢苏联。在军事方面尽管由于我方历次作战使其战斗力逐渐削弱，但蒋介石的统治力量仍然很强大，而且专心致力于整训军队，以便作好下一阶段总反攻的准备。与此同时，极力设法坚守缅甸北部、确保中印联络路线，并在福建及其它各地秘密建立了航空基地，企图破坏日本本土和在中国海上的海路交通。这都是我们所能看到而且应当注意的。在经济方面，由于南方作战的结果使之丧失了上海、香港以及其它沿岸地方的公路及滇缅公路。今后应进一步施加压力，杜绝中国同英美的联络。这一切仍然可以看做敌人方面的最大弱点。然而如果从四川北部大后方具备自给自足的各种要素来看，从中国事变带有民族战争的色彩来看，以及从敌人方面还坚持轴心国必败的信念各点来看，还不能指望蒋政权的早日屈服。至于缅甸作战的成果会给敌方抗战力量带来多大的影响，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估计其结果需要到今年夏季以后才能具体表现出来。

当时华北方面军不知道中央军部这些动向，单纯地从维持华北治安和对敌施加压力的观点出发，企图到南方作战结束后，大约在 6 月或 9 月间就可以向西安发动进攻，击溃第八战区胡宗南部队，然后消灭中共的最大根据地延安。在 4 月中旬及 5 月中旬向参谋本部提出实行本作战的强烈要求。另一方面，中国派遣军参谋部也因为得知上级的意图迟了一些，直到 4 月中旬为止，为了打击重庆，他们还曾判断，与其采取政治策略手段使重庆脱离英美，不如通过作战手段击溃长沙和常德的第六和第九战区的部队，夺取谷仓地带比较有利。但是没有考虑到一举完成攻占重庆的作战。

注:关于对中共问题

在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内部，对于华北方面军主张采取西安作战的方案，也有持反对意见的。他们认为目前国共双方斗争正在激化，最好不要触动与延安对峙的第八战区部队。华北方面军则认为，这种看法是对共产党势力的本质认识不足。日本与重庆之间暂时处于战争状态，却有能够共存的性质。但是，日本与共产党势力之间则是不容许共存的。求助于国共斗争等想法，完全是一种姑息的看法。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毅然决然地围剿消灭共产党势力。因此，曾考虑在西安作战中以延安为作战目标之一。华北方面军作战主任参谋岛贯武治就曾说，华北方面军的真实意图，却在于消灭延安。

参谋本部对中共的认识虽也未必充分，但是参谋本部第一部长田中于 5 月下旬审查推敲作战设想时，他在业务日志中写道:“攻占重庆后，抗战的中国有落入中共手中的危险，如果没有充分可靠的估计，攻占重庆就只不过是极端危险的投机……”。这一问题姑且做为研究考查的对象。

加强国民政府的措施

财政等的支援 南方作战获得辉煌战果，使重庆方面受到威协，同时也给占领地区的治安带来了良好影响。在这种新形势下，日本方面为了加强国民政府《汪伪政权—译注》的政治力量，而采取了各种措施。

3 月，把天津和广东的英租界移交给国氏政府管理。在通货政策方面，3 月 31 日停止了储备券和旧法币的等价兑换，5 月末采取了整顿措施，以新币与旧法币为 1:2 的兑换率回收了旧法币。这对于促进统一币制、打击旧法币，以及加强中央储备银行对华中金融的统制能力和调剂军费的能力等方面都给予了支援。

另外，对当时正在进行的清乡工作的支援，也以加强国民政府为其主要目的。

但是，中国方面缺乏政治、财经方面的人才，廉洁的官吏很少，因而不是靠外部的援助所能加强的，一定要从内部加以整顿。

注:当时任国民政府军事顾问的晴气庆胤大佐，对国民政府的内部情况作了如下的叙述:

国民政府在建立政权的同时，即丧失了过去和平运动的热情，一味追求理想面缺乏对现实政治的认识，对战时情况下的政策和施政的关心渐趋淡薄，而且也没有统治能力和经济方面的基础。参加政权的人们热衷于获取权利，政府成了贪官污吏的巢穴。由于这是出于日本政府的计划，因而日本在国际信誉上也应负一半责任。但国民政府也必须主动进行整伤，否则是无法加强其政治力量的。

清乡工作 清乡工作具有与“华北治安肃正要领”不同的特点。现在简述如下:

1941 年 7 月以后，选定长江下游苏州以北的江南地区，为了将该地区建成模范和平地区，开始了清乡工作。清乡就是要扩大江南工作的成果，要在国民政府直接统治下的所有省市普遍实行这一工作，以便建立地方治安，复兴和繁荣民生，从而达到加强国民政府政治力量的目的。

这就是说，清乡工作要分阶段进行，首先划定一定地区为清乡地区，按“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原则，以日本军队和中国方面警备武装力量，在指定地区内彻底进行肃正。与此同时，发动中国方面的军，政、党、民各方面的全部力量投入清乡工作，设法恢复治安，振兴政治经济。日本方面在结束军事行动后.即无需参与一切有关这方面的工作，由中国人自行建设自治、自卫和自力更生的和平地区。这样一来，日军的负担即可减轻，而且随着清乡工作各种措施的进展，清乡工作地区逐渐扩大而遍及全国，最后将达到建设新中国的理想。这一设想是从局部和平过渡到全面和平的解决中国事变方案的实践，具有根据新条约的规定使日华合作具体化的意义。

自 1941 年初以来，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和国民政府经过反复磋商，终于从 3 月份开始了具体准备工作。汪兆铭亲自就任清乡委员会委员长，由警政部长李士群任秘书长负责实际工作。日本方面第十三军及军事顾问部参加了委员会工作。首先在南京至上海间长江南岸及苏州以北划定一小块地区，从 7 月份开始了第一期清乡工作。随着工作的进展，在无锡北部地区，相继开展了第二期工作，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1942 年清乡工作进一步扩大开展，在江南地区，由乡镇到城市，包括主要交通路线在内的模范地区逐渐建设起来。同年夏季，因第十三军主力部队调去参加浙赣作战，清乡工作暂时停顿。同年秋季，重新开展了扬子江北岸地区、上海周围、太湖东南地区的清乡工作。1943 年，在安徽省浙江省境内也进行了清乡准备工作，国民政府的政治基础得到显著扩大。然而，在这期间，清乡工作与国民政府的一般行政发生了矛盾，而且矛盾逐渐激化，已发展到难以调和的程度。在人事上也积累了很多问题。到同年 6 月，消乡工作终于陷入了分裂瓦解的结局。

二、华北方面军的肃正建设施策

从日本方面来看华北治安战的全部经过，自中国事变爆发到1938年，是武力戡乱作战时期，治安肃正建设大致可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39-1940年，第二阶段1941—1942年，第三阶段1942年以后到战争结束。

第二阶段是肃正建设的全盛时期，如能顺利进展下去，收到成果是可以期待的。特别是1942年，过去的各种施策逐渐显示出效果。同时，断然实行了各种新的措施，密切协调了肃正和建设两方面的工作，而且结合大东亚战争初期整个战局的顺利开展，使得华北方面的治安情况迅速好转，局面也随之扩大。

另一方面，中共受到外部压力，加以其内部在政策上的矛盾日益严重，致使解放区的人口、面积、八路军的势力等等都缩小了，这是中共最穷困的时期。这在中共方面的记录中也有如下的记载:

1941年和1942年，是抗日战争时期党发展的第二阶段，日本帝国主义者为进行反英美战争，在中国进一步加强了以攻击国民党(重庆)为辅，以攻击共产党为主的方针。更加集中其主力于共产党根据地的周围，进行连续的“扫荡”、“蚕食”、“治安强化运动”以及残酷的“三光政策”，已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因此，使我党在1941年和1942年这两年期间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我党根据地缩小了，解放区人口已由一亿降低为五千万，八路军也由四十万人左右减少到三十万人，干部也损失了很多，财政经济陷于极端困难的状况。但是，我党在华北敌后解放区的干部以发了霉的黑豆和高粱来充饥，士气昂扬地坚持了战斗。另一方面，共产党中央在1942年的七·七宣言中也曾指出，这一年是抗战以来最困难的一年，同时还号召敌后的军民坚持度过最后危机，并号召共产党员做在敌后地区坚持斗争的模范。于是我们终于打退了敌人的进攻，为其后党发展的第三阶段奠定了巩固的基础。(以上仅按日文译出，未与中文原文核对。—译注)

自1942年秋季以来，大东亚战争的局势转化为对日方不利，而华北治安战也随之一蹶不振。但是，本章和下一章则主要讲述治安肃正建设的最兴盛时期的状况。

1942年度治安肃正建设计划大纲

1942年度，华北方面军考虑要以两个独立混成旅团改编成两个以治安警备为主要任务的师团，根据情况，为了调动兵团对管辖区以外进行攻击作战的需要，在运用兵力上应保持灵活性；考虑到有必要恢复管辖区内的治安、开发重要资源、促使中国方面独立自主的飞跃进展等等情况，策划了1942年度治安肃正建设计划。根据这个计划，方面军的直辖区缩小到只限于河北省，而且加强了这个地区的兵力，首先把主要着眼点放在河北省的彻底肃正与迅速恢复治安方面。

2月25日、26日，华北方面军召开了所属各兵团参谋长会议，下达了下述年度计划大纲:

第一 方针

沿袭前一年度计划大纲，特别在军事方面，灵活实行积极的不间断的作战讨伐，在治安建设方面，设法掌握民心，促进中国方面独立自主的积极性，大力推行具有创造性的措施，使治安状况得到空前改善。

特别要先以河北省北部的肃正工作为重点，同时，努力完成日军总兵站的使命，根据情况，断然进行西安作战、延安作战，为中国事变的解决、华北局势明朗化作出贡献。

第二 要领

一、根据“方面军治安肃正建设三年计划”的设想，主要是将确保治安地区的任务，逐渐移交给中国方面的军、政机关。日军的主要任务是进一步向外推进其势力范围，并设法将非治安区变为准治安区，准治安区变为治安区，而从逐渐扩大治安地区的面积。

在本年度内，务期将河北省大部、山东和山西各省以及蒙疆的主要地域都变成治安区。

二、治安肃正的重点，应放在以剿共为主的作战讨伐上，首先对冀东、冀中地区，然后对太行山北部地区开展治安肃正工作。在1942年度第一期，华北方面军计划进行的肃正作战如下:

冀东作战(一号作战)

冀中作战(三号作战)

上述两项作战，主要由华北方面军直属兵团进行。为此，由第一军抽调第四十一师团及独立混成第九旅团统归方面军直接指挥。

晋冀豫边区作战主要由第一军进行。

冀南作战主要由第十二军进行。

同年9至11月期间，进行晋察冀边区肃正作战，以期将对敌封锁线向西推进。

除上述各项作战外，根据情况进行西安作战(即五号作战—攻占西安、延安和洛阳)。

三、以治安第一为原则，军事方面的肃正讨伐，应与建设方面的行政、经济、文教等措施以及治安强化运动，新民会、合作社等民众工作密切配合，使军、政、民成为一体，而把各种行动措施有机地结合起来进行活动。

四、为了完成大东亚战争，鉴于华北应成为培养补充战斗力的基地，应采取紧急措施，特别重视确保治安、提高人民生活，加强地方自救、解决粮食问题、稳定金融经济。

五、促使中国方面的军队、官吏、民众自觉地认识到对肃正建设的责任，同时要启发诱导他们独立自主地积极展开活动。

另外，3月23日，华北方面军参谋长安达二十三中将接见驻京记者团，就肃正建设的成绩和1942年度主要措施作了说明。在他的说明中，对政治经济等建设方面的问题所谈如下:

去年是困难的一年，就象大水灾过后的救灾工作一样。希望本年度将是把各项工作加以组织系统化，使华北全区空前发展的一年。为此应统一进行五个建设项目。

一、要求中国官民独立自主地积极进行活动。

二、进一步扩大和提高行政力量。

三、努力开发和振兴重要国防资源。

四、保证粮食自给自足，彻底实行对敌经济封锁。

五、力求扩大和巩固联银券流通范围。

华北方面军在新年度中采取的措施，特别注重于治安肃正工作，在进一步加强对敌压迫的同时，推进五个建设项目的措施。倾注日华双方的全部力量开始一面战斗一面建设的大进军。我认为这样治安当可稳如盘石，华北才能真正与日满共同完成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任务。

4月27，28两日，华北方面军召集所属兵团长开会，贯彻年度肃正建设计划的精神。但是，27日中国派遣军突然下达密令，命派遣兵力参加华中的大规模作战(浙赣作战)，于是肃正建设计划从年度一开始就被削弱了。

各兵团的年度肃正建设计划

第一军的计划大纲 方面军的各兵团根据前项方面军的计划，结合各自负责地区的特点，分别制定了自己的1942年度肃正建设计划。

第一军适应第四十一师团和独立混成第九旅团的调出，以及独立混成第十六旅团的改编，自3月初制定了本计划，于3月21、22两日在与年度计划有关的参谋长会议上进行了传达，并且作了必要的指示。计划的内容不详，为参考起见，从军司令部情况报告中，将1942年第一期计划的一部分摘录如下:

一、我军以消灭敌对势力作为山西省肃正建设计划的主要目标，将军、政、会、民等机关的措施密切配合加以推动，力求迅速而扎实地进行建设。

为了消灭敌对势力，我军的方针是:对中央军除连续进行讨伐外，并要寻找机会集中兵力进行机动灵活的歼灭战。对共军则是彻底地不间断地进行肃正讨伐。

对于在晋冀豫边区建成华北共军主要根据地的第十八集团军和第一二九师，以及在太行山南部地区活动的中央军第二十四集团军和第二十七军，自5月中旬到7月下旬连续进行作战，将共军根据地设施的大半予以摧毁，并粉碎中央军。

二、在各种建设措施方面，根据日华基本条约的精神，协助盟邦中华民国促进治安行政的开展，特别是中国的内政，使其独立自主。发挥其创造性和积极性。同时日华一体为完成大东亚战争做出贡献，努力开发和获取重要国防资源，坚持低物价政策，设法保证驻军的现地自给自足，减轻国库负担，逐渐取得成果。

另外，对于一般人民生活，尤其是在战争时期直接受到灾害的民众的救济工作，要予以特别关注。制定粮食紧急措施，力求满足需要，以安定民心，使愿为大东亚战争尽力的新中国显著地活动起来，而更加推动日华提携的积极性。

三、对山西军加强历来的谋略工作(中略)。安平村谈判破裂后，经中央批准，向阎锡山发出通告，决定废除5月I7日已签署的协定。同时，为了改变阎锡山的优柔寡断的性格，促其反省，歼灭一部分山西军，或迫使他们投降，并加强经济封锁。

第三十六师团的计划 第一军直属部队第三十六师团于4月15日制定了“1942年度肃正建设计划”。这个计划是由六个部分组成的。第一，方针；第二，纲要；第三，关于肃正讨伐事项；第四，关于情报事项；第五，关于建设各种措施(有关政治、经济、交通、通讯等事项)；第六，关于宣传启蒙教育事项(思想战)。从各种措施中可以看出这是经过一番创造性的考虑而使之系统化的。其方针部分中有这样一段:

“本师团以消灭共军第一二九师及中央军第二十七军，扩大治安区为方针。为此，本着治安第一的基本精神，在继续加强过去各项措施的同时，使一切措施都从属于加强治安扩大治安区范围的目的，特别要促使中国方面各机关独立自主地参加这项工作，共同协作，分工负责，积极完成任务。肃正地区划分为治安区、准治安区和非治安区三类，按照一定的方针，分三期加强扶植，以推进和扩大治安地区范围。”

这个计划适应山西省东部的特点，特别认真地贯彻了第一军的意图。

独立混成第八旅团的设想 独立混成第八旅团长吉田峰太郎少将于8月24日曾向第一一0师团长送交一份情况报告。从这份报告中也可以看出该兵团对肃正建设计划的想法。独立混成第八旅团当时配属于第一一0师团，长期以来担任石门地区的保卫任务，而于4月上旬调到顺德(今邢台—译注)地区驻防，接替了前任部队的任务。其报告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敌情

在管区内及其周围地方的敌军，是冀南军区新编第四、第七、第九旅和太行军区新编第五、第十，第十一旅等各部队的部分兵力，总共约有 2,250 人左右。本旅团接防后，不断进行肃正讨伐，敌军的战斗力显著下降，其动态也极消极。

平原地区属于冀南军区，在威县(顺德以东约 60 公里)南部邻接县境附近，有新编第四旅及冀南第四分区的约 500 人游动。在管区以外的南宫(顺德以东即 80 公里)、冀县(南宫以北约 30 公里)以及枣强(冀县东南约 30 公里)三县附近地区,有新编第七旅的主力部队，其中一部分兵力有时侵入南宫县内。

在山岳地区，则有太行军区所属各旅和伪县政府系统的匪军，分散于各地。对我封锁线工作虽多有妨碍，但无联合行动。由于我军实行了彻底的封锁，敌物资缺乏，似陷困境。随着我军威令探入，管区内敌军的武装战斗已完全被我封住。因而管内之敌，有对县警备队等中国方面武装团体采取谋略活动，及对亲日派采取暗杀等恐怖政策的趋势。

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虽尚在某些地方蔓延，但随着侦察谍报工作的开展，逐渐实行检举。另外在我军威令深入的威县北部地区，共产党几无法进行工作，因此，7 月中旬出现了大批归顺投降者。

二、肃正建设

大东亚战争爆发以来，特别是为了使治安肃正建设得以空前飞跃进展，本旅团于 4 月奉调来当地驻防后，始终遵照师团本年度计划的指示，自认为是按规定进度执行了任务。目前在管内封锁线地区内，基本上已无敌匪团残留，但有时发现敌人自管区外潜入的行动，因此随时对周围地区之敌进行讨伐。

从已确保治安的地方开始，逐渐把警备任务移交中国方面的有关机关。皇军则将能集结的剩余兵力，利用原有设施，机动灵活继续进行肃正建设。为此，大致作了如下的指示:

1.到 8 月底以前，将京汉路以东钜鹿(顺德县东北约 50 公里)、广宗(顺德县以东约 55 公里)以西一带地方建成治安区，兵力部署重点放在东部、南部和北部县境附近，内部警备基本上移交中国方面负责。

2.到 11 月底以前，预定将京汉线以西直到原山地封锁线的一带地区建成治安区，兵力部署的重点放在西部山地封锁线的南部和北部县境附近，内部警备基本上移交中国方面负责。

3.到 11 月底以前，对威县、南宫、清河(顺德以东 190 公里)等县的敌人进行彻底扫荡，不允许敌人盘据在那里进行游击，内部警备基本上移交中国方面负责。

4.到 8 月底以前，铁道警备除重要地段外，大部分地区移交中国方面负责。山地方面，在今年度内从必要的地方开始，逐渐将封锁线向外扩大，一面清除敌人的骚扰继续修筑工事，一面配合讨伐扩大我军威力范围。

三、治安军第一 0 二集团与皇军共同处于分散部署状态。司令高德林及其所属军官，目前尚未发现有何不稳动向，可以认为是相当热诚地与我协力。这支治安军部队，从其经历来看，具有相当强的战斗力，而且还大有提高的余地。另外，这支部队的上层干部关心训练，工作积极，但在分散配置的情况下，也难望做得彻底，应经常考虑对他们在物质方面的扶植。

中国方面各机关的活动，逐渐活跃起来。除部分机关外，一般成绩良好。

各县警备队和警察等武装团体是皇军的一支辅助力量，在加强治安方面虽取得相当成就，但其素质训练和装备尚有待大力改善。

乡村武装、保甲制度尤其是乡村自卫团的编制训练以及主要乡村的防御设施均已完成。在治安区内，已有不少地方在单独击退少数敌匪、迅速传递情报等方面不断取得良好成绩。

大乡制度正在顺利地推进中。

新民会逐渐积极展开活动，但尚须更加努力。尤其是在管区内日本职员缺少的情况下，应特别重视利用优秀的中国人，与有关机关取得联系，并给以指导。

四、教育训练

以精神修养为根本，尤应整饬军队纪律，在肃正讨伐的实践中进行教导。同时，对治安军也努力进行严格的教育训练，以期锻炼成精锐强悍的军队。特别要千方百计提高军官的职能。通过各队队长及其下级的努力，在教育及检阅等方面大致可达到预期的要求。(下略)

根据上述情况可以看出，方面军关于治安区的扩张及确立中国方面独立自主精神的设想，正在各兵团的肃正建设中具体地表现出来，独立混成第八旅团长尊重中国方面领导人的立场，努力扩大了他们所分担的责任。作为一例，摘录该旅团长 1942 年 6 月 16 日在顺德召开的县知事会议上的谈话如下:

一、治安的责任

管区内的治安，虽然是我的责任，但是诸位也必须担负本管区内的治安责任。特别是在兵团把已经确保治安的地区防务逐渐移交中国方面负责，而准备把剩余兵力调赴前线以期扩大治安区的情况下，诸位更应负起责任。

各位县知事都是治安负责人，要大力构筑惠民壕-(即防护沟一译注)以及其它必要的防御设施，并努力加强所属武装团体(县警察队、特务队以及保甲自卫团等)的训练，以期奠定独立担当各自管区治安的基础。当然武器的充足是重要条件，但其根本不在于形式，而在于人心，就是说要有坚定的信念和周密的训练。

二、剔抉地下工作

最近敌人的地下工作更加巧妙多变，其工作重点集中于对我阵营进行中伤、离间，以及策动武装团体的叛乱等活动，必须加强戒备。

然而，要识破敌人的谋略或地下工作，同属一个民族的诸位处于最有利的地位。诸位绝不可安于现状，必须督厉部下，千方百计揭露摧毁此等敌人的工作，并进而打入敌方阵营开展工作，使之崩溃。当前临近青纱帐起之际，敌人的行动将日趋活跃，要防止火烧眉毛的紧急情况发生，鉴于过去的教训，希望各位努力。

三、关于加强经济封锁问题

经济封锁措施是方面军作战行动的一部分，予敌人以沉重打击，但就管界内的现状来看，在封锁的措施和机构方面，有不少地方尚待改进和提高。

兵团要使当地部队专心致志努力加强封锁，并逐渐提高封锁效果，但在执行这一工作中，中国方面各位官民所负责的部门关系极为重大。

鉴于实行经济封锁的重要性，各位必须与当地部队长保持密切联系，希迅速采取对策，以保证绝对安全，不给敌人以丝毫可乘之机。

三、华北方面军的警备阵营

新师团的编制和战斗序列的变更

在陆军中央关于 1942 年 1 月末兵备的设想中，指出要根据“1942 年度时局兵备纲要方案”(后改称“军容刷新计划”)，随着南方作战的进展，有计划地在南方、中国、朝鲜以及满洲新设置警备师团，逐步整顿野战师团，并设法实现对苏战备的现代化计划。按此计划，中国派遣军要以六个独立混成旅团为

基础改编成六个师团。只要情况无变化，大致在 7 月前后，调三个长期驻华师团和其它特种部队回日本，一个驻南方师团来中国。

新编制的师团是以独立混成旅团(五个独立步兵大队为基干)和三个后备步兵大队为基干，配备以适合治安警备的轻便装备，再加上两个旅团(各四个独立步兵大队)以及师团直属部队编成的。华北方面军有关方面，根据 2 月 2 日军令第八号，下令编成第五十九师团和第六十九师团。

注:第五十九师团(代号“衣”)是以独立混成第十旅团为基干，再加上步兵第五十三旅团(独立步兵第四十一、第四十二、第四十三、第四十四大队)，步兵第五十四旅团(独立步兵第四十五、第一 0 九、第一一 0、第一一一大队)，以及第五十九师团的工兵队、通信队、辎重队、野战医院和病马厂等，于 4 月 10 日编成的。

第六十九师团(代号“胜”)是以独立混成第十六旅团为基干，再加上步兵第五十九旅团(独立步兵第八十二、第八十三、第八十四、第八十五大队)，步兵第六十旅团(独立步兵第八十六、第一一八，第一一九、第一二 0 大队)以及第六十九师团直属的工兵队、通信队、辎重队、野战医院、病马厂于 4 月 10 日编成的。

两个师团的编制定额，兵员各为 11,982 名。其中各旅团兵员定额为 5,096 名，独立步兵大队为 1,274 名(由四个步兵中队、一个机枪中队、一个步兵炮中队所组成)，军中文职人员定额为 45 名。但是根据不同时期，实际定员人数也有差异。此外，还有编外人员，其增减变动很大。例如第六十九师团,5 月末(括弧内的数字表示 8 月末的数字)有军中文职人 583 名(704 名)，特聘的日满华人嘱托及常备的雇佣人员 132 名(112 名)，临时雇佣人员 842 名(364 名)。

此外，当时驻华北独立混成旅团是由司令部、五个独立步兵大队以及旅团直属的炮兵队、工兵队、通信队所组成。旅团的编制定额为 4,967 名。其中独立步兵大队为 810 名(1943 年 12 月 10 日为 850 人，1945 年 2 月 1 日改为 1549 人)。

4 月 10 日，根据大陆命第六百一十三号，下达新的战斗序列命令。按命令规定，上述两个师团自编制完成时起，编入第十二军和第一军战斗序列，分别接替了济南附近和山西省中部西部的防卫任务。同时，迄今为止直属于方面军的第三十五师团(配属骑兵第四旅团)、独立混成第七旅团以及汽车第三十六联队仍按原来配置隶属于第十二军。第一军所属的第四十一师团(驻山西省)及独立混成第九旅团(正从华中汉口移动中)，向冀中地区移动，作为方面军的直辖部队(隶属转移时间规定为 20 日零时)。

另外，4 月 16 日，根据军令陆第三十四号，第一一 0 师团改为三三制的编制，同师团的步兵第一三三旅团司令部改编为第一一 0 师团的步兵团司令部，步兵第一 0 八旅团改为新编的第七十一步兵团司令部(5 月 7 日改编完成)。

5 月 30 日，根据大陆命第六百四十号，命令第七十一步兵团司令部及步兵第一四 0 联队，合并编入新编第七十一师团。

自此，第一一 0 师团则由师团以及步兵团司令部、步兵第一一 0、第一三九、第一六三联队、野炮兵、工兵、辎重兵各联队、骑兵大队、师团通信队、兵器勤务队、野战医院、病马厂等所组成。编制定员达 14,784 名。

方面军的兵团部署

在 1942 年度，方面军企图以最快速度恢复河北省的治安，令从武汉地区返回的独立混成第九旅团(从去年 12 月到今年 3 月为止派出的)及担任山西省内治

安警备的第四十一师团移驻冀中地区，并在增加兵力的同时缩小了方面军直辖地区。

此外，由于第十二军在1942年初将苏淮地区让给了第十三军，遂将山东省北部和河南省北部划入其作战地区，并使之担当第一线对敌作战任务。

第一军将两个混成旅团和一个师团复员或调往其它方面，或代以新编的一个师团，结果削减了一个师团兵力。

方面军4月下旬初的兵团部署情况，参照插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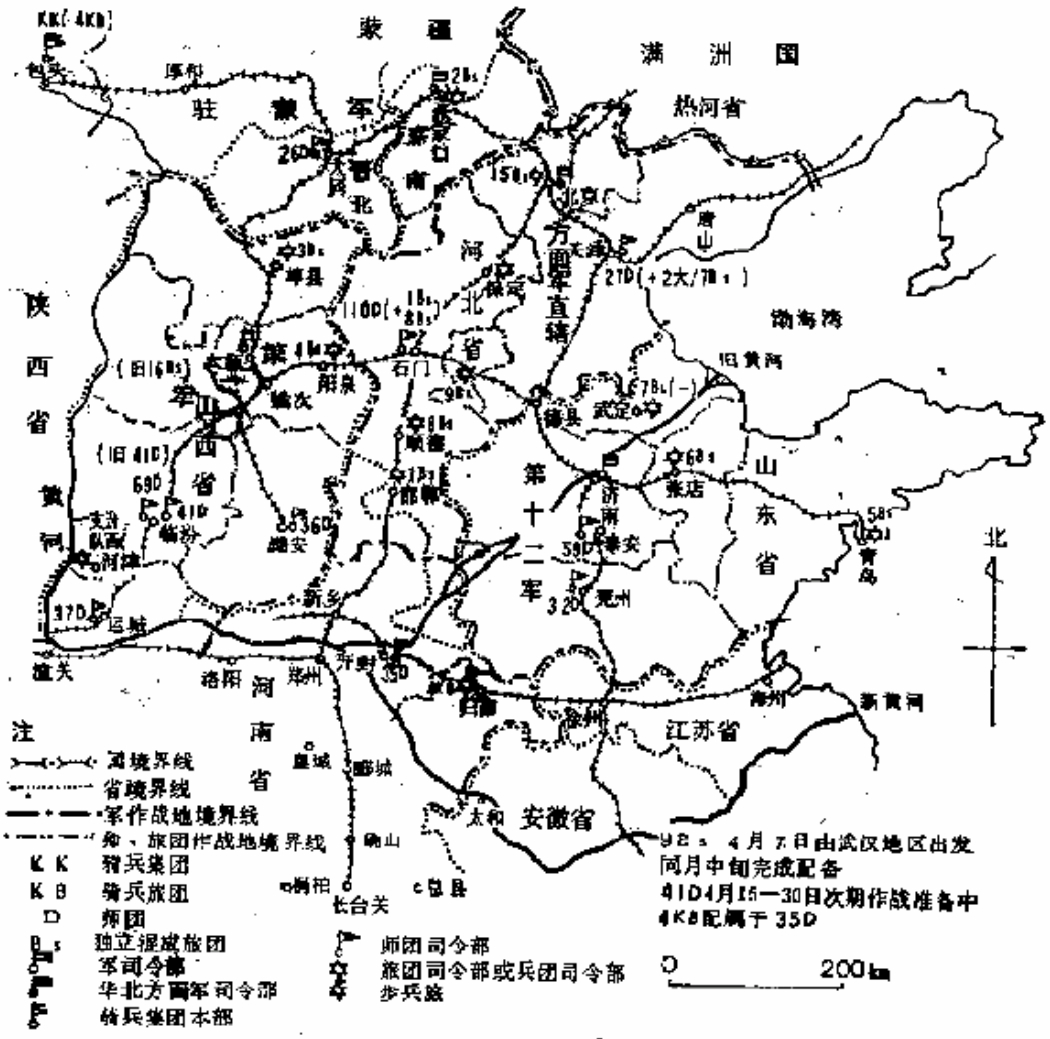


图1.华北方面军兵团部署要图

（1942年4月21日）

当时的方面军司令部主要成员及隶属和指挥下的各兵团长如下:

方面军司令部:

方面军司令官: 冈村宁次大将

参谋长 安达二十三中将

参谋副长 有末精三少将

参谋:

(第一课)德永鹿之助大佐，岛贯武治中佐，大井确一中佐，小野秀雄少佐，李健公少佐。

(第二课)晴气庆胤中佐，横山幸雄少佐，山崎重三郎少佐，茂川秀和中佐(兼)。

(第三课)广濑四郎大佐，西野恒夫中佐，官原健雄中佐，安倍邦夫少佐。
(第四课)西村乙嗣大佐，片山二良中佐，中村祐次少佐，塚本政登士少佐。

第一军:
军司令官 岩松义雄中将
(军参谋长) 花谷正少将
第三十六师团长 井关仞中将
第三十七师团长 长野祐一郎中将
第六十九师团长 井上贞卫中将
独立混成第三旅团长 毛利末广少将
独立混成第四旅团长 津田美武少将

第十二军
军司令官 土桥一次中将
(军参谋长) 河野悦次郎少将
第三十二师团长 井出铁藏中将
第三十五师团长 重田德松中将
第五十九师团长 柳川悌中将
独立混成第五旅团长 内田银之助少将
独立混成第六旅团长 盘井虎次郎少将
独立混成第七旅团长林芳太郎少将
骑兵第四旅团长 佐久间为人少将

驻蒙军:
军司令官 七田一郎中将
(军参谋长) 稻村丰二郎少将
第二十六师团长 柴山兼四郎中将
独立混成第二旅团长 真野五郎少将
骑兵集团长 西原一策中将

方面军直辖兵团
第二十七师团长 原田熊吉中将
第四十一师团长 清水规矩中将
第一一0师团长 饭沼守中将
独立混成第一旅团长 铃木贞次少将
独立混成第八旅团长 吉田峰太郎少将
独立混成第九旅团长 池之上贤吉少将
独立混成第十五旅团长 田中勤少将

四、华北各种主要措施的实施概况

在此着重叙述华北的经济建设情况。至于军事方面的问题只谈谈有关治安强化运动及对伯工作。关于肃正作战问题则另作叙述。

大力推动经济建设

华北的资源地位及开发的设想 方面军参谋部根据 1941 年 1 月规划的“华北资源二十年国土开发计划”，委托满铁华北经济调查所对华北资源进行了调查，并在调查资料的基础上，于 1942 年 9 月编成《华北资源要览》。在要览中适应东亚共荣圈的扩大，就华北资源地位和开发问题，做了以下的叙述:

华北资源价值的概括总结

一、观察现在展望未来，华北有许多确实可靠而且蕴藏是很大的资源。除劳动力以外，主要是煤炭，其次是盐、石灰石，白钨矿，萤石，铝矾土、页岩以及棉花、羊毛、皮革等。铁的资源现在虽不能抱有很大希望，但未经调查的部分很多，食物资源的自给亦无太大困难。森林资源现在比较缺少，但可与水利事业同时发展。

二、煤炭，无论在质量和数量上不仅是东亚共荣圈的唯一最大的供应基地，而且可作为集中于渤海沿岸的炼铁用煤，结合利用南方各地、华北、满洲的铁矿石，在这里可以设置重工业基地。另外，煤炭加工工业或利用煤炭的工业，如煤炭的液化及化肥工业等有很大的发展前途。

三、盐是仅次于煤炭的重要资源。开发包括满洲及渤海沿岸、青岛、海州一带的盐田，足以建立制碱工业的基础。这对于振兴以制碱工业为中心的化学工业具有特别重要意义。

四，如果同时利用丰富的煤炭发电和水利发电，完全可能以华北资源来发展轻金属工业、化学工业和窑业。

五、棉花、麻、羊毛、羊皮等衣着原料，通过增产和原料供应地区的扩大，为了日满华的自给自足，使华北成为原料供应基地，是不困难的。

六、农产品原料和衣着原料之间，虽然有互相争地的关系，但是通过扩大耕地面积，改进农业技术和施肥等措施，也不难达到华北地区自给自足的目的。另外还可以从南方各地以及满洲、华中等地得到粮食供应。

七，黄海、渤海湾沿岸，用做渔场极有前途，可以预期将来的渔业会有很大发展。

八、华北矿产工业，一般说来还不发达，其技术尚很落后。因而利用丰富的燃料，动力资源以及廉价劳动力，开发基础原料部门和发展以消费资料为中心的轻工业是有希望的。

九、彻底贯彻执行黄河以及五大水系的治水和水利计划，除可直接培育养护森林资源外，对农业可以防止水患，便利灌溉，对工矿业则可提供廉价丰富的动力资源，并可期待航运的发展。(中间部分删去)

华北今日已不再是欧美的殖民地，现在正与日满共同经营着统一的经济，其资源的开发得以委之于最善于利用者之手。因此，华北的潜在资源是非常大的。此外，华北的资源与南方其他共荣圈内的资源并不重复，所以说向南方发展就需要进一步扩大华北资源的利用。(中间部分删略。)南方地区长期沦为欧美殖民地，经济一直向畸形发展，变成了欧美的资本市场，原料供应地和商品市场，没有独立自主的经营体制。因此，今后该地区的经济再建设，要依赖日本的经济力量，提高重化学工业的技术水平是最大的关键。

华北对日满经济来说，是原料资源和劳动力的供应地。但是，在同第三国断绝了贸易关系的今天，华北在与南方共荣圈进行资源交流的同时，由华北提供的物资也将把纯原料改变为成品、半成品，从南方运进粮食和铁矿砂等，这样就有可能建立纺织、炼铁工业基地。

大力推进重点措施 华北的经济建设，在完成大东亚战争中的方针是“迅速建立自给自足的经济，以保障民生，努力减轻日本经营华北的负担，尽量提供战争需要的资源。”为了推行以强有力的战时经济体制开发重要资源，执行金融

货币对策和粮食对策，以及确保和加强运输力等主要措施，当前亟须具有“创造性”的施策。其概况如下:

1.开发重要资源

华北的重要资源有煤炭、棉花和盐等。

日本经济，重工业的发展程度及技术水平比轻工业低得多，而且原料缺乏。必须摆脱此种弱点，迅速确立以重工业为中心的产业体制。因此，迫切需要数量与质量兼优的华北煤炭(估计其埋藏量有二千亿吨以上，约为日本的十倍，并出产炼钢所必需的焦炭)。为此，对煤炭的开发和增加运输非常重视，认为是建立大东亚经济体制的根本。例如主要煤矿中的开滦煤矿，在大东亚战争爆发时即被日本方面接收，在军管下强行运营，对日本的供应发挥了重大作用。

其次是华北的棉花，由于从第三国输入棉花的途径已被完全断绝，它成了日本纺织业所必需的重要来源。另外，由南方各地购进必要物资需以棉纱布匹等交换，因此，对华北棉花的需要就越发增大了。在棉花生产部门方面，主要有华北棉产改进会、中央农事试验场担当指导和奖励工作，努力进行棉种改良、种子分配和打井工作等等。特别是在主要产棉区山东及京汉路沿线地区，则以当地驻军及有关机关为中心，设置了棉花增产实行委员会，积极指导棉花生产。由于采取了上述措施，预计本年度可增产五成。另外，在收购部门方面，由华北棉花协会实行统购制，积极促进收购工作。

盐和棉花的情况相同，由于红海沿岸和美国等远海盐的来源断绝，开战后必须改用近海盐，而中国的盐产，华北占其大半。因此，努力加强了盐田地带的治安和增产增运工作。

对其它如铁矿(蕴藏量估计有三亿吨，质量优良)钨、矾土、页岩、云母、萤石等重要矿产品，以及麻、烟叶等经济作物，也都采取了开发和增产的措施。

2.金融通货对策

历来，英美和重庆系统的银行，均靠旧法币进行活动，象在金融自由市场上那样捣乱，以妨害华北金融统制的体制。但在接收和掌握了这些银行之后，初步完成了以联银(中国联合准备银行)统治华北金融的体制。

其次，整顿和扩充金融机关，根据金融取缔规章，进行指导和扶持，以联银为中心，将其所管辖的中国、交通两银行以及中国方面的银号、钱庄等，予以整顿合并。此外，为了从金融方面推进华北自给自足体制的确立，努力动员民族资本，吸收游资，并根据日元与中国货币等价的原则维持联银券的币值。

此外，物价对策虽属重要问题，但过去由于各种情况。未能采用强有力的抑制政策。然而在开战后，物价却得以保持暂时的稳定，至1942年始出现上涨趋势，因而采取了紧急抑制政策。6月10日公布了“华北紧急物价对策纲要”。此外并采取了调整配给机构、促进物资的出售、加强限制消费等措施。以期确立日华两国人民生活安定的基础。

3.粮食对策

关于促进粮食自给自足体制的紧急措施，前面已经说过。增设二十万眼灌溉用井的工作，各地均取得意外的好成绩。在防治病虫害、改良品种及改进种植方法等方面，努力领导了重要肥料的特别分配、改善种子的消毒、普及药品消毒以及充实农业技术指导员等工作。因此，尽管当年气候不佳，平原地带的水稻生长尚属良好，全区的农作物预料可以获得平年的收成。

为了促进各地粮食上市，灵活地对价格进行操纵，积极开展合作社的活动，排除来自敌方的骚扰，确保支援物资的流入，设法获得敌区的粮食资源。此外，并尽一切努力从满洲、华中及华南、朝鲜等地运进粮食。

彻底实行配给制度和限制消费，虽有很大困难，但逐步取得了一定成效。

4.确保和增强运输力量

在陆路交通方面，华北交通株式会社(1939 年 4 月创办，1942 年 3 月时的资本总额约达四亿日元，日华籍从业人员已增加到十一万人左右)除综合经营铁路、汽车以及内河航运事业外，并作为附带事业通过警务和爱路工作以确保治安，对开发产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铁道营业总长度达 6,053 公里(其中事变后新铺设 869 公里)，汽车路线总长度约 1,300 公里，内河航运路线已达 3,848 公里，运输量显著提高。

海上交通的港口，则有秦皇岛、塘沽、青岛、连云港、天津等，运输能力大约为 800 万吨，为了顺利完成对日满的输出任务，现在采取紧急措施，以增强码头设备。

5.长期准备的措施

考虑到华北经济在东亚共荣圈的地位，为了加强日本的军事力量，除计划新设大炼钢厂和新设硫酸氨工厂以提供增产粮食必需的大量廉价肥料之外，并于 6 月 9 日召开了经济文化综合研究机关“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成立大会。该研究所为财团法人，以促进大东亚建设和增进民族福利为目的成立的，财团资金为 200 万日元(日华各出一半资金)，理事长为实业总署督办王荫泰，副理事长为北京开发调查局局长伊藤道雄，另有理事 IO 人，干事 1 人，原兴亚院华北联络部长官森冈泉中将(预备役)任研究所顾问。(该中将于 1942 年 10 月任华北贸易总联合会会长)

此外，方面军自己的兵站措施，也因采取了现地自给(武器、被服以及卫生器材的制造)，利用代用品、回收废品、节约消费、后方设施适应长期驻屯形势等措施，缩减了由日本国内的补充，逐渐收到了效果。

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

军、政、会、民一体化运动 华北治安强化运动自 1941 年 3 月展开第一次运动以来，已经进行过三次军、政、会、民一体的国民运动，取得了相当成果。此次为自 3 月 30 日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和华北政务委员会成立二周年纪念日开始，为期约两个半月的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

运动的目标为:“东亚解放”、“剿共自卫”.、“勤俭增产”。此次运动以过去三次治安强化运动所收获的综合成果为基准，由华北政务委员会领导，以新民会为实践运动的核心力量，方面军和兴亚院联络部予以合作，大力动员全体民众，特别要促进警备队的积极行动、民众的组织化和武装训练与保甲训练等。

另一方面，在此期间日军开始了春季四大肃正作战，即从 4 月 1 日开始向冀东进行的肃正作战和相继在冀南、冀中和晋冀豫边区进行的肃正作战。另外，自 3 月以来在各地连续不断地进行了肃正讨伐。这些作战与治安强化运动形成一体，极力扩大治安地区。中国治安军在日军的支援下也一直担当讨伐和治安工作，现已发展成为能够单独负担起某一地区的警备任务。

一般说来，由于大东亚战争初战取得辉煌胜利，提高了敬畏日本的心理，加强了官民对治安肃正的决心和信心。过去持怀疑态度的人，很多人也参加了运动。特别是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揖唐到各方面视察访问，并给予指导和鼓励，各道尹、县长都亲临第一线，带头活动起来。因此，民众也参加了与讨伐作战密切相关的治安工作，以及对共封锁壕的筑造工事和剿共自卫战斗等，在各地甚至出现了奋不顾身的行动，运动非常火炽。

治安强化运动如此继续到 6 月中旬。其综合成果虽不明显，但运动达到高潮的 5 月 8 日，华北方面军报道部长曾发表了一篇题为“跃进中的华北建设”的讲话。讲话中明确阐述了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的意义及成果。

中共方面的记录 这次运动对中共是一次巨大的压力，中共方面的记录，有如下叙述:

1942 年，在华日军为了响应在走投无路局面下“要建成大东亚战争兵站基地”的要求，把华北广大地区做为大东亚战争的后方基地，全面开展了所谓“治安强化运动”。这意味着对当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牢固团结战斗的华北抗日军民和解放区进行激烈的攻击。

当发起“治安强化运动”时，日军将整个华北划分为三类地区，分别采取了各不相同的对策。这三类地区是“治安区”“准治安区”和“非治安区”。

对“治安区”，日军以“清乡”政策为主，来清除中国共产党在该地区的根本和影响。即以发展和加强傀儡政权，实行并村，利用特务活动来监视、威胁人民，宣传“大东亚新秩序”、“日华亲善共存共荣”等来腐蚀中国人民的民族精神，从而加强其统治和掠夺。

对“准治安区”，则专门以所谓“蚕食政策”为主的方针。为了对抗抗日游击队的活动，一方面对居民以“通敌”罪名相威胁，另一方面则拉拢腐败的卖国分子做为亲信，两种方法同时并用。强迫居民“欢迎皇军”，“维持治安”，强制住在游击队活动地区的居民迁到“治安区”，制造无人区，而使八路军在该地区无法进行活动。并在该地区星罗棋布地修起隔断壕、地堡、岗楼，实行严密的封锁。

对“非治安区”，则以极野蛮的“扫荡”为主。在这里，为了使解放区人民经常处于粮食物资非常缺乏的状态，并使之产生悲惨、绝望的败战情绪，实行了惨无人道的“三光玫策”，即烧光、杀光、抢光的政策。

对上述三类地区，使“清乡”、“蚕食”、“扫荡”三种政策紧密结合起来，破坏解放区，歼灭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企图执行“确保华北”的最高命令。面对这种激烈的“治安强化运动”，中国的抗战军民不得不继续进行极为艰巨的战斗。(以上仅按日文译出，未按中文资料校正。一译注)

对伯工作(对阎锡山工作)

据判断，对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进行的怀柔招抚工作，在分裂瓦解重庆将领的工作中是有可能的，而且对其它方面的影响很大。陆军省部、兴亚院以及中国派遣军对之颇为重视，并曾抱有希望，领导了该项工作。

注 1: 关于工作内容，只有指定的首脑人物了解，在陆军省内部也只限于少数有关人员知道。关于对工作可能性的判断，各级司令部以及根据情况的变化有显著差异。从谋略工作的特点看来，这是不足为奇的。

注 2: 对伯工作的名称是这样来的，阎锡山的侄子阎宜亭在工作初期与日军进行联系时，称阎锡山为伯父，因此就以有“伯”字作为阎锡山的代称，而由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板垣中将命名为对伯工作。(据原第一军参谋长田中隆吉少将谈。)

注 3: 日本方面称阎锡山直接统率的军队为“山西军”，而阎则称为“晋绥军”。正式名称为国民革命军第二战区军。

此外，负责该工作的为华北方面军，实际执行该工作的第一军，特别是第一军司令官岩松义雄中将和参谋长花谷正少将，灵活运用他们丰富的对华谋略经验，以极大热情努力推动工作。然而工作的主要目标在于“通过阎锡山的加入南京政府，以促使抱机会主义态度的反蒋将领挺身而出，从而打开重庆政权崩溃的缺口，同时以此向中外进行宣传，以期有利于促进中国事变的处理。”(12 月 19 日第一军司令官在兵团长集会上的训示。)

1941 年 9 月 11 日双方缔结了基本协定和停战协定，10 月 27 日又缔结了停

战协定细则。日本方面为了加速事态的进展，建议召开首脑会议，并要求阎锡山发表独立宣言，以表明与蒋介石断绝关系。对此，阎锡山虽基本同意，但声称须在接到按协定第一阶段规定交付的军费、武器后，再发表宣言，而未允日方要求，以致拖延了时日。

当时山西军拥有十几万兵力，但苦于给养不足，士气消沉，缺乏战斗力，受到重庆中央军严厉的督战监视;另一方面不断受到中共方面的蚕食，对日军则采取避其锋芒，保持不即不离的态度。因此，当时在没有战斗力的情况下，一旦发表独立宣言，将立即遭到重庆军的打击，为全军招来危险。同时，阎锡山表面上的理由是，为了日华合作，首先必须充实自己的战斗力。但在日本方面，不能判明那是阎的真意，还是用以保身的谋略。此外，由于日方在协定上为了拉拢阎锡山含混其词地说了些大话，因而阎对于火速实行协定感到不安，而且是有困难的。

此外，第一军首脑和阎锡山方面的联络、谈判进行得非常密切，事实上双方的联络已成公开的秘密。此时阎踢山在太原的办事处(在此工作的有阎的妹夫梁延武及齐凤周、刘吉甫、曲宪南等)就设在茂川公馆(华北方面军第二课参谋茂川秀和中佐的事务所)的邻近地方与阎锡山总部所在地克滩坡(吉县西北的河畔)之间，除不断以无线电报联络外，并常有使者往来。为了使阎返回山西，特任命阎的旧部苏体仁为山西省省长，这对该工作具有深刻的关系。此外，第一军的有关兵团(第三十七、第四十一师团、独立混成第十六旅团)均与各该守备地区的山西军保持着联系。

大东亚战争刚一爆发，第一军司令官就主张举行双方首脑会谈。他指出:“形势迫切要求本项工作尽早成功，希望直接与山西军接触的各兵团，即使在各项治安建设工作中可能招致种种障碍，也应从大局出发努力准动本项工作。”同时他还亲自说服阎锡山，向阎拍发电报称:“双方首脑直接会谈，彼此以真诚的态度，坦率交换意见，以期超越协定中事务性的交涉而达到精神上的结合。确信这是促进本项工作的唯一途径。”但是，阎锡山仍然宣称，在履行基本协定第一阶段之前举行首脑会谈，从晋绥军内部情况以及全军所处的环境看来，有极大困难。未允日方电报的要求。

12 月底，第一军判断“阎锡山内心是脚踏两只船，企图从日蒋两方面尽量多得好处”，于是决定今后对阎采取强硬态度。1942 年 1 月，第一军在与阎谈判的同时，开始研究对其进行武力压迫的工作。1 月 24 日，向方面军上报了“陕西省进攻作战计划”方案。该方案的设想是向西安附近进军，击败重庆军后，完成对山西军的包围。但是，当时方面军正在研究压迫重庆军的“西安洛阳作战”方案，在实施此方案时即可考虑对阎行使武力，于是指示第一军暂时应以谈判为主进行工作。

然而，25 日，军司令官接见阎锡山代表梁上椿(梁延武之叔父)后，确信对阎锡山的上述判断无误，遂进一步研究了突然袭击阎锡山总部克滩坡计划、歼灭山西军作战及该军瓦解后治安维持计划等，并把这些计划与合作成功后的具体措施，一并设法传给阎锡山知道。

2 月，第一军为了在山西全省进行肃正讨伐，未对阎锡山全面展开工作。

注 1:2 月 26 日，杉山参谋总长在奏复天皇垂询时说，“对伯工作今后直到 4、5 月为止，将继续采取强硬态度，然后再看局势发展的情况，说不定要诉诸武力。”

注 2:为了促进对伯工作，方面军加紧筹建山西产业股份公司，以统一接管已解除军事管制的山西各主要企业公司。(山西产业股份公司于 3 月 31 日创立)

注 3: 3 月 1 日梁延武面见国民政府主席汪兆铭之后曾说。“重庆当局已详知协定内容，但不立即讨阎，而采取严密监视的方针。”

注 4: 当时，日本方面对阎锡山的性格曾做如下评论: “有自私自利打算，但优柔寡断”，或者是“慎重”，“小心谨慎”、“老奸巨滑不吃亏的家伙”，“难以揣度的人物”等等。

到 3 月份，第一军司令官为了推动对伯工作，决定同时使用武力，并做好各项准备。即由各有关兵团展开威压行动和进行炮击，以迫使阎锡山下决心，看对方的反应，逐渐增加压力。此次军事行动称之为“对晋作战”或“B 号作战”。第一军首脑认为这次行动有 60%的成功希望。

3 月 13 日，第一军司令官召见从北京回来的梁上椿和梁延武，提出最后方案并尽量说服他们。梁等对于传达这个方案感到为难，但终于 16 日出发去克滩坡。第一军配合梁的行动，于 19 日发动了第一次进攻。各兵团在各自的守卫地区对山西军进行了扫荡，并对河津以北黄河对岸的重庆军阵地进行炮击，以便切断它与山西军的联系。

此次示威行动，似乎给了山西军意外的刺激。于是第一军于 24 日召见驻太原的阎锡山联络员，面交正式书面通知: “以 4 月 4 日为限期，要求做出承诺与否的回答。”并口头传达了如超过限期，所签协定即行废除之意。25 日，第一军又发动了第二次攻击。此次为了减轻对山西军的直接刺激，主要炮击了黄河重要渡口附近的重庆军。当天，阎锡山的代表赵承绶等由克滩坡出发前来联系，于 27 日到达太原。

28 日，双方主要人员举行了会谈。会谈结果，第一军做出判断: “阎尚未下决心合作，因惧怕日军进行的佯攻，为缓兵计派赵前来，而赵并未带来具体的谈判条件。因此，第一军必须按既定日程实行。”但是，4 月 2 日遵照方面军司令官的指示，将废除已签订协定的日期延期到 4 月中旬。5 日第一军下达了 B 号作战延期的命令。

此外，3 月底，从独立混成第三、第四旅团各调出步兵一个大队，增派到汾阳前方，汾西支队(第三十六步兵团长佐久间盛一少将指挥的步兵三个大队为基干)，已向稷山地区集结完毕。(汾西支队是第一军直属专门对“伯”的部队，于 3 月 13 日下令编成。)

其后，第一军对赵承绶采取了怀柔政策，赵于 8 日返回克滩坡。9 日，阎锡山来电拒绝会见。

对此，第一军于 10 日发出废除已签订协定的预告，17 日发出“谈判结束，采取自由行动”的通告，同时加强了经济封锁和军事压力。20 日，对山西军进行了炮击。

在此以前，方面军参谋长安达二十三中将于 15 日与中央及中国派遣军共同调整部署之后，通知第一军“希望暂缓发出废除已签订协定的正式通告”。接着于 23 日又发出电报指示: “目前交涉事宜，由方面军司令官负责进行、对交涉进展切勿过于急躁，应等待今秋全面谋略取得进展的时机。”

然而，这时山西省长苏体仁从中进行斡旋，25 日给阎锡山拍出了“苏体仁关于会见的个人提案”的电报，27 日阎锡山复电大意表示同意苏的个人提案。于是，双方谈判又重新开始。28 日军司令官在北京研究了对策，结果决定以苏体仁省长个人提案为基础，与阎锡山举行会晤，并确定了促使阎锡山迅速发表独立宣言的方针。在 29 日的谈判中决定了以下事项: (一) 5 月 5 日在安平村(乡宁以西，山西军控制的地区)会见; (二) 撤销双方一切通告; (三) 解除对山西军的军事威胁和经济封锁; (四) 山西军恢复停战协定时的状态等等。

5 月 4 日，岩松军司令官、安达方面军参谋长、花谷参谋长一行来到了岭上(河津以北 30 公里，日军的最前线)。

5 日，因雨会见延期。6 日期待已久的岩松和阎锡山的会见在安平村窑洞里举行了。最初，会谈是在和睦的气氛中进行的，就合作的基本概念，毫无问题地取得了一致意见，但以基本协定为基础的谅解事项，却未达成预期的妥协，17 时 50 分会谈终于破裂。

注:关于会见的结果，在“烟元帅日志”中写道:“会谈十之八九不会顺利，此乃意料中事。”在“第一军参谋友近大佐业务日志”中同样记载:“会谈破裂，正如我方之所预料”。

5 月 12 日，方面军参谋长和第一军参谋长在南京报告了会谈的情况，并同时研究了今后的对伯工作。于是做出判断:“此次会见，可以肯定阎锡山不会回到蒋介石方面，他对日苏关系的进展极为关心，暂时将继续采取观望的态度。”为此，向中央汇报了今后的指导方案，主张施加更大压力，促使他做出决断。经中央批准的方案如下:

第一、方针

对伯工作今后的指导方针，应坚持我方严肃态度和适应机宜的各种策略，从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给以更大的压力，从而使“伯”迫于现实，痛感焦虑，终于不得不放弃年来的梦想，而在适当的条件下屈服，与我进行合作。

第二、要领

一、适时通告废除基本协定。

二、日军在表面上要坚持不以“伯”为对手的态度。

三、加强对山西军的经济封锁，并迫使驻汾南的第三四军等撤退到汾北山区等，以加强对‘伯”的压迫。根据情况，解除该部队的武装，以及分化瓦解山西军的部分队伍。

四、如“伯”提出请求，应相机行事，经批准后可以重新签订切实可行的合作协定。

5 月 17 日，方面军司令官通告阎锡山:废除基本协定，采取自由行动。

在会谈破裂之后，第一军立即对山西军施行了严格的经济封锁和严厉的军事压力。另一方面，对各个部队进行了分化瓦解及怀柔工作。同时将安平村会见的情况印成传单，在陕西方面散发，以离间阎蒋的关系。

到 6 月份，军司令官制定了歼灭山西军中枢的作战计划，于 7 日上报方面军。方面军的意见，对山西军应采取温和态度加以怀柔，以便在预定今秋进行的西安作战时，使之孤立。因此引起了很大的争论。结果该计划只限于研究的范围。

注 1: 关于“方面军计划的秋季西安作战”请参阅后述的“五号作战准备”项目。

注 2: 据说军司令官对阎锡山进行怀柔工作不抱希望，可能考虑改以苏体仁为主进行山西建设工作。

为了分化瓦解山西军，第六十九师团对局部地区的攻击也以 7 月 15 日为期暂行停止。在此项分化瓦解工作中，获得很多俘虏和投降部队，军以之改编成山西剿共军两个师，努力予以教育训练，目的是要使之从事瓦解山西军和驻地内的剿共工作。1942 年以来，经方面军批准，剿共军归山西省长指挥。

此后，曾有阎锡山方面的重新合作的活动，以及第一军准备再次歼灭山西军的计划等等，但在两者之间逐渐出现妥协气氛，决定通过部分合作的积累，逐渐达到全面合作，改变了工作方法。首先，采取经济合作的具体措施，自 1943 年春季双方开始了物资交易。1944 年 1 月，作为剿共和征粮的措施，由山西军四个师移驻浮山、安泽地区。同年秋季，阎锡山派其亲信、得力干将朱绶光常驻太原。由此可见阎锡山有意准备返回山西。尔后双方均无积极的企图，但继

续保持了紧密的联系。至于停战前夕的工作，容后叙述。

参考:

曾任第一军参谋的笹井宽一大佐关于对伯工作回忆如下:

日本方面由于采取了短兵相见的作法，对伯工作虽终归失败，但让无害的山西军存在，其本身就已具有重大意义。而且从阎锡山的立场看来，可以说达到了善保其身的目的。假如他归顺了日军，必将受到背后的重庆第八战区军的攻击，很明显，中共方面的蚕食工作也将加剧。阎锡山是一面观察国际形势的演变和日本的实力，一面忧虑着逐渐被赤化的山西，慎重而耐心地等待着时机的到来。

又，据曾任第一军参谋的土田穰大佐的回忆如下:

日军打击了共军，然后让山西军进驻共军力量已被削弱的地区，使之担当剿共建设的任务，果能如此则甚为理想。但是，山西军非常软弱，缺乏战斗力，即使同少数共军作战也只有失败。因此，把山西交给山西军，不能指望能起到防共壁垒的作用。

五、华北全区的长期肃正作战

在这一年度前半期，以冀中、冀南、冀东、晋冀豫边区的四大肃正作战为中心，在华北整个地区，连续不断地展开了剿共战。在详述各主要剿共战之前，先从 4 月间敌我一般的动向开始叙述。

四月中的敌我情势

方面军的作战设想 华北方面军在 2 月的参谋长会议上传达了“1942 年度肃正作战计划”，同时提出了“关于肃正作战计划实施纲要”。其设想的要点是:由方面军直接指挥消灭本年度肃正重点地区河北省北部的中共平原根据地，一举将该地区建设成为治安区。各军应予以配合，或在各自负责地区内彻底进行肃正工作。

为此，在冀东地区，由第二十七师团从 4 月初开始进行“冀东一号作战”，在冀南地区由第十二军和第一一 0 师团从 4 月末开始进行“十二号作战”，在冀西地区，由一一 0 师团和独立混成第十五旅团从 4 月下旬开始分别进行肃正作战。上述各地区作战的用意是要使敌人误认为例行的春季讨伐，并且兼起佯攻牵制的作用，以配合 5 月开始的冀中作战(三号作战)和第一军执行的晋冀豫边区肃正作战(C 号作战)。

对作为重点的冀中地区的作战，其新的战斗序列由方面军直属的第四十一师团和独立混成第九旅团的主力以及原有的第二十七师团和一一 0 师团的部分兵力参加。计划要在青纱帐起之前取得肃正作战的成果。从 5 月初开始进行突然袭击的包围作战，然后，长期坐镇，一面进行扫荡作战，一面实行治安建设。

关于选定冀中地区为主要作战目标的由来，当时的方面军情报主任参谋横山幸雄少佐(后任中佐)曾叙述如下:

在研究制定年度计划时，对于前一年的主要作战目标应定为共军，还是重庆军，曾有争论，但本年度在选定主要作战目标上，方面军内部并无任何争议。至于是在讨论以哪一地区的中共势力为主要对象的问题上，曾进行过多方研究，结果选定了冀中地区。冀中地区是河北省中部的粮仓地带，在战略上、经济上居于重要地位，中共势力已经在此根深蒂

固。由于该地区已成为对缺乏农产品的太行山区中共根据地供应、培养战斗力的基地，因此，可以认为只要扼杀该基地，就会收到很大成效。

此外，在此期间各肃正作战的特点为，以覆灭敌根据地、加强对敌封锁为主要作战目的，设法使治安区空前扩大。

这样，在 4 月份，一面进行准备 5 月的冀中作战，一面在冀东、山东、冀南、旧黄河畔地区开始了大规模的肃正作战。同时，并有日华军官民一体开展的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在整个华北地区，实行了连续不断的肃正讨伐作战。

4 月份双方交战次数达 1,354 次，敌方参战兵力有 225,437 人，敌人遗弃尸体 14,363 具，俘虏 16,492 人，归顺或投降的有 29,288 人，另外缴获大量武器资材，战果很大。

当前敌人的动向 根据“方面军战时月报资料”，4 月份我军面临的敌人其主要动向，如下所述:

重庆的注意力完全被“缅甸”方面的战况所吸引，因而在中国大陆上的抗日军事活动不免呈现消极。重庆的正规军因改编迟延，放弃了 3 月份的局部攻势，而代之以发动全面的游击战和加强特务战。在 3 月底和 4 月上旬，蒋介石曾两次下令，以破坏我方建设，牵制我军兵力，诱导被占领区民众的抗日热情为目的，由各地编制混成队伍，进行大规模的破坏性袭击，使游击队与之进行策应。因此，自 20 日以后，在蒙疆方面发生了爆破铁路、投掷炸药和放火等七次事件，到月底，在各地发生了数次敌特务战嫌疑的起火事件。但敌人此次活动无甚大进展而告结束。

共军依然以政治攻势和保卫春耕为重点，共内部似在本着精兵简政的精神致力于加强整顿工作。同时，对于我方不断的扫荡，煞费苦心地研究对策，在军事上不见有主动的活动，但在平西、冀西、冀中、冀鲁各军区部署了对冀东的策应，或估计到对冀西的扫荡，而部署了晋西北、太行、冀中的策应。4 月 27 日夜对冀中军区的高阳、博野、安国一带发动了全面袭击。这些都是根据第十八集团军的统一命令进行的，其战略倾向值得注意。

各方面共军的动向如下:

一、晋察冀边区

将原来的平西军区改称为第十一分区，平北分区改称为第十二分区，冀东分区改称为第十三分区，均改编直属于聂荣臻的冀西军区，并将冀察热挺进军司令萧克调到聂荣臻部下任副司令。

冀东共军，因受原田兵团(第二十七师团)攻击丧失了根据地，率其主力部队逃入满洲国境内。

冀西、冀中军区一方面因受我方进攻，不断苦思对策，一方面加强了政治攻势，积极破坏我治安强化运动。

二、晋冀鲁豫边区

4 月 15 日，大岳地区共军以全部主力，对驻在浮山附近的山西军(阎锡山军)发动了攻击，由于我方当地部队的援救，被迫放弃了攻击企图，撤退到沁河河畔，却又企图向中条山脉方面发展，逐渐展开强有力的进攻。

太行军区刘伯承料到我方将对该区进行扫荡，正在积极准备各种反扫荡。

4 月底，冀南军区由于仁集团(第十二军)的第十二号作战，在武城附近和威县以南地区受到了急袭包围，军区和新编第七师、第四旅的主力部队遭到歼灭性打击，损失很多得力干部，正如军区的自我批评所说，由于准备上的缺点为敌所乘，遭到了致命的打击。

三、山东方面

山东共军与于学忠的斗争，迄无宁日，而且内部统一也有困难，如主观主义、党派主义和党八股等均难以克服。

国共关系，表面上虽然看不出有何变化，但重庆对延安所怀戒心却日益加深。重庆军事委员会下令要警惕中共本年度的中心工作一企图潜入重庆军政各机关、学校、农村、军队、警察、工厂等，从内部进行破坏。蒋介石也命令要警惕中共使很多有故旧关系的人员潜入重庆军内部企图扩大其党组织。

两军在地方上的冲突，除山东仍频繁发生外，新四军似有重新侵入豫东的迹象，以及中条山区残存的重庆系统行政组织和游击队正在逐渐为太岳共军所蚕食。除此以外，无大变化。

关于苏联利用西北“公路”将援蒋物资运进中国的状况，4月份未获确实情报。

重庆失掉西南“公路”后，指望向西北寻求“汽油”的补给，特派翁文灏到兰州将甘肃省经营的油田置于重庆直接管辖之下，并使之调查尚未开发的油田。此外，为了经由西北运进苏联和近东的外国石油，而努力设法增强运输能力。

抽调部分兵力进行浙赣作战 此时太平洋方面的主要作战大体上告一段落。4月18日，突然发生了美军飞机从航空母舰起飞空袭东京及其它地方后回到华中方面的事件。据大本营判断，“敌军利用中国大陆空袭日本，今后将日益增多”，于是立即准备对策。4月30日命令中国派遣军毁灭浙江省方面的敌各主要航空基地(丽水、衢州、玉山等)(浙江作战即せ号作战，后改称浙赣作战)。

浙赣作战的设想是由第十三军从杭州方面发动攻击，同时第十一军从南昌方面予以策应。

华北方面军于26日前后接到中国派遣军的秘令:派出最大限度的兵力，即以步兵约14个大队为基干的部队，预计以三个月为期参加此次作战。当时方面军正在举行各兵团长会议，乃于27日夜，紧急召集各军作战主任参谋进行讨论，决定在不影响冀中作战的情况下，主要由各军分担任务。5月中旬抽出下述各部队(小部队、后方有关部队省略不记)，调往华中方面。

一、第二十二师团主力部队(师团长井出铁藏中将)

二、小薗江混成旅团(旅团长为第二十六步兵团长小薗江邦雄少将。从第二十六师团和第三十七师团抽调步兵五个大队为基干)。

三、步兵一四0联队(联队长青木政尚大佐，该联队因改编，已脱离第一一0师团，正准备调往满洲)。

四、其它，坦克第十二联队主力、山炮兵第三十六联队的部分兵力等。

此外，6月下旬，方面军由于接到增兵的命令，在冀中作战告一段落后，又增派了奈良支队(第四十师团步兵第二百三十七联队长奈良正彦大佐指挥的步兵两个大队为基干)。

5月15日，浙江作战开始了。作战进行得很顺利，作战规模也随之扩大，向打通浙赣线发展。参加兵力比原订计划增加了，占领期限也延长了。方面军派出的各部队由8月19日开始调回，返还原地时已是9月下旬。

下面以冀中作战为主题叙述华北方面军的主要肃正作战情况

。

第二次冀南作战(十二号作战)

(4月29日—5月15日)

一般敌情 在山东、河北、河南三省交界附近，有冀南及冀鲁豫两军区的共军盘据，建立了巩固的根据地，并且逐渐扩大势力范围。特别是它的地下工作有显著的进展，不容忽视。另一方面，蒋系高树勋军(第三十九集团军)，自今

春以来重庆色彩更加浓厚，对我方的治安工作虽有不少妨害，但自孙良诚归顺以后，其势力有所削弱，与共军继续冲突，勉强保持着地盘。

第十二军的作战准备 方面军在新年度计划中归纳其作战设想为:击溃冀南地区的国共两军，封锁其暗中活动，以便将来向治安地区推进;为了隐蔽冀中作战的企图，迷惑并牵制敌人，应在冀中作战之前进行，策应第一军的晋冀豫边区作战，摧毁敌资源根据地。根据方面军的计划，第十二军开始进行准备工作。截至 4 月 28 日傍晚，部署各参加作战部队集结到下述地点，定于 29 日拂晓即天长节(日本天皇诞辰—译注)，向敌盘据的中心地区发动全面的攻击。

林支队(独立混成第七旅团长林芳太郎少将所指挥的步兵五个大队为基干)部署在武城以北龙华附近，吉田支队(独立混成第八旅团长吉田峰太郎少将所指挥的步兵二个大队为基干)部署在武城以西垂杨村附近，铃木支队(独立混成第一旅团长铃木贞次少将所指挥的步兵三个大队为基干)部署在曲周附近，重田兵团(第三十五师团长重田德松中将所指挥的北川支队及佐久间支队为基干)部署在濮阳附近。

上述兵力部署，是第十二军在 28 日接到秘令调第三十二师团去华中时紧急变更的。即原来部署由第三十二师团长(井山铁藏中将)指挥师团主力和北川、佐久间支队，改由第三十五师团长指挥该两支队。并决定由第三十二师团的惠藤讨伐队(队长步兵第二百十二联队长惠藤第四郎大佐)和当地警备队予以协助。因此，盘据在东平湖西侧的共军就脱离开攻击目标了。

第十二军特别注意彻底隐蔽其企图，极力以假计划、假命令、散布流言等，欺骗敌人，真实命令一概限用口头传达。同时对各级指挥官、参谋实行集中教育，对以分散退避为主的敌人，研究搜索捕捉的办法等，为此进行了周密的准备工作。

作战经过概要 各部队在尽量离开敌人远的地方进行准备工作，于日落后轻装迅速移动，29 日拂晓，对敌各根据地同时发动了突然袭击。

林、吉田、铃木各支队巧妙地搜索所在地的敌军主力，并给以毁灭性的打击。尔后于 5 月 3 日到 6 日(林支队于 15 日)对敌根据地一带地方，进行了严密的扫荡讨伐。三个支队的战果，总计:共军遗尸 2,200 具，俘虏 780 人。

高树勋军已向东南方逃走，因此，进入到濮县附近的重田兵团立即追击，并在各处予以击溃。特别是佐久间支队，发挥了机动优势，远远追击竟至越过陇海线，击溃了高树勋军的主力。在此期间，北川支队又返回濮县西南地区，在该地区一直讨伐肃正到 15 日。重田兵团取得的成果:高树勋军遗尸 4,127 具，俘虏 2,350 人。

日军的伤亡，在整个作战期间共计死 46 人，伤 152 人。

此次作战的特点是，使共军受到很大的损失，使驻扎在冀南的蒋系军根据地受到毁灭性打击。作战成功的原因为:(一)彻底隐蔽了作战企图;(二)事先研究了有关作战事项;(三)统一控制包围部队的前进(防止敌人乘隙逃跑);(四)以轻快的移动构成包围圈;(五)临时编成骑兵中队和汽车中队，并有效地运用这些部队;(六)利用黄尘进行突然急袭。

在此次作战期间及其以后，积极进行了敌性地区的治安工作(主要是扩充中国方面的行政组织，组织警备队和保甲制度，构筑隔断壕)。但是，在 6 月前后，中共方面的地下工作有开始活跃的迹象。这主要是由于第三十二师团调往南方，减轻了作战成果的压力所致。

重庆方面的记录 在这次作战中，高树勋很快识破日军的企图，让日军进入

濮阳扑了空，随即采取了从四面围歼的方针。战斗极为激烈，予敌军以沉重打击。但因我方损失也过大，因此一面迎战，一面将部队转移河南和安徽地区。高树勋总部(司令部)于6月29日到达涡阳(徐州西南160公里)，掌握了后续各部队之后，开始进行整训。在此两月期间，交战五十余次，敌方死四千人，我方除团长四人战死外，伤九千余人。

中共方面的记录 敌人的“四·二九大扫荡”使冀南平原的军民受到了从未曾有的严峻考验。从此“铁壁合围”、“治安强化运动”及“特务自首政策”的凶恶气焰日益高涨。然而冀南地区的党和军队的领导机关，针对此形势缺乏严密的警戒心，在政策指导上也犯了错误。误解了“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结果未进行充分的迎击，或者甚至放弃了武装斗争。此外，不仅对敌占区内的群众工作做得很不够，甚至也忽视了加强根据地的工作。因而当受到敌人攻击时，正规军被动地向根据地收缩，终于脱离了广大游击区的群众游击战，而根据地内部也很快陷入了退缩和混乱状态。

“四。二九大扫荡”之后，根据地面积缩小到五分之三，平原抗战力量遭到很大损失。党组织近半数遭到破坏，党员人数由四万人减少到二万一千人。不少县、区的抗日政府，根本解体了。陷于敌人强力控制下的村政权已变成“两面政权”，资助了敌人。正规军减少了一半，剩下一万余人，游击队十之八九已经溃散。武器损失甚重，步枪损失约 5,000 支。党政军民、区级连级以上的干部损失达4,000—5,000人。其中包括第四分区司令、政治主任、政治委员，第四旅政治部主任，第七旅政治部主任，第五分区司令、副司令、政治部主任、青年纵队团长，第七百七十一团政治委员，第三分区政治委员，第六分区司令、副司令等多数高级干部，以及其他地方得力干部多人在内。

由于敌人在冀南平原彻底实行封锁隔离计划，完全改变了根据地的性质。敌人的气焰嚣张，而群众抗日活动已陷于一筹莫展的境地，人心混乱，苦闷，根据地已面临严重危机。

但是，冀南区党委的五月会议，是扭转冀南形势的关键，同时开始了根据地的重建工作。五月会议检讨了过去工作的教训，批判了右倾退缩思想，决议根据新的斗争方针，坚决进行积极的战斗，以打开局面，同时做好准备，无论在任何困难条件下，也要坚持冀南平原游击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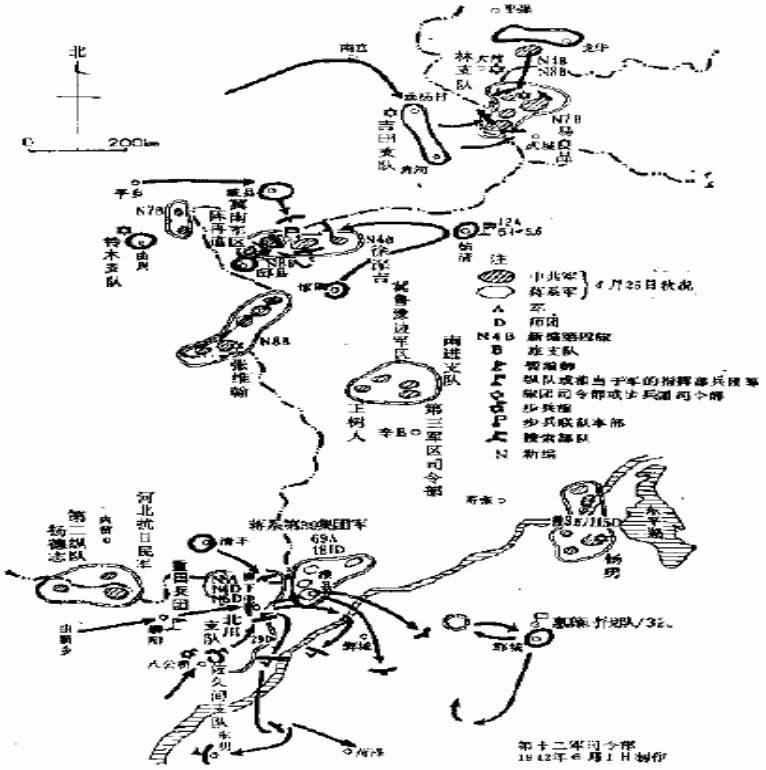


图2.第二次冀南作战（前期）经过要图

1942年4月29日－5月2日

冀南区党委和军区，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的“关于反对敌人蚕食政策的指示”(5月4日)和“关于冀南工作的指示”(6月22日)，坚决而全面地开展了对敌斗争。(以上仅按日文译出未与中文资料核对。—译注)

冀中作战(三号作战)

(5月1日—6月20日)

作战地的一般情况 所谓冀中，即在地理概念上将河北区划为冀东、冀西、冀北(平北)、冀南及所围绕的中央部分等五个地区，该中央平原地区就叫做冀中(而中共方面在军事，行政区划上是把京汉、津浦、石德、北宁几条铁路线所包围的地界叫做冀中区)。

此次作战地区是在冀中南部地区。根据方面军第二课调查整理(3月下旬)的资料，该地的状况如下:

第一，从军事要地地理上看到的作战地状况

一、作战地区包括安国、饶阳、安平、深县、深泽、献县、武强、武邑、肃宁、博野、衡水、束鹿、晋县、无极等县，总面积约9,000平方公里，人口约280万人，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约300人(这在华北人口密度上也是较高的，必须考虑估计其可能动员的地方武装兵力)，地势一般平坦，为村落散布的大平原。

二、道路多为凹形道，非治安区的车行道路遭到破坏，敌人筑有交通壕联络着各村落，对敌我双方都有很大的利用价值。

三、主要河流有子牙河、滏阳河、滹沱河、潴龙河等。这些河都是流向东北，只限指定地点准许渡河，但在5－6月间，水量缺乏时，即不成障碍。非治安区内设有敌人的秘密

渡口。

四、农作物有高粱、小麦、玉蜀委，小来、棉花等，高粱的耕种面积占四分之三，尤以无极附近为最多。5月下旬，这种高杆作物还不到0.7米高，对射击虽然有些妨碍，但部队的了望和通行并无不便。

冀中地区是向晋察冀边区共军提供给养的地带，可以判断，大量的各种农产品要运送到冀西边区根据地去。

第二，敌情

一、冀中军区，不仅是晋察冀全部边区，特别是北部太行山区根据地的物资供应地，并且担负着从北京、天津、青岛、济南运进各种物资的重要任务。本地区共有兵力14,000余人，其编制详见附表。该地区的正规军和游击队分别由各分区司令统一指挥。

二、正规军一般以团为单位进行活动，各个营通常部署在所属分区内行动，但有时也向分区以外移动。每团拥有兵力1,000～1,500人，按三三制编成，拥有步枪700—1,000支，轻机枪10—20挺，重机枪4—6挺，迫击炮2—4门，每人携带子弹30-50发。

一般战斗员的抗日意识似乎很高，但其思想基础薄弱，只坚信党的宣传，似有恐日倾向(中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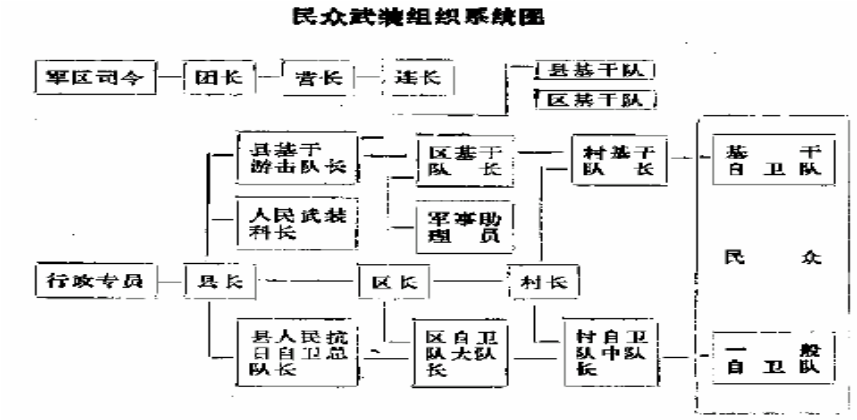
民众武装力量，大致分为两种:(一)半脱产的民兵，(二)不脱产，专门负责保卫家乡的自卫队。前者以青年抗敌先锋队、基干游击队形式编成区队，积极配合正规军参加游击战或除奸工作，或作为推动地方行政的力量。其战斗力虽比正规军低，但因与群众保有直接联系，在动员群众工作上起很大作用。后者纯属群众自卫组织，原则上青壮年男女均为自卫队员，并分为青抗先、基干队及一般自卫队，这些自卫队在县、镇、村分别设有支队、大队或中队等各级指挥部，按行政区划建立指挥系统。有关军事行动则由正规军团长指挥或直接隶属于军分区司令。此种武装比游击队更为软弱，仅十分之一的人员有步枪或手枪。但是，他们担负着情报活动、救护伤病员、运送物资、补充正规军、空室清野等极为重要的任务。他们的武装和党组织渗透到一般群众之中，应当看到匪区的全体民众都是怀有敌意的，因此单凭宣抚工作来分离匪与民是很困难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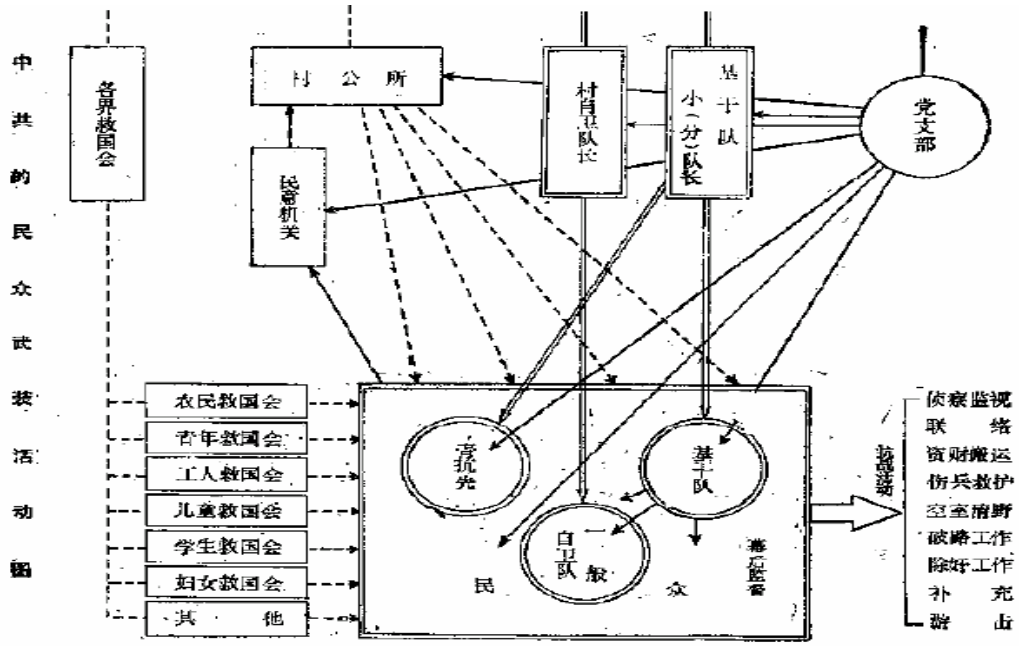
附表

冀中军区编制表

——第一六团在前分区司令赵承金指挥下向冀鲁军区方面南下中

参考:企图把冀中军区部队改变为野战军、地方军，野战军(改称第三纵队)是将特定的团编成野战团，然后再将二至三个野战团编成一个野战旅。地方军则是以团为基干队，至于其它部队改编为地区队，详细情况不明。





民众和自卫队的人数，因地区不同很难一概而论。根据对冀中的几个村的调查，居民中有十分之一参加了自卫队，另外还有十分之一参加了积极的敌性活动的基干队。关于其组织和活动状况，参着附图。

三、本军区不仅能做到粮食自给自足，而且能为太行地区根据地提供大量的各种物资、武器和被服的原料以及精密武器等军需品，并担负为基干部队补充人员的工作。同时又仰仗来自太行区根据地补充整训完了的兵员和制成的武器、被服。运输物资经常必须有相当数量的护送部队。军区后方供给处设在定县西北约 25 公里的情形。

四、冀中共军根据中央的一般方针，尽量避免与我方发生正面冲突，以图扩大势力、加强组织。对外则以宣传为重点的政治攻势与我方相对抗;对内则加强支援春耕的工作，以便把握民心和增产其所需要的粮食。

根据最近(3 月中旬)的动向，有相当数量的兵力正向石德路以北滹沱河以西一带地方集结，现已确实查明该地有军区司令部和第七军分区司令部，大致可判明的还有第八、第九军分区司令部，此外还可能有第十军分区司令部。估计共有第七军分区主力部队和第六、第八，第九、第十军分区部分兵力的基干部队七千人，民兵约一万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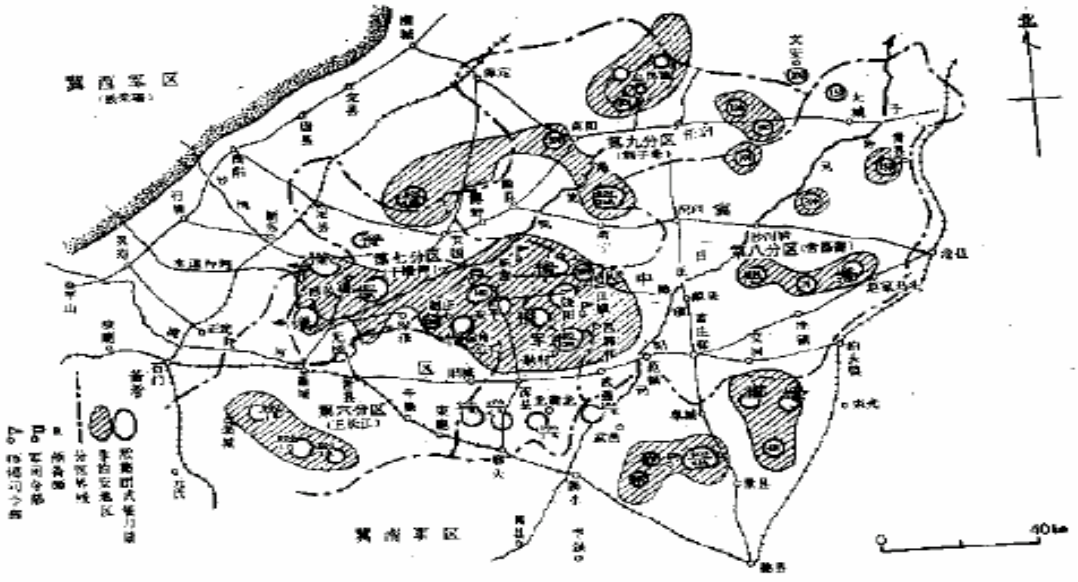


图3.冀中地区敌情要图 （1942年3月中旬）

敌担心我方发动讨伐.时刻保持警戒状态。如下达的关于春季反扫荡具体事项的决议所指示，部队和司令部要经常在小范围内进行移动。目前，有迹象表明第八军分区部队和回民支队向白洋淀东南转移，第九军分区部队又返回保定以南地区。

五、政治机构及其工作内容，逐渐脱出了军政的范围，而独立自成系统，同时要由军事的威压转变为以各种政治的措施为主。因此，为了消除本地区的敌对势力，不仅要依靠武力，而且必须投入强大的政治力量。行政区划大致要与军分区一致，特别是伪县政府作为地方行政的中心，统一管辖伪区长、伪村长。因此，必须注意，除消灭军事势力的设施外，同时还要消灭伪县政府。

六、冀中地区敌性势力的主要特征

(一)为了避开我方的武力和政治力量，以少数基干部队为支柱，有党组织渗透行政组织的小规模红色政权分布在广泛的地区内。

(二)为了弥补基干队数量上的不足，在保持生产力的同时，加强群众的武装力量和广泛动员群众。

(三)为了弥补分散存在的小规模红色地区的脆弱性，并且便于物资交流、人员移动和取得联络，各红色地区相互间进行点线工作(设立据点和交通线)。

上述(一)项的特点是，尽管我方武装扫荡目标指向敌方基干部队，但在广泛地区分散存在的小股兵力是很难捕捉的。而且要摧毁这些基干队无需动用大兵力，必须隐蔽作战意图，予以突然急袭。

上述(二)的特点是，我方剿灭的对象虽为此等武装，但由于他们之中大部分与生产完全结合在一起，致使匪民难分，而且由于其依靠动员民众成立的联防组织，使我方难以进行远距离的包围奇袭。

上述(三)的特点是，在邻接的非治安区中间，隔有治安地带，其中村民或中国方面的团体在表面上做出协助我方的态度，暗地里却进行资敌工作，致使我方人员、物资的移动以及切断敌人的联络都很困难。

从上述情况来看，该地区显然是中共方面党政军民结成一体进行组织活动的巩固的根据地。

注：中共方面所用“点线工作”一语，是指对大城市、铁路等进行谍报、谋略、扰乱经济等秘密工作而言。当时在北方局北方分局点线工作委员会下设有城市委员会(北京、唐山，

天津)和路线委员会(塘沽、山海关)，在济南，青岛还设有点线委员会特派员。

作战准备 方面军各主任参谋于三、四月间对作战企图严格保密，同时进行了现地侦察及研究、准备工作。此次作战由于特别重视了以武力为背景的政治攻势，参谋副长有末精三少将于 4 月中旬让有关政务军官在保定附近进行了现地研究。

关于情报搜集工作，自 3 月以来，对以冀中军区司令部为中心的电报密码破译成功，虽然是断断续续的，但已能掌握了该司令部的动静。除特种情报班外，并设置了谍报班(窃听班及方向探测斑)，对通讯状况进行了调查。据此侦悉各军司令部变动无常，在同一地点，从不连住三天。敌部队是否确实在作战地区以内，乃是方面军所最为关心的情况，但其动静并不明确。4 月 26 日，因中共方面开始实行电波管制并且变更了密码，此后就以谍报人员的报告为主，而对特种情报已不能寄以过多的期望了。

4 月中旬，方面军制定了包括详细项目在内的作战实施计划。其概要如下:

一、方针

对以吕正操为司令的冀中地区的共军主力，进行突然袭击的包围作战，摧毁其根据地，同时在政治、经济思想上采取各种措施，以便将该地区一举变为治安地区。

二、参加作战部队与配合作战部队

直接参加作战的部队:

第四十一师团(师团长清水规矩中将)的主力(步兵六个大队为基干)、独立混成第九旅团(旅团长池上贤吉少将)的步兵约二个大队，第一一 0 师团白泷部队(第一一 0 步兵团长白泷理四郎少将直接指挥的步兵四个大队为基干)，配属第二十六师团的坂本支队(独立步兵第十二联队长坂本吉太郎大佐指挥的步兵二个大队为基干)，骑兵第十三联队(联队长山崎武四大住)，独立混成第七旅团小川部队(部队长独立步兵第二十九大队长小川雪松大佐)，共计步兵十八个大队为基干。

配合作战部队:

第一一 0 师团(师团长饭沼守中将)，第二十七师团(师团长原田熊吉中将)，第二十九独立飞行队，河北省特务机关(设在保定，机关长铃木繁二少将)，石门特务机关(机关长石田丰藏大佐)。

注:第四十一师团的编制由师团司令部和步兵团司令部、步兵第二百三十七到二百三十九联队、山炮兵、工兵、辎重兵等各兵种的第四十一联队，以及师团的通信队、武器勤务队、卫生队、第一、第二野战医院、病马厂所组成。编制定员规定为 13,836 人，实际人数包括编制内的兵员人数和军队的文职人员总共达 17,055 人。

独立混成第九旅团的编制由旅团司令部、独立步兵第三十六到第四十大队以及旅团的通信队、炮兵队、工作队所组成，编制定员为 4,963 人。

三、作战指导要点

作战第一期(自 5 月 1 日开始约 10 天)

白泷部队在滹沱河北岸地区，小川部队在河间、肃宁地区，独立混成第九旅团在石德路南侧地区进行扫荡战，要估计到大规模作战会有困难，同时要将敌人压缩到滹沱河、滏阳河与石德路所构成的三角地带，阻止敌人从该地带逃出。在此期间，第四十一师团利用铁路运输从山西向邯郸。顺德(今邢台一译注)地区进行佯动，然后在石德路沿线地区展开。

作战第二期(自 5 月 11 日开始约 5 天)

第四十一师团(配属独立混成第九旅团)从石德路沿线向北挺进，白泷部队从滹沱河北岸地区向南进发，小川部队则从河间、肃宁向饶阳推进，分别发起突然袭击，将敌人包围

在三角地带予以歼灭。

作战第三期(自 5 月 16 日前后开始约 25 天)

前一阶段(约 10 天)划出作战地区，反复进行扫荡，以消灭敌人及其根据地设施。

后一阶段(约 15 天)继续剿灭敌人残余势力，同时大力推进各项建设工作。第四十一师团则转入新作战地区的警备姿态，进而正式开展治安肃正工作。

在此以前，各参战兵团早已开始了作战准备，兹就其主要工作加以叙述。

冀中地区，历来属于第一一 0 师团的负责地区(冀中东半部则属于第二十七师团)，进行了如下的治安肃正工作，但为此次作战，变更了配备，并实行了特别训练。

(一)增强警备设施 加强各部队分驻地据点的设施，特别加强了碉堡工事。为了使少数留守部队能很好地完成任务，通过筑城工事以弥补其兵力不足的弱点。为了掩护铁路和主要交通道路，将其两侧的隔断壕(治安壕、惠民壕)加以延长。到 2 月末，此种隔断壕总长大约已达 3,900 公里，碉堡工事约达 1,300 座。

(二)加强经济封锁 沿京汉路以西山岳地带山脚下修筑了绵延数百公里的封锁线(由石墙和碉堡构成，石墙高 2 米，底厚约 1 米)，用来隔断连接冀西与冀东的补给路线(构筑封锁线的工作量，以井陉地区中队所承担的正面封锁线约 90 公里为例，施工实用 70 日，共需 10 万人)。

一方面，在封锁线以内，彻底推行了治安肃正工作，特别是自 1940 年以来，在石门地区实行了模范地区工作，取得了治安模范地区的好成绩。

(三)揭发检举工作 为了杜绝中共方面顽强的地下工作，大力开展了侦缉破获敌对分子的工作。特别是进入 1942 年以后，根据宪兵队的计划和指导，对俘虏中的优秀分子进行特殊的教育，使之积极地从事特务活动，取得了显著成效。在 1 至 4 月期间，被检举揭发出来的敌对分子约达 6,500 人。

(四)治安地区内的警备 日军出动后，为了交接警备任务，尽力加强中国方面的警备队和自卫团的教育培养工作，特别加强了各村自卫团联合行动的训练。

(五)不断的讨伐 各部队在各自的警备地区连续不断地进行了讨伐。从 1 月到 4 月，师团范围内的交战次数达 2,025 次。敌遗尸 10,191 具，俘虏 6,462 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以及各种军需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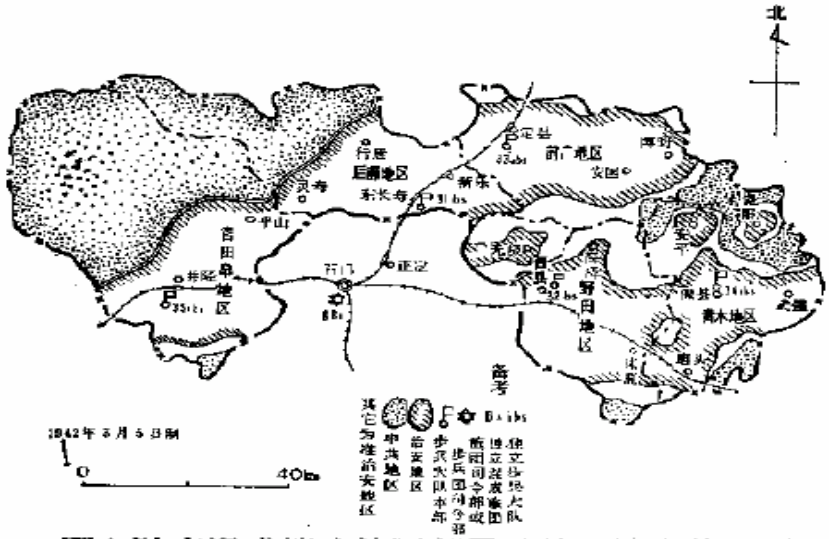


图 4.独立混成第八旅团部署及管内治安状况图

(六)改变编制及部署 师团为了改为三三制及做好冀中作战的准备工作，从 4 月中旬

开始逐步变更了部署。

在师团的指挥下担任石德和石太路沿线警备任务的独立混成第八旅团被调南下至顺德附近，接替了转调其它方面的步兵第一０八旅团司令部及步兵第一四０联队的警备任务。与此同时，新划归方面军直辖的独立混成第九旅团分驻于石德路沿线地区(10 个县)，步兵第一三九联队移驻石太路沿线地区(7 个县)由第一一０步兵团长指挥。

(七)冀中作战准备

1. 由第一一０师团和第二十六师团抽出的部队编成为白泷部队(部队长，步兵第一一０步兵团长白泷理四郎少将，各步兵大队均特设有自行车部队)。

2. 留守部队的警备部署

3. 为了隐蔽冀中作战的企图，于 4 月 25、26 日在保定西北山地对冀西地区进行了讨伐作战。

自 4 月中旬以后，第四十一师团付出很大力量，研究训练和编制装备以及对共军作战的方法。

(一)撒网战法 师团在山地剿共战和对重庆军战斗方面，过去已有丰富经验。但是，在大平原上对共军作战，尚无此等经验。因此，研究了以“撒网方式”作为接触敌人的基本队形，并进行了训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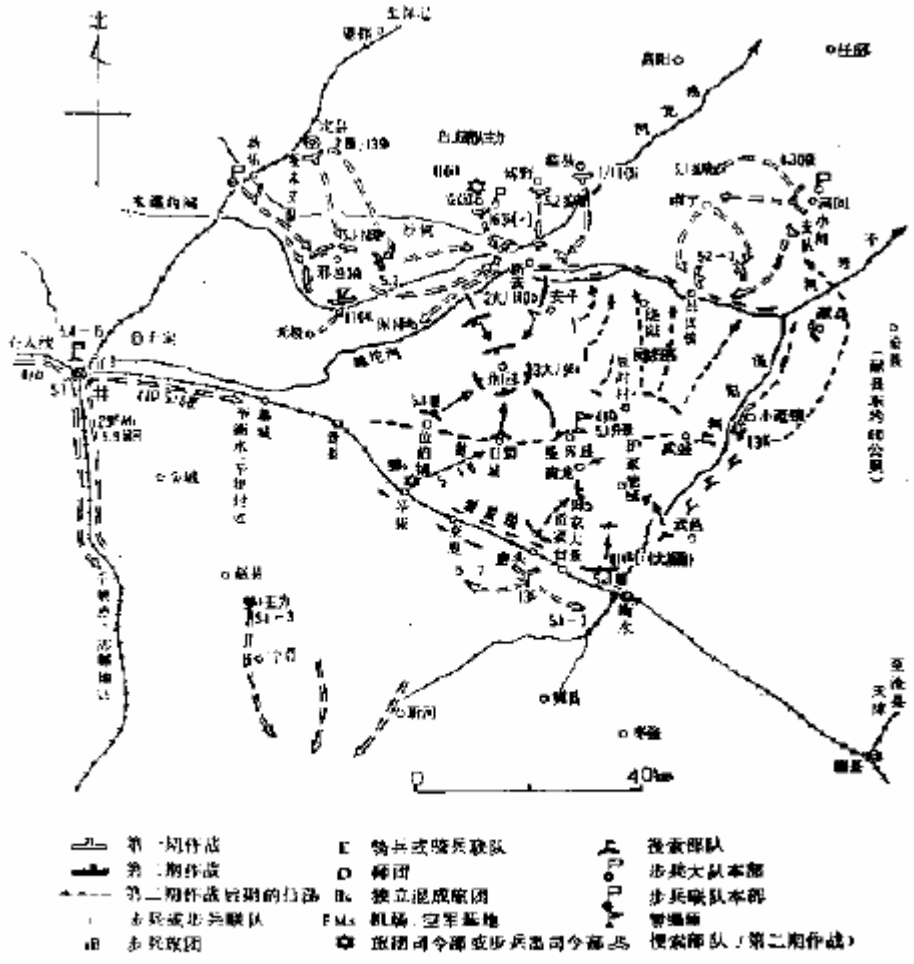


图 5. 冀中作战经过要图

这种方式的队形是，各步兵中队将一列纵队的分队按 500 米的间隔散开，大队再将各中队并列起来遮挡住整个所担任的正面，以搜索那里的敌入，并将他们赶入网内。这种队

形的问题是必须保持指挥联络和集中战斗力。为此，应预先安排好第二线部队或预备兵力，同时尤应重视并训练各部队之间的通讯联系和指挥的敏捷。

(二)部队的机动力 每个大队均编有20名左右的自行车队、骑兵小队。必要时也可将这些小队分属于中队，用以指挥联络，搜素敌情及切断敌军的退路(方面军从天津征用自行车，然后分配给各兵团，马匹主要是利用各部队缴获的马)。

(三)特务工作队 此种工作队是从山西时期为了进行民众工作，特别在联队中设置的。在冀中地区，则在当地各兵团中配备了与宪兵队和中国方面紧密联系的政治工作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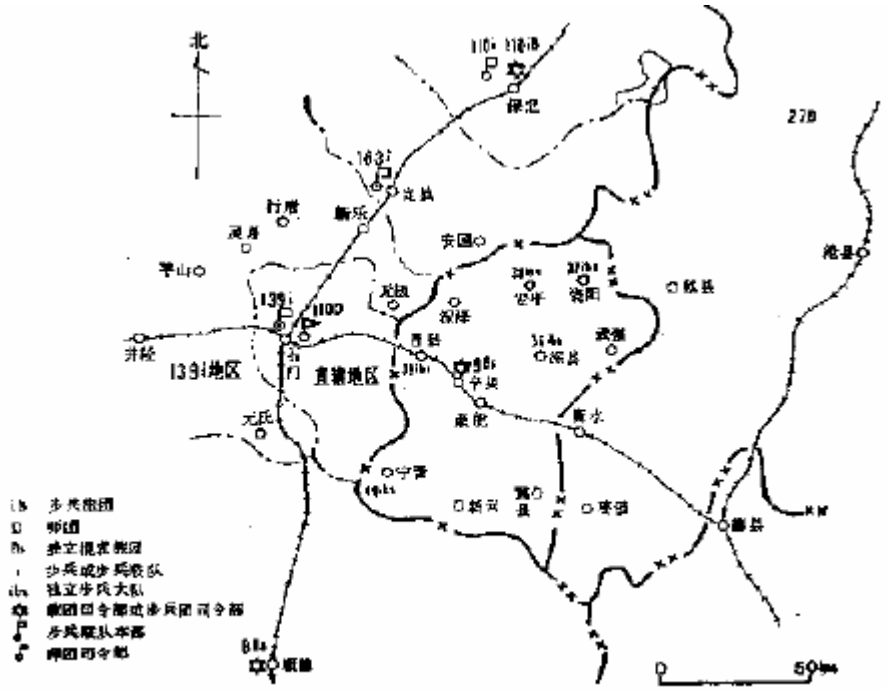


图6-2 冀中地区兵团部署图 (1942年4月末)

作战经过的概要 4月下旬，由于华中作战，突然抽调了兵力，而且对冀中地区的特种情报活动受到了挫折，尽管如此，方面军仍然按既定计划决定从5月1日开始冀中作战，在4月28日召开的兵团长会议上，下达了作战命令。

第一期作战(5月1日—5月10日) 小川部队在作战开始前，在小范镇附近的滏阳河上筑起一道拦河坝，截满河水构成障碍地带，同时利用其一部分，把献县、小范镇间的滏阳河做为阻截线，以防止敌人东逃。4月30日，主力部队于日落后开始行动，5月1日突然袭击了肃宁以北地区的敌人，接着于5月2日又攻击了滹沱河北岸地区的敌人。敌人很快地分散开，换上了便衣，3日进行扫荡时，取得了相当的战果。

白泷部队(配属坂本支队)于5月1日包围袭击了潴龙河，木道沟河北岸地区各处之敌，2日攻击了安平北面地区之敌，但敌人主力向东方及南方逃跑了。一部分敌人便装分散潜伏下来。因此于3日将兵力推进到滹沱河北岸地区(邢邑镇、深泽、新营附近)，分散部署兵力进行了扫荡。

在此期间，池上部队(独立混成第九旅团)增加了山崎部队(骑兵第十三联队)的配属，随着冀南作战的进展，击溃了有可能向北或向东推进的石德路南面地区的敌人。就此防止了敌人脱逃，同时也保护了石德路。

5月4日到9日，小川部队以河间、肃宁为据点，对子牙河、滹沱河北岸地区进行了扫荡;白泷部队如上所述对所在地区进行了扫荡;加岛部队(骑兵第

一一0大队，大队长加岛武中佐)对无极附近进行了扫荡。上述各部队，由于进行了彻底的“精密扫荡”，除了努力搜捕和歼灭便装分散潜伏的或游动的敌武装力量外，并摧毁敌军军事设施，搜查隐藏的武器，严格甄别匪民，检举、逮捕敌军指挥官和党的干部，取得了相当的成果。但是，沙河，木道沟河沿岸一带地区，素有中共平原根据地模范区之称，交通壕、地道建筑非常普遍，几乎所有的村庄都有地下设施，甚至有相距七、八公里的三个村庄用地道连接起来。而且农村的老百姓抗日意识很强，形成了半农半兵状态，就连老幼妇女也组织了抗日团体。因此，各部队在推行肃正工作时极为困难。

中共方面似乎预料到日军要进行此次作战。在作战开始之前，我方即已破译过吕正操司令部命令警戒的电报。另外，于4月26日午夜，共军约2,000余人乘我军准备冀西作战警备兵力减少之机，向高阳东南渡河点兹县、博野、安国各县城进行了袭击。此外，在此次作战开始之后，驻冀西的聂荣臻即命令所属各部队进行反击，第一军分区（杨成武）在易县西南地区展开了积极的军事活动。针对这种情况，第一一0师团除加强了对冀中和冀西的封锁外，同时在情报和补给方面协助进行作战。

方面军早就在石门设置了情报所，5月4日又在该地设置了战斗司令所。

5月7日，第二十七师团以紧急电报提出了具体意见。其内容为；“综合各情报判断，三角地带内敌之主力，正在陆续向东北方地区逃避移动中。因此，方面军应变更作战计划，调第四十一师团到天津方面，将敌军包围在子牙河、任邱、河间地区，予以歼灭。”

在方面军方面，最关心的间题就是在第二期作战时三角地带内是否还有敌军主力，但对此并无确实情报。第二十七师团的情报也主要是密探的报告。方面军参谋部进一步分析研究了各种情报，结果做出判断：“三角地带内的敌人，似乎预先知道了我方作战企图而发生动摇，可以断定部队和居民的移动，但是，军区的主力仍在三角地带以内，故第二期作战方针不必改变。”其理由如下:

一、该地区为晋察冀边区的给养基地，是多年来努力建设的地区，不可能轻易丢掉。特别是最近为防备日军的讨伐，加紧了根据地地下工事的建筑。

二、从对民众工作来看，不能设想共军会丢掉民众自己逃到边远地区去，特别是在已经形成根据地的地方，使之空室清野，为了将来的生存打算，恐怕也是很难做到的。

三、即使正规军暂时逃避，而本地的军队、分区的军队和民兵还存在，而且大部分正规军已经逃避的情况尚未证实。倒是有理由可以认为是敌人方面的宣传。

四、军区和各军分区司令部的不断移动，根据通讯谍报判断，仍然是在三角地带以内。

方面军司令官也同意上述意见。然而由于担心敌人主力的北上或东进，为了防止起见，当天夜里采取了以下措施。

一、派一部分兵力增援小川部队，收缩其作战地区的范围，扼守滹沱河及小范镇以北滏阳河的主要渡口，并搜索企图逃走的敌军予以歼灭。

二、调动山崎部队，速到束鹿集结，8日清晨开始行动，控制小范镇、衡水间滏阳河一线地带。

上述两部队，7日夜以后，遵照命令开始行动。参加第二期作战的第四十一师团，自5月初开始利用铁路输送部队，但为了欺骗敌人，先从石门顺京汉路南下移动到邯郸，然后调转过来做好进入石德路沿线的准备。5月10日在深县设置了师团战斗司令所。担任封锁任务的第一一0师团，为了阻截敌人向西方山区逃走，也派出兵力增援白泷部队，予以配合。

第二期作战(5月11日—5月15日）方面军按预定计划，决定从5月11日

开始第二期作战。

第二期作战的设想是:“使白泷、小川部队及骑兵第十三联队(山崎部队)从深泽南方封锁滹沱河下游和从衡水封锁滏阳河下游之线，同时使第四十一师团于 10 夜利用石德路急速将兵力运送到辛集、衡水之间，从 11 日拂晓，首先歼灭深县东南方地区的敌军，相继歼灭安平西南方地区的敌军，以及深县、安平县以东地区的敌军。”为了进行此次作战，池上部队(独立握成第九旅团的步兵三个大队、坂本支队、白泷部队的步兵二个大队)及小川、山崎两部队，统由第四十一师团指挥。

5 月 11 日拂晓，奥村部队(第四十一步兵团长奥村半二少将指挥的步兵六个大队为基干)从沿石德路的展开线出发，对深县东南地区的敌军，池上部队对安平西南地区的敌军分别予以双重包围并进行了攻击。然而共军已经便装分散，未能取得多大战果。

随后，师团于 12、13 日，又命该两部队对武强至安平的道路的东北地区进行了反复扫荡;14、15 日又为每个部队划出地域，以深县东北和安平地区为重点，反复进行了扫荡，同时命令小川部队和山崎部队搜索并攻击逃到滹沱河北岸地区的敌人。

第二期作战于 15 日结束。根据各部队的报告，敌人遗尸 2,299 具，俘虏 9,525 人，缴获甚多，予敌以沉重打击。

第三期前一阶段作战(5 月 16 日—25 日) 此次作战地区仅限于冀中军区核心地带。中共方面则尽力确保该地，而将兵力分散潜伏下来，试图进行顽强的抵抗。因此，方面军为各部队规定了以下的负责地区，部署密集兵力进行扫荡。

第四十一师团负责扫荡滹沱河、滏阳河和石德路间的三角地带; 白泷、小川部队则以连结高阳、饶阳一线为界，负责扫荡滹沱河以北地区的敌人。

在此期间，第二十七师团极力搜索估计逃往任邱(白洋淀东南地区)的敌集团，设法以突然袭击歼灭之。

16 日以后，各部队反复进行了负责地区内的“精密扫荡”，并进行严密彻底的剔抉，陆续取得战果。地区内的敌人，巧妙地运用离合集散的手法，千方百计地潜伏下来，逃避扫荡。

一方面，于 17 日得到特情报告，敌方对外围冀西，冀南军区各部队频频下达指令，以 20 日为期，将对京汉、石德各铁路进行全线袭击。事实上，其后在第一一 0 师团警备地区内，敌人只在各地反复发动过小规模的袭击。

在三角地带，由于对深县至武强道路以北地区进行了扫荡，敌人逐渐被压缩到深县东南地区。

20 日前后，由于大体上已能掌握了情况，于是调第四十一师团主力，从 23 日起对该地区敌人开始了攻击。敌人的行动灵活敏捷，最初很难捕获，但在各处也有遭遇战，或者依据村庄进行顽强抵抗的敌人。在 24 日的扫荡中，取得了相当的战果。

第三期后一阶段作战(5 月 26 日—6 月 20 日) 方面军鉴于三角地带内尚有残敌继续游动潜伏，同时外围的敌人与之配合活动，于是自 5 月 26 日开始约以 15 天时间，主要剿灭沧县、高阳、望都一线以南的冀中地区的残存敌军势力，特别是清除三角地带内的根据地设施，同时，大力推进各项建设工作，以期贯彻作战的目的。

为此，使白泷、小川两部队归回原建制，重新使第二十七师团和第一一 0 师团参加此次作战，并命令第四十一师团(池上部队配属不变)自 26 日起担任真

渤特别行政区(渤海道及真定道东部)的警备。

各兵团由于频繁进行扫荡，节节取得战果，敌方呈现明显颓势，敌军离开根据地到处游动，现已可判断敌正面临全面崩溃的局面。因此，方面军于6月4日将后一阶段作战从11日又延长10天，企图彻底进行肃正作战，促进建设工作。

在此次扫荡战中，虽未能捕获敌人的指挥中枢，但在人员和物资方面均使敌受到严重损失。第四十一师团以石德路以南地区为重点进行了扫荡，于6月11日～13日期间在枣强附近击溃了冀南军区部队，取得了敌军遗尸172具的战果。其后回师石德路以北地区继续进行扫荡。

第二十七师团和第一一0师团，搜索警备区内逃窜的残敌，不断进行了扫荡，同时极力设法扩大治安区。

当时步兵第一百六十三联队第一大队(大队长大江芳若少佐)于5月28日在安国西南地区，急袭包围了约一千敌军，并在地道中予以歼灭。

另外，在第二天即29日，步兵第一百六十三联队第十一中队在蠡县东南约20公里西张岗附近，搜索到敌军约450名，予以猛烈攻击，战斗结果敌遗尸245具，俘104人。参加此次战斗的我方兵力为日军中队长以下55名、中国警备队28名，无战死者，伤者8人。

独立混成第八旅团也取得了战果。6月1日在威县以北地区，搜索到估计有敌军司令吕正操所在的部队，并将其击溃。

在此次作战期间，中国方面的军民也协同作战，特别是在15日那天，真定道道尹率领一市十县的400名警备队，积极地参加了无极附近的讨伐，取得了成果。

参考一

关于大江大队的歼灭战，据大队长的回忆如下:

警备地区南部的沙河流域一带历来治安情况很坏，民众不与日军接近。大队在此虽反复进行了讨伐，但未能与敌军交战。5月27日获得情报称，有一营共军正在召村东南方北坦村附近修筑地道。

大队于当夜秘密从各警备队驻地出发，采取离开道路机动前进的方法，在拂晓以前包围了北坦村。天亮时开始了战斗，敌军虽猛烈射击，但我方逐渐压缩包围圈，攻入村内。此时一直坚持战斗的敌兵突然消失不见踪影。有时敌兵从房顶上抛来手榴弹，有数处地雷爆炸。于是立即搜索村外的地道和村内地道口，切断了通向邻村的地道。村内地道及地下室内充满了敌兵，进行顽强抵抗，因而费了很大力气，全部予以歼灭，缴获颇多。

我方军官以下战死三人，伤五人。

此后，该地区的治安迅速好转，邻接地区也受到了良好影响。

此次作战取得胜利的原因:日军精悍强干，军纪严明，受到民众的信任，从民众中及时获得了可靠的情报；预先研究了中共方面的地道战术，出其不意地突然袭击了潜伏的敌人，并堵住了地道口。

另外，为了执行冀中作战，大队变更了部署，于当年4月由曲阳县移驻于此。负责的警备地区的面积约达350平方公里，并以每4至8公里为一警备单位，分别部署各分队驻守，并修筑了坚固的防御堡垒，各堡垒之间以汽车公路连接起来，随时随地均可移动兵力。与此同时，在大队和各中队设置侦谍班，负责调查共军地下组织，并设法利用民众组织，搜集和迅速传递情报。

参考二

方面军本想用朱占魁在冀中进行政治工作，但他在被护送途中于 5 月 28 日在望都附近逃脱。朱为原冀中第十军分区司令，于 1941 年 11 月连同其卫兵被第一一 0 师团俘获。方面军召见了他，并在华北政务委员会启新院对他进行了约二个月的怀柔工作。朱逃后师团立即发出通缉朱占魁的命令，但朱终于跑掉。使坚强的共产党员变节背叛确实是很难办到的。

冀中(三号)作战取得了很大的战果，于 6 月 20 日宣告结束。方面军向大本营作了如下的报告:

冀中军区受到了歼灭性的打击，除在白洋淀、文安地区，尚有稍为有力的集团匪在游动外，在三号作战区内仅有少数残匪(至多不过 100 人)。此次作战主要战果如下:

敌军遗尸 9,098 具，俘虏 5,197 名(另有嫌疑者 20,568 名)，交战次数 286 次，敌方兵力 58,338 名。

主要缴获: 山炮 5 门、迫击炮 209 门、重机 7 挺、轻机 59 挺、步枪 9,101 支、掷弹筒 22 支、自动步枪 179 支，自行车 794 辆、电话机 97 台。

摧毁设施: 武器库 58 座、被服库 48 座、粮秣库 16 座、其他(从略)。

我方损失:

战死 161 名(其中军官 9 名)，伤 323 名(其中军官 14 名)。

上述敌方损失，如按作战时期区分来看，随着作战的进展，战果有显著扩大，其大部分战果是由于第三期扫荡剔抉作战所获得的。一旦军民的结合被破坏，敌方有组织的情报网出现破绽时，共军的混乱情况即将如实地暴露出来。

本次作战的意见和教训 综合整理参战者的意见，其概要如下:

一、关于共军的战法

(一)由于共军在根据地民众工作做得彻底，侦察谍报网在群众中巧妙地扎下了根，很快就会侦悉日军的动向，立即采取回避转移行动。而且由于熟悉地理情况，利用凹形道路，岔道和隐蔽的小道等，能够神出鬼没，巧妙地离合集散。

(二)对日军经常回避战斗，情况不利时，则将武器藏在地下或洞窑中，化装便衣，很难与群众区分识别。但在意外遭遇或追及时，其战斗意志相当强，特别是在村庄的防御战斗尤其坚强，战斗到最后一人仍然顽抗到底的例子屡见不鲜。

(三)火力装备虽然居于劣势，但携带有很多小型无线电报机，结合使用民兵、居民的通讯，通讯联络工作十分出色。

(四)共军的平原地带的抵抗据点，煞费苦心地修筑了各种地下设施。例如在各家炕底下修筑地下室，互相连通一气，甚至有的炕下地下室通过地道与村外秘密联络点相连接，有时村庄之间也设置联络用的暗道。地下室的规模不一，有大有小，一般能收容一百数十名兵员，还有能隐藏、储存一部分军需品的地下室。地道入口多隐蔽在寺院、庙宇、废井、堆肥小屋、堤坝、仓房、森林中，很难发现。此外，田地等的洼道、山坡等地方还设置了很多潜伏用的洞穴。

二、关于作战实施要领

要隐蔽我方的作战企图和通过严密的情报收集进行奇袭，要让讨伐部队有机动性并使分散的部队能以迅速指挥联络，特别是使各级指挥官在意外遭遇战时能独立应付，要做好侦察、剔抉、分离匪民的准备工作以对付善于进行地下工作、采取群众游击战术的敌人;要反复进行急促果敢而彻底的攻击。排除地雷、破除围墙、发现和挖掘地道，必须配备具有专门技术的部队。这些都是参战者的共同意见。

此外，第一一 0 师团参谋长中村三郎少将就此次作战，讲述如下:

(一)此次作战所以取得很大成果，主要原因是增强了讨伐兵力，分离匪民工作的进展，以及中国方面的积极协力。

(二)我作战主体兵力，是新近到来对共军作战经验少的兵团，但此次作战的目标是推进治安工作，倘为现地兵团增加兵力，使之支持作战，或可取得更大的效果。

(三)象一阵风似的讨伐，并不能捕获敌人。不如从一开始就编成多数轻快机动的讨伐队，分别部署在作战地区内各要点待命，利用各警备队现有的侦察谍报和联络网，一且接得敌情报告，立即出动，采取反复合击的“居座战术”(泡蘑菇战术。—译注)。

(四)高度分散部署的各级部队的指挥官，手中要掌握相当数量的机动部队，如果能随时动用，或可收到大的成果。

在无敌情时，可以推进治安工作，不论有无作战情况，都必须探入贯彻对民众的施策。

(五)根据盘问俘虏的口供:中共方面早在3月间就觉察到我方此次作战的企图，并在4月20日发出了反“扫荡”的指令。因此，必须充分认识中共情报能力的优越性。

此外，华北方面军作战主任参谋岛贯武治中佐对此次作战也曾做过如下的回忆:

冀中作战，是日军对共军作战当中，在政略、战略上可以说是改进得最完善的作战，也是华北方面军努力的结晶。

通过此次作战摧毁了冀中军区，这对西面山岳地区的冀西军区也有很大的影响，可以明显看出在这一年内共军的实力衰退了。

关于上述第一一0师团参谋长提出的(一)(二)(三)(四)项意见，该师团在冀中作战计划阶段曾经陈述了自己的见解，但方面军由于考虑到下述的理由未予采纳。

(一)第一一0师团以京汉路沿线为根据地，第二十七师团以津浦路沿线为根据地，而冀中军区则盘据在该两师团的威力难以达到的中间地区，而上述两兵团虽配属有1—2个独立混成旅团，但因占据地域广阔，已无力在该地区扩大肃正工作的成果。而且在师团的能力方面，在其指挥下不宜增加更多的兵力。

(二)冀中地区的党、政、军、民的团结是根深蒂固的。首先以猛烈的攻击迫使敌人离开根据地，并在其党、政，军，民中间打进楔子破坏其团结，然后将该地区改建为真渤特别行政区，分散部署两个精锐兵团。经过长期努力，以建立我方的军、政、会、民的组织。当然要以分散部署兵力实行居座(泡蘑菇)战术以及贯彻治安工作为熏点。

(三)对于民众工作，在政治、经济、思想、宣传等方面的措施，固属重要，但民众要依靠能保护他们生命和保障他们生活的强有力者。以压倒共军为基础，治安工作才能取得成效。方面军一贯的方针是大力推行积极的讨伐作战，而使治安工作与之密切结合。当时轻视讨伐作战的重要性，而专心致力于治安工作的意见也相当多，但至1942年对共军施策所取得的进展看来，方面军所采取方针的正确已得到证实。

三、作战前必须进行特别训练和教育

治安战是一种极其错综复杂的战斗，特别是各小部队在高度的分散行动中，各级指挥官的独断是很必要的。因此，在作战准备期间，至少要对干部进行有关与中共作战的实际训练，但不是泛泛的训练，而必须是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的训练。特别是对于从外地调来的部队，事先必须给以充分教育，使之了解作战地的地志、敌军及居民的动向以及历来的治安肃正状况等。山西省山岳地区的共军与盘据于平原的共军，无论在战法、地下组织以及民众工作等所有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异。因此，充分运用过去在该地区担任过警备部队的知识和经验，是必要而且有利的。

作战结束后的治安肃正工作 在进行冀中作战时担负着“军事上猛烈攻击”任务的各兵团，为了巩固已取得的成果，各联队、大队在反复进行清扫作战后，逐渐转为中队、小队分驻形式，并设法加紧完成警备据点的自卫设备、交通通

讯网的完善及隔断壕的构筑等等。与此同时，要一面开展对民众的工作及加强侦谍组织网，一面要逐渐实行高度分散部署，努力扩大治安地区。

9 月 15 日，第四十一师团将独立混成第九旅团纳入其指挥之下，承受了第二十七师团和第一一 0 师团的渤海道大部分及真定道一部分的警备任务，担负起巩固“真渤特别行政区”的防卫任务。

此时，在枣强附近的冀南军区的共军正在活动，治安情况很坏。因此，遵照方面军的指示，从 9 月 12 日至 24 日进行了“真渤特别行政区南境协同作战”，对枣强附近进行扫荡肃正作战。

参加作战的部队有第四十一、第五十九、第一一 0 各师团及独立混成第七、第八两旅团的一部分兵力。

紧密结合上述军事行动，开展了强有力的政治工作，5 月下旬真定道东部与渤海道合并，随后又将山东省德县也合并进来，设置了“真渤特别行政区”。

真渤特别行政区管辖内共有二十三个县，行政公署设于德县，由功绩昭著的冀东滦县县长雷恒成任行政区公署长官，对县政府以下人员的选拔也特别慎重，努力推行了以剿共为主，重视加强民生的崭新行政。

在此以前即 4 月 29 日，于德县设立了特务机关(机关长本间诚中佐)，与在沧县的天津特务机关办事处保持联系，担任着新行政区的内部指导。(该特别行政区的设置一直保留到 1943 年 8 月。)

冀中的共军主力虽遭到沉重打击，逃避到冀西山区，但在平原地区留下各县基干队和党的地下组织坚守着牢固的地盘，以图恢复其势力。第四十一师团参谋铃木重雄中佐(当时为少佐)回忆当时的情况如下:

冀中之战是地地道道的政治战。敌人对我方的武力扫荡，以逃避为主，力求保存实力，伺机进行袭击或伏击。另一方面，派地下党员秘密潜入新民会、新政府各机关、铁路局及学校等，从中争取同志，并故意制造贪污受贿等事件，借以破坏新政府的威信，以离间民心。或者在学校教育中，一面讲授新民教科书，一面极端巧妙而顽固地宣传抗日思想和共产主义等。更有甚者，向我岗楼上的日军散发传单或用扩音器进行反战工作。

因此，我方除不断进行讨伐和政治建设外，同时由对共工作班揭发检举潜入分子，和进行分离匪民的工作，并通过宣抚班的活动，开展启蒙新民运动。但是，我方要想扩大所占据的“点和线”周围的势力圈，是很不容易的。

此外，独立混成第九旅团参谋冈本孝行大佐(当时为中佐)就冀中作战后的状况曾叙述如下:

鉴于此次对共军作战的经验，于 9 月召集所属全体中队长实行集中教育，并就共军的战法、对共情报尤其是侦察谍报活动、扫荡及剔抉要领、通讯联络方法等进行了现地教育。更于 11 月下旬结合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举办了夜间剔抉周，在各大队长领导下，各中队以几个班的兵力编成特别剔抉队(以军官为队长，全员穿便衣，包括中国人)，全地区在同时进行了肃正工作。由于效果很好，因而又延期两周，其总成果超过了三号作战。旅团最初进驻时，在警备区内，如果没有一个步兵中队以上的兵力，就不能自由行动。而经过剔抉周之后，到 12 月份，不带警卫人员也能随时外出视察了。

然而，治安良好地区，是否仍然是那些部队驻地及主要交通道路两旁附近地区?对此，在邻近的枣强担任过警备的步兵第二百三十七联队第二大队长渊上好治少佐的回忆如下:

(一)到 9 月以后县内的治安尚未恢复，在枣强西南地区行动的小部队或小队、分队的驻地不断受到袭击。

(二)配属于肃(原文如此一译注)少将指挥的反共赞备队，其主要任务为收集情报，因

逐渐受到压迫，被困在县城内难以行动。11 月 21 日夜间，肃部队受到共军袭击，经日军出兵救援，才将敌人击退。当时大队长去德县参加部队长会议，县知事及肃少将也不在枣强，被敌军钻了空子。

下面再举一例。独立警备小队长山口真一少尉就山东省西北部与河南省境相接壤的武城附近的实际警备情况，叙述如下:

我们大队(大队长小川雪松大佐)与独立步兵第二十八大队同时配属于第二十七师团，在冀中作战期间担任河北省景县、故城及枣强地区的警备。作战结束后又返回旅团，奉命担任山东省禹城、平原、恩县、高唐、夏津及武城六个县的警备，6 月 8 日将旧警备地区移交给第四十一师团，而移驻新防地，大队部设在禹城。

第一中队新担任武城和恩县(面积共约 1,500 平方公里)的警备，中队长今枝荣作中尉鉴于管辖区内的治安情况，将思县警备委由县警备队负责，中队主力派往治安最坏的武城县，将兵力重点部署于武城、武官寨及十二里庄三处。当时武城县警备队拥有兵力约 530 人，分驻到各个据点。

我的小队驻在十二里庄(距中队长驻地武官寨 9 公里、距武城 7 公里，距大队部最远约 80 公里)。此地前任警备队曾受到共军地道战的攻击，损失重大，是个很成问题的地方。受到冀中、冀南作战相当打击的共军，仍无一定短期停留之处，而乘日军警备的空隙进行活动，特别是沿县境交界的地带都成了他们游动的道路。估计他们在重整兵力之后，可能进行相当强烈的反击。每晚对我通讯线路和道路进行破坏，对我方的小部队也进行过伏击。中队长不断带队讨伐和示威，很少呆在防地。

十二里庄是一个位于乎坦开阔大平原的田地中的小村庄。原驻防部队虽已开始修筑防御工事，但未完工。该阵地在村庄南面，是三个每边长 50 来的菱形阵地连结而成的三角形(边长约 300 米)砖结构、这是为了可以容纳日军、县警备队及自卫团而紧急修建的。因此，我们警备队暂时住于村庄北面的旧兵营。阵地设施简陋，很多地方已经损坏，据判断该阵地对来自村庄方向的袭击，显出了防御上的弱点。

7 月中旬连日降雨，高粱长势茂盛，杆长已超过身高。虽然指示过将阵地附近的高杆作物砍倒，但恐招致民众反感而未执行。7 月 27 日午夜，潜伏在高粱地的敌大部队突然发动了攻击(据以后调查，敌方的连长和参谋一级的人员曾混进修补阵地工程的劳工中进行过侦察，同时在当夜已将附近村庄的狗予以处置，防止了狗叫)。我小队，通常由三个分队、一个机枪分队组成，共计 31 名。但都是经过特别选拔而且有战斗经验的士兵，故能很快就从危险的屋里跑出，登上房顶应战。敌我相隔十几米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敌人的手榴弹象下雨似的投来，我军冒着弹雨集中火力猛烈扫射，但敌兵有如海潮反复向我方反扑。激战持续了六个小时，直到天亮敌人才逐渐开始撤退。我军立即向高粱地追击，但未能捕获敌人。这时，冲破了敌人伏击的中队主力和远处的邻接中队及大队主力的援军相继赶到。(县警备队约有 80 名，在教会东邻兵营内配合应战，战死数名。)

判断来袭之敌为新编第七旅的兵力约 800 名，袭击我中队主力的兵力约 600 名，袭击武城方面的兵力约 600 名，总共 2,000 名，我小队打死打伤敌人估计达 300 余名。我军战死 1 名，伤数名。这次战斗对敌人的影响颇大。其后，各驻地再未受到敌人的强烈袭击。随着治安的恢复，部队又进一步实行了高度分散部署。

回忆当时情况有如下感想:(一)我军官兵非常优秀。特别是独立分哨长，除指挥部下外，并与民众接触，且与随时都可能哗变的中国军警同居一处，十分辛劳。(二)我等非常关心民心的动向，特别注意凡是民众厌恶的事绝对不做。同样共军也贯彻这种方针，从未听到共军做过坏事。(三)作为下级指挥官的独立队长，其判断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全队的生命，责任非常重大，同时对神出鬼没的共军每天都要进行神经紧张令人恐惧的战争，不如打一次大规模的战斗反倒痛快。其后我参加过老河口作战，我回忆在中国四年之中，再

也没有比驻防在十二里庄当队长时代更苦恼的。

中共方面的状况 根据中共方面的记录，经过此次作战及其后的肃正工作，冀中的中共势力显然受到了很大打击，当时的情况有如下的叙述:

冀中平原的“五一扫荡”是日本侵略军在 1942 年一年间所实行七十五次扫荡中最残酷的一次。日军认为冀中是八路军的后勤补给基地，花费了一年工夫进行准备工作，布置了据点和稠密的公路网，施展了“张网捕鱼”的毒计或采取“纵横合击”、“展转剔抉”的办法，企图歼灭我军主力。

为了此次“扫荡”，日军动员了三个师团和两个旅团，再加上从全河北抽调的“傀儡军”总共调动了十万大军。敌军头子冈村宁次亲临第一线指挥，挥舞杀人的血刀，由平汉、北宁、津浦及石德四条铁路向冀中地区六百万军民进行了袭击。他们蹂躏冀中八千个村庄和六万平方公里的平原，威吓抗日人民，企图歼灭该地区的八路军主力。扫荡作战由 5 月 1 日开始继续了两个月之久。

针对这次扫荡战，吕正操将军指挥的冀中部队，收集精确的敌情，制定作战计划，摆脱了敌人的围攻，跳到敌后的铁路，公路及城市附近，实行突然袭击，首先使敌人陷于混乱状态，随后连同其救护部队一齐击退。

当敌人实行全面清剿时，我军主力从战略观点出发，向冀西山地、白洋淀、冀南方面等外围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转移。

这时遗留下一部分兵力在该地坚持抵抗，与地方游击队及民兵配合进行离合集散运动，以三击(迎击、侧击、尾击)和三速(速战、速决、速撤)的战术，击溃了大量的敌人。

另外，我方想出了地下战术。这种战术完全是由群众自己创造出来的。

我军在这次激烈的反扫荡、反清扫的作战中，在险恶的情况下，取得了多次辉煌的战绩。例如，5 月 13 日敌加道大队长(可能是骑兵第一一 0 大队长加岛中佐之误)率领 500 名步骑兵并带着伪道尹及伪县长八名到无极附近视察占领地，我军以二个连的兵力，在城外八华里的小吕进行了伏击。伪道尹当场击毙，加道大队长负伤，骑兵中队长以下 180 余人被击毙于麦田之中。这次战斗仅仅进行了 45 分钟。

另外，6 月 9 日拂晓，我军二个连在深泽东北 15 华里宋庄做好伏击准备。数天之前，在宋庄东南的白庄激战中，敌人蒙受颇大的损失，死伤 400 余人，晋藤联队长战死(可能是菅泽大队长之误)。因此，新任冀渤特别区司令官坂本旅团长为了去现地巡视调查这次战斗失败的原因，9 日早晨亲自率领约 300 名警卫队去白庄。旅团长一行来到宋庄东北我阵地前约 30 米处，我军同时发射密集火力，在旅团长的近前爆炸了一枚掷弹筒弹，炸碎了他的头部。警卫的骑兵队及视察团全部战死。(以上据原书注解系出自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书，经核对，与该书所载有很大出入，现按日文原著译出，希读者注意—译注)

此外，关于民兵的战斗情况，中共方面有如下的记载;

日本侵略军采用“为渊驱鱼”的战法，占领了冀中平原之后，为了确保这一地区，修建了一万里的汽车道路和 1,500 个碉堡，形成所谓的“到处都有公路，抬头可见岗楼”的状态。为了进行血腥的镇压，敌人杀戮逮捕几万群众，在广阔的大平原上，“没有不穿孝服的村庄，到处一片哭声”，怨声载道，但是，我们解放区的军队和人民并没有因此而屈服。

正值敌人大规模修建碉堡，到处成立治安维持会时，我们游击队和一部分村干部又返回村来继续活动，仅用几夜的时间，便把分散的民兵集合起来了，刨出埋藏的武器，干掉与敌人勾结的特务和汉奸，捣毁了“治安维持会”。然后配合当地党的地区委员会对党员进行再教育，团结了广大群众展开地道战，以抵抗敌人的“包围”和“讨伐”，在抗敌胜利过

程中，在该地区坚持了严峻艰苦的战争，粉碎了敌人的野心。(译注同前)

冀东作战(一号作战)

一号第一期作战(4月1日—6月10日) 冀东道是第二十七师团的北部防卫地区，截至3月份该区的治安肃正情况，上面已经讲过了。

根据方面军的指示，新年度刚刚开始，师团就以彻底肃正冀东共军根据地及其地下组织为目的，于 3 月下旬抽调中部、南部地区兵力，进行了必要的准备。

北部防卫地区队长铃木启久少将把作战部队分为两个讨伐队，即松井讨伐队和田浦讨伐队。松井讨伐队(中国驻屯军步兵第二联队长松井真二大佐指挥的步兵二个大队为基干，另外也指挥中国治安军第二、第四集团以及后来的第七集团)主要担任对玉田、遵化两县及丰润县西半部的讨伐肃正工作;田浦讨伐队(中国驻屯军步一联队长田浦竹治大佐指挥的步兵二个大队为基干)主要担任对丰润县东半部、滦县南部及迁安县的讨伐肃正工作。

当时共军以遵化、玉田、丰润、迁安的山岳地带为根据地，组成小股游击队出没于各地。

从4月1日以后,该两讨伐队开始搜索敌人,进行了突然袭击、破坏窑洞(用以潜伏兵员，制造和贮藏兵器、被服)、地道，侦察搜索中共方面的行政机关及党组织。

冈村方面军司令官对该地区的肃正极为关心，4 月 6 日赴唐山，视察了师团战斗司令部、治安军行营、驻丰润的田浦部队本部及驻鸦鸿桥的松井部队本部等，并予以鼓励。

由于此次作战，共军第十二、第十三团损失很大，从 5 月中旬前后逐渐越过长城线逃入满洲国境内。因此，师团于 6 月上旬大致结束了第一期作战，尔后转入对该地区的肃正警备工作。

此外，在此期间，独立混成第十五旅团，为了彻底歼灭潜伏在冀东邻接的蓟县、密云、三河地区的中共地下组织，派出特别工作队继续进行了果敢巧妙的剔抉工作。

注;为了在冀东道进行肃正工作，一部分关东军(几个大队)奉命配属于华北方面军，然后分别归属于第二十七师团及独立混成第十五旅团指挥，主要参加了沿长城线山岳地带的肃正讨伐，其具体行动不详。根据 6 月 1 日的大陆指第一千一百七十号，关东军派出了一部分兵力;又根据11月7日的大陆指第一千三百三十三号，关东军撤回了这一部分兵力。

此外，当时热河省属于关东军防卫军所属的第九独立守备队(司令官是安藤忠一郎少将，由三个大队组成，编制定员 2,416 名，驻守于承德、古北口.青龙)担任警备，但是，由于兵力少，必要时需从其它方面增援或派遣讨伐队。

参加此次作战的松井讨伐队的行动概要如下:

讨伐队本部设于鸦鸿桥，日野原大队(本部设于朱官屯)担任北半部的警备。伊藤大队(本部设于新军屯)担任南半部的警备，分别负责进行地区内的扫荡。讨伐队的主力从4月9日在南部平原地区进行剔抉。

17日将剔抉地区推进到北部山地,实行了彻底搜索,4月22日及5月4日日野大队(大队长日野原松市大尉)剔抉搜索了鲁家峪附近的洞窟，缴获了大量军需品。5 月中、下旬，

松本大队(旧伊藤大队)也于玉田地区的洞窟取得战果，由于我军实行严峻的剔抉搜索，共军主力逃入了满洲国境内。

配合上述扫荡并大力开展了宣传宣抚工作，以及县政改革指导工作，因而治安得到了显著的恢复。

此外，北部防卫地区队长铃木启久中将(当时为少将，第二十七步兵团长)的回忆如下:

铁厂镇周围地形复杂，故搜索敌人颇为困难。而且共军斗志旺盛，负责掩护大部队撤退的后卫部队，一直战斗到全体战死为止，或者巧妙地利用洞窟(在鲁家峪附近经过改造的燧石采掘场旧址，可隐藏很多人)进行了抵抗。由于我军进行讨伐，到 5 月底治安状况曾一度平稳下来，但至 6 月底前后，又出现了破坏道路、切断电线及埋设地雷等情况。中共方面的地下组织扎根于行政机关、学校及居民之中，形成了所谓“剥开表皮露出红瓤”的情况。

一号第二期作战(8 月 11 日—9 月上旬) 6 月 10 日变更了军队部署，中国驻屯军步兵第二联队第一大队奉调配属于北部防卫地区队，接替松井讨伐队的防务，松井讨伐队被调回师团防卫地区。

随着兵力部署的变更，减少了对敌的压力，因此一度逃入满洲国境内的共军，又重新回到冀东，力图重建地方基干队，其行动逐渐活跃起来。特别是由于屡次袭击了中国治安军，因此，北部防卫地区队大力开展了讨伐战。但是，7 月 4 日在遵化县，日军一个中队，8 月 4 日又有两个小队与数十倍的敌人交战，终于遭到了全军覆没的悲惨命运，因此，师团从 8 月中旬开始转入第二期作战，以期进行彻底的肃正。方面军也同意，并从其它方面抽调兵力，加强了实力。根据《中国驻屯军步兵第二联队史》记载第二期作战情况如下:

联队将主力留在中部防卫地区，仍然执行警备任务，联队长调集了已经配属于北部防卫地区队的田中大队、联队直辖部队的主力、中国驻屯军步兵第一联队的中谷大队、第一一 0 师团的大江大队、驻蒙军的面高坦克联队、山炮兵联队的高桥中队、汽车队及一部分宪兵队编成松井讨伐队，由北部防卫地区队长铃木少将指挥，并指挥中国治安军，负责执行遵化县及玉田县大部的肃正任务。

联队长于 8 月 11 日进驻冀东道统辖上述各部队，首先派田中大队负责继续进行玉田地区的肃正建设，13 日主力部队开始行动，开进遵化平原地区，极力设法搜索歼灭敌人。敌正规军主力逃往管辖区以外，其余部分各伪县基干队四散在各地潜伏下来。因此，从 8 月 17 日将各主力大队分散部署，对平安城平地、长城南侧地带及遵化平地进行扫荡，并灵活运用机动主力进行果敢的攻击。

东侧邻接的中国驻屯军步兵第一联队也同样在其警备地区内一日不停地继续进行活动。此外，独立混成第十五旅团也从 8 月 17 日到 9 月 27 日对蓟县方面展开肃正作战，以后并持续进行各项肃正工作。

第二十七师团继续作战，从 9 月中旬进入“一号后期作战”，其经过情况将另行叙述。

总之，中共以该地区为其通往满洲的道路，极力设法扩大其势力。因而对此种形势，方面军也是不容忽视的。

晋冀豫边区肃正作战(C 号作战)

(5 月 15 日—7 月 20 日)

敌情 共军第十八集团军军部及一二九师仍盘据于晋冀豫边区的山西、河南、河北省境附近的山岳地带(太行军区)及沁河中游河畔地带(太岳军区)，屡次巧妙避开日军讨伐的锋芒，企图扩大其势力。

太行山脉南部的陵川、林县附近为重庆中央军第二十七军(军长:刘进)、第四十军(军长:庞炳勋)及新编第五军(军长;孙殿英)在华北保持的重庆方面的唯一据点，彼等专心致力于保存实力。在其北部地区因与共军争夺地盘正闹矛盾。

作战准备 第一军根据方面军年度计划的作战指导纲要，以歼灭太行、太岳军区的共军为目的，从 4 月上旬以来开始准备，4 月 16 日向各兵团下达了作战计划大纲。其作战设想为:预定 5 月 15 日作战开始，作战分三期进行，第一期(8 天)消灭沁河河畔之共军;第二期(20 天)消灭涉县北方地区之共军,第三期(20 天)消灭涉县南方地区之共军。但是，如前所述，第一军的第四十一师团及独立第九旅团已被抽调出去，4 月 29 日又奉命将步兵二个大队、山炮三个大队及工兵一个联队派往华中第十三军。因此，就必须使第一军隶属下各兵团的主力参加此次作战。然而，根据对伯工作及警备地区内的治安状况的变化，恐怕不得不考虑缩短作战的期限。

各兵团为准备此次作战，采取了如下的编制，在战术上加以革新，并且实行了准备训练。

(一)以步兵大队为单位，编成支队。

(二)各支队配属以中国人为主体的特务工作队(进攻时担负挺进和搜索任务，在支队转移分散部署之后，担负搜捕敌人首领、剔抉地下组织以及扫荡村庄内部等任务)，俘虏工作队(处理居民和俘虏以及收集、调查情报)，政治宣传工作队等，或由支队自行编成此等工作队。

(三)根据第一军的要求，第三十六师团的两个步兵联队，分别准备编成“特别挺进杀入队”(步兵第二百二十三联队以益子重雄中尉为队长，步兵第二百二十四联队以大川桃吉中尉为队长，由特别选拔的、改穿便衣的士兵约 100 名组成)。

(四)在第三十六师团关于作战准备的指示中，其编成装备有如下的规定:

1.参加作战部队的编制:

步兵联队:联络本部、步兵三个大队、步兵炮中队(由配备联队炮二门编成)、通信队(五号无线报机 5 台、小型无线报机 6 台、电线 20 盘、电话机 4 台、对空联络班 1 个)，均为乘马小队。

步兵大队:大队本部(对空联络班 1 个)、步兵三个中队(编制为 80 名时，分编成二个小队，各配有重掷弹筒 4 个、轻机 4 挺;编制为 90 名以上时，分成三个小队，各配有重掷弹筒 4 个，轻机 6 挺)、机枪中队(由重机 4 挺、大队炮 1 门编成)、作业小队(包括队长共约 20 名)、俘虏工作队(包括队长共 10 名，队长由下级军官担任，兵 4、中国人 5、翻译 1)、特务工作队(队长以下约 20 名，以宪兵下级军官为队长，用中国人编成，全员武装，使用常设人员)、挺进杀入队(临时编成)以及行囊被服等。

山炮兵大队:由大队本部、山炮二个中队(每一中队配备山炮 2 门，另装备步枪若干)编成。

2.参加作战部队的装备

弹药:以每种武器单个计算，步枪 120 发、轻机 1,000 发、重机 3,000 发、重掷弹筒 40 发、大队炮 60 发、四一式山炮 100 发、九四式山炮 100 发、除上述弹药外，步兵每人携带手榴弹 2 个，各大、中队配备必要的信号弹及发射烟雾筒。

粮秣:每人 4 天的粮食、每匹马 4 天的草料、行囊供 3 天用。

被服:身穿夏服、携带雨衣、便衣中队的便衣到潞安领取。

3.其他

步兵中队的行囊，由大队集中解决，中队行动时，经常不配备马匹，作战时不使用中国方面武装团体。因此，要从第二、第三大队抽调步兵一小队归联队直接调遣，留守警备兵力则由各中队四年老兵约20名、新增兵及教官、助教、助手及伤病号，锻炼兵(乙)班、各本部负责治安的军官等组成。

此外，各队应对作战企图极力保密，同时在石太路以北和京汉路以东地区进行侦察及肃正讨伐活动，设法欺骗敌人。

第一军于5月8日下达了第一期作战命令。

作战经过概要

第一期作战(5月15日—5月23日) 第三十六师团主力及第六十九师团的一部分兵力，对在东峪村及沁河河谷马壁村附近的共军，发动了突然袭击并进行了扫荡，但敌人巧妙逃脱了。第三十六师团19日返回，一面扫荡浊漳河河畔，一面转入下一期作战。第六十九师团的参加部队继续在沁河河畔地域进行扫荡作战(步兵第六十旅团长太田藤太郎少将指挥步兵三个大队进行扫荡，截至月底，取得了显著的战果。与此同时，第三十七师团原定在中条山脉东部地区进行讨伐，即“卜”号作战，但因对山西军作战而延期，改自26日实行)。

在此期间，独立混成第三、第四旅团及协同作战部队第一一0师团指挥下的独立混成第一、第八旅团，于18日以后逐渐开始行动，对涉县北方的共军根据地，从东面、北面构成了封锁线。第三十六师团也于23日进至其西面及南面，从而全军完成了对共军的包围圈。

第二期作战(5月24日—6月7日) 第一军对共军的中枢部以具有纵深面的包围形势开始进攻，摧毁敌集团战斗力之后，遂在封锁线内分散部署兵力，预定在大约 20 天内实行彻底的扫荡剔抉工作，但根据全面情况，缩短期限为 15 天。

23日第一军司令官岩松义雄中将向各兵团发出电报，督励嘉勉第一线官兵继续奋战。

24日晨，各兵团同时由各出发线开始进攻。从第一天开始，在各地与大大小小的敌人部队发生冲突，反复多次战斗，追击包围圈内的敌人。当时光冈明中佐指挥的第二十九独立飞行队，有效地协助搜素敌情和对地面攻击。25日第一军战斗司令部从太原进驻潞安，军参谋搭乘直接协助作战的飞机进行了现地指导。26日独立混成第三旅团正面的敌人继续进行顽强抵抗，而第三十六师团正面的敌人已被击溃四散逃跑。

27日各兵团转入分散部署，随后进行了扫荡剔抉工作。在此期间，第三十六师团的步兵第二百二十三联队(联队长高木正实大佐)于26日突入梁沟，摧毁中共最大的武器库，缴获了大量的各种武器及器材等。此外，步兵第二百二十四联队(联队长安达与助大佐)追击敌干部团，取得了相当战果。

从27日到29日各部队在各地俘虏或剔抉出100—200名敌人，逐渐扩大了战果。我军从空中对山里逃出的零星共军，散发了劝降传单。

自30日以后，各部队以挺进部队为先锋，进一步对敌中心根据地发动神速果敢的进攻，尽力剔抉、扫荡敌对分子，特别是搜捕敌干部、毁灭敌根据地设施以及收集敌人的物资。

这里值得特别提出的是益子挺进队的灵活战斗。挺进队接受的任务是:“深入敌后捕捉敌首脑(朱德、彭德怀、金永德、左权及刘伯承等)，如不得手时也

应搅乱敌指挥中枢、报告敌主力退却方向以及在敌人隐藏军需品之前发现其所在。”21 日，在主力进攻之前，先行潜入敌后，特别搜索驻在五军寺的共军第十八集团军军部。24 日黎明前，在郭家峪奇袭敌军军部，经过一场混战后，敌人被迫溃逃(以后判明在此次作战中，副军长彭德怀负伤，参谋长左权战死)。随后于 30 日晨，在天文村附近(拐儿镇东方 4 公里)袭击残敌并予以毁灭性的打击等，屡建战功。

当时，在第三十五师团防区正面的重庆第一战区军，对驻在黄河南岸霸王城的我师团桥头堡阵地反复进行攻击，同时为了与山西省内重庆军取得联系，以黄河北岸沁河西侧的温县中心地区为桥头堡，继续活动。师团于 6 月秘密调动步兵第二百二十、第二百二十一联队向沁西地区移动，3 日清晨急袭黄河北岸的敌人，并予以毁灭性的打击，随后在附近一带进行了彻底剔抉工作(即沁西地区肃正作战)。因此，黄河北岸的据点已被扫清，其与山西省内的联系也被切断，敌第一战区军只能派遣挺进纵队到我师团占据地区内进行扰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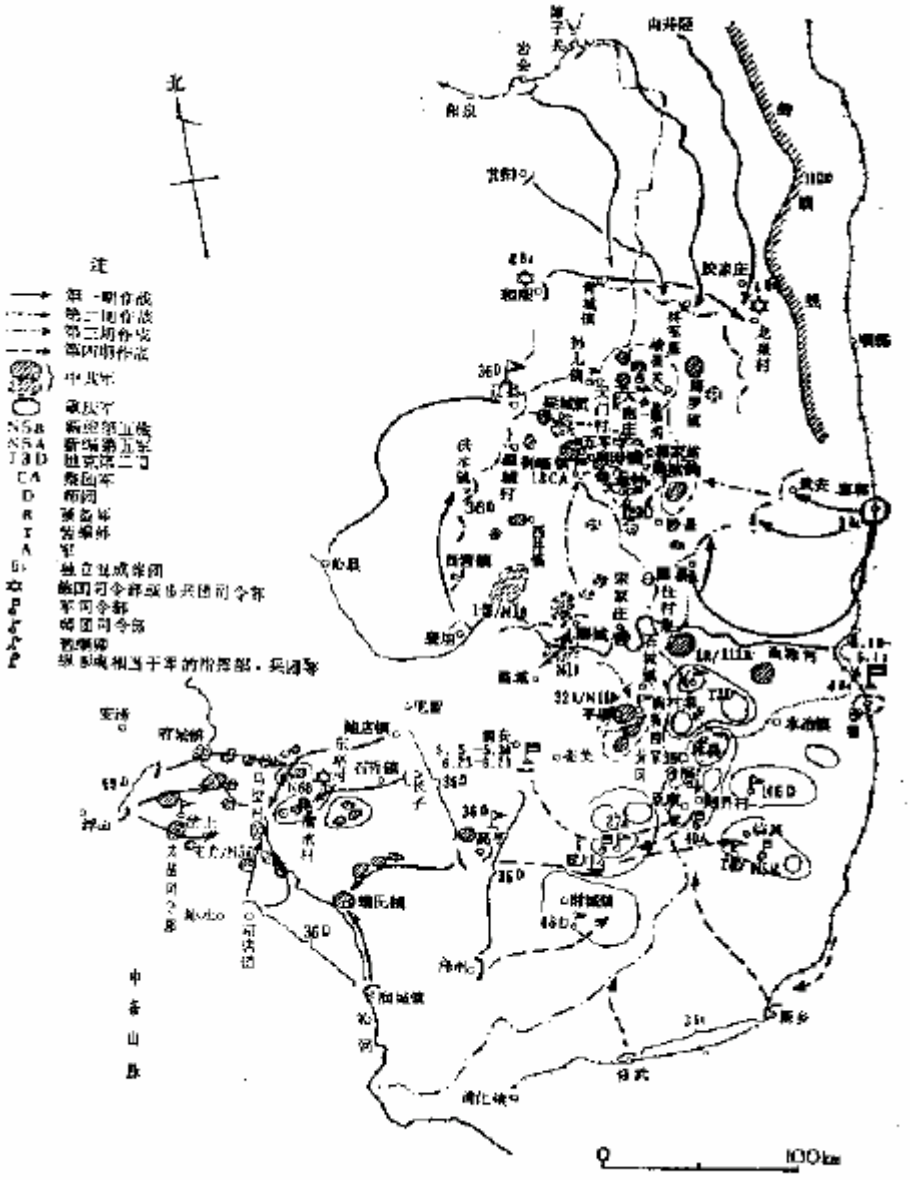


图 7.晋冀豫边区肃正作战经过要图
（1942年 5 月 15 日 — 7 月 20 日）

第三期作战(6月8日—6月19日) 第一军决定暂缓对山西军作战，先行击灭浊漳河南方的共军，乃于5月13日向各兵团下达了准备作战的命令。此次作战的设想是。命令第三十六师团从西方、独立混成第三旅团从东北方、并以独立混成第四旅团的一部分兵力从东南方对平顺东方省境附近的共军构成封锁线，由6月10日逐步开始进攻。同时，并准备调独立混成第四旅团的主力攻击林县附近的重庆军第四十军等。(变更为攻击第四十军计划的理由是，因为它妨碍击灭共军的作战，又据判断当时敌军的士气低落，正是击灭它的好机会，同时给第四旅团以立功机会。)

7日夜各兵团开始行动，10日发动进攻，当天在彰德设置了军战斗司令部。

第三十六师团攻击平顺附近的共军，独立混成第三旅团攻击任村集附近的共军，并分别追击包围圈内的敌人，取得了相当的战果。然而独立混成第四旅团主力虽然击破了林县、姚村集的重庆系敌部队，但敌暂编第三师凭借崔底(林县西北约12公里)附近天险，设置复郭阵地，坚持顽强抵抗。

旅团从13日奋力攻击，第三十六师团也派出一部分兵力(步兵第二百二十四联队第三大队长柿昇少佐指挥的部队)协助作战，15日占领该地，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其中独立步兵第十三大队(大队长安尾正纲中佐)的山本中队(中队长山本好江大尉)通过巧妙勇敢的工作，俘虏包括敌师长在内的多数敌人。

随后旅团返转回来对林县南方地区发动了进攻，排除敌人的抵抗，18日占领了原康村盆地。第四十军主力似有向南方及陵川方向退避的模样。

第一军依然在作战地区内对敌对分子进行剔抉扫荡，并继续摧毁根据地设施，同时接受第三十六师团的强烈要求，决定歼灭陵川附近的重庆军第二十七军。第一军于6月15日发布关于准备下一期作战的命令。

第四期作战(6月20日—7月20日) 独立混成第四旅团于20日从原康盆地出发，独立混成第三旅团于22日从新乡和修武北侧地区出发，分别向省境线挺进。第三十六师团在泽州、高平、潞安部署了作战准备之后，24日向第二十七军主力开始了攻击。因敌人迅速撤退，师团立即追击，第三十六师团和独立混成第三旅团进至临琪附近，独立混成第四旅团追击第二十七军军部，进入陵川附近。

第一军于7月上旬，命独立混成第三、第四旅团先后返回原驻地。同时，第三十六师团至7月20日以前继续扫荡残敌、摧毁根据地设施。

步兵第二百二十三联队在继续扫荡原康盆地的残敌过程中，从30日到7月2日之间，猛攻则界村的敌复郭据点，遇到敌人极其顽强的抵抗，付出很大损失后占领了该地。

注:第一军通过多次肃正作战，取得了大的成果，特别是摧毁了大量的军事设施和军需品，打击了正在重建中的中共第十八集团军。然而在方法上，尚有需要检查批判之处。如军的统帅过于武断，对于与作战密切相关的治安工作及掌握民心方面缺乏办法。此外，对部队进行了不适合第一线实际情况的不合理的指挥，追求表面上的武功战果，讨伐易于捕捉的重庆军残部，而对于第十八集团军虽摧毁其根据地，使之陷入极端的困境，但未能制其死命。因此，削弱了阻止中共势力南进的重庆军，反而让中共坐收渔翁之利。

山东方面的作战

第二次鲁东作战(S号作战)(3月25日—4月15日) 山东半岛东部地区及

海岸地带的共军和蒋系游击队的势力尚未壮大，但从年初以来渐趋活跃。遵照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的计划，第十二军在当地海军部队的配合下，对上述敌军进行围剿。为此，于2月底前后进行了各项作战准备工作。

当时担任该广大地域的警备任务的是独立步兵第十九大队。

3月25日第十二军派出独立混成第五旅团(旅团长内田银之助少将)、独立混成第六旅团(旅团长盘井虎次郎少将)开始了扫荡作战。两旅团主力奉命迅速东进，击败了驻锯齿牙山、青山及招远根据地顽强抵抗的共军，于月底占领了该根据地。(以上为第一期作战)

尔后，到4月中旬为止，摧毁该根据地的设施，扫荡残敌。另一方面，在半岛东部地区，与当地警备队、海军部队相配合，扫荡了威海卫、文登及石岛附近的敌军。(第二期作战)

但是，由于地域广阔，不能给敌人以彻底的打击，日军撤走时，敌人又开始了活动。因此，独立混成第五旅团于5月21日开始以大约一周期间，又于7月7日以大约一周期间对鲁东中部共军进行了围剿。

除上述之外，由于共军山东纵队力图在各地扩大势力，独立混成第六旅团于6月上旬对鲁北(黄河河口)地区进行了扫荡，第五十九师团(新编)也于6月初对新泰、莱芜东方山区(济南东南方约100公里)、随后从6月8日到12日对馆陶(济南西方约150公里)附近进行了扫荡。

注:锯齿牙山名副其实，是海拔千米以上的险峻山脉，正在建设指挥联络部、武器工厂、军需品仓库及医院等，将来是中共胶东军区最大的据点。

第三次鲁中作战(は号作战)(8月12日—8月15日) 鲁苏战区总司令于学忠指挥的蒋系军盘据在山东省中部高山地带，经常受到日军的讨伐，并常常遭到共军的蚕食，不断发生部队投降日本方面的事件，其势力逐渐衰退。

第十二军在结束冀南作战之前，调出一部分兵力，从5月中旬开始对益都、沂水道东侧地区的于军发动了攻势(あ号作战)。于军遭受打击，日益陷于困境，加以共军的策动，于8月3日突然爆发了兵变。怀有不满情绪的第一一一师包围了于学忠司令部。于学忠冒险突围后，于5日夜将叛变部队镇压下去。

第十二军为了乘于军内部分裂之机捕捉于学忠，调独立混成第五、第六旅团(旅团长奥村半二少将)发动了鲁中作战。两旅团于8月12日晚开始秘密快速前进，预定13日黎明前构成以坪头(莒县东方约30公里)为中心的半径数公里的包围网。但是，由干南部包围部认的行动迟缓，于学忠终于逃脱。我军立即对坪头南方地区实行了扫荡剔抉工作，虽予以重大的精神打击，但并未达到作战目的。

其后，我军进一步对于学忠的行动进行了侦察，8月20日开始了第四次鲁中作战(れ号作战，直到30日)。21日于唐王山(沂水东北约50公里)附近击败于军主力，搜索其司令部并进行了追击。在此次作战中，俘虏包括于军高级参谋在内达733名、遗尸1,861具。于学忠再次脱出，证实于学忠负了重伤。

独立步兵第二十大队长田副正信大佐，曾担任诸城、莒县、日照地区警备，并参加过山东各地的讨伐作战，就其亲身体验叙述如下:

一、1942年是蒋系军势力减弱，中共军逐渐积蓄势力的时期。于学忠的司令部受到攻击，几乎被俘，在我军松一口气的时候，终于跑掉。蒋系匪军动摇甚大，4月有莫正民匪1,470名投降，6月有张步云匪3,000名、9月有张希贤匪、李永平匪要求投降。由于经费关系，难以接受，但从治安工作来考虑，又不能置之不顾，是一个困难的问题;

二、共军固守在山岳偏僻地区的根据地，对日军不强行抵抗，而与蒋系军为争夺地盘

进行着激烈斗争。其宣传工作极为巧妙，将非武装的居民培养成自己人，用以进行联络监视、收集情报等军事行动的辅助工作，不断地扩大其潜在势力。

三、由东省的山区，多为岩石秃山，在山顶上以前就筑有岗楼、石墙，敌人利用作为营寨，为我讨伐行动造成困难。

四、我大队官兵现役兵少，因此特别注意维持军纪，消除“三恶”，同时由于是进行特殊的对匪作战法，采取了边作战边教育的方法，以期提高训练效果。

蒙疆方面的作战及警备

中共势力对于蒙疆地区，是从山西省晋西北军区北上向阴山山脉内渗透;肖克指挥下的北上挺进军继续深入察南、热河、河北省境的山区地带。

方面军为策应第二十七师团对冀东的作战，以独立混成第二旅团为主力，并以第二十六师团、独立混成第十五旅团的一部分兵力，从 7 月上旬以来，继续扫荡平北共军十二分区(龙门、赤城、延庆、昌平、怀来)，摧毁其根据地，作战至 8 月底结束。(平北肃正作战)

此外，驻蒙军以第二十六师团主力及骑兵集团的一部分兵力，从 7 月底以来，讨伐在厚和东北阴山山脉地区内活动的绥远游击队，并在该地区进行肃正工作，至 9 月 2 日结束(ガ号作战)。在此期间，骑兵集团主力渡过黄河向鄂尔多斯平原进攻，击败重庆第八战区新编第三十二师，制止其活动(6 月 5 日—10 日)。

平鲁地区的治安战 历来蒙疆地区在表面上看来，较华北其他方面的治安情况良好，并曾多次从这里抽调兵力到华北和华中方面作战。但是在这个地域内担任警备的各部队，并不是那么轻松，终日无休止地讨伐，同时还得煞费苦心进行肃正建设。

大青山的中共游击队 阴山山脉地区的讨伐也极为困难。在该地带曾追击过马占山，结果功亏一篑被他跑掉(马占山于满洲事变后，逃窜到黄河南岸鄂尔多斯建立起根据地，依附于重庆方面，企图伺机东山再起，并于 1938 年 4 月破坏京包线之后遁入阴山山脉地区。第二十六师团击败马占山，继续追击，企图割下马占山的首级，虽然歼灭其警卫连，但未能捉到马占山)。由于地域广阔，多属未开垦地，难得捉住敌人的机会。

另一方面，共军在该地的处境也极为困难。从下述记录中可以想见其艰苦的情况:

大青山(西部阴山山脉)地区是一片宽广无际人烟稀少的大草原，但敌人据点并不稀疏。飞机到处都可以降落，汽车能随意通过，骑兵更可任意行动。因此，使我军时刻都处于战备状态。在反“扫荡”期问，我军骑兵队不分昼夜行军和战斗。有的营半年不能脱衣睡觉。而且有的政委率领少数部队进行游击。连续十二小时没有下过马。骑士们提出口号是“马不离鞍，人术离枪”。我们移动的范围非常广泛，一夜之间行走一百多里，迂回一大圈出没于各处。因村庄稀少，有时需在山上露营，并且必须在大雨或大雪中继续行军和战斗，其艰难辛苦的程度，是一般人无法想象的。但大青山骑兵支队一天天扩大起来，使敌人感到越发难以对付。

骑上们非常熟悉这里的地形及道路，所以不需要群众当向导。这在沙漠作战中特别重要。支队副政治委员宇达志同志由乌兰花到晋西北的偏关地区，来回走过几次，从未迷过路。

1942 年 7 月的反“扫荡”，是最艰苦的战斗。敌人以绝对优势的兵力前来进攻，高原的战况变化很快，敌人又不断移动，反复进行攻击。烧红的枪膛未凉就又开始了下一次的战斗。但是，骑兵并未受到一点损失。

到了第七天战斗打响时，人困马乏疲惫不堪，但骑兵队的行动仍很敏捷。这一天敌人合围了三层严密的封锁线，他们在高地上构筑阵地张开了大网。在天明的同时，敌人骑兵踏入刚刚成熟的绿色田野，身穿便衣的特务对各村一户不漏地搜索，群众东奔西逃。打破高原早晨的寂静，使这里立即陷于一片骚动混乱之中。

骑兵做好了绵密的突破包围计划，暗暗地钻出包围网的空隙，一阵暴风雨般的马蹄响声过后，骑兵们向地平线上的铁路线猛冲过去，铁道守备队大吃一惊，说是“八路从山上跳下来的，从天降下来的”。敌人虽出动石黑部队(独立步兵第十三联队)，但山上连骑兵队的影子也看不到。汉奸及斥候还在搜索期间，骑兵早已在雨中连续十四小时夜行军，避开敌人的耳目撤走了。不久，敌人察觉到骑兵的下落，围攻过来，骑兵又从山上不翼而飞到山下去了。敌人用汽车追来时，骑兵又回到山上，成为马和汽车展开捉迷藏的战斗。

骑兵队在这样艰苦的清况下茁壮地成长起来，最后被削弱的不是骑兵队而是敌人。(以上按日文译出，未与中文原文核对。—译注)

夏季占领地区内治安概况及肃正建设的成果

—中共方面的政治攻势

占领地区内各种设施所受到的匪害(主要是中共游击队及特务工作人员进行的破坏和袭击等)，由于春季实行了肃正作战及彻底的剔抉讨伐，进入夏季以来便显著的减少。6 月份的匪害为 420 件，7 月份减少到 322 件。而 8 月份的匪害件数增加到 583 件，但各次事件的规模很小，只限于局部地区的活动而已。9 月又减少到 484 件，并略呈消沉状态。

根据方面军得到的情报，这是由于中共方面改变了战术的缘故。中共指令自“七七”事变纪念日起，以两个月期间展开政治攻势，将工作重点置于对中国新政府的武装团体及治安区、准治安地区民众的宣传。因此，虽仍采取历来破坏交通线以及利用小股部队进行袭击的方式，但以所谓“对伪军、伪组织工作”，对新政府军警小据点进行频繁的谋略袭击，暗杀亲日要人，毁谤和胁迫下级官吏，以及利用反战团体对日军官民和朝鲜人进行思想谋略等，这是从未曾有的特殊情况。此外，“平原地区的重建工作”也因秋收迫近，正在极其顽固地进行活动。

针对以上各种动向，华北方面军做出判断:“对于中共的反攻准备工作和牵制阻止日苏开战的企图，以及处心积虑要打开现状的策动，仍需要加以戒备。”

如上所述，夏季中共方面的军事行动不甚活跃，在另一方面却显示了我方肃正建设的进展。9 月 30 日华北方面军参谋长也以“华北军第二、四半期(第二季度)”为题发表了以下谈话:

第一，四半期(第一季度)方面军的肃正作战，是以河北省及其附近地域为重点，展开全华北从未曾有的彻底的歼灭战，进行了一次治安肃正总演习。在本期内，一方面继续积极作战，一方面大力扩大治安圈并加以巩固。由于采取适当的措施和高粱茂盛期的攻势作战，彻底粉碎了敌人的企图，取得了很大的战果。

本期的交战次数为 3,180 次(与前一年同期相比减少 1,843 次)，交战敌兵力 429,119 人(与前一年同期相比减少 40,220 人)，敌遗尸 113,861 具，俘虏 16,158 人(下略)。

交战敌兵力和战果的比率都有提高，特别是投降兵颇多，达 7,967 人，达到去年同期的二倍。

(上面的数字是重庆军和共军的总数，其中关于中共军的数字不详)

此次肃正作战得到民众的协作，进展颇为顺利，敌战斗力显著下降。

另一方面，华北治安圈的扩大和巩固工作正在稳步进展，由于协助作战的农民作出牺牲，提供义务劳动，在治安地区和非治安地区中间挖掘的隔断壕，总长达 11,860 公里，而且封锁敌匪活动的碉堡阵地超过 7,700 个，华北治安圈逐渐扩大起来。

方面军将确保治安作为根本问题，特别重视粮食及物价问题。本年度的小麦生产，虽然能保持常年的收成，但尚不能指望粮食自给，仍需输入南方大米或由日满两国予以补充。物价对策方面，也逐渐调整机构，其它措施也均顺利进行，但更重要的问题在于进一步加强力量贯彻实行。

注:华北方面军对中共方面从 7 月开始的“政治攻势”有过于轻视之嫌。后来方面军纠正了此种认识，注意观察中共的抗战方针、策略，在制定 1944 年的“剿共方针”(方面军参谋部制定)中，曾有如下判断。(摘要)

中共军事力量的弱点，表现在不能大规模生产军需品，装备低劣，训练不足以及缺乏干部。而其游击战术，是以长期消耗战为目的的消极战术，是不能与我军正式作战的战术。近几年来，我军对敌根据地进行歼灭性的讨伐，共军除保卫根据地活动之外，不容其采取大规模行动。

中共的特点是以卓越的政治工作、民众动员工作弥补其军事上的弱点，并以其拿手的政治工作对我方进行策动。

中共的政治攻势，从 1942 年以后迄今，特别是从 1942 年夏季前后对我方的政治攻势逐渐活跃起来。从冬季出现了配合政治工作的新式的小规模袭击事件。同时积极开展三风运动及精兵简政工作，进行内部的改编和改革，以及开始总反攻的准备工作及宣传工作。

中共的反攻，决不是以军事为重点，而是采用政治谋略进行工作，以离间瓦解敌对政权和民众，到一定时期，使之从我方阵营内部起义，从外部则以中共兵力响应，以期采用中国自古以来的里应外合战术。

第三章 1942年度下半年的治安肃正情况

一、整个形势的急剧变化与五号作战的准备工作

大本营及中国派遣军的作战准备工作

—从设想四川作战到准备工作的中止

在南方，5月7日攻克了喀雷西多尔要塞。在缅甸方面，到10日为止基本上也占领了全部主要地区，5月18日南方军已完成了既定的攻略作战。

但是，在这以前,4月18日美机首次空袭东京，给日本的战争及作战指导带来了很大影响。就是说，增加了对一系列问题的关心，诸如对国土的防空，对苏联的警戒战备，使用陆军兵力参加南方作战占领区外围主要地区的攻略作战，以及摧毁被利用于空袭日本本土的中国大陆空军基地(即浙赣作战)和进攻四川的作战等。

中央统帅部已看出，按当时的形势发展下去，不可能解决中国事变。但又迫切希望无论如何也要在大东亚战争结束之前，迅速使之得到解决。陆军上层人物很想把攻占重庆做为确立日本不败体制和促进结束战争的手段，但中坚阶层对这一想法则较慎重，并对其效果抱怀疑态度。在中国派遣军中，除总司令官之外，似乎也都不太热心。只有华北方面军从过去就在研究对重庆压迫作战，一有机会就与中央联系，建议进行西安作战。

注:烟总司令官的积极态度是认为“用国民政府与重庆政权真正合作的办法来实现全面和平是不可能的。除采取政治、军事上的攻势外，没有其它解决事变的途径。”

参谋本部第一部部长田中新一中将，在研究各种处理事变的方案后，认为“如听任重庆政权继续存在下去，由于美国的强力支援，恐将造成全中国的游击化，促进以中国内地和印度为基地的空中、陆地反攻的准备工作，以及抗日赤化工作在整个中国全面开展。因此，在确保占领地区的工作中，必须将确保适应长期战的资源地区放在第一位。进而有必要重新检讨对付美中联合作战的政策战略要点，以及确保重要交通线、航空、潜艇基地等问题。不能听任敌人战斗力的增强，必须以积极的武力行动做为主要对策。”

5月16日田边参谋次长来南京，通知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考虑在9月左右开始实行西安作战，然后根据情况于明年4月进行四川作战。希望在6月底以前制订出西安作战计划”。派遣军总司令官命令华北方面军进行此项研究工作。方面军于6月15日将过去的计划加以修正制订出该作战方案，由安达参谋长带往南京呈报。当天在总司令部进行探讨后，派遣军与方面军的有关人员立即前往东京，在参谋本部共同研究直到20日为止。

此后虽然中央统帅部、当地军方继续对作战计划进行了研究，但中央统帅部却迟迟下不了决心。这是因为不但要考虑进行此项作战对国家机动力量的影响和对作战效果的怀疑，而且有必要对内外各方面的形势做更进一步的观察和探讨。

在此期间，形势继续急速变化。经过 5 月 7 日的珊瑚海海战、6 月 5 日的中途岛海战，日本海军在太平洋方面的攻势已处于停滞状态。在陆军方面，正按照年度计划致力于部队的调整、充实北方战备、加强南方主要地区防卫力量等工作，以期确立长期不败的战略体制。但因德、意两国在北非的战况有所好转，日本又产生了日、德、意合作促使英国屈服的希望。因此，陆海军都很关心印度洋方面的作战情况，从 6 月下旬开始，对四川作战的研究工作也显示出很大热情。

7 月 9 日参谋总部起草了“五十一号作战(四川作战)准备纲要”，在陆海军部之间继续进行了研究，但在物资供应、对苏战备问题上仍得不到解决，同时，对作战效果、影响等问题也存在各种不同意见。

正当此时，美军于 8 月 7 日突然袭击了瓜达尔卡纳尔岛，开始了反攻。参谋本部也逐渐重视起这方面的战况，并不得不考虑在这种形势的重大影响下能否进行四川作战的问题，但是对此形势未必具有充分的认识。

8 月 25 日，向天皇上奏起草的“根据目前形势陆军方面的作战准备”的文件中认为:

“鉴于 1943 年下半年以后英美，尤其是美军的战斗力将有明显增强，在考虑必须在此以前力争以积极的作战行动达到战争目的时，1943 年陆军作战在条件允许情况下，要以对华积极作战为指导战争的最大目标。”

“对华积极作战的设想”，其内容大致如下。

本作战的目的在于消灭敌中央军的主力，占领四川省的主要地区，摧毁敌方抗战根据地，以促使重庆政权屈服或崩溃。为此，中国派遣军以主力从西安方面，以另一部分兵力从宜昌方面向四川平地进攻，消灭敌中央军，攻占重庆及四川省主要地区。在此期间，应以最小限度的兵力确保已占领地区的安全。同时，应使武力作战与对重庆的政治谋略工作紧密地联系起来。

基于上述方针，应在 1943 年春由一个方面军(以十二个师团、两个混成旅团为基干)从山西南部，另以一个军(以五个师团为基干)从宜昌方面开始进攻，各自击破当前之敌。方面军应确保西安平原地区并前进到广元(西安西南约 350 公里)附近，从宜昌方面出击的部队应前进到万县(宜昌西方约 300 公里)南北一线，各自做好以后作战的准备。根据形势的发展再发动攻势攻占重庆和成都，占领四川省主要地区。

在上述作战期间应以十五个师团、十四个混成旅团担任确保已占领地区的安全，并在必要的方面牵制敌军以利于进攻作战。

本作战使用的兵力以中国派造军为主，并从国内、满洲及南方抽调部分兵力增强编制。

8 月 24 日至 26 日，参谋本部与中国派遣军、关东军的有关参谋对上述设想的详细计划，作战准备，特别是有关航空、兵站问题共同进行了研究。

与准备工作的情况相反，在此期间整个形势日益恶化，尤其是索罗门方面战况的激化，物资供应、船只等问题，逐渐成为中央统帅部的沉重压力，因而减少了决心作战的可能性。但统帅部仍考虑到实行作战时的需要，决定先开始部分作战准备工作。9 月 4 日向派遣军总参谋长河边正三中将下达了大陆指第一千二百五十二号“五号作战(8 月 30 日将四川作战改称五号作战—译注)准备纲要”(摘录)

一、为了尽快解决中国事变，预定实行五号作战。目前先着手可能进行的作战准备工作。

二、自 1942 年 9 月着手进行本作战的部分准备工作。根据当年秋季前后的形势再决定是否实行上述作战。

如果实行上述作战，将在完成正式的准备工作之后，预期于 1943 年春季以后发动作战。

中国派遣军烟总司令官在听取河边总参谋长有关上述总长指示的报告后，在其日记中有以下记载:

虽尚需进一步观察国际形势发展，方能决定是否在 10 月下旬进攻重庆，但派遣军应指定专人立即着手进行必要的准备工作，有关指令已经发出。四川作战乃是最后的手段，能否实行目前各占一半。(烟日记)

派遣军在 9 月 9 日召开了方面军和军的参谋长会议，下达了进行五号作战准备工作的命令，力求积极进行准备。

大本营继上述指示之后，9 月 7 日、14 日又连续采取了从南方调给中国派遣军一部分兵力和拨给一部分军需品的措施。但瓜岛的战况日益恶化，9 月中旬川口支队进攻失败，更使大本营感到忧虑，而北非的形势也无进展，印度洋、西亚方面的前途也开始趋于暗淡。22 日大本营指示延缓拨交五号作战所用的军需品。10 月 20 日又发出大命(大本营命令一译注)将五十一师团(第二十三军)调归第十七军。10 月下旬第二师团对瓜岛机场的誓死攻击也终于失败，北非埃及的阿拉曼以及苏联斯大林格勒的战况也出现了对德军不利的形势。

大本营于 10 月底决定，首先针对当前战争局势。将作战焦点置于南太平洋方面，务求达到速战、速胜，并以此为重点。这是因为认识到这方面作战如何演变，将会决定战争胜败。I1 月 7 日联络会议决定的“世界形势分析”结论中谈到，“目前敌我战争形势的进展虽尚有利于轴心国家方面，但 1943 年下半年以后，敌我在物资上的国力悬殊将会增大”，“帝国必须在这一两年内排除万难，确立起自强不败的政略战略体制”，“与德、意两国协力，尽可能采取积极的制敌手段，随时随地消灭敌方的战斗力”，使英美丧失战斗意志，以达到我方的战争目的。

中国派遣军自从 10 月 11 日接到调出第五十一师团的秘令后，即觉察到五号作战已无希望。11 月 4 日又接到参谋本部提出在 1943 年中止五号作战的意见，7 日又接到以下通知:

(一)对中国事变的处理问题正在从根本上重新进行研究;

(二)今后对华作战在于确立最小限度的地面上及航空战略上的优势地位;

(三)还要抽调、转调、改编驻华兵力。

然而东南太平洋方面的战况更加激化，11 月 26 日又收到将第六师团转属第八方面军的命令，12 月 10 日接到“中止五号作战准备工作”大陆指第一千三百六十七号的指示。并得到通知:“五号作战的准备工作在 1943 年间中止进行。其它进攻性作战，在判明南方形势以前也应暂停。”

中国派遣军在 12 月 17 日召开了方面军及军司令官会议，下达了有关中止进行五号作战准备工作的命令，并明确指示各军应以加强治安、压迫当面之敌、确保占领地区做为主要任务。

如上所述，陆军统帅部，中国派遣军非常向往并决心推行的四川作战准备工作终于停止，中国方面战区又形成了全区持久战的局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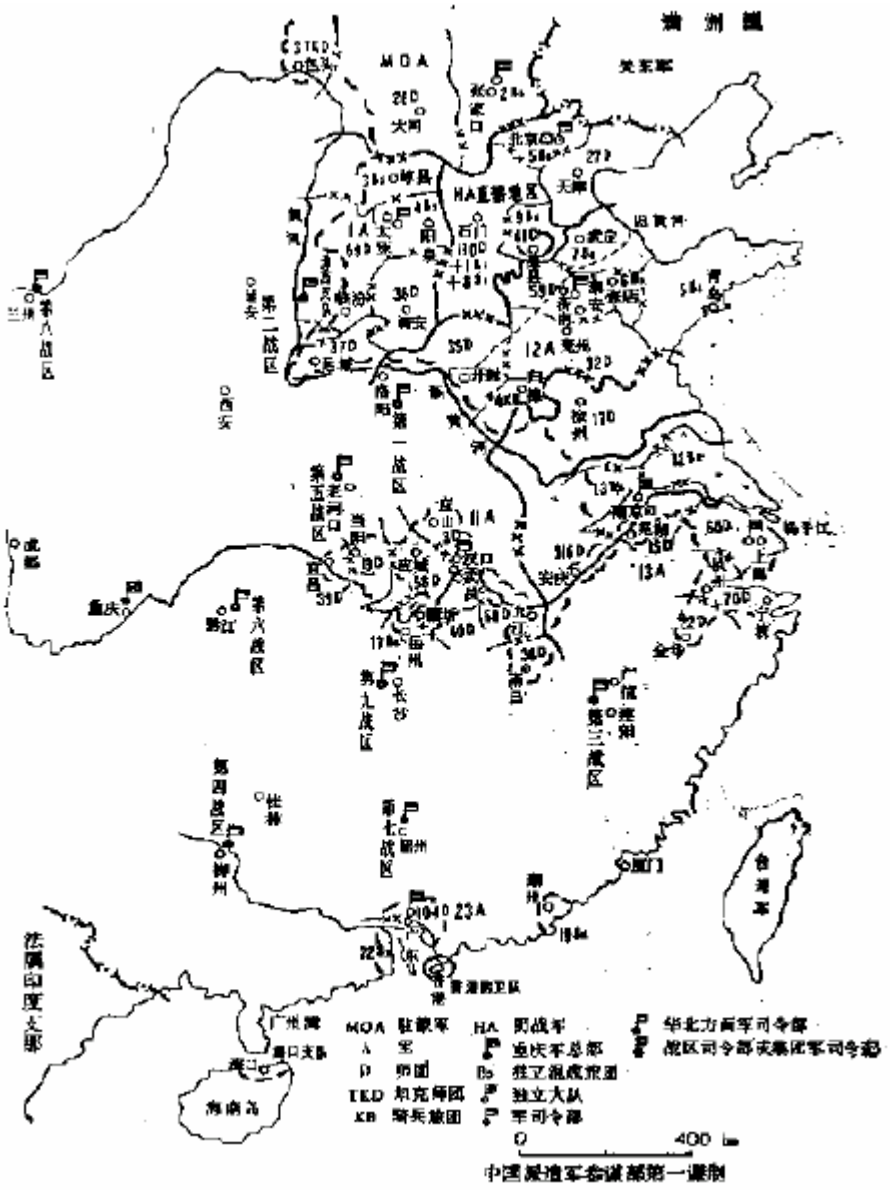


图8.中国派遣军形势图（1942年末当时）

二、华北方面敌情概况

重庆军概况

重庆政权所属陆军在9月份的兵力为步兵106个军299个师、骑兵6个军16个师，以及其他27个独立旅，共计约有500万人，这些兵力配备于11个战区等地担当防卫任务。在华北战场上，除在第一(29个师)、第二(24个师)、第八(45个师)、苏鲁(9个师)、冀察(7个师)各战区以及苏鲁豫皖边区(8个师)配置有正规军外，还拥有约20万人的游击队。其指导方针及要领如下:

作战方针

加强河防工事(黄河)确保目前防线，同时做好以后进行反攻的准备工作，并力求随时

进入沦陷区袭击敌人，破坏敌人后方设施。

作战要领

一、设置强大的第二线兵团，积极进行整编训练，准备反攻。

二、保持和扩充游击兵力，不断扰乱敌军，破坏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设施。

三、加强对皖北、豫西、豫西北及晋东南的控制。

四、固守太行山脉，吕梁山脉的各个主要地点。

根据重庆中央的指导方针和作战要领，华北各战区除不断努力加固阵地以防我军进攻、并侦察我方军情外，主要是从事整训，未发现显著的军事活动。据“方面军战时月报资料”记载其详情如下:

在第一战区霸王城前面之敌，除于9月17日至23日对我方阵地及渡河训练场进行了较为频繁的炮击外，正专心致力于整训和河防工作。第二战区依然被困于我方的严密封锁之中，正在积极收集粮食。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8月和9月期间停留于迪化(乌鲁木齐)，似与重庆玫府的新疆省中央化工作有密切关系，企图对西北地区推进军事行动。蒙疆的傅作义军虽未发现有特别的活动，但恐有与外蒙联系的企图，故需要加以注意。自 5 月份以来即准备再建的第十战区(陕西南部)，似已于 8 月间建成，并以蒋介石为长官、胡宗南为副长官，该战区与重庆的西北工作有直接的关系，同时也可看做是加强关中地区，以防备我军进攻作战的对策。此外，胡宗南军似已被指定为针对延安的防共部队。随着第八战区力量的向西北进展，第十战区似也有逐渐向西伸展的迹象，范汉杰部的第三十八集团军军部也于7月下旬移驻到解宁(西安西北约450公里)。

苏鲁战区由于8月兵变及我第十三军的鲁中作战，受到沉重打击。此后一直忙于整编，但因丧失了大量高级干部以及与共军之间的不断摩擦，日益趋向衰落。

注:第十三战区组建的结果，并未设置新战区，而自 1943 年 1 月起，将陕西南部地区编入第一战区，第八战区则向西北方面扩大了其所担任的地区。

此时，西北问题已被日益重视。在华北方面军编制的资料中有如下叙述:

中国的西北，是包括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五个地方的总称，与蒙古、苏联的中亚部分领土、阿富汗、西藏、印度等相接壤。

总面积为165万平方公里，在中国各省中，所占面积最大，但据说人口只有350万~400万人。方面军不仅是对重庆，尤其是从对苏联，中共的角度出发，对西北问题也深为关心。

随着中国事变的爆发，开辟了经由成都一兰州一哈密一乌鲁木齐通往苏联的所谓西北通道。但与南方的通道相比，运进的援蒋物资不多，德、苏开战后，更加减少，逐渐失去了作用。及至1942年5月，日军切断了滇缅公路，同时由于盟国方面重视欧洲的战略，形势发生了变化。

重庆政府急急忙忙想要开辟中印新通道(天山南路)，同时重视西北通道，而努力对之加强维护，为的是在继续抗战中、不单纯依靠外援，尽快确立自力抗战的体制，将西北建设成中央化的基地。也就是想要大大改变西北过去单纯充当输血路线的面貌。

因比，西北工作当前的重点是以武力为后盾的政治力量的渗透，发展经济，尤其是开采石油、钨等矿产。此外，为了确保输血路线，加强维护过去的西北通道和开辟中印空运新路线。

然而，该地区在民族、宗教方而存在着很多问题，而且政治势力的情况从来就很复杂:陕西南部、甘肃省属于重庆势力范圈;陕西北部和甘肃、宁夏的一部分属于中共势力范围;甘肃、青海的部分地区属于回教徒势力范围;新疆则处于苏联势力之下。因此。重庆政府首先开展了西北中央化工作。

从 4 月中旬前后，开始了政府要人对西北的视察，5 月至 7 月，使西北通道上的回民军队移驻青海方面，而使中央军进驻西北通道沿线，以确保该路。同时，随着苏军从新疆省的撤退，使中央军第四十八师进驻乌鲁木齐。5 月下旬，在西安召开的军事会议和第十战区的设置，可能都是与此关连的确立军事基础的措施。值得注意的是，有情报说进入 8 月份以后，在兰州设置了航空设施，9 月间更证实了在兰州、西安经常驻有飞机。估计将来会进一步增强，并将有部分英美空军进驻该地。此外，在新疆省伊宁设有空军教导队，正在训练重轰炸机组人员。

蒋介石偕宋美龄及其他要人，直 8 月以来，以一个多月的时间视察了西北地区，发表谈话称:“对西北各省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的发达很为感动，并对正在努力实现中央的计划(农工用地、测量、造林、户口调查、实行联保制等)表示满意。”

参考:

围绕新疆省的中苏关系，在蒋介石的回忆录中有以下叙述:“苏联在 1933 年拥立盛世才，开始了对新疆的侵略，1938 年派遣正规军确立军事控制。1941 年 4 月，为了进一步加强政治、经济方面的控制，又准备推翻盛世才建立傀儡政权。同年 8 月我巡视了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各省，并派宋美龄、朱绍良前往迪化与盛世才协商维护领土主权、政权归还中央等问题。结果，盛世才也接受了中央的命令，表示服从。苏联在这以后仍迟迟不肯撤兵。中央军是在 1943 年 6 月进驻哈密的。”(以上仅按日文译出未与中文资料核对。—译注)

中共及共军的状况

中共及共军自 1942 年“七七”事变五周年纪念日以来，开展了政治攻势，活动稍显活跃，至 9 月上旬大致似已结束。政治谋略、袭击事件逐渐减少。然而，最近在日军占领区内的宣传活动非常活跃，尤其是逐渐加强了针对日本军官兵、日本人、朝鲜人的宣传活动，这是值得注意的新动向。除上述情况外，方面军观察到的有关 9 月间中共及共军的动向，在 10 月 20 日的战时月报资料中叙述如下:

中共失去了平原根据地，现秋收季节迫近，深感困难。因此，不难想象，为了打开局面，今后将会进行顽强的策动，企图发动第二次百团大战，力求重建中共北方局的平原根据地，以牵制阻止日苏开战。由于存在着不少迫使共军采取行动的因素，因而对共今后的动向仍然需要加以警戒。

一、晋察冀边区 中共失去冀中根据地后，又值秋收季节临近，局势更加困难。这时中共北方局发表了彭德怀建议的“关于坚持平原根据地问题”的讨论事项，力图重建平原根据地。在冀东方面，由于原田兵团(第二十七师团)开展的终期一号作战，敌完全放弃抵抗，一味转移。冀西方面，也因受毛利兵团(独立混成第三旅团)的打击，活动极为消极。

二、晋冀鲁豫边区 冀南军区虽力争重建平原根据地，但因中旬遭到阿部(第四十一师团)、林(第一百一十师团)两兵团的再次扫荡，未见有大的活动。中条、太岳两军区的情况也无变化。

三、山东共军 该共军与于学忠军继续发生摩擦，正在于军内部极力发展其势力。鲁西共军游击第三旅在下旬仁集团(第十二军)的“リ”号第一期作战中受到了毁灭性打击。

四、晋绥陕甘宁边区 在政治攻势结束期，中共连续以第十八集团军政治部及觉醒同盟的名义，命令开展对日军官兵和日本人进行反战、厌战、逃亡等引诱鼓励的宣传，并指

示收集日本内地报纸、信件，或进行日军虐待残杀俘虏的宣传等工作。中共缺乏武力活动的实力，而使其宣传战活跃起来，对于此种动向，尤其是对日军宣传方法的新趋势，今后必须加以警戒。

参考:

关于对日本军的宣传工作 曾在延安从事对日宣传工作的野坂参三对当时的情况叙述如下:

我以日本共产党代表的身分在苏联从事了九年的第三国际的工作后,1940 年 4 月秘密进入延安。以后到 1945 年 9 月为止，我对日军进行反战和平的宣传工作以及组织反战同盟和教育俘虏等工作。

我到达延安后，隶属于八路军政治部。根据毛泽东的希望，要我具体负责对日军进行政治工作指导。我开始着手于对日本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当时延安虽设有“日本问题研究室”，并有一些曾在日本留过学的人，但未能取得应有的成效。我首先在八路军政治部出版了名为《敌国资料》的杂志，做为开展工作的基础。并以解放日报社论等形式发表各种论文。为了身分保密，使用中国姓名“林哲”，1943 年末第三国际解散后，改以日本姓名“冈野进”开始公开活动。此外，还把从前线各地数百名日军俘虏中挑选出来的人集中到延安，创办了“日本工农学校”，其目的不单是为了在当时进行宣传活动，而且要培养在战后重建日本工作中所需要的人材。该校由我担任校长，于 10 月份开学。这种使军国主义者变为革命家的改造人的工作，是很不容易的。

1942 年 6 月 23 日成立了“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这是共产党的预备组织，当时还只设在性安，但以后准备扩大到整个华北。该组织的任务是为了早日制止战争，建设幸福的日本，主张变革现在日本的社会制度，要为此而斗争。

当年 8 月 15 日开始，在延安召集日军十八个师团的代表，举行了“日本士兵代表大会”，接着又召开了全华北的“日本人反战团休代表大会”，26 日举行“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成立会，于 29 日闭幕。

当时在日本人反战团体中有反战同盟和觉醒同盟两个组织。前者的本部设在重庆，自 1939 年以后在华北地区逐渐组织扩大到八个支部,后者是 1937 年 7 月在山西南部由日军逃亡的三个共产主义者士兵杉木一夫、小林武夫、高木敏夫等在华北最早组织起来的反战团休。

参加大会的代表，除少数自动投降者外，大部分都是俘虏，然而在较短期间内都变成了反战的斗士。“士兵大会”的主要任务是鼓动日本军队内的士兵们奋起斗争，提出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的要求。只要是对军队生活不满的士兵，都欢迎参加。反战同盟则不仅要求改善军队生活，同时宣传要进行反对侵略战争的斗争，共主要任务是要设法使日军撤退和崩溃。因此.参加者必须是认识到战争的非正义性，并有为反战而斗争的坚强意志的人。在此联合会上讨论并采用了“华北联合工作会方针书”。其内容虽很多，但主要以对日军的宣传工作为中心做了详细说明。以后在各支部设立了“日本军队研究会”，特别利用士兵大会提出的要求书积极地展开了工作。

以下的口号均以歌谣形式表达出来:

一、揭露讨伐作战中的苦处:

(一)要增加行军中的休息！(二)不准殴打掉队的！(三)不要光在马背上打盹，要体会士兵的苦处！(四)早些宿营让大伙休息！

二，揭露对长官的不满:

(一)不准打嘴巴，当兵的不是牛马!(二)不准牺牲士兵争取战功！(三)进级评功要公正！(四)士兵当炮灰，军官得勋章！(五)对女人亲热的军官，对当兵的却是魔鬼！

三、加深思乡心情:

(一)要保证家属的生活!(二)给参军两年以上的士兵三个月的休假!(三)亲人们望眼欲穿等你回来!(四)亲人希望的不是勋章而是你的笑脸!(五)保重身体,快乐的故乡在等着你!(六)迎接骨灰盒的母亲,只有掉眼泪!

四、煽动悲观气氛:

(一)回国后还会征召入伍!(二)战争延长,生命缩短!(三)当几年兵才能回去!?

五、使日本兵反省其烧、杀、抢等罪行:

(一)烧光了房子烧不掉抗日!(二)杀誉无辜的平民能得到和平吗!?

六、宣传八路军的俘虏政策:

(一)我们决不杀俘虏,会象接待弟兄一样接待你们!(二)对放下武器的日本士兵,给与兄弟般的待遇!(三)战友们,我们在八路军里过着轻松愉快的生活生(用日本兵个人或原XX部队同人的名义)

反战同盟作的诗:

冰冷的夜晚,倒霉的战争,回国去吧!别再打仗了,回到妻子儿女身边去!

华北方面军注意到上述各种活动对于华北军、官、民心理上的影响,不断地加强了警戒。至1943年秋季,反战同盟的活动更加活跃,而其实际情况也已清楚了。

小康状态的国共关系

方面军的“战时月报资料(9月份)”就国共关系叙述如下:

在确保西北通道和开发该地区的问题上,中共、重庆都异常关心,都企图使之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圈。但不致立即形成双方的冲突,问题留到将来再说。当前出现的妥协态度,美苏的调停起了很大作用。在方面军编制的资料中有以下记载。

西北方面的国共关系一度极为紧张。5月上旬朱绍良遵照蒋介石的命令对围攻陕甘宁边区进行了部署,但随后因重庆急于实现西北中央化,为了调整国共关系曾由两党代表进行会谈,但意见未能一致。为此又企图依靠美苏合作以求得解决,虽一再与美苏等国大使会商,但未能实现重庆所希望的调解,国共之间依然处于乌云笼罩的状况。

此外,在“方面军战时月报(8月份)”中,也有以下记载:

7月末,在美苏合作进行西北军事建设的前提下,为了调整国共关系,由美苏两国大使馆派出代表团前往延安进行斡旋。中共尽管在表面上采取接近重庆的态度,但重庆对中共警戒是极为严重的。

正如以上所载,在国共关系方面除了要求考虑双方内部情况外,同时还必须考虑到国际形势的变化和美苏的政策。就是说,在中共方面,主要是正在尽最大努力对日军压力造成的困境进行重建工作;而重庆方面也为了从盟国,尤其是从美国获得最大限度的援助,不单是对西北问题,甚至对很多重要问题都不得不接受美国的要求,因而对中共也不能采取强硬的态度了。赴美求援的外交部长宋子文带回美国的意图表示,“美国希望国共关系能迅速得到调整,建议国共两党统一步调进行抗战,”对此,接近蒋介石的董显光曾说:

当时美国国民的政治倾向,意外地对毛泽东抱有好感。因为他们相信苏联是真心实意地在与盟国合作,认为民主主义同共产主义合作是可能的,所以是极其亲苏的。在1941年派亲中共反蒋介石的欧文·拉铁摩尔去给蒋介石当政治顾问。美国通过顾问、特使或施加其它各种压力,反对蒋介石的反共政策,强行要求国共及其它团体联合起来组成统一的政府,

蒋介石根据多年的经验,对共产党的阴谋并没有产生错觉。然而在与日军作战期间没

有以武力解决共军的余力。而且由于重庆那些好心而无知的美国顾问们主张“如果蒋介石同毛泽东妥协，美国的援助将更增多”，因此不得不考虑有效的政治解决。

另一方面，共产党在制造军事纠纷的同时，在政治上却假装保持协作关系，以精明谨慎的周恩来为首的共产党代表驻于重庆，与美苏代表等亲密接触，成为诱导他们反蒋介石的阴谋中心。

三、华北方面军的作战、警备情况

作战、警备概况

战斗序列的变更和警备体制 9月末的方面军警备体制，除了原驻山西省的第四十一师团及独立混成第九旅团因新担当河北省真渤特别行政区的警备任务而有所变更外，其它均无变化。

12月，根据年度革新阵容计划，改变了编制和适应南方作战急需调出了兵团。即:遵照 12 月 19 日的大陆命第七百二十五号，(一)驻蒙军属下(过去配属于第十二军)的骑兵第四旅团，随着骑兵集团的改编转入第十二军属下;(二)新编坦克第三师团编入驻蒙军属下(接替骑兵集团所担任的警备地区)。转属的时间为 12 月 25 日零时。

12 月 23 日，根据大陆命第七百二十八号，命令第四十一师团编入第八方面军(在新几内亚新不列颠岛的腊包尔。—译注)。因而真渤特别行政区的警备任务，大部分由独立混成第九旅团担任(司令部移驻德县)。东北部及东南部的部分地区的警备，由第二十七师团及独立混成第七旅团分担。

此外，第一军于1943年1月底，使河津地区的汾西支队复归于第三十六师团，缩小了该地区的占领范围，由第三十七师团担任警备，其它地区由第六十九师团担任警备。

在华北的防卫上，防空逐渐成了新的问题。

10 月 21 日 17 时 30 分前后，开滦煤矿受到了 B24 型重轰炸机的奇袭。损失虽然轻微，但对我方冲击很大。(据美军战史称，该轰炸机队是由印度的基地起飞，以成都为加油站而北上的。以此种方式攻击黄河以北，还是第一次。其目标为煤矿的电源和水泵，但未能破坏目的物。)华北方面军自 4 月东京遭受空袭以来，力图整备防空体制，正在将一部分重要物资材料进行疏散和移入地下，并在 10 月 1 日公布了“华北防空规定”。由于此次空袭，要大力加强重要地点的防空能力，积极贯彻防空思想工作。

作战、讨伐 方面军过去曾渴望进行西安作战，6月间得知中央的内部意图后，认真研究了作战计划，并积极组织了教育训练。9 月接到进行四川作战(五号作战)准备工作的指示后，于 4 日、5 日连续在北京召开了参谋长会议，加紧进行准备，但到12月份，因整个形势的变化，中止了准备工作，又致力于地区内的治安肃正工作了。在方面军年度计划中预定于9至11月间对晋察冀边区实行肃正作战，以配合冀中作战推进封锁线。但由于京津地区，特别是冀东道的治安恶化，因而缩小规模改为实行阜平周围的剿共作战，同时在方面军的领导下进行冀东一号终期(第三期)作战。

在此次作战中，由各方面抽出兵力加强了第二十七师团，于 9 月 17 日至 11 月 15 日，一日不停地进行了长时期的肃正剔抉。

本年秋季肃正作战的特点是所谓的“治强战”。这一作战成为从10月8日起进行两个月的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的主要组成部分。日华军、官、民形成一体，在华北各地，与治安工作和对敌封锁相配合，不断地进行了小规模的肃正讨伐。

在9月中、下旬开始的作战，是整个战役的前哨战，其规模较大的肃正作战列举如下:

(一)冀东一号终期作战。

(二)东平湖西方剿共作战(“ソ”号作战，9月27日至10月5日)，是由第十二军对山东共军教导第三旅的作战，也称“第二期鲁西旧黄河河畔剿共作战”。

(三)阜平周围剿共作战(9月27日至10月5日)是由第一一0师团和第一军的独立混成第三旅团，对盘据在阜平一带的晋察冀边区冀西军区第六团主力及第四团的一部分进行的扫荡战。

(四)第一军的“治强战”，是由第一军自10月10日以来对中条山脉内的蒋介石系统游击队和太行山脉南部的共军根据地进行的扫荡战，10月20日到11月底期间又遵照军的命令开展了“全山西秋季剿共作战”。

其中主要的作战有:(1)第六十九师团对沁源附近薄一波的部下太岳军区独立第一师及决死第一纵队的扫荡战;(2)在太行山南部的第三十六师团对辽县南方的蟠龙镇及襄垣地区的决死第三纵队和新编第五旅的战斗;(3)在石太路以南地区的独立混成第四旅团对辽县西北地区的新编第十旅进行的剿灭战;(4)独立混成第三旅团在五台山地区及崞县西南地区的扫荡战等。

各兵团在“治强战”以后继续积极进行讨伐，军又在12月11日至19日再次进行了全山西剿共作战，取得了战果。

(五)第十二军的“治强战”在鲁中方面，从10月10日到20日对益都东南山区及北部平原地区，以及博山西南山区地带，进行了对国共两方军队的扫荡。

然后第十二军又于10月27日至11月11日期间，在鲁中、鲁南进行了对国共两军的讨伐。即在第一期作战中，于沂蒙山岳地带(沂水西北方)追击山东纵队司令部(张经武)及第一旅(王建安)的主力，予以打击。接着又在第二期作战中转到沂水北部地区，自11月2日开始对蒋系的第一一三、第一一四师及山东纵队第四旅进行攻击。自7日起转入第三期作战，对博山东南地区的敌军进行了扫荡。上述作战又称为“鲁中鲁南讨国共作战”。

山东半岛的扫荡，是从11月19日开始进行了一个月的“第三次鲁东作战”(“と”号)。

(六)其它“治强战” 在河南省，由第三十五师团对新乡西北地区进行了肃正作战;在冀中，由第四十一、第一一0师团从9月中旬到12月底对白洋淀东南，尤其是河间附近，进行了最为活跃的肃正作战。在冀南，自12月中旬以来对巨鹿、武安。清丰各地进行“共军剔抉战”，取得了效果。

上述各项作战中的五号作战准备工作、一号作战、“ソ”号作战及“と”号作战的详细情况介绍如下。

五号作战准备工作

方面军早就在计划、准备进行西安作战，并渴望其实现。但根据中央要相

机进行四川作战的意图，于 5 月下旬对过去的计划加以修正，6 月 15 日上报总军。内容是由中央派两个师团前来增援，自 1 月中旬开始以六个师团的基干部队共约七十七个大队实行攻击，并考虑到将来的四川作战，准备进占到巴山山脉中的广元。当时，方面军的总兵力为步兵约一百三十八个大队，其中准备留下三分之二的八十九个大队用以确保占领地区，但在初期想使用十个大队策应作战。至于西安方面敌方的力量，估计为胡宗南军及可能增援的部队共约四十六个师，兵力约三十万人。

17 日在参谋本部与当地军有关人员共同研究了这一方案。当时，田中第一部长透露内部意见说，“最好在 10 月中旬开始行动，在 7 月中旬发出命令。为此要在 6 月末或 7 月初以前作出决定”。于 10 月中旬发起作战，从季节上看是本年的最后时期，很明显需要三个月的准备期。

根据这一意见，方面军在等待着 7 月中旬发出的命令，同时积极进行着作战准备。安达参谋长以下各幕僚除研究击灭西安附近之敌的方案外，并亲自飞往秦岭、巴山上空进行了空中侦察，为克服困难地形，使长途突进取得成功费尽了苦心。最成问题的是渡过黄河和突破山岳地带。然而，以后由于不知道中央的确实意图，并且为了确保华北治安不能延误讨伐作战，为此在繁忙的待命期间，进一步研究了作战计划及新占领地区肃正建设计划，训练了预定担任作战的部队，以及进行必要地区的侦察和后方兵站的准备工作。7 月、8 月的状况如下:

一、教育训练

(一)7 月初以两天的时间对步兵兵团长、独立混成旅团长进行了渡河作战集中教育，(二)对步兵大队长的山地战、渡河战教育(每次十一天，共进行了三次)，(三)对步兵联队通讯队长(十一天)、师团及军通讯队长(十二天)的教育，(四)对炮兵大队长的教育(每次十天，共进行了两次)，(五)在蚌埠附近对工兵队的渡河基干人员(从各兵团抽调一千三百人)进行了约一个月的训练。

二、情报机关编制作战资料

(一)制作十万分之一的地图，(二)摄制新黄河附近的航空照片，(三)派遣间谍潜入敌后的准备工作(从开封沿陇海路)，(四)对黄河，秦岭地区进行统计的观察。

三、有关后方事项

(一)修筑汽车公路(沿同浦路南段及由新乡经由黄河北岸至同蒲路地区的集中路线，预定于 9 月末完成)，(二)加固同蒲路南段(轮转材料的改轨作业与增加运行列车)。(三)在运城打凿供水用井。

方面军由于准备事项涉及的范围极为广泛、复杂，而且中央的决心尚未确定，作战意图又需保密，以及占领地区内的治安肃正等原因，以致不能进行充分的准备，为此甚感焦虑。但在 9 月 3 日接到五号作战进行部分的作战准备的指示后，又对计划仔细加以检讨，根据现地侦察、兵棋演习等重新进行了研究。同时各兵团也以渡河、山地作战为重点进行了训练。全部工兵部队的渡河训练、各兵团的地空联络教育也都于 9 月中进行完毕。10 月份进行了炮兵汽车部队的有关教育及各兵种联合演习。

对方面军此种积极态度，在 10 月上旬大本营参谋视察了方面军作战准备状况后，在报告中说: “认为当地军的意见很切实，实行计划是可能的。”

注: 预定以第一军为进攻作战主力部队，在 8 月间新接任的军司令官吉本贞一中将的热心指导下，排除万难进行了准备，每个月都进行了大规模的教育训练。在 12 月份还进行了十天的高山地区行军演习。

根据12月10日的总长指示，1943年的本作战宣告中止。当地军，尤其是第一军大为泄气。但是，考虑到根据形势变化，将来仍有实行四川作战或西安作战的可能，因而继续进行搜集情报和兵棋演习等研究工作。

冀东一号终期作战

(9月17日～11月15日)

冀东共军虽经我军不断肃正讨伐，仍力图恢复势力，继续进行活动。为了彻底予以剿灭，使冀东道一举成为治安区，方面军以第二十七师团的主力担当此任。

第二十七师团于29日将渤海道的警备任务移交第四十一师团，将原驻于该地区的中国驻屯军步兵第三联队转用于冀东道，作为东部地区队，使担任津海道警备任务的中国驻屯军步兵第二联队主力仍留驻于该地区，并使联队本部移动到冀东西部地区，指挥由方面军配属的各个部队及其它部队作为西部地区队，以第一联队为中部地区队，以步兵约十一个大队的兵力，开始了终期作战。

各地区队分散部署兵力，并取得当地居民协力，进行了积极的肃正讨伐，同时大力开展了以下各项治安工作:

(一)大力开展宣抚工作，扩大居民的保甲自卫组织。

(二)剔抉共军的潜伏分子、地下组织和秘密交通线。

(三)构筑隔断壕、碉堡、城寨等以防止敌人侵入和移动(规模最大的隔断壕是为了封锁以铁厂镇为中心的根据地，完全包围了通到遵化、丰润、沙河镇、迁安西方地区，长约二百公里)。

(四)设置无人区，为了隔断与满洲国的出入，在长城内侧由马兰峪(遵化以西约三十公里)到建昌(迁安以北约二十公里)附近，使宽约四公里、长约一百公里的带状地区成为无人区，将原有的村庄迁并到别处。

终期作战基本上于11月15日结束，以后移交新配备的部队，肃正建设工作一直继续进行到12月中旬。本次作战的军事上的战果:敌方遗尸2,337具、俘虏14,479人、投降者612人。我方的损失也较大，计战死221人，伤91人。

在同一时期，关东军的部分部队在长城线北侧地区进行肃正作战，担任燕京道警备任务的独立混成第十五旅团进行了蓟县方面的肃正作战(至9月27日，以后继续进行了扫荡)

有关中国驻屯步兵第二联队在本作战中的情况，在该联队的“联队史”中叙述如下:

本联队由日野原大尉指挥下的第二、第三大队及其它部队作为津海道地区队，担任警备，联队长(松井真二大佐)以在冀东的田中大队、第一百一十师团的吉田大队、第十二军的乙守大队等部队编成冀东西部地区队，并指挥治安军的第二、第三、第四集团担任玉川、遵化、兴隆各县及丰润县以北大部地区的肃正工作。

联队长于9月17日进驻遵化县城内，掌握各个部队。将地区队的肃正重点指向本地区的北半部和丰润县西南方还乡河沿线地区(中略)，并将治安军配属于各大队，使各个部队担任各自地区的肃正作战任务。为此，共军的第十二、第十三团三次转移到地区以外，各县的基干队潜伏于毛山沟、平安城平原、还乡河沿线地区。因此，地区队把各大队分散配置于各个主要地点，按照计划要求居民协力，全力以赴在纵横主要线路上构筑隔断壕、棚舍以防敌人的入侵和移动，并架设通讯网、新建汽车公路以利于我方的联络和兵力的调

动;同时开展了活跃的宣传工作，重建居民组织;此外，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招降工作，设感化院予以收容，以教育感化的办法使之转变。在此期间故意不进行大规模剔抉，以便随时揭发检举潜伏下来的敌人、地下组织及秘密联络交通线。同时，对地区内难以维持治安的村庄，令居民暂时搬家，使之成为无人村。为了隔断与满洲国的出入，规定沿长城线宽四公里的带状地区为无人区，采取收购农作物并保障今后生活的手段使居民迁出。

如上所述，在规定的 11 月 6 日期限之前，完成了师团计划的和地区队自己计划的工事以及其它措施。构筑了隔断壕 245 公里、其它封锁线工事 74 公里，共计 319 公里;棚舍 132 个、碉堡 3 个、城寨 18 个、关卡 2 个、共计 155 个。此项工事共用 52 天，作业人员达 1,957，000 人次。并新架电话线 258 公里，维修 153 公里，共计 411 公里;新建汽车公路 83 公里，补修 392 公里，共计 475 公里。长城无人区包括七十六个村，1,235 户、5,454 人，暂时无人村二十八个、2,342 户、12,036 人。

完成上述工事、设施后、11 月 8 日在遵化、玉田县城内进行了盘察搜索，11 日起又用三天时间，在全地区同时进行了全面的盘察搜索，而将感化院收容的大部分人予以释放。这样，完成了地区内的肃正任务，取得了招抚的效果。于是，11 月 15 日变更了军队区划，将西部地区队的警备任务移交于新任地区队长铃木少将，各队都复归原建制，从联队调来的兵力仍回津海地区。

曾任北部地区队队长的铃木启久少将(后升中将)回忆当时的情况如下:

第二期作战后，虽然看不到大型匪团的流动，但地下组织都增强了，其活动更加隐蔽。

8 月下旬，方面军为了使八路控制区与现政权控制区彻底隔绝，下达了修建在地图上标出的隔断线的指示，但该指示完全忽视了当地的实际情况。地区队根据该指示构筑了一连串的壕沟和岗楼，力图阻止八路军的移动和物资的流通。在此项工事中，动员民众共达六十万人次以上，给农作物的收割带来很大损失。此事成为中共方面宣传工作的重点，致使青年不断逃亡。

方面军又命令在沿长城线八路军根据地的地带设置无人区。于是，地区队以武力强迫居民搬出。居民对此特别怨恨，因而被八路军用以宣传日军实行“三光政策”(烧光、抢光、杀光)。

9 月的终期作战开始以来，除上述措施外，并在同时施行严厉剔抉、加强保甲制度、频繁讨伐、经济封锁等措施。然而即使到 11 月末，在认为治安最好的唐山附近，也还有袭击煤矿方面人员的事件发生。对地下活动的封锁是极为困难的。

参考:(有关秘密结社的一些情况)

对永清县红枪会叛乱的镇压和安抚 在中国农村的自卫机能方面，自古就有村庄内部自然产生的民团、乡团、公安团，保卫团、自卫团等名称的保卫组织(保甲制度是政府为了维持治安而设的行政上的辅助机关，在本质上有所不同)。此种民众出于自卫愿望的组织，有时会结合宗教信仰发展成为各种的秘密结社组织。由于民国以来的动乱，在华北也出现了红枪会、白旗会、红旗会、黄沙会等十五个以上的各种结社(在城市中，因利害关系而结成的青帮、红帮等)。清末曾经威振四方的大刀会、义和团，其根源出于对清朝的反抗和排外思想，而红枪会等结社则是由于对土匪实行自卫的目的而发展起来的。以后又以反抗军队的暴行为主，并带有反抗政府横征暴敛、征用民伕的自卫团体的性质，但也有一部分加入了土匪和军队。

中国事变爆发后，各地此种秘密结社对待日军、共军和中国政府的态度是各种各样的。其中既有亲日的，也有经过共产党说服而亲共的。但他们的自卫意识极为强烈，一般不会主动地采取敌对行动，也不会进行积极的协作。

第一一0师团于1940年9月13日下达的“确立加强保甲制度计划”中，对于“自卫组织与各种秘密结社之间的关系”说明如下:

中国的秘密结社大致可分为青帮、红帮、理门三派。虽然称为某某会，但大都是上述三派的分支。秘密结社的成员虽有善恶之分，但均以宗教信念为基础，在中国社会各阶层拥有根深蒂固的潜在势力。他们虽不参与政治事务，但对维持社会安宁极为关心，因而在治安工作方面采取怀柔态度，并了解他们的等级辈分，如“大、通。悟、学(青帮的辈分—译注)，很好地按其身分给以尊敬，即可对之进行利用。由于他们不断致力于维护社会安宁，所以在某种程度上顺从他们的意志，任从他们在保甲内实行自卫，即可使之成为有力而牢固的自卫团。对于非秘密结社的回教徒，也可采取同样手段加以操纵。

再由“中国驻屯军第二联队史”中，摘要介绍有关红枪会情况如下:

1942年秋季以来,河北省先天道总会所属永清县红枪会和中国方面县政府所属武装团体之间发生争执。地区队以该红枪会为拥有数万县民的宗教信仰团体，基本上服从我军，而我军正尽力对之进行劝诱工作，故对争执双方进行了调解。1943年1月，纠纷曾一度解决，但在3月间再次发生冲突，对维特治安的我方永清县警备队进行了抵抗，3月18日终子发生了国分见习士官等人的伤亡事件。

师团的意见要坚决予以讨伐，但地区队采取的方针，仍然是尽可能不以武力平定，但要彻底追究责任，清除祸根，使之今后成为与我方协作的有力组织，在万一不服从时再断然予以武力镇压。3月21日，地区队将主力集结于永清县，同时派津海道尹李少微对永清县、河北省先天道总会会长江洪涛对红枪会，分别告戒他们不要轻举妄动，并劝说红枪会投降。当时南部地区的红枪会虽应允投降，但北部地区的红枪会却抱怀疑态度，不肯立即投降，反而在各地集结武装，而且判明已向永定河附近的共军东进纵队求援。因此，为了防止叛乱扩大，必须抢先平定其激进分子，乃于22日突然袭击其集结地点前仲和及其它两个村庄，解除他们的武装，逮捕了会长张恒芝，并让张命令全体会员投降。只有孟家园子的会匪拒绝投降，不得已以武力使之降伏。

以后采取不用武力的方式收缴了全县各红枪会的武器，并开始对县方所属的不良武装团体进行了整顿，大体已告平定。在29日留下部分部队处理善后，但由于这是中国方面的内部问题，故于4月9日将处理善后工作移交津海道中国方面机关，并释放了已投降的张恒芝。

以下叙述若干有关红枪会的片断事例:

在山东省北部武定道的德平、临邑、商河附近有红枪会系统的匪军约八千人，事变后一度改编为国府军，但由于中共方面在其内部进行工作而赤化，变成鲁北地区游击队。后因我独立混成第七旅团对之进行工作，于1941年春投降日本方面，变成皇协军部队。1943年春季前后日军警备部队为了集结兵力开始撤退时，该部队再次倒向中共。1944年3月由日军对该部队内部进行了整顿。该部队直到战争结束为止，一直与日军保持联系，并维持该地区附近的治安。”

河北省南部地区是中共势力比较易于渗透的地方。1943年8月10日前后、在濮阳、清丰、东明各县边境一带红枪会的武装纷纷兴起，与盘据当地的共军河北抗日民军封丘县基干队之间，进行了持续一个多月的小规模战斗。据当时报纸报道，“在中共地区内很少见到群众武装斗争的事，此次斗争可以认为是群众对长期压迫反感的爆发。”

山西省南部绛县附近，红枪会系统的武装团体在事变初期约有两万人，该团体不属于

国府、中共任何一方，而由地方自治团体征收某种程度的税金，用以维持当地治安。该团体虽存在于一般社会之外，但其内部很有秩序，也很团结。日军进驻以来，对之进行长时期的劝降工作，结果以红枪会会长为绛县县长，形成了乡土自卫红枪会。以后在附近的乡村也产生了同样的机构，作为乡土自卫红枪会的下层组织，形成县行政组织的坚强支柱。

关于山西省东南部潞安附近的秘密结社情况，在当地特务机关的调查报告中有如下叙述:(1942 年 2 月特机月报)

(一)山西省安清同义委员会在大部分县中设有分会。本地区内约有会员一万人，其中也有相当数量的日本人。会员中多数是道县公署官吏、军队和警察署的人员以及商人等。至目前为止，除参加献金、慰问、追悼会等外，未见大的活动。目前正在筹备分会组织准备开始积极活动。因该会有相当知名的人士参加，对今后的动向需要大加注意。

(二)乾坤道(会员约七百人)

(三)三教圣道会(会员五十四人)、同善社(会员约一百五十人)

(二)、(三)是要振兴道德的稳健团体，特务机关做为“秘密结社”看待。

总之，此等秘密结社虽是局部地区治安对策的对象，或者有彼我互相利用之处，但方面军似乎并不认为是全盘施策之一而加以重视。

东平湖西方剿共作战(“リ”号作战)

(9 月 27 日～10 月 5 日)

敌情 盘据东平湖西方鲁西地区一带的共军，除经过 1939 年 6 月第十二军的作战及 1941 年 1 月第三十二师团的讨伐外，未受过大的打击。特别是第一一五师教导第三旅，几年来在鲁西地区建立了强大的地盘。当我方压力加强时即退散潜伏，压力减弱时即行活动，不断袭击中国方面的武装团体，从准治安区夺取粮秣，对民众进行政治工作。在本年 5 月的冀南作战时，因第三十二师团调往华中(参加浙赣作战)，避免了我方的打击。该地区从 7 月份前后开始，企图进一步加强根据地，似正扩充兵力，特别是乘我第三十二师团地区警备力量空虚之际，大有加强活动的趋势。

现已判明中共正规军兵力约六千五百人，正在不断游动。

作战准备 第十二军根据年度肃正计划，早在进行彻底摧毁鲁西根据地的准备工作。在土桥军司令官亲自主持下，由兵团长以下主要干部参加进行了图上战术、兵棋教育、现场指挥等研究工作。各参加作战部队在作战企图严加保密的情况下，进行了对共战法的训练。

本作战的设想为“军以约十个大队的步兵对范县附近(第一期作战)及东平湖西方(第二期作战)共军根据地采取完全包围、突然袭击战术使之彻底覆灭”。参加作战的部队为:石田支队(第三十二步兵团长石田保忠少将指挥的步兵五个大队、轻装甲车一个中队)、大熊支队(第五十九师团步兵第五十三旅团长大熊真雄少将指挥的步兵五个大队、轻装甲一个中队)，高原支队(骑兵第二十五联队长高原孝大佐指挥的骑兵两个中队、轻装甲车一个中队、骑炮兵一个中队)。作战开始日期，预定为 9 月 27 日。

注:土桥军司令官根据过去的研究和冀南作战的经验，企图彻底普遍采用“完全包围的对共战法”。其所设想的机动行程估算为:由“集结地”到“展开线”(形成包围圈)约四十公里(汽

车的夜间运行距离)，由“展开线”到“敌根据地”(目标中心点)约二十四公里(徒步白天攻击距离)。展开正面每个分队的间隔定为三百至五百米，以此计算出包围圈的周长。在行动中要特别注意横向联络，各队应控制若干预备队。要编成政治工作班(由新民会支援)，特务工作班(由宪兵队支援)，作为包围圈压缩后专门负责侦谍剔抉的部队。这是对付在大平原上善于四散逃避的共军所适用的特殊战法。但在地形、敌战斗力情况不同时，此法则难以适用。

第一期作战(9 月 27 日至 29 日) 第十二军于 9 月 25、26 日，命大熊支队在东昌、莘县附近，石田支队在郓城、巨野、济宁，高原支队在濮阳附近分别集结兵力，26 日夜间运动兵力，27 日拂晓以前到了预定的展开线。随后由控制线指挥各队前进，逐渐将包围圈压缩到中心地区(单堂)。

各队经过小型战斗，于 16 时以后攻进以单堂为中心的半径约三十公里的地区内。包围圈内的敌军几乎都身穿便衣、藏起武器、伪装难民逃走了，只有石田支队在旧范县附近与一部分强有力的敌军遭遇，经过激烈战斗将其击溃。以后各队在作战地区内进行了扫荡剔抉，直到 29 日为止。

第二期作战(9 月 30 日至 10 月 5 日) 第一期作战完成后，留下部分兵力在范县附近扫荡，各队主力伪装要返回原驻地的姿态，大熊支队在东昌附近、石田支队在巨野附近、高原支队在郓城附近，秘密进行了下次作战的准备工作。当时，在东平湖西侧仍潜伏有约两千五百名共军。

各队于 10 月 1 日夜间秘密开始行动，2 日晨在预定的包围线上展开，随即向东平湖西岸同时压缩进攻。敌方似乎并未料到我方的攻击，力图撤退和化装便衣，一部分强有力的部队与大熊支队进行交战被击溃。各队将敌主力压缩到我方的第三次包围圈内，自 18 时开始猛烈攻击，歼灭敌之大部。

战场一带 1 日夜间下了长时间的暴雨，各部队行动困难，但仍极力搜索和扫荡敌人。10 月 5 日大致达到预期目的，结束了战斗。

在此期间，由县警备队及石田支队炮兵队在东平湖东侧构成阻击线，担任防止敌军逃脱和捕捉俘虏任务，并对东平湖中的岛屿和湖岸进行了扫荡，扣留了民船。第六直协飞行队在指挥联络、侦察敌情方面进行了特别有效的协作。

作战效果及其后的状况 在上述两期作战中，交战的敌方总兵力约有 7,360 人，其中中敌遗尸 1,252 具、俘虏 1,250 人。我方战死 9 人，伤 72 人。这与过去进行的对共战相比，效果极好，取得了显著的战果。

如上所述，由于我方采取“完全包围突然袭击战法”，使当面共军未能积极集中兵力进行突破，因而我方得以较薄的包围网进行压缩。但从我方来看，还有必要进一步做好加强横向联络、隐蔽作战企图和轻快运动的演习和训练，以及匪民分离和收容运送俘虏的准备工作。

在我方搜索剔抉敌人之时，敌军教导第三旅两千人分散化装西去，逃往井店镇根据地(濮阳县西方约七十五公里，河北、河南省境附近)。

井店镇根据地虽经我军一再讨伐，近来仍逐渐增强扩大，正在与山西方面联系，并对滑县(濮县西南约八十公里)南部方面积极进行工作。为此，我方部署于该方面的特殊工作队和中国军逐渐受到了威胁。

第三十五师团为了迅速摧毁上述根据地，以便于推进豫北地区的治安肃正建设，于 10 月 31 日拂晓急袭了井店镇，随后在该地附近进行了扫荡剔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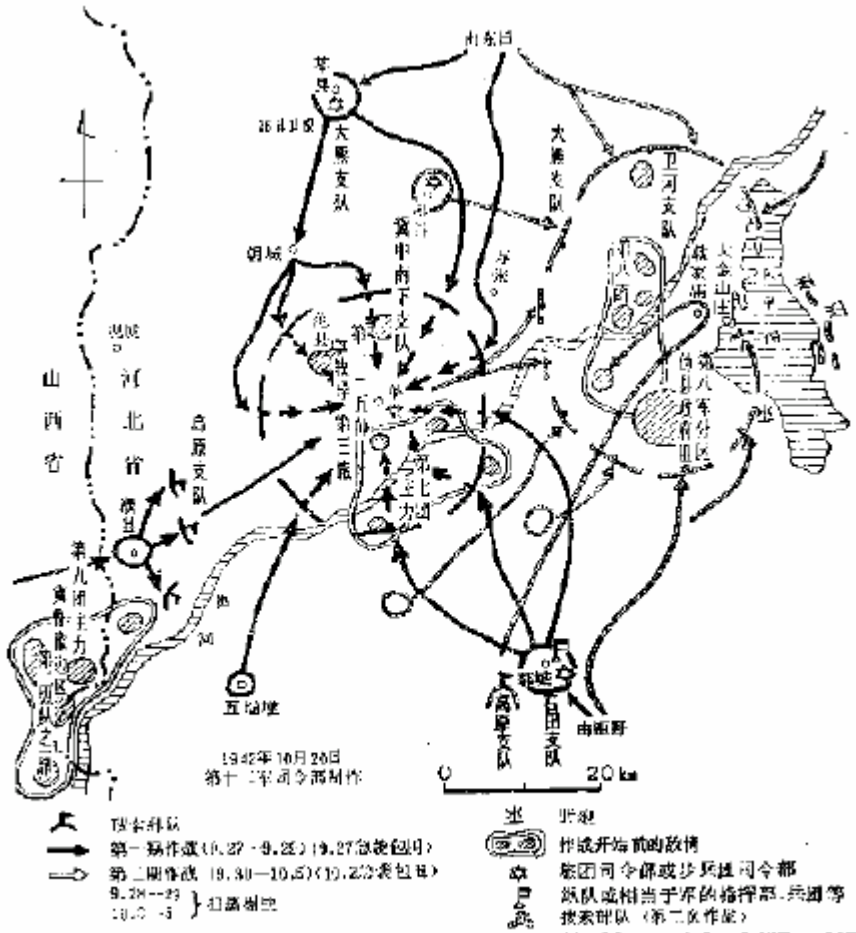


图9.东平湖西方剿共作战（り号作战）经过概要图

（1942年9月27日—10月5日）

第三次鲁东作战(“と” 号作战)

(11 月 19 日至 12 月 29 日)

第十二军进行此次作战的目的，是要歼灭以山东纵队第五旅及其第五支队为基干的胶东军区的共军，恢复山东半岛一带的治安，尤其是确保青岛、芝罘(烟台一译注)间的道路。参加的部队有独立混成第五旅团主力和第五十九师团、独立混成第六、第七旅团的部分兵力。

作战地区的地形与鲁西的平原地区完全不同，多是错综复杂的山岳地带，并且三面临海。因而该军采取了从西向东推进隔断网，将敌军压缩歼灭于半岛东部的战法，并与海军约定对沿岸进行严密的警戒。

第一期(11 月 19 日至 29 日）参加作战的部队大体上沿青岛至芝罘道路一线构成隔断网向东推进。敌军在锯齿牙山及其他山岳据点进行了相当顽强的抵抗，但在平原地区几乎是未经交战即行退避。

第二期(11 月 31 日至 12 月 12 日）于牟平南北一线构成隔断网，将活动于文登、荣成地区的东海区游击队及各县政卫队，包围压缩到半岛的尽头。自作战开始到 12 月 8 日的战果是:敌遗尸 1,183 具、俘虏 8,675 人。

第三期(12 月 13 日至 29 日）各部队反转西进，一部分由海路运送以切断

敌军背后，一方面主要在芝罘、青岛道路以西的平度、掖县、招远附近追击山东纵队第五旅、西海区游击队，自 22 日起在各地进行了扫荡，取得了相当的战果。

本次作战期间，军司令官将战斗司令所设于青岛，一度前进到芝罘、牟平指挥战斗。

参加过此次作战的独立步兵第二十大队队长田副正信大佐叙述所见如下:

一、鲁东与鲁西平原完全不同，对兵力说来地区广大，在山岳地带内张网前进极为困难。

二、由于包围网薄，容易被突破。特别是夜间曾有几次敌人突围出去。

三、感到中共势力正在扩大，其根据地建设正在不断进展

四、交战主要是在第三期，我军很难接触和捕捉共军。

四、推行治安建设各项措施的概况

1942 年夏秋之际，我方的肃正建设达到最高潮，中共及重庆方面均陷困境，使人感到华北治安战似乎已进展到收效阶段。

这就是，方面军自春季肃正作战以来，为了大力推行与治安战相关联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建设措施，逐渐新设或扩充了各地的特务机关以图扩大、巩固治安圈。

同时,华北政务委员会自 10 月 8 日起开展约两个月的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与过去相比，有了明显的实际行动。在日华军、官、民的密切配合下，进行了积极的肃正讨伐，取得了很大成效。此外，该运动的核心组织新民会也力图改善其基本性质，于 10 月下旬确定了新纲领和运动方针，期望发展为中国人自己的团体和开展反共和平运动的国民组织。

方面军也将对敌经济封锁作为治安肃正建设的重要对策和作战行动的重要部分，比过去加倍地增强了该方面的工作。为此，不仅在主要的作战行动中，而且利用中、小型讨伐的战果，扩充全华北地区的封锁机构，发动日华军、官、民与之协力，使敌人陷于困境。以下就各该措施予以详述。

加强特务机关与扩大、巩固治安圈

方面军根据年度肃正建设计划，为使肃正作战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措施紧密结合起来，重视了对省和道的政务指导，要在充实现有特务机关的同时，在各个道公署所在地新设特务机关。如前所述，在进行冀东、冀中作战时，于 4 月下旬在唐山(冀东道)、德县(真渤特别行政区)新设了特务机关。在山西省，由于兵团的调出及改编，将汾阳特务机关改为临汾特务机关的出张所(派出分支机构一译注)。山东省有十个道(青岛为特别市)，但在省特务机关之外只有一个特务机关。因此。9 月份在济宁(后迁兖州)、益都(后迁张店)新设了特务机关。但从以往的情况来看，在不同时期，兵团的防卫地区不一定和道的行政区相一致，有时会使兵团司令部与道公署、特务机关相隔离，因而在相互关系上产生了种种问题。

各个特务机关按照方面军的政治经济指导方针，即促进开发重要国防资源、

确立自给自足经济及对敌经济封锁体制，推进中国行政机关和民众的主动积极活动，并结合肃正讨伐、治安强化运动等扩大治安圈，推进开发建设的各种措施，以期巩固治安圈。

1942 年 9 月份，省及各地特务机关的部署情况如下(括弧内分别为机关所在地及机关长姓名)：

河北省(保定)特务机关(铃木繁二少将)
石门特务机关(加岛武大佐)
顺德特务机关(野田道大佐)
邯郸特务机关(冈田与作中佐)
德县特务机关(本间诚中佐)
唐山特务机关(堤雄平大佐)
北京特别市特务机关(包括燕京道)(松崎直人少将)
天津特别市特务机关(雨宫巽少将)
山西省(太原)特务机关(石野芳男少将)
潞安(上党道)特务机关(深见幸次中佐)
运城特务机关(字田川富藏中佐)
临汾特务机关(关根淳一郎中佐)
阳泉特务机关(千叶一良中佐)
雁门(崞县)特务机关(恩田忠录中佐)
山东省(济南)特务机关(大桥熊雄少将)
芝罘特务机关(泷寺保三郎大佐)
济宁特务机关(林千代治中佐)
益都特务机关(藤井幸吉中佐)
河南省(开封)特务机关(大泽侃次郎大佐)
新乡特务机关(河野又四郎中佐)
归德特务机关(近藤加明中佐)

参考

特务机关的编制并不一致，例如山西省潞安特务机关的编制，在 1942 年 3 月时，有专任机关长及辅佐官的现役军官各一名，机关人员有下士官兵八名、文职人员三十二名(嘱托九名、雇员十一名、佣人九名、临时佣人三名)。另外有兼任的宪兵、会计、兵技、兽医、兵科的军官各一名、军医两名，合计四十九名，组成总务、政治，经济、文化、通信等各班。

按照特务机关编制的方计，机关长应由专任军官充任，但也有如第一军及其所属兵团，或第十二军那样，在某一时期由参谋长或参谋兼任机关长的情形。

有很多地方在特务机关内配属有领事馆的警察，办理有关日本侨民的事务。

有的地方为道、县的联络员配备财政、警务辅佐官。联络员及联络员辅佐官均为军的无薪金嘱托。

各地特务机关及联络员受其兵团长和上级特务机关双重指挥和管理。为了业务上的便利，在军内每月举行一次特务机关长会议。在方面军内每年举行一至两次全体特务机关长会议。在特务机关内部则随时进行联系或开会。

根据地区的不同情况，各特务机关采取的对策和活动情况也各有特点。下面举几个在工作上具有特色的特务机关的例子:

山西省特务机关 1942 年 4 月，第一军司令部为了部内业务的顺利进行，废除了参谋部的二课制，并改组了省特务机关。即:由军参谋长花谷正少将兼任机关长，军参谋土日穰中佐兼任总务课长，原来的机关长植山英武大佐改任次长(政治课长为米花宇太古中佐、经济课长为田边新之中佐，全体机关人员有很大变动)，企图做到军事、政治、经济的统一和计划与实施的一贯性。但由于产生了政务指导过分从属于军队的弊病，8 月 22 日再度改变机构，任命专任机关长，又恢复了原来的体制。

上述参谋长兼任机关长问题，与企图加紧推进以“山西产业株式会社”为中心的山西省开发工作有密切关系。该会社关系到军管工厂的准备发还和随着对伯工作的进展由阎锡山接收的问题，因此，两年来一直悬而未决。至 3 月 31 日会社举行了成立大会。资金三千万日元，以交齐全部股金的日本法人资格，于 4 月 1 日开始营业。该会社将过去委托日本十三个企业修复和经营的山西驻军管理下的三十六个工厂合并，计划进行统一经营。新会社股金的交纳，以上述十三个企业向其原来经营工厂的投资额为基础，不足部分由华北开发株式会社贷款。该会社经营多方面的业务涉及五十多种，是一个有关保持军需民需比率均衡的开发和生产企业。然而，新会社不但要考虑扩充振兴重工业部门对大东亚建设做出贡献，同时还要考虑生产省内需要的物资，作为低物价政策基础。社长由大仓产业的太田文雄担任，干部大部分由各有关企业的代表担任。9 月 10 日太田社长因病辞职后，由河本大作(预备役大佐)继任，大大发挥了他的才能(总务部长为天野信彦、重工业部长为高桥铁造、轻工业部长为和田逸郎、经理部长为早川次郎)。自此，会社的经营开始走上了轨道。创办一年后获得利润达一百五十万日元。1943 年 4 月 20 日解除了军事管制，移交中国方面，由山西省经营。

注:阎锡山在事变前，为了山西省自立开始了以 1934 年为第一年度的“山西省政建设十年计划”，该计划以强有力的计划经济为主。企业为全省公营，并特别设立了统一管理工矿业建设的“西北实业公司”统一经营十四个工厂，另外还有十二个单独经营的企业。事变后，日军予以军管。另外又新设立了十个工厂。

省特务机关通过顾问部(最高顾问为甲斐政治)对省的行政进行幕后指导，并与各地特务机关的活动密切联系，使省政深入贯彻于各道(雁门、冀宁、河东、上党等道)。上党道是在 1941 年从河东道、冀宁道各划出一部分地区合并新设的。

各地特务机关大体上设于兵团司令部所在地，与兵团的军事行动同时并举，对道、县行政机关、新民会、合作社等进行幕后指导，推进各种建设措施。但因有些地区行政区划和兵团所担任的警备区域不一致，多少有些不便。例如第六十九师团担任了河东道地区的一部分警备任务，因而临汾特务机关即将冀宁道所担任的部分作为“指导地区”，而将河东道的部分地区作为“准指导地区”。这样，河东道尹要受临汾、运城两特务机关的指导。

潞安(上党道)特务机关 该特务机关根据第三十六师团的肃正建设计划努力扩大治安圈。尤其是对模范地区长治县的建设下了很大力显。年度初特务机关调查的上党道内县政贯彻执行情况如下(括弧内是长治县的情况):

地区内全部村数 4,626 个

联络村 2,498 个 占全部村数的 54%(93.8%)

保甲村 1,891 个 占全部村数的 41%(86,8%)

纳税村 2,246 个 占全部村数的 48%(93.8%)

平均恢复率 占全部村数的 47.7%(91.7%)

注:1941 年 6 月末时，华北的县政贯彻率平均为 67%，模范地区是 84%。因而上党道在长治县的建设虽有进展，但从全道看来，治安并不算好。

居民的回归率为 79%，尚处于有待复兴的状态，回归人口情况如下:

	事变前情况	回归数
户数	333,832 户	231,836 户
人口	1,712,145 人	1,352,951 人

根据上述状况，潞安特务机关采取了下列措施:

(一)增强道公署的机能，力求推动中国方面职员的主动积极活动，设立以道、县公署干部为主的“道政会议”，加强道尹的责任感(一般中国方面的领导人为老年人居多，缺乏活动能力)。

(二)在县财政方面，大部分县以借款来弥补开支，基础不稳定。因主要税收为田赋，故治安圈的大小直接决定县财政收入的好坏。因此，要努力设法使军、官、民形成一体，巩固和扩大治安圈以及整顿地籍帐册工作。

(三)为了发展农业，除在我军支援下，在东潞沿线有计划地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打井行动外，并指导合作社采取了增产小麦、种子消毒、改善施肥等措施，以迅速增加粮食生产。因此食粮问题大体上稳定下来。但因从太原运进的一般物资不足，物价有逐渐上升的倾向，对此，采取了物资统制、促进物资上市交易并组织加强各种组合(合作社一译注)等措施，努力维持适当的价格。

(四)联合银行发行的纸币和旧法币的币值比率，在各县不同。在治安地区是一比五至七，在非治安地区联银券的币位逐渐下降。因而通过没收法币工作制止法币流通，尽力消灭法币的流通价值。

(五)努力加强警备队、警察队的防御设施，管制夜间通行，进行清乡讨伐以肃清管辖地区的潜伏敌匪。为此，在教习所对警官进行了再教育，特别要提高保甲、警察的工作能力。警备队针对敌人利用警备地区的空隙进行地下活动的情况，计划对现有队员进行再训练并增加人员。

(六)为了加强以保甲制度为基础的乡村自卫团的武装力量(命名为先锋队)和扩大其组织，由新民会对自卫团干部及青年进行训练。

(七)为了对抗敌方的政治攻势，使中国方面的情报宣传更加活跃起来，增加了该工作的经费，指导他们进行活动，以分化敌方与民众的关系，鼓动厌战情绪，使敌人向我方投降。此外，尽量使潞安山西新报(发行份数为 3,250 份)的三分之二流入敌区进行宣传，并将各县发行的各种小报合并于该报，促进对一般民众及对敌宣传工作。

山东省特务机关 山东省的治安建设工作在第十二军司令官土桥一次中将领导下，军参谋长河野悦次郎少将(原省特务机关长)、省特务机关长大桥熊雄少将和山东省长唐仰杜之间的关系极为融洽，而中国方面各机关的活动也是积极的。1942 年 9 月，根据在各兵团司令部驻地设置特务机关的方针，设立了益都、济宁特务机关(但第三十二师团司令部在兖州、道公署在济宁)以图道、县行政的贯彻。(军的防卫地区延伸到河南省北部，也担任着该省的治安建设任务。青岛特别市属兴亚院华北联络部青岛出张所管辖。)

曾任第十二军高级参谋(兼政务主任)的折田正男大佐回忆当时山东省的政务指导情况如下:

(一)治安建设工作继续上一年度，重点集中于安定民生、改善治安。开发并取得国防资源以及对敌经济封锁等方面，并特别注意引导中国各机关积极主动的活动。对于盘据省

中部山岳地带的敌军，结合讨伐警备工作，尽量切断其通往河南省的西方补给联络交通线。

(二)大力向日本运送煤、盐等国防资源，同时为了收集敌方地区出产的水银、铜、铂等物资，在陇海路沿线用盐和棉花作为回头货以吸收那些物资。并努力招募了满洲所需要的华工。

(三)在剿共工作方面，要求军、官、民形成一体，破坏敌人的组织力量和争取民众的力量。但是，由于中国方面县长以下官吏的活动很不理想，加以指导县公署、新民会、合作社的日本人及朝鲜翻译的无能，工作没有成效。甚至由于他们干了坏事，或因日军下级部队中有些人对中国方面进行不必要的干涉，反而对日华亲善起了有害作用。因此，实际上即使表面上治安良好的地方，内里也有与敌我双方相通的农民。

(四)为了整顿军队对民众的纪律，提出“不准烧、不准杀、不准抢”口号，特别要求贯彻到各部队的基层彻底加以实行。但在作战讨伐之际，也出现了毁灭敌方根据地内的村庄，或为构筑道路、封锁沟侵占了良民的土地、征用.民扶等等情形。这些虽然是不得已的事，却成了招致民冤的原因。同时，我讨伐部队从敌方地区撤退后，对曾与我方协力的居民会有不利，但又难以做到长期驻守，这些都阻碍了我方获取民心的工作。

新乡特务机关 在河南省北部省特务机关设在开封，并在豫东道东部(骑兵第四旅团地区)的归德、(今商丘一带—译注)、豫北道(黄河以北第三十五师团地区)的新乡设置了支部。新乡特务机关长河野又四郎大佐(当时是中佐)是在中国工作过十五年的中国通。关于豫北的状况，他曾作如下叙述:

(一)特务机关的工作重点，根据地点、时间的变化而有所不同。例如北京特务机关以指导政治、文化为重点，天津则以经济，济南以农业生产为重点。从时期的变化来看，新乡特务机关工作重点在 1941 年为农村开发，1942 年为获取物资和招降工作，1943 年为治安工作，尤其是饥荒对策，1944 年则以对投降部队及警备队的指导为重点。在什么时期应做什么工作是根据兵团长的方针和特务机关长对形势的判断而决定的。由于是在异国作战地区的行政，在工作方法上尤须思想灵活随机应变以达到目的。但从日本国内来的官僚却多以低效率的机关化的方式进行工作。

(二)在我军占领下，得到优秀的当地领导人非常困难。在新乡特务机关负责地区的二十四个县中，有二十个县的县知事是事变后从满洲来的。这些外来的知事虽然有工作热情和办事能力，但与民众不能融洽。当地出身的知事虽然熟悉地方情况并与居民有联系，但多缺乏工作能力。这是特务机关长进行幕后指导最感困难的事。

(三)在反共工作上，我方的理论模糊不清，又提不出具体的实践办法，加以民族、语言、习惯不同所造成的弱点以及日军的统治欲、高人一头的思想等等情况，反而被中共所利用。

(四)日军占据的地方不过是点和线的“骨头架”，特务机关指导中国军、官、民扩大治安地区，要给骨头贴上肉。为此，比较可靠并有实力的是县警备队，其次是有乡土感情、早已形成组织的保甲自卫团。那些不想再战而投降的部队软弱无力，即使强令他们进攻中共地区，只能落个向敌人缴械而归的结局。

(五)招降工作由当地部队进行，特务机关负责支援和接收。投降过来的部队是对讨伐、警备都无用处的“食客”，简直是沉重的负担。

(六)确保粮食是每年都面临的问题。中国农民历来遭受大规模旱灾、蝗灾、水灾三重苦难。在饥荒的年头各地有很多人离开农村，大部分往江苏省、一部分往山西省逃荒，直到第二年春天为止。特务机关采取从其它省份买进杂粮，以及开发清河县水田地带(引水工程)、利用粮食平衡仓库等办法勉强进行救济。

(七)其它:诸如采取谋略从敌方取得中国方面武装团体使用的弹药，在濮阳、滑县等敌方地区收买棉花、粮食、收集铁路用的枕木(以盐交换)、“引黄济卫”工程、爱路工作、

维持特务机关工作人员纪律等等。

特务机关工作涉及很多方面，但多是一时难见成效的。

石门特务机关 京汉路沿线地区自事变初期即由第一一0师团担任警备。历任师团长(桑木崇明、饭沼守、林芳太郎等中将)均特别努力按照一贯方针推动肃正建设工作。因而石门附近的模范地区工作进展很快，至1942年底将该地区的警备工作全部移交中国方面。

唐山特务机关 冀东道在事变初期曾在唐山设有特务机关，以后又被撤消。1942年春季，因治安急遽恶化，又重新建立了唐山特务机关。曾任该特务机关长的提雄平大佐有如下叙述:

(一)到任后、首先要求中国方面撤换了失去民众信任的道尹以下主要干部，坚决肃清贪官污吏以期改变治安和行政面貌。

(二)为了对抗中共方面灵活巧妙的民众工作，在唐山设立青年训练所，从道内选拔优秀青年进行了三个月的特别训练后，组织以他们为领导的青年工作队，使之在当地积极展开活动。

(三)中共宣传“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制造对日本的民族反感，并对中国武装团体、官吏职员发出了“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号召，鼓励他们中立，并进行怀柔工作促使内应。因此，我方也加强了宣传报道工作，不断使民众了解具体事实，特别努力防止敌方利用日华间的隔阂。

(四)煤矿虽为方面军直接管理的企业，当地特务机关也在治安警备、维持产煤量方面采取了周密的措施，因而始终未发生过事故。

(五)在冀东作战时，曾进行了构筑隔断壕、设置无人区、新建和维修汽车公路和警备通讯设施等工作，特务机关在动员劳力、保障生活需要等方面也进行了协助。

兴亚院华北联络部青岛出张所 青岛出张所在所长(海军将官，当时在职的是绪方真记海军少将，在职期间为1941年8月20日至1942年11月1日)之下设有官房长(海军军官)，政务班(陆军军官)、经济班(大藏省官员)和文化班(海军军官，后为外务省官员)等，由内阁各省派出官员担当实际业务。事变初期，围绕青岛市的管辖问题曾在陆海军之间有过争执。出张所在两者之间极力进行协调，并将旧青岛与即墨、胶州县合并，设立了青岛特别市，担负了对该市的行政领导工作。青岛市的警备任务由中国方面警察及领事馆警察承担。旧市外的崂山区由海军，即墨、胶州区由陆军分别负责支援。

本地区遭受战祸较少，秩序迅速得到恢复，对英美权益的接收工作进行得也很平稳。该地区民众一般尚属亲日，对市政持合作态度。但即墨区的治安一向较差。1942年5月下旬，合并于共军第六旅的姜立川部队频繁活动，与重庆系统游击匪部的矛盾激化，而在青纱帐时期大小匪团也日益活跃起来。为此，在独立混成第五旅团支援下，中国方面的警备队进行了积极的讨伐，治安状况基本改善。

在市政方面。在市公署中自市长以下有一批积极而有工作能力的人材，工作可望取得成绩。因此，日本方面只在根本问题上进行幕后指导。在商业交易方面，由于6月份实行了华北紧急物价对策，一般呈现停滞状态，但统税局的收入在7月份却达到了最高额。主要是因为彻底实行了统制经济和大量烟叶上市的缘故。在合作社关系方面，指导了增产甘薯、养鸡、鼓励施肥等工作，并努力使物资购进、配给工作顺利进行。

华北开发株式会社 总管华北工矿企业的华北开发株式会社，在不同于特务

机关等部门的岗位上对确保、扩大治安工作起了很大作用，作为参考附记如下。

该组织是在1938年11月以资金三亿五千万日元创办的国策会社，是对华长期作战的支柱。其任务是向重要生产事业各部类的有关公司(子公司)进行投资贷款，以促进华北经济的开发，并对各公司的经营进行统一调整。投资贷款的对象为:(一)交通、运输、港口，(二)通讯，(三)发电供电，(四)矿产，(五)盐的加工、贩卖、利用，(六)其它为了促进经济开发特别需要加以统一调整的事业。该会社纯属控股公司，迄今为止是以不直接参与事业经营为原则的。

1942年11月7日，会社成立四周年之际，津岛寿一总裁曾对记者团就会社的事业状况做了如下介绍:

(一)本年春季，由于修改会社法，得到了增加资金八千万日元和由会社自已经营事业的许可。因而经营了有关物资材料的采购、配给业务，在物资调整方面取得了效果。

(二)对有关事业的投资贷款总额达到十一亿零七百万日元，在这一年期间增加了三亿八千万。充分显示了在加强已有事业发展的同时，对重要国防资源的开发增产和对日供应方面取得了超过预算数量的成绩。

(三)为了适应重要产业的发展，对交通、发电供电事业等也进行了扩充、增建。尤其是塘沽新港的部分建成，扩大了出口能力,并把山东省内的电业部门也统一合并到华北电业，形成了电业系统的一元化。

(四)投资、贷款的增加与山西产业、华北氮肥两会社的新建有关。山西产业形成了山西省军事管理工厂的综合体，华北氮肥是为增加华北农业生产提供廉价丰富的硫铵肥料的来源。

这样的投资贷款会社已达到三十二个，具备了能以妥善适应新形势的体制。

(五)根据大东亚建设审议会上决定的大东亚圈内工农产业的根本方针，对增产煤炭、盐、棉花以及炼钢、化学工业、人造石油、制铝等进行了具体的研究，以期完成增加对日出口、扭转依靠日本国内的局面。

华北、蒙疆的政治情况

华北政务委员会的情况 政务委员会屡次发表声明:“大东亚战争已日益显示出是资源战、生产战的性质。华北作为战争兵站基地的使命也越发增加其重要性。为此，必须以充实友邦日本的国防力量，采取战时所必需的经济对策，尤其是迅速开发国防需要的地下资源，确保治安，加快增产以粮食为主的农作物做为一切工作的重点。”(在10月19日省市长会议及I2月8日的大东亚战争一周年纪念日发表。)并努力加以贯彻执行。

由于物价问题最为紧迫，政府改组了“华北物资对策委员会”以期适当实行增产、收购、统制物价等措施，在民间也于9月份成立了“华北中央物价协力会议”，作为推进这一工作的主体。

蒙古联合自治政府的改组 联合自治政府于8月31日再次推选德王为第二届政府主席，于品卿、李守信为副主席。政务院院长为吴鹤龄、参议府议长为卓特巴札普。主席在9月1日的就职仪式上说:“本邦与日满两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要以全力协助兴亚大业。”号召全区五百万民众一致努力。(主席强烈希望蒙古独立，经常自称“蒙古邦”。对此问题，政府最高顾问大桥忠一与军方的关系不够协调。9月3日大桥顾问辞职，同时改变了政府机构，废除了最高顾问制。)

政府为了统一整顿行政机构并提高其工作效率，自 1943 年 1 月 1 日起设置了“宣化省”和“大同省”。联合政府原由察南政厅、晋北政厅和蒙古联盟三个自治政府合并组成，此次将察南、晋北两个政厅改组为宣化，大同两省，五个盟公署也改为由中央直辖，以此谋求加强中央的统治力量、精简机构和行政的一贯性。

新民会的活动

现状与将来 新民会一向是治安强化运动的核心实践团体，以该运动的共同目标“乡村自卫”为重点，通过武装民众、训练保甲等工作，大力开展新民会的活动。新民会的活动对于治安地区的巩固和扩大起了很大作用。8 月 22 日，新民会最高顾问铃木美通(预备役中将)就新民会的现状与将来做了如下叙述(在东京对日本记者团的谈话)：

新民会与满洲的协和会不同，具有华北治安自卫、组织国民等特殊性质。华北各地目前尚有很多由共军及蒋系残党设置的难以发现的据点破坏我们的工作。日军正在逐一进行讨伐，在讨伐后新民会立即进入，努力做到使该地区不再成为彼等之巢穴。今后的方针是使新民会进一步向共军控制地区采取攻势，以加强我方地盘。为此，先决条件是要有优秀的前线活动家，但遗憾的是日华双方都缺乏这样的人材。目前的紧急任务是培养和重新训练出胜任此项工作的人材。

到目前为止，新民会已与军方及兴亚院联系，进行了四次治安强化运动，从 10 月起将实行第五次的运动。该运动对巩固扩大治安地区、对敌经济封锁均有相当效果，现正陆续出现蒋系来降的部队。新民会正在加强现有的保甲制度，以此为基础整备各乡村的自卫体制。山西省以前组织过武装自卫团体“先锋队”，颇有成效。目前正仿效此办法，对乡村的优秀人材进行训练并予以武装，在各地编成名为“新民突击队”的组织。.

在进行武力工作的同时，也正在努力争取和组织乡村中的知识阶层。

现在约有三百五十万会员，将来准备将华北的全部居民都吸收进来。但目前的方针仍然是采取精锐主义，努力训练人员和巩固组织。为此，除在北京西郊建立中央训练所外，并准备建立地方训练所，不但要培训新的人员，对现有会员也要进行再训练。

新民会与华北政务委员会为一体的关系，有着象日本的大政翼赞会与翼赞政治会结合一起的性质，以此求得民意的沟通。

华北的中央及地方政府中的日本人作为新民会员处于顾问的地位。然而此等日系会员不应对政治上的每项工作都一一参与，而要以最高顾问为中心集结到一起，做到即使不说话也能取得华系人员的信赖，一有机会就进行指导。

在扩充加强新民会的组织方面，必须注意通过生活福利进行诱导、此外，要与合作社、工会、医疗机关保持密切联系，逐步做到全华北的新民化。希望这样来使新民会真正成为中国人自己的组织。

通过新纲领 10 月 27 日.在王揖唐会长主持下，于北京召开了为期四天的新民会 1943 年度全体联合协议会。南京方面为了谋求华中、华北的融洽，汪主席以及褚民谊外交部长、林柏生宣传部长、梅思平实业部长、鲍文越陆军部长等也出席参加了会议。会上修改了 1937 年新民会成立以来的纲领，通过了以下的新纲领和运动基本方针。期望对新民会的面貌进行一次大的革新。

新纲领

一、发扬新民精神、二、实行和平反共、

三、完成国民组织、四、团结东亚民族、

五、建设世界新秩序。

运动的基本方针(喻熙杰事务总长的说明)

(一)新中国的建设工作已经从理论信念到达了实践阶段。新民会必须担当起领导中国民众进行建设新中国的国民运动的任务。这是新民会的历史性使命，新民会是新国民组织的指导团体。

(二)建设新中国的障碍是共产主义，英美的自由主义、封建的残余三者。新民会负有领导民众除掉这些障碍的重大任务。

(三)发扬中国国家民族意识是建设新中国、支援大东亚战争的基本要求。新民会应以此作为统一国民信念的基础，致力于国家建设。

(四)新民会坚持政、会表里一体的精神进行领导，实行“众议统裁”的新政治体制，清除封建的、资本主义的文化，创造革新的文化。

(五)新民会发动最大限度的人力、物力加强华北参战体制，协助完成大东亚战争。

(六)新民会以整顿扩充分会、外围团体、青少年团三个组织，以建立新国民组织为工作重点，并在此基础上以确立国民总动员体制作为运动的目标。

会长王揖唐特别对新纲领中的“和平反共”做了解释，他说:“我们要用和平来扫清英美及其在中国的附庸势力，用反共来与共产党及其在中国的附庸势力进行斗争。和平反共就是中国第三势力的斗争路线。”主张大力予以实践。

新民会按照上述指导方针参加了与肃正讨伐密切联系的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

关于成为悬案的推进新中国的核心组织—华北新民青少年团问题，自 10 月 1 日起，对现有的青少年团进行了整编，在各地建立了组织，12 月 8 日在北京召开了建团大会。

新民会并努力联系和支援其它团体，协助它们扩大基层组织，对华北劳工协会，根据“新民会确立劳务动员体制纲要”实行了劳务动员，期使有关劳工、劳务业务正规化。

在对外关系方面，与日本的“兴亚同盟”合作，致力于两国国民的相互联系。

注:“兴亚同盟”是大政翼赞会的外围团体。于 1941 年 7 月组成，1942 年 5 月改组，总裁为林铣十郎大将。在日本国内和海外进行兴亚思想的普及运动，并举办兴亚事业以及进行研究工作。

1942 年 12 月 24 日，新民会建会五周年之际，该会顾问宋介叙述了新民会建立以来的经过及其发展状况，他呼吁“消除派系党派观念，以建会当初那样的团结和意志来发扬新民精神”。并说:“现在分会数已达 13,490 个(为前年的 38 倍)，会员达 3,643,199 人(为前年的 5.4 倍)，本年 6 月起的增加比数为分会 9%、会员增加了 29%，这表明了本会内容的充实。”

注: 随着组织的扩大与时间的推移，逐渐产生派系党派、丧失了清新活泼的风气，这是不难想象的。特别是官办团体更是如此。然而 1942 年的新民会，在战争期间，可算士气最为高涨的时期。

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的开展

实施纲要 华北方面军和华北政务委员会鉴于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对确立

大东亚战争兵站基地的华北新体制所取得的效果，为了扩大本年春季以来剿共战争的战果，进一步扩大、巩固治安圈，决定自 10 月 8 日天皇诏书发表日开始，用两个月的时间，大力开展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即与日华军警进行的肃正讨伐相配合，比上次更大规模地对华北中国民众及四十万日本侨民进行总动员，以“灭共”为主，及“确保农业生产”、“降低物价”、“改善生活”等为目标，进行军，官、会、民总动员以促进华北的建设工作。

此次运动没有关于中国方面计划的材料。由方面军编制了综合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对策综合实践的实施纲要，于 8 月 6 日通报所属各兵团及中国方面有关机关，开始进行准备。

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实施纲要

第一 方针

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要继承已往运动的精神，以期逐渐扩大战果，同时应特别注意与军事工作相配合的文化工作，并且要使目标及施策的内容与民众生活相结合，以促进和加强其主动的活动，以日华军、政、会、民真正上下一体的总体力量，开展讲求伦理的国民运动，使治安强化达到空前飞跃的时期。

为此，运动的范围应根据下列标语加以改正，针对运动地区的特点和运动对象的类别，适当地加以运用。

我们要建设华北，完成大东亚战争！我们要剿灭共匪，肃清思想！我们要确保农业生产。降低物价！我们要改善生活，安定民生！

第二 实行时期

实行时期为，自 10 月 8 日至 12 月 10 日。在初期约两周时间内与末期的夏防运动(针对 7 月以来共军夏季政治攻势的肃正建设运动)同时进行，以扩大其成果。自 12 月 2 日至 8 日期间，配合大东亚战争一周年纪念活动，使本次运动达到最高潮。

第三 指导要领

一、本次运动仍然坚持由中国方面自动发起的宗旨，特别强调要求各机关领导人真正做到阵前指挥。在本次运动中暂不明确提出“解放大东亚新国民运动”(以新民精神为基础的兴亚运动和新民运动是华北的长期性运动，但本运动是新民运动在大东亚战争中的重点工作。另外，华中的新国民运动是以三民主义为基础的。)的名称，但要为准备开始该运动进行指导。

二、在华的日本人应以物质、精神两方面的实际行动对中国方面起模范作用，并以真挚的态度投入运动。要特别强调养成自我整肃的作风，并严格要求各界领导阶层率先示范以确立当地的翼赞体制。

三、在本运动的各个部门，大力开展以青少年男女为主要对象的运动。为此，除特别要对各级学校进行积极的工作外，并要灵活运用宗教团体及社会教育设施的教化宣传力量。

四、运动期间的宣传教育要领应根据附件的计划进行，同时应尽量发挥日华各机关的现有能力，尤其要灵活运用从少年到少年、从妇女到妇女、从农民到农民的各阶层所特有的心理上的感染力。

华北政务委员会于 6 月份在北京设立了“华北治安强化运动总本部”，并在各省、市设立了常设支部以推行剿共和确保治安的对策。

实施概况及其效果 中国方面自华北政务委员长以下，省长、道尹、县知事

以及各团体领导人都率先带头促使运动的进展，致力于“确立大东亚战争必胜的协力体制，彻底剿灭共军，提高民众建设新华北的意志”。

另一方面，华北方面军在秋寒的山野上开展了激烈的肃正作战，同时，军、政、会、民打成一片推行各项工作，以期摧毁敌方抗战力量并完全杜绝敌方的收粮工作。

对此，中共方面在军事上始终采取游击战术，力求保存实力，同时在中共地区实行了经济反封锁，潜入我方进行破坏户籍调查和以宣传谋略等方法瓦解我方阵营的工作。

这样，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宣告结束。12 月 10 日王揖唐委员长发表讲话说：“本次运动已成功地在预定期间结束，但今后仍须继续实践以期运动的彻底。”由于痛感有防止青年思想共产主义化的必要，16 日让华北防共委员会准备设立“启新院”，决定从第二年起开始启蒙教育运动。

另一方面，华北方面军当局也于 12 月 11 日发表了谈话，指出“此次治安强化运动已收到伟大成果，华北的肃正建设工作确立了新的前进基础”。并发表本次日华共同剿共战(当时称为第五次治强战)的情况如下:

河北方面 第五次治强战以治安圈的扩大、巩固为重点。自 9 月 27 日起开始前哨战，对河北的红色据点晋察冀边区聂荣臻军进行攻击，在河北省太行山脉北部山岳地带开展了大扫荡战，占据了敌方指挥部所在地阜平。在共军冀东军区进行了彻底扫荡、剔抉和建设工作，在冀东全体民众的协力下构筑了隔断壕、碉堡和岗楼，加快了消灭中共地下组织，特别是政治组织的工作。在共军的粮食补给地区的冀中，继续进行了不断的肃正讨伐，打破敌方的政治攻势，使我方行政的贯彻得以空前提高。

此外，中国方面的武装团体、自卫团等，参加了对石德路南方地区及白洋淀附近残存共军巢穴的扫荡，取得了切断中共运粮通道的成果。

山东方面 山东省的日华两军协同作战，9 月下旬首先剿灭了活动于鲁北地区章邱北方附近的蒋系保安第二旅约一千人。在 9 月末开始的第二期鲁西旧黄河畔剿共作战(东平湖西方剿共作战)中，奇袭了教导第三旅主力。在鲁中地区，10 月中旬击溃了临朐(益都南方)东北地区的蒋系匪部及益都北方的徐向前部下山东纵队第三旅。于 10 月下旬开始的鲁南肃正作战中，于沂水西南的山岳地带追击山东纵队司令部，并扫荡其根据地。

这一系列连续进行的作战以及有民众参加的治强战，给予蒋共两阵营以大的打击，在治安强化运动期间出现了山东纵队第十二旅张希贤部队两千人等，总计一万五千人的投降。

山西方面 在山岳地带的治强战遍及整个山西，首先于 10 月上旬击溃了盘踞中条山脉的蒋系晋南游击队。在 11 月的全山西秋季剿共作战中，扫荡了太行山脉中部地区的共军第一二九师、晋西北地区的第一一五师。

五、对敌经济封锁

概况

根据 1940 年 11 月御前会议决定的“中国事变处理纲要”，采取了适应大规模持久战的有力对策，中国派遣军于 1941 年 2 月下达了“长期战现地政略指导”，其中规定“努力加强对敌区的封锁，并力求在占领区和敌区之间进行有效而合理的隔断”、“在经济对策上要加强对敌经济封锁，制止有利于敌方的经济活动，破坏敌方的经济力量。在占领区内部要确保我军当地给养，同时要增强生产能

力，以期充实我国防必须物资和安定民生，巩固国民政府的财政基础”。

1941 年 6 月 11 日，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命令“加强对敌封锁，力图消耗敌战斗力”(大陆命第五百零一号)。同年 12 月 3 日更明确指示要以“加强对敌封锁、摧垮敌方继续作战企图”作为基本任务(大陆命第五百七十五号)。对敌经济封锁的目的，就是要在中国大力进行经济建设，使之成为我军总兵站基地的同时.使敌方陷于贫苦的困境。

华北方面军在此以前，随着治安肃正对策的正规化，早已建立了对占领区内外敌人的封锁体制。1941 年以后，确立经济封锁体制的对策也逐渐完备。尤其在大东亚战争爆发后，除使敌方不能再依靠第三国权益进行突破经济封锁工作和利用东海面上的对外航线外，经过几次摧毁敌方根据地的作战，对敌方抗战经济力量的封锁效果也逐渐增大。但是，随着敌区的穷困日益加剧，敌方反封锁和经济谋略也更加灵活巧妙。相反，我方的封锁机构和封锁行动也有若干不足之处，从地区、局部看来，并没有充分发挥作用。直到 1942 年秋季也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特别是中国方面各领导机关的活动、地方基层的执行情况、民众的协力等，还有必要加强指导和监督。

兹将到 1942 年底前后的情况叙述如下:

经济封锁的执行情况

1942 年夏季华北地区我方设置的封锁线主要为(一)对占领区外围敌区的隔断线，(二)对占领区内中共根据地的隔断地带，(三)在城市周围、铁道水路、交通重要地点的物资流通限制线。其中(一)由方面军进行计划、统制，(二)、(三)主要由各兵团实行。

方面军直接进行指导的封锁线，其情况如下:

(一)对太行山脉内共军根据地及黄河、新黄河、涡河右岸的外围之敌的封锁线，除河南省豫西地区的一部分外，大体都已完成。

(二)对太行山脉内共军的封锁线是由一连串有一定间隔的警备队小据点构成的隔断线(其中包括隔断壕、隔断石墙、断崖及沿隔断线的警备道路)，在各个据点之间配置中国的武装团体形成监视线，并进行巡察、讨伐。在山地的据点阵地则按鱼鳞形配置成二线、三线。

(三)在河防封锁地带，按一定间隔构筑坚固的碉堡，特别是在河南省平原地带，碉堡直接配置在河岸上，修筑工程已完成一半。

各兵团进行的封锁线工作，在不同地区进度也不一样。由于封锁线是随治安状况的进展而逐渐推进的，故封锁线的整备状况也不一致，但设置适当的隔断地带逐步压迫敌人扩大治安圈，推进了封锁线工作。

注:封锁线推进计划之一例:

在推进封锁线工作时采取的方法是:(一)由日华军官警对隔断壕外的准治安地区进行讨伐和治安工作，划分地区按阶段逐次加强治安，建立多数联络村(向我方提供情报的村庄)，(二)在预定封锁线的各主要地点设立棚舍，然后修筑警备道路(供巡逻部队行动之用)、通信线和隔断壕，(三)根据情况与友邻部队协作,用隔断壕及碉堡对敌方根据地进行包围，并对在地区内游动的敌方部队反复进行袭击。

隔断线的构筑方法是，在平原地区不能利用自然障碍时，要筑宽约六米、深约四米的阻绝壕，在难以挖掘的山岳地带，设置由自然障碍或石墙构成的隔断墙，并配置火力、进行巡逻，以防止人、马、车辆等从指定入口以外的地方通过。

在山西省五台山附近和冀东道的沿长城线地区，有些地方设置了广大的无人区。

在铁路、水路及主要道路的交叉地点和城市的出入口设置检查所，并派流动检查班进行巡逻，以监视和杜绝敌区流出物资。

对城内物资大力实行物资上市的措施及配给统制，以阻止剩余物资的流出，并动员各机关尽力从敌区获取物资，积极采取行动，摧毁敌方的生产机构。

方面军内部担任实行这些对敌经济封锁工作的机构，是根据 1941 年制定的“华北对敌经济封锁大纲”组成的。其大体情况如下:

(一)日军方面以特务机关为主(在接近非治安地区为警备部队)统一领导宪兵队、领事馆警察，并指导中国各机关的经济封锁活动。

(二)中国方面以县为执行单位，由县的各机关，即县警察(流动的经济警察，固定的物资检查所，流动的物资检查所)、县物资对策委员会(由县长任委员长、县首席参事任副委员长，委员由县公署的科长、各民间团体代表、军队宪兵队的代表组成，实行对指定品种物资的搬出搬进的许可制。目的在于使治安地区内部的物资交流畅通和阻止物资流入敌区)、县警备队、保甲自卫团等以及新民会、合作社、爱路各团体、部外武装团体(如华北交通警备队)负责执行。

注:第一军特别设置了“山西省经济警察本部(由军参谋长兼任本部长)”实行了严格的经济管理。

下面是从方面军参谋部 8 月份编制的“经济封锁月报”中摘录有关各地区实行封锁的特殊事项。

(一)第二十七师团管辖区(津海道地区)将各驻屯队作为封锁据点，在重要地点设置固定检查班，对敌主要补给路线派流动检查班随同讨伐队行动，随时出动检查，并尽力收缴敌方企图反封锁而聚集的物资等，从积极、消极两方面进行封锁。在冀中敌区正在与第四十一师团一起共同构筑县境壕沟。

从封锁线外可向我方自由运进物资，但向敌方地区运出时，除指定地点外，一律加以禁止。

(二)第一一 0 师团管辖区(石门、冀中、冀西地区)平原地区方面大部分都是治安地区或准治安地区。因此，严禁有利于敌人的物资流出，但对农产品等的自由交流采取欢迎态度更为有利。即要使封锁线形成阻止匪团流动和利敌物资流出的监察点。

山地方面为敌方地区，必须使封锁线成为断绝居民交通及一切物资流出的界线。因此，师团特将重点指向山地方面，并努力推进。山地封锁线大体上是由分散部署在最前线的兵力点连接形成的。京汉路两侧的封锁壕形成第二道封锁线，防止物资由平原地区向山地方面流出。

(三)仁集团(第十二军一译注)管理区(以济南为中心的山东及河南地区)第十二军及所属各兵团为了确立封锁体制，进行了频繁的讨伐作战，或重新进驻兵力，逐步全面压缩封锁线，并向各个兵团拨交特别资金，在讨伐作战的同时，不间断地对封锁地区内物资。实行没收或强制收购。在整个管辖区内对正值收获期为农作物由收集班实行收购，并努力防止封锁物资的流出。特别要采取确保盐的增产、渤海湾沿岸的警戒以及河流航运船只的

批准制等措施，以加强管理。在河南地区由中国各机关进行了宣传宣抚工作，以期争取民心，对不服从者使用武力予以驱逐，以阻止物资流出。但仍有很多尚需努力的地方。

(四)乙集团(第一军—译注)管理区(山西地区)

第一军经济封锁的重点指向共军根据地的晋察冀边区、晋冀豫边区、晋西北军区以及山西军的晋南地区。为了掌握省内居民的经济实况和查办违犯各项经济对策的行为，由宪兵队编成巡回经济警察班，并制订“山西省物资流动取缔纲要”，在特务机关主管下，统制主要物资的省外运出运入及在省内的流动，坚持低物价政策以谋求省内居民的福利、增大军的自给能力，加强对敌经济封锁。

(五)戊集团(驻蒙军—译注)管辖区(蒙疆地区)

本区经济封锁工作是在驻蒙军的指导下由政府担任的，重点指向中共地区。封锁第一线为最前线的各个警察队连接成的包围封锁地带。此外，对各主要城市及车站的物资移动、集散进行统制监视。在封锁第一线的枢纽地点设置警察队的据点，在各据点的间隙进行流动检查。同时，极力破坏敌人的道路，使民众经由主要道路通行。虽然采取了此等措施，但未达到预期效果。因此，正在指导政府，应使行政力量贯彻到封锁地带的各个街、镇、乡，结合整顿基层配给机构，以期完成封锁住务。

物资配给、物价、货币流通的情况

治安地区内的主要物资配给制度，由于实行的日期短，中国方面官署对制度的运用尚不熟练，因运输困难造成物资的积压，户籍调查工作未完成，基层机类缺乏收购资金，一般民众对统制经济的不理解，以及单纯追求利益等等原因，很快达到所期望的目的是困难的。.

配给机构，各城市虽在监督机关指导下组成了各种统制配给组织，但由于日系、华系配给机构是两个系统，而华系配给组织尚不完善，以致配给工作不能顺利进行。各县是在物资对策委员会指导下，由新民会、合作社，各区公署、指定商店、各乡保甲进行配给的。不但要对机构进行整顿，对其职能也必须进一步加强指导。

其次，在华北由于受到大东亚战争爆发而产生的抢购风潮以及华中采取旧法币对策引起物价暴涨的影响，物价出现急剧上涨的倾向。于是，华北政务委员会于 6 月 9 日作出了“华北物价紧急对策纲要”的决定(内容为:整编和确立物资配给机构、规定适当的价格、确立综合性的供需计划、制订金融对策、降低生产费用和中间费用，对生活必需工业进行援助等)，采取了广泛的物价控制政策。自 6 月以后物价基本稳定下来。

与此相反，敌方地区的物价上涨幅度和我方地区内有很大差异，例如在易县境内，以 1941 年 11 月底的物价指数为一百时，在 1942 年 8 月末的指数如下:

	我方地区内	敌方地区内
高粱	**141**	**647**
盐	**131**	**833**

此外，在华北、蒙疆地区流通的货币，在我方有联银券、蒙疆券两种，在敌方地区有旧法币、中共系银行券(晋察冀边区券、冀南票、北海票、西北农民券、河南农工银行券、合作社流通票、伪造票等)以及各种杂券。联银券在 1938 年发行额为两亿元，由于治安圈的扩大和经济工作的进展，逐步扩大了流通范围，1942 年 8 月底的发行额达九亿七千万元。但联银券的流通是同以武力为支

柱确立治安相并行的，而在敌占区及部分接近敌方的地区仍有敌方的货币流通。此外，近年来联银券的迅速膨胀，不仅由于我方治安地区的扩大，物价上涨也是一个基本因素。

边区券等中共系货币，估计流通额约在数千万元左右，主要在冀中、冀南平原地区及京汉路以西、山西省境附近使用。其它旧法币估计约有三亿元。

随着大东亚战争的进展，联银券的信用价值有所上升，反之，旧法币及边区券等的价值则是一直下降。其交换比率在不同地区、不同时期差别很大，8 月末每一元联银券对旧法币的交换比价大致如下:(边区券比旧法币的价值高)

在河北省为二至五元，山东省为五至六元，河南省为三至四元，山西省为三至六元(在蒙疆地区，对每百元蒙疆券的比价是联银券六 0 至七 0 元、边区券一二 0 至一三 0 元、旧法币五 00 元)。

从敌区获取物资

方面军除在我方势力范围内努力收集物资和增加生产外，同时采取经济谋略与武力并举，或实行夺取物资的作战，从敌区获取物资，并破坏敌方的金融活动。

经济谋略的手段有:(一)采取没收等方法取得敌方货币进行采购。(二)运出不必需的物资作为交换品，从敌方吸收我方必需品或敌方抗战必需物资。(三)利用敌方商人，或设置由特务机关监督的物资收购机关(日华商店、商人、合作社等收购机关)，或利用武装团体灵活运用交易制度进行买卖等，主要通过准治安地区进行谋略性的采购。其中，以回头物资的流出曾吸收了相当大量的农产品，但随着敌方反封锁等对抗工作的加强，上述谋略工作也逐渐困难起来。因而从准治安地区收购土产品时，也大有必要采取武力并用的办法，对收集货物的机关进行支援和保护。在非治安地区收集物资，尤其是收集粮食、棉花等物资时，要受到敌方很大阻碍，因此必须密切配合作战、讨伐行动进行。过去对共军根据地进行的肃正作战，在破坏扰乱敌方的抗战经济组织、夺取培养抗战力量的资源方面取得了成效。特别是本年度春季肃正作战形成了积极的经济封锁，说明武力战就是经济战。如前所述，在冀中作战中丧失了经济基地的晋察冀边区，其北部太行山脉地区受到了沉重的打击是很明显的。但是，中共的生存力极为坚韧，因此不仅要摧毁其经济中枢地区，还必须破坏其所有的辅助性经济地区。各部队利用作战、讨伐的时机，极力破坏敌方的生产设施、运输工具以及被服粮秣仓库，缴获或收购我方必需物资及使敌贫困的物资。此时的重要问题在于争取民心，必须进行政治工作使敌方民众脱离或疏远中共的领导。

中共方面的经济反封锁

中共方面随着物资的缺乏，逐渐采取了对抗措施。为了粉碎“日军的以战养战方针”(中共方面的说法)，努力开展以确立自给自足经济为中心的各项工作。其经济反封锁的手段有;(一)统制输出入贸易。(二)确保土产物资。(三)从我方引进物资。(四)破坏我方设施、妨碍交通通讯等。关于其实行状况在“经济封锁月报”中有如下叙述:

一、中共的经济工作

中共的最终目的虽为全面实行共产主义的经济政策，但现阶段则采取过渡性的权宜办法，正在实行首先培育共军并使一般民众参加抗日战争加强战时体制的政策。同时以严格的统制建立自给自足经济，用“统一累进税”或“减租减息”压制大地主、高利贷，以图进行农业革命。

下面列举晋察冀边区北岳区的情况，说明最近的经济工作的趋势。

由于我方的不断肃正和连年歉收，北岳区的抗战经济濒于破产，特别是因冀中作战，使之丧失了兵站基地，抗战经济遭到打击，以致陷入如他们所说的“既无后方也无前方，只能潜入包围圈，改变形式进入敌人后方进行活动”的地步。为此，敌方正由过去的以军政为重点改变为以经济为重点，企图打开目前的困境。在经济工作中，号召“对敌经济斗争”，专门制订了从我方治安地区获取物资的具体方法，企图在解决当前经济困难的同时，进行长期的开发根据地生产事业以及增加生产。

中共研究利用我方经济封锁和配给制度、低价收购农产品等产生的矛盾、漏洞(人民隐藏物资、黑市交易、商人的谋利心理)，企图扰乱我方经济、阻碍我方获取物资，并正在全面进行调整、增强、新设领导和执行机构，努力提高成效。对此应予注意。他们的办法是:在边区、专区、县各级的党组织中设立“经济委员会”，制订对敌经济工作的方针、计划、手段等等，并将原有的贸易管理局，工矿管理局合并为“工商管理局”统一领导此项工作，工商管理局长并经营“公营商店”作为经济斗争的别动队，从事对内外贸易和物资调整等实际活动。为达到此目的，将“合作社”也纳入其领导之下，统一了进行对内物资调整工作的机构。从而有计划地从雁北、晋东北地区收购杂粮运往京汉、石太沿线地区、并从该地区取得棉花、在北岳区织成土布，做为交换物品运往雁北、晋东北地区，利用此种需求关系，进行北岳区的经济建设，同时，顽强打入我方商人中间，以夺取治安地区的物资。对此必须有所警戒。

二、领导机构及其话动

(一)经济委员会 表面上为单纯决定经济工作方针、对策的委员会，但实际则是由各机关的党员代表组成的中共党组织，负责监视政府的经济政策实行情况。其领导方针是对民众团体，特别是农会，以增加生产改善人民生活为藉口，设“劳动英雄”称号，鼓励各种增产竞赛。

(二)工商管理局 这是与各级经济委员形成一体的工作实施机关，在法令政策方面对公营商店、公私合营商店、工厂、合作社进行领导和监督。

(三)合作社 合作社的任务是扩充利用资源的生产组织，调整地区内的物资。但根据情况，也要促进运输事业的发展。将村合作社的小组组织与救济、生产，运输的组织结合到一起，贷给救济资金，使之从隔断壕、封锁线外大量吸收棉花，组织纺织生产，以冀西的土布交换蒙疆的粮食。政府贷放的救济资金用于工具原料产品的运输费用。(据晋察冀边区第四区农民合作社简章规定:“合作社是经济战线上的堡垒，是对敌作战的支柱”。)

(四)公营商店 负责对外贸易、管理市场、调查敌方经济动态，在各专区设有总店，由工商管理局长兼任经理。商店的主要任务为“管理市场”。市场为对敌经济斗争的基地，因而不仅利用封锁线外的商人大量获取军民所获取的物资，同时得以提高边区货币的信用，团结群众，在对敌贸易上处于主动的地位(中略)。关于市场管理方法有如下指示:(一)对于在敌人控制下游击地区及新蚕食地区的市场，必须采取各种方法加以摧毁。如采取任何方法也无效时，则应利用游击区及新蚕食地区的部分空隙地带组织早市、晚市、流动市场，以集合群众进行交易。(二)一方面要掌握市场经纪人，在另一方面要有计划地利用经济力量调节物资的需求，稳定物价，并同政府税收机关保持联系，共同负起管理责任。(三)在掌握市场时要首先掌握该市场的重要物资。

开展“商店工作”，要在游击区物色有信用的商人做为干部使之吸收群众。即首先用投资或谋利的方法和游击区商人共同营业，然后逐渐对之进行政治教育，提高其抗日思想觉悟，最后使之参加此项工作。(设立名为采办处的谋略性贸易机关，采办员多以店员身分住于店内。)从事商店工作的人员应经常注意身分保密，专心致力于商店的“点.线工作”，按照工作计划开设公营商店(点线工作的所谓点上的工作，是指以人为中心，或利用商店，仓库等，有计划地进行吸收物资和输出土产的情报工作。线上的工作是指以运输组织在游击区搬运货物出入的工作)。在工作薄弱地区及新开辟地区的工作，要注意给群众以充分的经济利益，使之与我方合作，然后再逐渐给予政治任务。

应将军、政、民各项工作统一起来，有计划地进行调整。

搬运货物突破封锁线有各种困难，因而采用“蚂蚁搬泰山”的方法，即根据多年的经验，将货物分成零星小件，发动民众以肩扛，独轮车推，小量地分批搬运，或利用邮件和日方的公共汽车运送。对于比较大量的物资，则在难以挖壕的地点、警备线的弱点或买通检查所的监视人员，以驮载、大车、独轮车、自行车、船只进行搬运。

(五)贸易局(在未设工商管理局的地区)是“有组织的对外贸易机关”，拥有由边区贸易局直到区贸易分局的上下系统。其目的在于谋求军用民需物资供需的圆满和控制物价。其活动情况为:

(一)从管辖地区内的各村庄按市价的八、九成价格收购各种物资交到各管辖分局。(二)分局使指定的商人运到我方的治安地区或准治安地区出售，以卖得的货款购进日用品、杂货等必需品。将取得的物资由分局一律上交总局。(三)总局将该物资主要分配给各军政机关，剩余部分出售给一般民众。(四)在治安地区盗用我方的良民证以城市附近乡村的旅店、商店为据点，利用村民小量地购进物资。其搬运手段巧妙，如隐藏在粪桶里或利用妇女儿童逃避我方的监视。

(六)交通站 是秘密通信联络机关，同时也是办理运输事务的机构。交通站的工作重点是保证抗战物资的流通，但也进行流动物资的运输以及对之取缔和监视。从边区一级到村级交通站，有严格的上下系统关系。

三、贸易工作的重点 对内是自由贸易，对外虽然名义上是统制贸易，但实际上是军用民需的命脉，而且重点在于获取决定各种物价基准的粮食，借以充实己方的粮食和破坏我方的粮食政策。因此，游击区也可称为敌方掠夺物资的对象地区。中共开展以经济斗争为中心的政治攻势，其目的是要在群众中造成对我方收集粮食工作不予协作的气氛以及使联银券贬值。(以下略)

四、货币斗争 游击区的统一累进税，是强行以联银券征收的。目的在于吸收大量的联银券，用以进行谋略性的大量高价收买我方地区的物资，使民众对联银券产生戒心，促使民众不与我方协作，或对不能阻止我方收购的地区故意提高物价，造成我方收买的困难。(以下略)

中共方面在彻底实行精兵简政，确立自立的经济体制的同时，并开展了巧妙的突破封锁线工作。根据各兵团没收的物资判断，向敌方流出的物资数量是相当大的。

注:据以后调查，“北岳区的贸易额在1942年达到了约三亿五千万日元。由于加强了经济斗争，贸易工作又活跃起来，约在三十个地点设立了公营商店，掌握了各地市场进行内外贸易，仅1943年1至3月份，实际贸易额似已达到一亿二千万日元”(剿共指南)。

1942年底以后，中共方面挽回了过去两年来的颓势，逐渐增强了力量，敌我之间的经济战日趋激烈。

方面军在“剿共指南”中明确指出，对敌经济封锁的目的“在于阻止战争必需物资流入敌方，以造成敌方战斗力的枯竭”，并努力促进中国方面积极主动予以协作。但是，封锁也带来了某些弊病。为此，“剿共指南”曾提出应注意事项，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实际情况:

(一)对敌经济封锁工作，稍不注意就会阻碍临近封锁线地区的物资交流，很有可能造成有损民生的危险。因此，应尽一切手段对中国方面的有关机关进行教育指导，同时要特别注意向一般民众说明实行对敌经济封锁的必要性，使之充分理解，从而主动积极地与我协作。

(二)在封锁线上实行盘问搜查及没收处理非法违禁物资，主要可由中国方面担任，但鉴于多有滥用职权借口盘问搜查勒索金钱或接受贿赂默许违禁物资通过等情形，以致造成民心离叛或降低封锁线效果，对此必须经常予以严格监督。

由此可见，经济封锁政策反而产生了使我方苦恼的情形，在本来想要成为铁壁一般的封锁线上出现了很多漏洞。

中央根据对华处理根本方针制订的政策，于 1942 年 12 月 22 日通过总长指示进行指导如下:

关于我军当地自给、对敌经济封锁等工作，今后应按下列各项实行。

一、保证我方占领地区内重要国防资源便于开发、获得、并确保我军当地自给，协助我方获取占领地区外的军需物资工作。

二、在对敌封锁工作上，努力阻止我方占领地区内的军需物资流入敌区。

但不得因此阻碍我方占领地区内的物资交流。

该指示的意图主要是要求在最后一项“不得阻碍占领地区内的物资交流”前提下，实行对敌经济封锁。这是因为中国，尤其是华中经济情况恶化的缘故。以米价为例，国民政府地区比重庆地区的价格还要高，在华北的各个地区之间以及地区内的物资交流也不够通畅，以致造成价格差额增大。

六 中共方面的贫困及其对策

1941 年至 1942 年，由于日华军、官、民全力以赴的治安肃正，中共根据地受到压缩，在军事上、经济上都陷于极度贫困。在中共各种文献中一般叙述如下:

(一)日军对华北解放区开展了扫荡、“三光政策”、思想战及特务工作的总力战。其扫荡方法有“铁壁合围、捕捉奇袭、纵横扫荡、反转电击、展转剔抉”等等，企图消灭我军的生存条件。这种连续进行的扫荡造成了未曾有过的严重局面，加上这一时期华北各地区发全了天灾，由于饥荒，军民只得吃树叶草根，局势越发严重。

(二)1942 年一年中，冀中平原的扫荡达到了最残酷的地步，更加上实行了治安强化运动等，使我方陷于极端困准的境地。

(三)日军在太行军区进行的“四.二九”、“六·一二”扫荡，规模大且彻底。我第八路军总部副参谋长左权同志在该战役中殉国。由于敌军的蚕食政策，更加上春季的大旱灾，粮食生产降低到三分之一，积储粮草枯竭，群众的贫困出现了空前绝后的惨状。

(四)1942 年是山东国民党(重庆方面)掀起反共高潮的一年。过去想暗中投敌以求自保的反共军，现在竟发展到纷纷公然投降日军，企图借敌人的力量共同消灭我军。我根据地因敌人扫荡及经济封锁，粮食极端困难。

针对这种形势，中共采取了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土地政策，实行精兵

简政、开展整顿三风(整风)运动以及生产自救(增产)等各项政策。

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边区内各级行政、立法机关实行三三制，企图以此加强统一战线。三三制是在边区立法机关参议会的人员分配上，按中共党员、党外左翼人士及中间人士各占三分之一的比例通过选举选出的制度，是把中间阶层吸收进统一战线，以紧密联系群众的政策。三三制的实行，使边区政权的性质形成了以新民主主义革命为目标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在克服经济危机上起到了极大的作用。“边区”是实行中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政治的行政地区，与重庆政府统治地区不同，是在性质不同的政权下实行另一种政治的地区。战后一个时期，中共曾称之为“解放区”，经过发展，合并构成了新中国的基础。

彻底实行新土地政策

为了保护中、贫农，提高他们的生产热情，彻底实行了减租减息政策(减少佃租降低贷款利息)，力求改善广大人民的生活，同时对于地主、富农采用交租交息政策(保证交纳佃租，利息)以团结他们使之抗日。由于削弱富农阶级及富农生产不利于边区经济，因而转变为凡不反对抗日的地主、富农，采取与之协作的政策，1941 年以后更加强调了这一政策。由于减租减息政策很难彻底实行，至 1943 年 10 月党内发出了“开展降低佃租运动”的指示。

实行精兵简政

精兵简政是为了解决各个边区的财政困难、减轻人民负担自 1941 年以来实行的政策。要求军队采取精锐主义提高素质，不盲目增加兵员。尽量精简行政机构，提高工作效率。

值得特别提出的是，在采取上述各项政策的同时，在军事方面扩大发展了适应作战地区情况的民众武装组织，大力开展了主力军、地方军，民兵形成一体的人民游击战争。

例如冀鲁豫边区，为了扩充民众武装，在 1941 年前后公布了“冀鲁豫边区人民武装抗日自卫团暂行条例”，其内容摘要如下:

第一章 总则

一、本队定名为冀鲁豫边区军区人民武装抗日自卫队。

二、本队为不脱产的人民武装组织，凡在县政府法令规定的年龄内(年满十六岁以上五十岁以下的男性公民及十六岁以上四十五岁以下的女性公民)的公民均编入本组织。

本队在执行任务时受政府指挥，但组织的性质是群众自卫的武装团体。

三、本队的目的是以抗日人民武装的自卫力量保卫乡村抗日根据地、抗日政权、抗日团休等，并争取民众利益，实现独立、自由、幸福的三民主义新中国。

四、本队的基本任务如下:

(一)进行人民游击战争。

(二)与抗日军队协同作战。

(三)维持抗日治安、担任抗战勤务。

五、本队为了执行基本任务建立下列各队:

(一)警备自卫队(简称自卫队)、(二)妇女自卫队、(三)青年抗日先锋队(简称青抗先)、(四)模范班、(五)公私企业团体内的工人自卫队。

(参加青抗先的为十六岁以上二十三岁以下的男性、参加模范班的为二十岁以上三十五岁以下的男性。二十岁以上二十三岁以下的男性根据本人志愿决定参加青抗先或模范班)。

六、青抗先与模范班统称“民兵”。

民兵为人民武装中的高级组织,因此以志愿参加为原则进行组织。任务比一般自卫队更大。即:农忙期从事生产,利用农闲期尽量进行训练,在有事之际参加战争,是武装自卫队的骨干。

七、警备自卫队执行下列各项具体工作:

(一)抗日警戒、铲除汉奸、肃情密探。

(二)破坏道路、围壁,实行空室清野。

(三)传送情报。

(四)救护伤病员、运送战斗器材、支援医院工作。

(五)缝洗军衣(妇女自卫队)。

八、民兵队除一般自卫队的工作外,并执行下列工作:

(一)配合军队参加战斗。

(二)对敌人据点进行封锁警戒,保护地方政权的生产、财产。

(三)封锁敌方交通线,进行游击活动。

(四)侦察敌情。

(五)援助、保护战时避难民众。

第二章(除以下各项外均略去)

十六、本队的编制及指挥系统如下:

(一)县级大队部设正副大队长、教导员各一名(由县武装科长兼任大队长,在武装科合并办公)指挥领导全县自卫队。

(二)各区设中队部,设正副中队长、政治指导员各一名,指挥全区自卫队(区武装助理员兼任中队长、合并办公)。

(三)在村庄多的区,根据实际情况,在区与村之间设立中心村区队部,设正副队长、政治指导员各一名,指挥全中心村的自卫队和基干自卫队。

(四)以行政村为单位设分队部,设正副分队长、政治指导员各一名,指挥全村自卫队。

(五)分队下设小队、小队下设班。小队及班均设正副队长、班长各一名。以五至十五人组成一班,以二至五个班组成一个小队,以二至五个小队编成一个分队。

三十六,在敌占区的自卫队组织,为了避免敌人的破坏,可利用各种隐藏方法。

开展整顿三风(整风)运动(译略)

生产自救运动

为了克服财政、经济困难,首先以粮食、被服的自给自足为目标,力求全面发展根据地内的农、工、商、运输业的生产。为此,在“中央统一,分散经营”原则下,组织党、政府、军队,人民大众的一切劳动力,大力开展生产竞

赛、表彰劳动英雄以及发展为大众服务的合作社等工作。军队也从1942年起，除采取自给自足的办法减轻人民的负担外，还担负起支援春耕、夏种、秋收、冬藏的劳动和对敌警戒的任务。

对当时的受灾民众，在“保证不饿死一个人”口号下，进行了救济活动。这一生产运动到1944年以后，在各方面都达到了自给自足的程度。并且在壕沟防卫线外的游击区，也开始了军民协力的大规模生产运动。毛泽东在1945年4月也说:“大家看，我们自己，在没有生产自给的时候，何等困难，一经生产自给，何等舒服。”

以上是针对1941、1942年的困难，中共方面实行的对策概要。胡乔木也说:“由于进行了这样的努力，克服了困难，根据地更加巩固，从1943年起，又逐步扩大了。”(以上均按日文译出，未与中文资料核对—译注)

重建冀南根据地实况

以上是中共方面克服困难的全面情况。下面再举出冀南根据地重建的具体事例。冀南地区在4月底开始的日军的肃正作战中受到了毁灭性打击，但从6月下旬左右，很快地进行了重建工作。在中共的资料中有如下叙述:

我们决定根据敌方势力强弱不同而形成的各地区的特点，采取不同斗争形式的方针。

在敌方统治时间长、势力比较强大的地区，例如平汉路沿线地区等地，仍然坚持“长期隐蔽、积蓄力量”的方针，把重点放在秘密工作上，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瓦解伪军伪组织工作。与此同时，领导人民进行日常的合法斗争，保护人民利益，积蓄抗日力量。

在接近敌方主要交通线、重要据点但敌方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地区，则一面坚持秘密工作，一面团结组织群众进行隐蔽的武装斗争。例如由干部及当地民兵打击敌方的特务活动，加强扩大抗日军队和抗日政府，争取团结群众开展社会统一战线工作和向伪军、伪政权内部进行渗透工作。

在我方力量占优势的地区，开展群众游击战争，实行革命政策，破坏伪政权，进行反“蚕食”，反“治安强化”的斗争，牵制和抵抗敌军的进攻，阻止其行动。

在我方游击根据地，推进武装建设，动员群众投入保卫人民日常利益的斗争，建立区村政权，加强群众游击战，进行改造环境工作。

以上各项措施均适应情况的演变进行，主要以党、政、军、民形成一体为根本。这样才能做到正确判断敌情，把合法与非合法斗争手段恰当地结合起来进行有效的游击战争。

我冀南军民在敌人的4,5月份大扫荡后，按照“夏防计划”休整兵力，并利用植物生长茂盛期进行了秋季攻势的准备工作。

在以后的一年战斗中，使日军死伤四千余人，打死、打伤和俘虏伪军七千余人，缴获步枪五千余支，机枪五十余挺，完全弥补了春季作战中的损失。同时，平原地区军民开展了连续不断的政治攻势，报复了敌方的“治安强化运动”。特别是为了对抗敌人的1942年秋季“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我方开展了“第六次政治攻势”，宣传了我方的“两年来的胜利总清算”，使敌人尤其是伪军产生了空前的动摇。

1942年11月至次年3月的五个月期间，开展了强有力的游击战争和全面性的群众斗争，给伪军组织以决定性打击，使其士气大为低落。

平原地区军民乘敌方兵力不足、纪律松弛等空隙，进入敌人后方建立了小据点，把敌占区改造成了游击根据地。军区和区党委详细调查了敌方地区的情况，做了充分周密的准备工作，挑选与当地居民有联系的干部，组成了数十个精干的武装工作队，秘密潜入敌方

占领区，说服当地有力人士，宣传抗日政策，开展了统一战线工作。接着武装工作队和抗日政府工作队又对敌方特务、汉奸、有民愤的坏分子，由群众进行公审、抗日政府判决，对其中的罪大恶极分子处以死刑，并要求其余的人反省悔过。同时，选择适当时机，对敌方的军事设施进行破坏，向群众显示我方的威力，掌握伪组织，进一步领导群众开展了对敌斗争。例如反对与敌人协作、反对出民伕、反对交纳棉花、反对纳税等等。这样，成功地建立了小根据地。对此，敌方根据确保占领区的方针，加紧实行了强制征壮丁、配给制度等措施，这样就必然与群众形成对立，因而我方的小根据地陆续不断地增加。

如上所述，在武装斗务支持下，或以武装斗争为核心，把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合法工作与非合法工作互相结合起来，建立起能够打击敌人的任何进攻、保护抗日力量的体制。

由于采取了上述方针和措施，冀南地区春季的混乱状态在6,7月间即已停止，8,9月间扭转了危局，10月以后扩大了游击区，在游击区及敌占区内建立了小据点，逐渐缩小了敌方占领地区。

其次叙述一下“道沟”、“坑道”斗争情况。这种战斗方法是平原地区军民在对敌斗争中的一种极为有效的发明创造。

冀南平原没有山区那样可以利用的险要地形，既少森林也无湖泊，是一望千里的平地。除在植物生长茂盛时期外，没有可隐蔽部队行动的东西。敌人在“四.二九大扫荡”后，随时都可以对我方根据地村庄进行袭击。据统计，1942年冀南地区的交战次数为乎均每天7次，1943年2月为平均每天9次。在这样的斗争形势下，为了便于我军部队的活动和打破敌方的严密封锁、拖延和阻止敌军快速部队的行动，平原地区军民花费了极大的劳力，改造了所有的道路，把大部分道路挖深修成了“道沟”。即把道路按可以通过牛车的标准，挖成五尺宽、三尺深的深沟，挖出的土堆积在沟的两侧做为人行小道。在与此道沟相隔一至二华里的地方再挖成同样的沟道，构成平行道路以便于往返通行。此等道沟纵横交错修成蜘蛛网形状。因而使我方可以通行无阻。在受到敌人攻击时可做为隐蔽掩护物体，便于分散退避，同时又可隐蔽地接近敌人。相反，道沟阻碍了敌军车辆部队和重武器的行动，敌军用填埋的办法行进时，则比我方步行的速度还要慢。

大规模地构筑道沟是在1940年开始的，但当时还很原始，在军事上的效果也不大。以后经过多次失败和试验，至1942年以后终于发明了这种有组织的新的道沟战法，加上建成了“坑道”和乡村堡垒，创造出了“地下战场”。

“坑道”也是随着斗争的发展而改进的，最后形成组织得极为复杂的设施。各户都有自已的秘密洞穴，村内有通往各户的村坑道，此外还有连通各村的“干线坑道”。这是我军和游击队的藏身地方，也是面临优势敌人时的退避通道。这样就使我军能够神出鬼没地行动。尤其是坑道增加了我军和群众接触的机会，使群众得以勇敢地和敌人斗争。

冀南平原长达几万华里的“道沟”和“坑道阵地”，虽然付出了很高的代价，但打击和削弱了敌人，积蓄了革命力量并使之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译注同前)

七、向对华新政策的转变

关于设置大东亚省的问题

1942年2月，由于战争形势的变化，要求尽快地集中发挥大东亚共荣圈的总体力量。为了适应这一需要，提出了在外务省之外，另设置一个带有内政性质的机构—大东亚省的方案。新机构的使命为“为了完成大东亚战争、建设大东亚，将共荣圈内的各种派出机关统一起来，对各项政治事务实行一元化的统

一的速效的领导。”(东条首相谈话)大东亚省于 11 月 1 日正式成立，首任大东亚大臣为青木一男国务相(前国民政府顾问)。过去的拓务省、对满事务局、兴亚院、外务省的东亚局和南洋局均合并于大东亚省。省内设有总务局、满洲事务局、中国事务局、南方事务局等组织机构。根据大东亚省的官制，大东亚大臣负责“实施有关大东亚地区(日本内地、朝鲜、台湾、桦太除外)的各项政治事务(纯外交事务除外)，保护在该地区内的帝国商务，并管理有关在该地区内居住的帝国臣民事务，以及有关移民、海外开发事业和对外文化事业的事务”，在这些事务范围内负责“指挥监督派驻大东亚地区的外交官和领事官”。

政府在 9 月 1 日做出设置大东亚省的决定后，就派驻各地的机构一元化问题，同有关方面继续进行了协商。然而主要围绕派驻中国机关问题意见有分歧。陆军方面主张由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兼任特命全权大使，而海军方面对之强烈反对，外务省则主张大、公使由文官担任。9 月下旬，大、公使问题大体上按陆海军之间的妥协案确定下来。但在下层组织的特务机关、领事馆等的一元化问题依然未能解决。结果，只得以改编若干机构的形式，仍使这些机构继续并存。

根据 10 月 1 日制订的“大东亚省驻华机构及其运用”及 10 月 20 日的“陆海军共同研究”，确定特命全权大使及驻上海特命全权公使由文官担任，驻北京、张家口的特命全权公使由原来的兴亚院联络部长官担任、总领事全部由文官担任。各地机构的人员暂由原来的联络部、领事馆职员留任，但尽量使陆海军人员退出。特务机关暂时保留，但对其权限有明确规定，以防止与大东亚省派驻机关之间发生摩擦，并使特务机关将治安以外的事项移交给大东亚省派驻机构或中国方面。

大东亚省于 11 月 1 日发表了人事任命: 重光葵大使留任，兴亚院蒙疆联络部长官岩崎民男陆军少将任驻张家口公使，兴亚院华北联络部次长盐泽清宣陆军少将任驻北京公使，外务省调查部长田尻爱义任驻上海公使，原公使兼总领事堀内干城任驻南京公使。

然而，大东亚省派驻各地机关的组成与原来的设想不同，力量是很脆弱的。

国民政府的参战问题

本来，日本方面是采取“不让国民政府参战”的方针的，因为陆军统帅部持有在五号作战后的适当时机，以宽大的条件导致与重庆政府达成全面和平的设想，认为使无多大力量的国民政府参战而加深对立，是不适宜的。

然而到 9 月末，陆军统帅部看出五号作战可能延期，全面和平已无希望，因而倾向于让国民政府参战。

10 月 29 日的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上，决定了日本方面的态度。即: 帝国同意国民政府的参战希望，使该政府尽早对英美宣战，以促进中国方面的对日协作，完成大东亚战争。

参战的时机应在采取各种措施、处理在华敌产、调整日华关系及加强日华协作等工作取得成效后，另行决定。

该决定显示出在领导战争的首脑人物之间，已发觉过去只是存在于中国内地的重庆政权，现在已经与英美的反攻相呼应，成为一个战略环节，发挥了支撑反攻作战的作用，如不及早采取根本措施，将会产生巨大恶果。对此感到焦虑。

此时，瓜达尔卡纳尔岛的战局趋势已成为大本营、政府的最大苦恼，五号作战的准备工作也不得不命令停止进行。此种形势的恶化也促进了对华政策的空前大转变。12 月 18 日的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审议了“为完成大东亚战争而采取的对华处理根本方针”和“具体方案”以及“在国民政府参战之际应与该政府缔结的各项约定措施要领”，鉴于第一项议题“对华处理根本方针”的内容关系重大，须由御前会议决定。

12 月 21 日御前会议上决定了“对华处理根本方针”，其主要内容如下(摘译)：

方针

一、帝国以国民政府参战作为打开日华局面的一大转机，本着日华提携的基本精神加强国民政府的政治力量。同时，力求消除重庆的抗日依据，而与真正的新中国共同向完成战争目的前进。

二、注视世界战局的演变，要尽力赶在英美的反攻达到最高潮之前，夺得根据上项方针的对华各项施策的成效。

要领

一、加强国民政府的政治力量

(1)帝国应尽量避免干涉国民政府，促使其自发的活动，(2)加强国民政府对地方政府的领导，(3)本着尊重中国主权及领土的精神尽快废除和调整在中国的租界、治外法权及其他特殊事态。关于九龙租借地的处理与香港问题另行规定。(4)为了提高国民政府的力量并体现其与日本的协力，考虑在适当时机修订日华基本条约及附属约定等。

二、经济措施

(1)当前经济措施主要是增加获得战争必需的物资，在占领区内有重点地开发、取得急需物资，并积极地获取敌方物资。(2)实行经济措施时，尽量避免日本独占，同时，要利用华方官民的责任感和创造性，使之体现积极与日本协力的实效。

三、对重庆方案

(1)帝国对重庆不进行任何和平工作，如形势变化要进行和平工作时，另行决定。(2)要使国民政府顺应帝国的上述态度。

四、战略方策

帝国对华战略方策按既定方针不变。

1943 年 1 月 4 日的联络会议并制订了“为完成大东亚战争有关对华关系的宣传指导方针”积极开展宣传战，极力扩大其政治效果。

当地军方的意见及对华处理根本方针的贯彻

对华新方针是在中央上层部门迅速制订出来的。既未在负责实际工作的人员中间进行充分的调整，也很少考虑当地军方的意见。当时中国派遣军就有“以扶植加强国民政府做为对华政策的中心不适合现状”的意见。中国派遣军烟总司令官在听取了派遣军参谋永井八津次大佐汇报中央的意图后，在日记中写道:“对内的以及对重庆的对策，都是行不通的穷途之策，实行起来不会那样简单。”中国派遣军总参谋副长兼大使馆武官落合甚九郎少将，12 月 16 日向中央统帅部汇报国民政府的实际情况指出:国民政府很不可靠，如果不改变国民政府的性质，以其薄弱的力量，只能起阻碍我方作战的作用，甚至有崩溃的危险。其党派没有核心，力图利用日本扩充维持自派势力。最近公馆派(汪兆铭夫人陈璧君

一派)抬头，企图排除周佛海派，推行黑暗政治。财政收入减少，税吏道德败坏，财政濒于破产。为解决军的当地自给，强制收购国防物资，以致物价昂贵，民怨沸腾，民心离叛。

总之，驻华当地军几乎一致的看法是;中国派遣军所属各军早已就与中国方面同甘共苦，根据中国方面的力量逐渐扩大其活动范围，发挥日华总体力量进行治安肃正和经济文化建设工作。日华合作并不是扶植和加强国民政府那样简单的事情。以为扶植加强国民政府就能争取民心，是完全不了解占领地区和国民政府实际情况的臆断。

为了贯彻对华处理根本方针，于 12 月 24 日召集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河边正三中将以及各军参谋长到中央开会，由参谋总长、陆军大臣做了解释和指示。陆军大臣谈到“根本方针的宗旨，要排除万难贯彻到基层彻底执行，特别要努力转变下级人员的思想。如果在执行中遇到阻碍，可采取人事上的措施，或按军纪予以处分。军纪的整肃、军队的威严为强行本方针的基础。军队应回到本来职能方面去，专心于作战的准备。倘以治安警备为借口干涉政治，军队将会堕落。国民政府虽有弱点，但过于干涉反而会削弱其政治力量。望与当地各机关密切联系共同努力。”最后传达了天皇在设置大东亚省时的讲话。参谋总长表示，要断然执行天皇的旨意，并解释说:“避免干涉，不等于完全放手不管，而是要军队处于后援地位予以推进的意思。”河边总参谋长答称决心尽全力执行方针。但随后在恳谈会上提出了以下要求。“此次大转变对海军方面也要彻底贯彻;大东亚省派驻当地的机关仍与过去相同，性质上未见任何改变，需要改变成军队可以大规模移交的机构，目前的状态是难以指望的;另外，对彻底改变过去做法的要求是理解的，但在当地必须逐步扎扎实实地进行，目前粮食显著不足，派遣军鉴于去年的失败，今年正在予以改进，但局势极端紧迫，对于扶植加强国民政府和争取民心工作，还只是在财政物资上给以补助，希望制订出切合实际的具体的经济对策”。

参考:

华北方面军山崎重三郎参谋回忆说:“新方针的宗旨做为一种理想是很好理解的。当地军方过去一直是在尽力加强新政权的政治力量。然而，当地兵团日夜忙于对付共军活跃的政治性的游击战，如果军方哪怕是在一时向纯军事领域后退一步，很明显，擅长政治工作的共军，其活动必将日益增强。此外，大东亚省驻当地机构，尤其是基层机构还很不完备，不仅在我军当地自给工作方面，而且在改善民生、开发和取得重要物资等经济措施的实行方面，仍然需要军方的积极努力。”

同时，烟总司令官在其日记中写道:“仅有的最后一策，成败虽属疑问，但既经御前会议决定，我等谨遵执行。”“南方形势依然不容乐观，今后中国派遣军更须提供兵力和资源。”

1 月 9 日国民政府发出了对美英宣战的布告，同时签订了“关于为完成战争日华合作共同宣言”和“关于退还租界及撤销治外法权日华协定”。

八、新政策在华北的实行情况

根据对华处理根本方针进行体制转变，预定在 7 月底完成。在华北，大致以 3 月底以前做为准备阶段，以后为基本事项的实行阶段。

在此主要叙述准备阶段的状况。

华北方面军的新姿态

1942 年 12 月 24 日,华北方面军和驻蒙军两参谋长在大本营直接听取了“对华处理根本方针”宗旨的说明后，回到驻地。

华北方面军于 12 月 26 日召开了兵田长会议，1943 年 1 月 7 日，又召开了各兵团参谋长及主管政务人员的会议，进行了贯彻。

会上冈村方面军司令官指示:“过去日本方面，尤其是一部分军队在行政、经济等方面采取了无视中国方面的立场，挫伤其自主性的过火态度，应予改正。军队应按照新方针的宗旨回到军的本职岗位上来。但因当地的实际情况复杂，必须根据各地情况，逐步实行，重要的是不使敌人有机可乘。”

1943 年 1 月 11 日，方面军司令官发表了有关国民政府参战的谈话:“华北地区自大东亚战争爆发以来，就担负起兵站基地的任务。在确保治安、开发重要.国防资源等方面，对帝国进行战争做出了很大贡献。国民政府参战后，华北所负的责任将更加重。华北方面军在此时机要更进一步发挥野战军的本领，除对重庆军加大压力外，同时要与中国战士合作，剿灭华北建设致命之敌中国共产党军。”

参考:

各兵团、机关按照方面军的意见，大致在 2 月中旬以后开始逐渐实行新方针。以方面军直辖兵团为例，第二十七师团于 2 月 23 日制订了有关肃正建设的新要领，以图集中兵力。根据该要领，将过去高度分散部署的驻兵地点减少了三分之一，将一部分警备地区移交中国方面的治安军等。

新设陆军联络部撤销参谋部第四课 如前所述，在设置大东亚省驻各地的机构上存在种种问题。其中之一就是特务机关的问题。如果使领事馆与特务机关并存，则会出现政令不一的弊病，如果撤销特务机关，力量薄弱的领事馆又难以做出成效。同时，继续保留特务机关又可能破坏基层工作的一元化。于是，将特务机关改名为“陆军联络部”，全面取消了过去对中国各行政机关的幕后指导，改为顾问式的“好意支援”。

根据 2 月 26 日华北派遣军当局的谈话，改变的要点为:(一)特务机关的名称改为联络部;(二)担任有关作战警备事项的联络和调查工作;(三)撤消过去的县联络员。

各地特务机关在 3 月底以前逐渐改编成陆军联络部，但实际业务和组成人员暂时仍与过去相同。只有县联络员改变了身分，过去县联络员是以方面军嘱托的身分分配到各个特务机关工作的，在有些地方也兼任新民会的县参事。今后则全部改为以新民会参事的身分从侧面对中国方面进行援助。与此同时，在新民会方面也为了尊重中国方面的自主而积极活动，调出了多数过去成为新民会核心力量的日系职员。

方面军参谋部于 3 月中旬撤销了过去主要担任政务的第四课。于是华北方面军对华北行政的干预领导也逐步取消(日本方面的有关政务工作的业务交由大东亚省大使馆事务所、领事馆及省以上的中国政府顾问兼新民会顾问，省以下的陆军联络部等不同系统的各机关担任)。但正如事先所料，在基层具体实行时，仍存在种种困难。

参考:

烟总司令官于 2 月 24,25 日视察了济南、海州之后，在日记中写道:“对华新方针大部分已逐渐实行，开始整理人事工作。但在地方上军队参与的县政，大部分是有关保安队的事项，即应由军队直接担任的作战警备事项。如现在立即撤销县联络员，治安恐将恶化。为此已通知他们目前不能立即全面放手，暂时尚需进行好意的援助。向中国方面移交工作当然要努力进行，但对其效果没有信心。此外，当地的大东亚省机能尚未运用起来，旧外务省官吏存在怠慢、不认真等不良现象，前途甚属渺茫。例如华北由于实行了新方针，共产党的活动又活跃起来，华北军正在为此忧虑。”

中国方面的参战体制

国民政府于1943年1月9日对英美宣战。

华北政务委员会于1月9日召开紧急常务委员会,决定了“决战五大目标”,即:集中物质、精神两方面的总体力量，加强国民组织，提高国防意识，开发和增运战时重要资源，加强农村的增产力量，爱护资源。

2 月 8 日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揖唐引退，由朱深接任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并陆续更换了一些省长、直辖市长。为了调整物资供需和加强物价的统制，3月1日在“物资物价处理委员会”下设了“食粮管理局”和“物资物价平衡资金运用委员会”。

新民会也于1月20日召开了临时全体联合协议会,决定与汪兆铭领导的“东亚联盟”合作，在华北也实行新国民运动。在人事方面，会长王揖唐辞职，由朱深、喻熙杰继任正副会长。日本方面撤出大部分日系职员，将留下的日系职员归并到新民会顾问部。(最高顾问是铃木美通预备役中将，12 月 27 日由岩松义雄预备役中将继任。)

去年设立的华北综合调查所于1月23日在北京西郊建所，正式开始活动。该所为对华北建设基础的自然界、文化界进行综合调查研究的中枢机关。3 月22日森冈皋(预备役中将)就任理事长。(方面军虽在政治、经济部门逐渐后退，但预备役、后备役军人仍占据重要职位。)

蒙疆政府 3 月 25 日召开了政府成立以来首次的地方长官会议(总力战体制会议)，决定施政重点为:加强地方行政机构，开发、增产重要国防资源，整顿自卫机关，增强综合战斗力，提高国民的决战意识，贯彻地方行政和确保治安等，以期对日本作出贡献。

华北政务委员会于 3 月 30 日设立了决定并贯彻推进剿共方策的中心机构“华北剿共委员会”。该委员会为政府、新民会、军方三位一体担当对共总力战的机关。在中央设总会，在各省、市、道、县设各级委员会，于 4 月 7 日公布了委员会基层组织大纲。过去担当对共施策的计划调查机关“防共委员会”及五次治安强化运动的指导中枢“治安强化运动总本部”都归并于该委员会。除由朱深兼任委员长，内务、治安两总署督办、政务厅长、新民会副会长兼任常务委员外，尚有若干专任委员。在总会中设有总务、企划，传报三个处。各省、特别市、道、市、县委员会，由各级行政机关的长官担任主任委员，委员由各级军、政、会的代表和选拔适于担当对共总力战的人物担任。各乡、村委员会为直接担任剿共工作的最下层组织，通常由乡、村长任主任委员，但在设有治安军分驻所，警察分署的地方，则由军警长官负实行的责任。

为了进一步开展工作，8 月 5 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荣臻中将(6 月 6

日投降的荣子恒之父、曾任张作霖的参谋长)担任了华北剿共委员会总会专任委员。

中国方面对日本改变政策的反应 3月份由中国派遣军参谋调任大本营陆军部第十五课课长的松谷诚大佐，曾报告了中国方面官民对日本改变政策的反应情况。华北、蒙疆地区可能大致相同。

一、要中国人了解到废除治外法权、交还租界的好处，恐怕要在今年秋季以后。现在的想法只是“日本感到困难了，才交还的”。

二、民众迫切希望得到粮食。至于盐等物资则认为对方真正需要，可以给他们。因物价高涨而感到困难的是食品及轻工业部门的日用品，

三、华北的共产党问题严重。铁路事故异常多起来。军队的当地自给也不充分，维持货币价值日益困难。

华北日军官兵的思想动向

中国事变初期，从军人、文职人员的通信、言论、行动、匿名信及笔记等反映出来的思想动向，大部分都保持坚强的军人精神，具有进行长期战的热情。只有一部分官兵的通信需要加以注意，不能轻视其内心的潜在影响。

分析这些表面现象，有反军反战思想的是极少数，大部分是由于战场的特殊性而滋生的厌战、嫌弃、希望退伍思念家乡等情绪，性质不太严重。或是对于与军队有关的事件抱有各种疑问、不满的。这些不能认为是敌国方面及第三国的思想工作(抗日反日、反战反军、扰乱后方)造成的显著影响。但随着事变的长期延续，对上级不满，反对入伍，以及对军队的制度、生活、待遇不满等事件逐渐增加，以后又出现了败坏军纪甚至投敌的犯罪行为。

大东亚战争爆发后思想动向的特点是:(一)为了在军队内部组织共产党小组而进行的思想宣传、煽动事件，有所增加(在全军检举的案件，1941年是四件、1942年1月至9月是六件);(二)离间军民关系、需要整肃军队的事件不断发生，1.军人文职人员的蛮横暴行; 2.对供应军需、取得物资材料、收购军用地等问题处理不当; 3.生活用品分配不公或流出军外等不法行为; 4.其它为一般民众所非难的私人行动; (三)投敌罪行有增加倾向。

华北地区在1940年以前从未发生投敌犯罪。到1941年发生了两件(兵一、文职人员一)，1942 年也发生了两件(兵二)。1943 年由于战争的长期化、战局恶化以及敌方加强了策动，至 11 月止已发生十八件(准士官一、下士官一、兵十五、文职人员一)，其中大部分是性质恶劣的“故意投敌”。而无意投敌、在逃亡过程中被敌方捕获或在战斗中负伤昏迷被俘、事后又未努力逃脱归队的“事后投敌”占少数。

以上只是本人归队或由我方逮捕的案件数字。据估计，未逮捕、失踪、投敌嫌疑等的数字可能是相当大的。

大部分投敌者的原因是厌恶军队生活、害怕私刑或恐怕暴露罪行、或相信中共方面的优待俘虏的宣传，以及考虑到成了俘虏后再归队要受到严厉处罚等。但也有一部分是从前就有共产主义思想而逃走的。

第四章 1943 年度的治安战

在本年度中，华北方面军的使命是，应付 1942 年晚秋以来日趋严重的整个战局，为了完成大东亚战争，确保华北兵站基地的安定，向开发建设迈进，对支援战争应做出比过去更大的贡献。

为此，方面军自年初以来，为使对华处理根本方针速见成效，将与作战警备无直接关系的政治经济等一切业务，移交中国方面自行管理，支持其确立自主的体制。同时，军队则力图转向专心致力于整顿军容、发扬武力的野战军体制。但是，当具体实行此种转变之际，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许多必须调整的问题。特别是实行治安战时，军事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措施，必须有机地结合起来，但由于机构一元化的程度更加削弱，这就需要靠独特的见解与最大的努力了。

此时，共军则逐渐扩大了势力，地下活动继续深入，同时表面活动又象两年前那样活跃起来。然而，友邦国民政府方面的中国势力，却仍难进展，方面军又将基干兵团抽出转用于其他方面，以致战斗力逐渐下降。华北治安殊堪忧虑。

本章将主要叙述华北方面军为应付此一严重局势所实行的作战警备以及编组华北特别警备队，设立模范剿共区等特殊措施的情况。

一 关于华北方面军的全面施策

新年度的作战警备计划大纲

过去，方面军在制订“年度肃正建设计划”时，总是包括作战、政务、经济各方面的内容。但 1943 年度，由于政策的转变，军事须与政治、经济分离，因而制定了作战警备计划。关于开发建设则另行制定计划。

关于方面军本年度作战警备计划的内容，根据一些文献资料及有关人员的回忆，加以汇总整理概略如下:

(一)大体确保现有占领地区的安定，特别要大力改善主要资源地区、城市交通线附近地区的治安。为此，应设法固定警备兵力，同时有计划地运用机动兵力。关于占领地区的肃正工作，在年度中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

(二)极力促进中国方面的活动，以减轻我军的负担，从而逐步集结兵力、适应形势的演变整备体制，努力提高战斗力。

(三)在 1943 年 7 月以前的作战指导，为迅速实行兵备整顿，正确、圆满地实行对华处理根本方针，使之不受阻碍，同时要以准备兵团抽出转用及今后作战为重点。

(四)铲除共军对我占领地区的阴谋活动，极为必要。随着对苏形势的日趋紧张，迫切需要迅速采取有效对策将其剿灭。特别是此次实行新方针，倘有不当，将予敌以可乘之机。因此，应采取如何对策要特别加以研究。

(五)迅速加强、完善防空组织，采取一切手段努力监视、侦察敌空军的状况。

(六)尽量减少战斗力的消耗，同时加强军队就地自给的能力。

(七)对敌封锁应采取措施，努力杜绝我占领地区内战争必需物资的流出，但不能妨害我方地区内的物资交流。

注：上述第(四)项，可以看出派遣军、大本营加深了对共治安战的认识。方面军对共军的再起，给予极大的关注。方面军的大城户参谋长 3 月间发表的谈话中指出：“共军不仅阻碍华北，而且阻碍整个中国的发展，是摧残全体民众福利之敌。我军决心彻底剿灭华北建设的死敌共军。但是，中共以其所谓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原则，采取欺骗宣传、武力威胁和有麻醉性的政治施策，积极进行地下活动以争取民众。此次日军将治安地区的警备移交中国方面，决定控制强大的机动打击部队，一旦需用时，即将以此新的战斗力，坚决予以沉重打击。中共的溃灭，仅粉碎其武装力量还不够，最重要的是，必须将中国方面的新政治力量，随着武力贯彻到赤化村去。”

1943 年 3 月 24 日，方面军召开所属兵团参谋长会议，下达了“1943 年度华北方面军作战警备纲要”，其原文已失，根据有关资料推断，其概要如下：

方针：方面军应贯彻野战军的特性，将作战警备的重点指向共军。应与中国方面的措施互相配合，以期消灭中共势力。此外，适应情况的需要，压制管区内蒋系军队或给予打击。

实施要领：各兵团专负责各自警备地区的安定，特别要促进中国方面自主的积极活动，以图加强其警备能力，确立其自主的体势。此外，要与我方的肃正讨伐及健全特务组织相结合，以期削弱中共在我占领的重要地区内的势力。

确保警备地区的安定，要特别重视铁路及主要交通沿线地区、主要城市及主要资源地区。

警备体制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由原来的高度分散部署，迅速逐步集结兵力。尽量保持灵活机动的战斗力。

为此，除必不得已的情况外，应尽力集中分队以下的分驻，大致在年底前后，尽可能改变成小队单位以上的分驻体制。

1943 年度方面军准备进行的主要肃正作战如下：

冀西春季作战 由第一一 O 师团计划实施。

冀西秋季作战 由华北方面军计划实施。

冀东秋季作战 由第二十七师团计划实施。

各军担任地区内的肃正作战，特别是第一军的太行山区，第十二军的鲁西、鲁南地区的剿共作战，须彻底实行之。

为了说明集中兵力的实行情况，现将“独立混成第四旅团警备及训练要领”摘要介绍如下：

实行兵力的集中，要做好周密准备工作，注意不要引起治安的动摇，为此，以中国方面自己的力量承担剿共警备的地区要逐步扩大。同时，我军应经常在必要时期、必要地点。及时进行活动，作其后盾，以确保支援的成效。并且必须逐渐进行集中，隐蔽我军的企图。此外，集中的军队，要有机动能力，对担任警备的地区，积极实行肃正讨伐，使敌人无活动余地。

集中后立即与中国方面紧密联络，进行周密的监视、侦察，以掌握治安的真实情况，完全封锁敌人势力的渗透，防范其东山再起。

关于方面军 1943 年度对敌经济封锁的指导重点不知其详。但第六十二师团的“对敌经济封锁要领”，具有如下的特点，由此大致可以看出方面军的全面措施。

一、封锁的对象不是所有一般物资生产丰富的敌匪地区，而是只限于真正必要的重要

地区。

二、封锁线一定要注意防止阻碍我占领地区内物资的正常交流。要排除由于各警备地区或各县的区域性封锁形成的经济障碍。健全配给、收买机构，以期正当进行运用。

三、军队实行的经济封锁措施限定于封锁线上，并分别监督封锁线上的中国机关。

在封锁线后方的我占领地区内，与封锁有关的各项措施，由大东亚省当地机关及中国方面各机关负责实行。

四、封锁线上的盘问检查及对违法物资的没收、处理，主要由中国方面的警察、保安队及其它武装团体实施。新民会与合作社动员其直接指挥下的机关、团体，进行封锁活动。保甲自卫团应互相密切联系，协助防止物资外流。民众应防止发生违法行为，迅速提供情报。

五、关于物资的出入，应视省内的需要进行控制，其多余的物资公平地输出于外省，以便物资统制合理化，并阻止战争必需物资对敌外流。

六、逐步推进封锁线，努力占有敌地区内的物资生产地区，并与大东亚省当地机关密切联系，灵活运用中国方面的作用和意见，以获取敌方物资，尤应努力收集我军就地自给的物资。

七、为了使获取省内敌方物资的工作统一而有计划地进行，由第一军、太原总领事馆、山西省公署组成的协议委员会作为其领导机关。

八、各部队对敌地区实行作战讨伐之际，必须组成物资获取机关(包括中国方面)并使之随同行动。

在封锁线前方的日军驻扎地，不仅是讨伐据点，同时也是获取敌地区物资的据点，根据情况，使日军及中国方面的机关向敌区挺进，努力获取其物资。

笔者注:从以上可以看出，与上年度相比，在限制军队的参与的同时，正努力活跃整个占领区的物资交流。

关于进攻作战的研究

1943 年度的对华作战，中央的基本方针是：尽量增加所需要的空军兵力，实行积极的空军作战，地面部队尽可能集结兵力进行治安战，以确保占领地区的安定。但是，中国派遣军接受了“继续压制敌人，力图粉碎敌继续作战的企图”的基本任务。为完成此任务，派遣军并不要求始终实行持久战略，而是强烈希望果断实行与政治策略大转变紧密结合的战略措施。中央与当地军队之间的意见经过多方调整的结果，于 **2** 月 **27** 日，中央通知派遣军，要求对实行下述作战进行研究。**(**概要**)**

一、秋季以后，如整个情况允许，为确立有利的战略体势，对京汉路南段(新乡一汉口间)实行作战。但鉴于华北的重要性，绝不允许因本作战而使共产势力活跃。

二、根据敌空军势力的增强及其活动等情况，估计敌方有对帝国本土进行大规模空袭的企图。不得已时，关于对华处理方面，在特别有利的情形下，即整个形势尤其北方的局势如能允许，适时实施五十号(西安作战)作战。

此外，关于占领地区的肃正工作，要通过整个年度计划，有组织地进行，并要求作好对苏作战的准备。

其中，华北方面军强烈希望实行五十号作战。特别重视占领西安附近的地区。占领了该地区后，可使空军处于优势地位，切断西北道路，北方作战发生时，能起分割苏、中的作用。但是，在整个局势上，该作战的实行显然是极其

困难的。方面军于1943年上半年，利用前年实施的五号作战准备成果，对其一部分继续进行了作战研究。

兵备的整顿

陆军中央于2月底将关于中国派遣军1943年度的兵备整顿及其使用的意图传达到当地军队，大致如下：(仅摘录有关华北事项)

一、大体上至5月底完成五个警备师团(其中华北两个师团)的编制。

二、第二十七师团至6月底集结于天津附近，7、8月间转用于满洲。

三、第三十六师团至6月末集结于京津地区，在华北派遣军司令官的隶属下，进行必要的训练，并随时供大本营调遣使用。

四、大体上在1943年底前，应使约两三个师团，能以迅速转用于其它方面。(这些师团考虑是徐州的第十七师团、兖州的第三十二师团和武汉地区的一个师团)

五、除以上兵团外，预定向北方转用的兵团，将于近期下达指示。

六、在华兵团从5月左右，改编整顿为以下三种：(1)装备完善的师团(预定转用的兵团)。(2)减少炮兵部队的师团。(3)原来的治安(警备)师团(炮兵、机动力量小)。整编后多余的炮兵补充新设师团。

七、新设兵团的部署，虽与肃正计划相关连，但希望尽量考虑到便于预定集结兵团的行动和教育训练。

八、制定新的“中国方面武装团休的整备及指导纲要”。

随后方面军在3月的参谋长集会上，进一步使新年度作战警备纲要具体化，同时准备兵备整顿，并根据5月1日发布的军令甲第三十六号开始进行临时编制(修改编制)。5月20日，召集所属兵团长集会，7月1日邀请新编兵团长，举行所属团队长集会，听取各地状况的汇报。同时对各项措施的实行、警备部署的变更等作了指导。

这样，对兵团抽出后的空额，以修改编制所多出的人员，给予补充。但因装备未有改变，严重影响部队的战斗力。因此，方面军以及各兵团，均不得不用很大力量就地制造武器、资材，以及尽量在使用方面设法充分发挥其效力。

兵团长的阵容如下:

方面军司令官 冈村宁次大将
参谋长 大城户三治中将

第一军司令官 吉本贞一中将
参谋长 花谷正少将
第三十六师团长 冈本保之中将
第三十七师团长 长野佑一郎中将
第六十九师团长 井上贞卫中将
独立混成第三旅团长 毛利末广少将
独立混成第四旅团长 中岛德太郎少将

第十二军司令官 喜多诚一中将
参谋长 寺垣忠雄少将

第三十二师团长 石井嘉穗中将
第三十五师团长 坂西一良中将
第五十九师团长 细川忠康中将
独立混成第五旅团长 内田银之助少将
独立混成第六旅团长 奥村半二少将
独立混成第七旅团长 秋山义隆少将
骑兵第四旅团长 小原一明少将

驻蒙军司令官 七田一郎中将 (5 月 28 日改任上月良夫中将)
参谋长 矢野政雄少将
第二十六师团长 佐伯文郎中将
坦克第三师团长 西原一策中将
独立混成第二旅团长 松浦丰一少将

方面军直辖
第二十七师团长 竹下义晴中将
第一一 O 师团长 林芳太郎中将
独立混成第一旅团 小松崎力雄少将
独立混成第八旅团长 吉田峰太郎少将
独立混成第九旅团长 岩永汪少将(6 月 9 日改任两官巽少将)
独立混成第十五旅团长 田中信男少将
注：独立混成第一、第八旅团在一一 O 师团的指挥之下。

华北派遣宪兵队司令官 三浦三郎少将

5 月 1 日，按照军令陆甲第三十六号，下令编成第六十二、第六十三师团及独立山炮第五联队、独立工兵第三十八联队、华北教化队，同日按照大陆命第七百八十三号，将第六十二师团编成后编入第一军，其他编入华北方面军的战斗序列中。

第六十二师团(文字代号“石”)

该师团是以独立混成第四旅团及第六旅团为基干，并转用一部分在华部队的兵力于 6 月 30 日在山西省及山东省的原旅团警备地区分别编成的。新编的部队为第六十二师团司令部(师团长、本乡义夫中将，参谋长、上野真臣中佐，后升大佐)、步兵第六十三旅团司令部(旅团长、中岛德太郎少将)、独立步兵第十一至十四大队，步兵第六十四旅团司令部(旅团长、奥村半二少将)、独立步兵第十五、第二十一至二十三大队、第六十二师团工兵队、通讯队、辎重队、野战医院及病马厂。(师团定员为 11,676 名，独立步兵大队为 1,233 名，由四个步兵中队、一个机关枪中队、一个步兵炮中队组成。)编成后，师团司令部设于榆次。步兵第六十三旅团(司令部在阳泉)于 6 月 30 日基本上接替了原独立混成第四旅团地区的警备。步兵第六十四旅团自山东向山西东南部移动后(司令部在潞安)，于 7 月 20 日接替了第三十六师团地区的警备。师团担任地区的面积大致相当于四国(日本地名一译注)的两倍，地区内铁路约 500 余公里。部队以铁路沿线为重点，分驻于 188 处。

第六十三师团(文字代号“阵”)

该师团以独立混成第十五旅团及混成第六旅团的一部为基干和在日本内地编成的各部队，于 6 月 30 日在北京附近编成。新编的部队为第六十三师团司令部(师团长、野副昌德

中将，参谋长、佐藤贞二中佐、后升大佐)、步兵第六十六旅团司令部(旅团长、田中信男少将)、独立步兵第七十七至七十九、第一百三十七大队、步兵第六十七旅团司令部(旅团长、柳勇少将)、独立步兵第二十四、第二十五、第八十、第八十一大队、第六十三师团工兵队、通讯队、辎重队、野战医院及病马厂。(编制定员与第六十二师团同。)

师团编成后，师团司令部、步兵第六十七旅团司令部设于北京，步兵第六十六旅团司令部设于保定，接替了一直由独立混成第十五旅团担任的北京特别市、燕京道，以及保定道、渤海道西北部、津海道西部地区的警备任务。(该地区内的驻屯地原分散部署于 144 处，此次将其整理为 96 处。)

注:野副师团长 5 月 16 日到达北京后，听取了各种情况，他在笔记中写道: “最初的印象是民心叛离，日军虽占有点与线，但处处薄弱，宛如赤色海洋中漂浮的一串念珠，情况十分严重。其后，巡视了所担任警备的地区，看到的情况是，几乎没有税收，逃避劳役，农商不振，筹办军需品困难，搜集敌情亦极为困难，敌人阴谋恐怖活动活跃，而我警备队则孤立无援，中国方面各机关也因敌人的反封锁，陷于同样状态。深感必须加强新编部队的团结，振作军纪风纪，特别是对中共地下活动的侦察和我方的治安工作，从一开始就应彻底进行。因此，对巡视的各部队，作了训示，只是拚命打击不行，唯有揭发、消灭敌对分子与爱护良民同时并举，才是圣战的宗旨。” 这些话表明了当时的治安状况，甚至在政治、经济中心的北京附近地区也是相当严重的。

此外，当交接警备时，不仅要作好兵力配备，新来部队并应迅速掌握社会情况，与当地中国人搞好关系，继承情报谍报网，彻底防谍，互相协助物资、设施的移交等等，都是特别应该注意的重要事项。

兵力的集结训练与警备部署

中央有关预定从中国派遣军抽出兵团转用于其它方面的意图，已分别向当地军队作了传达。4 月 5 日根据总长指示，指定了预定转用于北方的兵团。5 月 3 日的大陆指第一千五百七号 “中国派遣军兵力集结及训练要领” 的第一项规定: “预定向北方转用的兵团，在不影响当地作战任务的情况下，应于 1943 年度末以前完成为对苏作战进行的必要训练”。第二项中的集结要领规定:

第二十七师团约在 7 月，于京津地区集结，准备向满洲方面转用。

第十七师团约在 8 月，于京津地区集结。

第三、第三十二、第三十六师团于 1943 年底，在原驻地附近集结。

随后，对每个师团指示训练的重点，其项目为; “对坚固阵地的攻击”、“强渡大河”、“通过湿地” 等。

以下略述与方面军有关系的兵团的集结和转用情况。

第十七师团

该师团一向担任苏淮地区的警备，5 月 1 日根据大陆命第七百八十三号解除了其在第十三军的战斗序列，编入华北方面军的战斗序列中。其后逐渐进行兵力集结，当对苏作战训练开始时，又根据 6 月 17 日的大陆命第八百二号，重新编入中国派遣军(直属)战斗序列中。同时指示其在进行训练时要考虑到 “热带作战”，这是由于南方形势的变化而紧急改变的。

尔后，师团便将警备任务移交给第六十五师困，为了准备向南方转进，于 8 月中旬在南京、上海附近集结。

第二十七师团

该师团在担任冀东、津海道地区警备的同时，并准备对苏作战训练，当时根据 6 月 17 日的大陆命第八百三号，解除了其在华北方面军的战斗序列，编入关东军。因此，师团将该地区的警备任务移交独立混成第八旅团，7 月下旬开始向满洲国锦州地区移动。

第三十六师团

该师团 6 月中旬以来，逐步准备移交防务，于 7 月 20 日，将山西省东南部的警备任务移交第六十二师团后，准备进行对苏作战的训练。但不久任务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由北方改向南方。

在此之前，华北方面军司令部根据以往剿共作战的经验，于 1943 年 5 月编写了一本《肃正讨伐参考》的小册子，并以方面军参谋长的名义分发各部队，作为教育训练的参考资料，其目录如下:

第一、华北共军的特点及其战法；第二、一般讨伐的要领；第三、作战意图的保密；第四、情报的收集和审查；第五、警备要领；第六、指挥官；第七、通信联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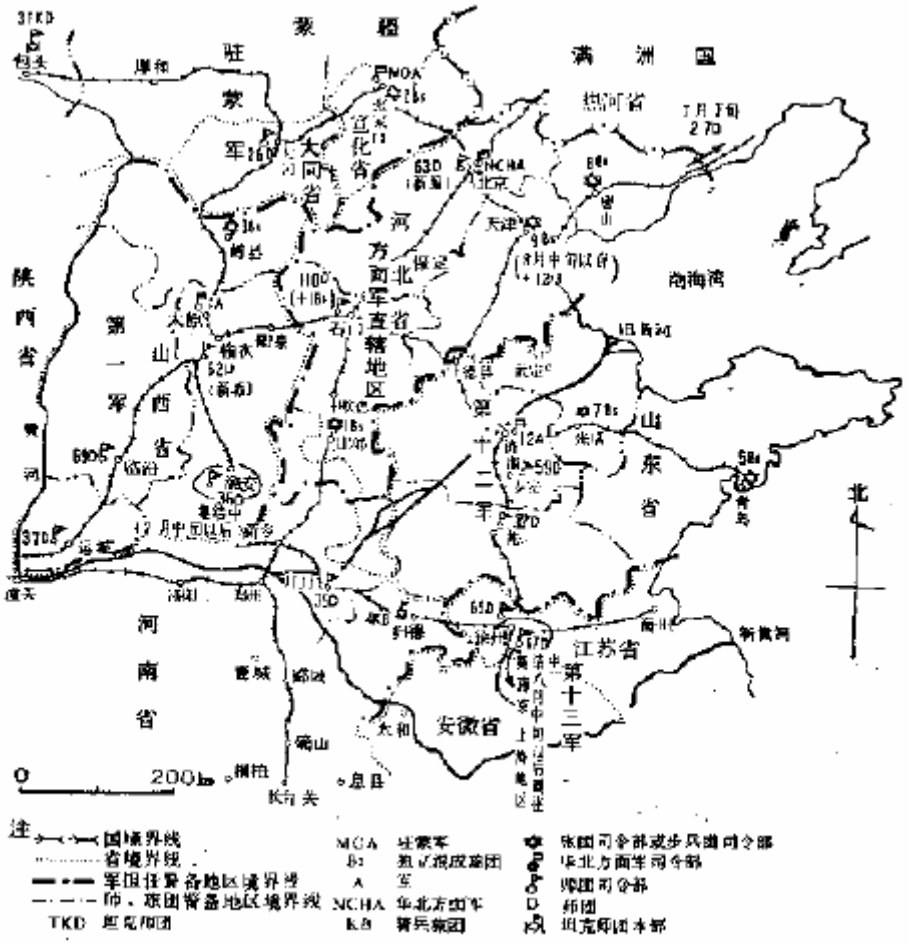


图10. 华北方面军警备形势图(1943年 8 月当时)

本书是要向直接参与讨伐、警备、对抗共军游击战术的各级干部提供在战斗行动上的指南。由于人员的接替补充，以致毫无剿共作战经验的干部增多，以及中共方面势力扩大、战法进步等原因，因此期望借此克服固定不变的战斗指挥法，实行适合于剿共作战特点的教育训练。

现将该书第五项“警备要领”叙述如下:

一、警备的一般要领是，占领要地，并加强其周围的防御设施，减少在一处所需的警备兵力，而在每个地区尽量直接掌握较多的兵力，根据周密的情报网获得敌情，先发制人，进行神速的讨伐，搜索敌人而歼灭之。

二、警备期间，力求严肃军纪，时间许可时，要进行教育训练。各警备队应明了守备地区内外的情况，努力做到军纪森严。恩威并举，特别要使民心安定，恢复其对日军的信赖，使居民能与日军协力，负起自卫的任务。

如能作到军纪严明，得到民众的信赖，敌可望风屈服。敌人判断军队价值的眼光是异常锐利的。

三、警备部队要不断实行警备行军，其范围应遍及所担任警备的全部地区，以使每个村落无不瞻仰皇军威容，促使居民自动担任自卫。必须严禁仅仅固守于驻防设施。消极退缩不前。

四、防御设施，应有周密慎重的计划，要使所构筑的工事，虽遭优势敌人的攻击，亦得以确保无虞。为此，各上级指挥官必须亲临现地，进行具体指导。

在兵力不足的情况下，如在无城墙的县城或村落进行防御时，白白地占用多数兵力，不仅减少了讨伐或出击的兵力，且使兵力分散，处处薄弱。因此，可在县城或村落等外圈或其一角，利用便于防御和出击的建筑物，构筑坚固的设备。其设备可用砖建筑碉堡等，附以掩体，并在手榴弹投掷距离以外的外围要点，设置有障碍物的支撑点。

五、如在有围墙的村落中，必须在外部重要地点，安排步哨或潜伏斥候。否则不仅对外部敌情不明，往往遭到敌人从一方面牵制而进行的袭击。

六、在敌人经常出没的地方，在屋内宿营的部队必须准备两个以上的出入口，同时必须准备随时都能占领房顶的措施。在市街上，有时敌人预先控制各个出口使我不能逃出;另外，时常遭到房顶上敌人投掷的手榴弹，蒙受多数伤亡。

七、接近墙壁所构筑的散兵壕，应隔开相当距离，以防避敌弹。尤其是手榴弹因墙壁弹回而遭受的伤害.离开墙壁困难时，需设置掩体。

八、对我守备地点的攻击，多数是在夜间进行，因此，要根据各种迹象，事先察知敌人的企图。

当敌人来袭时，应尽量将其引诱到阵前最近的距离，出其不意，以火力一举歼灭之。如过早开始射击，敌人往往即行撤退。另外，过早地出击，也会削弱歼敌的效果。

九、铁路的警备，不可只管固守铁道线路，而应积极讨伐附近的匪团。同时，还应在线路之外的要地，分驻一部分兵力，使匪团不得接近距离线路至少有一日路程以内的地带。

十、为了警备铁路，除以一部兵力警卫火车站和重要设备以及进行线路巡查外，必须掌握有力的机动部队，在线路两侧的外围地区积极进行讨伐。为此，有必要建立周密的情报网，并与铁路机关合作共同组成铁路爱护村。

十一、敌军破坏铁路时，经常采取以一部兵力进行牵制的手段，切勿上当。

破坏铁路，大多是在敌军领导下，强迫附近村民执行。因此，彻底搜查附近村落，逮捕不良分子及通敌者，同时指导村民，负责爱护铁路，至为必要。

十二、铁路经常被破坏的地点，多半是固定的。对这些地点，特别要增加巡察次数，采用不规则的巡察时间，并于日落以后部署潜伏斥候，在铁道线路附近一定地区禁止通行，铁路沿线以外的危险地区也禁止夜间通行。利用此等方法有利于捕捉敌人。

十三、守备“碉堡”等分驻的小部队，特别要对敌人的谋略袭击提高警惕。不管多么忠实的中国人，对其使用如果完全信赖而无戒心，是危险的。

特别是守卫“碉堡”的分哨等，认为平安无事，擅自脱离武器，甚至脱掉上衣，穿着木屐等，全然处于无警戒状态，也应深以为戒。

中国方面武装团体的充实、整备

1943 年 **3** 月 **6** 日，大本营陆军部根据 **2** 月 **27** 日的大命精神对中国派遣军，以大陆指第一四五四号下达了“中国方面武装团体整备及指导纲要”。

原来，国民政府方面武装团体的培养，一直是按照 **1941** 年 **1** 月 **30** 日大陆指第八二四号文件实施的。其目的在于随着日华基本条约的签订，建设新国军和代替在华日军充实警备力量，从而协助我占领地区内的治安肃正工作。当时其实力对日军只不过起到辅助的作用而已。

此次指示的特点是:(一)使其具有实力，能够单独担任国民政府统治下的治安工作和肃正任务。为此，将政府直辖军队由原来的不足 **11** 万人，增加到约 **25** 万人。(二)从原来分别培养的方式，逐渐统一进行整备，特别是加强国民政府直辖的军事力量，作为贯彻执行政府政策的支柱。(三)协助日军作战仍然是今后的目标，但与过去相比，对其期望要求则更为迫切。

中国方面武装团体整备及指导纲要

第一，方针

一、中国方面的武装团体，为了日华协力，完成大东亚战争和建设新秩序，首先在国民政府的统治下，独立担任起治安的维持和肃正，以至将来能逐渐作到协助日军作战。

二、整备训练及使用的大纲等，实际上由日军统一掌握。

第二、指导要领

三、中国方面的武装团体，是指国民政府直辖军队、华北治安军、蒙军及其它武装团体而言，分别隶属于国民政府、华北政务委员会和蒙古联合自治政府。考虑到各地区的特点，将原有的武装团体进行整理、合并，同时，通过整顿或编成必要的新建团体，逐渐使其体系完善。

四、整备的数量，要考虑国民政府、地方行政机关等的财政状况，地区的特点和治安的状况等而决定。目前，暂定标谁如下:

1.正规军队

甲.国民政府直辖军队 约 **25** 万以内

乙.华北治安军 约 **10** 万以内(包括剿共军等)

丙.蒙军 约 **1** 万以内

2.正规军以外的武装团体

考虑上述各条件，由各地方分别决定。

五、当前的编制，鉴于整备的目的，正规军队除特别规定者外，应以步兵为主，其装备可具有小口径火炮以下的武器。其它武装团体，以徒步为主，应避免编制过大。

六、航空部队，虽考虑将来防空战斗队的编成，但由于资材等关系，暂时不予增强。

七、在装备上所需要的武器和资材，主要依靠由日军交来的缴获物资解决，其它补充来源，虽尽量应由日本维持，但简单武器弹药制造修理补充机关，在中国方面负担范围内可以设置和经营。

八、日本与中国方面武装团体间的关系，依各地区的特点而定。但关于作战警备上的重要事项，规定由日军指定的指挥官负责，实际上得以指挥中国方面的武装团体。

九、为了维持治安，务使各团体的配备及行动等，符合日军所进行的作战或警备上的需要。

十、教育训练。以达到上述目的为目标，按各地区的实际情况，主要进行干部教育。

为此，在中央政府及各地方政务机关中，设置必要的教育机构。

十一、中国方面武装团体的指导机构，按以下原则进行工作:

属于国民政府的武装团体，根据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或有关的军司令官的命令或指示，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顾问及其所属机关等进行指导。

属子华北政务委员会及蒙古联合自治政府的武装团体，根据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和驻蒙军司令官的命令，由各该军所属的顾问、教官等进行指导。

十二，关于经费按以下规定实行:

1.中国方面武装团体所需的经费，应考虑团体的性质、所属等，原则上由中央政府或地方行政机关等中国方面支付。

2.招降工作及其所需经费，应考虑地方实情和归顺部队的性质等，原则上应由中国方面适当支付。

中国方面在军事上，亦应执行华北、华中一体化的方针，通过加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充实各武装团体，逐步整顿归顺部队，以图全军的组织化及提高其实力。

军事委员会为国民政府的最高军事机关，于 **1941** 年 **3** 月成立**(**委员长由政府主席兼任**)**，下设参谋本部、军事参议院、军事训练部、政治训练部以及航空署，军政部、海军部属于行政院。**1942** 年 **10** 月，在委员会内设立了陆军部、海军部，除特别设置了总参谋长外，大规模地进行了机构改革，加强了委员长的人事统帅权，同时充实了归顺将领的思想教育以及干部再教育的机构。**1943** 年 **10** 月，新成立了“驻华北办事处”，使其处理在华北的国民政府直辖军队**(**华北绥靖军除外**)**的军务。同年 **12** 月，再次改组军事委员会，采取了充实上层阵容的措施。

军队数量于 **1941** 年 **1** 月统计: 正规军约为 **15** 万人，准正规军约为 **18** 万人，舰艇约为 **100** 艘。其后，增加了归顺部队。如 **1941** 年 **2** 月李长江、**1942** 年 **4** 月孙良诚，先后参加了国民政府，在 **1943** 年内，**1** 月有吴化文，**5** 月有庞炳勋、孙殿英，**6** 月有荣子恒等归顺。政府对此等归顺部队，进行整顿或再训练后，编入了正规军。此时政府军的总兵力约达 **25** 万。但是，以之代替日军，则相差尚远。

1944 年 **4** 月的军事委员会及军组织系统如附表。

在华北，原来由治安总署督办齐燮元监督指挥治安军**(**华北绥靖军**)**和警察，方面军的军事顾问部担任指导和培训。**1943** 年 **2** 月，机构进行改编，由内务总署统一指挥警察，在治安总署内新设宣导局，以加强对共思想宣传工作。治安军至 **1941** 年底已编成五万二千人的部队，其后兵力未有增加。该军活动于警备、讨伐的第一线，并且正在努力加强团结和训练。准正规军约有二万人，根据归顺部队的情况，有所增减。随着国民政府的参战，为了对确保华北治安作出更大贡献，于 **1943** 年 **4** 月和 **10** 月，召开了绥靖军高级军官会议，研究了具体措施。**11** 月又修改了“华北政务委员会条例”，以期简化行政，并迅速推行决战的各项措施。此时，由杜锡钧就任治安总署督办、华北绥靖军总司令，人事为之一新。

注:军事顾问部长，继田岛彦太郎少将之后，由大桥熊雄少将**(1943.6**—**1944.4)**就任，野田哲大佐就任军事顾问部高级部员。顾问部的部员、教官等实际人数约 **150** 名，除此之外，还有由中国方面聘请的教官数十名。中国方面强烈希望增加顾问部的人员和补充治安军的武器。

此外，为了确立地方治安，各县警备队曾有较大贡献。**1943** 年 **5** 月底，华北政务委员会制定了“保安队条例”，警备队改称保安队，重新进行改编。过去

县警备队由各省自行指挥，此后则统一由中央指挥，由内务署督办任保安总司令、各省长任保安司令、各道尹任保安指挥、各县长任县保安队长，在一元化的指挥下，全力以赴进行剿共。

二、华北方面军的春、夏季肃正作战

华北方面军年初以来，为了贯彻对华新方针的宗旨，进行了各项准备工作，从新年度开始便着手整顿兵备、变更警备部署、对苏作战的准备、进攻作战的研究等等，并积极进行肃正作战。

在河北省冀西地区、南部太行山脉地区及山东省鲁中地区，进行了较大规模的作战。其它各兵团、警备队，为了管区内的治安肃正，曾不断地进行讨伐。特别是真渤特别行政区内由日华军警协力进行的扫荡战，在冀东以及平北(北京地区)地区内多次的肃正作战，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总结以上肃正作战的特点是：与盘踞在华北管界内重庆军的涣散和战斗力衰退的情况相反，中共的地下组织，却显著活跃起来。因此，为了剿灭中共势力，决不能满足于击溃其表面的势力，必须以其潜伏组织，特别是指挥中枢、秘密设施为主要目标，实行搜索剔抉的战法。

现将主要肃正作战，即 **1943** 年春冀西作战、太行作战、四十号作战、**1943** 年夏太行作战、第十二军管区内的作战，概述如下:

1943 年春冀西作战(“は”号作战)

(4 月 18 日～5 月 11 日)

冀西地区状况 该地区位于冀西的太行山脉北部地带，为晋察冀边区军区的主要根据地，由第一至第五军分区所组成，是该边区的中心。根据截至 **4** 月上旬的情报，得知军区司令部(司令聂荣臻，据说曾兼任冀西军区司令)在平山县回口附近，第三军分区(司令黄永胜)以唐县史家庄附近为根据地，占有完县、唐县、阜平、曲阳各县；第四军分区(司令邓华)以平山县寨北附近为根据地，在行唐、灵寿，平山、井陉各县继续活动。此外，并判明在陈庄附近有抗日大学分校以及武器、粮秣、被服库等军事设施多处。

但是，其军事设施隐蔽分散较广，有的利用民宅或伪装成民宅，有的设置洞窟等等，并且能够迅速迁出转移，因而很难掌握其所在地。其军队的位置也同样难以确定。

地形大部分是由岩石构成的连绵不断的高地，很少有森林和耕地，物资也不丰富。

作战计划大纲 本作战是根据方面军年度计划，在第一一 **O** 师团长的统一指挥下，以军分区司令部为目标，首先袭击第四军分区，继而袭击第三军分区。设法消灭该地带的共军(约一万五千人)，彻底摧毁其根据地设施。作战计划如下:

一、作战的时间及参加的兵力

第一期(4 月 18 日一4 月 28 日)步兵约十二个大队为基干。

第二期(4 月 29 日一5 月 10 口)步兵约十六个大队。

二、作战指导要领

第一期:以主力(约十个大队)从平山、灵寿方面，另一部(第一军的两个大队)从滹沱河上游地区，迅速开始急袭，占领陈庄附近根据地四周的要线，构成一严密的包围圈，断绝内外的一切交通。

继而投入有力的扫荡队，逐渐压缩包围圈，彻底实行扫荡剔抉作战。

第二期:以主力(约十二个大队)从完县，曲阳方面，另以一部(约四个大队)从涞源、灵邱方面进发，对军城附近的敌根据地构成包围圈，与第一期作战同样，实行扫荡剔抉作战。

注:当时的第一一O师团参谋长中村三郎大佐回忆如下:

本作战指导方法，并不是单纯的分进合击，而是师团根据以往对共作战屡次失败的经验，重新研究出来的办法。这是从捕鲇鱼的方法得到的启示，在急流里捕捉鲇鱼，不能在投网后立即拉网，以免隐藏于石缝的鱼逃脱。要先从上面轰赶，藏起的鱼入网后再拉网才行。为此，必须特别注意以下事项:

(一)指定的目标要适合我方兵力。

(二)在作战准备期间，要严守秘密，更要发挥夜间轻快的机动力，迅速地、无间隙地构成包围阵地。

(三)担任扫荡剔抉的挺进队，要准备建立专门负责甄别民匪，挖掘隐藏物资的特别工作队等。

(四)为了隐蔽作战企图，要将大行李、小行李分别运送。另外，为了便利反复扫荡，要将补给站设置在包围圈内的中心地点。

作战经过概要

第一期作战 4月18日夜，参加作战的各部队，一齐开始行动，击溃少数敌人后，至20日拂晓构成了以回口盆地为中心、直径约50公里的包围圈，随后投入挺进队，在包围圈内到处展开了果敢的扫荡战。至21日晚，将包围圈压缩到以红崖附近敌根据地为中心，半径约8公里的圈内，从22日拂晓开始总攻击。但敌主力于前夜早已分散逃逸，或改穿便衣，终于未能歼灭。至26日止，各部队继续寻找敌人，进行搜索剔抉，同时摧毁其军事设施。本作战期间，敌人遗尸518具，俘虏316人，我方死6人，伤42人。

第二期作战 4月30日傍晚，吉田支队(吉田少将指挥的步兵七个大队)从曲阳地区，白泷支队(白泷少将指挥的步兵五个大队)从满城、完县地区，井手支队(井手大佐指挥的步兵五个大队)从倒马关地区，分别开始行动。5月1日拂晓，在军城、北情醒、固城一线，构成包围圈，各支队派出一至二个挺进队(以一个大队为基干)向各目标突进，并在各地进行战斗。敌人从包围圈外向包围阵地猛烈攻击，以图解围。根据此种情况及俘虏的口供，可以判断，包围圈内有包括司令部在内的，相当强大的部队。各队实行扫荡剔抉作战至5月10为止。由于地形险峻，影响了部队的快速机动，虽未能按预期目的捕捉到敌方大部队，但到5日为止判明敌遗尸560具，俘263人。

根据井手大佐在1943年6月4日第二十六师团团队长会议上关于本次作战的讲话，总结出如下的教训:

(一)作战企图要严格保密，并要彻底熟悉夜间行动。

(二)所有部队应对队员进行搜索和处理地雷的训练，并应携带必要器材。

(三)为了突破险峻地带，应准备麻绳、杖杆、备用马蹄铁等，并有必要对日本马进行训练。

(四)应采取各种手段确保通讯联络无阻，并应携带备用无线电机。

(五)无线电窃听、准备秘密侦察队亦属必要。

(六)研究包围圈压缩方法，特别要考虑到在山岳地带互相联络和堵塞间隙的困难。

(七)努力获得搬运人伕。

(八)共军的战斗意志极为坚强，只剩一兵一卒也要坚持抵抗。

冀西地区为山岳地带，地形错综复杂，我方部队前进多受阻碍。共军则由于熟悉地形，民众又完全在其掌握之下，退避、隐藏极为容易。日军虽煞费苦心构成包围网，但因网眼过大，致使敌大股部队得以逃脱。因此，对该地区每年虽多次实行讨伐作战，但从整个情况来看，与敌人部队作战或得到捕捉敌部队的机会却极少。最大的效果就是摧毁敌人的根据地，这在物质及精神方面似给共军以很火损害。中共对此也采取了对抗措施，即在主要根据地以外，设立了许多秘密的预备根据地，力求减少损害。

1943 年春太行作战(“ヨ”号作战)

(4 月 20 日—5 月 22 日)

重庆军的状况 盘踞在太行山脉南部省境附近的第二十四集团军(集团军司令庞炳勋)屡遭讨伐和经济封锁，战斗力显著下降，极为穷困。但在重庆中央的指挥下，于 1943 年初以来，增加了陵川附近的兵力(约 8.2 万)，加强了阵地，对治安地区的扰乱以及征集粮秣等活动稍见活跃。在靠近北方中共势力的地带，始终与中共对立，继续进行暗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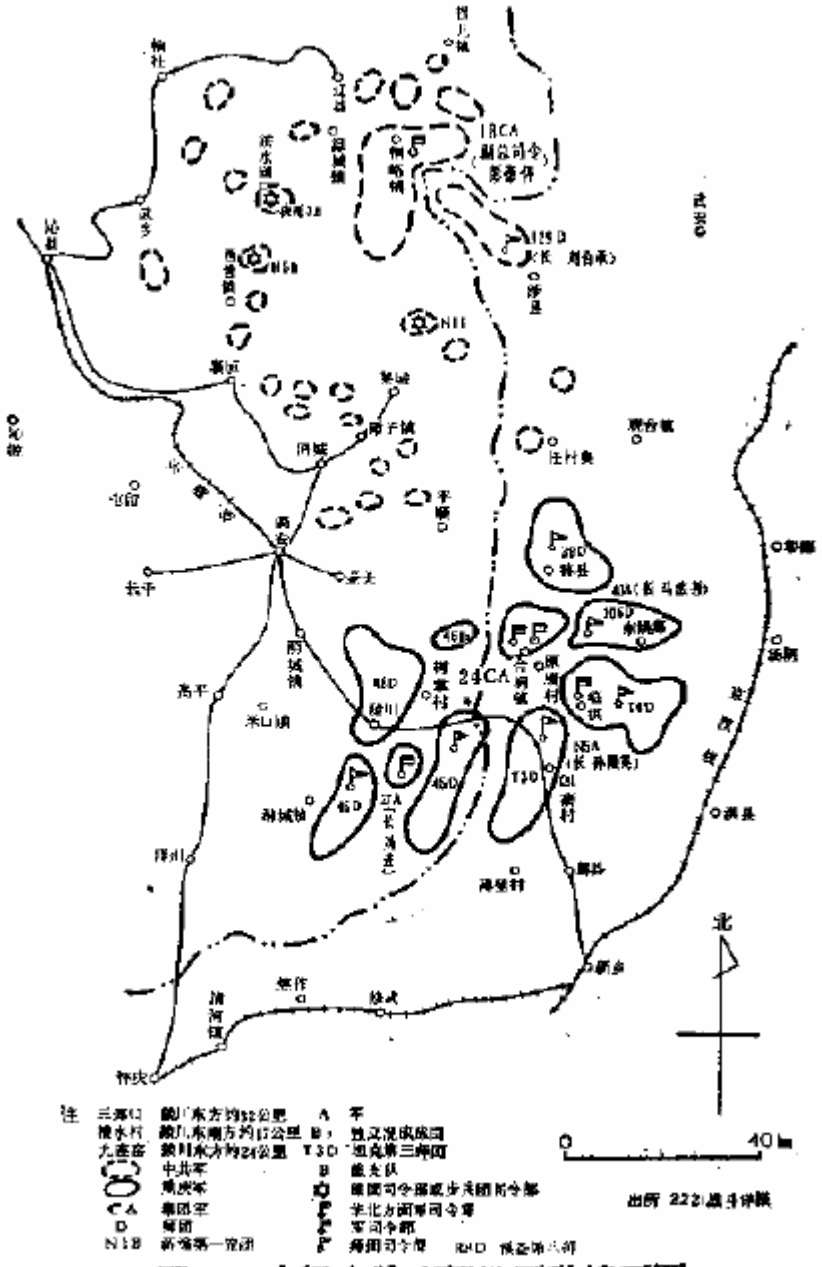


图11. 太行山脉南部地区敌情要图

（1943年4月30）

中共党和军的状况 太行军区的共军(司令由第一二九师长兼晋冀鲁豫边区军区司令刘伯承兼任)一向被称为该边区军区中的最精锐部队，华北共军指挥中枢的第十八集团军司令部，也设于此，由集团军副总司令彭德怀(总司令朱德当时在延安)统率。该部虽屡遭日军扫荡，但因巧妙运用退避战法，保持了战斗实力，现正通过“精兵简政”以图再起，同时继续对日华的军、官、民行使各种政治谋略，以及破坏小据点和通信交通线等。1942 年 6 月以来，该部在重庆军第四十军势力逐渐衰弱的情况下，正在企图南下扩大地盘。

地形及居民的状况 共军和重庆军的根据地周围，均为险峻的山岳地带，并有很多地隙和断崖，因此，我方在道路以外行动异常困难。但对敌方来说，却便于破坏交通道路，并且适合其分散潜伏行动。居民对我方一般都有敌意，而敌方工作又做得彻底，根据以往的经验，凡日军进攻的地区，全然见不到居民，

因而，想找到带路人、搬运夫、以至收集情报都极为困难。另外，空室清野作得彻底，扫荡搜索隐蔽物资，很不容易。

作战计划大纲 本作战根据第一军的提议，预定由军单独实行，但在向方面军申请过程中，逐渐扩大了作战规模，决定以第十二军一部兵力参加本作战。4月4日制订的第一军作战计勉大纲，概要如下:

一、作战方针

4月20日开始作战，首先将晋东南地区的第二十四集团军急袭歼灭后，将兵力转向西北方，对涉县附近的第十八集团军司令部及第一二九师，进行扫荡剔抉，消除搅乱山西省的根源。

二、作战期间及作战兵力

第一期: 4月20日—27日。第一军步兵约二十六个大队，第十二军步兵约八个大队。

第二期: 4月28日—5月10日。第一军步兵约二十九个大队（山西剿共军约2,000名参加），第二0六独立飞行队办助作战。

三、兵团部署概要:

第一期 约由十四个大队(以第三十六、第三十七师团为基干)从潞安及泽州(原为泽州府，今山西晋城附近—译注)正面，约用十二个大队(以第六十九师团、独立混成第三、第四旅团为基干)从京汉线方面的彰德、淇县之间地区，第十二军约八个大队(以第三十五师团为基干)从新乡及其西北地区，分别向林县、临淇附近进攻。

第二期 约用十个大队(以第三十六师团为基干)从潞城、襄垣、辽县方面，约用三个大队(以独立混成第四旅团为基干)从林县北方地区，约用四个大队(以独立混成第三旅团为基干)从武安方面，分别向涉县南方地区压缩包围圈，以第三十七、第六十九师团为基干的约十二个大队，在此期间，扫荡第一期作战地区，随后北上阻止共军向南方逃逸。

注:关于发动此次作战的原委:

1942年6月第一军在晋冀豫边区的肃正作战末期，曾对“宿敌”第二十四集团军进行作战，但未收到明显的成果。年初以来，该集闭军力图挽回其势力，因而刺激了第一军;另外，五号作战准备中止后，为了振作第一军官兵的士气，并粉碎“日军从华北撤退”的敌方宣传，以及有利于促进重庆阵营崩溃等，计划对第二十四集团军实行歼灭作战。

3月l日，制成作战计划草案，2日请求方面军批推。方面军认为剿共第一，治安肃正应首先讨伐共军。第二十四集团军的存在并无大害，相反，使其与中共的对立激化，则是上策。在此期间，第三十五师团正在进行招降工作，如能得到进展最为理想，若过早打击第二十四案团军，则其后出现的空白地带中共势力将很容易渗透。第一军考虑方面军的意见，决定改变计划，以第十八集团军和第二十四集团军双方为攻击目标，在第三十六师团抽出以前进行作战。于3月29日再次申请方面军批准。

方面军于3月31日份晚通知第一军对作战时机予以延期，其理由是:(一)从4月下旬预定实行的冀西作战。要从第一军抽出兵力参加;(二)随着作战规模的扩大，目前进行中的兵团改编业务结束后，要接受从第十二军派出的增援兵力;(三)第三十六师团集结后，预计暂时仍需留于潞安地区等。

在此以前，第一军已于当天的参谋长会议上，预先秘密指示了作战准备命令，得到上述通知后，再向方面军申请强调希望按计划实行，终于在4月1日得到批准。其后，便与在石门、开封的邻接兵团取得联系，同时决定第三十五师团主力参加作战，并于3日与第十二军协商完了。

作战经过概要 第一军及参加作战的各兵团，于4月1日以后正式进行作战准备，从10日开始了集中运输工作。军司令官于15日在训示中提出要求和希望:“(一)发挥机动力，保持纵深的、面的包围形势;(二)迅速克服敌人所依恃的险

峻地形；(三)采取各种手段确保通讯联络；(四)通过彻底的扫荡剔抉，消灭敌人战斗力。”

注:各兵团准备训练中的特殊事项:

(一)根据前一年的战斗训练,研究了新战法;(二)发挥夜间的机动力及处理地雷的训练;(三)向全体人员分发敌干部的照片。

第一期作战 4 月 20 日，第一军按预定时间稍为提前，开始了攻击。

第三十六师团击溃正面之敌，越过省境，企图向临淇方向进攻，于 20 日午后，以主力从荫城镇、米山镇附近开始行动，克服险峻地形造成的困难，于 21 日晚，突破了树掌镇附近的阵地，另以一部从微子镇、壶关附近开始行动，驱逐共军，21 日晚越过省境，进入林县西部地区。

第三十七师团，与第三十六师团同样企图向临淇方向进攻，20 日午后，从附城镇附近开始前进，至 21 日晚，突破了陵川东南的横水附近阵地。

独立混成第四旅团 20 日晚，从观台镇附近开始行动，经过任村集，于 21 日晚，进入林县附近。独立混成第三旅团从汤阴地区，向东姚集方向、第六十九师团从淇县西部地区向临淇方向，分别开始了进击。另外，第十二军的第三十五师团也从新怀路(新乡一怀庆间)(怀庆今河南沁阳一译注)沿线地区，向陵川、临淇一线进击。

第一军鉴于作战的顺利进展和根据特情(秘码破译)判明敌人的行动，于 21 日午夜，作了如下部署:“以主力在临淇西北合涧镇地区构成半径约为 20 公里的包围圈，同时以一部扫荡歼灭横水村附近的敌第二十七军。”

各兵团按照命令，至 22 日日落时，构成了包围圈，从 23 日晨开始逐渐压缩，搜索扫荡企图逃逸潜伏之敌，尽力搜索、捕获敌人干部。

第三十五师团早就劝其归顺的新编第五军军长孙殿英，于 24 日晨与部下一起，向横光支队投降。

在此期间，第三十七师团的一部，搜索潜伏于横水村(陵川东南方约 17 公里)附近的第二十七军，继续进行了扫荡。

26 日夜，第一军决定延期转入第二期作战。至 30 日止，对陵川以东三郊口(陵川东约 32 公里)附近，彻底进行了扫荡。27 日，将第三十七师团主力、米丸支队及第六十九师团的一部转用于横水村附近。29 日，第三十七师团的一部在陵川东部约 24 公里的九连窑附近，击溃了第二十四集团军及第四十军的两个司令部，但其首脑逃脱。另外，独立混成第三旅团，对依靠东姚集的坚固阵地顽强抵抗之敌，在炮兵、工兵、空军等的强力协助下，进行攻击，29 日占领了该地。第三十六师团主要对陵川东北地区之敌，第三十五、第六十九师团各主力及独立混成第四旅团主要对省境以东地区之敌，分别进行了搜索剔抉作战。

第二期作战 第一军在 5 月 1 日以后，对第二十四集团军的残敌继续进行扫荡，同时为了准备攻击共军，责令各兵团向集结地北进。

5 月 5 日，在本村旅团扫荡地区内的三郊口附近，通过第三十五师团的田中彻雄少尉(步兵第二二 O 联队所属)极其勇敢机智的招降工作,终于使化装便衣潜伏的第二十四集团军司令庞炳勋投降。

注:田中少尉 5 月 3 日接受了诱降庞炳勋的命令后，便率领下士官等 11 人，并偕同以前归顺的孙殿英的秘书等，急奔四寨村，根据在当地收到的情报，弄清庞炳勋的驻地后，遂即潜入盘据在险峻山谷的敌营中，4 日深夜与庞会面，经过说服。终于 6 日晚与庞同来新乡。6 月 12 日第十二军司令官授予田中少尉奖状。田中少尉毕业于东亚同文书院，曾在满铁调查部工作，以后入伍。他在很早以前就专门从事对孙殿英的诱降工作。

军在第二期作战时，根据“5 月 6 日开始进攻，对以涉县为中心的共军根据地，构成严密的包围形势后，逐渐压缩三层包围圈”的设想，向各兵团进行了部署。并指示按以下实施要领注意进行作战准备：(一)用步兵一个大队以下兵力的几个纵队，以涉县作为目标一齐突进；(二)各纵队令突击队提前半日出发先行挺进，另外，在各包围线上的要地留置一部兵力防止敌人逃脱；(三)进入第三包围线后，以此作为扫荡据点，剿灭其内部之敌；(四)进行扫荡时，夜间行动要作到机敏灵活，诱出潜伏之敌，利用中国方面的军警，努力获得隐藏物资。

根据截至 5 月 5 日的情报得悉，敌军司令部至 4 月 29 日仍在原来的位置未动，但似已作好逃跑的准备。另外，西营镇附近的军需品已搬入山中，并已埋藏地下。

第三十六师团为了确保本作战的成果，于 5 日下达了变更部分原警备部署的命令如下：

(一)将辽县的警备移交独立混成第四旅团；(二)5 月底以后，令剿共军第一师(日军的一个步兵中队给予支援)进驻蟠龙镇(西营镇北约 16 公里)附近，使其担任确保铁矿资源地区及附近一带的肃正建设工作；(三)为了阻止太岳地区共军的南北移动，以一部兵力在沁源(潞安西北约 80 公里)至屯留(潞安西北约 30 公里)之间，构成切断线；(四)以联队长指挥的有力部队，牢固地占领陵川附近；(五)潞安陆军联络部长指导陵川附近的复兴建设；(六)利用中国方面的武装团体，必要时使其担任特定地区的警备；(七)随着警备地区的扩大，改变原来的高度分散部署，尽量集中兵力(将分哨限于最小限度)，随时出动游击，维持治安。

5 月 6 日，按照第一军的预定，第三十六师团从潞城、襄垣、辽县附近，独立混成第三旅团从武安东北地区，独立混成第四旅团从林县北部任村集附近，分别向涉县附近开始进攻。

作战顺利进展，各兵团逐渐压缩包围圈，神速、果敢连续进行攻击。9 日以后，逐渐采取分散形势，至 13 日为止，搜索攻击逃避潜伏之敌，尽力获取敌人的物资。但是，要在短期内捕捉善于避免正面交战、彻底实行地下战术的共军，是极为困难的。因此，未能取得大的战果。

在此期间，第三十七师团与第六十九师团主力共同扫荡了陵川以东省境附近的山岳地带，于 9 日结束。12 日以后，除留置一部兵力外，其主力逐渐返回原驻地。

我军在 14 日以后，使第三十六师团转入警备体势，同时，以独立混成第三、第四旅团主力及第六十九师团的一部，合计步兵十三个大队为基干，对逃往松烟镇(辽县东北约 30 公里)附近的第十八集团军军部和第一二九师师部，进行跟踪扫荡，但终被逃脱。16 日，以第三十六、第三十七师团的一部及独立混成第四旅团，扫荡了榆社以北地区的共军新编第十旅。

这样，从 4 月 20 日以来，连续实行的太行山脉南部的肃正作战，于 5 月 31 日结束。敌人损失:遗尸 9,913 具，俘虏 15,900 人，投降者约 58,000 人(以上大部为第二十四集团军，属于共军的为数极少)。日本方面的损失：战死 227 人，伤 803 人。

注：庞炳勋于 5 月 9 日声明参加汪兆铭的和平阵营，随后在 14 日，号召旧部官兵和民众停战。通过日军的猛攻及招降工作，其归顺投降者，一度约达 74,000 人，但其后，由于第二十七军进行工作，致使第四十军的态度呈现暧昧，故归顺投降者的数字有所减少。23 日，庞炳勋、孙殿英编成和平剿共军(暂编第二十四集团军)，24 日，南京国民政府国防会议，任命庞、孙为军事委员会委员。

重庆及中共方面的状况 重庆方面有关本作战的记录如下：

日军以各兵种联合兵力约 5 万余人，从各地分路于 4 月 16 日开始了全面包圈攻击。第二十四集团军的前沿据点，虽奋勇抵抗，但终被相继突破。集团军主力保有陵川以东地区，以机动态势迎击敌人，从 18 日起至 24 日，展并了猛烈的主力战斗。其后，我军在山区留置一部兵力，以主力向敌后挺进，对敌进行夹击，因而敌人在 5 月上旬，用一部固守重要据点，主力依次返回。我军乘此机会，于 5 月中旬，大举进行反攻，给敌人以极大的损害，并恢复了各据点。其后，新编第五军合并于第四十军，第四十军转入整训，第二十七军也恢复了旧地。

中共方面有如下记录:

敌人新采用的所谓“对华新政策”，是敌人一贯实行的“以华制华”政策的进一步发展，也是在华北占领地区内，通过发动“新国民运动继续推行的治安强化运动”。

华北战场残存的国民党军队，在中条山战役(1941 年 5—6 月的中原会战)失败以后，其素质更加低劣，竟丧心病狂与敌人联合，采取反共政策，“视解放区为敌区，变日军占领区为自卫区”，企图依靠外力以图存。日军乘此机会，要求国民党军投降汪精卫，并发动“山东战役”及“1943 年春、夏季的晋冀豫作战”，施加军事压力。而国民党军完全丧失民族意识，坠入敌人圈套，大量投降敌人。从而使华北伪军竟达四十五万人之多，彼等用外国援助的武器，残害祖国的抗日人民，与我八路军对抗。(以上均未与中文资料核对—译注)

四十号作战(5 月 24 日—6 月 20 日)

原第二十四集团军的第四十军，响应庞炳勋的号召曾一度归顺，但由于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的压力，突然改变态度，企图逐渐南下渡过黄河。另一方面，第二十七军为重庆直系军队，比其它军队具有较强的战斗意志。该军一面对第三十五师团的招降佯作响应，一面随着日军返回原驻地，又纠合逃避潜伏各地的部队，以图恢复其战斗力。

对此，方面军一面仍然进行招降工作，一面于 5 月上旬，对第一、第十二军的一部重新进行了部署，以便对上述两军，尤其是第四十军的残部进行扫荡及阻止其南逃。

首先，第三十五师团于 5 月 24 日开始行动，将长谷川支队部署于黄河北岸，构成阻截线。27 日，向临淇以西省界方面派遣了横光支队。第三十六师团责令佐久间部队与之策应，在陵川一带进行了扫荡。6 月 12 日，横光支队、安达部队击溃了向济源西南地区南下的第四十军的第一 O 六师。

6 月底，随着日军的撤退，第四十军的残部返回临淇、合涧镇附近，苟延残喘，并在林县以南地区构成阻截线，以防共军南下。

1943 年夏太行作战(“シ”号作战)

(7 月 10 日—7 月 31 日)

第二十七军(军长刘进)，第四十军、第四十五军、预备第八师等约 3 万人，巧妙地逃避了日军的扫荡，企图于 6 月南渡，但未能实现，遂向陵川以东、以南的省境山岳地带内进驻，企图重建根据地。

方面军于 6 月末，命第三十五、第三十六师团主力进入新乡、怀庆、泽州一线及其以西地区，以防止第二十七军逃脱，同时仍继续进行和平招降工作，

但至 7 月上旬，突然决定立即解决该敌。

注:该决定是根据第一军“立即发动歼灭作战”的强烈要求而决定的。第一军认为“和平工作，已无希望，必须在第三十六师团转调以前，付诸实行”，因而早就秘密进行了准备。

当时，第二十七军长刘进，侦悉日军的集结状况后，于 7 月 7 日表明“彻底抗战”。对此，方面军部署兵力，进行了作战准备。

一、第十二军以第三十五师团主力从新怀线(横光支队从薄壁镇，修武北面地区，长谷川支队从焦作、清化镇以北地区)方面，长岛支队从辉县、林县方面，于 11 日以后，及时向各省境开始进攻。

二、第一军以第三十六师团的主力在陵川附近，以一部在壶关、荫城镇附近，另以第三十七师团的一部在泽州、清化镇方面接触敌人，并作好攻击准备，于 10 日以后，随时开始行动。

三、参加作战各部队，要准备编成负责搜索敌军司令部的数个追击队或挺进突击队。

第一军的各兵团从 10 日晨开始了攻击。但如所料，未曾遭遇大股敌人。由于已进入敌人根据地附近，虽一兵一卒也不放过，进行了严密的搜索扫荡，以期彻底摧毁敌人势力。13 日，第三十六师团的吉野部队与第六十九师团的大津部队(大津重雄中佐指挥的独立步兵第八十四大队)，猛追企图西逃的预备第八师，在端氏镇(高平西约 30 公里)以北，击溃该敌(大津部队在本战斗中，俘虏预备第八师长陈孝强以下约 250 人)。但是，第二十七军主力，从作战开始数日前，即已分散潜伏，期于日军撤退后东山再起。

第十二军的各兵团，也于 11 日以后，向省境方面开始行动。另外，第三十五师团的一部于 12 日，急袭怀庆以南的黄河各渡河点。切断其与第一战区主力间的联络。

15 日，进入第二期作战，第一、第十二军的各兵团在相互联系下，从陵川附近扫荡了省境地带，尤其对敌军长以上干部展开了积极的搜索。

24 日，方面军将独立混成第一旅团(旅团长小松崎力雄少将)及长岛支队纳入第三十五师团长的指挥，并责令新编成的第六十二师团的一部参加，以第三期作战的新部署，反复扫荡了残敌。因此，敌第二十七军的大部被击溃，军长刘进逃往黄河南岸。一部分残部，蛰伏于旧地盘附近，完全丧失了战斗意志。估计敌人迅速恢复战斗力极为困难。据此，方面军在 7 月 31 日基本上结束了作战，尔后，由当地兵团继续扩大其成果。

截至 7 月底，敌遗尸 1,371 具，俘虏 4,853 人，日军死 25 人，伤 84 人。

此外，在本作战期间，第三十六师团的葛日部队曾扫荡了蟠龙镇附近，并进行了招回居民的工作。在北部地区，共军并无明显活动。但在陵川地区有很多中共工作人员潜入，意图扶植代替第二十七军的势力。

注:河南省林县方面已有共军侵入积极进行赤化工作。8 月中旬。林县、临淇遭到优势共军的攻击，庞炳勋曾夸称“共军好比老鼠，日军好象狗，不管狗多厉害，对于捕捉动作敏捷的老鼠，也无能为力。我可以象猫那样，巧妙地捕捉老鼠。”然而，临淇的皇协军部队(指庞等的伪军一译注)，受到共军攻击后，立即崩溃退走。因此，第三十五师团从 8 月 19 日起约两周在林县附近进行了剿共作战。但晚秋以后，新乡以西，破坏交通、通讯线路以及恐怖活动等扰乱行为更加激烈。

第十二军管区内的肃正作战

在第十二军管区内，特别是在山东地区，由于日华协力肃正作战、开展治安强化运动和实行经济封锁，打击了山东地区的共军及重庆方面鲁苏区的于学忠军。因此，于学忠内部厌战及希望和平的气氛高涨起来，加以共军的压力，陷于困境，从而借反共名义向日本投降者，逐渐增多。

日本方面早就对之进行工作的新编第四师长吴化文，于 **1943** 年 **1** 月 **18** 日率新编第四师及第一师约四万人，归顺了日本方面。国民政府同意使之编入国军，并任命吴化文为“和平建国山东方面军总司令”。吴化文的部队，在以后曾积极协助日军作战。于 **4** 月中旬，攻击鲁苏战区的重庆军队周光烈的第五十一军、刘桂堂的新编第三十六师，取得了较大的战果。

位于山东中部地区的独立混成第六旅团(旅团长奥村半二少将，配属独立混成第七旅团的步兵两个大队)，从 **1** 月 **7** 日起，在寿光(益都东北方约 **30** 公里)附近，围歼了保安第十五旅。随后于 **1** 月 **15** 日与第五十九师团协力在大王村(济南东北方约 **100** 公里)附近，包围袭击了清河军区的共军，给以歼灭性的打击。**2** 月下旬，与独立混成第五旅团协力，讨伐了城项山(沂水东北方约 **55** 公里)附近，除俘虏了第一一三师长韩子恒、挺进第二纵队司令厉文礼等多数干部外，还歼灭了敌人抗战部队的大部。

重庆军的鲁苏战区军，在鲁中、鲁南维持苟延残喘的状态。第十二军于 **4** 月以后，对之进行彻底追击战，**5** 月 **14** 日，独立混成第七旅团和吴化文指挥的六个团，在新泰东部地区搜索到于学忠军部和第一一四师，俘虏和击毙敌人各 **1,000** 名左右，鲁苏战区之敌大为动摇。**6** 月 **6** 日，该战区鲁南指挥部总司令荣子恒，率领部下约 **2** 万人，脱离抗战阵营归顺了和平阵营。(荣子恒为东北系将领，曾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后在步兵、工兵学校进修。其父荣臻，于 **6** 月 **10** 日就任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

荣子恒由国民政府任命为暂编第十军军长。

如上所述，在此时期的作战，主要是对重庆施加了压力，招降工作也取得了极大的成绩。

三、蒙疆方面的对苏作战准备

一向的作战设想

中央开始重视促进蒙疆方面对苏作战的具体准备工作，是在 **1943** 年春季以后。

在这方面，向来的作战设想是:中国事变以前，“仅在多伦派遣约一个师团左右的兵力与中国驻屯军配合，担任警戒”;但自 **1939** 年起“便由驻蒙军主要确保张北附近阴山山脉的要地，以掩护关东军的侧翼”，开始构筑部分野战阵地，以后逐年加强。

1941 年“关东军特别演习”以后，经研究提出了如下设想:“为了策应关东军的辅助作战，以驻蒙军两个师团及蒙古军(五个师约为 **6,000** 人)确保正面的据点，通过机动防御以达到持久。此时，以一个旅团维持蒙疆地区的治安，根据情况对乌兰巴托方面采取攻势。”该设想已成为 **1942** 年度的计划。因此，促进了国境警备、情报收集、作战要地的调查等工作，并预定将原来的野战城堡改为钢骨混凝土的永久城堡。但是，由于五号作战的准备，大部分工事没有进展。

另外，驻蒙军在制订计划时，是以管区内的共军、西部的重庆第八战区军、北部的外蒙古及苏联军作为敌人，并且考虑到阴山山脉以北的广阔的大草原冬季的严寒等特殊地形和气象条件，这些都是制订计划的重要因素。

促进作战准备

大本营于 1943 年 2 月，制订了对苏作战年度计划草案。经进一步讨论并根据 4 月 5 日的总长指示，对派遣军作了指导(指示现无原文)。另外，于 4 月中旬，大本营曾发出通知：“希望确保多伦—张家口—包头，在与关东军取得联系后，也可以阿巴嘎作为主阵地。城堡、飞机场的整备等只限于应付急需，此外，则根据需要逐渐实施，避免刺激敌方。”

派遣军于 4 月 29 日制成方案，同时派遣主任参谋去蒙疆。他与当地驻军及关东军的有关人员。对驻蒙军修筑城堡及作战要领问题共同讨论后，5 月 4 日向大本营作了报告，其概要如下：

一、为了进行持久作战，应广泛利用阴山山脉前方地带。为此，在各要地采用据点式的、坚固的城堡设施，使其具有独立性，城堡地带及兵力配备规模如下:(1)阿巴嘎，(2)苏尼特右旗，(3)百灵庙，以上步兵三个大队为基干，(4)多伦，步兵五个大队为基干，(5)德化，步兵三个大队为基干，(6)平地泉，步兵一个大队，(7)包头，步兵两个大队，(8)张北，三个飞机场—四个战斗机队，轻重轰炸机各一队。

上记(4)、(5)要求对优势之敌能固守到数个月;(6)是阻止部分苏军和重庆军队;(7)为分割上述两军的阵地。

二、阵地修筑城堡，对主要战斗机关，以能够经受 5 吨炸弹威力为标准，全部实行地下设备，为了节约钢筋混凝土，全部采用坑道式，其进行顺序为 1943 年收集筑城材料，(1)、(2)、(3)阵地在 1944 年内大致完成，1945 年修补，(4)、(5)、(6)阵地，预定在 1944 年完成一部分。1945 年全部完成。

三、为了进行机动防御和攻势作战，应整备道路。攻势方向，预定指向乌兰巴托。在 1943 年将多伦—阿巴嘎之间的道路改成通行车辆的道路。

上述报告，于 5 月 6 日经大本营研究后，决定把阿巴嘎、苏尼特右旗、百灵庙阵地的兵力，保待在一个大队以下，并研究了筑城所需资材的收集、运输，以及作战部队的机械化等问题，从而促进了作战准备的迅速进行。

参考:

根据驻蒙军的调查，在当地生产的水泥、石灰、砖、木材等，不能满足需要，钢铁及其它材料，需全部依靠输入。另外，可能征用的民间车辆，其装载能力仅能达到四万九千吨。

其它关于蒙疆方面的敌情判断，并无可靠资料。驻蒙军判断：“敌人主要战场是在海拉尔，阿尔山(锡林郭勒盟东北端的北部)方面。在我军正面之敌是以切断满洲与中国并占领京津重要地区为目的进行辅助作战。其使用兵力，首先为三个机械化师。另外，这方面的主要作战，估计是沿张家口—乌兰巴托道路地区，其一部特别是外蒙军可能游动出现在阿巴嘎—多伦及百灵庙一厚和方向”。

大本营对蒙疆方面的作战估计，认为“开战后一个月内，地面部队和飞机都不会太多。三个月后会有一个师的兵力，恐无大的行动。六个月后，可能有两个师，在后方地区保有相当的预备力量，同时增加空军兵力，大肆破坏铁路。此时，可能与五原方面的重庆军队会合，逐渐向东方采取攻势。”

作战准备纲要的指示

7月15日，大本营关于蒙疆方面的作战准备，以大陆指第一五七四号文件，对派遣军下达了纲要。当时，因为对苏作战的全部计划尚朱确定，所以在纲要中只明确指示了应该确保的地区，其重点在于迅速修筑必要的城堡及定出其它作战准备的标准。关于确保线的选定，主要是根据与关东军最左翼阵地林西地区之间的联系和地形的特点而决定的。

蒙疆方面作战准备纲要

1943年7月15日

大本营陆军部

第一、要则

一、今后，蒙疆方面的作战准备，除根据1943年4月5日大陆指第一四七八号大东亚战争1943年度帝国陆军作战计划(无原文)外，以本纲要为依据。

二、根据上项，每当实行作战准备时，要考虑整个形势确定各该年度的作战规模。

另外，鉴于帝国目前对北方国策的根本方针，要避免刺激苏方，逐渐从后方地区进行渗透，并注意隐匿我方意图。

第二、进行作战准备必须依据的作战要领

三、中国派遣军在蒙疆方面的作战要领，基本规定如下:

1.作战目的

对外蒙苏军及重庆军队，应策划进行持久战，保卫蒙疆及华北要地，并使关东军易于作战。

2.作战方针

(1)对外蒙苏军及重庆军队，要确保阿巴嘎、苏尼特右旗、百灵庙、包头一线以南的要地，以便于持久作战，并使敌空军的行动困难。

(2)必要时，牵制外蒙方面之敌，使关东军易于作战。

3.作战指导大纲如下:

(1)驻蒙军(两个师团，一个坦克师团为基干)在阴山山脉以北地区进行作战，击溃外蒙苏军的进攻，以确保阿巴嘎、苏尼特右旗、百灵庙一线以南的要地，同时，尽一切手段，阻止敌空军基地的推进，使其难以行动。

在外蒙苏军主力向关东军方面进攻时，应及时以必要的兵力向蒙古东部进攻，尽量牵制较多的敌人，以利于关东军的作战。

对重庆军队，要确保包头方面的要地，抓住良机，予以各个击破。

(2)适当时机，要转用在华空军的主力，与关东军空军部队协力，击破外蒙方面敌空军势力，使地面作战易于进行。

派遣军基于上述指示，于8月初，命令方面军严格注意，在不刺激苏联的情况下，实行对苏构筑防御工事的三年计划。当时，作为地面作战兵力，除驻蒙军外，预定增援一个旅团左右的兵力。另外，为了确保满华联络要冲京津地区的安全，将抵抗线选定在多伦、德化、平地泉一线，为了极力阻止敌前沿空军基地的推进，在其前方地带，要特别重视机动防御。

驻蒙军在6月设置了由吉冈善四郎少将领导的“筑城部”，8月开始了构筑防御工事的教育及准备工作。然而，由于太平洋战况的关系，建筑材料缺乏的

问题难以解决，而且预计还要抽出兵力，所以，大本营在 10 月中旬，下达指示:“本年度仅限于实施有关飞机场的设施，明年度以后再考虑整个情况，决定每年度的工事规模和要领。”派遣军得到中央的同意，于 11 月中旬作了如下布置:“改以阴山山脉作为主要抵抗线，尽量利用地形，策划持久作战，首先应以重要的航空设施作为重点。”

注:由于材料及劳力不足，防御工事进展困难。加以 1944 年 3 月决定抽出坦克第三师团，同年 7 月又决定抽出第二十六师团，因而变更了计划，放弃包头、厚和，而要在平地泉以东阴山山脉一带阻止苏军的进入，缩小了作战准备的规模。

情报部的设置

根据 1943 年 7 月 22 日军令第七十二号，于同年 8 月 3 日临时成立驻蒙军情报部，作为驻蒙军司令部的附属机关。该部以驻蒙军参谋长为部长，以其情报参谋及军官、下士官等为情报部员，均以兼职执行勤务。与此同时，各地特务机关也改编为情报部支部，进行情报、谍报、防特、谋略等活动。其主要目的在于加强对苏的情报工作。

注:此组织系驻蒙情报主任参谋中西满治郎中佐，研究了关东军情报部，而后建立的具有同样机能的小型组织。

至战争结束时的情报部长、情报支部长如下:

军情报部部长先后为矢野政雄少将、中川留雄少将。

厚和支部长先后为小仓达次少将、野村茂中佐。

大同支部长为铃木重种中佐。

包头支部长先后为稻森利助中佐、田中良武中佐。

德化支部长先后为永井浩一中佐、高浦仪作中佐、幽经虎嵬大尉。

阿巴嘎支部长先后为牧野正臣中佐、竹原浩中佐。

备考:厚和支部长由军事最高顾问兼任，阿巴嘎支部归关东军情报部管辖，1944 年 9 月 27 日，该支部长由驻蒙军情报部支部长兼任。

四、推行新政策引起的波澜

中国经济情势严重及其紧急对策

华北与华中的经济具有紧密的关系，因此，先就全面经济状况加以说明。

对华处理根本方针的要点，尽管要使中国方面以提高民生为目的，施行自主的积极的政治，但在实践中，其基层机构缺乏实力，政令不能贯彻；在日本方面，大使馆的力量也薄弱，事态的前途堪忧。对此，烟总司令官 5 月 17 日的日记里写道:“实行起来很不顺利，例如对于囤积造成的问题，全国商业统制组合的基层部门迟迟不能采取行动，一部分已经表现出悲观失望情绪。上海的海军部对陆军采取不合作的态度，经济界人士静观情况的发展，有的吹出‘六个月以后再看’的冷风，意思是说行不通时还要倒退回去。在大东亚省内，大臣次官级、局长部长级、课长以下中坚干部之间，思想互有矛盾。中坚干部有悲观情绪，认为前途困难重重。”

又如 5 月 29 日“大本营机密战争日志”里载有中国派遣军井户垣浚主计大

佐对华中经济情况的说明:“对华新政策彻底实现极其困难的缘因是，物价在一年之间猛涨两倍，帝国虽以合理价格收购一些物资，但要受预算的限制。即便增加预算，如果没有回头物资，物资收购依然困难，国民政府正想采取二重价格政策。其实二重价格政策，总军已经用过，但当时中国、大东亚省、当地官民，一致指责这一政策所产生的不良影响，这也是决定推行对华新政策的主要原因。政府关于军队在第一线实行的经济封锁，特别在对华新政策的条文中，插入了‘不要防碍国内的物资交流’的字句。尽管如此，据说大东亚省迫于形势，仍要加强限制物资的输入，这一情况也和过去军方施行的物资统制同样遭到了批评。(中略)对华新政策，在经济部门是否会失败，现在作出结论为时尚早，新政策目前总算已进入了具体实行的阶段。”由此可以反映出当时的实际情况。

有关我军的自给物资及对日输出物资的开发，如无军方插手，工作就一筹莫展。这对当地驻军来说，其责任所在就大成问题。对此，在 5 月下旬，由次长、次官下达了经陆、海、大东亚三省协议的“对华获得物资要领”，与过去无异，仍然要求军方给以积极的支持。该要领规定:

一、关于确保中国提供的对日输出物资，由大东亚省负责，在中国的陆海军，根据各地情况，予以大力支援。

二、我军当地自给物资，由军负责，但应尽量利用中国机关。为此大东亚省有关机关应直接负责对中国机关的扶植和指导，军应在警备运输方面积极予以协力。

此时中国，特别是华中的经济状况，极堪忧虑。从治安考虑也要由南方运进食粮，但因船舶不足未能实现。

5 月，国民政府为了严惩囤积物资以操纵物价扰乱市场的行为，紧急制定并实行了“惩治囤积暂行条例”，加强了对物资收购机关的中枢部门“全国商业统制总会”的监督和指导。此外，对持有美英系敌性货币者严加取缔。

针对此种紧迫情况，日本政府决定施行“对华紧急经济施策”。其方针如下:

面临决战阶段，由于各种关系，我国对依靠中国物资的要求愈来愈增大。相反，鉴于目前中国经济由于物价暴涨，急遽趋向崩溃的实际情况，日华双方应互相协力采取各种紧急措施，迅速而坚决地防止中国经济的崩溃于未然，一方面维护供给帝国经济战力量的基础，同时使体现“完成大东亚战争对华处理根本方针”精神的经济政策付诸实施。

据此，在日华协力之下，实行了以下紧急措施:

一、对中国市场的棉纱、棉布，以公正价格强制购买，并运用它作为获得紧急物资的回头物资。

二、以金块 25 吨为限，由日本运往华中、华北，为加强中国财政予以全面支持。

三、日华协力严格取缔囤积，强制控制物价，并限制资金的发放。

在以上各项外，取消日本官厅直接监督日华合办的公司，扩大国民政府的监督权，增加对各公司的中国方面的投资额，增添董事及职员等。有条件的部门大体要在 7 月底，其它一般要在本年底采取措施，实行真正以中国方面为主体的运营，以此确保中国对日本的积极协力。此外，苏淮特别区很早以来即成为华中、华北结为一体问题的一个悬案。该区在行政上从 1942 年初开始，已划归国民政府直辖，但在经济、货币以及所有收购、交通、通信、邮政事业等，仍由华北控制。日本方面，从 1944 年 1 月以后，为使国民政府名实相符地掌握实权，采取了各种措施。

随着清乡工作的进展，国民政府也将苏北各县移交江苏省政府，设江苏省“第一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加强了中央对该地区的统治，并将苏北行营改为

“苏北驻在绥靖公署”以期确立治安。

然而，由于储备券币值低，难以在该地区流通，至年底强制与联银券并用，但终究未能做到完全改用储备券。

有关上述政策施行状况，烟总司令官在日记中有下述记载:

8月**10**日 根据紧急经济措施有关收购棉布一节，迟迟不见实行。本日发表了有关该措施的各项规定，就要进入实行阶段，但上海经济界人士受英美的影响难以消除。有实力的人采取投机观望态度，估计政策的实行将遇到很大困难。

8月**18**日 国府依然软弱，因此，终至下能掌握上海。上海统制总会竟不承担军米的收购任务，真没办法！轴心国战势不利，更使上海人心不稳。

8月**27**日 在上海的棉布收购工作，到最后阶段，国府仍无实行诚意。

华北、蒙疆的经济政策

华北、蒙疆的经济，虽比华中稳定，但随着战局的发展，对民众生活更加紧了压迫，逐渐出现了各种困难问题。方面军为了尽量减少从当地强行取得所需物资的弊害，在支援中国的原则下，费尽苦心，根据“剿共方针”向各兵团部队提出应有的思想准备和注意事项:

对华物资的取得

一、为完成大东亚战争，要求中国提供各种大量物资，将对民生发生重大影响。因此，必须考虑要贯彻中国参战的意义，根据对华处理根本方针的精神，由中国方面负责设法保证供应必要的物资。

二、要求中国提供的物资，区分为:在中国取得的陆军军需，由陆军运回日本的物资(陆军供给日本的军需物资)。在中国取得的国家短缺物资(供日本的一般物资，以及在中国取得供当地军用的陆军军需物资)。

三、日本要求提供的主要物资为:煤、矾土，萤石等地下资源及普通生铁、氧化铝、盐等工业品以及棉花、麻、油料资源等土产物资，依靠各种机构进行开发和收购这些物资。

四、对于要求中国供应物资，为了完成大东亚战争，必须绝对予以确保，而且应看到，随着战局的激化，所需数量必将逐渐增大。因此，不仅要彻底清除侦察资源地区附近的中共的策动及地下工作，同时加强各种措施，掌握民心，还必须大力援助有关收购、运输的警备工作。

五、粮食、棉花，是华北土产物资中最重要的物资，其收购的成败，直接对完成战争及重要产业的生产具有极大的影响。因此，军队对此等物资的收购政策，必须经常给以强有力的妥善的支援。

六、在支持土产物资的收购时，要严禁利用皇军名义进行掠夺，要严格监督收购机关，使负担公平、收购价格合理，正确分配回头物资，注意尽量不使农民的利益受到损害，杜绝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中间剥削，消除对民生的压迫，不给中共留有破坏我方政策的余地。

现地自给

一、军队为了实现现地自给自足，通过把握民心以博得其善意的积极协力，乃是根本问题。如果作法不当，压迫了民众生活，就会给中共以可乘之机。

二，自给物资中的大米、大麦、小麦、杂粮、棉花、蓖麻油、皮毛、牛、烟叶等，对民生有很大影响，原则上由大东亚省的当地机关，或通过该机关从中国方面的收购物资中取得。自给物资在当地筹措时，不仅要积极利用中国方面的收购机关，而且要尽可能在广

泛地区进行收购，并要重视富有地区。特别要注意以各种适当方法，不使民生受到压迫。

三、收购价格，要参照一般市场价格，避免强迫，尽量定出公正价格，对农、畜产品并应注意尽可能使之自由经营。

四、在当地筹措物资时，凡在使用回头物资时，必须使供应的系统、时间、地点都有妥善安排，并严密注意，尽量杜绝中间环节出现侵吞冒领的恶劣行为。

五、由于作战警备上的需要，在征集劳力时，应尽量躲开农忙时期。要有周密的计划，不得使劳力有所浪费，在支付工资时，应注意避免中间环节，要直接发给民众。

对敌经济封锁

一、对敌经济封锁的目的是防止战争必需物资向敌方外流，促使敌方战斗力的削弱和枯竭。为此，必须使中国方面主动积极地予以协力。

二、对敌经济封锁，往往阻碍接近封锁区的物资交流，以致压迫民生。因此，应尽量采取办法，对中国方面有关机关进行启发和指导，同时更应使民众了解对敌经济封锁的必要牲、以促使其主动积极地协助我方进行封锁。

三、封锁线的盘查及对非法物资的扣押及处理等，当然主要由中国方面负责，但借口盘查，勒索财物或收取贿赂，默许运出物资，滥用职权致使民心背离，或减弱封锁的效果，凡此种种，必须经常进行严格的监督。

华北政务委员会，于5月20日举行了华北各省、特别市长会议，对于当前迫切任务，即迅速收集粮食以安定民生和推进剿共方策两大问题的具体对策，进行了协商。尤其是为了制止春季以来继续上涨的粮食价格，要彻底实行“申报现存余粮和以公正价格收买余粮”布告的规定，并决定纠正各地区物价的不平衡现象和日华间公定价格水平的悬殊，以及严格取缔黑市等。

6月18日，新民会也决定对政府的粮食政策予以积极协力:(一)按公定价格贩卖粮食，(二)揭发投机倒把，囤积居奇等不法行为，(三)递减一般物价。以上三项立即付诸实施。

6月26日，由国民政府制定公布了“扰乱华北经济统制紧急惩治条例”，对违反经济行为严加取缔。

6月21日，华北方面军也就支持中国方面粮食政策发表声明，表明了强硬的态度，并从6月下旬全面开始了检举活动。

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的日记中写道:“6月21日，对囤积粮食及违反我军规定牟取暴利和榨取民众的日华经济界人物嫌疑犯约850人，断然予以逮捕，就连最大的公司的分公司经理等也不宽贷。其中华人多为日本公司的走卒。”又据12月5日发表，共计判处了日、华人104人及商业事务所28处。对罪行严重的三井物产太原事务所，在9月17日命其停业回国。

7月2日，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朱深病故，有关委员长的后任人选提名虽有问题，但终于决定由王克敏再次上台，5日王克敏就职。

蒙古联合自治政府，历来的主要目标是:“(一)最大限度地对日本提供重要国防资源;(二)确立自给自足的体制;(三)使大陆各地区之间的交易更加圆滑”。为了推动此项工作，5月1日修改了贸易统制法，采取了加强输出统制、缓和输入限制的措施，力图推动经济流通的顺利进行。在7月1日公布了重要产业统制法，决定国防资源开发事业由政府统一经营管理。

对违反经济取缔法的事件，与华北同样在5月8日由内务部、经理部联名发出布告，实行严格取缔。

参考:

有关政治、经济政策的意见书 为实现对华处理根本方针，中央和地方采取了许多措施，都未能收效，在青年军官中间，曾有要求果断实行各项新政策的呼声。

在华北方面军参谋部第二课担任政务工作的奈须要少佐、担任经济工作的田边新之少佐，对现状感到忧虑。他们曾分别提出意见书，但当时未被上级重视，至 1945 年，一度采用了其中部分的意见。

奈须少佐意见书的要点如下:

一、取消华北、蒙疆的特殊性，扶植和加强国民政府。华北政务委员会，从临时政府时期，在思想上就与维新政府相对立，盲目自我陶醉，不顾自己无能，只能依靠日军的力量存在，是一个完全脱离民众的畸形政权。而且各委员都是过去的政洽家，以伪装的、无诚意的亲日态度，欺骗军方和大使馆当局。必须首先清算扶植此种地方政权以实现联省自治的梦想。华北政务委员会应该是国民政府的一个名副其实的办事机构，蒙疆也是如此。

二、指导中国的核心势力，是充满民族革命热情的青年知识阶层，我们只有掌握其内心思想，才能掌握中国民心。

田边少佐的意见书要点如下:

一、恢复过去的经济机均和自治统制

以前所试行的种种官方统制均已失败。它分散和破坏了中国独特的自治统制机构，或者使之改变了形态。同业公会、商会、粮栈、钱铺，本来不是榨取机构，它是以地区的、血缘的相互扶助为基础的，因此，复活这些机构加以正确引导，就有可能收到统制经济的实际效果。

二、轻工业的自营及农村的工业化

使中国方面担任轻工业部门的工作，可以培养其经济力量，加强其政治力量，从而促进对日本的物资供应。为此，要重新研究敌产工厂，凡与进行战争无直接关系者，尽可能予以发还，以鼓励彼等企业的热情，这样作法是有利的。随着民营轻工业的发展，可以期望增加税收，丰富收购农产品的回头物资，从而促进收购，繁荣城市和农村的物资交流，充实经济力量。

中国是农业国，发展农业是当务之急。中国农村向来是只求一家糊口的消极生产情况，但今后应当改变这种状况，改良农耕方法，提高农业技术，增加生产力，考虑农产品的商品化，以及产品加工，或利用农闲时期进行多种经营。

通过农村经济的发展，城市工业的扩大，单纯以城市为中心的经济不平衡现象，就能得到调整。

三、华北、华中的经济调整

鉴于苏淮地区的经济调整的成效，应修订现行的物资交流限制，统一物价政策，调整汇兑交易，迅速促使在华北地区同时使用联银券和储备券。

华北、华中如实行货币调整，则不能保持日元与华币的等值交换，从而华北对日供应将不可能。但是，日元与华币等值的实质，尽管是以收购粮食价格为基础的对日输出物资的价格调整问题，但事实上只限于对粮食价格实行了统制，而大部分民众却生活在黑市价格之中。现在对日元和华币的等值问题，有重新考虑的必要。

华北开发会社和华中振兴会社，现已到了统一合并时期，此种统一的会社，不能象以前那样涉及一切产业和经营部门，而应只限于与完成战争有直接关系的部门，例如专门承担铁道、通信、重工业等部门的经营。

四、加强对日本的物资供应

对日供应物资不容乐观的是，在生产上的经济基础存在缺陷。其根本原因在于日本官僚的宗派主义，以致无论在内容上时期上都陷于敷衍的状况。为了改变这种缺陷，除去重工业以外，先将一般生产交给中国方面经营，这种作法，将会收到综合效果。以公定价格

制所实行的收购工作已明显地失败了。这项工作也交给中国方面承担，当可有效。虽然担心会出现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但对这些问题反而容易处理。

五、大使馆的撤销和军需省的当地机关

大使馆已经堕落成为完全的事务衙门，既缺乏政治力量也无改善的希望。

其根本缺点是:对中国政治研究得不透，对当地情况认识不足，回避政治责任等。因此，各种措施不得要领，招致中国方面的轻视，它与总领事馆以下各机构相脱离，墨守成规，毫无进取思想。在缔结同盟条约的今天，大使馆已无存在的必要。大使馆的业务本来以有关日本人及物资问题为主，但有关物资问题，已成为新成立的军需省的当然业务。因此可撤销大使馆，而使军需省的当地机关在军的支援下进行活动，同时恢复总领事馆的作用。

六、放宽敌地区的物资交流

现在的封锁、限制交易的方式，不仅徒劳无功，而且由于敌区采取开放性的价格政策，反使我方处于被动地位，为敌人提供了良好机会。倘使中国实行自主经济，从敌我地区的物资数量、生产能力、购买力的关系来看，不仅能够限制物资的外流，而且还能有更多的物资从敌区流入治安区，这是毫无疑问的。

七、整顿在中国的日本人

华北四十万日本人，对华北来说大部分是无用的。应该只留下必要的有能力的人，如计划人员、技术人员等指导阶层，其他人员一律使之返回日本。无用的日本人留在中国，减少中国人的就业机会，其卑劣的生活态度招致中国人的嘲笑，妨害了日华的亲善关系。日本国内正在加强决战体制，为了对青少年的再训练，也有必要尽快使之回国。

八、断然飞跃革新的热情

飞跃不能期待于渐进主义者。以前的对华各种政策，其结果几乎都使对方怀疑和失望。这是每次提出新办法时，在真理和道义面前有所踌躇的原因。由于经济政策是促进政治、思想对策完成的基础，因此，现在必须有断然飞跃革新的热情。

清丰事件

5 月 29 日，爆发了清丰事件。这是日军改变警备时的一幕悲剧:根据生存者的回忆，事件的概要如下:

河北省冀南道以北为独立混成第一旅团(旅团长小松崎力雄少将)的警备区，濮阳县以南为第三十五师团的警备区。当时共军在该地与山东省交界地区的农村已经根深蒂固，并且逐渐扩大势力。大名、成安县成为冀南军区第一军分区;南乐、清丰。内黄、观城、朝城县成为冀鲁豫军区第三军分区;濮阳县为冀鲁豫第四军分区的根据地。我独立混成第一旅团为了实现新方针，进入 5 月汾，逐渐集结分散驻守的小部队，放弃了距铁路沿线较远的清丰县。(根据治安良好地区的警备由中国方面负责的方针。)

在县联络员中间有不少人对于这一措施表示不满。他们认为，这种作法是对该地区有友好关系的中国人见死不救。对中国方面在心理上会有很大影响，不仅在军事上而且在政治上也是后退的表现。为此，道联络员川本说服邯郸陆军联络部长加藤次郎大佐，结果得到允许，只用中国方面的保安队夺回清丰县并确保该地。于是，由各县联络员领导从各县保安队中选拔的部队(主力是清丰、大名、南乐县的保安队)，在南乐、大名集结，总兵力共 4,800 人，以之编成冀南剿共保安联合军。5 月 23 日开始进攻清丰县，很容易地攻占了该城。

此后中共也未反攻，恰好各县联络员齐集该地，为了鼓舞士气，决定在清丰县城内召开 5 月份的联络员例会。28 日晚，联络部的代理部长名取正雄大尉、道公署的薛道尹，在大约三百人的教导队护卫下一同来到县城。29 日道尹亲自部署了县城的警备，在原来警备

队的旧址召开了联络员会议，讨论研究了收购粮、棉和清丰县的警备等问题。在会议当天，大名县警备队的藤坟大尉率一个护卫小队前来，通知全员要赶快由清丰县撤出。然而趾高气扬的联络员们反对撤走，会议继续开到黄昏。

当天夜里，全体人员逐渐就寝，突然遭到共军的袭击。保安队在城上布防时，县城已完全被包围，立即全面展开了激战。夜 3 时共军突破东关拥入城内，顿时，由各处抽调而来的保安队东奔西窜，混乱不堪，完全丧失战斗意志。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名取大尉命令全体突围。但是，突破两、三重的包围是非常困难的。到第二天的夜里，离此最近的南村集日本警备队赶来时，只剩下日本人 8 名、保安队 30 多名，名取大尉、川本道联络员战死、薛道尹被俘。

数日以后，加藤联络部长在旅团两个大队的支援下，经过三天的时间，在清丰县城内外收敛了数百具尸体。由于这一事件的发生，冀南道的保安队一蹶不振。此后南乐县城被袭击，松田联络员等战死、第二年大名县城又遭袭击，百田联络员战死。

清丰县事件、说明军事和行政调整的困难。日军是中国方面的后盾，中国方面为了确保和扩大冶安圈，必须首先能达到不需要日本联络员指导的程度，最重要的是中国人的自主和实力。中国人本身也必须有这种要求。

五、华北方面军秋、冬两季的肃正作战与治安特别施策

8、9 月份的敌情与治安恶化的原因—中共党、政、军的组织

一进入 1943 年夏季，可以看出，由于共军的策动逐渐活跃，加以战局的影响，部分民心发生动摇，8 月份的敌情，主要是中共的情况如下:(“北特警第一期作战的战斗详报”)

一、概况

中共仍以党、政、军、民四位一体组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目标，团结各种战斗力量，扩大并推进党的势力，采取各种积极顽强的措施，开展政治攻势和游击战争，极力加强和培养抗战力量，倾注全力确立抗战体制。对新政权则继续揭露其不正行为，袭击、绑架其人员，并继续进行民众工作，同时，加紧破坏我方重要战争资源设施地区及交通、通讯线路等。对其动向，不可等闲视之。蒋系方面，由于与我方多次作战和中共的飞跃发展，其势力被逐渐驱逐，但最近似正企图利用国际局势挽回势力。因此，蒋系的特务工作，尤其在主要城市中显得异常活跃。对此情况以及中共方面的动向，必须严加戒备。

二、冀东及平北地区

在冀东，中共自 8 月份以来，在发展中撤销了原冀热区分区委员会，新设冀热特别区党委员会。在其领导下设立了第一至第五地区党委员会，各地区的党委员会，一般担任四个联合县委的领导。

从上述情况可以判明，党的上层组织大体首先组成，但下层组织仍在改组扩大的过程中，成为冀东中共的一个弱点。

冀东的中共行政组织，8 月份撤销了原第十三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新设了冀热边区行政公署，并在其领导下设立了第一至第五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每个专署大致管辖、领导四个联合县政府。最近，进一步实行单一县制，改编为管辖五个县。

冀东地区的共军是晋察冀军区司令领导的第十三军分区的部队，在其党，政从晋察冀边区分出而独立发展时，为了建立军区，正在稳步进行扩大，并企图新编团队，大力开展参军工作。根据冀东中共后方支援力量极其强大的特点，可以判断出，中共在发展的初期

阶段，采取的是所谓军政统治的形式。

在华日本人的反战同盟仍与中共共同行动，专门在日本军、官、民中制造反战、厌战思想，但未发现有其它积极动向。

三、冀鲁及山东地区

今年夏季，在6月份发生的以邢仁甫为中心的中共党的内讧问题，尚未完全结束，南北两派干部仍然继续进行暗斗。同时可以看出，正在深入进行所谓敌伪工作，并准备反攻我方的据点。此外，其宣传谋略工作随着国际战局的变化日趋激烈。

山东中共的行政组织，于9月中旬撤销了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进委员会，重新组成新的战时行政委员会。各级行政机关断然实行改组，竭尽全力进行精兵简政及反攻准备等工作。整个山东地区积极进行救济难民、增产运动、构筑交通壕、武装群众等各项工作。

冀鲁地区的共军，预料到我方必将进行冬季作战，于是，竭力动员党、政、军所属各机关进行集结，准备形成以动员民众武装为首要任务的统一抗战体制。对中国方面的武装团体进行谋略的袭击及反正工作，对蒋系匪团进行瓦解工作，坚持破坏交通、通讯线路及反特工作，并加强培养其战斗力。

在渤海地区，日本人反战同盟的活动极其活跃，利用讲话和散发宣传品等方式，尽力酿成皇军官兵的反战厌战思想，同时，对部分非同盟人员进行教育训练。

山东地区的蒋系势力，受中共势力的逐步压迫，向中国方面机关伪装归顺，力图保持、增强其战斗力，并进行招兵、整训、改编等工作。趁国际战局的变化，以响应蒋系主力军进驻山东地区的意图。

在渤海地区，国共局部冲突屡次发生。在两者之间，争夺地盘、策划捕杀干部以及兵力转移等工作极为频繁，其关系逐渐恶化。

四、冀中，冀西地区

党的各机关，加强保密工作，彻底贯彻除奸恐怖政策。严禁居民出入治安地区，努力修筑特殊地道，同时采取各种措施继续积极进行反扫荡宣传，确保抗战物资、资材，破坏我方行政机构等，并策划加强和培养抗战力量。

各行政机关，随着党和军队的活动，积极开展拥军拥政爱民运动及刷新基层行政干部。各部队共同进行扩军整训，加强培育地方武装。在最近，以集团的兵力活动于铁路沿线及各县城周围地区，企图破坏交通、通讯线路、夺取县城，频繁袭击皇军分屯队和中国方面的武装团体。

五、太原周围地区

中共党与军、政、民结成一体，积极开展争取新政权人员的工作，袭击武装团体，企图扩大党的势力。

各行政机关健全和加强群众武装组织，彻底实施增产工作，并大力开展对中国方面的工作，特别是反工、除奸、征税征粮，获取并保护抗战物资材料等工作，努力加强培养抗战力量。

蒋系势力仍以兵农合一的政策为基础，努力进行建军工作。

六、民心的动向

随着国际局势微妙的演变，中共对中国方面进行各种策动，特别是对中国方面的机关，继续进行袭击、绑架、反正工作，以及使之采取两面的立场，同时开展袭击县城、破坏交通通讯线路等各种谋略活动、另外，对破坏重要的战争资源地区及设施的策动渐趋激化，其手段也更加巧妙、恶毒，加以当地皇军部分撤出，使敌势力逐渐侵入。因此，各县保安队、警备队士气普遍沮丧，民众对新政权的信赖降低，部分民心发生动摇。

自1941年以来，逐渐好转的华北的治安，至1942年底又趋恶化。本年夏

季以来，中共的活动再度激化，致使治安急剧显著变坏。

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随着整个战局的恶化，由于日军精锐兵团的抽出、转用，以及兵团的改编和新建，警备兵力的频繁换防和装备物资的减少、士兵素质下降、士气不振等因素，以致战斗力减退，从而使中国政府、民众在精神上产生了动摇和叛离。

(二)对此，中共方面自百团大战以后，用两年多的时间，极力扩充势力、进行地下渗透与政治工作。最近，为了策应盟国方面的攻势，在军事、政治、思想各方面，再次开始积极的行动，并得到多数民众的同情，从而迅速扩大了势力。

(三)日本对华处理根本方针的理想与现实之间，未能得到很好的调整，军、政、民、会四位一体的有机结合的施策产生了裂痕并开始分裂。对此，华北特别警备队作了如下的观察:

自 1 月份中国参战以来，我方实行尊重中国方面的自主意见与不干涉内政的方针，中国方面职员的服务态度愈益消极保守，其政治力量不能与我方作战密切配合，给敌方以进行活动的空隙。加之接近敌地区的民众，由于经济反封锁而造成的生活困难，其两面性色彩更加浓厚，以致我方的治安圈逐渐缩小。本年 7 月以来。华北政务委员会虽然加强了粮食收购和控制物价等统制经济，但因敌方的反宣传及民众的两面性，致使物价暴涨、各项经挤措施停滞不前，民心浮动，一般民众向往敌政权，加深了叛离的倾向，敌方秘密组织乘此机会逐渐积极深入地活动起来。

(四)其它方面，当时的有关人员举出以下各点:对于包括国共斗争在内的三方混战的治安战，缺乏明确的作战指导思想:在应以民众同情为基础的治安战中，由于偏重武力、过多地实行扫荡剔抉，以致民心背离，华北政权下的军警畏惧中共，没有代替日军的实力。

进入 1943 年下半年，由于日军集结兵力、变更警备部署，因而治安地区相应缩小，即在准治安地区，原来以一个分队就能行动的地区，现在则必须用一个小队到一个中队的兵力才行。在讨伐上，用一个中队以下的兵力难以积极行动的地区，有日渐增多的趋势。

秋、冬两季的肃正作战

作战的意义与实施概况 华北方面军企图尽可能在秋季，经过长时期有组织的肃正作战，摧毁共军的根据地。这是根据派遣军在 8 月份制定的“秋季以后作战指导大纲”的指示，修改了的方面军的年度作战计划。

方面军计划的肃正作战如下:

一、冀西方面(“オ”号作战)

对冀西地区的共产党军队，以第六十三师团、第一一 O 师团、步兵第六十三旅团(属第六十二师团)、独立混成第三旅团、第二十六师团的各主力部队，于 9 月 16 日以后进攻，以期将其歼灭。

二、冀南地区(武号作战)

对冀南地区的共军，主要以第三十二师团、骑兵第四旅团，于 9 月 20 日以后，实行急袭歼灭作战。

三、冀东方面

对冀东地区，特别是满、华国境地区的共军，以独立混成第八旅团(新成立的华北特别警备队给予协助)，于9月16日以后，与关东军相策应进行扫荡。

四、山西方面

第一军以一部分兵力，于9月26日以后对晋西北地区的共军，以该军主力于10月2日以后对太岳军区的共军，分别进行扫荡作战。

9月1日，华北方面军召开了所属各军及直辖兵团的参谋长会议，对此次肃正作战进行了全面指导，同时命令进行必要的准备。会上，冈村方面军司令官作了如下训示:(前文略)

当兹战局严重，我一亿国民决心振奋爱国激情，举国上下共赴国难之际，确信方面军官兵亦必不负所望。

随着战局的严重化，方而军唯有更加努力提高战斗力，保持灵活机动性，以适应大东亚决战的要求，迅速安定后方，为将来的巨大进展做好准备。然而，目前共军乘中国方面的力量薄弱，活动渐趋激烈。最近，其领导民众的势力竟有增大的倾向，对此深感遗憾。方面军为了适应大东亚决战的要求，迅速消灭中共势力，乃是当前急务。

为此，在战略上虽有精心策划的措施，但作为我军的目标，则可归纳为以下两大要点:

其一，树立必须使敌慑服的皇军威力；其二，树立牢固掌握民心的森严的皇军威容。即只有做到使敌人“真正恐惧日军”，使民众“真正信赖日军”方可。再看战局的要求，实际是“时间”二字，即以变不可能为可能的大智大勇，满足今日此时的要求，方能有助于今后的大决战。全军必须在充满瘴气和酷暑的战场上，不分昼夜，不论是进行殊死战斗或是担任肃正工作，都应誓死贯彻此次作战所期之目的。

注:在此，笔者想要指出的是，正如方面军所认识的那样，华北是大东亚战争的兵站基地，对此要求则比过去更为迫切，而且军已从政务方面撤出手来，专心致力于军事。因此，华北治安战的政治目的淡薄了。总而言之，作战目的在于取得和运输供应日本的物资，确保资源地区及交通线。肃正作战和警备的任务也都归结于此。这样，民生、民意的倾向如何，将不问可知，今后的治安战将会更加困难。方面军报道部长在讲话中虽曾要求“在此次作战中，要与治安军协同作战，由保安队、自卫队确保地方治安，行政机关、新民会开展政治活动，取得一般民众的协助”等等，但其实现确是大成问题。

肃正作战的要领是以彻底摧毁中共党、军、政的根据地为重点，特别是扫荡剔抉其地下组织，破坏其各种设施(弹药、被服、粮秣等仓库、工厂、银行，行政机关等)，通过彻底运出敌地区内的物资，以期使敌人势力枯竭。(10月18日方面军参谋长的状况报告。)

1943年秋季冀西作战(“才”号作战)

(9月16日—12月10日)

作战经过概要 方面军根据以下作战设想，于9月2日下达了作战命令。

一、方面军于9月16日以后，预定以约两个月的时间，攻击冀西地区共军的主力(第三、第四军分区)，并摧毁其根据地。

二、第六十三师团(四个步兵大队、一个坦克中队、一个山炮大队为基干)在9月16日日落后，使一部挺进队开始突进，急袭满城及唐县西北的敌中枢地区，牵制敌人，并于适当时机将其击溃，以后努力搜索敌人根据地，以期击溃敌人并摧毁其根据地。于17日拂晓，在保定设战斗司令所。

三、第一一O师团(四个步兵大队、一个坦克中队、一个山炮大队为基干)在16日日

落后，使一部挺进队开始突进，急袭灵寿西北的敌中枢地区，牵制敌人，并于适当时机将其击溃，以后努力搜索敌人根据地，以期击溃敌人并摧毁其根据地。于 22 日在灵寿设战斗司令所。

四、甲兵团(步兵第六十三旅团长指挥的三个步兵大队为基干)在 17 日夜从孟县附近开始行动，搜索东北部省境方面的敌人根据地，以期击溃敌人并摧毁其根据地。于 16 日在孟县设战斗司令所。

五、乙兵团(独立混成第三旅团长指挥的三个步兵大队为基干)在 17 日晨从五台附近开始行动，搜索东部省境方面的敌人根据地，以期击溃敌人并摧毁其根据地。于 16 日在东冶镇设战斗司令所。

六、丙兵团(第二十六师团长指挥的六个步兵大队为基干)在 17 日夜从灵邱、涞源附近开始行动，搜索南部省境方面的敌人根据地，以期击溃敌人并摧毁其根据地。于 16 日在广灵(灵邱北约 35 公里)设战斗司令所。

方面军于 16 日夜，按照既定的设想开始进攻。正面的敌人，一部分(约四个团)向山西省西北部方面移动，其主力竭力回避战斗。因此: 第一期(至 9 月底)的战果极小，仅毙敌 381 人，俘虏 177 人。

各兵团随着作战的长期化，乘敌人困惫之除，积极追击或扫荡剔抉。另外，还尽力研究了反用敌人的游击战法，因而从 10 月 2 日开始的第二期作战、23 日开始的第三期作战中，都收到了相当的战果。中共在作战初期相当活跃的游击战、地雷战、特别是对我后方治安的扰乱，也处于低落的状态，甚至有一部分丧失斗志，归顺投降者有所增加。在此期间，摧毁了阜平附近的敌军政中枢各机关，同时还挖掘出隐藏在神仙山附近的很多抗战物资。

第三期作战延长了约一个月，彻底进行了扫荡，于 12 月 10 日结束。敌遗尸 4,300 具，俘虏 2,600 人，除摧毁设施 1,660 处外，并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资材、杂粮等。

共军方面的记录 共军方面对本作战以“晋察冀北岳地区 3 个月的‘反扫荡’”为题，记述如下:

1943 年敌人对我解放区的“扫荡”，较之前年更为频繁，各解放区一年至少要遭到三次大规模的扫荡，最多者可达十数次。

仅晋察冀北岳区的一个地区，在这一年里就遭到十二次“扫荡”，最大的一次是从 9 月 16 日开始，到 12 月 15 日结束，达三个月之久。敌人使用 4 万余的兵力，并动员了所有的汉奸特务组织，实行了“毁灭性扫荡”。但是，不管敌人实行任何“扫荡”，而我方早已有了充分粉碎敌人扫荡的办法和力量。

我军区在各阶段作战中，对敌人的阴谋实行针锋相对的策略予以打击。作战开始的第一阶段，敌人采用分进合击的办法，占据了我方中心区的各要地，并实行分散进击，对重点地区反复进行了“扫荡”，搜索和破坏。我军集中适当的兵力，对分散之敌加以打击，迫使其停止分散“扫荡”计划，不得不集中兵力与我对抗。

第二阶段，敌人以滹沱河流域的生产地区为目标，驻屯有力的兵力，企图掠夺我们的稻谷。我军在河的两岸不断袭击敌人，并以民兵配合大部队，夺回稻谷，更大力支援群众的突击收割，变稻田为战场，使敌人吃不到大米。

第三阶段，我方以急袭合击为主。由于我方实行了精兵简政政策，已不存在庞大的后方机关，使敌人得不到任何便宜。特别是军队，做到了各种斗争方式的互相结合，即军队与民众相结合，内线与外线相结合，反“扫荡”与政治攻势相结合，军事斗争与其它斗争相结合，依靠这样的结合斗争，保证了反“扫荡”的胜利。

特别是我主力部队与广大地区的民兵，始终密切配合，实行勇猛而不间断的战斗。在这三个月中，军队作战 2,093 次，民兵作战 2,192 次，两者的协力作战，情况非常良好。9 月 24 日，行唐以北的华园、联庄两处之敌，企图合击我芦家庄。我芦家庄等七个村庄的游击小组，在行唐二区民兵营的指挥下，担任打击从华园来犯之敌。他们潜伏在二十余里之间，布置地雷阵，从房上用土枪、手榴弹与五百余名敌人战斗了一天，敌人仅能前进一、二里地，使敌人未能按预定时间到达合击地点。另一方面，我主力部队迅速歼灭了从联庄来犯之故，从而完全粉碎了敌人的合击计划。

在军区腹地激战之际，我外线部队深入敌后，在敌占区和游击区内积极的活动，相继攻入保定、望都、浑源等城市，摧毁敌碉堡 260 余处，炸毁列车 12 列，坦克 3 辆，汽车 540 余辆，铁桥 13 座，并填埋和摧毁了封锁沟 100 余里、封锁墙 16 里。同时，密切配合反“扫荡”，开展了政治攻势。武工队进入敌占区内，到处进行活动，在保定城内敌军司令部门前和各地伪政府门前，贴上了我们的大布告，更在敌占区及游击区内，召开了大规模的反法西斯群众大会，使伪军和伪组织人员普遍发生动摇。另外，在反“扫荡”胜利的同时，出色地完成了秋收、秋种、征收公粮以及救灾工作。这虽是以军事为主的极其复杂而严峻的斗争，但终于获得了胜利。

大“扫荡”被击退了，来犯的四万多敌人中生还者三万余人，而且丢弃了无数的装备。我们虽然遭到烧、杀、掠夺，但晋察冀边区的军民，是绝对不可“征服”的，就连不幸落入敌人虎口的同胞，在敌人残酷的拷问下也没有屈服的。(以上未与中文资料核对—译注)

参考一 讨伐的一般要则

一、讨伐作战的要诀，在于奇袭和急袭敌人，在战场上将其捕捉歼灭。对无抗战意志之敌，按一般原则实行大规模的包围往往会使敌人从间隙中逃逸，或在我完成包围之前即行分散逃避，以至于一无所获。

二、奇袭成功的要诀，在于周密的准备.迅速而准确地收集情报，防止泄露我方意图，以及部队迅速而隐蔽的行动等。敌人为了避免我军的奇袭，不仅充分利用其周密的谍报组织侦察我方的企图，并经常在我进攻之前，破坏道路和桥梁。因此，在使用汽车等机动装备时，应预先准备携带必要的抢修材料。

三、具有旺盛的士气和必胜信念的部队，即便是小部队，也能勇于攻击而消灭敌大部队。与此相反，对陷于消极被动的军队，敌人利用其弱点，则大肆活动，从而使我小部队束手无策。因此，各部队必须经常保持旺盛勇敢的进攻意志，决不使敌蔑视我军的战斗力。

四、军队在初战时，如能给敌以彻底打击，不仅对提高士气有极大效果，而且更能使敌人畏惧，可使其行动完全限于消极状态。

五、固定不变的战法，对谍报组织极为完备的敌人，尤其是对共军，应严戒使用。必须不断进行研究，提出异乎寻常的卓越战法，并适应当时的倩况，发挥机动灵活的作用。

六、军队对待民众特别要有严肃的军纪，使驻在地周围的民众真正了解皇军、同时，当民众受到敌军袭击时，要给予保护，使之信赖皇军。此外，将作为游击战基础的民众，与敌军分离开，这样才能迅速恢复治安。特别是民众对军队增强了信赖时，对收集敌方情报，有极大方便。因此，每当收到当地居民有关敌情的报告时，就立即实行讨伐，使其深深感到只有依靠皇军，才能保障自家的安全。

七、讨伐肃正的目的，不在于确保地盘、而是以捕捉歼灭敌人为重点，更应注意到，单纯的遗尸数目，未必就意味着敌人损失的多少，因为其中往往包括多数的居民，而缴获武器的数目，才是真正战果的重要依据。

八、在警备上部署的军队，实行肃正讨伐时多以小部队进行奇袭、急袭、强袭或遭遇战，各部队要针对此种情形集中力量进行训练。讨伐时如能利用汽车进行奇袭、急袭，自

然最好。但通常很难满足这种需要，所以军队要靠行军进行快速的奇袭和急袭。因此必须努力进行培养行军能力的训练。

九、实行讨伐作战的部队，虽然是小部队，但不应作为大部队内的一个战术单位那样去行动，而应该采取象一个独立的大部队那样的行动原则，要经常以旺盛的进取精神和独到的创见，通过大胆果敢的行动，采取包围迂回、佯动牵制、奇袭急袭等一切手段，使敌人难以捉摸，无法应付。

十、平时警备部队的适当部署，实际上是实行讨伐的基本阵势。占领要地，不仅要直接摧毁敌军根据地，而且要以之作为搜索、谍报等的据点，以便进行敌情的侦察和机动的准备，从而作到神速的机动讨伐。与此相反，实行分散部署而不经常进行积极的肃正讨伐，则无任何意义，却有分散兵力之弊，以致遭到敌人的蔑视。机动讨伐是肃正讨伐的实体，分散部署是准备肃正讨伐的据点。因此，要特别注意军队展开的态势。

十一、为了使机动讨伐兵力增大，应该尽可能减少部署固定的守备兵力。为此，部队应选定适当的部署地点，即选择自然防御力大的地点，尽量集结兵力，做好防御设施，从而节省自卫团兵力或一般警备兵力，此点极为重要。驻在地村庄的直接自卫，尽量使中国方面的自卫团、保安队等去担任。

参考二(引自《扫荡剔抉共军根据地的参考》一书)

一、敌潜伏方法及对之搜索要点 敌潜伏方法虽逐渐巧妙，但不断注意其细微的征兆和动向，同时通过对俘虏及居民适当的讯问，即可搜索到敌人。现将搜索敌人注意事项列举如下:

(一)敌干部、伪县政府要人等，一般避开市镇或交通方便的大村，带领少数部下，潜伏在偏僻的农户之中，通常选择村边的房舍。

(二)敌情报员、工作人员等都持有良民证，即便在皇军驻地附近，也多公然装成良民活动。

(三)武装匪团在同一地点，最多停留一天，在我方空隙中间流动。白天通常分散活动，预先定好集合时间、地点等，准时集合，夜间则采取部队行动。

(四)敌遭我军攻击、扫荡、搜索，断定不能逃走时，通常即扮成农民，携带农具就地假装劳动，如不能伪装时，便潜入房内、仓库、草堆、沟渠等，或躺在炕上装成病人。居民怕有后患，通常不敢告发。

(五)在我部队实行夜袭和拂晓奇袭时，应及时派出密探、斥候等，潜入村庄从高处了望，以便易于发现敌人，如发现村内有灯光和喧闹之处，多半是敌人潜伏的房屋。

(六)敌人往往收买或强迫良民，以加入其户籍。还有潜入自治机关，充当职员或勤杂工，甚至还有的就任乡保长等职。

(七)在县公所、公安局、自卫团、庙、学校、旅馆、村落附近的地隙、谷底、穴洞、民船以及房最内的顶棚、井内、夹道等，往往有敌人伪装民众潜伏其中。

二、敌根据地设施的位置及设备要领

(一)敌人在平素就有计划地使群众作好“空室清野”的准备，一旦侦知日军要进行扫荡时，便及时将武器、被服、粮秣等各种物资，以巧妙的方法急藏在极难发现的地方或运到偏僻的地方，迅速实行“空室清野”，以此避免我方的扫荡剔抉。

敌人占据的地方，即兵营、训练所，学校，医院或各级司令部、行政公署以及其它有重要设施的村庄等，必定隐藏有武器、被服，粮秣、药材、日用品等.但隐藏地点很少在明显的建筑物内，一般是避开村庄，选在山麓、谷地等往来不便的孤立房屋或有两、三间房舍的荒废小村，或在离开村庄一定距离的田地以及森林、洞穴等处。

但在村庄外的隐藏地点附近，通常都有比较明显的目标作为标记，另外，在其附近有

孩子、老人或病人等进行监视。

(二)敌人在战斗中发生死亡时，让民兵、民伕收回战死者的武器，于战斗结束后交还。如收回和携带武器逃走有困难时，便责成附近的村长及有势力的人代为隐藏。遭到日军突然攻击，不能分散化装逃走时，便依靠附近的自卫团，或送往特定的村庄隐藏。

三、敌根据地设施的侦察要领

(一)敌人潜伏及隐藏的方法，要贯彻到每一士兵，使之彻底掌握。

(二)为了审讯俘虏及居民，必须有多数的翻译和优秀的侦探同行，让他们直接讯问；在战场上的审讯，要通过巧妙适当的方法，迅速进行审讯，使其自行招供。在释放时可带到其它地区作适当处理。敌人和附近居民是息息相通的，敌人巧妙的藏匿地点，居民是必定知道的。

(三)检查可疑的假坟或梯田边端等地点时，每人应携带铁通条(直径 1 厘米，长 1 米)。

(四)妥善部署扫荡搜索，要无遗漏地按计划实行。为比，要编成搜索班(轻装)，明确指示任务和目标，即便在行军当中亦应随时进行搜索。

扫荡、搜索时应注意以下事项:

(1)不论有无敌情，应经常对周围严加警戒，禁止单独行动。过去对此放松警戒，因而遭到到敌人袭击或遭到挂雷，地累、手榴弹等意想不到的灾害的，为数不少。

(2)对指定的村庄攻击后，是否立即实行扫荡搜索，要根据情况而定。但在攻击村庄时，首先应尽量搜捕俘虏成找出村庄内有权势的人，要指导宣抚怀柔等工作，设法使村民能自动前来报告隐藏地点。

(3)攻击村庄后，将残留的村民全体集合在一处，首先进行服装检查，找出有权势的人物。然后根据所提供的情报进行扫荡搜索。此时要让集合的村民在原地不动，仅携带提供情报的人到现场进行搜索。搜索时与保安队等中国方面的武装团体合作最为有利。另外，冲入村庄进行扫荡搜索时，一定要对屋内残留的村民(特别是男人)，进行严密的服装检查，然后再行搜索。

(4)利用中国方面武装团体的协助，发挥其敏感性，效果极大，但不应使其单独行动。如无日军监视，往往会发生抢掠行为，这样会损害与扫荡有密切关系的宣抚、政治、经济工作。

(五)为了发现隐藏的地点，除进行周密细致的搜索外，运用所谓第六感也很重要。(利用各种征兆的实例，笔者从略。)

四、民匪分离的要领

扎根于群众、善于掌握民心的共军，与一般民众很难辨别，尤其在敌人根据地内更为困难。现将以前实行的比较有效的方法，手段介绍如下:

(一)长期有规律的生活是不易改掉的。因此，突然或连续使之操练军队的各种动作，就能区别出是否是军人。例如:

(1)集合民众，连续进行“立正”、“稍息”动作，或在谈话和休息时，出其不意发出口令，根据其瞬间的动作，便可判明是一般群众还是共军。

(2)凡是听到别人讲话就马上起立或有站立习惯的人，不是党员，就是士兵。

(3)早上突然吹起共军的起床号，根据其反应可以识破。

(二)实行身体检查，根据其肌肉发达状况可以辨别。例如，共产党员的肌肉是平均发达的；而士兵则肩上有扛枪的腙子，脚上也有腙子；农民的腕部、挑担行商的肩部特别发达。

还有根据日晒程度来识别，即农民通常赤膊劳动，日晒较为严重，党员和士兵比农民皮肤稍白，尤其是脖子，日晒部分和无日晒部分区别很明显。然而，最近共党的工作人员与农民共同从事芳动，所以也经常日晒，手掌也有老茧，应加注意。

(三)根据审讯及简单的谈话得以辨别。

(1)讯问出生年月日，回答“公历某年”而不说民国年月日者，多数是党员。

(2)党员对党外事项能够答辩，但转问有关党的事项时，则默不作声者居多。另外，讯问是否为党员时，党员多显示出兴奋态度，并强调不是党员的理由。

(3)利用审讯、谈话等机会，给以纸烟和其它物品，试验其对物资的“共有观念”，党员由于共产主义意识浓厚，如给纸烟，往往分给他人，并且在吃饭时，有先让别人自己不争先的优点。另一方面，由于私有观念淡薄，有的向审讯官等人，不客气地索要纸烟。

(四)根据检查服装的辨别方法

(1)化装便衣人员的服装，不合身的居多，有的穿用一般农民所不穿用的袜子，还有的仅上身是便衣，而下身还是军用的等不谐调现象。

(2)穿着便衣的人员，多数衣服不合体，也有脏的地方与一般群众的不同。另外，衣服上往往沾有不是当地的土。

(3)被服一般为上等品，并且清浩，衣襟上的纽绊较多。

(五)根据携带物品的辨别方法

(1)仅靠良民证是不可完全相信的，特别是在敌地区内，敌人平时都有所准备，有良民证的反而多是可疑的人。可用放大镜检查其指纹，中国人一般不关心指纹的重要性，故借此可以辨明。

(2)敌人尤其是工作人员，携带有自行车。

(3)一般携带金钱较多，另外还携带有仁丹、牙粉等。

(六)其它

(l)在拘留所及其它俘虏收容所等地，安插自己人与新来的匪民同住，秘密侦察其状况，是查出党员的有效方法。

(2)在匪民混淆之中，频繁窥视审讯者的脸色，或偷看其眼光者，是党员的征兆。

(3)打听儿童，辨明是否真正村民，或是某人的亲戚。可疑者如称某人为熟人时，可将可疑者和其熟人分开，个别讯问双方家属的情况，进行对证。

(4)党员中有表示特别亲日态度的和表现恐怖的。

第一军的秋季肃正作战 第一军以主力在太岳军区，以一部在晋西北军区，分别进行了扫荡剔抉作战。

1943年秋季晋西北地区肃正作战 (9月26日—11月上旬) 第一军对盘据在兴县、岚县、临县附近的共军，以独立混成第三旅团的主力从宁武，崞县地区，以第六十九师团的一部从汾阳、离石道方面，进行了夹击作战的部署。该两部队于9月26日开始攻击。至11月上旬，扫荡了兴县附近及黄河沿岸的晋西北根据地一带，战果虽然不大，但切断了中共延安根据地通往华北、蒙疆地区的连络线，对其威胁是相当大的。

1943年秋季太岳地区肃正作战(“モ”号作战)(10月2日—12月10日) 第一军为了肃正以沁河流域为根据地、逐渐向中条山脉地区扩展势力的太岳军区的共军，以第三十七师团、第六十二师团、第六十九师团进行了作战。作战设想为从10月上旬起，以两个月的期间，分四期进行。第一期为构成包围圈(封锁线);第二期为扫荡浮山(临汾东部约30公里)—长子(潞安西部约30公里)线的南北地区，第三期为扫荡翼城、沁水，端民镇、高平线以南及绛县、阳城、泽州线以北地区；第四期为扫荡至南部省境之间的敌人。

10月2日第三十七师团从运城地区向东，第六十九师团从临汾、霍县地区向东南，第六十二师团从长子、沁县地区向西南分别前进，构成包围圈。其后

各兵团以一部，一面随时阻止敌人逃逸，一面以缓慢的速度逐渐南下，采取消灭敌人抗战力量的新战法一车轮战术，将敌人根据地全部摧毁。

第一军将战斗司令所向临汾推进，致力于没收敌军需物资和破坏根据地设施。

通过此次作战，使共军的活动在相当长时间内处于低潮。

此外，与阎锡山交涉结果，使山西军三个师，移驻于日军肃正过的浮山、沁水、翼城地区(至 1944 年春，山西军移驻该地。此时，对伯工作随着对华处理根本方针的决定，在新的部分合作方式下，采取措施进行活动)。

冀东地区的秋、冬季肃正作战 冀东地区随着第二十七师团的转调满洲，独立混成第八旅团于 1943 年 7 月上旬从顺德地区移防，司令部设于唐山，各独立步兵大队分别部属在迁安、抚宁、遵化、丰润，滦县。下旬，接替了警备任务。(9 月 7 日由竹内安寺少将为旅团长，代替了吉田峰太郎少将。)

旅团根据方面军的指示，9 月 16 日以后，与关东军相呼应，开始对满华国境方面进行扫荡，同时为了讨伐在管区内活动的敌人，逐渐与华北特别警备队主力做好协力讨伐的准备，旅团已成为机动的讨伐部队。

10 月中旬，旅团主力集中于喜峰口南部地区(滦河流域的长城线地区)，与关东军及中国方面的治安军互相协力，对该地区进行了肃正作战，继而对京山路南部地区进行了扫荡，从 12 月上旬起至年底，与第六十三师团共同在热河省境方面继续进行了讨伐。

在此次肃正作战中，由于搜索敌部队困难，因而尽力摧毁其根据地设施及缴获其武器、资材。

另一方面担任津海道地区警备的独立混成第九旅团，与上述肃正作战相呼应，11 月进行了“秋季十一号作战”，12 月进行了“冬季十一号作战”，以期肃清管内之敌。

根据华北特别警备队的判断:“冀东共军，自从 1942 年的一号作战以来，通过不断地进行肃正剔抉，使其积极的游击行动变为消沉，但其地下活动却活跃起来。其对群众的工作及对中国方面行政机关和武装团体的工作，反而更有了进展。”

1944 年初冀东剿共战的状况如下:

一进入 1944 年，中共方面以鲁家岭(遵化南 25 公里)山区根据地及丰、玉、宁(丰润、玉田、宁河)伪县政府地区的平原游击战为中心，继续展开积极活动。因此，独立混成第八旅团为了粉碎敌人夺回遵化平原的企图，并击破丰、玉、宁地区敌武装力量和党政组织，从 2 月 13 日起至 4 月 5 日止，进行了冬季肃正作战。在此次作战中，击毙中共方面县长及主要干部，并破坏其组织，此后，敌游击活动暂趋平静。

1943 年秋季鲁中作战(勇一号作战)(11 月 10 日一12 月 9 日) 第十二军以摧毁张店南部山岳地带的共军山东军区司令王建安指挥下的第一、第二旅(旧山东纵队)及鲁中军分区(兵力约一万三千人)根据地为目的，11 月 10 日开始作战。参加兵力以第三十二师团的五个大队，第五十九师团的两个大队，独立混成第五旅团的两个大队为基干。各部队以分进合击方式，在各地反复进行包围，但由于是山岳地带，难以捕捉敌人，摧毁其根据地设施后，于 12 月 9 日结束作战。在此次剿共作战中，对潜伏于沂蒙山(沂县西北约 60 公里)山寨的少数共军，使用了所有手段企图歼灭和招降，但敌人并不理睬，一直抵抗到底。

关于此次作战，中共方面的记述如下:

1943 年内，敌人在山东全区所实行的“扫荡”达 50 次以上，在秋冬之间的一次，特

别激烈。从11月初起，敌寇出动山东的全部兵力和大部分伪军，从西到东，从南到北，对我山东地区发动了大规模的轮番“扫荡”。但是，由于我军主力和民兵的奋战，敌人的大扫荡计划终被粉碎。山东军民进行此次反“扫荡”，比过去任何一次都计划得周密和主动。通过军民的团结、战士的勇敢作战以及战术的巧妙，取得了辉煌战果，杀伤和俘虏山东伪军总数的二十分之一，夺回了相当于敌伪据点总数二十五分之一的城市和村庄。

应当特别提出的是沂蒙山的防卫战，敌人对该根据地的攻击相当激烈，在敌第十二军统率下，由石井第三十二师团长亲自指挥部队，并以炮兵队、航空中队、伪军团等协助，疯狂地进行攻击。然而，八路军官兵仅以少数的兵力固守达20天之久，充分发挥了英雄主义精神。使敌饱受痛苦后，我军踏过满山遍野的敌尸，突破了敌人的包围。

治安特别措施

中国方面的华北新建设运动

促进华北新建设 中国方面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与日军的秋季肃正作战相呼应，极力推进治安建设。

华北政务委员会，王克敏就任委员长后，于8月8日召开了首次华北省市长会议，对于“华北新建设运动”进行了协商，通过了如下的“促进华北新建设指导纲要”的决议。

方针

一、阐明日本对华新政策的真意，使全体国民彻底认识和理解，以新的热情尽到职责，从而完成华北的新建设。

二、政府加强粮食的收集、运输、分配等重要工作，保证民食，使华北建设工作全面的顺利进展。

三、运动实施日期，定为从8月9日起至10月30日止，华北政务委员会负指导监督的全部责任，各省市长以下各级机关。要与日本军、官、民紧密联系，不讲空话，努力实践，在指导民众时，必须与唯一的国民组织新民会密切合作。

实施要领

贯彻政府粮食政策时，对于接近敌人的地区，在收获期要防止敌人的扰乱，并阻止粮食流入敌地区。

一、对政府的粮食统制，鉴于一般农民的无知，可能发生种种误解。要将其价格的决定，物资的配给，充分向农民解释清楚。

二、合作社、采运社两个收购团体，要充分协作，各地官厅应监督指导收购工作。

三、严格遵守公定的收买和贩卖价格，对囤积居奇，暴利出售等经济扰乱行为，要严加惩处。

四，鉴于各地常有不良官吏、警察、乡村保甲长等，在中间剥削民众，对此，要坚决予以处置。

五、产粮区的小麦，各地方长官应负责完成规定的缴纳数量，根据成绩的优劣，实行赏罚。

新民会的活动 新民会于8月9日召开大会，支持政府上述决议，同时开始了运动。特别是为使该会领导下的社会、宗教、文化、思想等21个团体紧密团结，以促进新华北的建设，进行了准备工作。不久，声势逐渐高涨，9月9日成立了“华北民众团体反共大同盟”(该组织总部设于北平，各地方均设支部，各

民众团体均设反共工作团，专门从事秘密的反共活动一译注)。新民会更从 12 月 26 日起以五天时间召开了全体联合协议会，关于今后的运动方针，发表了如下的声明:

运动方针

一、新民会运动的基本方向，对内通过新国民运动的实践，完成国民组织，对外以大亚细亚主义为目标，谋求东亚民族的团结。

二、将重点置于教民、保民、养民的措施上，促进确立民众的自治、自卫、自给，以发挥国民的全部力量，

三、在对共斗争上，集中军、政、官、民的全力，以思想对思想，以组织对组织，以武力对武力，以图彻底根绝赤祸。

四、粮食问题是当前最主要的问题，要积极开展增产救民运动，协助政府执行粮食政策，努力贯彻农业增产和低物价政策。对囤积居奇，黑市买卖等不法行为，要坚决给以打击。唤起农民增产热情，以求提高生产能力。

五、作为国民组织基础的分会运动，要努力加强其组织，充实丰富其实际的内容，以求得国民组织的统一。

六、将青少年运动，向城市及农村各阶层进一步贯彻下去。

此外，山西省政府于 10 月 22 日组成“山西省急进建设团”，也叫做“产业建设军”，以此克服劳动力不足、确保粮食和获得资材等方面的困难，期望能大量增加生产，同时也注意到中国青年阶层的身心锻炼。规定 17 至 40 岁的男人均有服务的义务，被选拔的常备队员，服务期间为三年，预备队员在必要时动员他们从事重要物资的增产和获得工作。

设剿共重点地区一直辖行政区 华北政务委员会为了进一步加强剿共体制，于 1943 年秋首先选定北京以南准治安区的要地霸县，永清、安次(以上属津海道)及固安(燕京道)等四县为政务委员会第一直辖行政区(面积约三千平方公里，人口约一百万)，以原山东省沂州道尹曹若山为行政公署主任，公署设于永清县城。华北方面军应政务委员会的请求，于 10 月上旬特命担任警备的第六十三师团(师团长野富昌德中将)对该地区进行清剿及幕后指导，并监督指挥参加清剿的治安军。11 月 8 日师团下达了剿共命令，23、24 日以步兵第六十七旅团为主一齐出动，解除了各不良团体的武装。

随着地区内行政措施的贯彻，民众加强了团结，中共方面的游击队及特工人员难以活动，治安得到改善，已不需要在外围警备的日军的军事援助了。地区内的生产、税收等均逐渐取得成绩，至 1944 年 6 月左右人口约增加 20 万人。

与此同时，华北政务委员会计划在冀东道(辖 11 县，面积约二万五千平方公里，人口约四百五十万)设直辖行政区。但因本地区共军势力非常强大，不能施行民政，乃由治安军采取军政方式，于 1944 年 7 月于唐山建立行政区公署，以姜凤飞中将为行政公署主任兼冀东绥靖公署主任。在日军支援下，治安军以十个团分别部署于各县，期以军政统一的战时体制进行政治、经济建设工作。然而，本地区治安情况恶劣，讨伐作战全无宁日，行政机关及民众组织一如既往未见刷新。结果，对民众采取的措施终于未能贯彻执行。

华北特别警备队的建立及初期作战

编成的经过 1943 年 9 月，在华北编成了以破获中共秘密组织及秘密活动为

主要任务、具有特殊专门能力的部队“华北特别警备队”(以下简称北特警)。1944年6月又行改编，增加了兵力。至战争结束时为止，北特警一直积极进行着对共作战，其成果虽功过各半，但在战争末期的剿共作战中，认为是有特别存在必要的。

1943年8月24日，根据军令陆甲第八十一号，下达了改变华北派遣宪兵队的编制及组织华北特别警备队的命令，北特警于9月20日编成。

华北宪兵队原来总人数约为2,600人，由队司令部及北京、天津、青岛、济南、开封、临汾、太原、石门、张家口九个宪兵队和教习队所组成。经此次改编，压缩为总数约970人的北京、济南、太原、张家口四个宪兵队。

继而于10月12日根据大陆命第八六二号将“北特警”编入华北方面军的战斗序列，并下达了“在华北方面对敌人的秘密组织和秘密活动进行侦察、摧毁等秘密战斗”的基本任务。

据此，华北方面军布置:“北特警与当地兵团协力，以主力在冀东地区附近，以有力的一部在河北省北部(冀东地区除外)，另以一部在河北省周围要地及重要国防资源设施地区和主要城市，侦察摧毁敌人的秘密组织及秘密活动。同时并应准备以后对其它地区的作战。”

北特誓编成装备的概要 在编制上的特点是拥有单独的对共调查班、科学侦谍班、特别侦谍队及临时特别情报队等特殊部队，并具有进行剔抉及小规模游击战的机能。

司令部及各大队本部，为了综合复杂多端的各种业务，实行强有力的统制，因而配备多数人员，主要职位由宪兵科军官及下士官(班长)担任。

北特警各大队、中队可以分开使用，各中队都具备实行侦察剔抉的机能。

装备除特殊器材、通讯器材外，以自卫及轻便武器为主，具有游击战斗能力。

中共的秘密战法 北特警司令部于作战开始时，对中共方面的秘密战法，曾作如下观察:

1943度，中共的战略方针的基本特点，可归纳为“加强抗日游击战的群众化”及“广泛开展民主运动和生产运动”两点。

一、中共在大东亚战争爆发后，重视政治攻势而不进行积极的军事行动。1943年初，北方分局所发表的关于1943年度工作方针的指示中指出五项工作:(一)普遍加强群众性的游击战；(二)实现民主政治；(三)继续开展并彻底贯彻群众运动；(四)加强群众教育；(五)政治攻势的经常化。此外在同年10月1日中共中央所发表的“关于十大政策的指示”中，提出了包括以下十项政策的方针:(一)加强对敌斗争；(二)彻底精兵简政；(三)统一领导；(四)开展拥政爱民运动；(五)发展生产；(六)整顿三风；(七)审查干部；(八)时事教育；(九)实行三三制；(十)彻底实行减租减息。(以上未与中文资料核对一译注)

二、中共抗日战争的战术特点。

(一)军事

(1)大力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

工作重点在于广泛开展群众的组织工作，并提高其质量，加强正规军及地方游击队的游击战能力；经常进行群众备战教育，加强以民兵及一般群众为基础的游击战，特别要加强游击战的群众化。以军事从属于政治任务为原则，军事行动要与政治工作紧密结合起来，正规军与地方游击队及地方党、政、民密切联系，要在他们的协助下为当地群众利益进行活动，强调避免单独行动。

(2)游击战的统一领导指挥

由于采取分散游动的方式，难以做到全面统一指挥，为此，除一般战略事项外，游击战以县为单位实行统一指挥。此外，在机构上采取县长兼大队长、县武装科长兼副大队长的方法，在党的(县委)统一领导下，开展游击战。

(3)彻底实行精兵简政

从前年开始实行的精兵简政，虽大致完成，但还不够彻底，现正进行下级机关的整顿。由于实行精兵简政而多余的人员，随着游击战的地方化，需要加强基层下部的力量，将他们派往重点地区，担任基层干部。

(4)游击战术的巧妙化

除设法提高游击战的一般战术能力外，特别重视对孤立的保安队、绥靖军等华方武装团体进行各个击破；以连为单位机动运用少数兵力实行分散的游击战；广泛开展地道战，大力进行破坏道路、桥梁、通讯线路的交通战；加强依靠民兵及群众的谍报组织，开展有民兵配合的夜间袭击；地雷战的群众化，加强封锁政策等等，使游击战术逐渐走向巧妙化。(以下译略)

进驻警备区 9 月 20 日，北特警组织完成，同时下达了特警作命第一号命令，立即开始行动。命令大意如下：

第一大队主要与独立混成第八旅团协力，担任侦察剔抉滦河以西铁南(北宁铁路南侧)地区的敌人秘密组织及其活动。以军队划分而组成的第一至第五特别侦谍队，分别在北京、天津两特别市及开滦、井陉、枣庄各煤矿展开活动，侦察敌人的秘密组织及其活动情况。

第二至第五大队，在天津进行教育训练，准备以后的作战。

据此，第一大队及第一至第五特别侦谍队，在 9 月中旬各自进驻指定地区，确立了侦察的基础。后于 10 月上旬发现以收集情报为主的敌有力部队，以冀东东部地区为中心，对冀东、京津、满洲各地积极展开秘密活动。为此，乃于 10 月 4 日新编成了第六特别侦谍队，部署在山海关，使之侦察上述敌人的行动，掌握其全面情况。

在天津的第二至第五大队，从 9 月 22 日起，经过一个月必要的作战教育训练，做好作战准备。在此期间，北特警司令官为了提高中队长以及主要负责人剿共特务战的能力，进行了干部集中教育。这项教育的重点，则是掌握中共党政军的实际情况和剿共作战的规范，加强团结和纪律(特别注意对民众的军纪，监督当地雇用人员不法和不道德的行为，避免妨碍中国方面行政等情况)，以及侦察剔抉战斗的要领等。对一般队员，全都进行华语教育，并通过演习进行术科训练、盘查检查、化装、尾随、暗中监视、剔抉行动、甄别匪民、搜查审问、听取谍报、小规模战斗等方面的教育。

10 月 15 日，在上述工作准备完毕之前，根据 10 月 12 日方面军的命令，对下列各部队下达了任务。

一、第一大队配合独立混成第八旅团的作战，先以 1943 年底为期，侦察摧毁敌人的秘密组织及其活动。

二、第二大队(缺第四、第五中队)以 1944 年 4 月为期，先将重点指向盐山、乐陵各县，与第十二军及独立混成第九旅团配合。使察摧毁敌人的秘密组织及其活动。同时分别以临清县及博兴县为中心，收集该地方的情报，并且迅速准备收集有关山东分局的情报。

三、第三大队配合独立混成第八旅团作战，暂以 1943 年 12 月底为期，侦察摧毁敌人的秘密组织及其活动。

四、第四大队以 1944 年 4 月为期，先将重点指向安国、饶阳、无极附近，与第一一 O 师团及第六十三师团配合，侦察摧毁敌人的秘密组织及其活动。同时以南宫县为中心，收集该地方及拒马河以南石门以北的京汉路西侧地区的情报，并且迅速准备收集有关北方

局的情报。

五、第五大队以 1944 年 4 月为期，将重点指向蓟县、平谷、三河附近，配合第六十三师团及独立混成第九旅团，侦察摧毁敌人的秘密组织及其活动。同时在怀来附近部署约一个中队，在宣化附近部署约一个分队。在此期间，收集拒马河以北京汉路西侧地区的情报。

六、第二大队第四中队以 1944 年 4 月为期，将重点指向固安附近，配合当地有关部队，侦察摧毁敌人的秘密组织及其活动。

七、第二大队第五中队以 1944 年 4 月为期，将主力置于太原附近地区，与第一军配合，各以一部侦察摧毁敌人在阳泉、汾阳附近的秘密组织及其活动。并迅速准备收集有关太原分局的情报。

华北特别警备队宣传实施计划(节译)

第四、实施宣传的手段

十四、要重视具体的宣传内容和形式。

十五、不公开的方法。

(一)建立秘密宣传组织

(二)由秘密宣传员煽动民众和个人

(三)由秘密宣传员传递信件或散发宣传品

十六、公开方法

(一)免费医疗

(二)推广报纸杂志、散布、张贴传单、照片

(三)墙报

(四)拉洋片、电影、戏剧、民众大会，讲演会

(五)通过扩音器、留声机进行广播

(六)进行具体工作(应急配给物资、援助土建作业、支援农业生产)

(七)根据需要组织参观城市

第五 宣传施行要领

十七、担任宣传人员必须有坚韧不拔的情操。要忍耐、和气、冷静、谨慎，不发威风、倾听民声、明察民众心情，以诚意处理事务。切记失一人如失万人，得一人则得万人的道理。对每一个人都应不厌其烦地进行工作，以此获得民心。

十八、宣传，特别是对民众宣传，要抛掉理论，投其所好。要用鲜明的现实打动民心，顺应民情，这是宣传的诀窍。

十九、正确地判断当前的情况，迅速妥当地确定宣传重点，大力进行集中宣传。

为此，要大胆地使用兵力。

二十、宣传的时机适当与否，关系到宣传的成败。因此，要洞察全局形势，尽最大努力抓住宣传的大好时机，同时还应努力创造机会。

为了适应掌握民心、侦察工作、剔抉作战等各种目的，努力做到准确地判断进行宣传的时机，根据需要，预先进行酝酿，为宣传的成功打下基础。

二十一、宣传工作人员在宣传思想上应加强统一，特别要注意实际表现的一致。

为此，各级指挥官对于宣传工作，要在人员、时间、地点、事项等方面，使各机关能以贯彻到底，以不断加强宣传的领导力量。

加强部队间的宣传联系。

二十二，宣传工作一般使用多种手段，集中地反复地进行宣传，顽强坚决地推动工作。

二十三、鉴于剿共作战的特点，不能只着重对集体的宣传，要进一步对社会的各阶层

的个人和被俘的党员，通过说服、讨论、启蒙等方法，顽强深入地进行宣传。

二十四、鉴于剿共作战的特点，各中队要抓紧时机建立秘密宣传组织。

特别是秘密宣传员，要积极进行对个人的煽动工作，利用民族性的特点，传播流言，运用这种方法能够迅速取得宣传效果。要尽量减少公开的宣传活动。

二十五、在争取秘密宣传员时，先做好对争取对象的调查，关于为了争取他应进行的说服、启蒙，以及被争取者的弱点等，均应预先作好周到细致的调查计划，在进行时切忌急躁和露骨，要顽强而慎重地进行工作。

二十六、在编写宣传资料时。应注意下列事项:

(一)是否使用敌人的惯用语及其它术语以及有关使用类似的术语，要由司令部统一规定。

(二)根据宣传对象，要适当使用语言和文字。此外，对被俘党员、知识分子等，不要用错敌人的惯用语及其它术语。

(三)要充分使用绘画和图表等。

特别在绘制图画时，应使用强烈的色彩，通过粗大的线条，以便强烈刺激文化程度低的宣传对象的神经。

(四)宣传内容，要适合民族性、人民生活及文化程度、习惯，要特别注意防止我方的主观、自以为是的作风。

二十七、实行剔抉工作，对民心的影响很大，对此应特别注意，即使剔除一人，也要积极进行宣传，防止民心叛离。

在大规模实行剔抉时，要在大(中)队长的组织下，立即全面展开宣传工作，以防止民心动摇。

二十八、在进行宣传时，要竭尽各种手段，引导中国方面当地机关自动地积极展开活动。以期获得宣传效果，节约我方宣传兵力。

要特别重视利用俘虏充当宣传工作人员。

第一期作战的展开(1943 年 9 月 20 日一1944 年 6 月 9 日) 在 10 月间，第一大队及各特别侦谍队，继续执行以前任务，从 11 月起以北特警的主力，开始了侦察、剔抉战。但在第五大队担任地区，敌人集团武装在平谷、三河附近游动，如不歼灭该地游击部队，侦察剔抉作战将有困难。因此，北特警司令官亲自指挥大队主力进行扫荡，直至 12 月上旬为止。

在 11 月间，北特警进行剔抉作战 114 次，敌遗尸 76 具、俘敌 335 人(区党委级 4 人、地方党委级 l 人、县委级 9 人、分区委级 43 人、村支部以下 278 人)、缴获步枪 27 枝、手枪 19 枝。

当时华北方面军，正在进行冀西秋季作战，但冀西军区的共军为了重建根据地，正企图获取平原治安区的物资，以待我军作战完毕伺机活动。因此，第六十三、第一一 O 师团，对该地区的物资流出进行了严密的封锁。北特警为协助这一作战，从 12 月上旬以第四大队，在担任地区内加强了侦察剔抉及宣传工作，同时命司令部的对共调查班，调查在保定、石门之间的物资流出以及其它经济状况，并使之协助第四大队。

其它，在 12 月间，北特警的主要部署如下:

一、由于我方已掌握了在冀东、京津、满洲各地积极进行秘密活动的中共情报机关(北方分局联络部:部长刘杰)的大致情况，为此，命令第六、第一、第三侦谍队进行深入侦察。

二、12 月 7 日，命科学侦谍班在北京、天津展开对敌无线电通讯的侦察活动。

三，在北京特别市内旧俄国东正教堂附近发现中共系统的情报活动。为此，在 12 月 9

日，命令第一侦谍队进行深入侦察。

四、在冀东地区的中共势力，由于我兵团多次讨伐和各部队的剔抉战，敌发生动摇。据判断：其有力干部，已暂时转入热河省内，企图扩大锦热奉地区的党的势力。因此，为了在地区内深入侦察和加强剔抉作战，于 12 月 18 日，命令第一、第三大队及第六特别侦谍队，以 1944 年 4 月为期，在继续执行原来任务的同时，要尽快扩大成果。

在同一天内，司令部对共调查班的主力开赴冀东，预定以大约一个月的时间进行调查，搞清民心恶化的动向及其原因。

五、在第十二军管区内枣庄附近的中共，进入 12 月逐渐活跃。为此，在 12 月 24 日，命令增强第五侦谍队的兵力进行深入侦察，同时，使其加强对山东分局及新四军的情报收集工作。

在 12 月间，剔抉作战次数为 266 次、敌人遗尸 175 具、俘虏 1,555 人(区党委级 3 人、地方党委级 5 人、县委级 21 人、分区委级 74 人、村支部以下 1,456 人)、缴获步枪 103 枝、手枪 63 枝、自动步枪 1 枝。

1944 年 1 月下旬，方面军作了新的部署，以独立混成第八旅团为核心统一各战斗力，以加强冀东地区的剿共措施。

据此，北特警于 1 月 24 日下达了“侦谍破获战斗指导要领”，指示所部要与兵团各部队保持紧密联系，机动灵活进行战斗。根据过去的侦察，发现中共对井陉煤矿的工作逐渐展开，在煤矿附近的活动也转向积极。因此，命第四特别侦谍队迅速进行深入侦察，同时准备对之进行全面剔抉。另一方面，第一特别侦谍队，在 1 月下旬，破获了中共北方分局的北京情报组织，逮捕 47 人，摧毁了该组织。

2 月 2 日，根据方面军命令，为加强第十二军京汉路方面的对敌谋略封锁及防谍措施，将第五大队第五中队主力派往新乡配属于该军。

3 月 10 日，第一、第二、第三、第六特别侦谍队，对“中共北方分局联络部”(谍报网)同时进行了剔抉作战，捕获该联络部山海关负责人等 55 名。3 月 20 日以后，以第一、第二特别侦谍队，破获了在北京、天津地区的蒋系秘密组织，到 4 月 8 日共捕获 186 名。

根据截至 3 月上旬的情报，冀东中共称本年度为“总反攻”的一年，在加紧政治攻势的同时，根据中共的指令，于初夏发动第一期反攻，以破坏交通、通讯及袭击重要资源设施为目标。据判断现在似正积极策划准备工作。

北特警为了保卫冀东唐山以东京山路及开滦媒矿，于 3 月 19 日，命第一、第三大队迅速加强侦察，并抢先部署，以扼制敌秘密活动。(独立混成第八旅团，在 2 月 13 日～4 月 5 日，曾在遵化县附近地区进行了肃正讨伐作战。)

另一方面，第四大队在冀中地区，对晋县、深县、无极各县工作组织、博野县委、清苑县的合作社等进行了剔抉，并扫荡了张村附近敌游击部队。第二大队以一部协助第五十九师团的肃正作战，同时捕获了渤海第三专员公署、冀鲁边区地方党委等的干部，取得了一定成果。

据判断，重庆方面与中共方面乘大东亚战争形势的变化，将于初夏以后开始准备对日总反攻。为此，北特警司令部于 4 月 18 日发出如下命令:

一、各大队、直属中队应速行培育预备侦察网，使之能够适应治安变动情况，及时改变重点进行侦察。同时对重要铁路及主要国防资源设施作好防卫，不使发生问题。

二、为了加强侦察有关敌人总反攻的行动意图，在各大队特设一部分专任情报工作人员，并使各特别侦谍队也收集这方面的情报。

三、司令部新组成七个直属的临时特别情报队，分别布置在北京、青岛、兖州、归德、

邯郸、潞安、大同，收集北特警担任地区以外的有关敌人总反攻的情报。情报内容包括武力反攻、带有战略统一性的游击战、破坏谋略等。

四、为了加强有关扼制敌人对铁路策划秘密战的侦察，华北交通株式会社警务机关的特务组织暂由司令部干部直接指挥。

五、第二大队、第一～第三、第五特别侦谍队在担任地区内，对中共方面及重庆方面的基层组织，进行扰乱，阻止国共合作的“谋略宣传”。

六、为应付治安情况的变化，应迅速实行教育训练.以提高侦察能力和加强游击战的力量。

4月20日以后，又部署司令部对共调查班及各大队调查班，对中共总反攻的情况进行调查。

各大队在四、五月间，除努力收集上述情报外，并配合当地兵团的肃正讨伐，积极收集情报、捕获敌干部、破坏中共的经济通路等，逐渐提高了效果。

科学侦察班，在5月16日以主力布置在京津地区，以一部分布置在济南，目的是要粉碎中共的谍报工作，特别对其无线电活动进行电波侦察工作。

从5月底开始，为了改编北特警，暂时中断部分战斗，在6月9日第一期作战任务结束。

在此期间，剔抉作战4,214次，敌遗尸1,984具，俘虏13,438人。区党委级9人、地委级32人、县委级225人、分区委级928人、村支部以下12,244人。(原文俘虏总数字与分类数字不符—译注)

教训及观察 第一期作战结束以后的形势及此次作战的教训，在“北特警战斗详报”中，有如下叙述:

一、作战后敌我形势概况

(一)敌方

在第一期作战期间，敌虽多次受我剔抉作战的打击，但仍乘国际形势的变化，敌各种势力逐渐伸张，尤其在京汉作战时，由于一部分皇军的调出，中国方面武装团体的集结，县城的放弃，以及因改编变更重点地区等原因，使敌人得以趁机逐渐充实了地上地下的战斗力量。敌人一方面正在加强对中国武装团体进行谋略袭击、策反工作以及整军扩军、麦收工作等总反攻措施，一方面积极破坏交通、通讯线路和对重要战争资源设施地区进行谋略活动。

(二)我方

各大队增加了侦察力量，逐渐充实提高收集情报、侦察、剔抉、宣传、谋略游击战等的战斗力量，为下次作战打下了基础。

(三)此次作战对敌的影响

华北特别警备队开始进驻时，各地的共军颇为焦虑，尽力收集有关该队的情报，至1944年中共中央始下达命令采取以下对策:

(1)以武力掩护中枢组织。

(2)集结分散的行政武力。

(3)以加强除奸工作和围城工作，对情报、经济、交通进行反封锁。

(4)烧毁良民证和户口簿。

(5)中枢组织的干部分散活动。

(6)各匪团使用秘密名称。

(7)伪装基层组织。

敌采用以上方法企图对付特警的战法。然而，由于我方的侦察摧毁战斗，使敌蒙受多次打击，各地区的中共都显著地发生了动摇。尤其在冀中方面，中共被第四警备大队摧毁

了 28 个重要组织。为了对地方加强戒备，中共逐渐以地方军进驻冀中。冀鲁中共，由于第二警备大队的积极剔抉作战，受到歼灭性的打击，失去了独立性，在 3 月初不得不与清河区合并，新成立了渤海区。

特别侦谍队在京津地区进行的剔抉作战，给予中共和蒋系统的中枢机关以相当打击。

二、龃龉、过失、其它可供参考的事项

(一)有关作战一般情况

在完成作战任务上宪兵科出身以外的人员，对秘密战全无经验，对中共的理解也很肤浅，对敌情的掌握也不深入，各级干部在作战上缺乏信心，因此，在第一期作战期间，部队未能将全部力量发挥出来。

(二)中共党政军结成一体，在党的统一领导下进行有机的活动，并深深打入农民的实际生活中。对此种组织及其顽强性，我方的思想。政治、经济的各项政策措施未能配合武力作战，尤其是中国方面政治力量未能与侦察摧毁战紧密衔接起来，致使其进展缓慢。更加严重的是，中国方面的武装团体及其它机关人员的贪污腐化，使民众更增加了负担，因而招致民众的憎恨，降低了我方措施的效果，给予敌人以可乘之机。中国方面政治力量的软弱和贪污腐败是敌人工作得以进展的良好条件，今后必须对此采取彻底的措施。

(三)必须积极使用中国方面的各机关，剿共作战的要诀以掌握民心为第一。

为此，对于民众的呼声，应从内到外精心考查，采取切合实际的措施，即从“深知中国民心的是中国人”的观点出发，对有关机关要大力支援培植，使它能自觉地积极进行剿共作战。

(四)因对翻译、情报人员的监督不够而造成民心离叛。在剿共作战中，必须有翻译、情报人员参加。在使用这些人员时，必须经常严格监督他们的生活起居，以杜绝不法不良行为。

由于翻译、情报人员的恶劣非法行为引起民心离叛，加上敌人的反宣传，给我军完成作战任务带来极大困难。

(五)剔抉作战要随机应变，要研究创新的方法。下面几点可供参考:

A. 对同一目标要反复急袭，以使敌人无法退避。

B. 用少数兵力分散化装成便衣，这种方法，可欺骗敌人和农民，成功的机会较多。在白天穿制服单独行动，容易被农民从远处发现，会暴露我方意图。

C. 各据点相互联系进行出击，住往可以取得大的战果。为此，必须采取各种手段，做好所有小据点之间的联系。

D. 为了作好检查搜索，一兵一卒都要具备警察的敏感能力，必须熟练掌握剔出混在农民中间的干部、发现潜伏的敌人、查出隐筴的武器等工作。

E. 敌人的干部经常有较多武力掩护，如以我军一个小队的兵力往往难以展开活动，因此，在部署分驻时，需要考虑至少要有五十名以上随时可用的机动兵力。

F. 以少数侦察兵力分驻时，务必与该地兵团部队或中国方面武装团体紧密联系。

有关北特警的作战的评价，当事者有如下回忆: (包括北特警第二期作战情况在内。)

北特警高级参谋大森三彦大佐的回忆:

(一)北特警在进行治安战中，最感头痛的问题是没有行政权。只凭武力并不能摧毁人的思想。治安战需要对军事、行政、经济、警察、宣传等进行统一指挥。但是，北特警和各兵团都没有这种权力。有协作关系的华北政务委员会，其政治力量也十分薄弱。要推动地方政权求得所期望的成果，就必须刷新政治体制，使之适合进行治安战的需要。这是第一个大问题。

所谓治安的概念是因为有主权才得以维持。没有主权就没有治安。我军在华北没有作

为政治对象的人民，因而就没有真正的主权。严格说来，是军队掌握着主权。因此，北特警只能做本身能作的工作。例如通过严肃军纪取得中国领导者的协力，部队自己进行宣传、扩大新兴起的青年运动等工作以掌握民心。当时大东亚战争正走下坡路，整个战局的动向对敌我人心都有很大影响，一般的简单的领导，终难挽回颓势。

(二)侦谍工作主要是通过谍报活动，侦察目标为某些人物和组织的动静并取得证据，但这超出了军事的范围。如果进行政治解决，其成果可能会更大，北特警的侦谍活动，除进行反游击战外，比华北宪兵队时期更增加了侦察的深度和广度，力求通过剔抉作战，取得侦察成果。但其结果却看不出什么成效。

(三)要取得侦谍成果，在我方地区内至少需要六个月时间。华北战场广阔，又是处于异民族之中，难以象在日本国内那样进行周密细致的侦察。但因急于取得成果，产生了相信虚假的情报、而不能充分证实的弊端。因此，要对侦察人员进行再教育，努力提高他们的素质，并革新侦谍工作。过去侦察活动往往是委派下级人员，这次特别加强了对侦察队长的教育工作，让他们每月绘制复杂的侦谍图，并研究各种情报的精确程度。侦谍活动以个人单独潜入敌区的情况为多，往往有生命危险。但是，对此并无充分保障。此外，还存在语言不通，不易得到优秀谍报人员和协助人员等等困难。

(四)剔换意味着检举，然而又有其独特之处。剔抉要经常做好战斗装备，而且必须活捉对方而不得杀害。敌对观念不深的一般民众，在中共强制下作些敌性活动，对他们逮捕以后处分要恰当，过去存在处分过重的弊病。为了争取民心，改为释放政策，以防上出现因犯小过惩处过重而使之跑向敌方的情况。

(五)北特警不单纯是进行反游击战的部队，但为了进行侦察剔抉地下活动，首先必须击溃公开活动的游击部队。然而宪兵缺乏指挥战斗的经验，编入的步兵也并不都是优秀的战士。此外，方面军内的各兵团在情报战方面已被中共击败，只有在情况不明之中进行“主观的扫荡战”不能与敌人接触。因此，北特警尽力作到：使自己具备游击部队的主动性，研究如何能够与敌接触的

方法，励行召每日出动，、“突击素敌”。掌握地方的特点及敌情，熟悉千变万化的游击战法等。但游击战本来是在民众协力下才能进行的一种战法，所以在异民族土地上进行游击战十分困难，肃清敌人的游击队已是不可能的事情，

(六)兵团为了经济封锁所设的隔断壤，在物质方面虽有所收获，但为构筑隔断壕使用劳力，破坏耕地以及阻碍物资交流，这一切对民心的叛离产生了极坏影响，因而遭到指责。北特警根据民众的要求，虽然也填埋了一部分，但那主要是为了剔抉支持中共的经济界人士和切新秘密通路才填埋的。

华北方面军参谋长大城户三治中将的回忆:

为了加强对付中共的治安战，组成华北特别警备队着重部署于冀东地区。并且进一步加以改编，增强了兵力，但并未取得多大效果。其部署和活动都以城市为中心，在山岳平原地带是无能为力的。宪兵只知见可疑的就绑，多有过分，毫无保护民众之意。该部队为按照方面军的希望所设，但其结果却适得其反。

另一方面，由中央下达的对华处理根本方针，完全未考虑现地实际情况。中国的政治家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物，对此可能是毫无所知。实际上，要想得到华北政务委员会方面政治力量上的协力是不可能的。因比，与中共方面党政军民结成一体的情况相对照，我方的军政民则是支离破碎的一盘散沙。

华北方面军参谋井门满明少佐的回忆:

北特警成立时，我对此剿共专门兵团抱有期望，但同时也有相当疑虑。期望的是：随着战争长期化，在走投无路之中，打开一条对付中共“丛林战”的门路，希望能够出现新的旺盛的战斗力。疑虑的是：敌人以民众为丛林，潜伏其中进行抗战。倘要剿灭该敌取得

战果，就将伤害无辜的民众，因而造成对全局的危害。

对共作战的最终目标，可以归结为：第一是摧毁革命核心势力；第二是争取构成社会成员的民众。为了达到第一个目标。就必须具备优于敌人的武力，但这种武力并非过去那种数量上占优势的武力，单凭那种武力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必须具有适应敌人特点的特殊力量。第二个目标，只靠整顿军纪是不能获得民众的。必须使广大民众意识到自己是社会的一员，组织起来使社会与革命核心相脱离才行。因此，必须动员武力以外的其它力量共同发挥作用。

北特警有关附表

华北特别警备队收集情报的实施要领

<table>
<tr><td colspan="7">华北特别警备队对共调查实施计划</td></tr>
<tr><td colspan="7">（1943 年 10 月 15 日华北特别警备司令部）</td></tr>
<tr><td>调查方针</td><td colspan="6">1、调查中共党政军民的组织及其活动的状态，探明其弱点及特点，同时观察其将来的动向。
2、收集研究大队及特别侦谍队的剿共战斗的实际情况。以此提高剿共秘密作战的技能。</td></tr>
<tr><td rowspan="8">调查要领</td><td colspan="2">调查担任地区</td><td colspan="2" rowspan="2">调查期间</td><td>编组</td><td>调查方法</td><td>报告</td></tr>
<tr><td>部队别</td><td>地区别</td><td rowspan="7">各大队对其调查班根据必要可请求司令部或当地兵团对其调查班的援助</td><td rowspan="7">1.重点放在对俘虏的中坚干部的迅问、研究文件、调查当地实情 2.调查顺序按情报收集计划规定的进度</td><td rowspan="7">每次调查要作情报记录，此外每一项目完了之后，逐次汇总进行报告</td></tr>
<tr><td>司令部</td><td>华北全部</td><td rowspan="4">第一期（基础调查）自 1943 年 10 月 28 日至 1943 年 12 月底</td><td rowspan="4">第二期（地区的特点调查）自 1944 年 1 月 1 日至 1944 年 4 月底</td></tr>
<tr><td>第一、第三大队</td><td>冀东地区</td></tr>
<tr><td>第二大队</td><td>冀鲁晋西北地区</td></tr>
<tr><td>第四大队</td><td>冀中冀西地区</td></tr>
<tr><td>第五大队</td><td>平西平北地区</td><td colspan="2" rowspan="2">但期间仅表示作业内容的顺序</td></tr>
<tr><td>特别侦谍队</td><td>工业城市及重要设施资源地区</td></tr>
<tr><td rowspan="2">调查纲要</td><td>司令部</td><td colspan="5">1.观察中共全部动向
2.收集指导大队作战的必要资料
3.收集指导以后作战的必要资料
4.研究各地区的转性，并适应各种情况的剿共对策
5.研究有关剿共的综合对策</td></tr>
<tr><td>大队</td><td colspan="5">1.调查担任地区内中共的具体情况
2.为便于侦察剔抉并提高其效果进行调查
3.调查通过作战后该地区中共的变化及给予邻接地区的影响
4.收集整理指导中队作战所需资料
5.观察担任地区内中共的全部动向</td></tr>
</table>

	特别谍报队	1.调查城市及重要设施，资源地区中共组织活动的实际状态 2.调查中共适应我方治安地区工作特点的外围伪装组织的实际状况

一、大队共同主要调查项目

一、大队共同主要调查项目		
调查要目	调查项目	调查（收集）细目
军事	1.组成、装备	1.野战军，地方武装的总兵力、组织、编组、装备游击据点、游击路线的状况 2.民众武装的总兵力，组织、组成、装备、活动状况，但在民众武装方面各项情况有强弱之差，应按县分别详记
	2.补充、补给	1.上列武装的武器、弹药、食粮、器材的供应情况 2.兵员、募兵、补充的实际情况 3.实行义务兵的实际情况
	3.后方机关设施	1.后方机关设施的种类、数量、所在地、内部组织机构、经营、机能的实际情况 2.军区状况 3.交通、通讯状况
	4.法令、制度	1.有关军事的重要法令指令 2.其它有关的军事重要文献
	5.军纪、团结、士气	1.军内党的组织状况、党员的百分比 2.军内党员和非党员的比率(军内党员和官兵的关系及其比率) 3.军事部和政治部的关系 4.地方武装与野战军以及民兵的关系 5.抗战意志、军纪、团结的状况 6.与民众团结的关系 7.老八路与新八路之间的比率及其关系 8.旧杂牌八路与纯八路的关系 9.敌工部的活动及实际情况
	6.教育	1.教育机关的种类及其内容 2.学校以外的教育训练状况
党	1.党组织	1.党的各级组织及其人名 2.党的各级领导系统及其领导管区 3.县级以上的各级党组织的发展史 4.党组织的要点(治安、准治安、未治安区要分开)
	2.党员	1.党员数量（各级党组织分开）与民众的百分比 2.党员的级别、年龄、学历、性别、及地区（治安、准治安、未治安地区）分开统计的情况 3.党员入党的办法（级别分开） 4.党员的生活实际情况(干部党员与一般党员分开说明）

	3.党的活动实际情况	1.以地委、县委、区委为标准 (1)组织宣传工作的状况 (2)地方抗战组织领导的状况 (3)民众组织的领导状况 (4)上级机关的监督、领导状况 2.党务会议的实施状况 3.上级党与下级党的通信联络的手段方法 4.党的行政机关领导的方法 5.点线工作的状况 6.对我方实行两面工作的实际情况
	4.重要政策指令	1.党的机关报及重要文献 2.秘密文献
政	1.行政组织	1.边区政府以下的各级行政组织的机构及编制 2.行政管区 3.民主集中政府的实际情况 4.县政府成立的办法 5.有关行政各种法令
	2.有关财政经济事项	1.税制及其实施状况 2.货币政策实施状况 3.各经济机关的经营状况 4.合作社活动的状况 5.民众负担的实际情况(皇军驻扎地附近、中间地带、敌地区分别对照〕 6.与治安地区的物资交流的状况及其道路状况 7.敌方的经济封锁实行状况 8.家庭工业、手工业的增产运动及其成果
	3.有关农业事项	1.减租减息的实行情况 2.土地政策 3.增产政策
	4.有关文化事项	1.文教状况(尤其是学校) 2.民众教育的状况 3.宗教及会道门的政策 4.文艺娱乐体育及其组织 5.宣传活动及其组织 6.宣传资料的收集 7.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实行情况及其成果
有关秘密战事项		1.各级党对我方的谍报宣传、谋略工作的状况 2.各级军、师、旅、团、营对我方的谍报宣传、 谋略工作的状况 3.各级行政机关对我方的谍报宣传谍略工作的状况
社会变革		1.农村习惯的变化 2.农村统治者的变动 3.妇女地位的变化

民心动向	1.各阶级阶层对中共的动向 2.各阶级阶层对新政权的动向
有关新政权事项	1.行政工作状况与敌方对比其优缺点 (1)财政方面 (2)行政方面 (3)警政方面 (4)文教方面 按上列分别记述 2.敌方的民众工作与我方新民会的活动状况对比，从剿共的角度看新民会工作的优点缺点 3.与敌方贸易局及合作社对比看我方合作社及采运社的优缺点

二、司令部及大队、特别侦谍队的担任地区及调查项目

二、司令部及大队、特别侦谍队的担任地区及调查项目		
部队名	调查地区	调查事项
司令部	华北全区	1.观察中共的全面动向 2.收集整理指导大队作战所需要的资料 3.收集整理大队以后作战准备所需要的资料 4.研究各地区的特殊性及适应各种情况的剿共对策 5.研究剿共的综合对策
第一、第三大队	冀东地区	1.对日满蒙出入通路的形成状况 2.有无冀热特别区党委的存在，如果有，其成立的日期、沿革、内部机构、领导关系、方针、企图如何 3.海上通路的状况 4.反战同盟冀东支部的状况 5.对滦河以东的中共的企图、工作状况 6.随着滦热边区行署的成立，其党政军的组织的改编状况 7.对治安军及新政府的武装团体及其它机关策反工作的状况 8.县，总区，分区的关系其共活动状况 9.各级公安局的组织及其活动状况 10.天津，北京，唐山等及其它城市及我方治安地区的秘密运输物资状况及其通路 11.向大城市经营的点线工作及其联系 12.使用联银券、不使用边区券的理由，及其对我方及中共所产生的利害得失 13.联庄会、其它民众组织、宗教团体的利用状况
第二大队	冀鲁	1.冀鲁边区的内讧状况 2.冀鲁边区北部的党政军的组织、组成、活动状况 3.国共矛盾状况 4.海上通路状况 5.从纳税、货币、敌方谋略及其它各方面所看到治安状况

	晋西北	1.根据文件探知北方局、太行分局或第十八集团军等的企图、行动 2.国共矛盾状况 3.通向中共中央后方根据地的通路情况
第四大队	冀中冀西地区	1.冀西地区与冀中地区关系 2.滹沱河、唐河流域的根据地状况 3.晋察冀边区政府及北方分局的主要文件、谍报 4.从天津、北京以陆路，铁路、水路进行秘密运输的状况 5.维持平原游击战的各种方法 6.敌伪工作(指对日寇及伪政权进行的工作—译注)里外两面工作方法及其实际情况 7.因山地根据地经济困难的加剧所采取的对策
第五大队	平北察南	1.进入满蒙工作的通路状况 2.平西、平北、冀热地方的相互关系 3.中共党政军的组织 4.晋察冀、北岳区党委的领导状况 5.平西、平北地方有无党委的存在 6.军区有无改编 7.冀北办事处有无改编
特别侦谍队	一、北京、丰台、石景山、门头沟 二、天津市 三、开滦煤矿 四、井陉煤矿 五、枣庄煤矿	1.中共及蒋党系统的谍报机关团体的状况 2.中共及蒋党系统的谋略机关团体的状况 3.中共及蒋党系统的宣传机关团体的状况 4.中共及蒋党系统的各机关团体潜入城市及重要设施、资源地区的活动方法 5.中共，蒋党系统经济机关的潜入及其活动状况(特别从中共的点、线工作观察) 6.中共党对城市及重要设施、资源地区的组织、宣传工作上的特点及其企图和战略 7.调查中共适应我方治安工作的特殊性，其外围伪装组织的实际状态
备注	1.调查顺序根据情报收集计划，按其进度进行调查研究 2.司令部施行的特殊谍报另行计划	

预料中的治安新情况

对治安新情况的观察 1943 年内，华北肃正建设虽在局部地区或某一时期获得相当成果，但从全面看来，中共的潜在势力逐渐增大，活动也更加积极。在 1944 年春，方面军对今后治安新情况，作了如下的观察：

由于皇军历次剿共作战的结果，使敌军政核心机关远避于山间僻壤，独立抗战的活动显著下降。但综观管内全面治安情况，难说有所改善。相反，不少地区正在趋于恶化或复杂化。由此可以看出华北的治安情况，并非仅由皇军与共军相互角逐而形成，而是有新的第三因素介入其中。所谓第三因素，即近期“新政权的走向政治独立的动向”、“在皇军赶走中共后的地区内，敌民兵的活动转趋积极”以及“饱尝连年战祸之苦的民众产生抗日、

抗新政权的思想”等。

这样看来，由于反日、反新政权环境的形成，治安将趋向复杂混乱，就连中共也将放松其政治统制，而在政策上有所后退。至于对我方说来，那将是非常不理想的局面。为了对付这种局势，确立洽安，必须以优越的政治对策掌握摇摆不定的民心。一方面要支援新政权强有力的政治措施及其纯洁化的工作，同时要严格监视其抗日动向和防止其腐化堕落。并且要时刻防备和肃清民众及武装团体的不稳倾向。

形成治安新情况的原因:

(一)中共抗日战略的变化

中共鉴于1940年以前军事抗战战略的失败，于是，展开了积极的“政治攻势”，采取使新政权两面化的政策。对公务人员，武装部队和治安地区农村及其自动放弃的农村旧根据地，进行抗日赤化工作。中共此种战略的目的，显然在于加强“利用新政权充实抗战力量”的程度，便新政权在平常执行政务时，形成抗战的外围力量，以弥补自身独立抗战力量的不足，而在所谓“总反攻”时，要使新政权的部队、公务人员与民众成为“反攻友军”。

(二)我方地区民众的穷困

治安地区民众，尤其是准治安地区的民众，数年来担负双方过重的战时负担，以致生产下降、壮丁缺乏、牲畜减少，深受战祸之害，农村经济破产。几乎陷入饥饿的困境。共军从军政两方面掌握此种情况，在一个时期抑制农民的不平和暴力行动，而以其擅长的宣传战来振奋民心。然而最近皇军迫使中共势力退至边远地区，虽然中共党政军势力逐渐消失或减弱，但仅以皇军现有兵力维持新收复地区的全部治安工作，是不可能的。为此，不得已只好使用新政权腐败的武装部队来维持治安，其结果使这些地区的民众更加穷困，找不到生活出路，从而变成土匪和暴民的情况愈来愈明显。

(三)新政权的严重腐化

新政权的腐化堕落和政治上的无能，已达到严重的地步。就连从未受过中共任何影响的我方民众，最近以来，也已暗怀第三种(第一重庆、第二延安)抗日思想。何况受中共的思想策动，或在其政策下生活的民众，他们对新政权的失望，完全被中共的宣传策略所击中。对此，应当重新认识其严重后果。由于新政权的腐化堕落，一方面使民众的思想转向抗日，产生了有利于敌人的效果，另一方面是直接或间接地对中共进行援助，有不少公开通敌供给敌人物资武器的情况。其言论和行动在中共和民众中间造成日本必败的信念，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对以上情况，我方策略倘有失误，中共就要进一步利用新的形势，促使其更加恶化，以求壮大自己的势力。其主要策略大致如下:

(一)加紧开展民兵游击战

在新治安区，敌人乘我对治安的维持尚未巩固之际，通过精兵简政政策，以回乡务农的士兵、工作人员为核心，领导民众自卫，展开江西时代农民纷纷起义那样的游击战。

(二)利用匪化民众

民众变成匪的根本原因，虽是由于中共方面的抗战负担，但中共以巧妙的宣传说成是新政权的榨取所致，使匪化民众同情中共，使之成为最外围的武力，用来对付我方。

(三)对新政权更加彻底的怀柔和利用

中共现有抗战能力，无论在军事、政治，经济，都在极大程度上依靠和利用新政权。今后势必以毒辣的谋略手段，更加疯狂地对新政权进行怀柔和利用。

(四)抗战经济(主要是粮食问题)对我方地区的依赖

中共放弃了主要生产地区逃入山区荒村，以其基层部队和政治工作人员，设法进入我第一线的后方，试图依赖我方地区解决其粮食问题。

(五)在我方地区农村中贯彻两面工作政策

治安地区农村的两面工作，过去是以“使我方村政权通敌”为目的，现在则要更进一步，实现象冀东及东进纵队管区内的那种“村公所共有化”。由于我方县、乡政权的无力，不能改变这种局面，村公所难免陷入敌人操纵之中。

(六)变更征税方法

在山东已经放弃合理负担方法，采用了退步的“新征粮办法”，中共政权在皇军进驻地方，已经不得不放弃合理负担统一累进税等高级赋税方法，因为这种税法需要对土地及农民经济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与不断的指导监督。现在只能根据民众的经济力量及实际情况，由农民代表评议决定，实行累进的课税。

(七)民众工作的单一化

在完全由中共统治的地方，虽有可能按其意图进行复杂的民众组织工作，但在中间地区，象现在这样复杂的形势下，中共只能使组织单一化，既有利于指导工作，又便于防谍保密。今春敌人计划开展的民众团体统一运动，可以认为就是具体的例证。

总之，以上所述是今后可能出现的管内治安的混乱复杂情况。为了确保治安，不能只顾剿灭共军，也必须对我方的腐败部门进行调查、防备和清洗。更重要的是应整顿阵容，贯彻强有力的清新的政治、经济力量，这可以说是新阶段的剿共施策的主要问题。

对中共企图总反攻的判断 华北方面军对有关中共总反攻的情况，在 **1944** 年初作了如下考察**:**

一、要旨**:**

中共宣称中国已经进入反攻阶段，号召准备总反攻，展开了顽强的政治攻势。至于重庆方面的向我军发动总反攻，根据日中战争的经过和中国军队的实际情况，估计不能很快实现。中共所谓的反攻是指发动民众武装革命，因而与重庆方面的反攻形式不同。从中共现正倡导并进行的政治攻势情况看来，随着将来客观形势的演变，并非没有发动这种反攻的可能。因此，彻底探讨这一问题，实为当务之急。

中共的总反攻，并不是要进行单纯的军事进攻，而是通过政治攻势争取新政权的武装团体，使之在中共的领导下进行判乱，同时使新政权的公务人员作为内应，策动我方地区内民众一齐举行武装起义。

因此，战场上并没有一定的战线，而是在我占领地区内各处进行反攻。反攻的时期，要根据中共在我方治安地区内的反攻局势的形成和反轴心阵营总反攻取得显著效果，或北方形势的急剧变化而定。

为了粉碎中共总反攻的企图，要加强对新政权的监督指导，要肃清敌性部门，加强薄弱环节。在防止通敌叛变和民心背离的同时，要彻底剔抉中共的军事力量及地下组织，消灭其进行反攻的支柱。此外，要加强对中共的宣传，使之失去民众的支持，以促使中共自行消灭。

二、判断中共总反攻的战略根据

从“毛泽东的中日战争三个阶段论”、“中共二年战胜论”看来，中共所谓总反攻的战略阶段，虽与其当初预料的有很大距离，但是现实的发展，在某些方面还是逐渐接近的。因此，对其今后的企图，必须严密注意观察。

三、中共抗战新阶段的战略战术

中共抗战战略的演变，从其内容和性质可分为三期**:** 到 **1940** 年夏百团大战为第一期**(**发展游击期**)**，到 **1941** 年 **12** 月大东亚战争爆发为第二期**(**防御建设期**)**，从那以后到今天为第三期**(**政治攻势期**)**。

总之，在第一期内对军事、政治、经济建设方面完成了数量的发展，第二期，在质量方面也已达到了一定程度。此外，在军事活动方面，力求统一指挥，避免过去无组织的游

击活动。第三期，在政治谋略中同时采用一些军事行动，企图培养“通州事件”那种袭击和民众暴动的力量。

现阶段的特征，在军事方面因恐日军大举讨伐，将主力控制在自己的根据地内进行整备，以一部为保卫其游击区只进行一些游击活动。在第二期中，为建设内部，其战略是：集中政治力量指向我方，通过政治谋略工作策动日军士兵反战，使新政权和我方民众赤化、抗日。

四、对中共总反攻企图的研究

中共的总反攻要依国际形势、国内实情而定，目前情况尚难有急剧转变。但是，他们似正采取政治谋略配合军事行动。与新政权里应外合的策略，稳扎稳打避免操之过急。根据情况的推移，中共进行总反攻是必然的，估计将要选择战略上的重要地区，在各个地方分别开始反攻。

五、对中共总反攻的对策

(一)粉碎中共对新政权的策动利用(加强对新政权公务人员及武装部队的清洗工作，严加监督掌握我方治安地区内的民众)。

(二)尽先歼灭中共的抗战力量，彻底摧毁其总反攻的准备。

(三)加强并改善对中共的情报调查活动。

(四)对“里应外合”袭击进行战术上的研究。

从中共方面看本年的军事成果 共军回顾 1943 年在艰苦奋斗之中，逐渐恢复、扩大了解放区，取得了相当的成果，概括叙述如下：(以下据原著称摘自《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书，本文与该书有出入，译者按日文译出未按中文资料校正—译注)

1943 年，日寇对我党我军的进攻有增无减，‘扫荡”更加带有毁灭性和长期性。“扫荡”次数极其频繁。1000 人以上的“扫荡”有 150 次。敌人在 1943 年提出了“对华新政策”，但这是“以华制华”的新发展，同时在华北的敌战区发动了“新国民运动”，这是“治安强化运动”的继续。华北战场上残存的国民党军，丧心病狂地与敌人联合实行“反共第一”的政策，“变敌区为自卫区”，却将“自卫区”暗中献给敌人。并且称“解放区”为“奸伪区”，加以敌视。

敌人并不满足国民党军这种暧昧的态度，于是施加军事压力，要求更加“明朗化”，即公开投降，成为第二号汪精卫。这就是.‘山东作战”和“山西河南作战”。丧失民族意识的敌后的国民党军，纷纷大批投降。庞炳勋，孙殿英、吴化文、陈孝强、夏继礼、侯如镛、李旭东、王尚志、张励生等、都是按照国民党当局“机宜行事”的电报命令，带领部队投入敌人怀抱。他们手中拿着外国援助的武器不去对敌，而以本国抗日人民与八路军和新四军为敌。如果没有这徉多的伪军，我八路军将能比现在多牵制敌人八个至十个师团的兵力。

另一方面国民党当局，还发动三次反共高潮，调动胡宗南指挥下的驻守黄河大军，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但其结果，由于我大力揭露和谴责他们这种不道义的罪行，所以才没有象过去那样公开爆发内战。

我们的境遇虽然如此艰苦，但在 1941 至 1942 年的艰苦斗争中，为我们 1943 至 1944 年的胜利奠定了基础。我们在最初的一个时期，在解放区施行的政策及对敌的斗争方法，从 1943 年以来更要显出效果。

1943 年我八路军与敌作战 24,800 余次，死伤敌伪军.达 136,000 余人，俘虏日本军 420 余人，日军自动投降的有 90 余人。我军攻克敌据点 740 余个，在环境极端困难的冀中平原，秋冬之间粉碎敌“清剿”40 余次，毙俘敌伪 3,500 余人，攻克据点碉堡 300 余处。在同样困难的冀东，一年内击退敌“扫荡”1,400 次，死伤敌伪 7,000 人以上。

中国共产党，以民兵建设作为解放区的建设及军的重要部分。民兵、游击队与正规军三位结成一体。各级党委、各军区抽调大量干部参加民兵建设工作，各级政府使用各种手段提高民兵的地位，使之发扬革命英雄主义。各部队发给一定数量的武器。并援助其进行教育训练。民兵的组织随着敌我斗争形势的变化，随着大众运动的开展，逐渐发展壮大起来。

民兵进行政治战，从精神上打击了敌伪人员，使之瓦解。镇压敌人的间谍活动，摧毁伪政权。公开惩罚敌伪人员，使之脱离伪政权或为我方所用。

敌后的交通战，主要由民兵和群众担任。在民兵掩护之下，男女老幼一齐动手，破坏道路，烧毁桥梁、拆围墙，割电线。在冀中、冀南平原地带，基本在全部道路上掘了丈余深的道沟，使敌人快速部队难以前进，以之掩护抗日军民的移动。

1943 年更加前进了一步，主要进行地形的改造，达到了即便是熟悉当地地形的人也要迷失方向的程度。在村与村、乡与乡之间构筑地道，彼此相通，在地面上不见人影，就可向邻村移动。在太行山区等的山谷间以隧道连结了山和山。这是几十万，几百万人民的创造。

从 **1943** 年以后，随着群众运动的普遍展开，民兵组织也扩大了，由于有了战斗经验，也就更加坚强了。民兵从日寇手中夺取了很多武器装备了自己，在斗争的实践中不断丰富自己的经验。

第五章 1944年至1945年的治安战

一、京汉作战与华北治安的对策

京汉作战(“ｺ”号作战)概要

一号作战的发动 1943 年秋，大本营根据同年 9 月制定的新作战方针，对各项策略及形势的演变进行了研究。当时，从整个战局需要出发似乎将有积极进攻的作战设想，即消灭美国在华空军基地，打通中国南北大陆，确保与南方的交通线。更鉴于 11 月 25 日在华美空军袭击了台湾新竹及年初以来日本船只在中国东海之损失日益增多等情况，为了保卫日本本土和我军在将来的总反攻，深感有进行上述作战的必要。因此，大本营与中国派遣军商谈之后，对这一作战方案迅速进行了研究。

1944 年 1 月 24 日，参谋总长对中国派遣军司令官传达了“攻占湘桂、粤汉及京汉铁路南部沿线的重要地域”的大命。作战目的除上述以外，主要集中于“摧毁中国西南部敌空军主要基地，以扼制敌机活动。”同日下达了“一号作纲要”，其内容如下:

第一 作战目的(略)

第二 作战方针

一、中国派遣军在 1944 年春从华北，夏季从武汉、广东地区，分别开始进攻作战，击破中央军，先行占领并确保黄河以南、京汉铁路南段，继之占领并确保湘桂、粤汉两铁路沿线重要地区。

在进行作战时，只要情况许可，务将京汉及粤汉两铁路恢复原状。

二、南方军为了配合中国派遣军的作战，从缅甸及印度支那方面实行局部作战。

第三 作战指导大纲

其一 京汉作战

三、1944 年 4 月，华北方面军从华北开始行动，击破第一战区敌军主力，占领黄河以南京汉铁路沿线并确保之。主要作战期间预定为一个半月。

四、使用兵力计划如下:

华北方面军

第十二军四个师团为基干

第五航空军之一部

五、本作战终了后，将所用兵力，由陆路经武汉转用于湘桂方面作战。

为确保新占领区，预计使用兵力为两个师团。

其二 湘桂作战(以下略)

作战准备 当时方面军的正面，在河南有第一战区蒋鼎文的部队约四十个师。该部自年初以来，见我方将要进攻，即努力加强防御。西南有第八战区的胡宗南部队，该部以其主力对延安共军、以部分兵力对日军保持警戒。

2 月下旬和 4 月初，方面军为了贯彻作战意图，两次召开兵团长会议，并对作战计划进行了“兵棋演习”、方面军的作战设想是:以第十二军主力从京汉沿线开始作战，击破敌人之后，向郾城附近挺进。尔后，准备向洛阳方面进攻。同时，分兵一部向信阳挺进，并与第十一军之部分兵力合作，打通至武汉的陆

路交通线。如果第十二军主力能挺进到郾城附近，则立即向左迁回，向洛阳方面急进，歼灭敌第一战区部队。我第一军以一部分兵力从垣曲附近渡过黄河，切断陇海线，直接策应第十二军。在本作战期间，第一军以一部分兵力佯攻蒲州附近，第十三军以一部兵力在颍川(今登封一带一译注)附近作战，以牵制敌军。

为了完成此次作战，尽量以优势兵力集中使用于主攻方面，这是此次作战的第一方针。因此，对占领区的治安，不得不暂时在一定程度上作出牺牲，但对重要资源的开发、获得以及运往日本所需要的物资，只能增加，不能减少。为此，不能希望缩小警备地区，而且除已抽调部队参加作战兵团外，由于新调往南方两个师团，还必须考虑新编独立步兵旅团接替警备区域防务等问题，对此，确实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当时，方面军拥有的兵力为 124 个大队，预定转用它处的有 27 个大队，预定补充的有 40 个大队，可以指望至少要抽出全部兵力的半数。

如上所述，1943 年 10 月接到秘密指示，令方面军所属第三十二、第三十五师团调往南方，第二十六、第三十七师团及坦克第三师团，作为大本营预备队集结待命。由于一年作战计划的实施，12 月底曾经接到通知，拟以上述兵团作为一号作战兵团。然而、从全局的要求出发，至 1944 年 1 月下旬，将第三十二、第三十五师团调往南方去了。

当时华北地区治安日趋恶化，尤其中共的秘密活动不断发展。对此情况北特警在其报告中，曾有如下叙述:

冀东及平北地区 中共对于华方及重要资源地区的策动极为活跃。近来，各地频繁召开干部会议，积极加强保粮生产运动、反特工作及反扫荡的对策。特别在对满洲行政力量的伸展方面，诸如逐渐改革行政区划及建立新县政府等项工作，均有进展。北部山区，以长城线为中心的行玫势力，亦在迅速发展中。同样，铁南区(北宁铁路南侧地区)在山区中心地方，中共方面的政权也已经建立。此外，其军事集结等活动，近来更加活跃。以袭击和绑架等手段，以获得武器、弹药为目的的活动，以及破坏交通和通讯线路，对开滦煤矿地区进行各种阴谋活动，特别引人注目。

冀鲁及山东地区 由于我方不断进行剔抉作战，中共的活动表面上虽然沉默，但其内部则正在积极进行整顿及更换干部，似已形成新的地下组织。看来今后在我势力范围内，将以扩大、加强党组织的基础为重点。在军事方面，对国民党政府第三方面军吴化文部队不断进行攻击和驱逐。同时，对鲁南地区的蒋系第十军也加紧进攻，国共的局部斗争，仍在激烈进行。

冀中(西)地区 最近，中共突然活跃起来，正在加紧扩大党的势力。与此同时，军事行动，特别是以夺取县城为目标的行动，也活跃起来。

太原附近地区 中共把工作目标指向准治安地区，有不断向中国方面的武装团体及日军分驻部队进行袭击的趋势，需要戒备。

作战经过概要 4 月 18 日拂晓，首先由中牟正面的第三十七师团和独立混成第七旅团开始进攻。在第十二军主力方面，第一一 0 师团 19 日拂晓夺取敌军部分阵地，20 日晨，军的主力发起攻势，追击退却之敌。

作战进展顺利，第十二军于 5 月 1 日占领许昌，随后又以第二线兵团向西大幅度迂回，对汤恩伯军，继于 10 日左右，对以洛阳为中心的敌第一战区主力展开歼灭战。在此期间，第十三军一部在寿县(归德东南约 230 公里，蚌埠西南约 75 公里)方面，实行牵制作战。此外，第十一军的一部北上与南下的第二十

七师团于 5 月 9 日在确山会合，完成了华中华北的联络。第一军 5 月 9 日渡过黄河后，在陕州附近切断了陇海路，策应第十二军的歼灭战，予敌很大打击、于 5 月 25 日占领洛阳。

尔后，第十二军继续扫荡残敌，5 月底以后，确保了京汉路沿线南部及洛阳附近的重要地区，随后转入新占领地区的警戒。第一军于 6 月上旬，在灵宝附近对第八战区军的反攻予以还击后，留一个支队于陕州，主力于同月上旬陆续返回山西省。6 月 9 日关闭设于郑州的方面军战斗司令所，第十二军战斗司令所由洛阳返回郑州。

据 6 月 11 日内山中将向大本营提出的报告称: 此次作战，蒋系军 43 个师中遭到毁灭性打击者占百分之六十，未受损失者占百分之十五，给了第一战区以很大打击，年底以前不可能恢复。我军战死者占参加兵力的百分之一，伤者占百分之三，患病者百分之五。

确保新占领地区的治安

第十二军转入占领态势、方面军占领洛阳后，鉴于该地附近治安迅速好转而北京方面治安恶化的情况，遂于 5 月 27 日，解散洛阳的菊兵团，命第六十三师团各部队返回原地。

第十二军对重庆军的活动和反攻，随时准备予以粉碎，27 日以后，对新占领区域的警备情况大致如下:

第一一 0 师团在洛阳西侧和西南侧，以确保洛阳城及洛阳至郑州道路。第六十二师团在临汝一郑县一襄城方面，占领阵地作好警备部署。独立混成第七旅团的兵力集中于郾城附近，同时担任郾城至新郑间的警备。坦克第三师团和骑兵第四旅团在洛阳周围地区进行整顿，并作好以后行动准备。第三十七师团准备调往华中，在临汝西侧集结待命。

根据以上情况，各兵团继续扫荡残敌，并按照指示开始移动。进入 6 月，由于敌情的变化警备上作了若干修改。骑兵第四旅团，为了加强京汉路沿线及其西侧的警备，6 月 8 日进驻舞阳。随着京汉路的打通，由第六十二师团和独立混成第七旅团直接担任警备任务。23 日大致部署完毕。7 月上旬，第六十二师团由于抽出调用，该师团的大部分警备任务，由坦克第三师团担任。

8 月份，第一一 0 师团和坦克第三师团警备部署作了若干修改，此外变化不大。第一百一十五师团担任黄河以南的京汉线地区，第一百一十七师团担任黄河以北地区，骑兵第四旅团仍然担任陇海路沿线地区的警备任务。

敌方的动向 重庆方面第一战区军队在战局告一段落时，一面扬言要再度进行总反攻，一面积极整训，特别是加紧准备对付日军的进攻，同时进行着局部的活动。

中共中央方面，在此次日军进攻作战时，企图向豫西地区(主要为黄河南侧河南西部)伸张势力，但从作战一开始，除一部分当地党员及武装党员外，大部分党员撤退到河北和山西方面去了。日军转入警备态势后，民众出乎中共的预料而信赖了日军。此外，败退的重庆军队为了恢复其战斗力，掌握了地方游击队和武装团体。尤其是日军对中共进行了非常激烈的剔抉作战。为此，中共中央 7 月下旬，确定了新的工作方针，指令太岳军分区南下，并令延安抗日大学原藉豫西的男女学生还乡，以图争取群众和地方的武装团体。

根据上述指令，在 8 月上旬，若干工作人员由济源地方的数百名武装兵力

伴随，首次开始南下，这些兵力似已编入新安、巩县、偃师游击队内。8 月中旬中共第五军分区老二团的一部继续南下，9 月上、中旬第三、第七、第十七、第十八、第七六九各团合计约三千人，先后侵入该地区，以新安以北地区为根据地，经工作人员诱导，逐渐扶植势力，对地方武装和游击队似正进行怀柔和争取工作。9 月下旬争取了新安游击队作为友军，编成两个大队，队长刘绍表就任暂编豫西独立游击支队长。此外缑氏镇以南地区的黄宇宙为冀鲁豫边区游击第五纵队司令，似已编成四个支队。

共军侵入我地区的情况如下。

新安北侧及东北地区:老二团、第十八团。

新安西侧地区:第十七团，暂编豫西独立游击支队。

宜阳西侧地区:第七六九团。

临汝北侧地区:第三团冀鲁豫边区游击第五纵队。

预料共军今后更要怀柔自卫团和游击队，进行争取群众的宣传，并以强有力的集团兵力进行袭击。

第一一 0 师团占领地区的治安状况 师团各部队，6 月以来继续构筑阵地，8 月中旬变更了部分部署，并对活动于境内之敌，特别是对共军进行了果敢的讨伐，以期确保占领地区的治安。此外，进行了教育训练，培养战斗力，为对付装备优良的美中联合空陆军的反攻作好准备。

师团在实施军政中，特别注意对民众保持严格的军纪，不征收捐税，大力开展召回居民的工作。结果到 8 月中旬有半数居民归来恢复生产。按照兵团军政实施纲要成立治安维持会，并组织训练乡村自卫团等，各项措施进展顺利。地方游击队逐渐被击退到敌我交界地区，民众信赖日军，并得到其协助，因而管区内治安情况逐步恢复。

新占领地区的军政 华北方面军随着作战的推移，对新占领地区开始施行军政，作战告一段落后，即将占领区行政工作移交给第十二军。

过去，在黄河—新黄河以北的河南省，有陆军联络部(开封陆军联络部的部长为山崎茂大佐，兼任河南省顾问。归德支部的支部长为近藤喜明中佐，新乡支部的支部长为河野又四郎中佐)，并在开封设有总领事馆。但是，为了在新占领区内施行与之性质不同的军政，从 3 月份着手组织华北方面军司令部军政部，部长为山崎大佐，其主要成员由华北进行选拔，并有实业家、官吏，银行员、技术人员等多人充当顾问。

军政部于 4 月 30 日进驻郑州，随着作战的进展，为了迅速恢复治安，首先在许昌、随后在郾城、洛阳成立支部。同时派去了省政府厅长、县知事及各县指导官，以图恢复行政工作，并积极地设置警察，重新组织商会，进行抗灾救济工作。军政费用开支不实行征税，而从菸叶交易收益中提取。如此掌握行政、经济实权，进行强有力的指导。由于治安迅速恢复，从 5 月下旬起，难民还乡者增多。

6 月份，作战告一段落后，军政部移交第十二军司令部。该军根据“河南军政实施纲要”把支援作战放在第一位，特别是力图确保京汉路沿线及洛阳附近地区的治安，并以争取民心、收购物资等作为主要措施。由于作战的顺利进行和保持了军纪，通过推行上述措施，产生了好的影响。

参考:方面军与第十二军制定的“军政实施纲要”已无从查找，兹将大本营在一号作战时的“对新占领地区政务指导纲要”(1944 年 2 月 2 日制定)转录于下，以供参考:

第一 方针

一、以便于进行作战为重点，并确保我军在当地的生活自给。

为此，特别要笼络民心，重视当地居民的积极性。

第二 要领

二、对于新占领地区的行政处理，依据对华处理根本方针，尽量利用当地居民。

在战况允许情况下。尽可能迅速使国民政府行施政权。

三、力图确保我军在当地的生活自给，并恢复民生。

为此，必要的物资由中国派遣军在当地筹措，予以适当供应。

四、关于货币的使用，在华北要用联银券，在华中、华南用储备券，但由于作战需要，可以使用旧法币。

五、随着作战的进展，在情况允许时尽量作好重要物资的收集工作。

兵团转调和新兵团的编成

湘桂作战补充兵团的调用 中国派遣军通知方面军、转调第二十七师团，作为第十一军于5月27日开始进攻的湘桂作战(“卜”号作战)的补充兵力。派遣军在京汉作战结束后，于5月31日，调第十二军所属第三十七师团，于7月初以前进驻信阳，归派遣军直辖。6月3日，又命令坦克第三师团主力，于7月中旬以后作好调往湘桂方面作战的准备。

第三十七师团主力于30日拂晓在临汝西侧南北线上集结后，6月12日转到郾城南侧集结，随后于15日左右开始南下。

坦克第三师团于6月上旬参加第一军的灵宝作战后，中旬归还洛阳近郊，准备调往武汉地区，因命令变更，仅以坦克独立第六旅团作为基干编成的部队派往武汉。师团主力则接管第六十二师团的警备任务，于7月6日进驻襄城、鲁山地区。

第二十六第六十二师团的调出 太平洋方面，美军终于6月15日在塞班岛登陆。大本营在6月下旬，通知派遣军迅速集合两个师团，作好调用准备。7月4日发出命令，将第二十六师团和第六十二师团分别从驻蒙军和第十二军战斗序列抽出，直属大本营。

随后于7月25日，第二十六师团奉命编入第十四军战斗序列，19日由大同出发，8月8日由釜山乘船开往菲律宾。该师团为驻蒙军对治安肃正和准备对苏作战的核心力量。因此，原来的对苏作战计划在执行上发生了困难，只得相应地缩小了规模。

另一方面，第六十二师团，7月上旬，把鲁山、襄城附近的警备任务移交给坦克第三师团，集结于新乡及开封附近。7月24日奉命编入台湾军司令官属下第三十二军战斗序列，逐渐向上海移动，8月16日由吴淞港开赴冲绳。

新兵团的编成 中国派遣军6月下旬接到大本营通知抽调两个师团时，为了迅速补充兵力，曾申请将独立混成第七旅团、独立步兵第三、第四、第九旅团，改编成四个丙师团。7月10日根据军令第七十九号下令改编，8月10日至15日分别改编完毕。

与此同时，7月17日命令第一百一十四师团属于第一军，第一百一十五、第一百一十七师团属于十二军，第一百一十八师团属于驻蒙军，分别编入各该军的战斗序列。各师团由两个旅团(四个独立步兵大队)、一个工兵队、一个通信队、一个辎重队、一个野战医院、一个病马厂组成(1945年增设炮兵队)。其编制定员，师团为13,045人，独立步兵大队为1,233人。

注:第一百一十四师团(代号“将”，代理师团长为中代丰治郎少将)以步兵第三旅团为基干，在山西临汾编成，主要部队是步兵第八十三旅团(独立步兵第一百九十九－第二百零二大队)、步兵第八十四旅团(独立步兵第三百八十一－三百八十四大队)等。

第一百一十五师团(代号“北”，师团长为衫浦英吉中将)以独立第七混成旅为基干，在河南郾城附近编成。由步兵第八十五旅团(独立步兵第二十六－二十九大队)、步兵第八十六旅团(独立步兵第三十、第三百八十五－三百八十七大队)等组成。

第一百一十七师团(代号“弘”，代理师团长为铃木启久少将)以独立步兵第四旅团为基干，在河南新乡附近编成，主要部队是步兵八十七旅团(独立步兵第二百零三－二百零六大队)、步兵八十八旅团(独立步兵第三百八十八－三百九十一大队)等编成。

第一百一十八师团(代号“惠”，师团长为内田银之助中将)以独立步兵第九旅团为基干在蒙疆大同，平地泉附近编成。由独立步兵第八十九旅团(独立步兵第二百二十三－二百二十六大队)、步兵第九十旅团(独立步兵三百九十二－四百零一、第四百零三大队)等主要部队编成。

华北的全面治安和警备

全面状况

华北方面军的状况 方面军在京汉作战期间，对旧占领地区的警备甚为忧虑，担心共军可能乘压力减轻的机会大举出动。

中共方面表面上虽未进行大规模的武装反攻，但地下活动日益活跃，使我方警备增加了很大困难。视察过京汉作战现场的参谋次长秦彦三郎中将，曾向大本营提出报告称:“作战期间，原来占领地区的治安急剧恶化。”

方面军于攻占洛阳后，命菊兵团各部队等迅速归还，有重点地进行了肃正工作。此外，于9月上旬起草了一个“华北警备刷新计划”，对警备、防空、剿共等工作作了全面的有力指导。

华北方面军在此时期至战争结束的主要成员如下:

方面军司令官 冈村宁次大将(至1944年8月25日)、冈部直三郎大将(至1944年11月22日)、下村定中将(至1945年战争结束)

方面军参谋长 大城户三治中将(至1944年10月14日),高桥坦中将

方面军参谋副长 德永鹿之助少将(至1944年8月1日)、冈田重一少将(至1950年4月7日)。

第一课高级参谋 德永鹿之助大佐(至1944年7月31日)、寒川吉溢大佐(至1945年6月1日)、笹井重夫大佐(至停战)

作战主任参谋 吉本重章大佐(至1944年6月26日)、田永契矩中佐(至1944年8月25日)、笹井重夫中佐(至1945年6月1日)、井门满明少佐

第二课高级参谋 高泽修平中佐(至1944年6月16日)、尾关正尔中佐

情报主任参谋 山崎重三郎少佐(至1944年7月31日)、堤宽少佐

第三课高级参谋 片山二良大佐(至1944年8月25日),神崎长中佐(至1945年5月2日)、高泽修平大佐(至1945年6月16日兼任)

注:特命全权公使盐泽清室中将于1944年10月14日调出，由楠本正隆中将继任。

对中国方面的措施 华北方面军对中国方面实行的政务、经济等措施，特别

是对剿共的措施，尊重中国方面的自主性和积极性，并予以大力支援。强调日华必须一致协力作战，集中目标对付中共。为此，在“剿共指南”中特向各兵团、部队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其所以如此，是由于在各兵团、部队残存着以支援中国方面为藉口的强制风气。

方面军冈村司令官在京汉作战开始前，于 3 月 20 日召集治安军(华北绥靖军)和在华北的南京国民政府直辖的军队将领庞炳勋、孙殿英、孙良诚、张岚峰、杜锡钧、李守信、吴化文、荣子恒、胡毓坤等开会，迫切期望为日军后方警备努力作出贡献。并且对改组治安军的人事、组织作了安排。

这些军队保持不同重庆军交战的信条，专门担任驻防地区的警备。但是，又不能与共军争胜负，其地盘逐渐为共军所蚕食。因此，当时治安军顾问山崎茂大佐曾指出:“由于政府支出的经费不足，粮秣等必须依靠在当地征收，以致民心背离，而指挥官得不到人材，薪饷被剋扣等.，造成军纪松弛，战斗意志低落。”

此外，华北政务委员会于 1943 年秋，设立了剿共委员会，委员长荣臻，由军事顾问部指导，为剿共进行收集情报，宣传、教育等工作。然而，由于经费不足和人才的缺乏，工作一直没有进展，1944 年底被撤销。

第十二军后方地区 第十二军为了京汉作战，将一向管辖的山东地区的警备任务交由第五十九师团长细川忠康中将负责。因此第五十九师团司令部由泰安移至济南，并将参加京汉作战的独立第七旅团的警备任务立即担当起来(4 月 6 日)。但因该地区有顽强的共军盘踞在黄河河口一带，于是师团放弃了武定、利津地区，收缩到黄河右岸的青城、博兴地区。独立混成第五旅团管辖地区不变。2 月调往南方的第三十二师团的警备地区由新编独立步兵第一旅团负责，但其战斗力很低，而从兵力看来，也不可能在山东省西南部(曹州道的西半部)配备部队了。对于山东全区逐渐壮大的共军，采取相应对策实非易事。

山东省，原为第十二军的根据地，在肃正建设方面已有成效。在京汉作战期间，中共方面无显著活动。虽然日军警备部队逐渐集中，转向确保津浦、胶济沿线的态势，但是仍不断努力扩大治安区，除以小部队连续实行讨伐外，并进行了长期的肃正作战。这种作战的特点是:有系统地用方向探测器掌握中共的动静;平日组织训练好便衣挺进队，对敌中枢部门利用挺进奇袭方法取得成果;以支援收买小麦、棉花为目的进行作战等等。此外，为了对付中共的政治攻势，进行了凌驾于敌人之上的政治攻势，如“1944 年秋季山东作战”(10 月下旬—12 月中旬)即其一例。其特点是:以把握民心为第一，将中国方面的工作人员和保安队置于前面，日军在后方作为支援和后盾。军队虽不参与政治，但要利用部队中在政治、经济、报道等方面具有专门能力的人，担当情报收集和部队内外宣传教育工作。

尽管作了这些努力，但中共方面确实扩大了潜在势力，秋季以后对日本分散驻扎的部队也能进行袭击了。

参考:

从 1942 年 4 月至 1944 年 2 月，在第五十九师团曾担任参谋的折田贞重大佐，关于对中共作战有如下回忆。

当时的治安肃正作战，因情报不确实，对中共地区的实际情况完全不能掌握，从而使讨伐徒劳无功，几乎是毫无成效的，几十次当中，可能侥倖碰到一次。各部队为了取得成果，东奔西跑，迄无宁日，因为对争取民心考虑不周，敌地区内的居民，饱受战祸的痛苦，

以充满憎恨的眼光盯着日军，长时间忍受封建主义和外来压迫的民众，只盼望着过上和平生活。要从这些现实情况出发进行研究，以期改进对中共的作战。师团长采纳了这一意见，并逐渐实施。其设想及实施情况如下:

(一)作战目的的确立及启发教育

一般作战的目的在于消灭敌方野战军，作战操典上也规定，“军队主要任务在于战斗”，但这并不适于对中共作战的特殊性。在治安肃正作战中，军事行动的目的，在于把握民心。这一观点虽然从指挥官到士兵似已贯彻，但让他们转变头脑是需要长时间的。

(二)掌握战场的实际情况

要调查研究中共各地的党、政、军、民一体的实际情况和中共地区政治建设以及其势力范围扩大的情况等。对于单凭反复追剿中共正规军，并不能破坏其党、政、民组织的道理，要向部队进行启发教育，同时要严肃军纪，真正成为无愧于皇军声誉的军队(军队要很好掌握政治、经济的实际情况，这与干预政治是两回事)。

(三)废除翻译

翻译是宣抚工作的尖兵，是重要的情报员。当时的翻译能力低下，而且假借军威，作恶多端，招致民心背离，从而无法取得正确情报。为此，要使师团官兵学习中国语言，从中选拔出翻译人员，在把握当地民心的基础上，奖励他们收集情报。

(四)利用军队内部有特殊技能的人员

军队中有不少军事以外的专门人材，让其中的经济人材、官吏及有关报道人员等，担任适合其能力的工作，从事收集政治、经济情报，分析和宣传形势，并对行情的变动、历史、经济、地理等进行研究。这对于掌握共军地区内的状况是很有效的。

(五)对游击战的研究和训练

讨伐作战结束后，必须进行研究提出今后的教训。由于从来光凭战果论功行赏，因而造成了掩饰失败、捏造战果的坏风气。师团编成特殊便衣部队一个中队(队长:大川键治郎大尉)，进行游击战法的研究和训练，以期向各部队普及推广。此外，中国方面各机关、武装部队的指导系统存在着严重的分散混乱现象，因此要进行改革，实行统一领导，以便能够集中使用。

(六)扩大治安地区的要领

期望飞跃的扩大，一举占领敌地区，这样在确保治安方面会出现不平衡现象，勿宁实行象潮水那样波浪式地渐进为好。为此，先将中国方面的工作人员和武装团体放在敌我中间地区，随后对中共地区展开政治攻势，排除该地区中共工作人员，努力把握民心。日军则安置在治安地区以内，作其后盾予以支援，一旦判明敌正规军的动静，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然袭击歼灭之。

以上的设想和实施，是 I944 年秋肃正作战时的事，后来因调动工作，未能看到其成效。

山东半岛治安恶化，对于青岛一莱阳一棲霞一芝罘路线的确保也很困难。10 月中旬要地棲霞也放弃了。因此，在年底以后必须进行大规模的肃正作战。12 月中旬至 1 月下旬，独立混成第五旅团实行了鲁东主要地区作战，1945 年 1 月下旬至 3 月下旬进行了山东作战。

豫北(开封、新乡)地区是京汉作战的兵站基地。三十五师团调出时，3 月 8 日由新编独立步兵第四旅团接替了该地区的警备任务。由于兵力减少，旅团将司令部设于新乡，各大队部署于开封、卫辉、怀庆，阳武。撤回附近地区日军驻屯据点，由中国方面归顺部队担任警备。陇海路以南重庆军很少积极活动，张岚峰军得以确保该地治安。但京汉路以西地区，共军势力强大。日军驻林县

警备队撤回后，该方面的庞炳勋、孙殿英军受到压挤，担当濮阳方面的孙良诚军也逐渐被蚕食后退。

京汉作战一开始，共军同时开始扰乱后方，特别是西面的庞炳勋军，被压到辉县、汤阴县西部，使京汉路经常受到威胁。

7月，旅团改编为第一百一十七师团，仍继续担任原来的任务。

冀东地区 独立混成第八旅团(旅团长:竹内安守少将)为了本地区的治安肃工和警备工作，连日进行活动，并由关东军及第六十三师团协力在满洲国境和玉田方面进行了肃正作战。但是，由于共军得到民众的大力支持，巧妙地进行了游击战，不断袭击我小的守备队，攻击中国方面的治安军，伏击讨伐队等，而想要捕捉敌人则极为困难，故未取得成果。

6月，因北特警改编，其主力进驻冀东，7月7日旅团划归北特警司令官指挥，以后即作为机动剿共部队在冀东全地区内实行剿共作战。10月17日，旅团主力在丰润县杨家店(丰润以北约24公里)附近，搜索到六、七百名中共正规部队予以歼灭。敌遗尸400具，俘170名。此次战果是由于过去的经验，特别是旅团自 7 月以来多方研究训练所取得的，主要是切断了共军和当地居民的情报来源(一连几天采取电光形的不规则活动)以及出其不意的奇袭战术(一接触敌人，各讨伐队都向打响重机枪第一声的方向一齐冲去)取得显著成功。此次作战旅团受到方面军司令官的嘉奖，并将此战例广泛予以推广。

津渤地区 津海、渤海两道由第九旅团(旅团长:藤冈武雄少将)负责，连日讨伐和警备，迄无安宁之日。京汉作战时，地区内的共军在我旅团未设兵力的地方，以及道、县的边界附近，加强其根据地和扩军工作，并且为了准备总反攻，下令专对中国方面的武装团体进行策动和袭击，积极培养反攻力量、获取武器弹药。由于旅团机动果敢的讨伐，在高粱收割期间曾一度被压制下去。及至晚秋我方收缩警备部署，共军即利用其密如蛛网的情报组织，巧妙地避开交战，致力于重建工作，并逐渐采取集体行动，袭击兵力较小的部队，扰乱我方收购粮秣等工作。

对此，旅团从10月下旬以大约一个月的时间进行了“秋季二号作战”。作战的前期在支援收购棉花、杂粮上取得了成果。后期作战和继续进行的“冬季一、二号作战”，扫荡了所辖全区。大部分情况是:共军行动敏捷，利用围绕村与村之间的交通壕得以逃避，或得到民众帮助得以逃脱。但是由于利用骑兵部队和自行车队进行彻底追击，因而也取得不少战果。

天津特别市 天津附近的中共党委和晋察冀分局等点线工作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潜入市内，在社会各阶层伪装就业。为了重建中共地下组织，从1943年开始积极活动。随着战局的演变以及物价上涨，民生不安，便乘机以工人、苦役、青年、学生等为目标发展党的势力和进行围城工作(破坏交通通讯线、阻碍物资移动、封锁情报等)，胁迫和收买附近的土匪，策动官吏反正，进行谋略秘密宣传，收集情报，购买和运出抗战物资等。

重庆系统特务工作人员，也企图在社会各阶层中进行争取同志的活动，但较之中共方面的工作，质量低劣，行动也不积极。

天津为华北商业中心，文化发达，一般市民讲求实利，明哲保身的观念很强。随着中共以武力为背景的政治攻势日益激烈，他们对新中国政权和日本的信赖逐渐减弱，两面性的态度(任何一方都依靠)越来越明显起来。

天津为独立混成第九旅团独立步兵第三十七大队负责的地区，但市内则由北特警第二特别侦谍队分担。侦谍队以伪装身分打入社会各阶层和新民会等进

行侦谍活动，同时与有关机关，特别是天津宪兵队及中国方面的警察等密切联系，逐步剔抉敌方的工作人员，破坏其秘密通讯设施。

天津陆军连络部制造的“连络部情报”中，对1944年2月的情况有如下叙述:

一、重庆方面特务系统的工作有相当渗透。

二、华北交通会社的爱护村工作，为了行政一元化，有必要与县政进行调整。

三、有的房东压迫参军者的家属。

四、从天津的情况看到，华北经济界的混乱，现已成为失去平衡的统制经济，依靠时局精神的号召，采取姑息因循的手段，是不能挽救这种局面的。如此放任下去，则华北经济势必在道义和统制的旗帜下遭到破坏，而华北兵站基地的作用必将从根本上被彻底摧毁。当前必须采取的重要措施，应以吸收游资为第一要务。

五、此次大使馆采取的粮食增产对策，是对当地片面认识的产物。它使当地华方机关对日本丧失了信赖，使驻津兵团和特务机关的多年努力成为泡影，至为遗憾。今后必须注视华方从中央当局向下级机关指示的内容及其诚意，鉴于彼等过去的所为，需要严加监视。

北京、石门地区 第六十三师团(师团长:野副昌德中将)将步兵第六十七旅团(旅团长:柳勇少将，8月以后为寺仓小四郎大佐)部署在燕京道，将步兵第六十六旅团(旅团长:佐久间盛一少将)部署在保定道，同时将警备真定道的新编独立步兵第二旅团(旅团长:柳川真一少将)置于其指挥之下。

京汉作战时，最初预定只以部分兵力参加，但为了攻占洛阳，师团长急速率领第六十七旅团主力前往指挥菊兵团。在此期间留守地区治安急剧恶化，驻北京附近的分屯部队也遭袭击，并不断发生炸毁铁路，向我城内后勤诸设施投弹，以及中国方面的武装团体叛变、被绑架和逃亡等事件。因此，洛阳攻克后，参战部队立即返回。

师团在刷新警备、促进剿共工作的同时，努力对新出现的防空问题采取了对策。其特点是:军民一体组织民间的防卫(以陆军连络部为中心，军、政、民、会的负责人每月召开“剿共连络会议”，推动组织联庄自卫团、民兵、剿共挺进队，建设治安村，改善和扩充爱路村工作，训练新民会青少年团等)，加强北京市的防卫，刷新铁路警备和情报工作，怀柔密秘结社的先天道，大力支援农产品的收购。

肃正作战，是在9月至12月之间，对中共冀西根据地进行搜索讨伐，尽力消灭敌军并摧毁其设施。

蒙疆西部地区 为了京汉作战，抽出负责包头地区的坦克第三师团，3月25日以后，第二十六师团派步兵独立第十一联队担任该地区警备，随后命混成一联队参加京汉作战，仅以少数兵力担任广大地区的防卫。7月中旬，第二十六师团转移后，由新编第一百一十八师团警备大同地区，第十二野战补充队警备厚和及包头地区。

本地区的兵团有三项对敌工作，即:在北面要作好对苏联的作战准备，在西面包头地区，要作好反击傅作义军队的对策，在南面和长城线中部地区，要彻底进行剿共工作。特别是由于兵力减少，要设法增强城防工事和刷新情报工作。在朔县、厚和地区，由于军警联合肃正讨伐，取得了一定成果，但灵邱、清水河地区，共军积极开展地下工作，小部队的兵力已无法应付。

第二十六师团转移前，该师团长佐伯文郎中将对管区内有关治安状况，特别对包头方面兵力减少后的对策以及南部中共势力的扩大，极为关心，兹摘录其手记要点如下:

一、共军地下工作巧妙灵活，群众对他们心悦诚服，而且军纪严明，秋毫无犯。对本地上层人物的情况虽不清楚，但要严加警戒。

二、朔县地区，县警备队和警察结成一体，并有青年突击队、皇协团等，按照我军的意图进行策应，取得了效果。其它地区尚未达到这种程度。特别是灵邱附近地区威胁较大。县总人口十三万五千人之中，治安地区居民三万五千人，居民中大约三分之一是文盲，对彼我关系持两面态度，因而需要从根本上重建县的行政工作，并由警备队积极进行肃正讨伐。

三、在治安地区内外均需对共军采取经常攻势。要加强警备队伍，修筑城防工事，进行居民调查(由县、街、乡长协助)，讨伐时必须采取包围战术。

四、关于包头方面的警备

对于傅作义军在我方占领地区的活动，务期及时集中兵力彻底予以粉碎性的打击。对包头地区要严加戒备。

当时包头特务机关长稻森利助中佐，收集五原、宁夏方面的情报，并指导由归顺部队改编的绥西联军(司令王英)、东亚同盟军(司令白凤翔)，进行情报谋略活动。让他们与驻在五原的傅作义暗中交往，为的是防止傅作义对包头地区的反攻，如有可能，还要进行怀柔工作。

五、物价昂贵，赋税增加，省、盟的经济状况令人难以满意，只有军警一体才能打开局面。

六、日本人(官吏、居民)要率先以实际行动为当地人作出示范。

七、宪兵应以铁路方面的对共侦谍破获为重点。

八、要加强对空监视哨和重要地区防空防火工作。

山西南部地区 第六十九师团于 3 月将临汾的警备任务移交给独立步兵第三旅团后进驻运城，接替转向它处的第三十七师团负责地区的警备任务。

5 月，以师团主力参加京汉作战。6 月师团司令部返回运城。步兵第五十九旅团驻守黄河南岸的陕县桥头堡，步兵第六十旅团担任原师团负责地区的警备任务。

潞安地区，在 3 月间，由新编独立步兵第十四旅团接替了六十二师团的警备任务。旅团在 6 月间进行了陵川作战，9 月间进行了秋季太岳第二、第三军分区肃正作战。但是太岳军区共军势力强大，因此，警备队被压迫到东潞路沿线地区，将兵力收缩到沁县附近。此外，该军分区部队在西面的安泽、浮山、绛县地区也扩展势力，在部分地区内对同蒲路造成了威胁。

由于精锐兵团的调出，警备更迭频繁，密度降低，太岳军区的共军大有显著扩张之势。

华北特别警备队的第二期作战

(自 1944 年 6 月 10 日至 1945 年 1 月 4 日)

改变编制 北特警基于 1944 年度兵备计划，以 2 月 15 日军令陆甲第十八号，奉命再次改变编制，6 月 10 日改编完成。

在此次改编中，北特警的宪兵人数未变，仅增加了步兵，主要是新增设了五个警备大队。从全体看来，兵力有所增加，但各大队的宪兵却相应减少了，一半，致使情报和侦谍能力降低。

新设警备大队的大队长为:第六大队长猪俣稔秋少佐,第七大队长原重司宪兵少佐,第八大队长松田秀雄宪兵少佐,第九大队长松本满贞宪兵中佐,第十大队长长谷川俊文少佐。

警备大队由大队本部和五个中队组成,兵力为 1,157 人,中队是由四个小队组成(第五中队由三个小队组成,另有骑兵小队一个),兵力 202 人。小队由五个分队组成,与第一次编组相同。教育队由一个候补下士官中队、二个受训兵中队及一个教导中队组成。兵员增加100人。

北特警在 6 月份编成以前,首先从 3 月份开始对调进的军官、下士官进行了干部教育。组成后,以部队团结,破获间谍、进行战斗等必要的基本事项为重点,进行了两周的紧急训练。

当时,中共趁京汉作战日军兵力集中和转移的空隙,企图扩大势力,其秘密活动仍极顽强,尤其是冀东、冀中地区,各种活动都很激烈。其总的动向判断如下:

中共今后将展开更加积极的攻势,进一步对汪政权的军队和各机关策动反正工作,对我军民进行厌战和反战工作,对朝鲜人和在日本统治下的各民族,进行巧妙的离间工作,并加紧扰乱占领地区内的治安。此外,一方面利用美、苏尤其是美国缓和重庆对中共的压迫,而努力加强其军事、政治、经济力量。另一方面,将重庆的战斗力极力引向对日作战,以便扩展自己的势力。估计中共的实力将随着抗战的继续而逐年壮大起来。因此,占领地区的治安,特别是对中共势力的南下,需要严密加以警戒。

改变警备部署及第二期作战 第二期作战的方针是:“为了加强原有部队的战斗力,在山东省及河北省南部地区,邯郸以南的京汉路沿线和陇海路部署新编的兵力,同时在冀东、蒙疆、山西重要地区也增加兵力,以所需要的侦谍兵力直接与当地兵团的作战警备密切协作,进行第二期作战。”根据上述方针,北特警下令:“各部队必须在 1944 年 12 月底,侦破并摧毁当前敌人的秘密组织及秘密活动。”遂即在华北全地区部署了特警网,同时与当地兵团也形成了密切协作的态势。

各大队实行上述的教育训练后,逐渐向新驻防地区转移,于 6 月下旬配备完毕。在此期间,继续进行了侦察剔抉、压制敌行政及武力活动、扩大侦谍网、为保护国防资源设施和交通机关的秘密战斗以及破坏敌中枢组织等活动。

方面军重视冀东道的治安,于 7 月 7 日以后将独立混成第八旅团列入北特警指挥之下,并制定了新的方针:“严格确保开滦煤矿区及京山铁路,同时大力摧毁、肃清中共势力,以期迅速实现冀东地区的安定。”华北政务委员会也计划将“冀东道定为特别行政区以彻底进行剿共”。因此,北特警于 7 月 10 日将司令部移至唐山,第九、第十警备大队、教育队、混合骑兵挺进队等逐渐投入冀东地区,开始进行冀东作战。

8 月 27 日,北特警遵照方面军命令,将第六、第八警备大队、蒙疆特别支队,分别配属于第一军、第十二军、驻蒙军。9 月 26 日,又命部署在方面军直辖兵团作战区城内的警备大队,在作战警备上接受有关兵团长的指挥。1945 年 1 月 4 日,第二期作战结束。

1 月 5 日,北特警第八警备大队主力(移驻青岛)和警备第二大队配属于第五十九师团,第四、第五警备大队配属于第六十三师团,第七警备大队主力配属于独立混成第九旅团,北特警主力仍留冀东,准备下次作战。

作战后的状况及教训 根据“北特警战斗详报”第二期作战后状况和教训大

致如下:

一、中共方面党，政、军均受到相当的打击，但由于巧妙地避开日军锋芒，其势力依然继续增长，并积极展开对满军的工作和对新政权各机关及武装团体的全面斗争。特别是由于美空军在中国的活动，国共摩擦的缓和以及国际形势的变化，这些均有利于中共的宣传工作。今后对其围城工作和反正工作，需要严加警惕，情况不容乐观，

二、由于关系兵团对北特警的特点认识不足，未能予以充分利用。同时，北特警与关系兵团及各个机关的联系也有很多缺点，以致搜索目标时，发生了竞争或隔阂，兵团的战斗力和北特警的侦谍工作之间存在着不够协调的现象。

三，中国方面 上层领导机关没有积极的活动，在基层行政机关，由于中共的武力打击和政治攻势，陷入萎靡不振状态，治安军叛变事件屡屡发生。新民会于10月全体联合总会上决议开展统一救国运动，虽然造起了声势，但在具体措施方面看不到任何成果。此外，尽管今年是丰收之年，但因统制经济措施拙劣，物价上涨，囤积居奇现象继续存在。因此、显著削弱了北特警的作战成果。

四、共军战术的特点依然是以游击战为主。除以少数兵力或工作人员动员民众破坏通讯线路、警备道路、埋设地雷之外，并以集团兵力采取伏击、诱饵等战术，奇袭.日军的粮秣运输队、连络队、或偷袭中国武装团体。对兵力少的驻地，则夺取其枪支弹药等。近来由于招兵扩大了军队，对日军有可能积极果敢地进行正面作战了。

五、甄别民匪的注意事项 1.八路军的人员，比一般老百姓步行速度快。逃跑时，村民四处分散，工作人员则结成组向同一方向迅跑。3.工作人员的口袋是鼓的。4.正在耕地的老百姓，通常一处大约在五人以下。人数多的往往是来不及逃跑的伪装的土兵。5.指挥官和工作人员，大部分是本地人，要怀柔、利用与他们有关系的人。

中共方面的军事状况(1944年)—局部的反攻

据中共军战后发表的资料称:1944 年解放区的恢复和扩大，比上年又有进展，由于发动了局部反攻，为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打下了牢固的基础。4月以后，华北日军一部分向国民党区进攻，一部分转移它处，由新的兵力迅速接替防务。敌人虽然进行了规模超过去年的“扫荡”，但我们取得的胜利则比去年更大。现将有关华北战场部分的记述介绍如下，以供参考:

山东地区的罗荣桓部队:

在鲁中3至4月，发动第三次讨伐吴逆化文的作战，消灭伪军十三个团，共计七千余人，收复国土一万二千平方华里，解放同胞三十万人。3月中旬沂水作战，夺回沂水，收复国土三千五百平方华里，解放村庄三百五十个，巩固了鲁中山区。在海滨区，7月下旬讨伐李逆永平，收复国上一万余平方华里。11 月在莒临公路作战，夺回了莒县，收复国上七千余平方华里，解放同胞三十万人，并有伪军三十个中队反正。在渤海区，7月至9月的秋季攻势中，夺回了利津，臬陵、南皮、临邑等县，消灭敌伪一万二千余人，收复国土四万五千五百平方华里，解放同胞四百余万人。在此次战斗中，王道率部两千余人投诚。在胶东地区，8至9月的攻势中，夺回荣城、文登，收复国土二万余平方华里，解放同胞一百四十余万人。此外，伪军七个中队和刘公岛伪海军七百余人投诚。在鲁南地区夏秋攻势中，歼灭敌伪一万七千余人，收复国土二万平方华里，解放人民一百四十余万。

晋察冀区聂荣臻部队，采取一连串的攻势，使该区形势为之改观。

1月攻入卢龙，2月攻入抚顺，昌黎，3月攻入赵县、晋县，4月攻入博野，5月攻入任邱、安新，6月攻入定县，涞源、河间、获鹿、灵邱、徐水，7月攻入大城、易县、蔚县，

8 月攻入雄县、沧县，9 月攻入深泽、饶阳，10 月攻入献县、平谷、安平。

此外，尚有若干大城市，如石家庄、保定、高阳、肃宁、武强等，均曾两次被我攻入。晋察冀军区共计拔掉据点一千五百个，夺回五千多个村庄。冀中平原自百团大战以后，敌蚕食严重，形势益形紧张，战斗更加艰苦。但至 1 月以后，由于反攻的胜利，又已恢复到百团大战以前的局面。至于冀西山地的北岳山区，我们的根据地扩大，敌人封锁第一线的碉堡全部被摧毁，迫使敌人后退。在冀热辽三省边界线附近，我们在巩固了平西、平北、冀东等根据地后，更进一步将游击战火烧到伪满境内。冀东的环境虽然艰苦，我们也屡次攻入县城，有了很大的发展，由此可见我们势力的壮大。

冀鲁豫区的刘伯承部队，在太行、太岳区，3 月夺回榆社、4 月夺回林县、沁水。攻入的县城更多。如 2 月攻入武乡、大谷，5 月攻入陵川、左权(辽县)，7 月攻入阳城，8 月攻入和顺，11 月攻入元氏。从 6 月到 9 月在豫北的黄河北岸连续发动三次攻势，攻克据点三十六处，收复国土九千余平方华里，解放同胞十万零五千余人，使济源、垣曲完全为我所控制。国民党军放弃守地溃逃后，豫西沦陷区人民遭受残酷蹂躏，我八路军组成豫西支队，从晋南渡过黄河，积极打击敌人，建立起豫西解放区。从 9 月到年底短短时间内，作战一百三十次，活动地区五万平方华里，解放村庄四千六百七十六个，一百一十三万人，建立十六个县政府，我军势力东达平汉路西侧，西至渑池地区，南至宝丰、嵩县。给予平汉、陇海两铁路及郑州、洛阳的敌伪以很大威胁。我军与民众的约法五章，赢得当地民众的热烈拥护和协助。

刘师所属部队在平原地区(冀鲁豫)的活动，2 月攻入沙河、朝城，5 月夺回内黄、邱县，5 月下旬攻占清丰县城时，捕获了正在开会的伪冀南道的道尹薛兴甫、伪县长、伪保安队长、警察所长、商会会长等十三人，此外俘敌伪军一千余人。给予敌伪一次意外的打击。7 月夺回了莘县，8 月从汶上到郓城二百余里的战线上，对刘逆本礼所属部队展开攻势，拔掉三十七个据点，解放村庄六百余处，同胞三百余万人。9 月夺回濮阳、寿张。11 月再次攻克莘县。12 月攻入尧山。据不完全统计，晋冀鲁豫的刘伯承部队 1944 年拔掉据点和碉堡一千余处，夺回县城七座，收复国土二千余平方华里，解放人口五百余万，至 1945 年，在该地区掌握了十一座县城，已将鲁西南和鲁西连成一片。

晋绥区吕正操部队取得了非常大的战绩。4 月攻入方山，5 月攻入静乐、6 月攻入离石、10 月攻入宁武。9 月中旬在该地区展开了大规模的秋季攻势，攻入汾河西岸的要地汾阳城，焚毁敌飞机场、电灯公司、火柴公司及车站，并将离石至岚县公路截成数段。一年来，共夺回敌伪据点九十五个，解放村庄三万一千八百 0 八个，解放同胞二十七万人，收复国土九万七千余平方华里，这样惊人的胜利使晋西北形势大为改观。

由于这些胜利，使敌人受到极大消耗和牵制，缩小了敌占区，扩大了解放区，发展了我们自己的势力。至 1945 年，人民解放军局部反攻的规模更大，晋冀察边区人民解放军著名的春季攻势和夏季攻势开始后，在全华北地区不断地发动了猛烈的反攻。(以上未按中文资料校正—译注)

二、对华政治谋略的施策

改变对中共态度的工作

日军在中国大陆作战的主要敌人，认为第一是重庆政权、第二是延安政权、第三是美国在华的空军。这是陆军中央从 1943 年春开始特别强调的看法。但是，直到 1944 年才开始重视中共的存在及其实力，认识到中共与重庆政权尽管在本

质上绝对不能相容，但它利用继续抗战的机会，巧妙地在我占领地区内扶植并扩大其势力，正在建立一个同重庆政权完全不同的半独立政权。这一客观现实是必须予以正视的。

华北方面军成功地结束了京汉作战，华中第十一军 5 月 27 日开始的湘桂作战，也在顺利进行，于 6 月 18 日占领长沙，26 日占领衡阳飞机场。

中央为了在政治上利用此次战果，7 月 3 日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决定了“对中国作战时的宣传要领”大力进行对外政治策略宣传。

该“要领”特别要求贯彻在中国作战的目标是破坏美国的战斗力而不是重庆政权的精神，要以尽力阻止美、英、重庆在中国的合作，防止重庆与中共合作及美、英、苏共同对日为重点，强调采取政治攻势。

7 月 5 日，根据上述“要领”精神发表的“帝国政府声明”，向国内外表明了日本关于在中国作战的真意。

此外，值得注目的是对中共态度的转变，“要领”中有如下叙述:

对中共本部暂称延安政权，对其所属军队，在需要讨伐时则以匪贼称之。对反共、剿共、灭共等名称，一般情况下应避免使用。

中共的名称也尽量不要用。

使用延安政权这一名称进行宣传的目的，是为了使重庆军产生动摇情绪，离间国共，使其矛盾激化。然而，效果如何，中央也抱怀疑态度。它是想要经过试验宣传，见到效果后，再作为政策下达指示。

中国派遣军接到该文件后认为:“这是容共政策，是对共态度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对于华北方面军的剿共方针以及对南京国民政府的指导工作都有很大影响”，“其结果恐将变成讨好苏联的政策”(烟元师日记)，对之表示反对。尔后经中央说明，虽然大致取得谅解，但华北方面军首脑认为“对反共政策决不能稍有歪曲”，仍表示强烈反对。

中央始终考虑到，为了不把苏联推到敌方，在表面上也不能把中共看成敌人，这乃是在谋略上的需要。经与华北方面军多方进行协商，结果于 8 月 10 日由总长指示，下达了上述精神的“对延安政权宣传谋略实施要领”，要求遵照施行。

该要领指出:延安政权在政治方面，事实上已经是独立政权，在思想上正从共产主义逐渐向民族主义蜕变，对此应予强调指出，以诱导敌人放弃抗战目的。要积极展开这样的思想战。随着工作的进展，必要时对延安政权的党和军队，进行地方性的、或局部的争取工作，并设法使之逐渐扩大和发展。

注: 据当时大本营陆军部参谋、本案主持人田中敬二中佐的回忆:作为对战争终局指导思想的一环，当时的设想是，为了与美国谈判，首先需要和苏联的莫洛托夫握手，而作为与莫洛托夫谈判的手段，就要考虑怀柔毛泽东;同时，还要推进对重庆的政治工作。

华北方面军于 8 月 30 日下达了废除“中共”称呼的命令。然而以后中央也并未采取具体措施，当地驻军也无认真实行“要领”之意，结果未取得任何进展。

中共对形势的判断

在中共方面，估计战争胜利已经接近，对日本方面，一心坚持斗争;对重庆

和美国方面，虽本质上互不相容，但仍保持交涉和联系，力图扩大和巩固自己的势力。看来，在此期间其力量倒是集中于后者。

在此形势下，即使试探一下怀柔中共的工作，其结果必将是徒劳的。

对重庆的政治工作

在太平洋方面，1944 年 6 月 15 日美军在塞班岛、7 月 21 日在关岛、23 日在提尼安岛相继登陆。各岛守备部队经过奋战之后全部战死。在欧洲方面，美英同盟军也于 6 月 6 日在法国北部登陆，德军东西两面受敌，正在继续撤退中。

在日本国内，7 月下旬发生政变，7 月 22 日小矶内阁成立。在此形势下，8 月 19 日的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即原来的大本营与政府联络会议)审议并决定了“对世界形势的判断”和“今后应采取的战争指导大纲”。根据对付盟军的攻势，日本的物质力量能够支持到年底的判断，确定了基本方针为：“集中现有作战能力以及截至年底能够用于战争的全部国力以击败敌人，摧毁其继续作战的企图”。对外政策是在认为战局已经进入最后阶段的情况下，作为应付世界局势转变的手段，而以斡旋德苏和解及对重庆进行政治工作为中心课题。

在斡旋德苏和解方面，就派遣特使问题与苏联进行了交涉，苏联方面不但严加拒绝，而且 11 月斯大林的演说使人感到:连日本最重要的条件，即维持两国的中立关系，也面临危险。政府对此深感忧虑。

对重庆政府方面，则根据“迅速发动统一领导的政治工作，竭力利用苏联以解决中国问题”的方针，作了具体的研究。此项工作一向由南京政府进行，但今后的工作究应如何进行，必须明确作出决定。于是 8 月 30 日制定了“对重庆政治工作实施纲要”，规定：“根据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决定，由总理大臣与外务大臣取得联系，通过南京国民政府在其自发的形式下进行工作(根据需要可以邀请南京国民政府顾问及其他人员参加)。驻华大使及陆海军最高指挥官仍不直接参加，只须给予支援。

9 月 5 日，制定了进行此项工作的具体措施，以“速使重庆政权禁止抗战为重点”，以“创造彼我直接会谈机会”为第一目标。临到直接会谈时，日本方面的最大限度让步腹案如下:

(一)认蒋介石返回南京，成立统一政府；(二)废除日华同盟条约(指日本与汪伪的同盟条约一译注)，缔结新的友好条约；(三)对蒋汪关系、延安政权的处理，蒙疆地带特殊化等，均作为中国内政问题，日本概不干涉；(四)满洲国的现状不变；(五)如在华美军撤退，日军也完全撤退。

这样，将使 1932 年以来日本在中国的成果，除满洲国外，一概化为乌有。

为了向南京国民政府传达日本方面这一意图，派陆军次官柴山兼四郎中将(截至 8 月 25 日担任南京国民政府军事最高顾问，其后为矢崇勘十中将)前往南京，9 月 13 日同南京政府首脑进行了会谈。当时汪兆铭正在日本养病，代理主席为陈公博。国民政府方面对此提案虽然谅解，但大部分首脑内心认为此项工作不可能实现，对之表示消极。

但是，当时中国派遣军的湘桂作战进展顺利，占领了湖南的重要区域，正在准备对广西省桂林、柳州的作战。因此，日本方面想利用这一有利的战略形势，求得政治上的效果。

注:据曾任派遣军参谋副长的今井武夫少将回忆：“中央并未深入考虑南京国民政府与重庆

政府的关系，也未很好研究南京国民政府近一年来几乎完全失去信心而放弃努力的实际情况，即行作出如此决定”。因此，他反对通过江精卫国民政府进行此项工作。此外，行政院副院长周佛海宣称，该项工作业已结束。

为了推进此项工作，宇垣一成大将(偕同坂西利八郎中将、渡边渡少将)受政府委托，从 9 月中旬约以一个月期间视察中国各地。宇垣大将回东京后似曾建议：“重庆工作需要开辟新路线，南京政府的存在对工作反有妨碍。”

但是，最高指导会议听取了矢嵜中将的意见之后，10 月 25 日，仍未改变通过南京政府进行工作的原则。确定了“以最高军事顾问”为当地日本方面负责人，受总理大臣的直接指示行事，并决定迅速邀请陈公博来日本，听取汪主席有关全面和平的遗言(汪兆铭于 11 月 10 日死去)。

以后几乎未着手工作，又提出了必须由日本当地各机关密切参与的意见。12 月 13 日，最高指导会议决定：“停止由军事最高顾问为当地日本方面负责人的作法，改由驻华大使及陆海军最高指挥官协商进行工作。”并决定“由中国派遣军总司令负责与中央联系，以统一掌握并进行上述工作”。这是从大东亚战争以来，由当地日本最高机关参与对重庆工作的开始。但是，在中央的负责人仍为内阁总理大臣，此项工作由南京国民政府以自发形式进行的方针，也未改变。

注：冈村宁次大将就任总司令官以来，极力设法和重庆进行秘密联络，同国民党政府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互派使者。通过这一路线，传达蒋介石的口信说(2 月 14 日)，无意与日本进行和平谈判。

政府尽管如此努力，但因世界形势的关系，此项政治工作终于无望。最后 1945 年 3 月底小矶首相的“缪斌工作”，也以失败而告终，这也是构成内阁更迭的直接原因之一。

注：缪斌为南京国民政府考试院副院长，受小矶首相的邀请于 3 月 16 日来东京。首相将通过缪斌进行和平工作的提案，向最高战争指导会议提出，但遭到与会者大多数。特别是陆军方面的强烈反对而未能通过。

重庆方面的政治状况

在此期间，重庆政权与英美等盟国的结合，通过 1943 年 11 月的开罗会议更加巩固。宣称：要彻底进行战争，直到日本无条件投降为止。因而已无与日本单独进行和平谈判的余地。重庆方面主要关心的是增加美援和对中共的关系问题。

三、战局恶化中的各种紧急措施

(1944 年后半年至 I945 年初)

中国派遣军态势的转变

1944 年夏，为了在华中、华南迅速完成湘桂作战，决定新设立第六方面军司令部，8 月 25 日任冈村宁次大将为该军司令官(华北方面军司令官由冈部直三郎大将继任)。以后湘桂作战进行顺利，11 月 10 日攻占桂林、柳州，24 日攻占

南宁，12 月 2 日追击到贵州省内，占领了独山，同时南下部队于 10 日与一部分印度支那驻屯军会合，将中国大陆南北分开。

在此以前，11 月 22 日，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更迭，各方面军和司令官阵容为之一新。由冈村宁次大将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部大将任第六方面军司令官，下村定中将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澄田睐四郎中将任第一军司令官，根本博中将任驻蒙军司令官。

当时太平洋方面战局逐渐趋于不利，在 10 月中旬开始的莱特决战日方失利，12 月下旬转入持久战。估计美军下次很可能在中国东南沿海登陆，因而在那里加强对美战备成为紧急任务。派遣军一面对沿海重要城市进行防备，同时，加紧进行占领粤汉铁路方面重要地区的作战准备。

在中国的同盟国空军活动愈益激烈，空军基地逐渐北移。为了防卫日本国本土、满洲和朝鲜的需要，攻取西安作战又成了当前的重大问题。11 月大本营通知派遣军对该作战进行研究。派遣军早有此意，当即要求华北方面军速行研究，参考其原来的计划方案，于 30 日制定出西安作战指导大纲。其作战的目的在于“摧毁敌在中国西北的空军基地，同时获得我方空袭中国内地的空军基地，以加强日本本土及满洲、朝鲜的空防”，并设想于 1945 年春由华北方面军实行作战。本案于 12 月上旬向大本营报告，并进行了研究。然而此时全局形势已不能允许该方案的实现。大本营当前最重视的是加强中国东海方面的防御，要求派遣军迅速作好中国东南沿海和华中三角地带(长江下游南京上海杭州地区)对美作战的准备。

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大将的信念是:“为了支援全面战争，估计到将来美中同盟军可能由海陆两面进行总反攻，要做到先发制人，并有利于保卫日本本上，派遣军应该利用一号作战的成果，排除万难，坚决实行对重庆作战使之屈服”。因此，自就任以来研究的结果，于 1945 年 1 月初派松井总参谋长去东京，说明“中国东南方面作战计划大纲”，同时提出了进行四川作战的强烈要求。对此，大本营避而不作答复，却迫切希望加紧进行中国东南方面的战备。(冈村总司令官西向作战的真意，是估计美军要在日本本上登陆，而想要把美军吸引到大陆上来。)

1 月 9 日，美军在吕宋岛登陆，围绕中国东海沿岸地区和岛屿以及日本本土的防卫形势，变得更加吃紧了。1 月 22 日，对派遣军下达命令和指示，改变了基本任务。其中也采纳了总司令官的上述意见，要求以长江下游重要地区作为重点，加强东面作战的准备，对西面作战在缩小规模的范围内可以实行。

大陆命令第一千二百二十八号(实施纲要部分—译注)

(1)迅速加强中国大陆战略准备，击败从东西两方进攻之敌，特别是击败美军，粉碎其企图，确保日本在大陆的国防重要区域。为此，要以确保华中和华南，特别是长江下游重要区域为加强战备的重点。

(2)加紧压迫重庆势力，摧毁敌之战斗力，并结合实行政治谋略，以期使之衰亡。此外，应努力扼制在华美国空军势力的活动。

(3)为了确立我军作战根据地，便于取得国防资源，对占领地区特别是华北及长江下游重要地区应迅速使之安定。

(4)大体上，苏尼特右旗王府、百灵庙、安北至山西省西南端黄河、老河口、宜昌、秀山、黎明关、平马连成一线。在其以西进行地面作战时，可采取以小部队进行挺进、奇袭等方式，除此以外，要根据另外的命令方可进行作战。

(5)对台湾及西南诸岛方面的作战，在航空作战等方面，要尽可能予以协助。

(6)与南方重要区域，尽力保持联系，并要协助海军保护海上交通。

大陆指令第二千三百六十三号(摘要)

一、中国派遣军司令官，要以促使重庆势力衰亡为主要任务。同时为了封锁敌在华空军势力的活动，要组成多数小部队对中国内地长期进行有组织的挺进、奇袭作战。

二、中国派遣军司令官要承担作战地区内不归其指挥的部队的兵站业务，同时在必要时，对关东军、南方军及第十方面军的兵站业务，也要进行援助。

因此，派遣军于1月29日召开方面军及各军司令官会议。总司令官下达改变方面军及各军基本任务的命令和有关摧毁敌前进航空基地的老河口、芷江作战的命令。派遣军对各军有关基本任务的命令摘要如下:

一、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大体上要确保现占领区域，尽可能加强对重庆势力的压迫，同时预定于夏初在青岛方面，大致完成对美作战准备。

在蒙疆方面，尽可能做好对苏作战准备。此时给了青岛方面对美作战的新任务。

二、第六方面军司令官，要大体上确保现占领地区，同时应设法摧毁重庆方面的战斗力以促其衰亡。此外，将第二十三军由派遣军总司令官直辖，时间另行指示，并要极力与南方军保持联系。

三、第十三军司令官，要在大体上确保现占领地区，同时预定在夏初大致完成沿海对美作战的准备。

四、第二十三军司令官，由派遣军总司令官直辖，时间另行指示，大体确保现占领地区及赣南地区。同时预定在3月底大致完成沿海方面对美作战的准备。

五，第五航空军司令官，以一部分协助地面部队，并努力扼制在华的美空军的活动，同时以主力在沿海口岸进行对美作战准备。

六、各方面军、军司令官应加强对重要国防资源地、工厂、交通干线、主要城市以及飞机场的防空措施，特别是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及第十三军司令官，为了便于获得国防资源，对华北北部、长江下游重要地区，要努力设法迅速使之安定。

七、各方面军、军司令官关于对美作战准备，要依据附件“沿海方面对美作战准备纲要”进行。

为了对美作战，下达了“沿海方面对美作战准备纲要。”关于兵力部署、城防设施、飞机场的设置、军需品的聚集和军事训练等作了指导。该设想分为华南沿海方面(光一号作战)和华中沿海方面(光二号作战)。后者的指导方针是预定在本年夏初，加强长江下游特别是上海周围的战备。美军进攻时即调用可能使用的兵力与之进行决战，以消灭敌人。因此，拟集中派遣军的主力准备决战。根据这种设想，兵力运用、兵备计划和华中、华北方面军有关事项，摘要如下:

一、预定从华北调往上海附近兵力如下:

第六十九师团(运城)、第一百一十八师团(大同)4月调出。

第六十三师团(北京)、第一百一十七师团(新乡)、第五十九师团(济南)5月调出。

第一一0师团(河南)、第三战车师团(河南)6月调出。

二、第十二野战补充队改编为独立混成旅团，预定在5月调往徐州。

三、为了便于向上海调兵，4月上旬，在华北新设五个独立警备队。

四、应迅速加强武器的自给，特别是对美作战兵团的装备，尤应充实坦克部队。

五、为了对美作战，要重视特攻战法(以下略)。

除以上光号作战以外，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又接到命令，必须尽可能迅速占领老河口附近。

3月19日，中国派遣军命令华北方面军在4月中旬，将六十九师团及一百一十八师团调往上海(根据5月28日命令，自6月10日隶属于第十三军指挥之下)。

华北方面军治安警备和兵力配备的变化

治安警备 华北方面军京汉作战结束后，针对管内治安状况，于9月上旬制定“华北警备革新计划”，采取按照各兵团的兵力情况，对警备部署的整顿进行了指导。然而，新任司令官冈部直三郎大将深感:为了适应紧迫的全局形势，不仅限于警备，必须刻不容缓地制定包括所有各方面的综合措施，迅速果敢实行。因此，9月25日在北京召开兵团长会议，下达了新计划，强调加紧进行决战的准备工作。

新计划的详细内容虽不清楚，主要是刷新警备、整顿兵备、做好防空措施，以及有关政治、经济的“对华北紧急措施纲要”、“剿共强化治安要领”等。

参考:关于“对华北紧急措施纲要”，华北方面军第三课高级参谋神崎长大佐的笔记中有如下记载:

本“纲要”系9月上旬在中国派遣军政务负责人会议上对大纲进行了调整，由方面军政务主任参谋塚本政登士中佐起草后，作出决定，并在上述兵团长会议和10月4日连络部长会议上作了传达。纲要是以军为中心，强力推行各种政治经济措施，要使已经不参与政治经济工作的军方重新进行干预，从此时开始，强调“向实质上的军政转移”、“军司令官和大使两位一体制”的主张。

对此，塚本参谋有如下回忆:

当时，日本对于战争必要的战略物资的增产和向国内的运送，要求非常紧迫。同时，随着京汉路的打通，日军在中国大陆上有了机动余地，必须加紧对共军的处理，节省华北的兵力。然而在华北，一般说来，对日本严重危机的时局尚无正确认识，缺乏自觉和紧张的精神。此外，为了促使中国方面发挥积极主动性，我方虽按照“对中国处理根本方针”尽了很大努力，但由于南方战局的恶化，不相信日本的思想有所抬头，中国政府更加威信扫地，越发软弱无力。另一方面，由于京汉作战，共军乘方面军主力集中黄河南岸的机会，向河北省北部及满洲国境方面伸张势力，该方面的治安已感不安。

在此形势下，起草了“对华北紧急措施纲要”，其方针大体如下:

一、彻底收集华北战略物资，尽量多往日本输送，以支持战争。同时，为了节省海上运输力量，尽量在华北制成成品，为此，决定将日本一部分炼铁高炉移至华北(未及实现战争即已结束)。

二、由于共军不能早日消灭，必须确保重要地区和铁路两侧的治安，以保证战略物资的收集和运输不受阻碍。特别是关系重大的开滦煤矿，由于治安很坏，务期早日确保该地区附近的治安。

三、应使在华北的日本人，充分认识全面战局和日本的实际情况，改正松懈不振的状态，加强团结，并进行必要的训练。

四、上述各项措施，以日军为中心，大力予以推进。改变过去以日本大使馆和由中国方面出面的麻烦作法。这就是说，要以军为中心，将日本大使馆、中国方面各政治、经济机关、新民会等从实质上统一起来。

但是，对中国方面的利用依然不变。

按照上述方针，各兵团均致力于管内的治安肃正、建设治安村、组织民兵工作，以及支援警察活动和收购物资等。但是管内形势依然不见好转，未能收到显著成果。

关于 1944 年秋的治安状况，方面军第一课高级参谋寒川吉溢大佐回忆如下:

在方面军占领的三个特别市，四百个县当中，治安良好的除三个特别市以外，只有七个县(占总数的 1.4%)。有一三九个县(31.5%，差不多未部署兵力，不得不听任中共活动。还有相当于 66.9%的二百九十五个县(包括华北政务委员会直辖行政区的四个县)，属于中间地区。在该地区彼我势力浮动很大，行政力量大多不能充分贯彻执行。其中大部是以县城为中心，只将兵力分驻几个乡村，民心多倾向共产党。1941 年底治安地区为 10%,准治安地区为 40%，未治安地区为 50%，恢复县行政机关的为 92%(总数 398 县中的 366 县)。与此数字对比，治安状况恶化情况十分明显。

当时方面军第三课高级参谋神崎长大佐对方面军确保治安的形势有如下的叙述:

对于“面”的控制，在当前形势下是不可能的，只能考虑确保“点”和“线”的措施。当时考虑到，如果确保了点(城市)，物资以点为中心收集和分散，人也自然以点为中心进行活动。如果进一步确保了主要的线，向毛细管流通也就有了可能，那样，不仅城市，农村的生产也会发展起来。因此，如果军事上确保了点和线，只要措施得当，不单纯是经济，就连政治、文化也是可以在面上无限扩大的。

但是，缩小各警备部队负责的作战地区，由于种种原因，是很不容易的，直至 1945 年 4 月以后才得以实现。当时是 1945 年秋季(疑为 1944 年—译注)。方面军的主力部署在河南新占领地区。但占领地区的警备部队，一般都经验不足，大部分是素质低劣的部队。而且分散部署在广大地区，兵力非常稀薄。对当时情况举例证明如下:

第六十三师团(师团长:野副昌德中将)于 1943 年编成，负责北京特别市、燕京道、保定道地区的警备。真定道的独立步兵第二旅团(旅团长:服部直臣少将)属于该师团指挥之下。师团虽以主要城市和铁路沿线为部署守备重点，但第一线守备队与敌地区非常接近。京汉作战后管区内治安日趋恶化，7 月份唐县、8 月份满城方面的守备队受到中共优势兵力袭击，9 月份平谷保安队发生哗变、北京西直门分哨发生被狙击的事件; 11 月份南口、昌平地区、12 月份密云地区敌情活跃起来。炸毁铁路或未遂事件屡屡发生。因而，师团为了应付此种局面极为纷忙，野副中将的年终述感如下:

一，“静”的警备是失败的根源，要有坚固的据点设施和机动部队，要进行“动”的警备活动，不要陷入驻防和守城。

二、剿共战的成败，不在于战斗力如何，关键在于情报。要和特别警备队保持密切联络，在各行业各团体内部组成间谍网。

三、讨伐要以少数精锐部队突然袭击、夜间行动为主，不要走大道，要经常考虑伪装我军前进方向以欺骗敌人。

四、剿共战已变成地道战，要尽力发现其地道。

五、要以陆军连络部作为政治经济幕僚来使用。

六、组织居民联防、联攻。在铁路的重要地点设置伏兵。

有关冀东的情况:

方面军特别重视冀东地区的肃正工作。在北特警司令官统一指挥下，以北

特警主力进行肃正、剿抉作战，以独立混成第八旅团(旅团长:竹内安守少将)和华北治安军主力作为机动部队进行剿共作战。但是，李云昌(原文如此一译注)率领的第十三军分区的部队，以冀热边境山岳地带为根据地，与平北地区的肖克军联合一起，继续活动于热河和河北省内。北宁路以南平原地带一部分共军的活动也非常积极。为此特规定:“在敌地区内日军的行动部队，最低限度要有两个中队。”

1944 年 12 月，根据关东军的提议，与华北方面军建立了协定，1945 年 1 月派遣满洲国军到冀东归北特警司令官指挥，配属于独立混成第八旅团。该部队由装备优秀的一个步兵旅(汉族部队)、一个骑兵旅(蒙古族部队)及十个警察队所编成，步兵旅部署于北宁路北侧地区，骑兵旅部署于该路南侧地区。(在 4 月增派了铁路警护旅，总兵力约达一万五千人。)

独立混成第八旅团要求各大队长指挥各自地区内的有关部队，自己则作为机动部队进行讨伐肃正作战。满洲国军由于地理不熟，剿共经验不足，以及与友军联系不够密切，开始损失较大，随着对情况的熟悉，逐步取得了效果。

改变兵备 1944 年底，华北方面军战斗序列中的主要部队有:第一军(第六十九、第一百一十四师团、独立混成第三旅团、独立步兵第十、第十四旅团)，第十二军(第一一 0、第一百一十五、第一百一十七师团、战车第三师团、骑兵第四旅团)，驻蒙军(第一百一十八师团，独立混成第二旅团)，直辖部队(第五十九、第六十三师团、独立混成第一、第五、第八、第九旅团、独立步兵第一，第二旅团、第十二野战补充队、华北特别警备队)等。

但是，至 I945 年，除确保现占领地区外，尚须对美、苏、中进行作战准备。此外，派遣军为了进行“光一号作战”，要由华北调出大约七个师团去上海方面。为此，1945 年 2 月 1 日，根据军令甲第十八号改变兵备，然而在进行改编时，方面军的各部队必须一面担当作战准备和警备任务，一面自己进行改编，工作极为困难。

兵备改变情况如下:

一、预定担任对美作战兵团的“甲”师团化

(一)第五十九、第六十三、第六十九、第一百一十七、第一百一十八师团的各师团迫击炮队(本部及三个中队、编制定员 553 名)，3 月 15 日整编完毕，但在装备上有所不同。

(二)上述各师团及第一一 0 师团的各该工兵队经过改编予以加强(改编后包括:本部二个中队、一个器材小队，编制定员 901 名，人员数约增至原来的 5 倍)。

二、增强独立混成旅团的治安警备力量

对独立步兵大队实行增员改编(包括本部、四个中队、一个机关枪中队，一个步兵炮中队、一个通信队。编制定员 1,549 名，为原来的 1.9 涪)，旅团炮兵队(包括本部、二个野炮中队、一个山炮中队。编制定员 582 名)，旅团工兵队(包括本部、二个中队。编制定员 531 名)，4 月 30 日编组完毕。(旅团编制定员 8,439 名。)

三、野战补充队的改编

以第十二野战补充队为基干，于 2 月 20 日在大同编成第九十二旅团(旅团长为原补充队队长瓦田隆根少将，该旅团由司令部、独立步兵第六百一十五一第六百一十九大队，炮兵队、工兵队、通信队组成)。

旅团预定与徐州地区的第十三军第六十五师团交换警备，但因第十二军老河口作战的关系，转到了河南省郾城地区。

四、接替调出兵团任务的独立警备队的编成

独立警备队，系由司令部、六个独立警备步兵大队、一个独立警备作业队所组成，定员 8,857 名。独立警备步兵大队系由本部、五个中队、一个步炮队所组成，定员 1,365 名。中队有队长以下 220 名，配备轻机枪六挺，掷弹筒六个。步炮队有队长以下 110 名，配备重机枪二挺，步炮二门。作业队有队长以下 235 名，配备轻机枪、掷弹筒各一。根据军令规定: “独立警备队司令官隶属于军(方面军)担任要地的警备。”“独立警备队司令部的工作，适用战时高等司令部勤务令中有关旅团司令部之规定”。

3 月 9 日，下令编组第三一第七独立警备队，30 日编组完毕。4 月 5 日，分别于所在编成地区附近担任警备(其情况见下表)。

独立警备队	司令官	独立警备步兵大队	编成地	战斗序列
第三	古贺龙一少将	第十三—第十八大队	北京	华北方面军
第四	坂本吉太郎少将	第十九—第二十四大队	大同	驻蒙军
第五	佐久间盛一少将	第二十五—第三十大队	运城	第一军
第六	饭田雅雄少将	第三十一—第三十六大队	新乡	第十二军
第七	冈村胜美少将	第三十七—第四十二大队	保定	华北方面军

五、华北派遣宪兵队的改变: 除原有的天津、北京、太原、张家口、济南及特设冀东宪兵队(1944 年 7 月 5 日特设)以外，新设青岛、开封宪兵队，于 3 月 15 日编组完毕。

六、其它，临时编成独立速射炮中队，独立山炮兵大队，独立轻装甲车队等，并改编加强野战高射炮联队，兵站医院等。

以上各部队，是以当地各部队抽出的人员为基干，或由混成部队匆忙编成，故装备和人员均不充足，在独立警备队中，有的部队人员还不到 50%,而且素质也低劣。转到炮兵队和工兵队的人员，大部分是步兵，很多部队需要进行再教育。

如下表所示，方面军的治安警备部队兵力的一百二十五个大队，约十九万人(包括北特警十个大队，但骑兵、坦克部队及其它特种部队除外)。这与大东亚战争前在数量上虽无太大差别，但占领地区扩大到河南省的大部分地区，而且在大东亚战争以前连续担任警备有经验的部队，不过只占半数。

华北方面军警备兵力演变情况表（1941.12—1945.3）					
兵力	1941 年 2 月	1943 年 5 月	1944 年 4 月		1945 年 3 月
			进攻	警备	
驻蒙军	14 大（18,500）	17 大（28,300）		14 大（15,600）	16 大（27,100）
第一军	47 大（59,900）	39 大（57,100）	17 大（17,400）	12 大（18,000）	27 大（44,300）
第十二军	24 大（32,600）	36 大（54,300）	32 大（61,400）	21 大（29,300）	28 大（56,000）
方面军直辖	47 大（60,100）	50 大（67,600）	11 大（18,300）	28 大（32,000）	54 大（67,000）
计	132 大（171.100）	142 大（207,300）	60 大（97,100）	75 大（94,900）	125 大（194,400）
			135 大（192,000）		
注：括弧内为大概人数					

对美作战准备和老河口作战 I945 年 1 月底，中国派遣军命令山东半岛开

始对美进行作战准备。由于该方面战备的重要程度逐渐增大，决定新设军司令部。原来第五十九师团为该方面的骨干兵团，但该师团调往上海方面，山东半岛已无师团，于是不得不由方面军直接指挥很多警备部队。

3 月 13 日，根据军令陆甲第四十一号命令，组成第四十三军司令部，4 月 10 日编组完毕。在此期间，于 3 月 22 日下达了第四十三军的战斗序列。4 月 10 日将第五十九师团、独立混成第五，第九旅团、独立步兵第一旅团，均划入第四十三军隶属。从此山东半岛的对美作战准备工作进入了轨道。

注:第五十九师团从 1944 年秋开始研究对美作战，独立混成第九旅团，于 1945 年 1 月以后在塘沽海岸修筑防御工事。

另一方面，在西方进行了老河口作战(鄂豫作战)。至 1944 年秋，以老河口(郑州西南约三百公里，今湖北光化一译注)为前进基地的中美联合空军的活动逐渐活跃，京汉铁路和长江下游，甚至津浦铁路也受到很大威胁。军队和军需物资的运输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因此，派遣军 1 月 29 日命令华北方面军，迅速摧毁老河口敌人的前进飞机场。

方面军命令第十二军担任此次作战。第十二军于 3 月 22 日发起攻势，4 月 5 日占领老河口。但是重庆第一战区军在西峡口附近进行反攻，此后两军长期连续进行了激烈的战斗。

另外，方面军根据中央的方针，于 3 月 9 日夜解除了华北的法国军队(北京、天津、秦皇岛)的武装，

确保经济和运输的对策

政经指导方针 随着战局的恶化，事态更加紧迫，必须火速将满洲和中国的资源与日本国内的生产力结合起来，努力造成立见功效的作战力量。为此，于 1945 年初，对满、华经济政策，以及为了确保大陆与日本之间的运输，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另一方面，当时在中国，就连比华中较为安定的华北，也由于支援战争的要求和战局恶化，造成民心的动摇，致使经济形势日益险恶。就连付出最大努力支援日满物资的运输和军用自给物资的增产，也逐渐难以确保。铁路运输力下降，统治经济不完善，以致囤积居奇、黑市交易盛行，粮食和生活必需品的上市情况显著停滞。同时，联银券继续增加发行，各种货币任其流通，通货膨胀，民不聊生，增产开发也只是虚张声势而已。然而中国方面的官吏和经济人士情绪消极，法纪松弛，迫求私利。在中国的日本人及国策公司也缺乏适应时局需要的热情，加以担任指导的陆海军、大东亚省各机关，其来自中央的指令系统不同，致使当地各机关的互相联系很不充分。例如:在筹措当地用物资和向日本送回物资时，互相竞购，以致造成价格上涨。

在此形势下，华北方面军首脑认为必须改为实行军政，以此意见上报中国派遣军，并计划进行内部调整，从而制定出反映民意的决战政策。

1 月 11 日，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审议并决定了“确立中国战时经济的对策”及“在中国统一筹措物资要领”。该“对策”的目标是:“以军的战时自给及支援日满为首要任务。为了防止中国经济发生破绽，确保支援战争，尽力维持和培养当地经济力量，维护现行通货制度”。在实行“对策”时，“要使日华军、官、民真正成为一体，在军的强力推动下，重视当地意见，以期迅速取得各项

措施的综合成果”。为此，决定实行(一)推行强有力的综合措施。(二)调整军队自给与支援日满工作。(三)维持和培养当地经济力量。(四)维护现行货币制度。(五)刷新日本人的经济活动。

“要领”是推行上述措施的重要因素。“在中国对筹办日军自给和向日本送回物资等工作，实行统一领导，重点在于提高筹办物资的效率，同时要制止由于互相竞争造成价格昂贵的现象，以期迅速收到效果”。

在华北方面军方面，去年 9 月决定大力推行的“华北紧急措施纲要”未能收到预期效果。从年底到年初迅速转向军政的主张强硬起来。但是，反对的势力也逐渐增强。到五月上旬，改变施行强权的想法，纠正依靠实力统制过火的行动，依靠日华军、官、民的紧密协作以打开政治经济困境的想法占了上风。4 月 15 日为了实行上述中央各项施策决定了“适应形势的政经指导方案”，作为方面军的综合措施。在此期间与各方面反复磋商，先从有可能的部门开始实行。

2 月 16 日，在华北方面军兵团长集会上，下村方面军司令官在训示中强调指出：“不得滥用强权，各项事务不得独断专行，要力戒自以为是，遵循提携共荣之道。”

另一方面，1 月底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辞职，2 月 8 日王荫泰就任委员长，为适应日本方面的新施策，调整了阵容。

注一：神崎第三课高级参谋关于“适应形势的政经指导方案”有如下记载：

新方案是期望思想和政策上的大转变。其基本想法是：(一)不能单纯从军事观点出发，要确保政治上、经济上重要地域，即与兵力相适应的点和线；(二)城市经济和农村经济互相协作；(三)尊重中国人的自主自立，纠正过火的实力行动(缓和统制，逐渐转向撤销统制)；(四)军队充实自己的战斗力，密切与中国官民的协作关系(政治、经济措施胜过武力)等。

据此精神，经多方研究，结果，选出当前可以尽快实行的有以下各项：(一)撤销内河水运的统制；(二)处理可能向中国方面移交的煤矿等；(三)根据协商价格促进物资收购(禁止靠武力或行政力量收购)；(四)从中国各机关撤出日系职员的范围和实施办法；(五)设置大使馆和军的政治经济调整机构；(六)修改陆军连络部服务要领；(七)调查囤积等。

该方案 4 月 15 日得到批准。5 月上旬正要全面推行时，我调转工作免去第三课长职务。因此，除撤销内河航运统制一项外，其它各项在更换课长后.仍旧维持现状。

注二：在方面军首脑中间，对“转向军政”的想法，从 1 月中旬以后虽未见公开表现，但强硬的意见似乎仍未打消。2 月下旬，方面军参谋长去东京汇报各项工作，其中申述了“军及大使馆的一体化的具体方案”，并要求迅速实现，希望实行军的强力统制。

关于上述神崎参谋的工作调动，与部内外特别是各统制机关反对“撤销统制政策”的活动有关。围绕统制经济的是非问题一度产生动摇，但从日满华经济一体化、物资总动员的观点看来，也是有问题的。

确保大陆重要运输的对策 为了确立日满华战争自给体制，以确保大陆和日本的重要运输为前提，大本营于 1944 年 12 月 11 日下令组成大陆铁道队隶属关东军司令官，规定由该司令官负责鲜、满、华铁路整体军事运输计划的执行。1945 年 1 月 11 日，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审议了“确保大陆重要运输措施”，决定“为了提高大陆运输效率，暂时先将对日总动员物资(对大陆总动员物资)的运输，运到大连港为止，并要作为准军需物品一律按军事运输办理。”接着，该会议又于 3 月 10 日决定，“在暂时期间内，华北及华中两铁路的运营，由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管理，军管开始日期定为 1945 年 4 月 1 日”。

大本营首先于 3 月 15 日，以“为适应日本本土决战，1945 年上半年大陆铁路运营要领”指示关东军司令官、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第十七方面军司令官(在朝鲜)，要紧密联系，以确保各该管地区内的铁路运输，并于 3 月 22 日改编了大陆铁道队，将关东军和朝鲜军的铁道队统一起来。又命令第一野战铁道队(在华北)由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直辖。至此，在大陆上的重要物资，以军事运输形成了整体的运输体制。但是，运输与生产的调整极为困难，一般民需物品受到严格限制，严重阻碍了当地经济的维持和培养。

注:铁路军管是以“暂时期间内”为前提的，一俟战争结束后，再与中国方面磋商，从根本上进行调整。此外，虽然实行军管，华北交通公司和华中交通公司依然存在，两公司的日本工作人员算作军属(军队中的文职人员一译注)，当地的工作人员按军属待遇，各种供给物品由军方支付。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关于实行铁路军管问题，于 3 月 30 日与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缔结了协定。

四、1945 年 4 月至 6 月的状况

中国派遣军的新作战计划

4 月 1 日，美军在冲绳岛开始登陆。4 月 5 日，苏联通告废除日苏中立条约，同时急剧向东方增兵。欧洲战局向有利于盟国发展，战局已进入末期。在日本国内，4 月上旬政局变化，7 月铃木内阁成立。日本本土的防卫作战也在正式进行准备。

4 月上旬，大本营对于中国派遣军新的作战指导方针，再次进行审查研究。4 月 14 日，为了紧急应付美.、苏的形势，对于如何运用兵力和促进对美作战的准备，提出沿岸战备的重点，应以首先在上海附近、其次在山东方面为宜的意见，并以此与派遣军进行联络。随后于 18 日，命令从华中、华南调出四个师团，在华中、华北重要地区集结待命。同时于 4 月 12 日命令在华中新设二个师团、华北新设六个独立警备队，作为调用兵团转出后的补充力量。

中国派遣军按照大本营的意图，于 4 月 7 日，除上述四个师团调出外，并部署第十一军从广西撤退，收缩了华南方面的作战范围。此外，预定从华北调往上海方面的兵团中，除第一百一十七师团和独立混成第九十二旅团，按原计划不变外，命第六十三师团及坦克第三师团改于北京、天津地区集结。第五十九师团改于济南附近集结，要求尽快完成集结。(这是由于上海方面作战设想的改变，对苏作战形势逐渐紧迫，山东半岛方面战备需要增加，以及在老河口作战西峡口附近继续进行激烈战斗等的缘故。)

大本营计划加强南满及朝鲜战备。5 月上旬以来，就兵力使用问题同中国派遣军进行了联络。28 日将湖南、广西、江西的兵力转移到华中、华北，以加强该地区战略形势，30 日命令派遣第三十九(第三十四军)、第五十九、第六十三、第一百一十七师团前往满洲和朝鲜北部，由关东军指挥。又在当天命令中国派遣军司令官，除执行现有任务外，还必须作好对苏作战的准备。

注：上述命令是梅津参谋总长前往大连，于 6 月 4 日在该地召见冈村总司令官时，直接传达的。

因此，中国派遣军立即修改原来的计划方案，制定出新的作战计划。其中有关华北方面军的事项，摘要如下:

第一 作战方针

一、中国派遣军以主力控制华中、华北重要地区，对苏、中采取持久的战术，同时应歼灭沿海要地来犯的美军，以利于日本本土的决战。

二、对美战备的重点，首先是华中三角地带，其次是山东半岛，但应尽量于事先识破敌人在华中、华北登陆的企图，于适当时间集中派遣军的主力部队。

三、到万不得已的情况时，也要确保南京附近、北京附近及武汉附近的重要地域。

第二 作战指导纲要

六、华北方面军确保华北重要地区，在9月底以前，要大体完成山东半岛方面对美作战堆备，同时与关东军相策应，大体完成对苏作战准备。此外，第五十九师团、第六十三师团、第一百一十七师团等迅速派往南满及朝鲜北部，使之隶属于关东军，混成第九十二旅团于9月份派往徐州，归还第十三军属下。同时命河南地区的第十二军主力及山西省南部的第一军一部分部队作好适时撤回的准备。

七、速将第四十七师团派往济南，隶属于第四十三军(第四十七师团，为第六方面军属下的兵团，编入第二十军指挥之下，正在参加湖南省芷江作战)。

第五 三号作战指导纲要

二九、华北方面军将第四十三军部署在山东半岛，使之专门进行对美作战的准备，以其主力在青岛、日照附近沿海及后方重点地区修筑坚固的防御工事，同时以一部分主力部队部署在济南附近，使之构筑进攻据点，并考虑到河南地区及山西省的兵力撤回，要使第十二军及第一军充分做好修筑防御工事和各项准备工作。

三七、于光三号作战时，倘苏联果真参战，华北方面军要与关东军互相策应，以驻蒙军(增加一个师团)及承德支队，力保张家口及承德附近的重要地区，尽力击败苏军。同时，以京汉地区所有兵力，坚决固守北京附近的重要地区。

6月10日，中国派遣军召开各方面军和军司令官会议，按以上计划布置了任务。

华北方面军的状况

改编及缩小作战范围 在华北编成第九—第十四独立警备队，作为兵团调往上海后的补充兵力。根据4月12日的军令陆甲第六十五号，于5月10日着手编组，5月30日在山东及河南省编组完毕。按照4月20日的大命，被编入各军战斗序列。各队以在中国的各部队抽调的人员为骨干，由当地应征入伍者编组而成，人员不足，装备极坏。(其编制与原有的警备队相同)编组情况如下表:

独立警备队	司令官	独立警备步兵大队	编成地	战斗序列
第九	石川中夫少将	第四十三—第四十八大队	济南	第四十三军
第十	星善太郎大佐	第四十九—第五十四大队	郑州	第四十三军
第十一	灌田武二郎少将	第五十五—第六十大队	兖州	第四十三军
第十二	泷本一磨少将	第六十一—第六十六大队	青岛	第十二军
第十三	吉武秀人少将	第六十七—第七十二大队	郾城	第十二军
第十四	大井川八郎少将	第七十三—第七十八大队	邓县	第十二军

满、鲜方面调用的兵团，4月以后逐渐集结，第六十三师团于6月中旬、第五十九师团于7月中旬、第一百一十七师团于6月下旬—8月中旬，经过山海关转进，隶属于关东军司令官。第四十七师团奉命从6月27日隶属于第四十三军。但由于芷江作战后返回集结困难，其主力到8月中旬仍在武汉地区。

方面军随着精锐部队的减少，痛感必须彻底改变警备形势，采取了缩小警备地域、集中兵力、实行机动讨伐的指导方针。但是，各兵团考虑到日军撤出地区中国方面警备力量的不足，原来为日军出力的居民会受到中共方面的迫害，因而缩小作战范围不易实现，处于半身不遂状态。为此，方面军在配备独立警备队时，强调只确保重要地区和路线。

6 月，根据派遣军的新作战方针，方面军决定更加缩小作战范围，逐步使美、中军队延缓前进，而坚守济南、石门、京津地区，以进行机动灵活长期持久的防御作战。于是作了以下部署: 第一军留下一部分，将主力调往石门方面。从第十二军抽出二个师团，由军的主力确保黄河一线。第四十三及驻蒙军分别作好对美和对苏的作战准备，并确保占领地区内的主要城市、交通线以及资源产地。

注一: 方面军在讨论关于确保重要地区的问题时，司令部内部，有的从纯军事观点出发，提出放弃京津地区的意见。下村司令官批驳这种意见指出: ‘放弃此一地区，方面军即无存在意义。”方面军参谋长高桥坦中将对司令部内一般情况曾有如下记载: 配合关东军对从北方进攻的苏军进行作战准备，对于如何迎击在山东省或河北省东北部登陆的美军正在研究中。方面军为了研究如何进行对苏作战，曾举办军棋演习。关东军派来参观演习的该军作战主任参谋竹田官殿下说: “关东军对付苏军的进攻，只能采取游击战。此外，热河方面的防卫，连补充一个微弱师团的余力都没有”。听他如此说明，很明显，如果美苏同时进攻，我军将一筹莫展。因此，方面军下决心以北京一带地区为最后阵地，坚决死守。在山东方面重视抗击美军登陆作战，为了尽量给敌人以沉重打击，加紧进行构筑防御工事，士气颇为旺盛。

注二: 方面军的对苏作战计划不详，作战参谋井门满明少佐有如下回忆: “6 月底，为了准备对苏作战举行了研究会，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及关东军参谋也参加了会议。会上，方面军的设想是: 以驻蒙军的全部和第一军的一部固守内、外长城线。并以坦克第三师团及方面军抽出的兵力调往蒙疆及热河方面，另从华中调来一个师团增援。此外，重新明确热河西南部地区，属于方面军作战地区，该地区所驻关东军由方面军指挥。当时，方面军估计苏军进攻的时间将在 9 月底，决定进行准备工作”。

注三: 据高桥参谋长的笔记内载: “为了尽量保持兵力的灵活性，必须考虑缩小作战地区，为此，从春季以来再次展开了 ‘对阎锡山工作’。8 月 5 日，方面军参谋长亲自带领第一军参谋长进入敌地区，直接和阎锡山会见，双方约定: ‘首先将山西省南部一带的警备让给阎锡山，并让阎的代表常驻太原，然后逐步进行交接警备，进一步密切联系有关共同合作对付共军’ 等事项，”

原方面军情报参谋堤宽少佐关于 “对伯工作” 的回忆如下:

我在主任参谋任内，从 1944 年 9 月开始，至 1945 年 2 月正式进行工作，此次对伯工作改变了方针，即: “为使第一军大部分兵力便于调往主要决战方面，要让阎锡山谅解亚洲大同团结的意义，首先与我合作进行武力剿共，然后合作进行政治剿共。应避免与阎军的摩擦。” 工作进展顺利。3 月，为了武力合作，允许阎军进驻我驻屯地区。6 月华北政务委员会督办苏体仁降格任山西省长，对阎进行劝说，并于 21 日派苏到阎锡山处联系政治合作问题。随后于 8 月 5 日，由苏陪同方面军参谋长高桥中将、第一军参谋长山冈少将在温县某村与阎锡山会见，向实现政治合作迈进。9 日返回北京，当天接到日苏开战的报告。很遗憾，未能见到工作效果。

各兵团的警备 以下是指导各军缩小作战范围和各兵团警备的状况:

驻蒙军 2 月以后，改变作战计划以对苏作战为第一，将张北以南的全部阵地作为集中掩护阵地，予以增强。在张家口附近开始修筑可以容纳军内各机关

的大窑洞。在蒙古草原的重要地点安置情报机关，以加强对苏联的情报工作，并对五原的傅作义进行妥协工作。根据其结果，研究并进行准备，通过让出绥远省缩小我警备地区，以便抽出对苏作战的兵力。

注:5月中旬，曾经视察该方面的秦参谋次长的感想是:“驻蒙军的对苏作战准备无所作为，管内治安恶劣。”实际上所属各兵团，并未能按照军的意图完成任务。

独立混成第二旅团(旅团长:渡边渡少将)5月底至6月上旬，收缩警备撤出涞源，固守铁路沿线地区。这是为了适应驻蒙军的意图和应付管内中共势力的显著扩大，同时为了重建治安地区而采取的措施。

注:渡边少将对政治特别关心而且经验丰富，在其笔记中有如下叙述:“我于1944年11月到任，当时管内治安紊乱，民心背离，感到必须改革各项治安措施。基于几年来的见解，计划在与我方势力相适应的地区内建立模范善政区，与中共‘解放区’的善政竞争，以争取民心。该方策以‘要爱护、同情、尊敬中国人’为口号。其内容为:(一)将军队驻地缩小到与兵力相适应的范围内;(二)对军官和日本官吏进行再教育;(三)控制武装讨伐;(四)整顿日本侨民的风纪;(五)撤回配属于北特警的部队;(六)刷新地方行政官吏的任用与推进政治治安工作;(七)整顿警察、邮局、监狱;(八)县政完全由中国人施行。此一德化政策，虽也收到若干效果，但大势所趋终归无法抗拒。

第四独立警备队虽然装备很差，人员也不足，但接替第一百一十八师团及第十二野战补充队，承担了大同、包头广大地区的警备任务。管内南半部中共势力显著强大起来，并从偏关方面继续北上。西半部有重庆的优势兵力采取包围形式，正在进行炸毁铁路、策动武装团体(蒙古军、警察队、铁路警护团等)叛变和瓦解等工作。警备队不断进行剿共讨伐，但管内治安状况并未好转。因此无力进行对北方作战的准备(主要是在包头、武川、平地泉附近修筑防御工事)，工作迄无进展。

第一军 指导全军在情况最坏时也要以确保太原附近及石太路沿线地区为最低限度，缩小作战范围。但是中共势力显著扩张，而且由于南部地区撤军，需要确保同蒲、石太路沿线地区，所以警备部署仅作了小的变动。5月为了策应第十二军老河口作战，以第五警备队主力和独立步兵第十四旅团的一部分进行了“岔官作战”(灵宝南方官道口，岔道口地区)。此外与阎锡山军的地盘协商及警备接替等仍在继续进行。中共方面正专心致力于地下工作，尚未发现积极的武装行动。

独立混成第三旅团(旅团长:山田三郎少将)，4月，为了将兵力收缩到同蒲路沿线，变更了部署。独立步兵第十旅团(旅团长:板津直俊少将)从4月下旬到5月上旬，将警备部署收缩到太原附近及石太路沿线地区。独立步兵第十四旅团(旅团长:元泉欣少将)4月放弃南部地区，重新重点部署于东潞路沿线地区。以上地区均靠近共军根据地，由于共军的行动活跃起来，各旅团在各该管区内积极进行了肃正讨伐。第五独立警备队4月初接管了第十九师团警备任务后，同月下旬在陕州桥头堡地区进行肃正讨伐作战，6月进行岔官作战，担任对重庆军的戒备。

第一百一十四师团(师团长:三浦三郎中将)收缩了各警备大队的警备地区，将一部分地区转让给阎锡山军。4月转入新态势，立即在同蒲路东面及离石以东地区进行剿共作战。随后，各大队组织和训练挺进队，对活动于管内的共军连续进行肃正讨伐。各兵团每次改编都要抽出精锐兵力，以致部份素质低劣、装备不足非常突出。

第四十三军 佑计美军的主要登陆地点为青岛，对防御登陆积极进行准备。

同时，为了对付美中两军总反攻，在济南地区修筑防御工事，并努力加强管内治安工作。

为此，从4月25日至5月26日之间，实行“秀岭一号作战”，命各兵团为确保各自管内的重要地区进行了扫荡。本作战结束后，命独立混成第五旅团(旅团长:长野荣二少将)部署于青岛附近，独立步兵第一旅团(旅团长:浅见敏彦少将)部署于日照海岸附近，第十二独立警备队的一部分部署于海阳县海岸(青岛东北约一百公里)，作好对付登陆作战准备。与此同时，新设的各警备队部署于后方地区担当警备任务。日照及海阳地区原为共军的根据地，我军讨伐肃正极为繁忙，以致推迟了构筑工事的工作。济南附近修筑工事虽由军直辖部队负责，但材料不足，工作也难以进展。此外，为了剿共作战组织和训练了挺进队，但因兵员素质低劣、装备不足，未能收到效果。特别是以冀中地区为根据地的共军，改变了过去利用坑道的战术，于6月10日，一齐发动攻势，使警备津浦，石德路的独立混成第九旅团(旅团长:的野宪三郎少将)前线守备队遭到了严重损失。旅团立即转入反击，将其击退，但此后该地区治安急剧恶化，天津市内也不断发生恐怖事件。

第十二军 以新编各独立警备队接替京汉路沿线及兵站线地区警备任务，主力部队在西峡口方面与重庆军进行激战(豫鄂作战)。6月，基于方面军缩小作战范围的方针，首先将坦克第三师团调往北京、天津地区，该师团从7月上旬以后陆续进行转移准备。

方面军直辖地区 本地区周围的共军纠集各地武装团体，以进行总反攻的姿态逐渐向日军势力范围渗入。治安情况在日益恶化。在冀东地区，不仅威胁京山路，对满工作也更加活跃起来。因此，方面军从6月下旬，将分散在青岛、济南、太原、石门等地的北特警各警备大队调往冀东地区，7月以后，以北特警全部、独立混成第八旅团及配属的满军进行了冀东作战。

最后的和平工作

由于美军进攻紧急，特别是受对苏形势的逼迫，势必改变在中国的战略对策。为此，中央决定对重庆和延安进行政治工作，首先要尽力与重庆实现停战。

对重庆的政治谋略，一向是由南京国民政府以自发形式进行的，由于工作停滞，几乎陷于绝望状态。于是，今后不能只顾维持对南京国民政府的信义。作为最后手段，决定在中央由陆军大巨负责，在当地由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直接进行工作，4月18日发出如下的参谋总长指示:

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今后按照以下要领负责进行对华政治谋略施策。但南京国民政府对重庆正在进行的政治工作仍不变。

一、利用目前对华战略优势，大力进行对重庆的政治工作及对延安的谋略工作，力求与重庆实现停战。

二、尽量利用对延安的谋略施策，作为对重庆策略的牵制手段。目前要极端秘密地分别对重庆和延安进行工作。

注:据《大本营机密战争日志》载称:“对重庆政治工作的目标，作为结束战争计划的一环，在于利用重庆政府，以谋求缓和盟国的对日要求。在研究阶段，曾有主张对重庆和延安并行的方案。同延安的联络从去年夏季就已经考虑，但并无任何具体指施，今后的希望也很渺茫。于是决定以仅有一线希望的对重庆工作为主。然而不能考虑与重庆政府单独讲和，

又因对重庆的谈判有变为对美谈判之虞，故不搞全面和平，而只是尽力促使实现停战。此外，该工作概由冈村大将负责进行，这是中央的意图。”

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大将对 5 月来访的参谋次长河边虎四郎中将说:“完全达到我们的希望是不可能的，但愿作到能使重庆政府至少默默保持中立的态度。”他计划将一直在秘密进行的此项工作推向前进。

此外，总参谋副长今井武夫少将，也从 2 月下旬和重庆第十战区副司令何柱国取得联系，于 7 月 9 日在河南省新站集就和平问题进行了会谈。但是互相都在试探摸底，尚未进入谈判阶段。准备与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会见的工作，直到战争结束也无结果。

另一方面，对中共实行何等策略则不明确。只是中央近来对思想战极为重视，对于英美的思想攻势和共产主义的威胁，不断向军队和全体国民发出警告，并努力进行宣传教育。

兹将陆军省兵务局的一位职员以“思想战线”为题，在《偕行社纪事》杂志(军官阅读的刊物)上发表的论文中“中国共产党的动向”一段摘录如下:

中国共产党由于在中国民众中进行唤起民族觉醒工作，在农村中进行政治经济工作，成功地掌握了民心，其势力正在日益壮大。党的势力壮大虽然并不意味着全中国的赤化，但是党的核心是苏联共产党的一翼，从而具有推进世界革命一环的本质，因此，我等不能等闲视之。

对皇军将兵的瓦解工作，对国民政府官吏的反正工作，对上海及其它治安地区内重要城市和经济工作的扰乱等活动，日益积极，顽强。近来估计美军将在中国登陆，希图与之取得联系，正在极力奔走所谓‘接岸工作”。

对日本国内，企图与左翼进行联系，同时趁调来华工之便，混进谍报谋略组织，使之担当各种谍报任务，或对军事设施进行放火、破坏工作。最近各地就有检举的此种行动。

再有，对朝鲜、台湾、满洲和其它共荣圈内的各地区进行赤化工作，特别是以支援民族独立运动为手段，在东亚各地到处伸展其魔掌。对此，确定综合对策，并付诸实行。实为当务之急，并且要了解他们的意图和战术，以防患于未然。同时，对于他们所策动的对象—满洲和中国南方诸地区的民众，我等必须积极进行善意的诱导。作为指导者，我等自身更要自觉地严格要求，端正自己，此乃根本问题。

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译略)

注:在此期间，中苏关系表现密切，7 月开始谈判缔结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此以前，赫尔利大使于 4 月 15 日曾就国共问题同苏联首脑进行会谈。当时，苏联方面说过:“中共党员实际上不是共产主义者，他们的目的是要在中国实行他们认为必要而正确的改革，苏联并未援助中共;苏联并不希望中国内部分裂和内战;苏联希望同中同保持较为密切的谐调关系，苏联对新疆及其它地区发生的事件表示强烈的关心。苏联主张中国政府要防止对苏联人民差别待遇的一贯态度不变”。斯大林特别指出:“苏联和英美两国都承认蒋介石领导下的中国政府，同时对中国全国军队完成统一愿予协助”，对美国的对华政策无条件地表示同意。然而，这不能认为是苏联的真意。美国接到莫斯科会谈的报告后，给赫尔利大使发出的训令曾指出;“这是当前形势下苏联的态度，并非出于长远局势的产物，不要过于乐观地使中国政府轻易对之产生期望”。(本段中的中国政府指国民党政府—译注)

五、战争结束

日本的停战

8 月 9 日接到苏联参战的通知，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立即部署上海方面的一百一十八师团(师团长: 内田银之助中将)向张家口挺进，并命令转用于南满的兵团作好出发的准备。当夜接到对苏准备发动全面作战的大命，遂将新编入中国派遣军指挥下的关东军承德支队，划归华北方面军指挥，并命令该方面军“当外蒙方面苏军来犯时，应以现有兵力将其击溃”。

华北方面军命驻蒙军进入现有阵地，掩护我方集结兵力，同时于 12 日将第一，第十二军从山西南部及河南撤出。分别部署于北京及济南方面。13 日接到优势的苏蒙联合军从张库(张北—库伦)大道方面南下的情报。

中国派遣军 14 日接到全面开始对苏作战的命令，15 日拜受停战的诏书，16 日收到停止积极进攻作战的命令，接着又收到“即刻停止战斗行动”的命令。遂命令所属部队立即设法贯彻执行。然而，日本停战真情一经判明、重庆与中共的矛盾便急剧激化，竞相夺取日军的武器、资材和抢占日军占领区内的重要据点。自 16 早晨以后，占领交通干线和要求小部队解除武装的情况到处发生，群情为之骚动，治安突然恶化。为此，总司令官对所属部队下令: 除根据统帅系统的命令外，对于所有要求一概拒绝，必要时可以采取断然自卫措施行使武力。

内蒙方面的苏蒙军策应共军的纷纷起义，重庆方面傅作义军想要抢先占领张家口，从 19 日开始进攻张北阵地。中国派遣军及方面军于 19 日指示驻蒙军“停止战斗行动，适当进行局部停战谈判”。但是，当地的独立混成第二旅团受到苏军的攻击，正在交战中。因此驻蒙军从 20 日开始进行交涉，并将前来增援的第一百一十八师团主力(因 17 日以后逐渐到达)部署于张家口以南地区。从当天夜里开始送日侨后撤。苏军方面强硬要求解除全部武装，交涉未能成功。驻蒙军不得已于 21 日夜间，将主力部队向北京北侧地区撤退，一部分向大同附近撤退。苏蒙军也未再向前推进。

侵入热河方面的一部分苏军，于 21 日将负责警备古北口的独立混成第八旅团的一部分解除武装，并将负责交涉的参谋绑走，且有南下之势。方面军准备断然进行自卫，但苏军于 22 日夜间撤走。

在山海关，苏军于 31 日侵入，当地警备队事先后撤，避免了发生冲突，但残留的日本侨民蒙受很大损失。

注: 蒙疆方面，从兴安岭侵入的苏蒙联合军，为主攻军的右翼助攻军，苏军拥有一个坦克旅、二个机械化旅、一个骑兵师、一个反坦克旅等，外蒙军拥有四个骑兵师、一个装甲车旅等，总兵力约四万二千人，拥有坦克约四百辆，大炮约六百一十门。其中，进入张北方面的先遣队，为机械化第二十七团(外蒙军)、第七装甲车旅(外蒙军)、第三十摩托车团(苏军)。进入热河的先遣队为苏军坦克第四十三旅，机械化第二十五旅，坦克第二百六十九团。

在此以前，中国派遣军于 23 日接到蒋介石的命令: “中国战区所有日军，必须向蒋介石投降。”今井总参谋副长作为总司令官代表，于 21 日飞赴湖南省芷江飞机场与重庆方面代表陆军总部参谋长萧毅肃会谈，23 日接到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致冈村总司令官第一号备忘录，并接受了上述命令。9 月 9 日，冈村总司令官在南京签署投降书。投降仪式在各个地区分别举行。北京于 10 月 10 日举行投降仪式。

当时重庆军主力远在华中、华南的西方地区，因此向日军占领地区，特别是华北地区进驻迟缓。在此期间，日军仍在占据地区维持治安，起了很大作用。然而在华北，日军被卷入国共矛盾的旋涡中，由于拒绝了共军解除我军武装的要求，到处都有被其攻击受到损失的部队。从 8 月 15 日到 11 月底，方面军官

兵为此死伤约二千九百名。此外，尚有很多问题: 我第一军由于阎锡山强烈要求协助对付中共，将一部分军人以当地退伍形式连同一部分日本侨民被阎军留用; 各地暴徒的掠夺暴行事件; 战犯问题; 对约达三十三万日本侨民的保护及撤退任务等。直到日军全部撤回日本国内，尚有许多波折存在。

注: 下村大将就任陆军大臣，8 月 19 日成为最后一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的根本博中将，关于战争结束后的状况写有以下的笔记:

在华北，日军严守军纪，继续艰苦奋斗，掩护国民政府军(指国民党政府军，下同—译注)和日本侨民的集中，直到国民政府军能够防御共军的侵犯为止，始与之进行交代，并将武器交出。同时，帮助侨民有条不紊地回国。在此期间，逃亡和失踪的，全军只不过数百名。所以如此，中国领导人的善意也是原因之一。从十一月开始，中国方面对我军一部分部队解除武装，主力部队则是从翌年 2 月开始解除的。但 9 月 30 日在塘沽登陆的美军(在冲绳岛作战时，由于苦战对日军持有强烈反感)担当了在天津地区的警备。在中国方面接收部队尚未到达之前，竟将日军武装予以解除(10 月 11 日完毕)，这是美军的越权行为，同时也是由于缺乏对中共作战的经验所致。因此，治安一时陷于混乱，津浦路到处被共军切断，以致使国民政府推迟了进驻华北和满洲的时间。

中国方面的状况

一方面，中共在今年 4 月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对日军继续进行局部反攻作战，但估计到日本即将投降，抢在重庆前面开始了机动敏捷的行动。

8 月 9 日，听到苏联参战的消息后，毛泽东当天以“对日寇的最后一战”为题发表声明，指出必须调动所有抗日力量，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反击，密切而有效地配合苏联及其它同盟国作战。朱德也在 10 日向解放区的武装部队发布命令(延安总司令部第一号命令)，要求“对解放区的所有日军及傀儡军队立即解除武装，然后将其占据的要地予以占领。接着，11 日，命令在山西、河北、山东的旧东北系中共各部队要配合苏军的进攻，并为接受日满军投降，向热河、辽宁、吉林挺进(同上，第二号命令)，命令驻在绥远、察哈尔及热河的贺龙、聂荣臻部队北上，策应外蒙军(蒙古人民共和国军)的进攻(同上，第三号命令)。同一天蒋介石也给各战区发出解除日军武装古领要地的指示，12 日获悉朱德的进攻命令，立即命令朱德原地驻防待命。在法律上共军是在蒋介石指挥之下，但实际上早已脱离其统制。13 日朱德向蒋介石提出杭议，同时在 15 日，以“解放区抗日军总司令”的名义，命令日军投降。此外，当天中共向美、英、苏驻华大使馆送交了备忘录，中国解放区的人民和武装部队必须享有参与同盟国对敌国受降的权利，并且为了减少中国内战的危险，要求美国马上停止对重庆国民政府的武器贷与法案。(以上未按有关中文资料校正。—译注)

基于此一方针，各解放区的中共武装部队展开了解除日军武装的作战。在此期间，毛泽东赴重庆同蒋介石进行谈判，以期缓和国共矛后。然而，日军服从盟国的命令，拒绝了向中共缴械、美军也援助重庆军向华北挺进，因而中共的意图很少实现。但是由于共军很快进入满洲，以及苏军对共军的援助，为以后国共内战带来很大影响。

注: 据美国国务院“中国白皮书”内称，满洲有日本人建立起来的庞大的工业组织网，有强大的输出余力，有富饶的农业地区。其面积占中国总面积的四分之一，人口占总人口的九

分之一，工业超过中国其它各地总和的四倍，发电能力将达其它各地总和的三倍，铁路密度为其四倍以上。而且解除关东军约七十五万人、满洲国军十五万人的武装后，即可成为一个庞大的兵工厂。因此，国共双方及苏联当然对之感到极大兴趣。

结束语

华北治安战的特点是，其作战对象为彼此互有矛盾的中共和重庆两方面，它们既属同一民族，而性格、素质、战术却各不相同。对这样两种势力，我军一方面要维持艰巨的统治，另一方面还要持续不断地进行政治、军事、谋略斗争。从这一战争的现象方面可以看出以下各点:

一、敌人的性质模糊不清

按照战争的目的，对于互有矛盾的重庆和中共两方，究竟以哪一方为真正的敌人模糊不清，难以确定。在战场第一线应该以谁为打击目标，就更难判断了。尤其是中共势力，它和日军在长期训练中作为目标所描绘的敌人，或者是迄今为止我们所接触过的敌人，无论在形式和本质上都完全不同。

二、没有战线的战场

在传统的正规战中，互相对峙的敌我战线是比较明显的。然而，在治安战期间的华北战场，敌我的势力范围犬牙交错，变化无常。有关敌人准确位置的情报，很不可靠，甚至在我方势力范围内部深处经常潜藏有敌人的军事力量。

三、长期持续的战争

从芦沟桥事件爆发到战争结束，打了八年有余，如果不是全面停战，这里的战争恐将长期继续下去。这一战争，不是以往的持久战，也不是消耗战，而是一种独特的战争。

四、新型的总体战争

军事力量的优劣、军事行动的成败，并不直接连结于战局的这一事实，说明在军事以外的力量起了很大作用。这种兼有政治、经济工作、社会思潮等非军事力量的战争，有助于敌人的战斗意志和战斗力的发展，但是阻碍了我方战斗力的发挥。

总之，华北的治安战，是一场在战线的形状、战斗力的构成、作战的方法等各方面都复杂多端、千变万化的战争。而且，随着整个形势的变化，华北本身的地位也发生变化，加以其它方面战局的影响，使华北局势更加陷入动乱多变之中。

此外，使治安战的经过和成果受到很大影响的重要因素之一，是日本方面进行战争的目的或基本方针，随着形势的发展所作的改变。

“确保华北安全”，这是由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事变初期为大本营)给与华北方面军始终不变的基本任务。这一任务的目标有二: 一个是有助于中国派遣军完成其作战任务，粉碎敌方继续作战的企图。另一个是保障当地政权友好、稳定地成长。前者为军事目标，后者为政治目标，两者本来并无矛盾。这就是说，政治的稳定和成长，应该是提高政治潜力，使敌人失去继续作战的借口，削弱其抗战意志。但是，现实情况的进展，却使两者之间产生了矛盾，从而对于治安战的进行造成了困难。这是因为，当地政权的稳定成长使原来的战争目的消失，而降低为一种战争的手段了。这种不得已的转变，自然是由于大东亚战争造成的。

对上述转变过程根据资料稍加说明如下:

根据1938年11月30日的御前会议决定的“日中新关系调整方针”，其根本目的为:“在建设东亚新秩序的理想下”，“日满华三国结为友好邻邦，以共同建成东亚和平轴心”。当前的具体目标则为:“一、在华北及蒙疆从国防及经济上(特别是资源的开发利用)设立日华高度结合的地区，二、蒙疆地方除前项外，为了防共，要确立军事和政治上的特殊地位。”总之，扶植和加强当地新政权，就是处理事变的根本目的。这一目的在1940年11月30日签订的“日华新条约”，“日满华共同宣言”条文中也均未改变。然而，由于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及美国强大压力的影响，使战争目的的内容和实施策略有所改变，逐渐成为只顾强调权利的趋势了。

至1941年1月，在“对华长期作战施策要领”中，明确了“中国的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要联系日满两国的情况、彻底开发和获得国防资源。同时，要有助于安定占领地区的民心”。11月5日，在决定进行大东亚战争的御前会议上，在“完成帝国国策要领”的“对华方针”中，明文规定:“肃清英美在华势力”、“诱导并促进占领地区内的华方要人的积极活动”，“在对华经济关系方面，重点在于获取物资”。从字面上看，并未放弃培育新政权和安定民生，但与之并列的开发和获取重要国防资源，则由于整个战局的要求，逐渐被重视起来，并不可避免地上升为战争的根本目的了。换言之，华北治安战的目的，实质上就是把华北、蒙疆当作完成大东亚战争的兵站基地而予以维持和发展，当地政权的稳定只不过是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所不可缺少的一种手段而已。1942年12月21日，御前会议决定的“为完成大东亚战争的对华处理根本方针”，也就是要将上述目的贯彻到底。

为了适应中央根本目的的改变，华北方面军的基本布局当然也要随之变更。华北方面军的主要目标一向是放在培育和加强防共亲日新政权上的，历尽艰辛并付出了重大牺性的治安战的目的也正在于此。其一切部署都要慎重考虑提高改善民生和安定民心(虽然新中国的政治理想是否出于民意尚属疑问)。然而自从1941年以来，为了加强国防力量，对于经济方面的要求越来越高。随着大东亚战争爆发，直接支援日军全面作战的兵站基地的使命，越发受到了重视。在1942年中，由于有效地支援了整个战局，以及华北对共措施的进展，前述两种要求的矛盾尚未表现出来。从而认为根本目的也是可以完成的。但至同年年底，由于过高估计了国民政府的实力，而实行了新的对华处理根本方针，于是，现地驻军不再过问政治，以致由军、政、会、民综合力量形成的防共基础发生破裂。另一方面，整个战局也出乎意料地迅速变坏。兵站基地的使命骤然加重，为此，确保治安就逐渐变为完成该使命的一种手段了。

关于防共问题，从事变开始即为悬案。起初主要是针对苏联、外蒙等共产势力，计划以蒙疆起到缓冲地带的作用。但是，当逐渐认识到渗透占领地区的中共势力、乃是治安的主要症结时，方考虑到要以对共措施作为治安战的重点。然而，这种认识的转变，实际上为时已晚，而且很不彻底。究其原因，固然由于中国派遣军及中央的基本布局，一贯以重庆势力为主要敌人，粉碎其继续作战企图为目标，致使作战观念不能统一。但是，归根结底，不可忽视的一点，却是多年来存在于整个陆军的“歼灭野战军”的战略教条所起的作用。

此外，华北治安战不能成功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当地政权应有的状态成问题。拥立当地人士组成的国民政府等政权，并使其健全成长，以摧毁重庆政权的基本方针，不能认为是错误的，错误的是政权负责人的选择和扶持的方法。

无论华北政务委员会或蒙古联合自治政府，都没有积极主动地展开活动，其领导者都是些保全自己和追求权势的中国旧的政客。这些人缺乏新的政治观念，根本不想真正掌握民心，他们所关心的只是看日军的脸色行事。最初，曾指望以其武装团体在日军削减兵力时起到补充兵力的作用，但结果连这一点也都落空了。因此，其政治势力的范围，仅限于日军羽翼下的地区，即主要城市和主要交通线狭小的两侧。所谓亲日防共政权实际上只不过徒有其名而已。

作为兵站基地支援了整个战争，开发和获得了大量国防资源送回日本，可以算是华北治安战的一个成果。然而，其中也有单方面的强行榨取，以及陆、海运输力量的掣肘等情况，从日满华一体总动员的立场来看，其成果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总之，从全面来看，华北治安战是既未收到预期的成果，也未能达到作战的目的。

仅以对共治安战为主题，举出主要教训如下:

一、对中国、中国人以及中共特性的理解

完全理解土地辽阔、历史悠久的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气候风土人情各个方面虽然极为困难，但如对之不理解，要想采取适当的措施是不可能的。中国事变爆发的原因之一，往往被认为是日本对中国方面的立场和社会情况缺乏理解。当时，在中国建设统一国家的运动和民族自觉的风气已在兴起。但是，在很多日本领导人的头脑中，仍然看做是旧军阀时代的中国，对其新的动向并无确切的认识。

另一方面，共军与民众的关系，同以往的当政者不同。中共及其军队集中全力去了解民众，争取民心，不但日本，就连重庆方面也是远远不能相比的。正因为如此，尽管他们在数量方面处于劣势，却具有不容轻视的坚韧力量。就战略战术而言，其巧妙的作用，并不是由于他们学习了马列主义，而是他们在中国风土人情及历史的基础上，巧妙地利用民族主义而取得的。

中共是有铁的纪律的党组织，以党为核心团结军、政、民进行所谓四位一体的活动。它一方面与重庆政府保持不即不离的关系，一方面自己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抗日救国”的口号动员、引导民众，并以“民主联合政府理论”逐渐改造社会的政策，来掌握民心，从而不断扩大和加强了党的势力。它以“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方针，将抗日战变为政治战，在建设解放区的同时，鼓动民众广泛开展“游击队”活动。当然，这些措施并非所有民众都无条件赞同，但他们也万无一失地依靠强制力量来进行调整。尽管如此，所有这些作法都是适合其国家风土人情和民族性的。治安战的目的归根到底就在于争取民众。

与此相反，由于日本方面对中共在抗日势力中的地位及民族主义不够理解，因而长期未能掌握中共的这些实际情况。这也是由于中共的高度保密，使我方的调查研究工作极为困难。至 1941 年，方面军觉察到中共存在的可怕，于是编辑“剿共指南”通报全军。

此外，还有所谓“圣地”问题。无论日本或重庆方面都不想放置延安的陕甘宁边区于不顾，但由于政治、军事以及其它方面的制约，无法将其攻破，结果使它发挥了“圣地”的作用。时至今日，才充分认识到“圣地”在“解放战争”中对革命者是不可缺少的，陕甘宁边区所起的作用是太大了。

对于中共，只有排除任何妥协，必须从各方面都采取彻底的对抗政策。就中共的信念而言，他们是要一直战斗到日军完全从中国撤退为止的。因而，日

本方面一度试图与中共进行交涉，或与完全无力控制中共的重庆政府进行交涉，以期取得妥协，但即使交涉成功，也不过是敷衍一时的办法，终究不能达到防共的目的。

二、各种肃正建设的统一和连续性

无论从治安战的目的或中共的战略战术来看，将肃正讨伐等军事行动与政治、经济、文化各种建设措施统一起来是绝对必要的。

当时由于受国际、国内舆论的牵制，在不能实行军政的不得已情况下，推行统一措施受到阻碍。在日本方面由于兴亚院(后为大东亚省)系统的当地机构与军方各行其是，因而有时政令不一致，或者在业务上发生重复和漏洞，在中国方面，半独立的政权分别存在于蒙疆、华北和华中;日华双方军、官、民之间的根本观念不统一，日华双方都缺乏有关政治、经济的人材，尤其是中国方面有能力的领导人和官吏，大都离开日本占领区，或者隐居不出。日本方面渴望中国方面能发挥主动性和积极性，虽然在第一次至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时，多少取得些许成果，然而未能达到转让权限的地步，从而使中国方面的政治力量始终不能渗透到基层。

此外，以中国和中国人为对象，如不特别重视各种政策措施的统一和持续性，工作就很难收效。然而，不仅是中央的对华政策频繁变更，当地也有同样倾向，而单从军事观点出发进行的部队调动、警备换防等，都是不利于政策措施的持续性的轻率行动。实际上，在彼我两军交互进入、撤出的地区，当地居民不知应该何所适从。结果，由于担心后患，而采取了不合作和旁观的态度。

至 1943 年以后，对华处理根本方针的宗旨，事实上是放弃了治安建设的一切措施，一变而为以军事为主体，肃正建设的统一被破坏一了。

三、军队的精锐

共军主要是依靠民众来进行游击战，其装备远远落后于英美苏军。因而，对付这样的军队，与其使军队的装备现代化，倒不如使军队精锐化。所谓精锐化，就是说，在进行与正规战完全不同的治安战即游击战、政治战、思想战等多种战争的情况下，都要具有取得胜利的实力。

最重要的是严格的军纪。如果能做到以军队的威容和武德获得民心，就可使共军失去民众的协助，而导致其战斗力的衰退和崩溃。

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大将于 1943 年 9 月 1 日曾在训示中指出:“进行剿共战争，在于充分发挥皇军之威力，使敌人感到‘日军真可怕’，使民众感到‘日军真可仰赖’”。

然而随着战争的长期化，违反军纪的事件层出不穷。特别是从 1942 年底前后，性质恶劣的犯罪增多起来。对此，部队的各级指挥官必须严加注意。

再从部队的军事行动方面来看，面对变化无穷、进行高度游击战的共军，从上级指挥官以至最小部队的指挥官，都必须经常仔细研究编制、装备、战术，设法加以改善，遇事随机应变，掌握高超的指挥战斗的能力。关于治安战，在进行战斗的同时，还必须进行治安工作，必须把政治战贯彻到底。因此，所有官兵都必须是具有坚韧精神、精通政治的精锐战士。

四、关于剿共战

在华北方面军中，除部分有识之士外，对共军的实际情况认识不足，因而未能在萌芽时期予以扑灭，以致坐视中共势力壮大起来。然而 1940 年经过所谓“百团大战”开始觉醒后，在肃正讨伐作战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剿共指南”中指出:剿共战的秘诀在于首先掌握中国共产党的实际情况，

进而满怀信心，制定因地制宜的对策，并坚决贯彻执行，断然予以剿灭。在进行剿灭时，要采用积极果断的武力作战，摧毁其军事力量，并以周密的剔抉战术破坏其党和行政组织，特别要破坏其核心部分。随后即须展开各种清新和强有力的政治工作，以确立治安、安定民生。此外，还应懂得摧毁敌方武力是完成剿共战的先决条件。同时要仔细研究敌方惯用的游击战术，考虑并制定新的有效的对共战术。努力争取及时获得准确的情报，不断地进行讨伐，不容敌方有回旋余地，以期迅速将其消灭。总之，主要依靠担任这一任务的部队的信心和力量。中共游击战术的本质是秘密地将多数民众团结在自己周围，形成一个整体，采取“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敌惧我扰”的方针，与民众一道反复进行顽强的战斗。敌人的武装力量并不仅是正规部队，其周围有层层的民兵和拥护者。民众具有两面性，他们是要看彼我力量如何而决定去从的。因此形成难以分清敌军和民众、敌方和我方这些错综复杂的现象，这种情况同正规作战完全不同。

当时有关人员曾慨叹：“对付共军犹如割除根深蒂固的杂草，费尽力气毫无成效，真是无能为力。”

剿共必须首先破坏其军事力量的核心，同时要挖出中共党和行政组织。此等组织地下活动能力很强，用武装起来的民众团体进行自卫，依靠彻底的除奸工作清除异己分子，并具备相当完整的防谍组织。在这样情况下进行间谍工作，尤其是想要侦破存在于异民族内部的高度有机体的秘密组织，可以说是难上加难。但是，我宪兵队以及我侦察机关所获得的成果是相当值得称赞的。

从剔抉工作中所得的经验，可以归纳为，“通过周密的谍报活动，掌握其中枢地下组织的情况后，有计划地以疾风迅雷之势实行剔抉，务期无遗漏地挖出其所有干部，特别是重要领导干部”，此际，也必须做好立即投入战斗的准备。

这些工作说来容易做起来却很难，往往是只能挖出一部分或仅仅挖出低级分子。这样，反使对方加强了保卫党的手段，行动更加巧妙，从而使以后的剔抉工作更加困难。

其次是警备的问题。在华北方面，直到最后都是采取高度分散部署兵力的方法。

华北方面军强调这种部署的积极意义，并指示:妥善部署警备部队是进行讨伐行动的基础。占据的重要地点，既是搜素警戒的据点，局时也是准备机动讨伐的处所，依此即可直接摧毁敌人的根据地。

但是，当我们观察为改善治安所部署的警备队的状况时，不难看出，只是在连续不断地出动，进行果敢的讨伐，但其结果往往是未曾交战而疲于奔命。然而，每当得到居民的报告就立刻出动，将会提高居民对我方的信赖，所提供的情报也会是正确的，从而也将取得大的战果。如果我方部队在所辖范围内公然通行，部队的威令即可渗透到基层。即使是小规模也好，只要是不断地积极出动，就可使敌人经常感到不安和动摇。反之，如我方处于静止状态，敌人就可以行动自如。

然而，如果长期采取高度的分散部署，会使警备部队的官兵产生孤立感或涣散情绪，同时也会使上级指导官不能充分监督指导，形成怠于讨伐和放松警备的倾向。从而使中共有机可乘，在山区或行政边界附近逐渐扩大其根据地。至1943年以后，警备兵力小的地区就频频受到中共的攻击。

要想得到中国方面武装力量的协助，主要应该着眼于乡村自卫之上。因为任何国家都不愿意同胞之间自相残杀，所以治安军等进行讨伐作战并不起作用。

据说县以下的警察及警备队为了自卫倒是起了很大作用。

五、有关情报问题

中共及其军队与政治团体、民众团体结成一体，进行息息相通的情报活动。尤共是在民众的谍报，防谍组织方面有独到之处。

我方的情报活动也是以民众作为情报的重要来源的。只要掌握了民心，情报自然就会源源而来。得不到情报就意味着脱离了民众。此外，利用密探、俘虏、秘密结社、宗教团体、经济团体等，或以文件谍报、无线电特种情报等尽量掌握细微的征兆。中共方面的密码虽极其严密，但经华北方面军从1941年春约以一年的时间进行研究，终于破译成功。

情报活动，除军事情报外，还要尽力收集以下情报:

(1)收集中共各项工作的情报

中共的工作主要是争取民众的工作。因此，观察敌方工作对民众的影响如何，是对中共情报工作的第一步的工作。

(2)为剔抉工作收集谍报

侦察获取有关中共方面党，行政机关的地下组织及其机能的谍报。

(3)治安情报

在调查敌我政治、经济、思想等各种政策及其实施的效果和各阶层官民的言行及秘密活动等情况时，如果仅仅了解表面的社会现象，是非常危险的。由于中共的地下策动极为巧妙，待到表面上出现某些征兆时，往往是已经无法应付了。

六、关于治安建设

华北方面军为了达到剿共的目的，在实施军事对策的同时，力图强化治安、安定民生，大力推进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各种政策，期望不直接行使武力，而以武力为后盾发挥政治力量，进行治安建设。其主要措施有以下几个方面:

(1)安定民生和掌握民心

华北方面军在“剿共指南”中指出:“华北治安的关键在于掌握民心。只要能掌握民心，治安工作大体即可完成。如能做到使民心归顺，一切治安问题当可迎刃而解。中共最害怕的是日本人的诚心诚意。实际上，只有掌握这一精神武器才是剿共的要决。”

然而我方工作的成果和理想的差距太大。究其原因，早在事变初期即已失去民心，这对以后影响很大。当时处于军事作战时期，致使中国的土地荒芜，民不聊生。虽说占领地区的行政工作因不熟悉而不够完善是不得已的情况，但我方军、官、民的思想认识上，确有很多应该反省之处。例如，当时提出“讨伐暴华”的口号，“讨伐”在态度上就有问题，所谓“暴华”也有问题。这一口号的用意本来是惩罚暴戾的中国军阀。遗憾的是，其后竟不加区别地将一般无辜民众也卷入在内。这样一来，反而更加煽起了中国民众的反日、抗日、侮日的思想。

华北方面军自1939年以后，开始努力建设华北，然而难以消除上述影响。日军对民众纪律也有缺点，而在日本官吏及侨民中滥用特权的也大有人在。再加上中国方面的贪官污吏和奸商等对经济的破坏，使民众生活日益困难，民心更加叛离。

总之，日军所听到的是来自中国上层的一片颂扬之声，根本听不到一般民众的责难。有很多实例说明，凡是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民众，一旦对其它民族抱有怨恨，要想消除是不容易的。军事上的失败比较容易挽回，但要弥补对社

会犯下的过失就极为困难了。因此，深深感到作为领导者的自觉是非常重要的。

华北方面军是想树立起反共亲日新的社会秩序，但只靠宣抚等工作来取得民众的好感是远远不够的。首先，必须将民众组织成为具有反共亲日意识的社会，并使之与共产党势力隔离开来。中共想乘民心不稳、民众生活不安之际，展开强烈政治攻势，如果占领区内的民众，没有这种反共亲日意识的社会组织，民众就只能表现出顺应形势服从任何一方的两面性。一个村子里就有属于日方和共方的两个村长向两方面纳税的情况。这些情况足以说明我方政策的不当。

(2)关于特务机关

华北方面军随着治安的恢复，在各地设置特务机关，以便有效地利用当地特点实行符合实际情况的行政管理。

各地的特务机关处理复杂的多种业务，同时进行政略战略两方面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由于人材和经验的不足，也产生了很多错误和过分的现象。对于本来应该由中国方面自己处理的政务，也借口幕后指导进行干涉。要想借助外部压力改造社会结构，是不会收到良好效果的。必须用精通实际情况的中国人自己担负起改革社会的任务。

华北方面军指示各政务工作人员，对于华北政务委员会以至各乡村，都要最大限度地发挥中国人的作用。要培养和加强中国方面的政治力量和武装自卫力量，让他们自己负责确保治安。这是从最初就确定了的基本方针。然而中国方面缺乏主动性和积极性，因此，不得不始终对这个软弱无力的政权进行扶持，这是华北方面军极为苦恼的事。结果就产生了日本人拼命干，中国人休息的现象。

(3)有关治安地区工作

按照治安情况，将占领地区划分为治安地区、准治安地区、未治安地区。针对各个地区的不同情况，分别采取肃正建设措施，有步骤地扩大治安区，可以说这是最妥当的办法。尤其是华北地区过于辽阔，同我军拥有的兵力很不相称。因此，在治安地区中，进一步将特别重要的地区划为模范治安区，以中国方面为主体，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实行了有机的综合工作。此种办法，通过发展生产，安定民生，向周围地区渗透行政力量，取得了相当的成果。但是，在1943年以后，由于整个局势的变化，不仅这种设想未能实现，到最后竟形成了只能保住所谓“点”和“线”的局面。这表明我方的军事力量直接影响到治安，同时也表明只靠军事力量扶持的政权的脆弱性。

另一方面，中共也大体上与我方同样划分为敌占区、中间地区、解放区，企图逐次扩大地盘。但其作法与我相反。他们首光进行政治战，组织群众，然后才行使武力。他们把治安战看作政治战。全力以赴进行政治工作。因此，其军事力量比之我方虽然处于劣势，却是逐步扩大了势力范围。

方面军实施的封锁战术，最初，在隔断和敌方地区的联系、实行经济封锁方面是取得了成果的。然而到头来仍以失败而告终。究其原因，并非由于该项施策的不当，而是在制定适合当地经济情况的措施上有缺欠，同时在实施中也未能贯彻到底所致。

(4)关于新民会

进行总体战争，须有一个包括个体国民在内的有机的组织。在中共方面就形成了一个从中央直到基层以党为中心的具有强大统制力量的军、政、民的巨大组织体，完全能够适应总体战的要求。在这方面，日军虽然能与之匹敌，但日军与中国方面是各自单独存在的。为了使中国方面官民成为一体。形成以民

众为基础的实践组织，因而成立了新民会。从当时的政体看来，对新民会势必要抱有极大的希望。但是，该组织的发起并非出于民众的要求，而是官办的御用团体，是在日本庇护下的所谓“日本新民会”。其基层的民众对时局既无认识，又无主动性和积极性，而且也找不到优秀的领导人材，这样的组织，终究是无法与中共抗衡的。

七、关于思想战

为了对抗共产主义，分别在华北树立新民思想，在蒙疆树立兴亚思想，在此基础上力图达到舆论的统一。但是，这些思想，是在日本的大东亚新秩序理论、中国的传统思想及三民主义的基础上仓促拼凑的，同华中的正统国民党、东亚联盟、或满洲国的协和会等思想的基本概念有所不同，甚至有对立和分歧之处。

在异民族或全中国实行统一思想，虽然既有困难也不受欢迎，但至少在反共这一基本政策方面，必须具有强大的说服力才行。但是象那种内容极端抽象、超越现实、缺乏实践性的理论，一般民众既不理解也不感兴越。此外、对于既反共也反日，即对于历来一贯认为日本的思想和政策的本质就是侵略的知识分子来说，也根本没有说服力。中国人要的是自己的理论和由自己建立的思想。但是，占领区内居于指导地位的知识分子，多为投机取巧之人，无所谓自己的理想。如果用以思想对付思想的观点来看，象新民思想等等，无法与共产主义相对抗。

在中共方面，他们拥有共产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于1944年靠毛泽东思想统一了党内思想，对于党外，以“抗日”思想团结大众，以严厉的除奸工作加强统一战线，但是，并不急于用共产主义去实现统一。在宣传教育工作方面，也以党为核心，全体党员、全体战斗员均作为思想战线的战士进行活动。

思想战并没有界线，所以赞成中共的人也广泛出现于中共游击队战区以外的地方，其原因即在于此。(以下译略)

译后记

《华北治安战》一书所依据和引证的资料，几乎完全是日本侵华时期军部和政府的机密文件，以及当时战争决策者、执行者的日记、回忆等。因此，本书虽为战后编写，但仍然是当时侵略者的立场、观点，以致有不少粉饰侵略和自相矛盾之处。例如书中一方面再三否认侵华日军执行“三光政策”，但另一方面却又记载了“三光政策”所造成的犯罪事实，并把犯罪的原因完全归咎于日本国民教育上的缺欠。又如书中引用了大量“赫赫战果”以炫耀日军的强大威力，而在某些地方却暴露出“由于一向只凭战果论功行赏，因而造成了掩饰失败、捏造战果、虚报战功的坏风气”(折田贞重大佐语)的内情。而对于侵略军在“扫荡”中杀害和绑走的老百姓，也都列入到“赫赫战果”之内了。此外，书中并有多处对中国共产党、八路军及其所领导的抗日战争进行了歪曲和诬蔑。

尽管如此，本书仍不失为一部详述日军侵略我华北的比较完整的历史资料。它不仅叙述了日本帝国主义在战争各个阶段侵略我国的方针、政策的制定和演变的详细情况，并且记载了历次作战计划、军事部署以及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所谓“总体战”的具体内容。这些资料，不仅可供研究战史之参考，而且对于了解侵略者采用的战略、战术，掌握其作战规律，具有重要意义。

另外，本书从侵略者的角度，以大量事实说明了侵略战争不得人心、终必失败的道理。这在当前更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书中记载的整个战争过程生动地表明:日军侵略华北是费尽了心机的。在军事上它用尽了各种战略、战术，挖空心思研究和采用了诸如“楔入战术”、“居座战术”(泡蘑菇战术)、“剔抉战术”、“撒网战术”、“囚笼战术”、“铁壁合围”、“分进合击”，以及制造无人区等等无比残酷的手段。在政治上用各种阴险的谋略，进行欺骗宣传，组织“新民会”，企图树立所谓“新民思想”，把华北广大人民网罗在侵咯者所设的圈套中，实现所谓日、满、华亲善，对国民党军队，则实行怀柔、诱降政策，例如所谓“对伯(阎锡山)工作”，企图不血刃而取得华北的领土。在经济上，采用各种手段，搜刮掠夺，以达到“彻底收集华北战略物资，尽量多住日本输送，以支持战争(华北方面军第三课高级参谋神崎长大佐笔记所记‘华北紧急措施纲要’大意)”的目的。但至最后，侵略者终于不得不承认，对于这样一场军民不分、战线不明的特殊战争，一切战略战术、政治谋略都是无能为力的。这充分证明:有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中国人民将永远是不可战胜的。任何凶恶、强大的敌人胆敢入侵，终必遭到可耻的失败。

本书译文，为了保存原著的精神面貌，有些地方采取了直译的方法。如“华北治安战”(实际是侵略华北之战)、“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中国事变”(七七事变)，“大东亚战争”(“大平洋战争”)、“中国方面”(伪政权方面)…等等，均照原文直译。书中引用《毛泽东选集》,《中国共产党三十年》、《中国革命史讲义》、《抗日战争时期的解放区概况》、《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等书的文字，除译略者外，均按原著译出，末按中文资料校订。有些地方将我方军政领导人员的姓名写错了，仍保持原样，未加订正。这也可以反映出敌人的情报工作并不准确。请读者注意。

限于译者的水平，难免错误或不当之处，尚希读者予以批评指正。

最后，本书上下卷译出后，承李麦同志审阅，特此表示感谢。

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